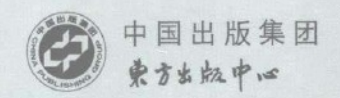


20世纪世界史

丹尼尔·R. 布劳尔 著 洪庆明 译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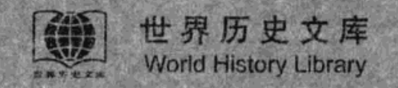
PEARSON

www.Pearson.com

ISBN 978-7-5473-05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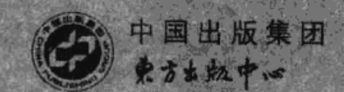
定价：65.00元



20世纪世界史

丹尼尔·R.布劳尔 著 洪庆明 译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0 -3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世界史／（英）布劳尔著；洪庆明译. —上
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1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7 -5473 -0540 -9

Ⅰ. ①2… Ⅱ. ①布… ②洪… Ⅲ. ①世界史—现代史
—研究—20 世纪 Ⅳ.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535 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 -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 ×960 毫米　1/16
印　　张：38 5
字　　数：530 千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473 -0540 -9
定　　价：65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1947年8月，英帝国承认印度殖民地独立，对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来说，这是胜利和欢庆的时刻。如同战后岁月获得独立的其他殖民地一样，印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希望，解放将为此前受奴役的诸民族开启一个自由和进步的时代。然而，尼赫鲁发现，权力转移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人道惨剧。两年后他道出了那种幻灭感，追忆在独立最初数月里他所经历的痛苦、无助和绝望。尼赫鲁的坦白之言很是及时，它警示人们不要夸大后帝国时代带来的成就，也不要低估后帝国时代带来的破坏。它对本书第六版所述的历史，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一如本书首版在十几年前出版时一样。 xiii

近代的各个帝国瓦解后，各民族及其领导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创立新的政治结构，打造新的信任纽带，以便维系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实证明，锻造一个民族共同体，是一项复杂而痛苦的任务。这些令人畏惧的努力，表明后殖民时代曾经尝试过大范围的重建，但它们也包含了这种转型的阴暗面，因为民族之间的敌视和恐惧，在此后数十年里时常引发痛苦的冲突。这些种族和社会动荡，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新政府，造成了政治动荡。

尼赫鲁曾一度为他的祖国设想了非常幸福的时光。这些破碎的梦想，如同印度等国家实际取得的成就一样，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组成

部分。了解这些事件,有助于我们对当今复杂世界里的人类关系达至平衡而清醒的理解。

xiv 破坏和创造是这部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理想和利益之争产生的痛苦和灾难,让这个世界变成动荡不宁和暴力充斥之所。或许,浴火重生的希腊长生鸟(phoenix)神话,为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最适当、也最乐观的形象。辨识这个正在崛起的新时代之基本特征,是所有回顾变革的动荡时代的历史任务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种,尤其是回顾一个与我们间隔如此之近的时代。

重要主题

现代帝国的衰亡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的崛起,是这部教材的主题。这个过程曾产生出强有力的新政治理想,引发了前所未闻的人类关系问题。这个时期动荡激越的历史,将一些民族推上始料不及的显要位置。本教材所涉年代,上溯至19世纪末,其时,新兴的西方帝国和古老的亚洲帝国控制着这个世界广袤的领土,统治着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民族。本教材下迄21世纪初,其时,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似乎预示着世界诸多民族国家迎来新的和平时代。在这个时期,权力掌控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手中,使它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图形塑国际关系进程。与此同时,这样的权力和繁荣也招致了敌人,其中一些人采取恐怖主义方式攻击这些国家。暴力依然是此一时期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帝国的瓦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整个世界民族国家的倍增,促使各国和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强,本教材采纳的世界历史视角,对阐明此点尤具意义。我们力图解答的问题直接源于这样的前提:塑造这种相互影响关系的最重要趋势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全球趋势的出现?它们对全世界各民族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书简短的概述不可能详细探索此种相互影响的全部方面,只能进行选择性的描述。为了吸引读者对重要问题的注意,每章含有一篇“重点”短文以陈述关键问题,以及一篇“聚焦”短文,为某个其生活卷入当代世

界史基本趋势的个人提供传记性的速写。在本教材里,三方面主题支配着我们对重大趋势的选择和对事件的描述:各国的国际关系史;意识形态在形成政治运动与重塑文化和社会价值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关系的演变。

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强调全球相互影响的关联性。国际关系史考察影响各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 各国的政治理想和国家利益;(2) 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3) 国家间的权力平衡。将这三个因素统合在一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全球的冲突与合作:从两次世界战争的大对抗到二战后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对峙,乃至冷战结束后的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史为透视形塑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各种全球性力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

政治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产生自心灵对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的深切认知,它可以引发力量强大的群众运动,左右政府的政策。在当今时代,这种激情是如此重要,乃至一些学者建议把 20 世纪称为"意识形态的时代"。自由主义是 20 世纪初在西方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信仰,20 世纪末它则在整个世界赢得了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支持。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从意识形态上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文化控制提供了广泛的指引。发轫于西方但却没有任何特定思想源流或文本的民族主义,将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置于人类奋斗的中心。毫无疑问,它是如今世界各民族中唯一一个最强力的政治纽带。20 世纪末,宣称捍卫穆斯林的宗教共同体,影响力强大的政治运动,经常利用暴力手段,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属性中获取力量。研究这些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更好地体悟到重要的政治领袖的动机所在和社会不满赖以表达的方式。

xv

最后,经济史强调生产资料、新技术和拥有这些生产工具的重要性。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区别的根本性差异,以及富有和贫穷在全球范围的转移分布,正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石油等重要的自然

资源，对全球经济变得如此必不可少，乃至拥有此等资源的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引来了大国的关注。这种外来的关注既是有益的，也是带有破坏性的。

我们探究的这三个领域——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和经济史，是解释全球变革力量的向导，它们表明了强有力的新历史趋势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方式出现。一言以蔽之，它们说明了不同形式的人类力量重塑20 世纪世界的进程，无论这种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第六版的特征

第六版所述的历史，延续了先前各版本总的论题框架，但有所扩充和修订，以论述近年来引人瞩目的问题和事件。最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两章内容。第一章是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革命性后果；一篇有关约翰·里德生平的新"聚焦"短文，阐明了俄国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对一位激进的美国人的吸引力，同时，一篇新的"重点"短文，探讨了战争对现代社会深远的政治影响。另一个新增章，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里，东亚地区爆发的革命冲突。这两章包含在第五版的相关主题里，但如今比之前得到了更具体的关注。它们的存在，让上编和下编中的其他章节能够比第五版更明晰地专注于主题内容。尤其明显的是，第七章现在专门关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危机频发的背景下西方世界的冷战状况，而第十三章则将苏联帝国的衰落一直追述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重建新俄罗斯的痛苦努力。

当代的国际冲突，要求我们比以前更多地关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大量的新内容聚焦中东地区充满麻烦的历史。第十二章包括一个"重点"篇目，专门探讨伊斯兰教对该地区民族国家演变的影响；第十四章中一篇新的"聚焦"短文，分析了本·拉登不同寻常的人生履历，他的一生，囊括了激进的宗教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这些激进的宗教恐怖主义，给全球事务打上了残酷的印记。从更广的视角来看，石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是第三章新增的"重点"篇目的主题。给第五版最后一章所讨论的"局部战争"增添的内

容，是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两者所提出的战与和的问题，对理解新世纪初期展开的世界历史至关重要。这多处修订，使本版能够比上一个版本呈现出更精微复杂的历史，让第六版的《20 世纪世界史》成为一部与时俱进的历史文本。

解释历史

本书讲述历史坚持最简单的原则，即历史是时间流逝所展现出来的过去的故事。它强调国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趋势，关注那些最具形塑作用的影响力，正是它们把世界塑造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样子。特定的历史主体是历史的鲜活见证，在这样的观念启发下，本书引用政治领导人和观察者的言论，或复制政治招贴画和照片，经常使用反映这些历史趋势的语录和图像。参与者赋予这些事件的意义和目的，与事件本身一样是我们历史的组成部分。这里重述的故事，是他们首先书写的历史，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赞扬或谴责，但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他们意欲何为。

我们对距离近如 20 世纪的历史所做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对周边世界的直接感知的影响。那些反对的人可能说，如此解释犯了“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错误，这是扭曲过去使之适应当下的需要，我会回答说，我们教授和撰写的历史，必定是当下与过去的对话。历史理解的基本要求就是，让来自过去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语汇，回答我们认定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和关怀。

很大程度上，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来自我作为世界现代史讲课教师和教材作者的经历。我教授这门课已近三十年，在此期间，本书的写作一直让我着迷，我与同事们为此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他们慷慨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参与到我的努力中来。我们因时间流逝而获得的对历史的清醒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权，但本书拒绝了这项特权，书中最后章节所涉诸多事件，按照历史的尺度，仅仅发生在昨天。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我的 20 世纪世界史课堂上的学生们，经历了这部著作的诸多阶段。学生听众群每年更新，经常对我的结论提出挑战，激发我重新思

考那些创造了 21 世纪历史的诸事件的意义。由出版商征求的读者评论,对我修订本书帮助极大。这部第六版献给我的女儿卡罗琳和瓦莱丽;愿她们及其孩子,“微风照拂的日光之河”惬意前行,就像她们的父母曾经带着她们前行一样。

丹尼尔·R.布劳尔(Daniel R. Brower)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目录 *Contents*

上　编

帝国时代



第一章　变动中的帝国：20 世纪初的世界

- 西方殖民帝国　1
- 古老帝国
- 西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重点：新帝国主义

聚焦：中国的慈禧太后

20 世纪是一个异常动荡和暴力的时代，战争和革命摧毁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活，这些冲突也激发了宏伟的设想和崇高的期望，期求未来的人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毁灭和创造，是这段历史形影相随的主题。

20 世纪初，各帝国统治着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构建帝国的传统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随着第一个军事国家在中东的出现，它发端于5 000年前并持续到现代。“帝国”最简单的定义是，各民族由一支征服的军队聚拢到一起，并由这些征服者从一个中心区域加以统治的国家。这些征服者中最强大的，来自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亚洲北部的游牧部落，组织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周期性地入侵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寻求财富和权力。他们的军队在欧亚大陆上纵横驰骋，留下道道巨大的毁灭和血腥痕迹。一旦征服者在新土地上定居下来，他们通常采用此前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和帝国机构。说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部落，团结在他们新的信仰——伊斯兰教周围，在中世纪时征服了从地中海—

2 直延伸印度的广袤区域。他们的帝国在数个世纪里一直是文明、商贸和财富的璀璨中心。

到 20 世纪末，民族国家在全世界业已取代帝国。根据事后观察，这种重大的转变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已在进行。一些帝国在这个世纪之初就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背后有着光辉的历史，它们曾一度是文明的中心和强大的军事国家。到 19 世纪末，这两个老迈帝国都无力阻止新帝国攫取它们的边境领土。西班牙帝国曾一度占据了美洲大部分，其殖民地延伸到了东太平洋，是个巨大的殖民地聚合体。但它在历次革命和战争中已丧失了其大部分领土。在这些国家里，国内的政治反对力量和社会骚乱也日益增长。经济资源的不足和政治领导人的虚弱，注定这些古老帝国很快就将消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们，本身也是帝国构建者，它们以文明和自身福祉的名义，继续捍卫帝国掌控的殖民地。但这次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西方最强大的帝国——英国和法国的经济。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它们控制殖民地的能力。它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殖民地，有时是自愿放弃，有时则是殖民反抗的结果。苏联领导人在其他地方捍卫反帝运动的同时，统治着多民族人口构成的最后的西方帝国。1991 年，它的解体标志着帝国衰亡故事的最后篇章。

20 世纪初，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业已启动。19 世纪的西方帝国在殖民地对臣服的民族行使着巨大的权力。然而，在国内，这些国家大多施行宪政模式，承认自己的人民参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权利。这些国家还以某种宪政方式，引入基本法保证其公民享有全部的公民自由。尽管对外是帝国，但从内部来说它们是民族国家。正是这些自由和民族主权的原则，给予了被殖民民族从帝国争取自由的正当理由，西方殖民帝国命定只能持续短暂的时刻。

加速它们崩溃的战争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里，欧洲国家间的民族敌对使得外交对抗加剧，这些冲

突到 20 世纪初变得更加尖锐。西方各国政府的好战性和工业经济生产的致命军备，最终削弱了帝国的存在根基。

西方殖民帝国

19 世纪的新帝国主义建立在早前的欧洲帝国的经历之上。欧洲征服者在 16、17 世纪曾不遗余力地进行构建帝国的任务，他们将海洋变成征服的通道，沿着非洲和亚洲海岸创建贸易中心。一些勇敢的探险家和坚毅的基督教传教士冒险深入到远离海岸的地方。

在西半球，欧洲征服者将帝国远远地扩张到内陆地区，他们把自己的文明和传染病带给了土著人。西班牙军队在寻找金银的过程中，毁灭了阿兹特克人(Aztecs)和印加人(Incas)的帝国，而他们自己的帝国给被征服的民族留下了深重痛苦的印记。西班牙官员、西班牙语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定居点，是一个遥远的、异质的帝国施行控制的有形标记。在英国和法国移民开拓的北美殖民地中，美洲土著的遭遇尤为苦痛：他们的土地被夺取用以耕作，他们被一步步地赶到内陆地区。西方各民族的扩张，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帝国各处领土的面貌。

3

19 世纪西方诸帝国共同拥有新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重要特征。每个国家都有相对先进的经济，包括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工艺和高效的工厂。凭借这些工业资源，领土扩张者们有能力将他们的军队和官吏送过广阔的海洋和巨大的沙漠，进行新的征服。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都向帝国探险、征服和经济盘剥敞开了大门。因此，这些帝国能够建立起庞大的殖民领地，其中一些是移居殖民地，敞开接收来自欧洲的移民前来大规模定居，但在大多数殖民地里，西方人在那里仅施行统治，并榨取可以取得的经济利益。

在西方各国内部，民族主义者以国家荣耀和文明开化使命的名义支持帝国。通过国家展览会、中学教本和其他诸多方式，帝国鼓吹者将殖民统治描绘为人类进步的伟大史诗之一部分。到 19 世纪末，西方国家已拥有了众多新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与母国虽距离遥远，但联系却很紧密，因此，我们经常将这些国家称为殖民帝国或海外帝国。

西方帝国和产业制度

新帝国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欧洲在生产方式、产品分配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等方面的这种深刻转变,开始于 18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它已经扩展到了西方世界的外部边缘地区和日本。它给工业化国家带来巨额的财富盈余,这些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成功的资本家手里,并日益为金融和工业公司所控制。掌握财富者上台影响政府,日益增长的岁入给帝国扩张和军备改良提供了能量。而构建殖民帝国的工具取决于此等工业技术基础。

工业革命要求工程学、冒险事业和工厂劳作领域的新技艺。至 19 世纪晚期,在做出对工业家来说实用且利润丰厚的新发现(比如电)方面,科学家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工业时代,知识是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发明家和工程师是把这些新奇之物带入日常应用的关键人物。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和商人,他是把电从科学理论层面带入到日常生活方面的天才。电灯改变了有财力承担此种新产品的那部分人的公共空间和生活条件。工程师们致力于制造高功率且轻便有效的内燃机以用于制造业,从而使大规模的汽车生产成为可能。工程技术把提取自煤炭和石油的化工产品带入到工业生产领域和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在西方世界,这些重要的发展正如此剧烈地改变着经济活动,以至于欧洲看上去像是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4

对那些拥有金融财富并握有生产及销售新产品所必备的商业技巧的投资者来说,这些产品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诱惑。他们在一种名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体系下工作,其基础是生产、商品流通和服务的私人所有权。个人或公司将经济繁荣或萧条的责任掌控在自己手里,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生意上的盈亏,与其他商业主的竞争也需要寻求最富成效的(因此也是最不昂贵的)运作手段。他们享有财产保护权和合同法的保障,赞赏资本家的工作的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使无限制地获取劳动力的权利,以及日益增长的寻找国际市场

的能力。成功的企业主累聚起财富，每年由经理负责给股东带来分红的股份公司亦复如是。这个体系向新来者开放，只要他们有资金、技术和胆量。

这个体系要求的经济选择自由既是它最大的力量，也是它最大的弱点。与封建时代的可能性相比，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为更大的首创精神开辟了道路。但是，它的运作没有考虑到那些缺乏保障自己福祉的社会和经济手段的人的需要。到19世纪晚期，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循环主宰着欧洲和国际经济发展的进程。每当艰难时期来临，劳工群体总会遭受最严重的打击。社会福利并非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工人的苦难变成大规模抗议运动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灵感的来源。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工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工厂和田间的劳动力。来自农村地区、被廉价工业品摧毁的手工业以及欧洲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提供的丰富而廉价的工厂工人，有助于制造业主保持低成本，以及阻止工人有效地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工厂里的工人必须习得日益复杂的技术，否则就只能待在报酬最低的人之列。具备了这些技术，有时候通过工人停工和有组织的罢工，工人对付工厂主的力量增强了。来自乡村的食物供养着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随着国际商业联系的发展，食品供应往往来自远离工业中心甚至远隔重洋的地方。到20世纪初，工业化国家中城市人口的生活条件正在逐步提高。然而，财富的不平等仍然是巨大的。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宣称，那些成功者证明了自己能力杰出。这个论点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酷理论的又一个翻版。

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分化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与它们在遥远大陆的殖民地民族，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与欧洲社会内部一样巨大。但在经济方面的主要不同是，作为西方工业原料产地的非西方土地日益重要。整个19世纪，寻找有价值商品储藏地的诱惑，将探险者和投资者引往欧洲之外的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政府直接着手推动帝国扩张。塞希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就把在南非钻石产地雄心勃勃的赚钱

5

计划与英国人在东非构建帝国的宏大设想结合了起来,为大不列颠"染红地图"是他描述自己在这片大陆上所追寻的目标的习惯语。但大多数资本家在帝国构建中仅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只有当他们国家的帝国力量很好地确立起来后,他们的活动才变得重要起来。

工业经济不是新帝国主义的罪魁,但它确实制造了国际范围的经济联系。国际贸易公司在国外为诸如肥皂和缝纫机等消费品找到了大规模的市场,西方银行将贷款业务在西方内部延伸到境外他国,在外部则延伸到遥远的世界其他地方。尽管仍然是独立的,但奥斯曼帝国由于欠下西方各国的债务过巨,使得欧洲国家对奥斯曼的部分税赋收入已确立了财政所有权。

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导致其他股份公司到远离自己国家的地方投资。大运河与铁路建设工程,在海上和陆上将世界联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1869 年通航)缩短了欧洲到达亚洲的航程,而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1914 年完工)打破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壁障。随着联合果品公司开始开发中美洲土地,生产将卖给美国消费者的果品,这里对美国第一次具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到 20 世纪初,西方对石油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世界范围的油田探测。俄罗斯帝国边缘的里海城市巴库(Baku)周边石油储量丰富的区域,吸引了瑞典富有的诺贝尔兄弟家族。他们甚至设计了专门的驳船和货车,将石油运往欧洲市场。在那里,其品质和低廉的价格使之能够与来自美孚石油公司出售的石油竞争。其他投资者则远赴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地。在荷兰政府的保护下,19 世纪 90 年代,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那里开发了另一个世界大型油田。

英国政府直接插手支持另一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该公司在波斯(伊朗)西南部发现并开发了储量丰富的油田。波斯在 20 世纪初依然是一个古老的主权帝国,但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要求波斯政府保证不做任何有损于它们利益的事。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导致了对全球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对西方工业至关重要且能带来利润。

新殖民帝国

法国和英国早在先前的数个世纪里就已夺取了大量的海外领地，部分是为了贸易，部分是为了移民定居。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导致法国丧失了君主制政府曾经控制的大部分土地，但扩张在 19 世纪再次开始，直至新的法兰西帝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第一大是不列颠帝国，它在控制此前时代大片领地的基础上，于 19 世纪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殖民地。

法兰西帝国吞并海外领地浪潮的复兴零星地纵贯整个 19 世纪，这部分是因为雄心勃勃的政治领导人努力寻求国外征服的荣耀，他们的野心引发了法国第一波新的殖民征服活动。从法国跨过地中海就能直抵北非，那里各地方王侯仍然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当时的法国政府，在国内民望低下，正力图寻求一项能激起爱国主义支持的事业，而北非还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目标。在 1830 年的一次短暂战争中，法国部队在被其称为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北非领土上，击败了当地王侯的武装力量。19 世纪中期，法国利用名为“保护领地”(protectorate)的间接统治方式，强迫突尼斯(Tunisia)和摩洛哥(Morocco)的当地统治者接受法国统治。这些大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民族，从奥斯曼帝国有名无实的统治下脱离开去，变成了法兰西帝国的臣民。

6

这一轮帝国扩张，也是法国政府致力于保护法国天主教会传教士和法国贸易商在亚洲和非洲的土地上展开活动的结果。他们的存在激起当地周期性的反抗，民族自豪感和法国大众传媒炮制的骇人听闻的苦难故事，促成了法国政府派遣法兰西帝国武装力量前往当地解决这些争端。当他们获得成功时，经常是以那个地区被帝国吞并而告终。

数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一直小规模地在东南亚的土地上活动，中华帝国对那里行使着遥远且日益微弱的统治权。当 19 世纪 60 年代的混乱状态似乎危及法国人的生命时，法国军事力量开进了这片土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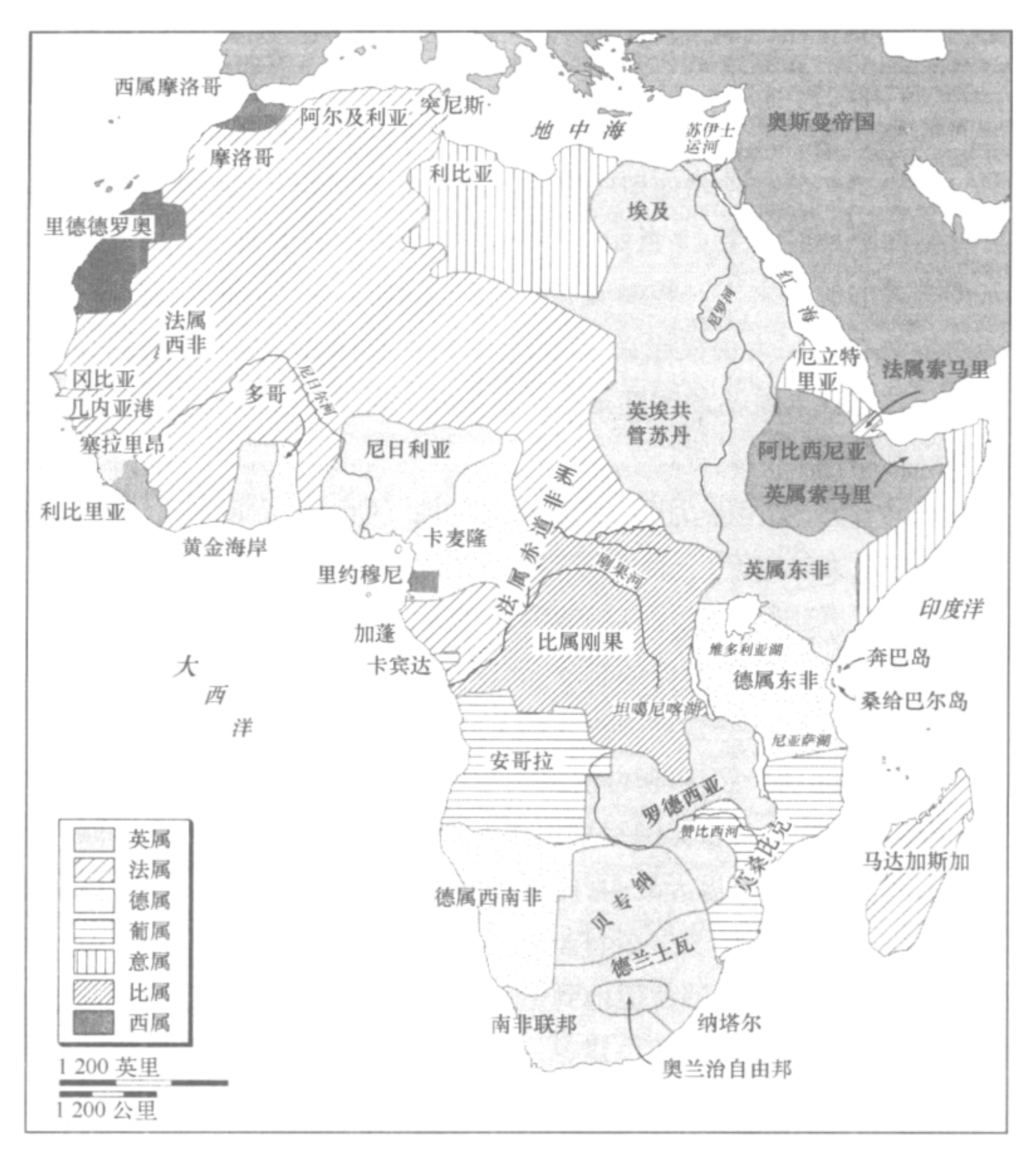
19世纪90年代,他们从当地王侯和中国军队手中夺取的土地包括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区域。法国人给他们的殖民地命名为印度支那(Indochina)。他们的殖民统治模式,也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样,包括了对这些土地上的各民族实行直接的行政和军事统治。天主教传教士继续搜寻和发现归宗者,殖民官员通过建立法语学校体系和为法国军队招募当地志愿兵,鼓励当地人融入法国文化。

19世纪下半叶,非洲成为法国扩张选中的大陆。欧洲探险者在19世纪70年代开启了扩张的进程,他们越过西非的大河进入到内陆。在通过劝服或武力与部落酋长签订条约后,他们宣称,中非和西非广大的领土属于法兰西帝国。在对这片土地或民族没有任何清晰了解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约,以便阻止其他欧洲国家把这些领土占为己有。政治野心和民族主义激情推动了这种"竞逐非洲"的浪潮,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帝国展开竞争。

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落入法国的统治之下,新边界将他们与其土地已属于其他帝国强权的相邻部落分割开来(至少在地图上如此)。他们新的国家语言变成了法语,尽管只有少数翻译拥有在他们与法国殖民官员间进行沟通的能力,他们的部落首领成为帝国统治梯级中最低的一层。当反叛新的统治者时,他们面对的是从帝国其他地方派遣而来的军队。这些配备着现代武器的部队准备毁灭整座村庄,以便"给土著一个教训"。帝国统治根本性地、永久地瓦解了非洲社会。

与此同时,小国比利时把它的统治扩张到刚果盆地(Congo Basin)。19世纪70年代,比利时国王资助了对该地区的探险,然后利用探险者的发现,宣布这片领土为"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全非洲最大的一块殖民地)。这激起了欧洲人"竞逐非洲"的浪潮。随后,他的官员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钻石和铜),他们在强迫劳动力的辅助下开始着手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经济利益使殖民地成为有价值的财产。比利时国王深感高兴,但一些传教士和人文主义观光者不高兴,他们谴责殖民官员和商人行为残忍。他们反对国王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变成了欧洲的一项人权事业。国王不得

8



非洲的瓜分，1800－1914 年（图片来源：Craig, Albert M.; Graham, William A.; Kagan, Donald M.; Ozment, Steven; Turner, Frank M.;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 *Volume II*：*Since 1500*, 4th Edition,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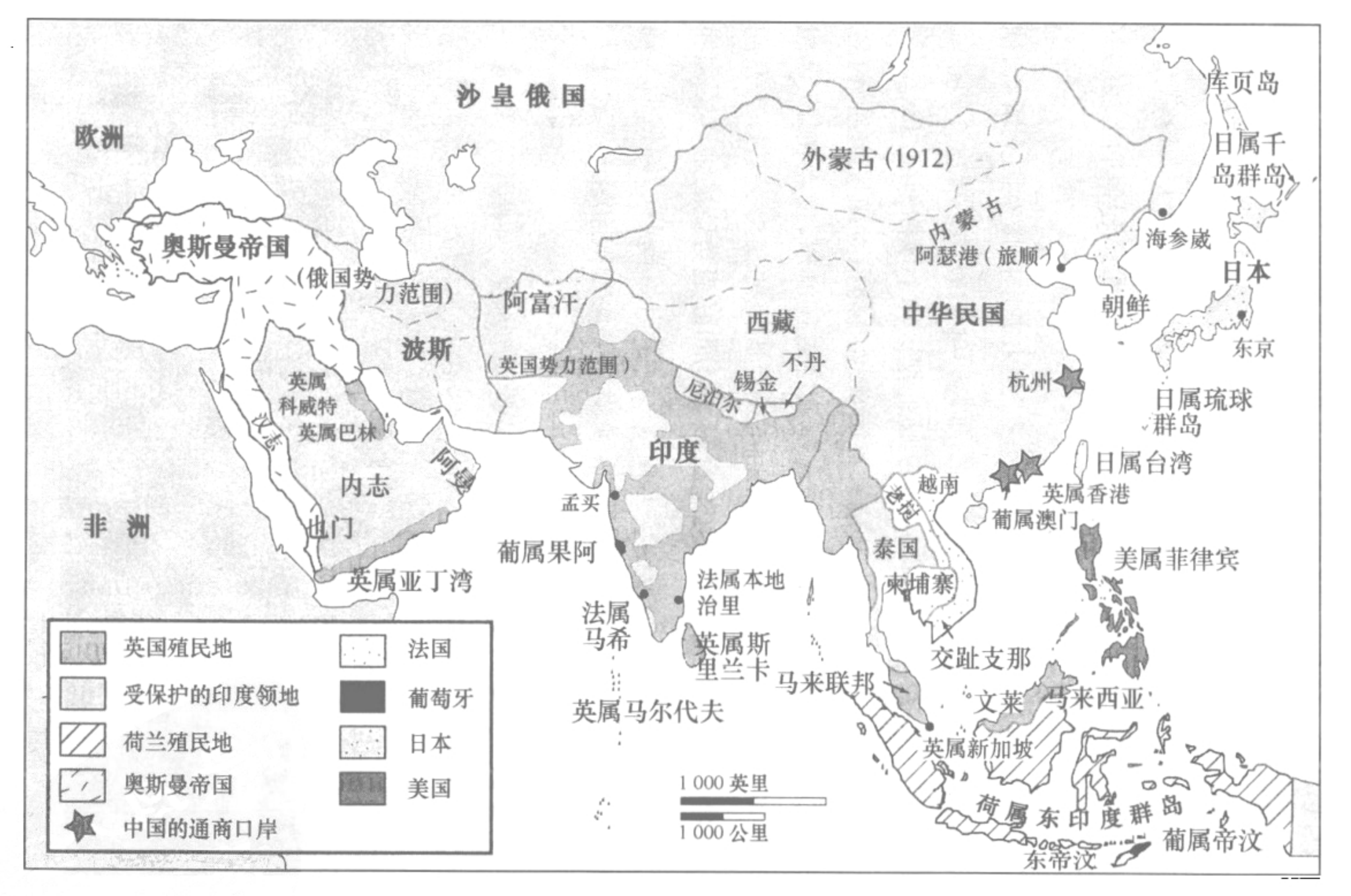
不将殖民地控制权移交给政府。这桩国际丑闻日益消减，但比属刚果作为欧洲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最恶劣例证的形象依然未改，这部分是因为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像法国人一样，英帝国以同样零星无序的方式扩张到亚洲和非洲。

至 19 世纪初,英国商人和制造业主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贸易网络,使英国成为西方的商业中心。他们在推动帝国前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征服的荣光也驱使帝国继续向前。驻扎于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沿海各贸易中心的那些野心勃勃的殖民官吏,在 18 世纪晚期开始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内陆地区。至 19 世纪 50 年代,就连印度的北部平原地区亦落入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控制让帝国付出了代价,1857 年,对英国人统治的怨恨激起了大规模起义,起义者包括由英国训练的印度部队和原先允诺效忠英国统治的印度王公。英国耗费数年镇压了叛乱并对起义者施以残酷的惩罚。

在此后的 90 年里,印度是"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它是英国殖民地中最大的财产,一位英国政客称之为女王陛下"王冠上的明珠"。在一些地区,英国行政官员实行直接统治,在另外一些地区,则由印度王公(在 1857 年起义期间仍效忠于帝国的那部分人)统治。他们着手创建一个殖民地,在这里,英国法律和英式教育将把本土人口中乐意与英国合作统治这片广袤土地的精英阶层吸引过来。他们扩编了印度军队,创建由印度士兵和英国军官组成的军团,打算借此维护次大陆的秩序,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军队协助保卫了帝国。1875 年,英国政府宣布他们的女王维多利亚为印度女皇。

为了确保海军能够便捷地到达印度和中国,英国海军当局在非洲、阿拉伯和亚洲沿海建立了供煤站。该政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英国在 19 世纪 70 年代决定控制"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对埃及的赫迪夫(khedive)来说,把自己掌握的大批公司股票出售给英国人,似乎是偿还自己债务的简捷途径。事实证明,这笔交易的影响是巨大的。大不列颠致力于保护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因为苏伊士运河区提供了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直接海上通道。英国政府不久后决定,埃及本身也必须归入帝国的控制之下。1882 年,它派军进入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一个行省的埃及,把它变成了英国的保护领地。英国官员和行政人员在这里以毫无实权的埃及统治者的名义,间接地行使着政治权威。不列颠帝国已成为中东地区一个主要的强权。



沙皇俄国
欧洲
奥斯曼帝国
（俄国势力范围）
阿富汗
波斯
（英国势力范围）
外蒙古(1912)
内蒙古
阿瑟港（旅顺）
中华民国
西藏
不丹
锡金
尼泊尔
印度
库页岛
日属千岛群岛
海参崴
日本
朝鲜
东京
杭州
日属琉球群岛
日属台湾
英属香港
葡属澳门
美属菲律宾
英属科威特
英属巴林
汉志
阿曼
内志
也门
非洲
英属亚丁湾
孟买
葡属果阿
法属本地治里
法属马希
英属斯里兰卡
英属马尔代夫
越南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交趾支那
马来联邦
文莱
马来西亚
英属新加坡
荷属东印度群岛
葡属帝汶
东帝汶
英国殖民地
受保护的印度领地
荷兰殖民地
奥斯曼帝国
中国的通商口岸
法国
葡萄牙
日本
美国
1 000 英里
1 000 公里

亚洲诸帝国，1914 年

在竞逐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土地的过程中，英国人制定了领土合并计划，意在以一条巨大的“从好望角到开罗”的南北向领土带，把南部非洲与埃及连接起来。这是英国建立非洲帝国最精悍的推动者塞希尔·罗德斯的梦想。他努力通过条约和征服，取得的东非土地，包括肯尼亚和那片为纪念他而命名的领土——罗德西亚。他最大的障碍是强大的祖鲁(Zulu)王国，其战士在 1870 年重挫了一小股入侵他们土地的英军。一年后，英国人带着更多的部队回来击败了祖鲁人，他们的土地变成了帝国的战利品。但“从好望角到开罗”并未完全变成英国人所有，德意志帝国插了进来，宣布拥有中非在图西人(Tutsi)各部落统治下的布隆迪(Burundi)和卢旺达(Rwanda)王国。他们把这片土地称为德属东非。

9

对罗德西计划最坚决的抵抗来自南非境内的荷兰殖民定居者(称为布尔人或南非白人)。他们很久之前就定居在海岸，接着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创建了几个小的内陆共和国，不受英国人的统治。从好望角向北到高地平原地区，在英国紧靠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殖民地和罗德西亚之间的一片区域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农场并实践自己的信仰。他们在自己的教义里，找到了把非洲人视为下等人和把土著部落从土地



南非的白人定居者：正在前往城镇的布尔人农场主(承蒙 the South African Consulate/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供图)

上驱逐出去的宗教理由。但当 19 世纪晚期他们的领地上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后，他们根本无法赶走那些来寻找贵金属的欧洲人。布尔人决心控制他们的“新锡安山”——他们的新教教堂和社区组成的城堡。塞希尔·罗德斯等英国帝国主义者则坚持这片土地应并入英帝国，由英国资本家来开发。两种计划水火不容。 10

因此，大英帝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殖民战争。在南非的英国官员和行政人员如此傲慢地处理与布尔人的争端，如此挑衅性地使用他们占优势的武装力量，乃至布尔人在 1899 年向英帝国宣战。军事冲突令人绝望地不利于他们，他们以宗教狂热的果敢精神和游击战术进行战斗。这场冲突一直到 1902 年才结束，布尔军队最后投降。但到此时，甚至连英国政府也明白这种扩张主义战争的毁灭性蠢行。

不久后，英国建立了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作为英帝国内部的一个自治国家(类似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他们让布尔人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地管理内部事务，也可以自由地参与联邦的领导阶层。非洲人自己在这次冲突中未起任何作用，他们以及他们的土地仍然是帝国的战利品。

俄国、日本和为帝国而战

在欧洲的东境，俄罗斯帝国是古老帝国和西方新型海外帝国各种特征的结合体。它实行专制政治制度，由号为“沙皇”的独裁君主领导。这种制度，在许多方面像奥斯曼帝国的体制一样缺乏效率，而且很残酷。它的臣民包括位于其西部边境数量庞大的波兰人。在 19 世纪，波兰人曾两次反抗俄国人的统治，希望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俄罗斯帝国每次都动用部队击败了他们的反抗。欧洲地图删略了任何提及波兰的地方。在俄国沙皇的专制国家中，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权利没有存身之地，它对这些民族的统治使之获得了“各民族囚笼”的残酷称号。 11

像其他欧洲帝国一样，俄国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夺取亚洲的殖民据点，它的哥萨克士兵和殖民者很久以前就占领了亚洲北部区域，这里原

先主要居住着狩猎—采集部落。帝国广袤的西伯利亚领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人口太少太弱,难以抵挡俄国人的前进。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俄国领导人看到了向突厥斯坦(Turkestan)扩张的新机会。这是由一个个沙漠绿洲组成的亚洲内陆国家,处于软弱的穆斯林王公统治之下。到 19 世纪 80 年代,俄罗斯帝国的边境抵达了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英帝国强烈抵制这头贪婪的"俄罗斯熊"的逼近,但没有成功。俄罗斯政府建设铁路,把这些边远地区与帝国中心联系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西伯利亚铁路,该铁路在 1900 年贯穿整个西伯利亚,直达中国和朝鲜以北的太平洋地区。

日本帝国与俄国就亚洲东部土地的控制权争斗不休。直到 19 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岛国,其统治者像中国的皇帝一样,面临着被扩张的西方帝国控制的威胁。在海军支持下的西方外交官,按照类似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强迫日本政府接纳他们的商人。

像中国一样,他们的国家面临着变成西方帝国强权控制下的半殖民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1868 年,日本一群年轻的改革派夺取了政府控制权。他们虽然是来自武士阶层的贵族,但深信必须放弃古老的封建制度。他们相信,他们起事是维护帝国及天皇(在日本国家宗教神道教里被尊奉为神人)尊严和荣誉的唯一手段。这场所谓的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Meiji"意谓"伟大",是明治天皇后来起的名字),利用了日本民众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和反对外国的狂热。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使日本凭自身的力量成为东亚的大帝国。改革派把他们的目标归结为"富国强兵"。他们的方案是以传统的日本体制为基础,尝试"从上层进行革命"的大胆战略。

尽管他们宣称业已恢复了天皇的权力,但实际上,天皇只是实行名义统治。通过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到 19 世纪 90 年代,改革派成功地为工业经济奠定了基础,打造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并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了不平等条约。为了取得民众的合作,他们创建了宪政的代表制政府结构。政府的权力受到天皇及其宫廷权威的制

约，也受到军队领导人权力的制约。民主只是动员民众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在天皇崇拜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中，“帝国道路”将天皇和改革的国家联合了起来。

维新派改革卓有成效，使日本政府能够将其殖民征服计划付诸实施，它的目标是赶在西方帝国之前，夺取亚洲大陆相邻的区域。1894 至 1895 年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迫使中国政府在中国北部地区割让领土、给予贸易特惠权。他们的扩张引起了西方帝国的抗议。对这个披着现代外衣的“东方”帝国的突然兴起，西方各国领导人还未回过神来。

12

俄罗斯帝国是日本的主要帝国竞争对手。俄国和日本政府对富饶的满洲(Manchuria)垂涎不已，它们都希望牺牲虚弱不堪的中国，开发这里的经济资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政府警告俄国不要继续向该地区扩张，俄罗斯沙皇对此并未认真对待，他对黄种人的轻鄙态度，使之对日本军事力量的现实失去了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日本在全球的帝国游戏里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劣等的玩家而已。

1904 年初，由于担心俄国即将夺取整个满洲，日本军队对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发动海上突袭，他们的陆军随后跨海登上亚洲大陆，打算将俄国军队驱逐出中国北部。到 1905 年，日本人已击败俄国海军，并迫使俄国陆军远远地撤退到该区域的北部，同年的条约承认了日本胜利。尽管满洲在名义上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日本军队在其南部区域建立了势力范围，日本的工业家和工人涌入满洲，开发这里的矿产资源。而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朝鲜变成了大日本帝国的一个省。

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崛起于东亚，它以自信、国际力量和扩张野心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它对中国领土的征服，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抗议运动，抗议的矛头既指向软弱的中国皇帝，也指向日本人。尽管运动太过弱小，还不足以引起日本的重视，但中国人的抗争预示着未来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将遇到麻烦。20 世纪初，新帝国开始面临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抵抗和抗议。新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抗议运动，表明帝国时代不会延续很长。

美利坚帝国

美国在 19 世纪的扩张,在范围上局限于北美大陆。那时常是一个残酷而富有侵略性的过程,其殖民者和军队将美洲土著从广袤的沃土上驱赶出去,安置到狭小的"保留地"里,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19 世纪中期,美国军队对墨西哥发动了一场短暂的战争,把从得克萨斯(Texas)到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的广大土地纳为战利品。美国边境此时向西已扩展到太平洋。从这方面来说,美国是一个大陆帝国。

不久,美国获得了一小块自己的海外帝国。像欧洲国家一样,它拥有建立帝国所需的经济资源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它的工业经济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更有创造性。它只有一支规模很小的陆军和海军,但它所拥有的战争武器与其他任何现代军队一样致命。到 19 世纪末,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公开昭示他们开始扩张海外帝国的野心。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声言,像美国这样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义务动用其海军和外交力量扩大美国的权力和影响。他为海外扩张辩护的民族主义激情,推动美国跻身于西方帝国列强的行列。通过军事征服和经济扩张,美国大部分是在拉丁美洲获得了殖民领土。

13

此时,这个地区几乎全部是由独立的国家组成。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里的殖民者成功地反抗了在欧洲的母国统治者,并将新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独立前就已主导着社会,因为他们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庄园和矿山,来自这里的产品是国家经济福祉的主要来源。农民群众,包括美洲土著,都生活在贫困中。天主教会直截了当地支持这个保守的精英阶层,从他们当中招募神职人员,鼓吹尊崇宗教信仰。拉丁美洲新兴的国家,仅在名义上是主权民族国家。

这些国家相对弱小,与邻居美国佬相比相对贫穷。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在这里购买矿山,修建铁路和工厂。拉丁美洲各国靠对外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但因其价格年年起伏甚大而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各国政府经常迫不得已从外国(主要是英国)银行借贷,以满足国家的基

本需求。当它们不能偿还债务时，英国政府就会把海军舰队派到它们的海岸，强迫它们偿付。幻灭的民族主义者在解释这种困境时说："拉丁美洲是坐在金山顶上的叫花子。"拉美国家只有表面的而非实质的独立。

美利坚帝国诞生的进程始于古巴岛。这里当时仍然属于西班牙帝国（它剩余的财产还包括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和太平洋的菲律宾群岛）。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古巴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他们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以赢得独立。美国民族主义领袖在不断攻击西班牙人暴行的新闻战支持下，带头支持古巴革命者。报纸文章通过报道西班牙人的残暴行径和呼吁美国介入支持古巴民族主义者来吸引读者。

在这种好战气氛下，停靠在古巴哈瓦那（Havana）港的美国"缅因号"（Maine）军舰发生爆炸（可能是意外事故），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提供了足够的借口。美国海军在菲律宾附近击败西班牙舰队后，1898 年美西战争很快结束；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夺取了古巴。同年年底和平条约签订，这些西班牙殖民地被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古巴独立战争为美国扩张和领土兼并开辟了道路。美国政府宣称（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如果它的军队撤离该群岛，欧洲另外一个帝国将会夺占菲律宾。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军队并肩与西班牙军队作战，期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当美国军队不打算离开时，他们又掉转枪口反抗美国，菲律宾军队弱小且领导欠佳，因为这个群岛上的人民被种族和宗教差异深深地割裂开来。这场殖民战争持续了四年，但最终征服者获得了胜利。

14

西奥多·罗斯福是扩张主义最露骨和最雄辩的辩护者，他为本国新获取的经济力量而自豪，声称国家利益和威望要求它保持对新解放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控制。他乐于接受吉卜林在美国征服菲律宾之际写的一首诗里所言的"白人的重担"。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帝国建立者一样，美国政府以它的胜利作为证据，证明美国拥有帝国的使命。菲律宾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而古巴成为美利坚帝国的一部分，不是以被吞并的形式，而是通过变成受保护国。与西班牙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让古巴革命者得以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但美国政府坚持要求古巴领导层给予美国当局干涉这个岛国事务的权利，“以保护生命、自由和个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古巴人允许他们庞大的北邻干涉自己国家的政治事务。于是，通过吞并和条约，美国创建了自己的小型帝国。

美国很快成为加勒比地区的主导力量。1901 年，在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后，他积极地鼓励修建一条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这是涉及国家利益的事。他知道，稚嫩的美国海军可以充分利用运河巡视拉美各国海岸，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会得到实现，美国商船将能够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迅速穿梭。在与哥伦比亚协商失败后，罗斯福帮助巴拿马叛军创建了自己的小国，他们迅速同意割让领土修建运河，运河在 1914 年最终开通。运河区属于美国所有，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基地。

罗斯福让欧洲列强知道，加勒比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这里的小国不得不接受美国对它们外交和内政政策的监督。这种干涉政策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一直保持未变。如果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的政府未能偿付外债，来自北方的财政顾问就将接管它们的国家财政；如果它们不能镇压骚动或叛乱，来自运河区的海军炮舰就前来暂时掌控局面。1911 年，当尼加拉瓜面临内战威胁时，海军陆战队承担起警察的角色并在那里驻留了 20 年。罗斯福声言，这种“炮舰政策”是正当的，宣称它符合西方构建帝国的精神，被“文明国家”的道义所认可。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根本不同意这种辩解，但他们的国家距“美国巨人”太近了，难以逃脱美国的控制。

重点：新帝国主义

15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西方帝国的版图，整个世界也是“环球旅行者”(globetrotter，一个新的词汇，指前往遥远地方的旅行者)的领地。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73 年创作的流行小说《环游地球

80天》的读者，想象自己与故事里的英国主人公一起，乘船、坐火车和骑马穿越海洋大陆。主人公菲尼斯·福格要进行一次几近疯狂的旅程，在80天内环游地球，否则他将输掉一场荒唐的打赌。幸好，一家新旅行社——托马斯·库克公司为他提供的服务，让事情变得容易了许多；由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奇迹，他成功的机会也大为增加，这些包括从欧洲到亚洲以及贯穿北美的铁路线，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蒸汽轮船。该书被译作各种西语言以及日语，小说的成功很好地表明，全球范围内的阅读公众都乐于相信，时间和距离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旅行者的障碍。

同样的原因，时间和距离也不再是扩张的帝国的障碍，凡尔纳的小说里隐现着新帝国主义的解答提示，它暗示大量的技术创新使新帝国的胜利成为可能。帝国的这些工具包括新的医药、新的武器和新的交通手段。

工业革命之所以让旅行比以前更加迅捷和可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蒸汽机。蒸汽轮船迅速地穿洋过海，驶过道道宏伟的运河，从一个大洋到另外一个大洋，扬帆于以前没有任何大型船只敢去的河流。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将他的技术和组织技能投入到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工作中。运河于1869年完工通航，它很快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至关重要的交通纽带。在陆地上，蒸汽车头拉着火车，穿过群山与河流曾经形成不可逾越障碍的地区。蒸汽机驱动着新式海军舰只，这些军舰能够在远离本土海岸的地方行动，能够运载帝国军队前去进行新的征服。随着电信线路在大陆和海底的延伸，信息以电报速度从这些地方传到本土。1897年，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作为她75岁生日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从伦敦首发的电报，在通过她的亚洲殖民地并环游世界后又折回到伦敦。

帝国军队拥有了新式武器，其火力之猛此前时代闻所未闻。强大的海军大炮把炮弹发射到几英里外；后膛枪能够再装弹，并以老式毛瑟枪无法比拟的速度开火。最具破坏性的是，连续速射的机关枪能够用弹雨阻止大型的攻击部队。所有这些武器都是技术革新和精确制造的产物，只有工业革命使之成为可能。帝国的战斗部队经常是由从殖民

地招募而来的士兵组成，他们被训练使用新武器，并由来自帝国的军官领导。尽管人数很少，但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征服和控制了大片领土，因为他们握有使用这些战争工具的技能。

16 最后，由于 19 世纪晚期以来大量的医学发明，前往遥远大陆的旅行者、商人、传教士和士兵能幸免于致命疾病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些发明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细菌学革命”。在诸如高精度显微镜等设备的帮助下，法国和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菌引发了许多传染性疾病。在这些发现揭示出传染病的原因之前，可能提供的治疗方法也充满了痛苦和错误。因为对疾病的性质不了解，死亡率持续高企，尤其是在传染区。折磨着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一种最具杀伤力的疾病是疟疾。到 19 世纪末，人们了解了它的细菌性质和传染过程；有效的治疗方法接踵而至。这些医疗手段极大地缓解了新帝国殖民统治的困难。

当地人口得到治疗这些疾病的西方医学知识和设备要迟缓得多，公共卫生服务在殖民关注的问题中仅占微末之地。而事实证明，基督教传教士则是西方医学最有效的使者，苏格兰人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随身带着基本医药穿行在英属东非大地上。后来，阿尔贝·施维泽尔（Albert Schweizer）在法属西非的丛林里建立了一座功能齐备的诊所。这些传教士希望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同时照顾殖民地人民中归宗者和非基督徒的健康。

西方帝国共同拥有一套非同寻常的帝国意识形态。渴望旅行——儒勒·凡尔纳用作小说的主题——不仅仅是基于对冒险的欲望。研究和理解遥远的土地和民族的渴望伴随着西方建构殖民帝国的冲动。探险家们行至最遥远的、难以接近的地区，以填补世界地图上剩余的空白点。亚洲内陆和非洲，这两个极少被探索的有人居住的大陆，到 19 世纪末被彻底描绘了出来。尚不完善的民族志学努力根据各民族自己的习惯和习俗来区分各个社会。这个浩大工程的动力部分地来源于一种新信仰，即所有人类拥有共同的进化历程，当然，西方人在进化之路上走得最远，落后民族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这种潜在大度的目标，伴随着包括地图测绘者和民族志学家等在

内的殖民者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业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成就，带着这种信念，他们来到世界各地。继这种信念而来的必然是，认为西方优于那些未能有幸成为这种文明一部分的民族。“原始”部落或许期望能学习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直到那时，他们一直要在人类的等级阶梯中居于低等的位置。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古老文化，在它们背后有着值得学习的丰富历史；但它们似乎已沉沦到一种衰朽的状态。征服和统治殖民土地的主张，部分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落后社会没有权利要求独立存在。

17

殖民帝国的领导人让他们的国家把殖民地民族从落后状态提高到文明状态。他们拥有本国大多数公民同样的信念，即物质和精神进步在某些时候应该与这些民族共同分享。如何界定进步，它以怎样的速度来临，将是帝国领导人和殖民官员的责任。西方帝国在它们统治扩展到的每一个地方取消了奴隶制，它们引入或口头上谈论着引入法治，保护商业贸易和自由市场（对销售殖民母国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用处，自身利益从未远离过帝国构建者们的关注）。

出生在印度的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因其关于帝国的小说和诗歌变得闻名遐迩。他用写作鼓励西方人对殖民地人民认真地负起责任。在1899年的一首诗里，他写下了自己最著名的帝国主题思想：“白人的重担”。诗中呼吁的服务于“你们新夺得的愠怒的民族”的需求，是专门针对美国而言的，它刚刚获得了自己的小规模帝国。然而，他和他的读者都没有想过去问这些民族，他们是否希望被他人控制在手里。

帮助殖民地人民的愿望，被新教和天主教活跃的传教士以颇为不同的方式阐释着。大卫·利文斯通等传教士广泛写作，敦促欧洲读者通过分享“社会的和宗教的神恩”，以“帮助他们的非洲同胞”。到20世纪初，这些传教士在亚洲和非洲已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改宗基督教。他们的做法，在本地社区里制造了分裂，在原先统一于自己习俗和信仰的人们当中激起了混乱和分歧。改宗为新基督徒更容易地进入殖民地社会开辟了道路。尼日利亚小说家奇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名为《瓦解》（*Things Fall Apart*）的反殖民小说，强调了基督教传教士和英国

殖民官员的到来在非洲人民中间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写作,因为他的父亲抛弃了祖辈的传统加入新教。教会学校教会了他西式教育和如此流利的英语,乃至使他不得不选择英语作为文学语言。

19 世纪晚期,民族主义激情促使政治领导人宣称,他们的国家必须要求得到越来越多的领土,以阻止敌对帝国在争夺土地的竞争中超越到前头。成功就会确立本国的优势;相反,失败则是国家衰朽的标志。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坚称,像动物界一样,国家也是在"适者生存"的斗争中竞逐,帝国主义领导人及其追随者深恐被列入不适者之列。

这种态度驱使俄罗斯帝国远远地深入东亚。在那里,它遭遇到另外一个同样决意在相同区域扩张的帝国。在此前数十年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改革的日本帝国的领导人,在 20 世纪初的一场短暂战争中击败俄



基督教在非洲:乡间教堂,罗德西亚北部(赞比亚),约 1925 年(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国人，成功得到他们想要的争议地区。西方各国政府首次发现，一个非西方国家也能够把帝国的工具挪为己用。

古老帝国

非洲和亚洲的古老帝国在许多方面迥异于 19、20 世纪的西方帝国，它们由皇帝统治，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仅受因古老而受到尊崇的传统的制约。皇帝的权力基础是从征服者中遴选的和根据古老惯例招募的官员与军队。对它们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民主和工业化亦复如此。它们统治着众多习俗、语言和宗教差异极大的民族。这些臣服的民族通常可以保留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但不允许得到权力和财富，除非他们采纳统治者的语言和宗教。一小撮统治精英享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惯例维系统治。发生混乱时，他们最终会诉诸军队的武力，军队装备着足以镇压叛乱的武器，但还不能与西方现代军队相匹敌。 18

这种帝国体制有时候会着手鼓励商业和制造业发展，这么做是为了获取由这些经济活动产生的财税收入。他们对企业和投资毫无兴趣，因为这些活动对体制似乎具有威胁。工业革命在这种受敌视的环境下没有机会发展壮大。 19

在久远的前现代时期，亚洲和欧洲之间的陆路及海路贸易交流，曾将制造的产品和农作物带到遥远的土地上。沿着亚洲游牧帝国保护下的商路，丝绸从中国运到欧洲；这些商路也把鼠疫带到了欧洲。16、17 世纪的西班牙旅行者把新的植物，如土豆和玉米，从美洲传播到欧洲和亚洲；他们也把致命的疾病带到了新世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古老帝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到 20 世纪初，少数残余的古老帝国，其旧日的荣耀已一去不返，沦为欧洲和日本等新帝国的美味佳肴。

中华帝国的衰落

17 世纪，来自东北方的勇武部落夺取了中华帝国的控制权，他们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帝国——清朝。他们对自己的勇武文化深感自豪，鄙视汉人，但像在他们之前的其他征服者一样，清统治者采用了汉人的统治体系。熟知一套有关道德规范和统治体系的繁杂著作，仍然是进入帝国行政管理层的必备要求。哲学家孔子在 2 000 多年前撰写的这些著作，非常适合新王朝的需要，他的哲学强调社会和谐和稳定高于一切。这套体系的核心是"三从"(Three Bonds)：臣从君、子从父和妻从夫。国家与家庭都是同一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该体系里，道义责任是行为的基本指导者，而不是权利。

特有的传统和宗教仪式都围绕着这种国家倡导的伦理原则发展演化。祖先崇拜在一套被称为道教的宗教仪式里广为流行。在显赫的家族中，妇女被藏于深闺，她们的魅力来自缠过的"三寸金莲"——逐渐地折断年幼女孩的脚骨，使她的脚尺寸减半。这个习俗渐渐地传播到社会下层阶级中，只有农妇得以逃脱，因为田间耕作要求她们能够行走。缠足满足了中国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它也揭示了儒家三从的巨大力量。

坚持儒家的帝国统治体系是中华帝国生存长达 2 000 年的秘诀所在。各个新王朝都发现，它满足了维护稳定的需要，保证了它们有一群高效而忠诚的行政官僚。他们对广土众民执行朝廷的命令。清朝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中国在 200 年时间里享受了和平与经济繁荣，它在 18 世纪的经济生产力能够媲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

清朝的力量在下一个世纪开始衰微。一场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引发的内战，在 19 世纪中期持续了 20 年，蹂躏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直至清政府最终击败起义者。由于它在诉诸经过时间考验的战争和统治方法方面的能力，清朝艰难存活了下来。然而，当它面临新的外国敌手时，清朝是需要后人从中吸取教训的例子。

20 对中国的新威胁来自海洋。18 世纪，在政府的支持下，乘着帆船开始到达中国的西方商人人数日众。中国的奢侈品，如丝绸和瓷器，在西方需求颇多，但西方商人很难找到中国人感兴趣的商品。鸦片确实卖得很好，英国商人可以方便地取得印度丰富的鸦片供应。中国当局

力图限制外国人进入中国市场，阻遏鸦片销售。英国商人则吁求英国政府能使他们公开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的恳求成功了。

为了结束贸易争端，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中期对中国发动了两场短暂的战争，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更多的战利品。中国南海岸的香港岛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英国公民(其他西方人也一样)获得了在几个中国港口城市生活的权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定居点里，处于自己的法律管辖下。上海的一部分区域成为欣欣向荣的西方城市缩影，有西式的房屋，宽阔的街道，外国人自己的警察在街上维持治安。这里也是清朝政敌的庇护所，鸦片贸易猖獗。

19 世纪末，中华帝国打输了另一场短暂的战争，这次的胜利者是日本帝国。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亚建立自己的海外帝国，它的第一个目标是朝鲜王国。这个国家数个世纪来一直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但中国已经不再能够保护它的边境领土了。在 1894 年的一次决战中，日本的新海军毁灭了中国海军，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接受一次屈辱的战败。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到了对朝鲜(很快被变成殖民地)和台湾的控制权。早些时候，俄罗斯帝国已经在中国的北部边境攫取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在 19 世纪下半叶，法兰西帝国逐渐征服了被称为印度支那的南部地区。20 世纪初，靠近中国西南边境的群山连绵的西藏，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正在分崩离析。

危机驱使惊恐的清政府领导人付诸绝望的行动，他们支持反洋爱国的秘密会社，它在 1899 年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外国殖民者、商人、传教士和本国改宗基督教者的群众起义。这就是所谓的“义和团起义”，它的领导人呼吁追随者“扶清灭洋”。但起义民兵的装备太差，组织混乱，根本经不住组织有序的西方军队的攻击，联军部队——主要来自俄国、英国和日本的军队——击败了拳民。他们命令中国政府严惩起义领袖并占领了都城北京，那里的外国租界已遭到数周的围攻。在此过程中，他们烧毁并劫掠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在最后时刻孤注一掷地改革国家，着手创建现代的行政管理系统、西式学校和装

备精良的军队，但为时晚矣。

清朝最严重的敌手来自国内。即便是负责建立新军的将领对领导层也失去了信心。在沿海城市，很大程度上因繁荣的海外贸易而致富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反对传统的中国体制，他们同情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的目标。在孙逸仙博士的领导下，这些人组织了国民党。该党领导的运动号召推翻清帝国，建立民主共和国。1911 年，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将年幼的皇帝囚禁起来。次年，国民党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众叛亲离之下，中华帝国消亡了。

21

聚焦：中国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The Empress Dowager, 1835 — 1908 年)是世界最古老帝国的最后一位强力统治者。1861 年，她的皇帝丈夫驾崩后，她成为继承亡夫尊贵的遗孀。他的死，将他们的儿子——中华皇位继承人的监护权交到了她手里。她作为皇帝众多嫔妃中的一个进入宫廷。她运气甚好，为皇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和继承人。在帝国宫廷里，像在传统中国所有显赫的家庭中一样，当妻子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后，她才变得重要起来。慈禧太后凭借诞下帝国未来的统治者，而获得了最初的影响力。

皇帝崩逝后，照顾幼小继承人的责任，将她直接带进了王朝最高的宫廷圈子。她被册封为"慈禧皇太后"。在此后几年里，她展开了政治活动，证明她决心保护王朝和确保帝国的续存。她果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直到 1908 年去世。三年后，帝国崩溃了。

在反击削弱帝国的诸多力量时，她的个人成就是卓著的。她的帝国宫廷被个人争斗和各种截然对立的保卫中华帝国的计划弄得支离破碎，她的国家面对着强有力的外国，它们也被称为帝国，但在组织、装备和领导等方面与她的帝国截然不同。俄国、英国和日本等帝国都攫取了中国领土，并迫使她的政府给予它们在中国的公民经济和司法特权。它们的陆海军装备着致命的现代武器，在战争中能够压倒性地打击中国军队。它们驻中国的使节嘲笑中国人缺乏科学知识和技术工艺，也嘲笑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前往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和访客嘲弄慈禧太后

是“龙夫人”(龙是帝国的象征)，相信那些说她腐败和残忍的谣言。

慈禧太后自己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在处理她的国家所面对的那些危机时，不得不依赖于宫廷官员的建议。她不信任皇帝。坐皇位的先是她的儿子，她儿子死后是她的侄子。她认为他们软弱，优柔寡断，而她是正确的。她完全忠于王朝，忠于中国的帝国传统，她准备无情地捍卫这个事业，即便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不断涌入她的国土的外国人，带来了新的陌生的习俗。她对他们深怀戒惧，既是因为他们挑战了神圣的中国方式，也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她的王朝。1900 年她秘密支持拳民起义，这是在清朝朽坏和帝国衰微之时的绝望举措。

22

拳民的失败迫使她放弃了维护帝国传统统治方式的努力，她第一次接见了外国客人，她让西方摄影师给她拍摄了一张身着帝国衣饰的照片。最重要的是，她接受了力促对帝国进行根本改革的宫廷官员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她难以挽救中华帝国免于崩溃。



慈禧太后，1903 年(Cixi,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1835 – 1908, Photographs.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rchiv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urchase. Photographer: Xun ling, negative number SC – GR 252)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23 在同样的年代里，亚洲大陆西端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西方帝国的威胁，经历着与中华帝国几乎一样巨大的内部动荡。自中亚的游牧部落征服拜占庭帝国以来，这个古老的帝国就已存在。这些部落讲一种突厥语，由他们的第一个伟大领袖奥斯曼（Osman，在英语中的变体写作 Ottoman）的后代们统治着。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pole，后来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施行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皇帝们管理着广袤的领土，在其顶峰时期从中欧的匈牙利平原横贯到波斯边境，从黑海北岸和高加索山脉纵贯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在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各异的众多民族。帝国皇帝尊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奥斯曼统治者的名号叫"苏丹"（Sultan），后来又在其上增加了"哈里发"称号。该称号得自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将苏丹提升到了全体逊尼派穆斯林名义上的领袖的崇高地位。帝国允许非穆斯林宗教团体在交纳一定税收的前提下，保留自己的宗教仪式和习惯。这项政策带来了宗教宽容，在西方国家尚在迫害非基督教的教派之时，是一种非常人道的做法。

帝国的力量在于其战斗力量和遍布其领土的大量贸易活动。16 世纪，奥斯曼的陆军和海军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是最棒的，但到 19 世纪，他们的军队在西方现代军队的手下屡战屡败。它的经济欣欣向荣，直到西方的海上贸易取代了从亚洲到欧洲运载货物的骆驼商队，直到西方工业生产出比任何奥斯曼属地生产的都要便宜得多的产品。到 19 世纪中期，奥斯曼领导人面临着军事和财政双重危机。

同中国的情况一样，帝国宫廷和宗教人士中的保守力量阻碍着改革，奥斯曼帝国被紧紧地束缚在传统的穆斯林价值观中。宗教领袖守护着这些价值观，他们随时准备谴责任何文化和社会变革，认为变革违反了伊斯兰教律法和习俗，尤其是那些受西方实践启发的变革。

事实证明，苏丹及其宫廷没有能力对国家进行根本性变革，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伊斯坦布尔宏伟的托普卡珀宫（Topkapi）

里享受着奢华的舒适。宫廷里也居住着庞大的后宫，嫔妃都是从奥斯曼帝国有权有势的家族和联姻王公家庭选来的。面对日益增长的危机，领导阶层的缺失要求军队担负起改革重任，这也为基督教少数民族的起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打开了通路。

帝国的衰微源自在西方帝国手下的军事失败。邻近的基督教帝国不再畏惧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它在东南欧的土地是它们垂涎的目标。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宣称保护苏丹治下基督教臣民的权利，它们甚至要求扩展至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小部分区域，这里是奥斯曼帝国最神圣的城市，一些基督教教堂坐落在这块圣地上。到 19 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周边频发的战争，业已将奥斯曼在欧洲的领土缩减到巴尔干半岛的一小部分。在北非，法兰西帝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不列颠帝国使埃及沦为其保护国。英国人将军队调入埃及，保护对帝国商业和交通来说很重要的新通道苏伊士运河。至 19 世纪末，西方各国领导人公开制定计划，摧毁奥斯曼帝国，瓜分其领土。

24

欧洲各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外交冲突的源头。1877 至 1878 年，俄罗斯帝国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并毁灭性地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在战争结束前，俄国的军队几乎抵达伊斯坦布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为阻止奥斯曼帝国落入俄国人手中，纷纷介入。到此时，苏丹政权财力耗尽，对西方银行负债累累，被迫接受西方控制它的部分财税收入以偿还债务。奥斯曼帝国的生存本身前景黯淡。

在这种日益增长的危机中，奥斯曼的统治精英断定，激进的变革是拯救家国的唯一途径。陆军军官们宣称，他们掌握着复兴奥斯曼的秘诀，就是向西方学习。他们注意到，这些国家依靠的是，各自的民族自愿为公共需要所做的贡献。在他们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自己说土耳其语的共同体能够成为革新帝国的民族核心，有能力动员其人民起来反对迫在眉睫的崩溃和征服。

国内有来自各方反对改革计划的力量。伊斯兰教宗教领袖激烈地反对这种在世俗理想鼓动下的改革计划，他们把帝国视为伊斯兰教的中心，在其疆域之内的圣城麦加(Mecca)和伊斯坦布尔的宗教中心里，

穆斯林朝圣者能够恢复他们的信仰和实践行为的纯洁性。世俗化改革在他们看来比外国敌人更危险。

非土耳其民族也抵制改革者的计划。创造一个土耳其民族共同体，意味着为了土耳其人而损害其他民族。他们原先受保护的地位确保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有破坏这里微妙的种族平衡的危险。聚居在帝国东北部（与俄国接壤）的亚美尼亚民族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为对土耳其改革者民族主义计划的回应。民族主义诉求激起的种族仇视，导致了周边的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Kurdish）穆斯林对亚美尼亚族群发动攻击。改革这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帝国所引发的社会和宗教问题是如此尖锐，乃至削弱了改革者原本希望挽救的帝国。

奥斯曼改革运动的领导人，来自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军官团，以秘密会社的方式组织起来，给自己命名为“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他们的目标是迫使苏丹同意他们的改革计划。尽管他们并没有发动政治革命的想法，但他们时刻准备动用武力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Ⅱ）那里获得承认。1908 年，他们在军队中组织兵变，威胁要进攻伊斯坦布尔，除非苏丹同意他们的改革计划。苏丹屈服了，接受了青年土耳其党的要求，宣布给帝国一部宪法，保证自由选举和代议制政府。叛军（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的青年）控制了政府，并开始改革这个古老的帝国。



身着奥斯曼传统军官服装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1914 年（©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优先之举是增强帝国力量。对他们来说，挽救面

25

临着治下臣民此起彼伏的暴动以及与欧洲各国展开新战争的帝国，远比实行宪政权利和法治来得重要。他们的领导阶层缺乏民众支持；他们内部在应对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急需的重大举措方面也难以达成一致。

他们求助于德意志帝国，它的经济是欧洲最具生产力的，它的军队是欧洲武装力量中最强大的；同样重要的是，德意志帝国是敌视俄罗斯帝国的。奥斯曼改革者们欢迎德国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他们利用这些援助修建了新的铁路；德国的军事顾问协助增强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这些联系在当时满足了改革派的需要，但事实证明，其最终结果对帝国却是灾难性的。1914 年欧洲战争开始后，他们顺从德国人的请求，加入同盟国作战。1914 年的奥斯曼帝国，是南征北战的土耳其人昔日辉煌版图的惨淡影子。

西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那些力图理解西方强大秘诀之所在的非西方精英当中，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引发起最大的兴趣和最大的争论。这两样东西，都是在传统社会经历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转变后才能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威胁到了旧式精英；同样的道理，它们得到了改革派的支持。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践和观念，是西方特有的历史力量的产物，但它们看上去是可移植的和有价值的。

自由国家

大多数西方国家确立了法治，践行着逐渐被称为人权的自由。在此前的世纪里，英国、法国和美国业已演变为民主政府体制，意在确保这些权利。这个进程的实现，有时候是通过愿意变成立宪统治者的世袭君主批准的改革，有时候是通过革命推翻那些企图保有自己的权力和限制这些权利的君主。1905 年，俄国革命者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 26 (Nicholas Ⅱ)同意给予其臣民一些政治自由的改革措施。争取自由的斗争可能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当土著居民同样的自由要求遭到帝国统治者反对时，类似的局面也会在殖民地出现。

自由主义的关键要素是公民权利，其核心是法治，最经常体现在包含于宪法当中的基本法里(如在美国和法国)。国家强制施行的刑法典和民法典在原则上禁止任何公民基于阶级、种族或宗教而享有任何合法的特权，国家保证宗教宽容，婚姻、家庭和财产关系置于国家法律的管辖之下，国家法律凌驾在任何特定宗教的成文法和习惯法之上。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通常被叫作世俗主义，后来，它在殖民地成为最具争议的改革之一，尤其是在宗教法延伸到信徒的家庭和公共领域里的穆斯林群体当中。

自由国家的目标是保证每个人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自由主义许诺给予公民以公民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还享有各种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被委托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代表。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有时候是由立法机构选择政府的行政领导人(英国的内阁制)，而其他一些国家则由公民直接选举其领导人(总统制)。法院可以否决政府的不合法行为，定期的选举意在阻止政治领导人滥用权力而忽略公民的需求。最后，在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方式运转的经济体系里，法律保障个人和团体的财产权。

这种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纲领潜藏着严重的问题。牵涉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哪一部分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整个 19 世纪期间，选举权是主要的分歧之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党争夺选民的支持，男性选举权法逐步获得通过。妇女选举权激起了特别的争论，大多数男子仍然拥有这样的观念，认为在政治事务中女性逊色于男性，因此，她们只能被归于二等公民行列。但妇女的选举权运动打断了这种声音，要求把政治和公民权利也给予人类的女性半边，她们寻求“作为人格的女性解放”，并把自己的事业称为女权主义(feminism)。她们对自由的追求，其源头植根于 18 世纪的革命当中，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19 世纪西方履践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弱点，在于它不愿意接受殖民地民族要求保护其政治权利的诉求。在基本的层面，自由主义赞同干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但也禁止诸如奴隶制和遭到诟病的违反基本人权等行为。由私人组织和政府领导的反奴隶制运动，

在非洲大地尤其盛行，这里曾经是输送到美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奴隶的主要来源。

但大多数西方人断定，法治和代议制政府不适合落后民族。他们通过指出自己所认为的殖民地之原始落后，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充其量，他们会向那些经过漫长学习的臣属提供达到某种程度公民地位的可能性，他们推定，公民地位要求了解和认同帝国的语言文化。20 世纪初，英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他们在亚洲的一些属地，尤其是印度，有朝一日可能会适宜推行地方自治，但他们没有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要到来。在广为流行的种族主义支持下，政治上的家长制作风阻碍了欧洲帝国对殖民体制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

27

自由国家的第三个严重缺陷是，它们不愿意承认尖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较之缩小贫富差距(所有工业化国家共同的特征)，政治公民权的扩大来得要容易许多。19 世纪的自由主义不承认社会福利是一种人权，个体公民必须通过一己的努力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由自然法则来决定哪些人受益和哪些人受损。工人阶级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参与竞选，寻求新立法以保护穷人和劳动阶级。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由体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只有深刻的变革才能给劳动大众带来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针对自由主义失败之处最有影响的谴责。

尽管存在这些瑕疵，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在西方民主体制之外的国家激起了革命运动。20 世纪初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19 世纪 90 年代，古巴革命者在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旗号下起而反叛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910 年墨西哥发生革命，在自由和正义的名义下举行起义反对独裁者，当墨西哥的农民群众发现起义领导人表达了他们的苦难时(参见第三章)，起义迅速演变为一场社会革命。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要求沙皇政权放弃专制统治，给予臣民宪政民主框架内的公民权利，因而在 1905 年革命中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一系列类似的要求，把青年土耳其党人团结起来，在 1908 年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起义。在此前两年的波斯，政治反对派迫使

伊朗国王给了国家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在遥远的中华帝国,孙中山在为他新组建的国民党制定纲领时指出,实现民主具有与民族复兴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些自由主义革命没有完全成功地把自由和正义带给人民。当革命的领导人争权夺利,或当新政权未能解决社会和经济苦难时,曾经的愿景就难以实现。但是,当自由主义者明确地证明自己致力于捍卫民族国家时,他们就拥有最大的机会保有这种支持。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就能够重绘世界的政治地图。但这么做的机会取决于找到满足工人阶级急迫的经济需求的手段。

工业社会

1914 年之前西方的繁荣,有助于解释西方自由主义的吸引力。社会不满不时爆发,变成严重的社会冲突,但没有哪一个大到足以威胁民主体制的程度。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访客来说,工业社会的好处是实在的,且与自由主义纲领密切关联。至少,在断定工业主义是经济上的成功方面,他们是对的。

28 工业革命在许多方面提高了西方民众的生活水平。应用于工农业中的新技术,以及工厂制度的非凡生产力,为急剧增长的欧洲人口(1900 年时是 1800 年的两倍)提供了食物和住所。东南欧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这里境况艰难,出现了向西半球的大规模移民。各地的城市都在扩张,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得多。它们吸引着来自乡村的移民,这些人寻求逃脱农村的贫困。失望等待着许多新的城市居民,但他们仍然源源涌来。至 20 世纪初,城市化已在整个西方制造出大规模的都市区。

在这些城市里,家庭和阶级关系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旧的商业阶级与工业生产和贸易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世纪之交,在职业工作领域——从银行职员到医生和律师,中产阶级职位快速增长,如白领等新的语汇随之出现,用以描绘大量需要具备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新工作。由于社会壁垒和教育不足的阻碍,穷人几无希望得到这些职位。

少数中产阶级未婚妇女能够进入教育机构获得高等培训，但大多数人只能接受诸如中学教师或护士之类的职位。即便到此时，习俗仍然要求女性一旦结婚必须马上放弃外面的工作，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成为妻子就等同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在维多利亚时代，权力和财富执掌在中产阶级男性手中。

19 世纪晚期，个人提升的机会增加了。随着工厂体制的扩展，雇佣工人的数量日益增长，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亦复如此。尽管遭受生活贫乏之苦的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但他们的劳动经常危害他们的身体，缩短他们的寿命。工作取决于经济方面的需求和私人企业的需要，萧条意味着失业和困苦。20 世纪初，政府在帮助那些失去工作能力和丢掉工作的人方面做得很少，它们依然尊崇旧格言："上帝只会帮助那些自助的人。"英国人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写的 19 世纪晚期最流行的书籍之一，以词语"自助"总结获得成功的秘诀。

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变革正在西方下层阶级当中进行，他们开始分享到工业经济的益处。由于劳动阶级的饮食水平和卫生状况得到提高及改善，成年人的寿命极大地提高。作为普及初等教育的结果，断文识字变得普遍。民众教育的大幅进步和大规模阅读公众的兴起(尤其是在城市中)，可能是西方世界在 19 世纪晚期主要的文化发展。

工人的家庭生活开始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卫生和饮食条件带来了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婴儿死亡率。与此同时，避孕方法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变得普遍可用。到 19 世纪晚期，随着家庭选择要更少的孩子，整个西方的出生率日渐下降。这种趋势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人们普遍相信大多数孩子都会存活到成年，因此能够给予年迈的父母照顾。四分之三的婴儿活不到 10 岁的时代已经过去。小家庭可以更轻松地分享家庭资源的同时，仍然能让父母满意地看着几个孩子长大成人。这种被称为"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整个社会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达至一个相对平衡点)的演变趋势，标志着欧洲前一个世纪人口爆炸的结束。同样的人口变化过程——平衡

资源和人的需求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 20 世纪晚些时候开始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

大多数西方人共有的对于进步的信念反映了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也开始享有曾经是中上层阶级特权的休闲时间，它为诸如组织化的体育运动等活动开创了新的机会。欧洲人倾向于足球运动，美国人则选择了棒球。法国人德·顾拜旦（de Coubertin）男爵把他的国际体育竞赛梦想变成了现实。1896 年，他在希腊雅典（Athens）组织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 30 个国家参加，派遣了 200 名男运动员，竞逐顾拜旦相信其将成为国家间和平竞争样板的金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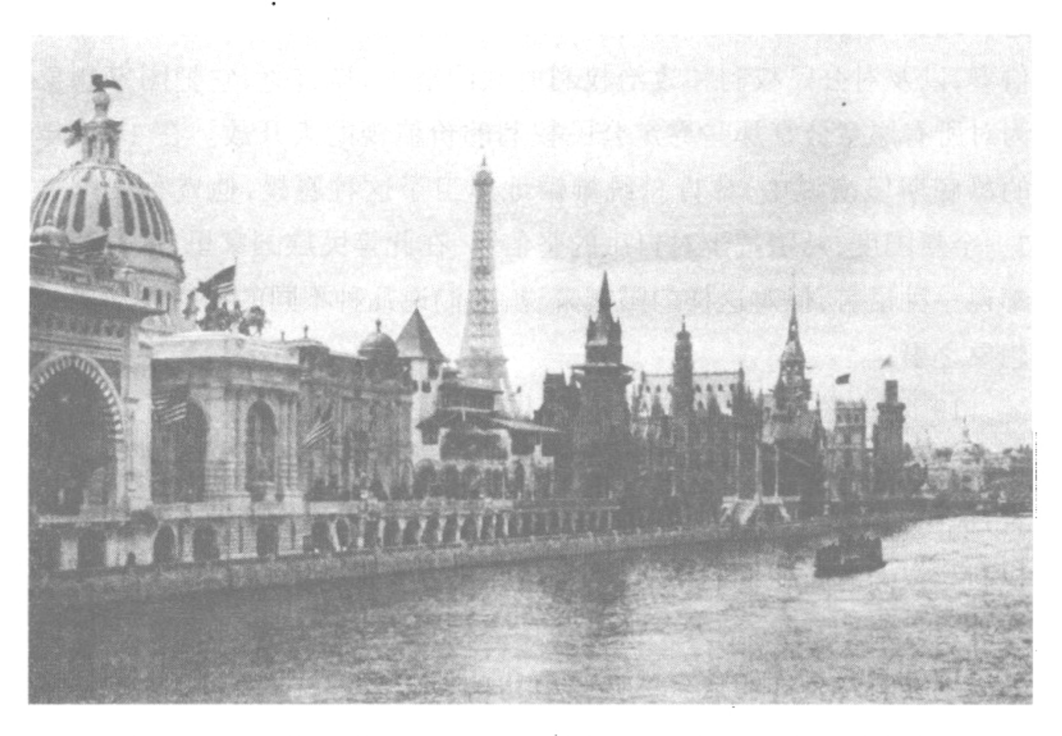
技术成就是奇迹的源泉。电影——摄影胶片和电灯相结合的新产品——以传奇、喜剧和冒险等逃避现实的故事，让观众心醉神迷。

这个充满奇迹和成就的世界，在 1900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公开展示，博览会的组织者以进步和西方文明的名义庆祝新世纪的开始。它在闭幕前共吸引了 5 000 万参观者。展览在纵贯巴黎市中心的大量新建筑里举行，展出的东西从巨型的工业机械到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致命细菌。大量的展览和布景揭示了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奇异风俗和服饰，其中包括穿着传统服装的土著民族代表。

国家展厅沿着“万国大街”排列开来，彼此之间争奇夺艳，努力以各自国家的成就让公众留下印象。德意志帝国的展馆建筑像巨大的中世纪市政厅；美国选择了罗马神庙的设计形式；俄罗斯帝国修建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中世纪城堡）的模型，里面是形似巨型西伯利亚地图的“跨西伯利亚铁路”，以及一节真的火车餐车厢。游客被邀请进入车厢内，坐在桌子边，通过车窗一边观看 30 分钟不断转动的透视图画（非常长的卷轴油画布），体验着想象中的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之旅所见的场景，一边享用端上来的俄罗斯美食。据观察者所言，它是世博会里最受欢迎的展览。环游世界成为一件极具吸引力的事。

1900 年巴黎世博会给公众呈现了乐观的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既指工业社会，同时也指文化态度）愿景，这种态度衍生自对正在进行中的深刻社会经济转型的意识。一些人看到了这些力量较为黑暗的

一面，指斥国家间民族主义敌对情绪的上升、致命的新式战争武器的出现、阶级冲突以及隐藏在城市贫民窟和乡村里的贫困。进步和对抗是 20 世纪历史的两面，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其程度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万国大道"，巴黎世博会，1900 年(摘自"The Paris Exhibition 1900" [London 1901])

欧洲民族主义

30

巴黎世博会上西方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展馆现场，鲜明地凸显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变得多么的重要。法国大革命时期首次得到确切阐发的民族国家理想指出，民族拥有共同的身份特征和由自身历史经历凝练的一整套信仰。但这种愿景潜藏着深刻的冲突。它将国家与这个国家的人民联合到了一起，但却没有解答这样的问题，即促成这种联合的根本特征是人民欣然接受的政治理想，还是单个民族明显具有的民族团结性(不论这一民族是由人民自治的，还是由一个代表他们行管理权的统治者所统治)。这两种迥异的民族主义版本，一个

是个人性的,另一个是集体性的,都存在于所有西方国家当中。20 世纪,随着民族主义在全世界传播,它们重现于非西方国家。

作为一种人权形式的民族主义通常被定义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它将民族国家的理想建基在民族纽带的基础上,这种民族纽带的含义是,在民主的民族国家里,人们有着对法治的共同信奉,以及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共同尊崇,换言之,它把国家想象为对所有愿意分享那些界定公民权利的价值观的人开放。在 1863 年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总统雄辩地捍卫了这种愿景,他宣称美国是"一个新国度,乃肇基于对自由的坚信"。在此等民族国家里,人们通常都说一种语言,但对这样的国家来说,人们说几种不同的语言亦非不可想象之事。

31

19 世纪,在诸如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公民,似乎业已接近达至这种形式的民族国家。但即便在那里,批评者们(同时亦宣称是民族主义者)提出,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化的主导民族,不应该给其他民族同样的权利和权力。按他们的看法,所有公民在得到完全的公民权之前,都必须从语言开始,逐步融入主流文化中。他们的主张清楚地表明了公民民族主义的希望和弱点。要变得真正的公正合理,国家需要它的各族民众同意加入到一个多元的民族共同体中。林肯对美国公民民族主义的愿景,在内战后的一个世纪里是悲剧性的失败,因为美国不能克服将黑人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还能够界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同体。它经常出现在政治争论和权力竞逐中,认为一个民族拥有基于共同祖先的集体特性,人们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其思想根源在于 19 世纪的文人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独特性的赞颂。这种对"民族"(people)的定义强调他们的民间故事、语言和历史的丰富,"种族"(ethnic)则指这个民族特有的遗传特征。种族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纲领后,强调每个民族都需要在故土上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国家去实现他们真正的命运、捍卫他们的需要,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必须接受占主导地位的种群的统治。19 世纪,以

此等语汇宣扬民族统一的文人和政治领袖，大多数都设想以专门的法律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

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归属，并日益以民族语汇对其加以界定，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里，逐渐传遍欧洲各地。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和普遍的识字率，使人们能够读到史学、新闻和文学里传播的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叙事，民族主义就是从这当中汲取到了力量。它的主要支持者居住在城市中心，这里的个人联系和大众文化使共同的民族特性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经历。对共同特性的感知，极大地扩展了有意义的人际联系，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当它助长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甚至是仇恨时，就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潜在的力量，创造出一种自我与他人、朋友与敌人的新观念。

在欧洲，民族主义毁灭旧国家、创制新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性潜能，在 19 世纪就已显山露水。在民族统一的旗号下，通过战争和民众起义，德国和意大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变成了民族国家。在中东欧，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君主国依然是动荡和暴力对抗的中心，决意捍卫统一的政府与力图脱离开来以建立独立的种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猛烈碰撞。东南欧的奥匈帝国和东边的俄罗斯帝国居住着大量的民族。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统治着奥匈帝国；俄罗斯人是俄罗斯帝国的统治民族，他们统治下的各民族掀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性运动。 32

奥匈帝国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要求为所有说塞尔维亚语的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塞尔维亚作家和知识分子相信，所有南斯拉夫人（巴尔干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属于同一个国家，这些人所说的语言，尽管各地方言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在语言学上都是相似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为缺乏清晰的共同语言不重要，正如他们低估了宗教壁垒的重要性一样。宗教信仰在那里制造了天主教徒（克罗地亚族）、穆斯林（通常被称为波斯尼亚人，因为大多数居住在波斯尼亚地区）和东正教徒（通常把他们称为塞尔维亚人）等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宣称这些民族说同一种塞尔维亚语，拥有类似的祖先。根据种族民族

主义的逻辑,他们所有人拥有共同的民族特性,所有人都应属于同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多数说塞尔维亚语的民族都居住在奥匈帝国境内,位于帝国南境的小塞尔维亚王国,形成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希望构建新民族国家的核心。奥匈帝国是他们实现目标的拦路虎,一些塞尔维亚人准备以暴力方式取得胜利,包括政治谋杀(恐怖主义),他们最终获得了成功,但却是在经历了一场恐怖而血腥的战争之后。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难以逃脱流血和暴力。

小　结

数千年来,诸帝国的稳定和强大主要依靠军队的力量、赋予其权威以合法性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维系帝国庞大机器的经济资源。中华帝国的衰落揭示,在面对经济困境和败于外国之手的时候,古代帝国不能依靠其臣民的忠诚。相反,日本帝国的成功表明,图存的关键在于改造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工业技术,使之适应本国的需要。日本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去庆幸自己迫使其民众吸纳了西方的工业、民族政治机制和现代的陆海军。

这些新帝国为自己征服的领土创立了新的帝国统治模式。科学技术发明使它们能够到达以前无法企及的土地,相同的帝国工具,使它们进一步强化对殖民地的经济盘剥和对殖民地各民族实施更严密的政治控制成为可能。它们的铁路和电报方便了交通通讯,使殖民地和母国靠近起来,也将各殖民领土连接起来。它们在自己殖民地周边划定的边境变成帝国行政官员和界内各民族可触知的界线。西方的官员、民族志学者和地理学者给这些民族所起的名字经常是武断的,帝国政府赋予当地部落统治者的权威与传统的部落统治方式几无相同之处。然而,这些殖民行为,一如帝国修建的港口、铁路和电报一样,牢牢地将自己嵌入到殖民地的生活当中。

这些帝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解决冲突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内部和平以及长期在亚洲、非洲构建帝国进程的结束。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战争是注定很快就要倒台

33

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弱点和冲突的产物，但战争的直接起源主要是欧洲政治领导人犯下的可怕错误。他们最大的失败是未能理解战争不再是获得国家利益的工具，工业时代的战争变得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性。当欧洲民族国家使用新式武器打击另一个国家时，战争也就毁灭了许多曾经是欧洲文明引以为豪的东西。

本章大事记

1900年　世界人口约15亿
1900年　中国义和团起义
1899－1902年　布尔战争
1901年　伊朗发现石油
1904年　美国干涉中美洲政策
1904－1905年　日俄战争
1905年　俄国第一次革命
1906年　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运动
1907年　英国与法国、俄国非正式结盟
1910年　德国军援奥斯曼帝国
1910年　墨西哥革命开始
1911年　大清王朝瓦解
1914年　巴拿马运河开通

推荐阅读

世界现代史透视

*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1998) 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进行了有力的分析和论述。

J. M. Roberts, *Twentieth-Century: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99) 详细介绍了当代世界史。

帝国和民族国家

*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tion, 1991) 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民族主义的社会文化起源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Raymond Betts, *The False Dawn: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75) 对欧洲新殖民帝国简明扼要的解释。

Basil Davidson, *Africa in Modern History: The Search for a New Society* (1978) 研究了欧洲帝国对非洲的影响。

* David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1) 对新发明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作用进行了敏锐的探讨。

回忆录和小说

* Ivo Andric, *The Bridge on the Drina* (1959)。虚构的引人入胜的波斯尼亚历史，讲述一个穆斯林—基督徒社区和一座 300 年历史的大桥的经历。这座桥把人民聚拢在一起，直到 1914 年彼此交战的国家将它毁坏。

* Joseph Conrad, *Almeyer's Folly* (1895)。欧洲人对东印度的嘲弄，由最受帝国主义鼓舞的西方小说家康拉德撰写。

* Rudyard Kipling, *Kim* (1901)。英国最伟大的殖民小说，对英属印度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

* 表示有平装版的图书。

第二章　战争与革命(1914－1930)

- **欧洲的战争与和平** 34
- **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 **苏联的共产主义专政**
- **墨西哥革命**

重点：战争与社会

聚焦：约翰·里德

对新帝国的巨大考验发生在1914年，奥匈帝国边境上的一次局部冲突，出人意料地在欧洲国家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遥远的亚洲诸帝国旋即加入了战争，不久，美国也卷了进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好几个帝国消失了，成为战争和内部动荡的牺牲品。在这场战争临近结束的年代，影响巨大的政治声音(美国总统威尔逊以颇为谨小慎微的语言，新的革命国家俄国的领导人则以暴烈的语汇)甚至质疑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统治权。

在西欧的战争结束之前，俄罗斯帝国境内业已开始了政治革命。列宁及其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在短短几年里破坏了俄国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帝国的旧体制消失了。法律方面也是如此，在1917年革命岁月里通过的法律，奠定了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共产主义者期望，他们的革命将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在当时，他们渴望革命性转变的梦想还扩展到整个世界。

在这些年里，革命运动出现于数个国家。19世纪曾就民主和政治 35

自由问题爆发过欧洲革命，新世纪的革命则将民族团结和军事荣耀问题带上了前台，这在战后的意大利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这里，“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第一次开始大行其道。这些革命也涉及民族团结和社会正义，两者都成为墨西哥革命的中心特征。20 世纪将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军事冲突的时代。

欧洲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在欧洲，战事几乎自始至终一直在两大战线上展开。东线是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对阵俄罗斯帝国的军队。1917 年俄国旧王朝垮台，新成立的俄国政府停止抵抗，导致东线的战斗停息。在西线，战斗继续进行，直至西方协约国迫使德国请求停战。这场战争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使欧洲的恢复缓慢而痛苦。

战火很快蔓延到遥远的土地。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集团(Central Powers)，旨在击败俄罗斯帝国。它确实间接地取得了成功，因为它封锁了从地中海到俄国的商业通道，导致俄国陷入困境并最终爆发革命。但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承担同盟国集团 1918 年的失败，它很快就从中东的地图上消失了，那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必须在新国家里重建自己的生活。即便是东亚也小规模地卷入了战争：日本帝国加入了协约国，派遣军队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占领区，后来又加入了协约国派往俄国与共产主义者作战的部队。这场战争在范围上和影响上都是国际性的。和平缔结者们力图让解决方案涵盖整个世界，于是创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阻止针对任何地方的成员国的侵略战争。像战争一样，和平也是全球性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在大部分地区已工业化、仅部分地区自由化的欧洲世界，令人不安的冲突迹象在世纪之交业已浮现。欧洲诸国有着漫长的战争史，19 世纪期间，对抗行为仅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之间，且持续时间也很短。到 19 世纪末，曾经使进步显得如此稳固可靠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却给“长

期和平"带来了威胁,民族主义似乎正在加剧欧洲各民族间的彼此敌对。工业革命为构建新的更加有效的战争工具提供了可能,世纪之交的繁荣则让各国政府有充足的资金从事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观察家们知道,当新的冲突爆发,它们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美国内战曾给欧洲的军事观察家提供了理解正在进行的军事变革的大好机会。然而,直至另一场大战来临,大多数军事将领从来不曾考量过武装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所能导致的真正流血规模。

欧洲冲突的起源植根于欧洲内部未解决的国际问题。各新兴帝国在欧洲边境之外的关系偶尔会激起剧烈的对抗,但所有争端都通过谈判得以解决。帝国对领土的要求,对欧洲各国的战略、外交或经济需要而言并非是不可缺少的。按照外交官们的理解,这些需要被界定为"国家利益",保护这些利益构成了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36

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些国家的独立性确保它们的领导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这些利益是什么,以及他们将如何促进和捍卫这些利益。没有任何国际组织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也没有任何国际法约束动用武力解决冲突。一些外交协定力图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前者可以杀戮或被杀,后者在理论上受保护,免于在陆上和海上遭到这样的残害。但维系和平的责任落在了欧洲大国领导人的身上。

在此等环境中,欧洲外交官员根据"均势"原则判定本国的强或弱,也就是本国和盟国在对抗敌对国家及其盟国时的相对力量对比。取决于它们的国际野心大小,它们可能满足于一种可以阻遏战争的均衡,或通过恐吓力图使均势朝有利于自己的一方摆动,以便获取国际利益。没有人把战争本身看作目的,战争只是他们的政府或其他国家可能动用以达到某种外交目的的最后手段而已。他们把国际关系的这种指导方针视为外交政策的唯一"现实"基础。

到 20 世纪初,欧洲大国形成了两大敌对的同盟阵营,每个国家根据自身对国家利益的判定选择盟友。1871 年,在一场反对法国的战争中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选择与奥匈帝国联合,后者需要得到支持以对抗南部和东部边境的敌对国家(尤其是俄国),这个同盟被称为"同盟

国”。法国领导人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东部省份在1871年后丧失给德国,因而从俄罗斯帝国那里寻求支援,俄国也准备欢迎法国盟友,以阻止德国和奥匈帝国变成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力量。在该地区,冲突存在于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俄国政府的目标是保持一个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奥地利领导人决意镇压塞尔维亚人(无论是来自塞尔维亚国还是来自奥匈帝国境内的臣民)任何的分离主义努力。事实证明,在可能引发战争的所有根源中,这个是决定性的。

德国皇帝无条件地支持奥地利这项危险的政策,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而大大增加。20世纪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为本国确定了所谓的“世界政策”,意图通过外交和军事努力,使他的国家变成全球性的大国。德国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体系,以及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具聪明才智的军事领导层。利用这些资本,德国的外交和军事使节与奥斯曼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援助奥斯曼帝国重整军备,建造通往阿拉伯半岛的战略性铁路。

德国皇帝紧锣密鼓地推动整顿军备的浪潮,让他的国家拥有一支堪与英国匹敌的海军和一支能压倒其潜在敌手的陆军。这一进程预定至1914年完成,而到此时,德国将军们业已设计出一套似乎万无一失的军事战略,确保一旦发生欧洲战争就能迅速取胜。他们的计划是,通过中立的比利时领土入侵法国,首先摧毁法军,然后调转部队打击俄国。德国政府并非为战而战,而是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包括支持奥地利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寻求全球霸权。这种政策被批评者称为“强权政治”(machtpolitik),它提高了战争风险,也促使英国政府认真考虑与德意志帝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37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政府断定,对其帝国利益和战略防卫的主要威胁,是德意志帝国意欲成为全球大国的目标及其依靠的强权政治手段。德国雄心勃勃的海军扩建计划威胁到了大英帝国海军的霸主地位,德国在中东的扩张导致其接近苏伊士运河和英国的保护国埃及。出于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摒弃了与夙敌俄国和法国之间的长期怨隙,1904－1914年间,它迅速地与它们走到一起,形成针对德国的非正

式同盟。两大同盟集团本意上都是防卫性的,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利益都主导着盟友的选择。然而,它们构成了双方战争计划的基础,设想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确保能迅速击败敌对的同盟。

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引爆战争的事件发生在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市(Sarajevo)。波斯尼亚居住着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所有居民说的都是塞尔维亚语。一小撮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名为"黑手会"(Black Hand)的秘密会社,其目标是实现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一。政治恐怖主义是他们选取的行动手段,用以打击创建南斯拉夫国家的拦路虎奥匈帝国。像当时和此后的其他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他们变成暗杀者引起公众对他们事业的注意,但却几乎没有激励什么坚定的支持者投身到他们的斗争中。他们的恐怖主义是弱者那种绝望而毁灭性的姿态。

黑手会选择的暗杀目标是为帝国服务的官员。1914 年 6 月末,他们迎来了最好的机会。当时,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对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他们的手法很业余,但却侥幸成功:在炸弹袭击失败后,一个 18 岁的黑手会青年成员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近距离开枪击中了斐迪南大公。黑手会的成员们都是帝国的公民,但他们把忠诚放在自己的民族主义事业上,他们服从的是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抗是他们的目标。这一次,他们所获的成功超过了他们最狂野的梦想。

仅一个多月后,欧洲两大同盟就已处于交战状态。首先采取行动的是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政府,它决定结束塞尔维亚国的独立,而暗杀为奥地利在 7 月末向塞尔维亚宣战提供了口实。奥地利和德国领导人都预期俄国会抗议,但不会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冒战争之险,他们只是部分地预料对了。为了证明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俄国政府下令动员其西部(与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边界上的军队。俄国的行动是导致欧洲冲突的第二步。德国将军们仅懂得俄国军事动员的军事含义,即要阻止他们的战争计划。他们说服皇帝,除非俄政府停止集结部队,否则战争不可避免。但俄国领导人拒绝让步。德皇声言德国受到了入侵威胁,对俄罗斯帝国和法国宣战。当德国部队急速开进中立的比利时并

38

包围了法国军队后,英国政府做出了重大决定,以自己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为由,站在法国一方加入了战争。奥地利—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变成了全面的欧洲大战。

欧洲和平为什么走向终结?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争论,从战争第一枪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两种常规理论出现在历史学家的研究和阐释中,一种是把主要责任归咎于这些年里促成国际冲突不断扩大的诸多因素,如恶化国家间关系的侵略性殖民征服,分裂欧洲人民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军备竞赛诱使军备最精良的国家更倾向于诉诸战争而非外交妥协,以及结盟体系创造出敌对的国家集团。在这种观点看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应受谴责,因为所有国家都促成了关系恶化,作了战争准备。另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则着重关注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主义计划和 1914 年德、奥欲摧毁塞尔维亚的危险决定。通过确认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导人执行了侵略性政策,这种理论认为,德、奥政府应该为导致战争爆发的系列事件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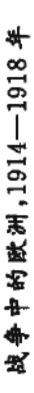
在全面战争之前的数周和数天发生的事件,揭示了用强权政治解决外交冲突的危险。双方的政治领导人都努力想要和平地解决争端,但却使用了战争威胁以表明他们为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决心。当军队将领要求当局对这些威胁针锋相对,把战争的决定权从外交官手里接管过来时,临界点来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将军们相信,战争会给他们的军队带来一场快速的胜利。他们的错误是欧洲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战争的爆发是政治家失去了对偶然事件的控制力,它给 20 世纪后来的政治家(包括 1962 年时面对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总统)提供了警示,努力去思考他们怎样才能避免无意间又引发一次更加可怕的战争。

欧洲战争

1914 年东线和西线的大规模战役的结果,挫败了战前拟定的速战速决的军事计划(参见第 39 页[①]地图)。所有的军事进攻都未能达到它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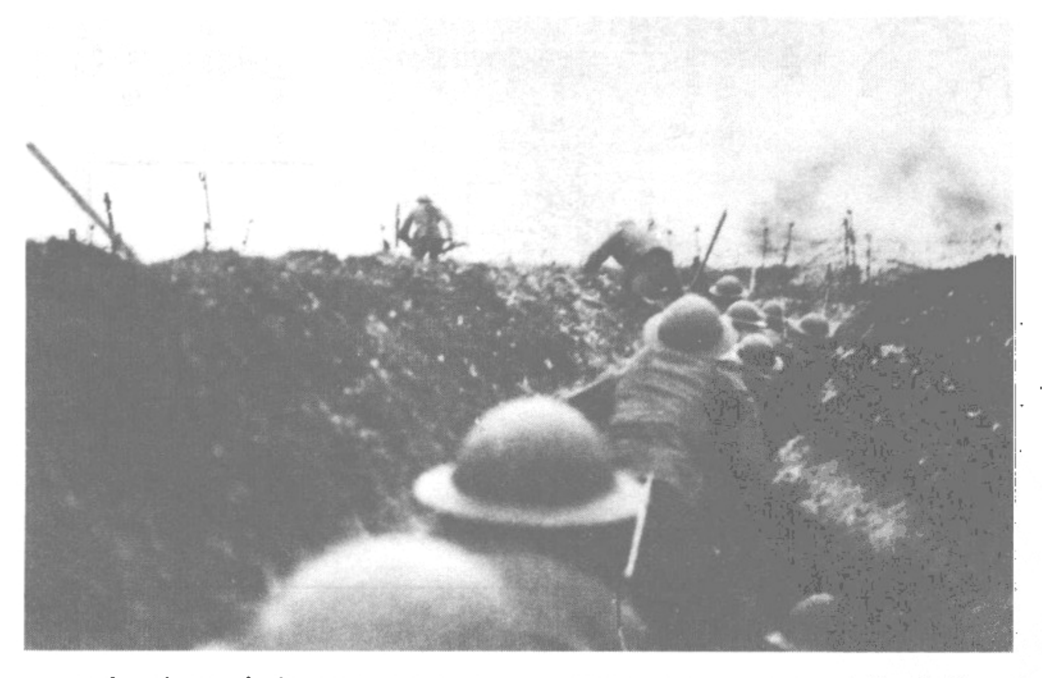
① 正文中提及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编者注



战争中的欧洲,1914—1918年

的目标,各方的军队在这些战役后仍然保有充足的力量继续战斗,即便是弱小的塞尔维亚军队,在短时间里也曾成功地阻止奥地利军队征服这个小小的边境国家。防御性武器,尤其是移动的、快速射击的加农炮和机关枪,才是真正的胜利者。1914 年底战争的最精确图景是深深的堑壕,士兵面对炮兵的狂轰滥炸猫在里面寻求微弱的保护,最终,这里成为数百万士兵的坟墓。尽管生命的损失巨大,但军事领导人到处许诺,他们很快就要取得胜利。用一位痛苦不堪的德国军官的话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各国的坟场"。

长期战争的可能性迫使战争领导人改变和平的社会经济方式,成千上万身体强健的男子开往前线,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严峻的劳动力紧缺现状压倒了此前在经济领域里对妇女的歧视,战时的机会和要她们给予帮助的爱国主义吁求,促成了妇女离开家庭到"后方(生产)战线"上工作。但对许多已婚女性来说,在生计状况日益恶化的时候,工厂工作难以弥补她们丈夫收入的损失和不断攀升的家庭需求。政府被迫动用特殊权力,实行商品配给制度,以保证战时经济按需要运转。



西线:英国正在进攻,1917 年 7 月(Imperial War Museum/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0

事实证明,商品配给的结果,是军队得到了满足,但工人阶级的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至1916年,即便是俄国军队也能得到充足的战争必需品供应,但在战争最初数月一度平息下来的社会冲突,随着劳动人口生活费用的升高又卷土重来。工资增长落后于物价,农民宁愿在黑市交易,也不愿意按政府的法规出售产品。俄国经历了最严重的物资短缺,因此导致了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1916至1917年冬,罢工浪潮在俄国各个城市的工厂工人中蔓延。罢工风起云涌,部分是因为食品短缺,部分是因为反对沙皇政体。新近被招入劳动大军行列的女性工人,在运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她们加入到罢工和反战示威中。1917年2月,受雇于彼得格勒(Petrograd,以前叫圣彼得堡)各工厂的妇女在"妇女节"(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特别节日)举行罢工,要求得到更多的食品,她们高呼"给我们面包!"吸引了许多其他工人加入,由她们发动的革命在两周内推翻了俄罗斯帝国。

速战速决的战争计划的失败,把这场欧洲冲突转变为世界大战。战争在海上和陆上进行,英国海军迅速控制了公海,宣布对德国实施海上封锁。德国海军将领借助一种新的海战军备——潜水艇,他们指望以这种新的战争武器摧毁英国的战舰和向英法运送商品的商船。

41

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动员了整个帝国的劳动力和资源用以支持战争。英国宣布所有的殖民地和自治领都与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来自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军队参加了欧洲西线的战役,并在非洲和中东进行战斗。150万印度士兵也同样如此。法国从其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动员了50万部队。这些多种族的武装力量,有力证明了殖民地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对殖民地各民族的要求既带来了合作,也带来了抵抗。来自帝国的食品和工业生产对满足战争需要至关重要,但在各殖民地造成了严重的物资短缺。西方经济体系第一次需要来自非西方的劳动力,以取代被征召入伍的人。劳动力征召被强加于殖民地的人民,但他们不情愿被征召的情绪是如此之大,乃至引起公开的反抗。1916年,俄罗斯帝国加于突厥斯坦(Turkestan)殖民臣属头上的战争需求,在当地定居

民族和游牧部落中引发大规模反抗,许多人宁愿逃往中国也不愿协助沙皇军队。法属西非也爆发了类似的抵抗,非洲部落以起义回应法国人动员劳动力大军的行为。

协约国和同盟国都扩大了它们的军事同盟。1914 年秋,德国成功地使奥斯曼帝国站在己方参战。奥斯曼领导人相信,同盟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并期望恢复自己在中东的统治。他们加入战争,在高加索山脉地区开辟了攻击俄国的新战线,在靠近苏伊士运河的中东地区开辟了攻击英国的新战线。相应地,协约国在 1915 年获得了意大利的支持,意大利领导人希望征服奥匈帝国沿亚得里亚海一带的领土。同年,日本政府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它很快夺取了中国境内的德占领土,并迫使中国政府在华北给予它经济特权。在战争条件下,日本发现了在中国扩张其帝国的新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开启了全球势力均衡的时代。

各国政府进行秘密的和公开的宣传行动,在敌对阵营里煽起冲突。德国秘密资助俄国反战的革命党,其中包括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协约国则援助奥匈帝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政党。而它们的宣传战在奥斯曼帝国发挥了最大的影响。1915 年,被流放到俄国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号召居住在东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亚美尼亚人起而反抗奥斯曼帝国。作为报复,奥斯曼当局强行将那里的 170 万亚美尼亚人迁移出去,安置到中东的集中营里。在此次暴力行动过程中,土耳其人要为 50 多万亚美尼亚人的死亡负责。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确立的模式,即战时在种族仇恨激发下进行大规模迫害,在这个世纪以后的时间里一再重演。

英国政府把中东地区对民族家园的祈望转变为一种赢得奥斯曼帝国境内少数民族支持的武器,它支持阿拉伯半岛(Arabia)贝都因(Bedouin)部落的民族起义,向他们许诺,他们的胜利将在中东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在此次运动中最著名的活动者是英国官员 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贝都因非正规的骑兵部队,在哈桑王族(Hashemite)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参见第三章“聚焦”)的带领下,在两年时间里与正规的英国部队并肩作战,打击土耳其人。

42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答应犹太人定居者无限制地向巴勒斯坦(Palestine)移民。东欧地区数百万的犹太人长期是压迫的受害者，因为在这个生活着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的地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有着漫长的历史。他们的社区孤立地存在着，说一种德语方言(依地语)，严格地遵行着他们的宗教仪式。只有极少数犹太人脱离了这些社区，接受现代教育，但即便他们也遭到那些严厉限制他们公民权利的法律之害。得到解放的犹太人之一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在1897年发起了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运动。这是一项民族建国事业，因为他把自己的犹太同胞视为一个特色鲜明的民族共同体。他称之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以表明犹太人的家园必须建在巴勒斯坦(圣经上的锡安山)。他声言，只有在犹太人2 000年前被逐出的那片土地上，他们才能免于受迫害。巴勒斯坦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由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统治，居民几乎全部是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1914年前，一些犹太人先行者定居在该地区，但奥斯曼政府和当地阿拉伯居民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直到一战爆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的复国主义目标，看上去仍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英国对战时盟友的需求改变了一切。英国政府的宣传战，其受众也包括欧洲的犹太人，以最大限度地动员支持力量。经过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漫长的讨论，英国政府于1917年发表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daration)，让“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成为一项公开的事业。该宣言确实承诺保护“现存的非犹太人社群”的民事和宗教权利，但宣言的影响是允许了犹太人自由地向巴勒斯坦移居。反过来，英国人期望得到犹太人领袖以及遍布欧洲和美国的犹太民众对他们战争行动的支持。但问题在于，既鼓励阿拉伯人又鼓励犹太人梦想在中东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一项带有潜在爆炸性后果的自相矛盾的政策。但此时，英国领导人把赢得战争胜利凌驾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

同盟国与协约国在欧洲的对抗依然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同盟国在东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俄罗斯帝国缺乏合格的领导层，它的战

争资源无法与德意志帝国相匹敌。1915 年,德国军队把俄国军队驱赶到俄国境内数百英里,造成 100 多万俄国人伤亡。德国的胜利未能迫使俄国投降,但却强化了国内对沙皇尼古拉二世政权的社会和政治反对。到 1917 年冬,对政府战争行为的敌视已经在整个帝国的人口中蔓延开来,甚至包括军队的将领。1917 年 3 月(俄历 2 月),抗议物资短缺的罢工浪潮,迅速转变为吁求推翻沙皇君主制的政治示威。当尼古拉二世命令军队镇压起义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生哗变,加入了示威者行列,甚至连沙皇手下的将军也选择支持革命,而非保护他们已完全对之失去信心的君主。尼古拉被迫逊位,俄罗斯帝国土崩瓦解了。

43

事实证明,这次政治革命中,在决定谁最终控制俄国的过程中,战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队里的士兵和工厂里的工人,对战争所要求的牺牲深感幻灭。大多数政治领导人拒绝向德国投降,相反,他们要求人民忍受战争苦难,直至德国军队被逐出俄国。只有列宁领导下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准备给予人民"和平、面包和土地"。当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党(1918 年改名为共产党)下令支持者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是一次不计后果的行为,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很少,而且国家正朝着经济混乱的方向发展。列宁政权上台后的第一项举措,是宣布整个东线休战,开始与同盟国进行和平谈判。

作为回应,德国军事领导人要求在俄国有条件投降的情况下给予其和平,他们提出的条件包括由德国军队占领他们业已征服的所有东部领土,他们还要求俄国承认新的东欧国家乌克兰(Ukraine),它的人民几个世纪里都生活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利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接受德国的保护。1918 年 3 月,列宁被迫接受这些条款,此时,俄国军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已不复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把新成立的革命国家的疆土,缩减到 17 世纪莫斯科公国(Muscovite)旧有的北方领土范围里,德意志帝国成为东欧主导性的力量。同盟国集团在战争中获得了最大的胜利,他们在布列斯特的谈判让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舞台上待得长了一些,但这似乎是有价值的冒险,他们期望在西线速

战速决，结束这场战争。

协约国的胜利

德国没有取得胜利，那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命运的这种惊天逆转之原由，是法国和英国军队的一个新盟友——美国的存在。没有大规模的美国军事供应和随后从海外而来的成千上万的生力部队，德意志帝国很可能会赢得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斗争。这些改变了战争趋势，协约国的外交目标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决定国外战争胜负和战后和平安排的重要角色，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美国卷入战争首先起因于将美国与协约国联系起来的经济贸易。美国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追求的目标则进一步起了推动作用。威尔逊被举着改革政纲的民主党提名参加1912年大选，他的竞选纲领标举着乐观主义的经济机会和政治自由观，这为他赢得了当年的大选。两年后，当战争降临欧洲时，他对商业利益的重视促使他保护美国的对外贸易，这对美国走出新近的经济衰退至关重要。他的民主理想也让他深信，美国应最大限度地在世界上捍卫自由原则和法治。在向美国公众解释为什么在1917年对同盟国宣战时，他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他曾许诺，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是"民主的安全阀"，这也解释了美国人在战后何以如此迅速地感到幻灭。 4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状态。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宣布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他敦促美国人"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保持中立，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保持不偏不倚"。不卷涉其中很难保持，但他在三年时间里让美国置身于冲突之外。他担心战争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警告说卷入欧洲战争将迫使政府"采取那些对我们的政府形式和美国理想致命的防卫措施"。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居间调停结束战争。1916年12月，他提出了一份"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计划，该计划将终结"对新的势力均衡的争夺"和"纠缠不休的结盟体系"，他提议以"权力协调"(concert of power)取而代之。他的提议失败了，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准备妥协。但这些思想

后来变成了他战后欧洲和平计划的基础。

尽管他努力保护美国的中立地位，但威尔逊面临着协约国需要美国商品的现实。法国和英国充分利用美国市场，下巨额订单购买食品、衣服和军火。到 1915 年，这两个国家都花光了自己的资金，需要向美国贷款来购买更多的战争商品。威尔逊犹豫不决，因为他认识到批准贷款不符合中立精神，但拒绝就等于支持同盟国集团，而威尔逊对它们毫无好感。此外，美国经济刚刚摆脱严重的衰退，农民、商人和劳工领袖都指望对外出口来加速经济复苏。威尔逊批准了贷款，结果是，美国对协约国的贸易到 1916 年增加了四倍，美国经济繁荣了起来。美国在战争中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

美国加入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对英伦诸岛实施潜艇封锁。德国海军司令下令从 1917 年 2 月开始实施全面封锁，这个命令允许德国潜艇击沉中立国家的船只。他们向德国政府做出极其乐观的承诺，说他们有 200 艘潜艇的舰队将扼杀英国经济，迫使英国投降。他们承认，包括美国在内的中立国船只将被击沉，这个行动会给美国宣战提供合法理由，但他们相信，在美国军队抵达欧洲之前，德国早已取得胜利。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海上封锁是威尔逊决心参战背后的决定性因素。1917 年春，驶往英国港口的货船中每四艘就有一艘被德国的鱼雷击沉，其中许多是美国船只。威尔逊可能把德意志帝国想要称霸全球的企图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不过，说服美国公众支持其行动的信念和需要，使他将美国宣战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1917 年 4 月，他要求国会向同盟国宣战。他谴责德国的“反人类战争”，并保证说美国不是为“征服或统治”而战斗，而是为了“世界的终极和平，为了各民族的解放，世界必须变成民主的安全阀”。他的演说按照政治进步和国际和平的理想计划来表达战争。

45

但在威尔逊可以履践他的和平计划之前，协约国不得不先击败同盟国。它们的第一个成就是粉碎了德国的潜艇封锁，到 1917 年末，英美海军联合力量已将船只的损失减半，当美国开始向欧洲派遣军队时，

没有一艘军队船只被击沉过。然而,在美国军队准备好前往法国境内战斗前,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最后,在1918年夏,成千上万的美国步兵开始每月陆续抵达欧洲大陆,到秋天时他们已形成一个拥有百万部队的独立武装力量。他们的存在毁灭了德国人在西线取得胜利的最后希望。

1918年夏秋之季,同盟国的军事崩溃到来了。由于人数上的劣势和士气的日渐低落,德国部队开始持续的、不间断的撤离法国和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北部的小股协约国军队在当年秋天突破奥地利防线。与此同时,中东的英国和阿拉伯军队通过巴勒斯坦挺进大马士革(Damascus)。1918年10月底,同盟国作为军事联盟不复存在。奥地利军队分裂为帝国各民族的部队,每支部队都准备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奥匈帝国顷刻分崩离析。1918年秋,同盟国大踏步地走向失败和革命性的混乱,德国政府在10月要求停战议和。

停战条款与和平计划主要出自美国,威尔逊总统"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激进计划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听众。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甚至迫使那些对威尔逊观点深表怀疑的欧洲政客也关注他的声明。他就战争目标的主要声明体现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中,其中三点是威尔逊计划的重点:欧洲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建立民主政府,以及创立一个由各国参加的国际联合组织保障和平。威尔逊以美国的威望和权力支撑起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

11月初,威尔逊条款的胜利来临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生效。奥斯曼帝国的中东领土掌握在阿拉伯起义军和协约国军队手里,德国和奥地利皇帝逊位,他们的帝国崩溃了。此前控制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手中各片土地上的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10月末宣布成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民族国家。

经过四年的浴血战斗,即将到来的战后世界的形式,比旧的战前生活更加残酷。到处都是以百万计的战争伤亡者,都集中在处于应征年龄的男子当中。这场战争导致了1 000万人死亡,2 000万人受伤。没有人能预测出前俄罗斯帝国领土的命运,在那里,共产主义者及其敌人

之间的残酷内战已经开始。战争和革命正急剧地改变着人类历史进程。

重点：战争与社会

46

当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金(Eugene Zamiatin)在1920年撰写他的小说《我们》时，他想象了一座城市，经历200年的世界大战而幸存下来。这座名叫"联合国"(United State)的城市，被"大恩主"(Benefactor)及其卫兵统治着，致力于给每个人带来幸福。他们下令说，个性妨碍了全体人民福祉的实现；个人需求和情感必须服从理性，而他们垄断着理性的阐释。不同意见压根儿不存在，因为它是非理智的。数字号码取代了人名。夫妇凭借票证可在规定的时间间隔里短暂聚合，以满足不可避免的性需求。在环绕这座城市的绿色大墙(Green Wall)之外，生长着经历了长期战争幸存下来的植物和动物，以散乱自由的原始状态存在着。没有人去那里，因为它可能打乱公共秩序。扎米亚金这本小说的男主角D-503，曾短暂地梦想过拥有私人化的爱情和个人思想自由，但他很快被指控为有病。"我们"压倒了"我"。

扎米亚金的故事描述了以进步名义给出的毁灭信息。20世纪有好几部警示梦魇般未来的小说，包括乔治·奥威尔(Geoger Orwell)的《1984》(1948)和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1953)，这是其中的第一部。这些作品被称为"反乌托邦"小说，因为它们告诫人们要防范那些允诺给予所有人幸福未来的意识形态(譬如像苏联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相反，它们描绘了一个严酷的未来，冷酷无情的力量在那里践踏着人类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个体的自我和培育着自我的自由。

在他度过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和内战期间共产党统治的三年后，扎米亚金的警示来临了。革命新政权提出的计划许诺，通过把阶级利益变成决定因素促成社会进步。扎米亚金关注被剥夺了自我意识的民众的根本性问题，政治当局为抽象的集体利益而拒斥个人权利，他们成为心甘情愿的同谋犯。他有意极度夸张地描绘那个社会。

随着总体战和革命让国家权力不断增加,国家权力以此前时代做梦也想不到的程度压倒个体。西方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只不过在形式上要柔和许多。

构成国家侵入公民生活正当理由的主要战时政策,是动员战争行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在这个过程中,爱国义务构成了公民必须合作的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西方国家青年男子必须应征入伍。他们舍弃两到三年的平民生活,在退伍回乡前学习军事技艺,并且在今后许多年里,倘若发生战争便须接受被召回军队的义务。征兵是一种复杂的行政过程,但进行定期人口普查的行动,赋予了当局统计和记录所需信息的手段。在 19 世纪的短期战争中,仅此就足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对人口的需求极大地增加了,征兵令征召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在可能的情况下需要他们服役到战争结束。逃避军事义务是叛逆不忠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号召迅速扩大到包括女性,她们不得不填补应征入伍者留下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人建议她们应该避免诸如军火制造等危险工作。在国家的战争努力面前,对个人健康的考量不得不退居次席。词汇"后方战线"(home-front)将她们的工作与男子在大前方的工作置于同等的地位。在所有卷入战争的西方国家里,随着战争的久拖不决和越来越多的男子前往参战(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公共义务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起来。

47

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生命和物品,国家动员超越了人力资源以及继续战争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的限度。工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决定权以前曾是公司和个人的事务,价格涨落和利润冲动在决定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战争也改变了这些。

政府直接卷入国家的经济生活,它们确定物价,给工业分配稀缺资源,利用配给制分配商品。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监督经济活动,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控制。在美国,联邦政府掌控着铁路运输,以确保军队和军火从全国各地运来,必要时在港口迅速装船运往欧洲。它甚至成立了"燃料管理署"(Fuel Administration),监督稀缺的煤炭供应的分

配，以及“石油署”（Oil Division）以确保军事运输和海军能得到这种珍贵的商品。在俄罗斯帝国，由于担心军队和城市居民缺乏食粮，1916年，政府颁布政令，确立了“食品垄断”，根据俄管理当局实际上无法执行的那些政府法规，农民必须按额定数量输送粮食，并从购买者那里接受额定的价格。在理论上，价格管制和强制订购将保证没有人挨饿，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起作用，反倒是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后来效仿的榜样。

面临最严重的匮乏，德国引进了最严厉的国家经济管制。一位德国工业家断定说，本国战时对经济事务的国家干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次教育”。旧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即政府没有权利干预市场经济，在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力量。

战争带来了严格的审查制度，那些被怀疑不忠诚的人会受到严厉惩罚。报纸不再能够自由地出版他们想要刊载的东西。对其行为有损国家战争努力的个人的惩罚是叛国罪指控。在美国，这种指控使用得是如此随便，乃至在 1918 年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里，《权利法案》给人们提供的保护被暂时遗弃了，政府允许武断地逮捕和拘押任何被怀疑不忠的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和各个民族，平民人口中的某些群体全部贴上了“不忠”的标签。这在战争史上还是首次。在一些协约国，战争的爆发导致了针对德国人的暴乱。暴乱期间，被鉴别为与德国有关的企业和个人都易于遭到攻击。俄国统帅部走得更远，1914 年，它发布命令，把住在帝国前线附近的城市和乡村里的德裔居民都划入“敌对侨民”范围。他们被强行驱逐到帝国的内陆地区。在 1915 年俄国军队溃退期间，俄军事当局以类似的残酷方式对付西部地区的犹太人，下令这个有害的民族离开生活的村庄，还要他们在作为难民前往遥远的东方的旅程过程中自行照料自己。这种判定整个族群全体都有罪的政策，是 20 世纪稍后时期横扫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惩罚和种族清洗的先驱。

48

战争的终止结束了几乎所有交战国里这些充满敌意的人口政策，

宪法和法治重树声威，自由市场取代“国家社会主义”，战时的爱国狂热渐趋消退。然而，战争对一些因人员阵亡而给人口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法国在此方面受害最重。在战场上失去的男子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大量的战争寡妇和其他单身妇女，出生率如此之低，乃至法国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对 1920 年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解决之道是不得不通过立法尽可能多地促进人口出生率，出台法律对任何公开鼓励使用堕胎或避孕工具的形式施以严厉限制。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创举，它瞄准堕胎尤其不慎，因为它挑选了妇女作为其限制性指令的专门对象。在此后数十年里，更有效而更少侵略性的举措是给大家庭提供财政和社会资助；欧洲其他国家采用了类似的措施。国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卷入了床帏中的事务。

苏联，然后是意大利，再后来是纳粹德国，战争对国家行动的鼓励，为国家干预公共生活树立了样板，战争在这方面的影响比战时尝试的任何事情都要大。20 世纪 20 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自夸说(尽管带着夸张的成分)，他们的体制在控制社会方面是“极权主义的”。在苏联，革命行动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即“阶级”这一集体标签能区分出敌人和朋友、爱国者和叛徒。内战首次见证了苏维埃秘密警察进行的大规模逮捕，逮捕的唯一依据就是人们有产阶级或特权阶级成分的出身。在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类似的阶级标签起着更具毁灭性的影响。对富农(kulak，用于鉴定富有农民的词汇)的敌视，为采取镇压性的阶级斗争政策提供了理由。从打击范围和残酷方面来说，它是走向 20 世纪 30 年代末大恐怖的第一步。

在纳粹德国，人口政策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这个国家蛮横地决定谁应该被归入雅利安人行列，谁应该被归入犹太人行列。前者理当繁衍生息，后者是劣等人种，需要被消灭。纳粹领导人宣称自己绝对了解什么对他们国家的人民有益，并根据这种了解建立独裁政权。他们的支持者被劝服，相信集体的种族或阶级标签足以了解谁属于他们的国家。扎米亚金曾经预警过的“我们”取得了控制权。事实证明，这对他们的国家是个悲剧。



“后方战线”：皇家炮弹工厂，英格兰（Imperial War Museum/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49 事实证明，战争结束并不是威尔逊曾经希望的民主制度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激情。对一些战争老兵和政治领导人来说，它是黩武精神和暴力的一次演练。强化本国力量和荣光的需要是它的正当理由，战后是按照黩武的、威权的模式重塑他们的国家，检验这些新技术和新信仰的时间。德国的一个团体自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战争老兵领导。最成功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由名叫墨索里尼的另一个老兵领导。在意大利，战争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民主政治根本没有能力抵挡法西斯夺取权力的浪潮。

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50 墨索里尼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激起欧洲其他国家法西斯运动的

鼻祖。他是一个技术纯熟的政治煽动家,将意大利政治生活转变为暴力争斗的舞台,并最终走向了独裁政治。战前,他是一个反战的社会主义者,战争将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加入意大利军队参加战斗,这个经历给他的人格留下了印记,使他明确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受伤复员后,他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旨在把他在前线当兵时学到的残酷无情带到平民生活中,他的选择得到了意大利和欧洲各地许多其他战争老兵的追随。一名德国老兵打心眼里排斥"那些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的人",他逃避其他人相信的事实。对他来说,战斗已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就是战争,它动人心弦地鼓励我们去毁灭威胁国家的叛徒和布尔什维克,让我们心醉神驰"。战争给墨索里尼提供了在国家舞台上进行政治斗争的培训,对希特勒也是如此。

与其他感到幻灭的战争老兵一道,墨索里尼大力鼓吹意大利民族军国主义复兴的思想,他吁求把"腐败的"政客从政府里赶走,结束罢工和动荡,打败"颠覆性的、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嘲弄自由理想,为意大利民族选择"纪律"。他提议取代议会政体,建立一个强势领导人统治下的强权国家,清洗掉所有的民主党派。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原初版本,更多地表现为一整套民族主义口号和男性的好斗与暴力形象,而非一种清晰的原则学说。墨索里尼作为一个煽动性演说家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和天分,说服了许多意大利人,使他们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有着光荣而英雄的历史的民族。他把这段历史一路追溯到罗马帝国,并允诺复兴过去的荣光。他以这种方式利用了意大利的历史和种族民族主义的观念。法西斯主义把战争精神转化为革命的信条,为民族主义独裁政治提供了模糊的政治意识形态。

为了打败政敌,墨索里尼组织起一个新型的战斗政党——"战斗的法西斯"(Fasci di combattimento)。政党的名字来自"fasci"一词。法西斯运动的精英是"战斗员",一个身着黑衫扎着武装带的准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在街头打击被他们指责削弱了国家力量的共产党人、劳工领袖和其他团体。墨索里尼赞美战争是对男人和国家的真正考验,他根本不理会自己的政党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赢得15%以上的选票,他相

信,他和他的追随者会证明自己适合领导这个国家,不是根据受欢迎程度而是根据毅力和决心。他的运动不是以具体的政治纲领,而是利用情感强烈的民族统一诉求、共产主义颠覆的危言告诫以及对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制度本身腐败无能的攻击。

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国内的弱点转变为他夺权计划的便利点。战后几年里,他的追随者招募了大批对战后情况不满而渴望变革的意大利人。由于战时就社会改革和民族统一的草率许诺未能兑现而带来的失望情绪,战后的意大利,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和罢工此起彼伏。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里,黑衫党发起街头战斗,并在各处成功地夺取了市政府的控制权。一些企业领袖给予墨索里尼财政资助,他们认为法西斯分子是一个有用的工具,用以压制工会以及威胁他们财产所有权和经济利益的政党。意大利法西斯最大的号召力在于它赞美国家统一、许诺结束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里国家深陷危机,这个口号因此吸引了许多意大利人。

51 墨索里尼在此期间成为一名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渴望夺取政权,以便将自己的革命计划付诸实施。1922 年 10 月,他命令他的战斗队"向罗马进军",推翻民主选举政府。他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因为军队和警察可以轻而易举地驱散他的战斗队。墨索里尼主要指望当局不愿动用武力,他赌对了。在他的战斗队抵达罗马之前,国王邀请他担任意大利内阁政府总理,他作为合法的政府首脑开始了自己的统治。

法西斯国家

民主的意大利国家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已不复存在,政治反对派受到法西斯信徒暴力威胁的恐吓,有些人被攻击,有些人被谋杀。不久,墨索里尼废止了政党,封杀了新闻自由。他把工会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宣布罢工为非法。尽管没有发生社会或经济革命,但新政权在践踏人权和破坏民主政府方面是激进的,它许诺以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极权"权力,确保人民的福祉。

墨索里尼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党独裁的国家,处于受他绝对控制



法西斯主义游行：意大利的妇女法西斯主义团体(Dorothy Thompson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的法西斯党的掌握下。他大力鼓励领袖崇拜，追随者颂扬他是"神圣的恺撒"、"罗马天堂里崇高的救世主"。墨索里尼以罗马皇帝为榜样，向意大利人允诺法西斯党将创造一个与罗马一样辉煌的新帝国。但这些许愿多年来一直是空话。意大利殖民帝国由利比亚(Libya)沙漠中贫困的游牧人口组成。但当经济萧条来袭时，墨索里尼极尽浮夸的言行后来曾在一些欧洲民众中间引起强烈的共鸣。利用战争经历和战后危机，他塑造出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形式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谴责民主和颂扬战争的革命信条。

52

苏联的共产主义专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引发了一种类型截然不同的革命。1917年3月俄罗斯帝国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遭受的苦难和对沙皇战时领导力的幻灭感。但新领导人让国家继续参与战争的努力失败了，他们没有能力阻止军队的解体和经济的崩溃。在此等混乱情况下，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得以在1917年11月夺取了政权。

这个国家曾犹疑不决地尝试着采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体

制。共产党政权遽然中断了这种努力。新的革命政府公然拒斥了一些俄国爱国者和西方协约国的意愿，与德国单独签订了和平条约。1918年，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联合起来，在一场浴血内战中打击新政权。在三年战争过程中，农民拿起武器夺取了地主的财产，工人把企业家从工厂里、把富裕的城市居民从家里驱逐出去，民族主义运动为给那些曾在沙皇统治下的民族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战斗延续到内战期间，直至这个国家沦为废墟。

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领导人锻造的权力工具，是革命政权取得胜利的关键，它让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幸存了下来。它给俄国强加了一幅新的意识形态蓝图，后来被用作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模板。它就人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给世界提供了第一个范例。它证明了一小部分政治斗士能够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

列宁和共产主义革命

俄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列宁，在 1917 年之前的岁月里创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革命政党。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与欧洲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起者们都相信，卡尔·马克思的理论阐明了人类在过去千年里遭受压迫的缘由所在。他们从马克思理论当中取得的理念是，历史必定会走向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所有的需求和愿望都将得到满足。但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是，列宁声言只有他的政党拥有领导革命群众的知识和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进一步预测，战争已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到了革命的边缘。对敌人来说，共产主义者看上去像一个危险的狂热团体。但当 1917 年初帝国垮台后，在数量日益庞大的俄罗斯人看来，他们充满活力且纪律严明，能够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并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

列宁直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了灵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他的革命信念至关重要，它使他相信，生产资料所有权不仅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而且还决定了由谁控制国家所具有的压迫性力量。在 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将权力赋予了富裕的产业主（资产阶级），他们承

53

担着创造技术奇迹和提高工业经济生产力的职责。它也创造了人数庞大的“无产阶级”工人,他们被剥夺了从这种经济体系中获得益处和改变这种体系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声称,全世界的工人都终将认识到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把一种全球视野的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观赋予了共产主义者,它让 1917 年的列宁相信,他在俄国夺取权力的斗争将为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创造条件。

共产主义者还相信,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历史进步理论将是他们统治方案的指导方针。马克思断言,像此前的封建主义一样,资本主义注定会在一次暴力革命中垮台。取而代之的是,工农群众将迅速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达至终极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财富按照“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简单原则共同享有。这种在尘世里能建立起一个完美社会的信念,被称为乌托邦理想。

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其他共产党人迫不及待地要在这桩历史伟业中取得成功。他们声称,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将把落后的俄国直接带到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于 1917 年 11 月夺取权力与俄国大量底层人民的支持分不开。他们胜利的关键是工人的支持和哗变的士兵。1917 年间,这两个团体都组织了自己的革命管理机构,其俄文名字叫作“苏维埃”(Soviet)。1917 年,列宁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号召暴动反对议会制民主。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列宁的武装推翻了自由的“临时”政府(在同年早些时候沙皇帝国崩溃后它曾短暂地统治过俄国),并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革命国家,称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前来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把这场大变动形容为“震撼世界的十天”,但他那绘声绘色的描述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愿景,因为世界的其他地方仍然按自己的方式在运转。新政权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赋予了它的领导者以及诸如约翰·里德等来自遥远地方的追随者坚强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对支撑他们挺过即将到来的恐怖内战是不可或缺的。

共产主义国家和内战

苏维埃新政权在俄国国内和西方招致了难缠的敌人,反对者来自所有各方。一些俄国爱国主义者谴责他们 1918 年初签订投降条约,把国家“出卖”给了同盟国。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残酷无情的专制统治发出警示。共产党人征用农民的谷物供养工人和新成立的红军也激起了部分农民的不满。而来自前帝国边陲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动员起他们微弱的力量,发起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反对力量得到了俄国战时前盟友的援助。共产党业已断开了连接俄国和西方的所有纽带,解除了战时同盟关系,与同盟国媾和。它勾销了俄国的全部外债,共计数十亿美元,大多数是欠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投资者的。这个政权还呼吁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它的存在,挑战了协约国在战胜德国后力图构建的国际秩序。

54



列宁在向红军战士讲话,1919 年(Corbis-Bettmann)

1918 年中期,俄国已陷入残酷的内战中,苏维埃政府丧失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被意在推翻革命政权的反共白军所夺取。为了应

对战争,列宁把他的政权重组为战争状态,国家的资源全部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以击败“反革命”的进攻。流放到遥远的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的国家囚犯——沙皇及其家庭,成为这场残酷战争的牺牲品。1918 年中期,列宁下令处死他们,以避免他们逃到白军阵营。列宁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一个“世界资本包围下的堡垒”,要求把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军营”,新建的红军增加到 500 万人。为了向军队供应必需的给养,包括工商业国有化在内的经济政策开始实施。

55

为争取战争胜利的努力对新政权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共产党成为国内唯一的党派,国家政策的制定权和官员任命权掌握在新的共产党委员会——政治局里的核心领导层手里。列宁及其亲密顾问,如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这里做出决定新国家生死存亡的决策。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苏维埃政府被叫作人民委员会,它的成员都是党的领导人。他们杰出的领导能力以及党员们的热烈支持,是其在内战中击败反共产主义力量的关键因素。协约国的军备和财政援助,不能弥补白军的无能和组织无方。1920 年,红军在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领土的大部分区域都获得了胜利。

苏联及其各民族

俄国内战结束时,这个国家处在经济崩溃的状态,它的人民贫困不堪,传染病在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间肆虐,但相应的医疗救护措施却极为缺乏。城市人口纷纷逃到农村寻找食物,大城市变成了鬼城。没有人知道在战争中死了多少人,或疾病、饥荒导致多少人死亡。工业生产水平降至战前的四分之一。1920 至 1921 年间,俄国大部分区域的农作物歉收,在农民中导致了大规模饥荒。俄国不能在如此糟糕的境况下继续生存下去了。

共产党的专政仍然是新政权的基础,但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迫使苏维埃政府暂时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曾被视为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捷径。1921 年,政府被迫允许私人所有的农场和小企业加速经济复兴,并把这一向市场经济妥协的举动命名为“新经济政策”。

它准许教堂重新开放(暂时性的),容忍有限的新闻自由。政府领导人甚至欢迎包括福特汽车公司在内的外国工业家前来帮助重建毁坏的工厂,按照现代生产方式训练他们的工程师和工人。尽管共产党当局不情愿地做出了诸多妥协措施,但专政的强度并未削弱。

共产党还必须考虑得到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支持。内战期间,这些地区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创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们经常处于西方列强的保护之下。乌克兰和芬兰接受德国的支持,一直到 1919 年为止;波罗的海东岸的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受英国的保护;高加索地区的小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努力求得生存。到 1920 年,西方协约国军队已从俄国边疆地区撤军,只有英国留在波罗的海的舰队还在为那里的小国提供保护。1922 年,日本政府最终下令其军队撤离东西伯利亚。再也没有任何外国军队威胁革命政权。

在不会与西方发生战争风险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很快夺取了那些边疆地区,红军把苏维埃政权带到了乌克兰、高加索地区以及伊朗和阿富汗以北的中亚领土。在南面和东面,苏维埃国家的疆界接近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界线。

国内的民族多样性使俄国共产党人面对严峻的两难困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提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劳动群众大部分是工业主义塑造的且准备弃绝有害的民族激情的工厂工人。截至 1917 年,俄国和乌克兰有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但这个新国家里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过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业化,从这些方面来说,苏维埃的人民大部分还是非常落后。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地方仍然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

56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其同伴们被迫重新思考他们的民族主义观。他们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他们的革命蓝图必须包含承认不同的民族群体,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特性,是人类朝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人类确定不移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他们决定,在一部新的联邦制宪法里给予各个民族专门的政治认可。这部在 1924 年通过的新宪法,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即苏联),这个国家的主要

民族分别组成各个民族共和国的主体,它们都有自己的苏维埃"共和"政府。最终,这类共和国的数量是15个,包括俄罗斯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亚美尼亚苏维埃、阿塞拜疆苏维埃和哈萨克斯坦苏维埃。在这些土地上,少数民族获得了小块的"自治"领土,它们在其中也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学校和官方承认的语言。

通过这种对族群共同体异乎寻常的(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承认,苏联确立起一套宪政秩序。按照该宪政秩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本"土,叫"民族领土"地区,主要由说俄语民族居住的广袤区域只是众多"民族领土"单元里的一个。共产党在短期内接受了这种妥协,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对整个国家做出重大决策,党的追随者垄断着整个苏联的实际权力。

建设社会主义的挑战

全体苏联人民都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这是他们向"无阶级社会初级阶段"——共产党名之为"社会主义"前进的文化战略。在他们看来,学习是把他们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解放观念灌输给群众的必要工具。他们组织扫盲运动;通过专门的"工人大学"提供速成辅导培训,中高等教育机构向下层阶级敞开了大门。上层阶级出身的人是法律上的二等公民,不允许享有工农国家的全部权利,且作为"阶级敌人"很容易遭到专横的逮捕和惩罚。

对资本主义垮台后人类成就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构想的愿景中,包括要结束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共产党领导人申辩说,他们不是女权主义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妇女的真正解放只能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苏联新法律确实嵌入了许多来自女权运动的想法,婚姻变成了简单的法律程序,妻子或丈夫都有权提出离婚,堕胎合法化了。共产党作家颂扬"苏维埃新女性",她们在权利方面与男子平等,在决定婚姻和家庭方面享有自由。

实际上,妇女地位在苏联变化得非常缓慢,尤其是在农民当中。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活跃的共产党人力图禁止妇女戴面纱,但遭

57

到的抵制如此强烈，乃至运动不得不半途而废。在俄罗斯的城市和全国的共产党员中，妇女的确取得了她们在社会中的新权利和积极地位。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Nadezhda Allilueva)是一名拥有家庭和党内工作职位的解放女性。苏联的女权主义改革后来成为其他国家的样板。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遴选政治领导层，这个问题关系到寻找正确的政策以把他们的国家带入社会主义的紧迫需要。列宁掌控着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但经过 1922 — 1923 年的几次严重中风后，他难以继续担任领导人。1924 年初，列宁去世，领导权转移到中央政治局中他的同僚们那里。权力的争夺者之一是约瑟夫·斯大林。他从民族身份上来说是来自高加索山脉南部地区的格鲁吉亚人。但是他的同事们对他粗暴的工作方式深感担心，这种粗暴作风在他对待同志和担任苏维埃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时就已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前曾支持他的列宁，在 1922 年也警告说，斯大林的个性和统治手段是“残忍的”和破坏性的。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其他共产党人拉拢到他一边，他答应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以一份承诺尽快根除资本主义残余、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纲领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经过五年的不确定状态，约瑟夫·斯大林异军突起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得到了这个他非常渴望的职位。1929 年，政治局承认他是苏联共产党的新领袖，是列宁的继承人。

事实证明，共产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在恢复农业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是成功的。恰恰是它的成功，证明了自由市场行为是多么根深蒂固地继续存在着，尤其在农民中间。工业继续由国家控制，依靠国家补助进行建设和扩张。苏联政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为国家经济政策提供“科学的指导”。怎样才能利用财富促成工业增长？共产党知道，工业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但在他们国家，农民作为私有农场主控制着土地，他们的生产对苏联的经济财富仍然举足轻重。

在共产党眼里，建设财产人人共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农民的存在显

然是主要的障碍。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寻求可以用来规划国家经济前程的指导原则。他们认识到，根本不可能从外部得到任何帮助，正如他们的一位领导人所说，只有依靠自己"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末，斯大林的任务就是解决这种困境，他的选择是"自上"发动一次新的革命。这个口号实际上意味着针对农民发动一场战争，并开展一场迅速使经济工业化的运动，无论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俄国革命尚未结束。

在这些年里，共产党投向国际事务的注意力与投向国内事务的一样多，他们意识里的国际关系观模糊了两者的界线，因为他们的革命愿景不承认有国家界线。他们组织起一个新的国际性革命组织——共产国际，用以帮助国外的革命。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对抗的是一个被西方帝国主义强权控制的世界。随着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承认苏联的革命成就，将之作为自己国家的样板，共产国际的规模迅速扩大，其成员国接受莫斯科的领导，按照苏联的命令把他们的政党重组为中央集权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运动。

58

在远离苏联边境的殖民地，苏维埃领导人鼓励和支持那些寻求终结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按照他们对自身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的理解，对西方殖民统治这种日益增长的反抗，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走向崩溃的新阶段。1920 年，他们发起了被压迫民族大会，会议在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里海沿岸城市巴库(Baku)召开。这是非洲和亚洲社会主义者首次聚集在一起，会议的精神是革命性的，与会代表敦促殖民地人民起而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者。他们致力于击败所有的殖民帝国。会议将苏联政权坚定地放在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一边。

聚焦：约翰·里德

约翰·里德(1887－1920)被埋葬在莫斯科紧邻列宁墓的地方。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并排葬在一起，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作为报纸记者，他前往世界各地，到处搜寻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故事。他到过工人正在罢工的美国工厂，到过革命期间的墨西哥，最后来到了俄

国。其时列宁的共产党于 1917 年 11 月接管了政府，而后竭力在内战中保有权力。他的名声来自对这些冲突的报道。他最著名的报道题为《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该书力图描述共产党在俄国夺取政权的那些动荡的日子。它实际上是一部对共产党人光荣革命的颂歌，苏维埃领导人认定他有资格与他们的革命英雄埋葬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的成长经历注定他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出生在俄勒冈州(Oregon)波特兰(Portland)的一个富裕家庭里，在私立学校和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接受了教育。实际上，在加入纽约知识分子具有反叛性质的波希米亚式团体后，他真正的教育才算开始。20 世纪初，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们反抗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满、盲从和傲慢。在私生活中，他们逃避婚姻，宣扬并践行自由爱情；他们的政治信念使他们站在劳动群众一边。里德接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叛逆式信仰，他在描写普通民众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天职。

59 在担任记者的初期岁月，他很少关注点燃这些冲突的思想原则。新泽西州(New Jersey)丝绸纺织厂正在罢工的女工的悲惨命运给了他灵感，他撰写了与集会者的对话，对她们的斗争进行了戏剧性的报道，诅咒她们的老板和镇压并破坏她们罢工的警察。1914 年，他前往墨西哥，与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的骑兵一起，骑在马上目睹了这个国家的革命。尽管他认识到了比利亚起义背后对权力的渴求，但他的著作《暴动的墨西哥》还是把这位起义领袖描绘成为被压迫的墨西哥大众而战的战士。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是与比利亚一起战斗的农民，他已经开始根据阶级斗争观念来理解社会冲突，全心全意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不仅仅在墨西哥，在每个地方他都发现了阶级冲突的表现。

这种信念给了他按照进步力量对反动力量、善对恶、白对黑的逻辑来理解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洞察力。他日益根据这种视角去考量自己的政府，判断它的政策对群众是坏还是好。他正确地预见到，墨西哥人民将不遗余力地抵抗威尔逊总统在 1914 年构想的拙劣的军事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穿梭于东线和西线战场之间，亲眼观察可怕

的战斗，但他估量战争的冲击力，很大程度上是从它对社会革命的影响上着眼的。他相信，整个欧洲黩武主义的高涨把"盲目服从"精神渗透到群众中，阻碍了他所希望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战争已使欧洲成为"完全迷失的世界"。他坚定地反对美国在 1917 年卷入战争。

就在他前往俄国的那一年，他对世界事件发展进程的悲观看法突然烟消云散。他来到这里寻找一些理由，希望社会革命仍然是有可能的，并且在列宁的革命运动中找到了它。尽管他对俄语几乎一窍不通，但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九十月间那数周里风起云涌的集会、示威和辩论旋流中。其时，临时政府正在分崩离析，共产党则正在工人和士兵中赢得广泛的支持。他参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共产党人正在这座城市动员力量夺取政权。他观察了 11 月 7 日彼得格勒的起义，然后赶赴莫斯科，观察共产党人与支持自由政府的军队在这里展开的街头战斗。他所撰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就是在描写这场革命。

他继后的使命是捍卫这场革命。1918 年初，他返回美国，立即投身于反战运动，他的武器就是他手中的笔。尽管他因"颠覆活动"而数次入狱，但《权利法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是他最成功的防御。完成对这场共产主义革命的报道，是他真正的成就，该书在 1919 年初问世，从见证人的视角讲述了这"十天"。像他在写墨西哥斗争时一样，通过突出描写为列宁事业而战的普通士兵和工人，他对这场革命予以了戏剧性的记述。在他的故事里，士兵和工人是作为革命群众出现的，共产党正领导他们走向正义与平等。像他一样，他们也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成功。同年，他成为



约翰·里德，1916 年(Corbis/Bettman)

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60 但当他在 1919 年末返回苏俄时，他的信念受到了动摇。他原先似乎相信，他的家园在苏俄，不在政治反动而非革命主导着公共生活的美国。可当他身处苏维埃共产主义者中间时，他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类的救赎。红色恐怖的残酷随处可见。在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同意前往遥远的巴库，参加被压迫民族大会，并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反对者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狂热地相信革命事业真正有益于群众，但在来去的旅途中，穿越被连年战争毁灭的土地时所看到的景象让他产生了怀疑。他在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便死于伤寒，还未来得及写下他最近的经历。他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里，使他作为捍卫这场革命的英雄得以圣化。但这也许并不是他想要的荣誉。

墨西哥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里，欧洲各地都处于政治混乱状态。墨西哥的情况与此类似，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其根源积存在墨西哥自身的历史中，而非战争本身。然而，它的结果却与共产党给俄国带来的激进改革有着强烈的相似，墨西哥人自豪地宣称他们的革命以其特有的方式预告了后来第三世界发生的政治和社会革命。

在那里，暴力而革命的动荡始于 1910 年。当时，墨西哥自由主义者组织起义，以终结政治独裁者的长期统治。七年后，随着民族主义的民粹政权的出现，动荡似乎才最终结束。但后来的领导人在革命催生的理想激发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这些激进的政策一直到 20 61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才告终。在这个过程中，墨西哥政府成功地击退了美国的军事干预，推翻了盘踞百年之久的地主和军阀统治。

"革命"

墨西哥革命始于 1910 年一场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国家由温和的军人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

(Porfirio Diaz)统治着，他的权力主要依靠富裕的地主和工业家、天主教会以及相邻的美国政府的支持。他并非美国佬的“傀儡”，但他愿意合作，向美国投资者开放国家。对他统治的反对首先来自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代议制政府和政治自由。他们在墨西哥中产阶级中找到了支持，但“民族”和“阶级斗争”的旗号对农村贫困的农民也一样有号召力。1910 年，他们组织了武装起义，成功地迫使迪亚斯接受举行新的总统大选。1911 年，他们的候选人赢了，迪亚斯从政界隐退，但他在教会、军队和地主阶层中的保守派追随者，继续抵制新的民主选举政府及其改革方案。更多的战斗很快爆发。像俄国一样，“革命”变成越来越多墨西哥人支持的一项事业，政治革命演变为内战。

到 1913 年，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业已成为这个强大革命运动的发言人，他把“黩武主义”和“教权主义”(譬如天主教会)定性为人民的敌人。墨西哥的“阶级斗争”证明，将给民众带来社会公平和政治自由的起义是正当的。当墨西哥工人和无地农民加入到反对国家精英的武装中时，他反对新军事独裁者的起义就变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这些工农群众发现，起义领导人善于表达出他们对社会平等的诉求，善于组织起庞大的志愿军为他们的事业战斗。他们出现在政治自由分子旁边，急剧地改变了墨西哥大变动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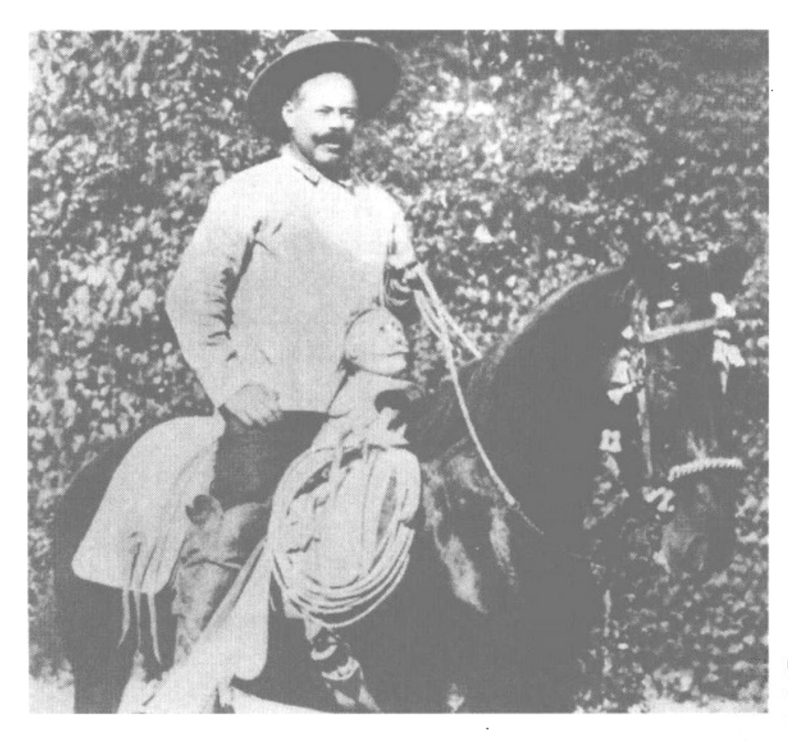
墨西哥的社会革命

在卡兰萨之外出现了新的革命战士。艾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领导下的起义运动，控制了墨西哥南部大多数地区，而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的军队则占领了北部土地。他们没收了曾经统治乡村地区的大地产，宣称他们将坚定不移地为崭新的墨西哥国家而奋斗。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行动却诉诸社会公平理想。这些游击军将革命转变为血腥的内战，敌对的军队在斗争中发动大规模的战役，造成成千上万的死伤。墨西哥一度看上去要四分五裂。到 1915 年，革命让墨西哥社会饱受散兵游勇的蹂躏。

冲突让墨西哥的邻居美国深感不安。美国总统威尔逊笃信自由主

义，不仅针对他自己的国家而且针对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原则。看到墨西哥的动荡，他认为他的政府有义务支持墨西哥的宪政主义政治运动。他也注意到了来自美国投资者的吁求，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人源源不断地将资金投入墨西哥，购买矿山、牧场和油田，因而此时为自己的公司深感担心。墨西哥的社会公平不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之事，民主制度的统治才是。1914 年，威尔逊派遣美国部队站在自由主义军队一边，干预墨西哥冲突。同年，在墨西哥进行新闻报道的约翰·里德，预测墨西哥人“将拿起枪，以无畏的英勇，在街道上，在他们的家门口拼死抵抗我们”。他预测对了，干涉行动没有成功结束墨西哥内战，倒是引起了墨西哥民族主义者对美国干涉的怨恨。

62



革命战士：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Clendenon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916 年，威尔逊断定，对墨西哥民主制度的真正威胁是比利亚的军队。比利亚准备与美国战斗，他袭击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小镇，短暂地将战争带到美国境内。像苏联的内战一样，墨西哥的冲突引来了试图保护自由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外国干涉。威尔逊派遣美国步兵进入墨西哥追捕和惩罚比利亚。但美国人插手的唯一明显结果，是给墨

西哥各派社会革命力量赠予了民族保卫者的美名。

这可能就是比利亚的目标所在。他并不想征服曾属于墨西哥领土的美国边境地区,他只是希望把所有相信民族主义事业的墨西哥人团结到他的军队背后。墨西哥所有各方都立即谴责了美国人的这次干涉。预期这年冬天将与美国开战的德意志帝国,即便远隔重洋,也相信墨西哥是一个可能的盟友,因此敦促它的大使来寻求结盟。这是错误指导思想下的行动,在墨西哥领导人中不会找到任何支持,反倒在美国激起了抗议浪潮。一年后,美国从墨西哥撤军了,但未能战胜墨西哥叛军。

这个阶段的墨西哥革命结束于 1917 年,宪政主义力量获得了胜利。比利亚在失去民众支持后放弃了战斗,内战结束了。墨西哥从这段血腥的时光里走了出来,产生了一个认可其人民有追求社会公平的强烈愿望的民族主义领导层。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它给墨西哥农民分配了内战期间从地主那里夺取的大量土地,他们变成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新政权坚定的支持者。

20 世纪 30 年代初,新的激进领导层下令墨西哥政府占有外国石油公司的所有权,该行动不仅给了它对国家巨大的石油储备的所有权,而且也赋予它对美国公司投资建立和控制的炼油厂的所有权。这种重 63 要资源的国有化让墨西哥政府直接介入国家的产业部门,而且是一种以其自己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像苏联占用俄国的工业一样剧烈。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在新的“睦邻政策”名义下,它忍住了,而没有动用武力强迫墨西哥领导人把国有化的石油公司退还给前所有人。

就在这些年里,墨西哥政府建立了一套全面的初等教育体系,其中的关键元素之一是墨西哥革命成就的荣耀史。为了体现此种墨西哥历史观,它还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就叫做“革命纪念碑”,上面充满了伟大战役和对墨西哥新政权有过贡献的英雄人物的雕像。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革命的社会成就业已改变了墨西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这些包括重新分配土地、重要的工业部门国有化和发起反天主教会的运动——包括剥夺教会的大部分财产和建立世俗化的教育体系。这个新体制来自墨西哥自己的革命经验,与苏联的样 64



迭戈·里维拉，一位艺术家对墨西哥革命中的英雄与恶棍们的构想，壁画，墨西哥城国家宫。（Bertram Wolfe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 2006 Banco de Mexico Diego Rivera & Frida Kahlo Museums Trust. Av. Cinco de Mayo No. 2, Col. Centro, Del. Cuauntemoc 06059. Mexico. 经 Instituto Nacional de Bellas Artes y Literatura 许可翻印）

板没有丝毫关系，但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相似的革命和内战阶段。在墨西哥，政治也很快被一党(最终被称为革命制度党，或 PRI)所统控。

墨西哥的经历预示着这些年里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它也标志着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与此同时，它揭示了民族主义能够变得多么强大，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面临美国干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独立是真实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唯一紧邻美国的墨西哥，得以逃脱其北方强邻的统治。

小　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影响是如此之大，乃至它爆发的那一年——1914 年，标志着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开始。它破坏性的力量削弱

了欧洲各国的幸福安宁,政府不顾一切地寻求资源来打那场战争,使它们卷入公民日常事务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协约国计划胜利后把帝国统治扩展到中东地区,这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西方干预阿拉伯世界的复杂政治的开端。美国政府决定站在协约国一边直接卷入战争,这将美国推入世界事务,改变了一战的结果,并给和谈带来了各国以前从未听闻过的国际主义和平主旨。

在这场恐怖战争的警醒下,世界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苏联领导人从不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把他们置于这个进程的前列,他们称该进程为人类的进步之路。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国家已从战争和恐怖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共产党的专政已牢固建立起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革命政权准备着手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变革,他们相信通过这种变革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社会带到苏联大地。他们的观念是乌托邦式的,它在世界各地激发起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到处爆发并呈现民族主义的特征,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但像墨西哥革命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主义也可以被用来把人民团结在争取社会福祉的事业周围。20 世纪的历史正按照不可预测的且经常麻烦重重的方式演进。

本章大事记

1910 年　墨西哥革命开始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 年　德国在东线取得军事胜利
1916 年　凡尔登战役
1916 年　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
1916 年　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
1917 年　美国参战
1917 年　墨西哥宪政主义者的胜利
1918 年　同盟国失败
1917 年　俄国革命

1918－1920 年　俄国内战

1918 年　奥匈帝国垮台

1931 年　墨西哥政府将石油工业国有化

推荐阅读

西方的战争与和平

David Fromkin, *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ed the Great War of 1914?* (2004) 根据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战争起源进行了新的分析。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A New Illustrated History* (2003),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要但全面的考察。

Edmond Taylor, *The Fall of the Dynasties: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Order, 1905－1922* (1963),奥匈、德意志、俄罗斯和奥斯曼诸帝国的衰亡史。

Arthur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American Diplomac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86),总体上对巴黎和谈中威尔逊的作用予以积极的阐释。

欧洲法西斯主义

Robert O. Paxton, *The Anatomy of Fascism* (2004),该领域杰出的史学家对欧洲法西斯运动的综合性考察。

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1976) 批判性地审视了这位法西斯主义领导人。

俄国共产主义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97)。根据近期的史学研究,对俄国革命的起源和结果的审慎而缜密的阐释。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32*（第三版,1999)。对有关列宁 1917 年起义和斯大林革命的苏维埃早期史的扼要考察。

Eric Homberger, *John Reed* (1990)。一部思维缜密的传记,强调了里德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天分。

墨西哥革命

Thomas Benjamin, *La Revolucion: Mexico's Great Revolution as Memory, Myth, and Reality* (2000) 通过发动革命的墨西哥人的所见所闻,审视那些重塑墨西哥的大变动的故事。

Friedrich Katz, *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cho Villa* (1998)。墨西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传奇故事。

回忆录、小说和视觉教具

Boris Pasternak, *Doctor Zhivago* (1958)。俄国经典小说,讲述在战争和革命动荡中随波逐流的无助个人。

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1919)。俄国革命中善战胜恶的戏剧性故事。

"Red Flag"。摄于1993年的讲述俄国革命的杰出记录片,其中包括对参与者的采访,属于"人民的世纪"系列记录片之一。

http://www.lib.byu.edu/～rdh.wwi/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错网址,里面包括来自所有交战国家的文献和图片。

第三章　战后欧洲及其帝国

66

- **欧洲的战后复兴**
- **中东和非洲的西方帝国**
- **东亚的新帝国**

重点：石油和国际经济

聚焦：侯赛因·伊本·阿里

对西方世界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数年是恢复时期。正如没有人能预料到战争带来的破坏程度一样，也没有人能预见到战争促动的历史巨变，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已全然不同。即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退出欧洲政治，但它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依然是战争后期的强大遗产。这场战争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削弱达到如此程度，乃至经过几年的繁荣之后，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袭来了。各国对回归战前状态的渴望非常强烈，尤其是大英帝国和法国。它们凭战后和谈得以重构的帝国比以前更大，但它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却不足以应对摆在面前的外交和帝国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解决了应该由哪些国家统治欧洲的问题，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西方列强取得了胜利，它们确定了战败国领导人被迫接受的和平条款。20 世纪 20 年代初，美国从对欧洲政治的积极参与中抽身而出，使威尔逊的和平计划几无可能取得成功。它没有参加国联，这严重地削弱了维护国际和平的希望。胜利的协约国确立的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

67

战争结束后,西方重返繁荣的希望依赖于它们工业经济的复元,同时也取决于世界经济再次作为一个自由市场运行的能力。但欧洲战争业已吞噬了太多的财富,阻碍了这些希望变成现实。战后数年里,在德国战争赔偿和偿付美国战债问题上的分歧扰乱了经济重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但美国政府拒绝降低严重损害自由贸易的关税,对欧洲的外贸扩张施以严厉的限制。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美国私人银行和投资机构直接介入欧洲的经济恢复。可是,美国投资者把大量财富用于投机,20 年代末,繁荣的泡沫破灭后,美国从世界经济中退了出来。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缺席恶化和加深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萧条,西方世界难以重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拥有的舒适境况。

西方各帝国的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正在衰落。他们宣称的胜利果实之一是,得到了以前由战败的敌人统治的海外领地。在短期内,协约国在扩大对非西方世界的控制方面有着具体的计划,它们重绘了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地图。西方殖民帝国的行政官员们勉强承认,他们"神圣的托管"包括为这些民族走向自治做准备,一如英国人在谈及他们与殖民地民族关系所说的那样。在非洲,经过国联的授权,德国殖民地转由协约国"托管"。战后数年里,非洲殖民地的内陆领土——整个非洲大陆最后落入西方殖民帝国手中的土地,逐渐置于殖民官员的有效管理之下。他们带来了铁路、港口和负责结束部落间旧有冲突的守备部队,促进了臣属民族生活的改善。这些变化主要旨在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在大多数国家,私人投资极其微小,西方诸帝国不准备在这些偏远的土地上耗费它们并不丰裕的资源。

在远东,战胜国为国际合作引入了新的原则。国联捍卫的结束强权政治的理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似乎成为现实。几个大国之间于 1920 — 1921 年间签署的各项条约内容包括,放弃它们在中国和俄国领土上的势力范围,在太平洋上大规模地裁减海军军备。这些条约曾一度给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理想带来了活力。它们通过在东京、华盛顿和伦敦就和平和政治权力问题做出种种决定来改变局势,和平的命运操

控在协约国的手里。

欧洲的战后复兴

战后的和平条约并未最终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剧烈分歧。在遥远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拒绝按照 1920 年与奥斯曼帝国领导人签署的条约内容，让协约国分割他们的国土。他们为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战。他们的存在，迫使协约国接受了土耳其人自己的军队确定的新国界，他们的胜利迫使协约国重新谈判新的和平条约。在欧洲内部，赔款问题是 1919 年后的数年里最剧烈争吵的源头，在西方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它处于核心位置。欧洲内部的安全需要一项新的条约，其最终于 1924 年签署。唯有到此时，欧洲人才能期望他们得享永久和平。

68

缔造和平和国联

威尔逊要缔结一个“没有胜利者或失败者的和平”的目标，吁求一种妥协精神，以及协约国领导人接受维护和平的理想主义计划的明确意愿。他的战后世界设想要求，按照民族自决的民主程序，为所有人口众多的族群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他所期望的公正解决方案建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因此获得民族和民主权利的各族人民将永远不会再支持黩武好战的领袖。在一个通过集体合作抵制侵略行为的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各国之间自由贸易，在没有对战争的恐惧下得到繁荣。威尔逊希望在势力均衡原则上建立国际关系，以确保人类的真正进步。他的目标是一套体系，通常称为“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建立在各国联手合作和尊重民主的基础上(参见第六章“国际主义”)。

但战胜方的协约国其他领导人坚定地坚持“胜利者的和平”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战败国必须牺牲领土和财富，以确保和平协议的持久性。他们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是粗野而明确的要求：“战利品属于胜利者所有。”英国和法国期望在它们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中东领土和德国的非洲殖民地；日本业已攫取了德国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在这样的

和平计划中，民族自决问题居于次要的地位。西方领导人中间的剧烈争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和平性质认识的根本性歧异。

和谈被美国代表团所主导，威尔逊带着“为正确的事情而战”的决心前去巴黎。他在那里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他在欧洲的声望正处于顶峰。除此之外，欧洲政客们还知道，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是战后恢复能够起步的必要条件。美国救济管理局（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缩写为 ARA）给中欧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带来公共和私人救助。它向数百万人提供食品，让中欧国家能够得到技术援助，重开煤矿和铁路。救济管理局局长郝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工程学般的效率、对社会苦难的仁爱关注和对自由企业制度最终胜利的信心，运作着救助行动。他声言，他的目标是“阻止欧洲滑向布尔什维克”，但他更大的梦想是期盼为美国商品重建一个繁荣的欧洲和市场。救济管理局的声望揭示了美国援助对欧洲从战争中复元的重要性。

事实证明，和平条款最终更具和解性而非惩罚性，它们反映了领土问题的复杂性，包含了民族自决、防备德国和集体维护和平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条约的四则条款体现了经数月谈判后达成的妥协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是：(1) 一个被削弱的但仍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2) 在中欧新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3) 德国对战争损失予以赔偿；(4) 建立国联。

69

德国的命运压倒了所有其他问题。德国必须把它在 1871 年夺取的莱茵河领土让予法国，必须把东部的领土让予新建的波兰。但新德国仍然与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几乎一般大，德国的工农业经济在潜力上依然是欧洲最具生产力的。除苏俄外，它的人口仍然是欧洲国家中最多的。和会谈判各方同意把德国的军队规模限制在 10 万人，让德国西部的莱茵兰地区“非军事化”，也就是禁止德国军队进驻该地区，法国在上述条件下才接受了这些条款。威尔逊许诺，美国将与法国和英国一道参加一个防卫条约，以满足法国人在维系新的势力均衡中对援手的需求。作为回报，法国政府在建立国联中予以合作。在他看来，这是未

来和平的真正希望。

和会专门考虑了东欧新建两个民族国家的问题。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与德国接壤,两国政府都宣称它们西部边境的领土——尽管由德裔人口居住,对防止德国未来可能的扩张主义战争至关重要。波兰得到了一条从波兰人居住地区通往波罗的海的"走廊"地带领土。德国港口城市但泽(Danzig,格但斯克[Gdansk])成为一座"国际城市",作为它在波罗的海的出口。在奥匈帝国北部省份形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斯拉夫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这些土地上被赋予了自治的权利,但这里还生活着人口众多的德裔和匈牙利裔少数民族。像波兰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代表着民族自决原则和安全之间的一种妥协。只有在西方国家的军事支援下,它才能挺过与德国的新战争。

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南斯拉夫的边界也得到确立。它的核心是战前的塞尔维亚国。其在战争中被吞并,但协约国的胜利使之得以复活。尽管在和会期间,威尔逊与意大利谈判者就此问题发生剧烈争吵,但它要为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一个国家的目标最终变成了现实。意大利人坚持,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努力应该得到回报,要求得到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领土,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曾经一度扩展到这里。但该区域居住的主要是说斯拉夫语的民族,因此威尔逊坚持它归南斯拉夫所有。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包括新兴的法西斯党党魁贝尼托·墨索里尼)被激怒了。作为抗议,意大利代表团退出了巴黎和会。

在战后的几年里,引起公共争论的所有问题中,战争损失赔偿问题争议最大。协约国都一致同意从德国获取赔偿。战败者必须向战胜者支付经济补偿是一种古老的惯例。但私底下,它们认识到,欧洲经济复兴和德国赔款支付巨额是不相容的。它们在重建本国遭到战火毁坏的地区时寻求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首要的要求是让美国政府削减它们欠下的总额高达 150 亿英镑的战争债务。威尔逊拒绝考虑给予这样的"礼物",这迫使协约国利用赔款取代美国的援助用以重建。这个决定开启了它们与德国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赔偿要求和东部的领土损失证明,凡尔赛和约是不公正的、惩罚性的和平。1919

70

年，德国领导人无力改变和平协议，他们的国家被协约国军队占领，且仍然处于协约国海军封锁之下，尽管他们激烈反对，但最终不得不在条约上签了字。

威尔逊维护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以国联的形式来体现，他相信这种规划将是和平的关键。他认为，国家间合作致力于和平关系，可以取代通过结盟和军备竞赛维系势力均衡的体系。他的计划在对殖民主义的处置方面是不切实际的，乃至维护和平的新路径亦复如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在来自殖民土地上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意味着欧洲殖民统治的结束，然而，这个过程才初显端倪。国联盟约(Covenant)，或国联成员国间有约束力的协定，规定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将作为“托管领地”由协约国暂时管理，各协约国政府负责为这些民族在未来某个时候实现自治做准备。国联盟约对协约帝国的殖民地未置一词，从这些方面来说，它是欧洲殖民主义和威尔逊捍卫的新原则之间的妥协。

威尔逊结束黩武主义和战争的计划之核心，包含在国联盟约第 10 条中。它宣称，盟约的每个签约国都要“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和政治之独立，防御外来之侵犯”。各国政府将联合行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以对侵略者宣战的方式来阻止侵略。这个重要的条款要求，各国在决定战争问题时，不仅要遵照本国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它要求国联捍卫这一年拟定的各个条约的条款，包括新的边界线和对德国军事力量的限制。

盟约第 10 条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威尔逊国际主义的理想色彩。该条款给国际关系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国家共同体的观念，即不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保护所有独立国家反抗侵略。这种对和平和集体行动的道德义务将各个国家结合到一起。对威尔逊来说，这种国际新秩序的愿景代表着“世界的希望所在”。但在 1919 年晚些时候，他未能赢得本国国会的支持，很多美国参议员对他维护国际和平的概念持敌视态度，认为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应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针。当威尔逊拒绝做出任何妥协时，参议院驳回了整个凡尔赛条约。

这项举动仅代表了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的一个步骤。在政治领导人中，国内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重中之重。1920 年大选获胜方共和党把做生意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国际债务必须要得到偿还，即便这些债务是在美国自己也曾经参与的战争中形成的。国际商业提供了促进美国商品销往国外的手段。为了安抚国内生产商，美国政府在 1922 年制定了保护性关税，限制从国外进口，尽管对贸易的这种限制让欧洲国家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些年里，美国人中的排外压力导致政府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移民法。个体利益能确保公共利益，美国把这种短视的格言应用于国际关系。

71 在这些孤立主义政策中，与他国结盟没有一席之地。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从来没有加入国联，从来没有成为英国和法国防卫联盟中的一员，以保护它们免受德国侵犯。从事后评价来说，显然，美国退出欧洲事务严重损害了重建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美国政府仅从美国的短期利益出发做出的处置战争债务和贸易关系的决定，也同样是破坏性的。曾根本性地改变战争结局的美国，把维护和平的任务扔给了欧洲国家。

欧洲和平的建立

德国军队战争期间在西欧造成的破坏，给予了协约国政府从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政府那里要求赔偿的理由。凡尔赛和约当中有一则要求德国赔款的条款，但没有具体规定赔偿总额。在港口遭到协约国封锁的情况下，德国领导人被迫同意，但抗议说他们的经济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而这些破坏（乃至战争本身）的责任要算在他们业已推翻的德意志帝国政府头上。然而，这个问题是没有商讨余地的。协约国损失了太多的生命，这引发了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经过漫长的拖延，国际赔款委员会在 1921 年同意德国应向英国、比利时和法国赔付 350 亿美元，这代表德国人被集体抵押上了他们的财政未来。

德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决定。两年时间里，冲突不断发展，到 1923 年，法国武装力量重新占领了德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区鲁尔

(Ruhr)。德国人组织起抵抗运动,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资助,但这是以放任恶性通胀为代价的。恶性通胀毁灭了德国货币的价值,将德国中产阶级的储蓄一扫而空。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都知道,由赔款争端带来的人力和经济代价是他们承受不起的,和解是通往稳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在赔款上的冲突将欧洲决心避免再次发生战争的所有国家都卷入进来。它损害了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的利益,政治危机和占领鲁尔区带来的不确定性,打断了他们的经济扩张和财政投资计划。

华盛顿共和党政府最终认识到,只有德国的赔款定期地流往协约国,它放出的战争债务才能得到支付。这推动了美国银行家参与到切实可行的赔款计划的制定中。实际上,问题的全盘解决取决于美国金融界的参与,它们被吁求加入到欧洲的"美元外交"中。

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同意领导一个委员会草拟赔款计划。1924 年,道威斯计划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提交,该计划制定了德国每年赔款的常规进度表,第一年赔偿 2.5 亿美元。与此同时,它制定了私人基金大规模贷款计划,这些基金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帮助德国政府筹措它的首批赔偿费用。实际上,道威斯计划造就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流动体系。德国的赔款主要流向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用这些资金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务。美国投资者继续向德国提供利润颇丰的短期贷款,美元再次以赔款的形式从德国流通回来。

美元支撑了这个体系,这反过来又确保了国际金融利益。直至 72 1928 年,德国的高利率吸引了美国投资,此时美国的对德投资总额近 30 亿美元。1928 年,投资者认定华尔街股票市场投机回报会更多后,美国的贷款逐渐减少,此时这种金融体系开始分崩离析。在它运作良好的时候,各国政府避免了冲突,美元推动了国际经济的增长。

欧洲和平新协定的第二部分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达成。它是在所有欧洲大国间的一项安全条约。1925 年,德国、英国和法国政府领导在瑞士洛迦诺(Locarno)会晤,就全面的外交解决方案举行谈判。欧洲各大国承认德国西部边境的永久地位,德国则接受莱茵兰地区的永久非军事化,这使得紧邻法国和比利时的地区没有德国驻军,在占领军

撤离后也没有外国驻军。德国被接纳到国联,该行动象征着这个国家在欧洲恢复了大国地位。

像威尔逊当初许诺的那样,国联在这些年里仍然坚持着这样的希望,即它能作为一股维护和平的集体性力量发挥作用。在美国没有加入的情况下,英国和法国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它们的领导人在行政院的争吵中合作。只要没有大国卷入,国联看上去有能力阻止战争。由国联遴选的法学家组成的常设国际法院,在争端国家接受外部调解时,对解决国际争端提供协助。新体系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劳工组织,其目标是在全世界改善工作条件。该组织的章程宣称,"社会公正是确立普遍和平"的唯一有效基础。

所有三个组织都围绕着"战争可以避免"的原则运转,国家间争端的缘由应服从于讨论和妥协处理,政治家应赞同国际合作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国联的活动代表着国际事务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但它缺少的是有分量的参与者。代表团的共识取决于它狭隘的成员资格,美国、苏联和殖民地各民族都被排除在外。在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它抵制侵略的诺言听上去空洞无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想成为欧洲的事情。

德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能力,对战后体系的成功至关重要。新共和国(首都在小城魏玛)的建立者创立的一套宪政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国体制的仿效。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大多数德国选民表示他们更愿意选择致力于民主统治的政党。原先敌视魏玛政体的保守政客,逐步接受了它的存在。但较之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经济状况改善带来的满意感,民众对自由的热情似乎远没有那么显著。

1925 年,魏玛共和国首次总统普选吸引了来自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也引来了战争英雄冯·兴登堡元帅参选。大多数德国选民受过去民族荣耀之记忆的吸引远甚于受恢复旧君主制之期求的吸引,因此选择了兴登堡。尽管他有着君主制主义背景,但他信守总统誓言,坚持民族宪法。正如当时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有充分理由相信,"德国的内心深处"渴望"自己的皇帝和英雄"。如果确实

73

如此，那么这种渴望并没有干扰这些年德国的政治稳定。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繁荣岁月里，政治和社会的敌对缓和了，议会制政府得以确保政治稳定。德国似乎成了欧洲新体系的一部分。

繁荣的国际经济

战争结束后的 10 年，被兴高采烈的美国人称为"兴旺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它让工业世界的人们有理由期待，和平与繁荣已经回来了。科学家们探索自然世界的未知领域；发明家们给工业经济的技术奇迹添加重大的发现。诚然，悲观主义的声音对人类阴暗的毁灭力量发出警示之声，一些作家颂扬暴力斗争和民族至上的荣光，这些将这个和平的年代带入战时特征的话语暴力当中。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挑选战后"愚蠢而粗鄙的革命"来证明，西方文明像很久以前的罗马文明一样，进入了不可避免的最后衰落阶段。他的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在他的德国同胞中尤其成功，许多德国人都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深深的悲观。

就在这些争论在知识界内部回响时，技术发展让日常生活产生了惊人的变化。汽车作为私人交通工具出现，在美国其价格便宜到中产阶级都能买得起。福特汽车公司领导下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给西方带来了新的产业部门，增加了全球对石油和橡胶等原材料的需求。公路交通的繁荣使汽油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1900 年的国际经济正逐步演变成彼此依存的全球经济。

建筑师建起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国际经济的新中心纽约，通过建造世界最高的大楼"帝国大厦"，宣示自己经济上的卓越地位。电力穿越城市，进入居住在乡村和都市的千家万户。伴随它而来的是收音机，这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将全球事件几乎同时传到万千个人那里。曾被广泛应用于战争的飞机，在和平年代里成为横越大陆乃至海洋的便捷交通工具。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所有公共事件中，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27 年只身飞越大西洋，激起了空前巨大的热情，引来了公众对未来最美好的想象。整个欧洲和美国为之欢呼，他作

为一位民间英雄横空出世，他用技术的力量征服天空而非陆地，他的探索消解了国家边界。从这方面来说，旧大陆因激情而显得“焕然一新”。

经济繁荣是战后时代从战争的物质和心理损伤中复元所依赖的基础。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绝大部分世界贸易和金融依然集中在西方，但战争也给西方世界留下了疮疤。国际投资大多数被耗尽的英国，不再能协调和稳定投资和国际贸易。日本和美国享有最高的出口增长率，纽约而非伦敦，成为西方的金融之都。曾经是欧洲投资者债务国的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在 1924 至 1929 年间借给外国 60 多亿美元。相比之下，英国则借入了这个数目的一半。

74

欧洲金融和投资的虚弱，导致这里的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承担起比此前更大的责任，它们采取措施刺激商业出口，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生产商免受国外竞争。只有英国在战后恢复了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以确保英镑币值稳定。1925 年后遭受国际食品价格下降之害的东欧新兴国家，针对工业品进口提高了关税壁垒。贸易和金融政策日甚一日地趋向于反映国家利益而牺牲国际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从战争中复元的全球经济仍然是不稳固的。

与此同时，经济和社会新趋势也出现在非西方国家——无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独立国家。当时出现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将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代：第一，这些地方正变成全球经济中重要原料和农业产品的来源地；第二，医疗保健服务的逐渐扩展和粮食供应的增多，正在将人们的生活条件提升到让全球性人口扩张成为可能的水平。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率首次上升到欧洲之上，以前对人口增长的主要自然制约——可怕的饥荒和瘟疫急剧地减少了。到 1930 年，估计世界人口已从 1900 年的 15 亿上升到 20 亿。人口增长显示的生活水平的根本性提高几乎难以察知，但它们昭示了人们态度的逐渐变化，人们过去面对似乎不可阻止的灾难时的宿命论，让位于对自己和子孙后代能有更好生活条件的希望。这些趋势表明了意义深远的“高涨的期望值革命”。

这些非西方国家日益依赖于国际经济。越来越多的小农种植经济作物出售，第一次进入某个地区甚或某个国家的市场。在非洲，棉花和

可可等作物的种植扩展到全国。一直到20年代末，这些商品高企的价格都预示着农民能有不错的收入。与此同时，西方矿业公司正在扩大对非洲一些地区丰富矿藏的开采，为非洲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非洲工人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流徙过来，到比属刚果的铜矿、尼日尔的锡矿、南非的金矿工作。雇主欢迎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接受的工资比白人工人要低得多。逐渐地，非洲的工人阶级开始在这些欧洲人所有的企业中出现。

20世纪20年代，由战时需求启动的工业经济在亚洲各地继续发展。日本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即便印度的沿海城市也显示出现代化的迹象。在这两个地方，纺织制造业在一战期间都迅速增长，它的产量在20世纪20年代继续上升。

亚洲和非洲大多数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亦是最大弱点，是它们依赖于原材料出口。它们的市场在别处，它们的商品价格取决于它们丝毫不能控制的全球供需力量。直至20年代中期，这些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可当全球价格开始长期的持续下跌时，这些好年头就结束了。至20世纪20年代末，橡胶价格跌去了三分之二；拉丁美洲和亚洲依赖橡胶销售的经济体经历了严重的萧条。生活条件完全牵系于单一产品生产的农民和工人首先遭殃。反过来，非西方地区的经济衰落又伤害了国际工业品出口，甚至在1929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就已指向了即将到来的全球萧条。 75

欧洲的经济恢复让国民收入在1925年回到了战前水平，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增长以缓慢但持续的步伐又继续了三年时间。美国在这些年的经济繁荣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公共和私人借贷者提供了大部分投资基金，它也是欧洲和日本制造业产品唯一的、最重要的国外市场。

美国政治领导人依靠资本家非个人化的运作，即自由市场体系确保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他们忽视了美国股票市场不计后果的投机，仅仅通过提高关税保护农民和制造商来干预经济事务。保护性关税和股票投机在短期内对美国投资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家后来总

结到，美国国内政策的这些方面严重地削弱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美国未能提供英国曾经给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种有力领导，“兴旺的二十年代”的繁荣，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重点：石油和国际经济

煤油照明灯第一次让石油工业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城镇和乡村里的西方人，在夜幕降临后，仍然被迫靠蜡烛提供室内照明，靠月亮提供不确定的室外照明，把光带入家里是他们的梦想。这对有进取心的发明家和考虑到购买明亮可靠照明源的巨大市场的投资者也是个诱惑。对名字叫石油的黑色而黏稠的产品之潜在用途的了解，业已存在许多世纪。在一些已知的地方可以获取它，它在这些地方汩汩地流出地面。把精炼形式的原油和大众消费结合到一起，是19世纪中期几个幸运的美国人所做的事情。数十年后，石油成为驱动应用于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动机的有用物。事实证明，对原油的这种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并急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

最初，石油工业发展没有掺入政治和战略考虑。美国投资者渴望未来的利润，冒险赌博他们能从地下抽出石油，并对之加以提炼，制造出适于点灯的产品。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油田的钻探最终获得成功。油钻钻头穿透一个大型矿床，来自被困油液的压力把大量肮脏的原油源源地挤出钻井设备。在专门工厂里的提炼程序迅速被掌握，把一种名叫煤油的产品投放到市场。石油工业诞生了。

销售是有保证的，但生产则是一个投机蔓延的过程。这种不稳定性对一位名叫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雄心勃勃的商人来说是福音，他利用自己的基金和不择手段的诡计买断竞争对手的股份，在1865年创办了第一家大型的石油提炼和销售公司——美孚石油公司(Stanard Oil Company)。它的煤油和其他石油衍生品迅速延展到美国之外的市场，到19世纪80年代，它是首批以国际规模运作的公司之一，并获得了与之相匹配的丰厚利润。

76

这些诱人的利润促使其他投资者寻求珍贵的原油自然资源，并成

功地将之开采出来，无论它可能储藏在世界什么地方。早在几千年前，里海西岸的人们就已注意到这种黑色的液体汩汩地流出地面，随着这个区域被俄罗斯帝国征服和寻找石油的资本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来，巴库成为一座石油城镇。它距离欧洲市场太远，投资者因此设计出专门的油罐车经铁路把石油产品运到黑海，然后通过专门的油轮经海路运往西方，完成整个旅程。对这种需求巨大的产品来说，距离不是问题。19 世纪 80 年代，油田已在远至东印度的荷兰殖民地开始生产，有一家名为"荷兰皇家"(Royal Dutch)的公司下赌注，认定它的煤油能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孚石油公司的煤油竞争。到 19 世纪末，石油工业已遍布整个世界。

到此时，石油工业还发现了对石油产品的新的且极具前景的需求源。内燃机是汽车的最好工具，这种"无马车"对流动性日益增长的西方社会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对石油工业来说，这个发明来得可谓适逢其时，因为电灯的出现，对煤油的需求正急剧地减少。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 1908 年推出针对中等收入消费者的"T 型"汽车，立即取得了辉煌成功。到 1914 年，它在美国市场上卖出了约 100 万辆，对汽油的需求随之急速上升。工厂锅炉、火车和轮船对燃油的需求也增加了。英国海军专家迅速认识到，他们的舰队——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将不得不采用新技术，以给他们的舰只提供比旧的燃煤发动机强大得多的动力和机动性。"燃油"，海军上将费希尔(Fisher)惊呼到："将给海军战略带来革命性变化"。国家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与国际石油生意直接关联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10 年里，新油田的发现保证了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入国际市场。美国依然是主要的生产者，充足地供应本国的需求，同时还满足国外三分之二的石油需求。欧洲其他产地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里海油田，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控制着生产的荷属东印度。这种情形让在 1913 年受命负责英国海军的温斯顿·丘吉尔感到不满，他以悲壮的语调警告英国国会，他们的国家正屈从于"被全世界的石油托拉斯长期持续的压榨"。他的解决办法是要求英国政府"按照海军和

国家利益"维护"那些控制发展的力量"。实际上,他建议英国政府购买在波斯已发现大型石油储藏地的石油公司的控股权益。在那里,英国的外交影响力一直很大。丘吉尔的希望得到了实现,从这个决定中最终出现了一家名叫"英国石油"的公司。在国际石油生产的巨大搏弈中,大英帝国成为其中的一名竞争者。

这个行动来得恰逢其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性地证明,石油对战争的胜负是多么重要。1914 年,当法国军队需要从巴黎调动一个师前去阻止正朝该城进犯的德国先头部队时,解决办法就是调集巴黎全部的出租车队运输部队。这种权宜之策非常清楚地表明,"步兵"应该拥有自己的机动化运输工具,坦克(建造在驱动拖拉机的机车的基础上)的发明强化了这种初步的认识。在海上,英国海军舰队对日益增长的石油数量有着极其急迫的需求,它的需求仍然大部分来自美国。1917 年中期,供应是如此短缺,乃至英国政府向华盛顿告急,除非更多的石油很快运达英伦诸岛,否则石油短缺将让"舰队失去作用"。这种经历使得协约国认识到,他们国家未来的力量——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取决于直接得到石油的机会,无论它可能在什么地方。这包括奥斯曼帝国的中东领土。

77

这种考量,对英法政府就战后分割这个敌对帝国的谈判结果起了极大的作用。消息早已在石油公司和官员圈子里流传,说美索不达米亚省境内可能有巨大的石油储量,尤其在大部分由半游牧的库尔德族所居地区的摩苏尔(Mosul)城周围。一位颇有权力的英国官员让他的同僚们知道,"控制这些石油供应是英国首要的战争目标"。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英国部队北进至大马士革。尽管英法两国尚未完成它们在该地区势力范围的讨论,但这些英国部队中有一部分很快占领了摩苏尔。新成立的伊拉克,作为一个托管国被置于英国的控制下,发现自己的边境扩展到了整个摩苏尔,向北延伸至土耳其。库尔德族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中东特别丰富且优质的石油储藏被真正发现。大型石油公司首先做出果断而艰难的努力,以保持对石油勘探的

控制权。1927 年，它们的谈判者在前奥斯曼帝国土地和新成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划出一条“红线”，清楚地确定它们在中东的石油勘探和开采中有权合作的区域，这等于明确宣示它们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表明它们的势力在全球石油事务中已变得多么巨大。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它们的地质学家的钻头钻出了“自喷井”（当钻头钻穿一个巨大的石油矿床时产生出来的巨大油喷），先是在伊拉克的摩苏尔，接着在波斯湾的科威特（Kuwait）和巴林（Bahrain）酋长国，然后在伊本·沙特的王国里——所有发现中最大的。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东的石油估计储量总额占世界原油的四分之三。当时，加上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发现的油田以及在美国西部发现的新油田，整个世界似乎都浸泡在石油里。

但原油价格并没有暴跌，一个原因就是汽油和石油需求的旺盛。发达国家的公路不断延伸，汽车和日益增长的卡车似乎填满了道路的运能。美国依然高居汽车运输之首，它的汽油消费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翻了一番以上。到兴旺的二十年代结束时，石油已占美国能源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大萧条和更多的石油勘探发现使价格暴跌，致使石油生产控制成为罗斯福政府新政政策的一部分。通过下令让所有产油州限制产量，美国政府迫使价格上升到足以保证石油公司利润的程度，这些限产反过来又有助于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价格。政府与石油公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78

接着，战争再次来临，对数量大幅增加的石油的需求成为所有交战国的重中之重。有时候，战争进程本身似乎被石油决定。当美国和荷兰在 1941 年中期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时，该行动促使日本政府接受了太平洋战争计划，试图以武力得到因禁运而不可得的石油。日本战机未能摧毁夏威夷岛（Hawaiian Island）上的石油储备，这些储备确保了美国逃过一劫的航空母舰，能够在次年与日本舰队交战。当希特勒在 1942 年下令东线军队向俄国南部进击，直指高加索山脉地区，与隆美尔将军横跨北非向中东进击的浪潮协同时，他和他的顾问们眼里的终点是巴库和伊拉克的油田。这些战役的失败反过来又严重限制了

欧洲轴心国的战争行动能力。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地懂得"石油即权力"的地缘政治真理。随着武装部队对汽油和燃料的需求日益增长,美国的石油储备日见减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政府就把汽油包括在针对所有非必需的民用用途实施定量配给名单中,美国司机发现他们的汽车业已变成一种负担。罗斯福总统及其对外政策顾问审慎关注与那些富有石油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一名顾问曾充满感情地写到,中东的石油"是一切历史中唯一最珍贵的东西"。

在 1945 年初的雅尔塔会议结束时,罗斯福非常露骨地表达了友善之意,邀请沙特阿拉伯的伊本·沙特国王前来埃及苏伊士运河的美国军舰上与他晤面。对这位贝都因人国王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走出阿拉伯半岛。他带着自己的帐篷和波斯地毯来了,睡在军舰的甲板上。在他们的谈话中,罗斯福确实提及他的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却忽略了这位国王的答复,即在德国给幸存的犹太人提供一个家园。他邀请伊本·沙特的意义被其继任者所领悟,杜鲁门总统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就告知这位国王:"只要对美国不是当务之急的事物,就不可能对贵国发生任何威胁"。



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Philip McConnell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美国热心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合作的阿拉伯产油国,同时希望在中东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而由此产生出来的两难之境,在即将到来的许多年里一直困扰着美国政府。就在 21 世纪来临的前后,美

国政府在它石油利益所引发的问题上,直接卷入到中东的战争中。到这时候,一些领导人业已断定,为中东石油值得去战斗。

全球大萧条

79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衰退损害了全世界所有的工业经济体,以及向西方供应粮食和原材料的地区。它具有早前历次衰退的特征,包括生产和贸易的衰退,失业率的急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猛烈下降。企业宣布破产;银行发不出贷款;许多银行无力偿还储户的存款;食品价格下降得如此之低,乃至农场主任由土地抛荒,尽管城市穷人饥饿难耐。经济衰退自 1929 年开始于美国,逐渐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乃至东亚。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它已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在程度和影响方面比以前的任何萧条都要坏得多。它展现了规模巨大的人类悲剧,引起了艰难和困苦,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削弱了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在许多国家,它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80

在启动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后,美国经济又带头陷入衰退。到 1929 年初,美国工业生产已经开始下滑,新兴的汽车工业首当其冲。对工业品需求的日益下降是引发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美国金融和贸易的其他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让经济衰退的国际影响变得错综复杂。1929 年虚高的股票价值反映的是投机狂想而非经济现实,这种情形导致一些大投资客在 1929 年晚些时候放弃了华尔街,转向风险较小的投机活动。他们的决定加上伦敦的金融问题,使投机泡沫破灭了,大大小小的股票持有者开始大规模地抛售。到 1929 年冬,股票价格业已下降了三分之一,许多负债累累的投机者面临着破产和毁灭。

当他们不能偿还贷款,加上银行提高利率时,投向工业的资金减少近半,工厂产量削减得更多。美国商品销售量的下降和失业率的日益升高,导致了阻止国外商品进口的政治压力。作为应对,美国国会于 1930 年制订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它把进口关税

壁垒提高了50%,因而将需求日益下降带来的有害影响又传导给了欧洲和日本的工业生产商。

美国经济衰退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是重大的。首先,美国不再对国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1929年华尔街崩盘引发的金融危机深深地渗透到世界经济中,到1932年,美国的国外投资下降了三分之二,欧洲的生产商缩减了工厂投资。在大萧条的开始阶段,统治阶层中的金融正统派要求平衡预算,实行高利率吸引国外投资,这两项政策后来都被批评为阻碍了经济恢复。自一战以来的世界金融交易中心美国,没有能力提供这些资金。随着借贷方抽回他们的贷款,欧洲整个国外投资体制分崩离析。

美国金融崩溃的长期效应,是在欧洲制造了1931年的大规模银行和金融危机。德国和奥地利的银行取消了自己的贷款;德国禁止把资金撤往他国。在大不列颠,资金的外流迫使英国政府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永远放弃了金本位制,结束了它对用英镑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的保证,放弃了它保护国际金融稳定的努力。1931年,英国和法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务,作为报复,美国国会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英法政府的债券。除美国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恢复世界金融稳定的经济资源。美国投资者不计后果地赌光了他们的资金,而他们的政府主要是设法保护美国的银行和投资。

美国应对经济衰退之策直接促成了全球经济衰退,可它仍不顾一切地决定阻止成品的进口。不是对价格下降的国外商品敞开市场,相反,美国政府全面地提高了关税。先前历次经济衰退之所以能够复元,部分是因为一个国家商品价格的降低吸引来了外国的买家,但美国不允许这样的过程发生。1930年,它的禁止性关税导致国外进口减少近半。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报复;即便英国也在1931年放弃了自由贸易。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世界贸易缩减了三分之一。到30年代初,大多数出口粮食和原材料的国家损失了大部分对外销售额。依靠出口用于支付重要原材料进口的日本,眼看着美国市场突然收紧,其出口总额下降了50%,其工人生活水准下降了三分之一。日

81

本面对国际萧条显露的脆弱性，促使它的政治领导人考虑把东亚变成他们专有的市场，经济衰退让日本将军们征服东亚领土的计划复活了。经济危机和战争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到 1932 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生产下降了四分之一，欧洲则下降了三分之一，工业世界的财富正在缩水。经济危机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尤其剧烈，德国所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它失去了大部分的美国贷款，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又在美国 1930 年提高关税后遭受了出口锐减的折磨，生产最终下降了 40%。每四名德国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许多其他工人依靠比以前低的薪酬艰难度日。雇主和工人向其寻求帮助的德国自由主义政府，在医治危机方面显得手足无措。而极端主义政党则宣称有简便的良方，纳粹党在这场危机中登上了权力舞台。

经济萧条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网络，各国日益依赖于国内市场争取经济恢复。1933 年，在伦敦举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试图使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回归到正常轨道，欧洲领导人向美国求助，要求它保证美元稳定作为新的投资基金来源，并开放经济增加进口。美国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拒绝合作，他担心，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计划会恶化美国国内的经济萧条。伦敦会议以失败告终，国际合作让位于短视的国家利益。从战争中复原的整个进程，被严重的经济萧条削弱了。国际合作土崩瓦解，对民主体制的政治信任灰飞烟灭，对和平与繁荣的希望倏然消散。大萧条的有害后果是把世界推向了新的动荡和冲突。

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落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萧条引发的深远危机。资本主义体制的美好愿景——给人们提供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悲惨地失败了。1932 年后，工业生产确实逐步回升，但在许多国家仍低于 20 年代晚期的繁荣水平。全球经济恢复的根本性障碍，是各国间投资基金和消费及生产商品缺乏自由流动。20 世纪

82

20 年代的国际金融体系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体系”，一种依靠自身、敌视竞争的民族主义经济体系，“以邻为壑”是这个时代的座右铭。自由市场会空置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这仅仅部分地是旧式政治自由主义缺陷的结果，但民主政体在一些国家却遭到了可怕的变故。保守的财政政策未能针对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大萧条的年代里，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阶层没有能够有力且有效地应对这场危机。

保守政策的批评者指责国家的不作为和依赖供需法则确保经济繁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这种观点出现在所有的民主国家。1932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拒绝其共和党对手认为经济会自行改善的观点。他主张：“经济法则不是自然生成的，它们是人类制订的”。他的结论简单而直接：因为“男人和女人正在挨饿”，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按照他的看法，美国危机首先要求的是强有力的领导。

经济萧条的长远解决之道要求经济思想的根本性修正。最有希望的思想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参见第六章“聚焦”），他提出了一套对付危机的激进新理论。他宣称，自由市场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它不能确保长期的经济恢复和充分就业，仅靠对制造和消费商品的长期需求不足以达到这些目标。他转而提出，危机期间，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应利用自己的财政手段去投资和消费，以补偿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他呼吁政府干预经济，在保守主义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为这违背了限制政府权力和促进自由企业制度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已深深地嵌入人们头脑里。

凯恩斯颇具争议性的理论慢慢地赢得了足够的政治支持。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领导人改进政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在每一个国家，在帮助缓解萧条带来的社会苦难中，它们的政府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在公民的压力下，它们增加了以前给予失业者、老人和病人的微薄救助，赋予工会新的权力以保护工人的利益。这些帮助需要者的新政策被称为“社会福利”。它们曾经被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致视为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如今，却不仅在保护穷人福利方面，而且在保证这些国家政治稳定赖以维系的民主共识方面，变得至关重要。

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32 年大选中的胜利，开启了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的时代。1933 年初就任总统后，他发起了被称为“新政”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以政府直接采取行动，拯救当时处于崩溃状态的银行系统和恢复经济活力为开端。他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是着重救助生产者，其中包括帮助农民避免丧失土地抵押赎回权，帮助工商业者免于破产，建立联邦监管机构制止投机者的过分行为，确定 1929 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的责任人。他救助穷人的主要手段，是上马大规模的公共工程。20 世纪 30 年代晚些时候，他的政府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雇主和雇员都必须交纳养老基金。因为动用联邦权力规范和限制企业权力，所以保守派称罗斯福是“社会主义者”。罗斯福回答说，他正竭力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免于崩溃。1936 年，选民们表达了他们对罗斯福政策的支持，在当年举行的大选中，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83

然而，罗斯福的改革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从萧条中的恢复是不充分的，因为尚有数百万人依然处于失业状态。在凯恩斯理论的启发下，即便于 1937 年引入政府开支举措也还是不够，直至 1940 年大规模的军备生产启动后，才恢复了充分就业。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大国中，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也是不敷所需，需要有一个国际经济扩张的新体系，但此等举措不在罗斯福及其政府的计划之列。在这些年里，政治领导层和大多数民众仍然像从前一样是孤立主义者。

英国和法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拥有类似的微弱效果。像美国一样，这些国家的选民仍然忠于民主政党，拒绝支持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缓慢的，政治领导层的心神日渐被战争威胁所占据。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像他们的民众一样，对和平的渴望远超其他任何东西。他们在“绥靖”政策中联手合作，极力安抚扩张主义的法西斯国家。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激发下，好战思想弥漫于欧洲的法西斯运动中，他们的座右铭是“强权就是公理”，法西斯主义似乎是未来的潮流。事实证明，起初寻求和平的英法民主政府，无力抵制法西斯主义的压力，直到它们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恢复防御性同盟，但为

时太晚。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是，世界不再像威尔逊在 1917 年乐观预测的那样，是“民主制度的安全阀”。

中东和非洲的西方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中东的旧秩序，英法之间的秘密条约在这片曾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分配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在作战中曾赋予阿拉伯武装力量一定的地位，这种做法引起了阿拉伯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希望。一战期间，阿拉伯部族在以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为首的哈桑氏族领导下和英国部队的帮助下，曾组织了一场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他们征服的地区向北一直扩展到叙利亚省的首府大马士革。该省边境纵贯地中海东岸，与美索不达米亚省相接。

侯赛因及其追随者的雄心是在中东建立一个大阿拉伯国家，这是中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帝国激发出来的美好愿景。但在 20 世纪，阿拉伯语人口已分为许许多多的宗教和部落群体，穆斯林分裂为五大不同的派别，逊尼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参见第十二章“重点：伊斯兰教和民族国家”)；人数较少的基督教徒也同样分裂开来。这些分裂遏制了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让协约国在战后得以对该地区的各个部分进行分而治之。

聚焦：侯赛因·伊本·阿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部落促成了中东的转变。这些说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以前曾经作为促成历史转变的力量崭露头角。7 世纪，他们曾联合在先知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在征服广袤的帝国领土过程中以他们的剑锋传播着穆斯林信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领导人是侯赛因·伊本·阿里(1854 — 1931)，其家族世系(哈桑氏族)可追溯到穆罕默德。19 世纪中期，这个家族已从奥斯曼苏丹那里获得了统治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权力。这两座城市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名为汉志(Hijaz)的地区。

但他的家族并非是阿拉伯半岛唯一强大的氏族。在更东边，伊本·沙特(Ibn Saud)当时已是一大群贝都因部落的谢赫(sheik)。他的权威建基于他在组织追随者成功袭击邻近阿拉伯人方面的能力，给追随者带来战利品，而这是贝都因人生活的主要来源之一。他还领导过激进的穆斯林运动——瓦哈比(Wahabis)运动。该教派宣称，只有他们才理解伊斯兰教宗教教义的启示。伊本·沙特和侯赛因是争夺权力的劲敌。战争期间，侯赛因发现了可带来权力的新源泉，即赢得英国支持，建立一个在他领导下的阿拉伯国家。

1908年，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侯赛因从奥斯曼苏丹那里获得了汉志谢里夫(sharif)这个显赫(并有利可图)的职位。这里的圣地是每年来自全世界成千上万穆斯林朝圣者的目的地。侯赛因认真地履行他的宗教职责，他的职位是他要求成为阿拉伯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穆斯林)领袖的基础。当时，少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组成秘密组织，致力于在中东创立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侯赛因知道他们的颠覆性活动，为进行这些活动，他们冒着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处死的危险。早在一战前，他就已向他们表明自己支持甚或领导这种泛阿拉伯运动的意愿。他完全有可能同情他们的梦想；他也从中看到了成为阿拉伯人国王的机会。

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创造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不列颠帝国负责与奥斯曼军队的交战，但它只有寥寥无几的部队(大多数来自印度)派往中东。为了获取更多的支持力量，英国政府代表前往贝都因部落，表示如果他们支持协约国，就会获得慷慨的经济支援。对贫穷的游牧民来说，这是一份诱人的报价，给诸如侯赛因这样的领



阿拉伯人起义的领导人：侯赛因·伊本·阿里(Imperial War Museum/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85

袖提供了建设自己武装力量的资源。贝都因游牧民精熟于骑兵攻击，骑在马背或骆驼背上，快速地穿过沙漠突袭敌人。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aisal)是一名熟练的军事领导人。1915 年，侯赛因告知英国，他准备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事业而斗争，将领导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他后来承认，这个主张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私下告诉英国政府代表说，没有他的领导，阿拉伯人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是“无知的和不团结的”。作为回报，他要求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那片广袤的土地将成为他的王国。

他的目标似乎曾经一度触手可及。英国政府接受了他的阿拉伯捍卫者的崇高称号，送给他大量的资金、军火，以及才能杰出的政府代表，以便与阿拉伯人合作起义。这位代表就是 T. E. 劳伦斯。他在战前数年一直学习阿拉伯人的历史和他们的语言，战争剧烈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如同对侯赛因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一样。他相信阿拉伯人的民族事业，把侯赛因及其贝都因勇士们视为在英国(和他自己)领导下打造阿拉伯人团结的工具。一名美国战地记者公开报道他在那场战争中的业绩后，他作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广为人知。

1916 年，侯赛因发动了阿拉伯起义。起义以公告的形式，承诺“要为伊斯兰教服务，要重塑穆斯林的荣耀”。他是这次起义的鼓舞人心的领袖。他的儿子费萨尔，在劳伦斯的协助下，领导军事战役，与数量比己方多得多、装备比己方好得多的军队战斗。侯赛因向阿拉伯人发出的呼吁，只赢来零星的支持。城市和乡村的阿拉伯人大多数不信任贝都因战士，而继续服从于奥斯曼的统治者。在最初的岁月里，贝都因人被迫打游击战，因为他们与守卫苏伊士运河的英国部队被分割开来。当费萨尔和劳伦斯率领贝都因骑兵，在从麦地那到耶路撒冷的铁路沿线击败土耳其军队后，侯赛因的前程变得光明起来。他们与英军连成了一片，当时英军正沿着地中海岸进军。

战斗进展缓慢，直到 1917 年晚些时候，英阿联军攻占耶路撒冷。次年，阿拉伯军和英军向北进击，直到抵达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对侯赛因的支持者来说，这里也将是未来的阿拉伯国首都。协约国在这一

年 11 月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似乎将让侯赛因的阿拉伯王国梦想成为现实。

但事实证明，和谈让他极度失望。他的儿子费萨尔陪同劳伦斯前往巴黎和会。他们业已得知，在战争期间，英国人已许诺在巴勒斯坦省给犹太人一个家园。英国也已与法国签订了一项分割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由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冲积而成)的协定。侯赛因第一次面临大国强权政治的现实。安排奥斯曼帝国领土命运的各项条约，都未经他的参与或同意。它们没有为阿拉伯人创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相反，"托管"给法英政府和军队的几个小国家出现在那里，英国人在其中的两个国家——伊拉克和约旦，为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和阿卜杜拉(Abdullah)创立了王位。它们仅把汉志这块原有的土地留给侯赛因自己，他将成为这里的国王。这是一份寒酸的奖赏。当英国人要求侯赛因正式批准巴黎和约时，他断然拒绝了。他已有的财富与巴黎和谈没有丝毫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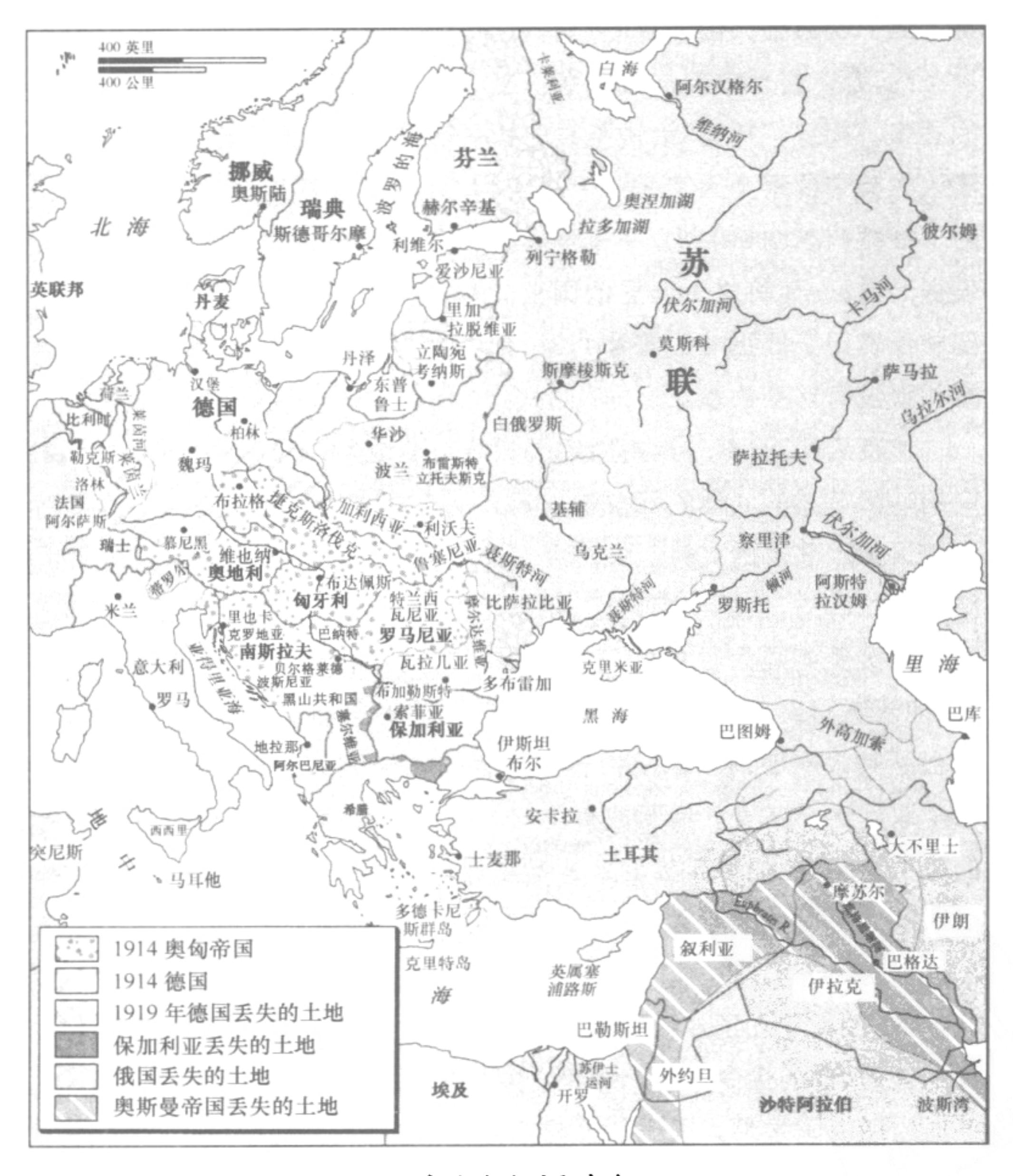
86

侯赛因受骗，部分是由协约国的背叛造成的，部分是由他宏大计划中的缺陷造成的。他的阿拉伯人起义从来没有赢得哪怕是阿拉伯半岛全部贝都因部落的支持。侯赛因在痛惜中东说阿拉伯语的各民族不团结时是正确的，但他欺骗自己，相信他的威望和权威能克服这些分裂。他拒绝接受英国人提供的汉志国王这样的安慰奖。他矢志不渝地相信，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卓越地位，担任穆斯林圣地的统治者。1924 年，当土耳其政府取消了以前由苏丹持有的哈里发身份时，侯赛因要为自己争取到这个名号。他要成为中东人数众多的逊尼派社群的宗教领袖的努力，在狂热的穆斯林看来是不虔敬的，这给了伊本·沙特发动贝都因军队反对侯赛因所需的借口。

侯赛因没能赢得 1925 年那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他逃离了汉志，让伊本·沙特创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流亡在约旦王国他儿子阿卜杜拉的宫廷，他的生命也在此结束。阿拉伯人统一是一场失败的事业；他要成为所有阿拉伯人国王的梦想亦复如是。

协约国在中东

在协约国和谈期间，英法政府让它们的战时密约生效了，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领土。这部分领土从土耳其向南延伸至红海和波斯湾、西面纵贯地中海直到波斯。它们的领土要求遵循的是早先帝国争夺殖民地的传统。虽然英国政府战争期间曾承诺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一



一战后的欧洲和中东

个"阿拉伯民族国家"，但它们并未被这种承诺困扰。但在威尔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中，包含了殖民地人民有权实行自治的内容，这是英法在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确立势力范围的障碍。

通过创立领土"托管"体制，各方在巴黎和会上达成了妥协。托管政策被应用于以前曾是战败的同盟国殖民地的所有非西方领土。在中东，按照国联的要求，英国和法国承担着给托管领土提供建议和协助的责任，直到这里的各民族能够自治为止。英法军队和殖民官员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间接地控制着这些政府。法国军队开进前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省，将侯赛因的武装力量赶出大马士革，建立了叙利亚国和一个新国家黎巴嫩，黎巴嫩是大多数基督教徒聚居的地方。英国控制了托管的伊拉克和外约旦（Transjordan，位于伊拉克和约旦河之间的地区，后来叫约旦王国）。说阿拉伯语的民族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多数民族。

88

其他民族没有得到承认。在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人的中世纪王国曾一度繁荣昌盛，他们欲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国，但在苏联和土耳其就共同边境达成协议后，这个梦想破灭了，亚美尼亚仅作为一个小共和国被留在了苏联内部。居住在中东北部山区的库尔德族领袖，也向国联提出要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但由于缺少任何西方国家的支持，他们完全失败，他们的人民发现自己是散居在各个新国家里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地区创立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多种族的领土和缺乏民众强有力支持的政府。

在所有这些领土上，阿拉伯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独立性，但以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与西方帝国合作为前提。首先在波斯而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现和开采的大型油田，使该地区的势力范围成为对西方各国政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真正获得独立的前景晦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爆发了阿拉伯人反抗西方统治的起义，但他们的力量太弱，不可能打败法国和英国的军队，最终遭到镇压。这些新国家还充斥着国内相互敌对的种族族群和宗教团体的政治及社会冲突，没有哪一位阿拉伯人领袖拥有像甘地在印度拥有的那种群众支持；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西方列强对这个地区的瓜分。这是战后中东地区和平安排的持

久遗产。

巴勒斯坦问题

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和平安排导致了被深深地分割开来的人口，割裂为阿拉伯人和日益增加的犹太人团体。1917 年《贝尔福宣言》曾许诺“给犹太人民一个民族家园”。英国政府信守了这个承诺，允许犹太人移往这个沿海地区。2000 年前，罗马人把他们从这里驱逐了出去。犹太人定居者(大多数来自东欧)的数量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缓慢地上升到 18 万人。这个时代，阿拉伯人(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总数为 75 万。英国领导人限制犹太人在此地定居，向阿拉伯人保证，会保护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但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坚决反对犹太人定居，只要英国支持这项政策，他们就拒绝合作统治这片领土。

理解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定居关键，在于知晓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隔开来的种族差异。过去，奥斯曼统治者没有实行宗教迫害，把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视为下等臣民。他们可以自由地践行自己的宗教习俗。统治者们曾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让犹太人大规模地移居此地的要求。英国人同意放开巴勒斯坦让犹太人移居急剧地改变了这里的种族平衡。战后犹太移民的涌入，在大量的阿拉伯人口中间造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欧洲文化定居者团体，这些定居者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上富有进取心，政治上是民族主义的。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财产，开办工商企业，建立集体农庄(希伯来语称为 kibbutz)。该地区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仍然因他们共同的习俗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许多人依旧保持着农业生活方式，在经济上不能与犹太人竞争。关于耶路撒冷圣地的宗教争端濒临爆发冲突的根源，在于把这两大族群分割开来的深远的社会和文化差别。

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阶层，但各个阿拉伯部落的领导人都公开宣布他们反对创立犹太人家园。在他们的鼓励下，1921 年爆发了第一次反犹太人暴动，1929 年再次爆发更大规模的暴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安全部队。巴勒斯坦正在变

89

成一片双方集体敌对并伴有零星种族冲突的土地。

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统治巴勒斯坦托管地。阿拉伯领导人拒绝合作,英国人不可能在不激起阿拉伯人暴力的情况下鼓励犹太少数族群参与统治。一名英国行政专员在帝国军队的协助下施行统治。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迫害犹太人迫使日渐增多的人放弃他们的家园,随着犹太人移民加速,他的任务变得日益困难。在 20 年代严格的移民法下,美国只接收了相对较少的涌入人流,巴勒斯坦是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同时亦是他们的宗教家园。

犹太人定居者的迅速增加,在 1936 年引发了一战以来最严重的阿拉伯人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 1938 年。阿拉伯游击军在乡村行动,犹太自卫军保护着他们的定居点免受阿拉伯人的攻击。此次起义以损失几千名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生命而告终。到此时,英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把巴勒斯坦分割为独立的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这个建议对阿拉伯领导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拒绝给予犹太人一个巴勒斯坦家园的权利,要求巴勒斯坦全部土地必须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两大族群水火不容。

埃及独立

位于巴黎和平安排没有触动的地区中的这个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最为强烈。战争爆发时,英国切断了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正式宣布这个国家是英国的保护国。战争期间,这里对英国统治的抵抗日益增强,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促使埃及政治领导人在 1919 年向协约国的和谈人员要求独立。当英国人拒绝让埃及代表团出国时,数个城市爆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民族主义者组织起自己的政党,组织大规模的运动要求埃及民族独立。

面对这样的抵抗,1923 年,英国领导人提出给予埃及独立,条件是埃及政府允许它的军队留驻苏伊士运河区,该运河对于保卫英国的亚洲帝国的安全所具有的意义像以前一样重要。给予埃及独立也是英国帝国力量正在衰落的一种象征。埃及人接受了这个折衷办法。他们的

国家仍然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但他们可以自由地统治自己。

埃及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对政策仅有非常有限的影响力，真正的权力由在国会中有席位的各政党组成的内阁掌握。国家领导人大部分来自富有的土地精英，这些人拥有尼罗河两岸的大部分耕地，他们受到西方尤其是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代表了一种未来，即埃及的进步将来自西方世俗的实践方式，而不是来自穆斯林宗教或埃及的传统方式。许多埃及人对西方文化的流入忧心忡忡。20 世纪 30 年代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民族主义学生的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后来回忆到，“我们的精神仍然停留在 13 世纪”，但“19 世纪 20 世纪的种种表征到处渗透到”埃及社会。

埃及精英这种西化的生活方式触犯了该国的穆斯林领袖，他们当中的最激进者开始着手组织群众运动，保卫穆斯林信仰的行为方式和律法。这种强调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教义的努力被称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最终，这些宗教保守分子在 1928 年达成一致，组织起“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其目标是维护宗教权威和伊斯兰教法。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反对那些支持世俗教育、民事婚姻和妇女权利的埃及人。通过给社会引进“世俗的”（譬如国家控制的）统治和制度，这些事物威胁到了宗教习惯。兄弟会的抵抗方式包括对民众强化穆斯林实践，促进宗教教育。它还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抗议埃及政府世俗化改革的努力，甚至支持暗杀危险的政敌。20 世纪晚些时候，兄弟会还出现在那些引进西方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来挑战伊斯兰方式的阿拉伯领土上。

90

1923 年之后，埃及从英国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为中东第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它的人民也先于其他阿拉伯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了文化和社会的紧张。这种紧张是践行西方世俗文化和个人自由的吸引力制造出来的。

战后非洲的殖民帝国

协约国的和平安排所及范围远超中东，直抵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南非采掘金矿，约 1925 年(Stark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这里的欧洲殖民地也曾卷入战争，部分是因为西方各国对非洲原材料和工人的急迫需求，部分是因为那里的德军和协约国军队发生战斗。一战前后，西方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刺激了以南非和比属刚果的加丹加(Katanga)地区为中心的采矿业的发展。从部落地区招募工人到矿山和其他行业工作让非洲的劳力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地，非洲也陷入西方构建帝国带来的影响中。

非洲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给南非的白人统治带来了问题。正是在这个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把非洲人裹入工业经济的程度，为非洲之最，但这种促进种族融合的力量面对着南非白人(Afrikaner，即阿非利坎人)的种族主义。像美国南部那样，种族主义制造出一个白人和黑人深度分裂的社会。为了控制这些民工，南非政府增强了种族隔离政策，其中包括"通行证"(pass)制度，它要求南非黑人随身携带内部通行证，政府以之严厉地限制他们在城镇居住的权利。面对着国际经济产生出来的社会压力，南非白人并不准备放弃他们种族优越论的信仰。

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在战后数年里变动甚微，协约国控制了德国所有殖民地。在国联的托管制度下，它们变成了当地各民族的"受托

人”。实际上，早在战前时代，这些地区就已被整合到西方各帝国建立的殖民体系中。一小部分西方行政官员统治着广大的领土，主要依靠非洲部落领袖执行他们的命令。法国人和英国人通力合作，让管辖下的各民族为殖民统治缴捐纳税，对他们的全部土地征税，尽管当地人民依然非常贫穷，经济主要依靠农业。他们鼓励能够获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到殖民管理机构中工作。这些人数不多、受过良好教育和说两种语言的土著精英，构成了非洲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新群体。西方医学缓慢地从城市传播到乡村地区，帮助抵抗折磨着这些土地上万千民众的各种热带传染病。

91

大部分非洲人与西方人几无接触，然而，随着经济作物渗入传统的农村经济，非洲人的确感知到了外部世界。这些改变了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促使他们比以前更加依赖市场来谋生。对西方强加的变化持久的敌视，影响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给了我们不需要的道路”，比属刚果的一名非洲部落酋长回忆到，把“外国人和敌人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女人不贞洁，强迫我们转向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种植我们不想种的庄稼，从事奴隶劳动。他们派来基督教传教士毁灭我们的信仰”。他的言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这种统治正日渐削弱他在其臣民中的权威。西方殖民国家的存在，造成了一种文化冲突，无可挽回地改变了非洲人的生活方式。

殖民统治的社会和心理张力，为大规模改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行为开辟了道路。穆斯林传教士给非洲人提供了一套严格的宗教信仰行为以及非洲穆斯林专家和教师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宗教社区。一战后的数年里，伊斯兰教信仰迅速地扩展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东西部的北方区域，许多地区超过半数的人口都是穆斯林。

新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传教士，经常在西方殖民官员的支持下开展行动，他们给那些来到传教中心的非洲人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宣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基督教传教士在争取大批皈依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帝国征服业已削弱旧的万物有灵论信仰的可信度，并让基督教变为征服者的宗教。

92

对那些渴望习知新的经济和技术环境并从中获益的非洲人来说,归宗基督教信仰能给他们提供一种文化资本。他们在自己的宗教社区里逐渐开始担当起领导职位。

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部落团结的旧纽带正逐渐消解,新体制和新意识形态极其缓慢地填补着文化和社会真空。宗教本身变成一种意见分歧之源。西非高原地区是伊斯兰教的中心,而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各民族更倾向于改宗基督教,宗教皈依的过程在非洲人内部挑起了纷争。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契贝——其父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曾改宗基督教——回忆到,孩童时代时,他及其所在教区里的所有人都把自己称为“基督教教会人”,称所有非基督教徒为“异教徒”甚或“不是人”。他后来对这种歧视进行了谴责,但这仍然是造成分裂的真正来源。后帝国主义时代非洲的悲喜剧要追溯到西方这种令人不安的影响。

东亚的新帝国

西方国家和日本在东亚的竞争导致的外交解决方案,如同巴黎条约之于欧洲和中东一样重要。一战结束,日本帝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地位。它的海军在东太平洋拥有规模最大的舰队;它的陆军比新的中华民国的军队或苏联红军更为强大。战争伊始,它就加入到协约国联盟中,尽管它的陆海军没有直接参与欧洲的冲突。

新日本帝国

一战这几年是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时代。战争期间,日本领导人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和东北的势力范围。他们迫使自己孱弱的邻居接受侮辱性的对待,像西方国家早前强加给中国的一样。在更北方,1918 年协约国决定干预俄国内战,这给了日本领导人调动军队进入前俄罗斯帝国远东地区的机会。在这几年里,日本帝国成为东亚主要的强国。

日本陆军在此数年间积极着手推动日本扩张主义。赞美征服和军人勇武的封建传统再次出现于日本的现代军队中。天皇让这种“帝国

道路"借重自己的威望和半神的身份。扩张也符合工业家的经济利益，他们渴望夺取新市场和矿产资源。由于在中国攫取领土和商业特权，日本受到了报复，许多中国人激烈地抗议日本侵入他们的国家。1919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宣布抵制日货，以表达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要求。抵制日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利用了城市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忠贞，尤其是利用了他们对这个国家新的帝国主义敌人的仇视。

一年前，日本军队业已占领了东西伯利亚，这里远远地超出了虚弱的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对日军内部的帝国主义者来说，俄罗斯内战和西方站在共产党对立面的介入，使这个地区变成一个诱人的领土战利品。与军队相比，日本政治领导人对这种冒险利益并不那么信服，因为它花费高昂且不能给日本带来直接利益。但即便在西方部队全部撤出苏维埃领土后，日本军队仍留驻在那里。

93

华盛顿会议

1920年，日本政府下令终止陆军的亚洲征服计划，该决定是抵制军内帝国主义者的令人瞩目的行动。其措施是重申对日军统帅部的直接控制，结束"统帅自主权"(直至20世纪30年代)——军队将领经常利用这种权力不经文官领导人批准而行动。采取这些行动后，日本政府在同一年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提议，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解决东亚主导权的争夺。

但也是在美国政府协调努力以阻止日本帝国扩张后，日本才愿意前来谈判。美国的经济和战略目标，使它在这里不可能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在该地区的贸易繁荣兴旺，菲律宾群岛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执行遏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政策。美国海军是日本在太平洋上唯一重要的对手。战后几年间，它已增强了自己的太平洋舰队，以对抗日本的野心。日本的商业利益也是其支持谈判的重要理由。美国业已成为日本商品的重要主顾，同时也是它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如石油和铁矿石。经济的重要性和美国

海军力量暂时地终止了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

在美国政府的倡议下，讨论东亚危机的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将类似于美国谈判代表1919年带到巴黎的集体维护和平模式引入亚洲的国际关系。共和党政府前来参加1921年会议之急切程度，如同威尔逊当初前去废弃势力范围一样，因为对这个关注经济的美国领导阶层来说，与日本开战没有丝毫吸引力。它决心继续执行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保护中国不受外国干涉，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开放，但它选择了与日本谈判而非对抗。其他大国准备接受美国的建议，在远东结束强权外交。英国和法国表示合作，因为它们被战争严重地削弱了。日本文官领导人希望，与美国合作会给本国带来经济繁荣，减少其陆海军的军费开支。

1922年，谈判最终完成，会议产生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每个帝国战舰总数量的条约，它确定了与会各国主力舰的比例。英国和美国拥有规模最大的海军，日本紧随其后，然后是法国和意大利。为了符合条约规定数量，英国、美国和日本都报废了大量的海军舰只，其中美国要报废32艘。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诺不在太平洋上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或加强他们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科雷希多岛(Corregidor)现有基地里的防御工事。作为交换，日本从苏维埃领土上撤军。这些条约有效地终结了远东的强权政治，阻止了海军军备竞赛。像欧洲的《洛伽诺条约》一样，华盛顿条约提供了创建亚洲国家间和平时代的希望。 94

华盛顿诸条约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是日本和美国间的继续合作。相关条款很容易被误解，因为这些条约体现了日本和美国对待全球政治的不同路径。美国领导人设想，和平环境中的共同利益必须是所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最为关切的事物，条约像合同一样，是不可违反的。与此同时，他们对“东方”民族总体上印象不佳，他们认为东方民族只遵从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如此之多的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轻蔑态度，导致他们的领导人去寻求并相信在东亚已获得了一种自动调节的和平。

日本的历史经历赋予了它的人民一种迥然不同的目光，来看待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在闭关锁国数个世纪后，日本力量引人注目的复兴，鼓励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的帝国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的民族需要和利益比东亚其他国家的要重要得多。日本的统治精英把他们在华盛顿会议和国联中扮演的活跃角色，解释为西方承认他们国家大国地位的明证。日本文官政府真心实意地接受了美国人的国际合作计划，它不得不通过指明这种计划直接有益于日本，以便向工业界和军界上层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性。在签署华盛顿条约和从亚洲大陆撤军时，日本人未言明这是以经济繁荣和日美贸易的发展为条件的。20 世纪 20 年代末，当繁荣终结、日美贸易下降时，日本人对华盛顿条约的遵守也终结了，其结果是安全条约的失效和东亚战事再起。

小　结

20 世纪 20 年代这 10 年，从事后看来，似乎是朝一场新的、更加恐怖的战争转变的时代。20 年代一位美国总统欢呼的“常态”仅延续了短暂的时间。英法两帝国把它们的控制权扩展到中东的成功，遮掩不住这两个国家在其所统治的殖民地面临的困难。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开始兴起。欧洲政治家组合起来的新秩序，代表着其在寻求解决国际冲突和经济增长问题新办法时勇气不足的努力。我们可以评判这些政客是短视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们的人民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不逊于对战争的恐惧。

对他们来说，世界在许多方面看起来还像战前那样。根除了德国的“军国主义”，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面对的是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帝国和势力范围。如今，中东是超级帝国的势力范围，由于石油在战争与和平的战略资源中已逐步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它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国际经济正在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不创造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就可能无法持

续；就眼前来说，国际合作是经济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必要条件。然而，各国力图将本民族的直接利益置于国际合作之前，致命地削弱了这样的进程。战后新秩序潜藏着严重的问题，当大萧条袭击工业国家时，国际金融和经济合作土崩瓦解了。

美国对经济恢复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它的领导人和民众拒绝接受他们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新的外交和经济角色。他们天真地认为，复杂的国际金融和外交安排——国联、洛伽诺公约、道威斯计划和华盛顿条约——会自行运转，让美国和平地待在它的两洋防线之后自得其乐。然而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终结了这些幻想。 95

本章大事记

1920年　国联创立
1921年　法国和英国在中东的托管领地建立
1921－1922年　讨论东亚安全的华盛顿会议
1924年　埃及独立
1925年　伊本·沙特击败侯赛因·伊本·阿里
1925年　《洛伽诺公约》
1927年　林白孤身飞越大西洋
1929年　全球经济萧条开始
1932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
1932年　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
1936－1938年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

推荐阅读

20世纪20年代国际关系史

Frank Costigliola, *Awkward Dom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urope, 1919－33* (1984)。就美国对一战后欧洲复杂影响所做的均衡分析。

Sally Marks, *The Illusion of Security: Europ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8 –33* (1976)。对战后欧洲维护和平的努力之所以失败的富有创见的解释。

一战后的帝国

Raymond Betts, Uncertain *Dimensions: Western Overseas Empires in the Twentieth Cenruty* (1985)。对 20 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专题研究。

David Fromkin, *The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 –1922* (1989)。对重新划分中东的外交过程的卓越回顾。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65)。日本一战后在东亚寻求自己地位的历史。

Efraim &Inari Karsh, *Empires of the S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 (1999)。对导致奥斯曼帝国毁灭和现代中东诞生的各种历史性力量进行了清晰而有批判性的评估。

经济繁荣和萧条

Charles Kindel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1973)。仍然是大萧条全球性起源和影响的最佳回顾。

A. J. H. Latham, *The Depress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1914 –1939* (1981)。考察了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萧条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1991)。反映石油出现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一部卓越的史书。

回忆录和小说

Isak Dinesen, *Out of Africa* (1937)。在肯尼亚的一位失败的欧洲种植园主的故事。

T. E. Lawrenc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1926)。劳伦斯的回忆录,以及对他作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生涯之思考;他的故事在大卫·里恩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也得到了生动的讲述。

George Orwell, *Burmese Days* (1934)。作者在缅甸英国殖民机构里工作岁月的幻灭故事。

Erich Maria Remarque, *The Road Back* (1931)。20 世纪德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所讲述的一名德国老兵的残酷经历。

第四章　亚洲的民族国家与帝国：土耳其、印度、中国（1918 – 1941）

96

- 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创建
- 英属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
- 中国的内战和抗日战争

重点：莫汉达斯·甘地

聚焦：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民族主义赋予了整个亚洲所有古老文明以新的生命。和平安排没有触动战前西方诸帝国在亚洲拥有的殖民地，但事实证明，一战是土耳其、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土耳其人被奥斯曼苏丹动员加入同盟国一方，并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如同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所经历的一样。在英国总督宣布印度与同盟国处于战争状态后，印度士兵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印度所作的牺牲激励了国大党内的民族主义者为自己的国家要求自治权。新的中华民国加入协约国，希望赢得国际承认，但它发现日本帝国是其最危险的敌人。

威尔逊和列宁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对欧洲之外的各民族表达了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愿景。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西方各帝国动员起来的殖民地工人和士兵带入一项共同的事业中来，这赋予了他们机会，习知诸如社会主义等新的意识形态，并注重自己在结束殖民统治中的潜在作用。每一个地方都兴起了对更好的经济条件以及对民

族权利得到承认的希望。工人群众的社会解放和从帝国统治下的殖民解放，这些由新成立的俄国领导人所宣布的革命愿景，在整个世界回响。战争和俄国革命标志着殖民帝国衰落的开始。

协约国的胜利致命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土耳其领土。作为回应，来自前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军官们，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把他们的追随者聚集到民族主义运动中，驱逐外国占领军，挽救国家免于被分割。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为了达至这个目标，他们不得不背叛奥斯曼帝国，谴责帝国软弱无力的领导阶层和战争中的屡屡失利。在选择与协约国合作以期保住自己的王位后，苏丹的权威崩溃了。保守的宗教领袖们力图让穆斯林行动起来反对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失败了。现代的世俗化改革成为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基础。在几年内，土耳其领导人业已取消了苏丹制，结束了伊斯兰教义在法律上的至高无上性，击败了所有的外国入侵者。战争的熔炉第一次锻造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

印度各民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比以前卷入英帝国事务的程度要深得多。印度工业生产快速增长，以满足帝国的需求；印度军队在欧洲和中东的前线上作战。英国人认识到，这些新情况要求其对印度的民族主义做出让步，但他们有限自治的思想未能让领导主要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感到满意。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卓越领导，将这个知识分子的小党派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英国总督已经开启了将自治政府引入印度的进程，他发现自己处于国大党日益增加的压力下，要求他做出越来越多的改革。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它已走向了完全的独立。在研究亚洲民族主义时印度占据着中心位置，因为它产生了20世纪最有效的改良主义独立运动。

1919年的和平协定在中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抗争浪潮。1911年中华帝国崩溃，紧随而来的是中央统治的分崩离析和内战。被称为“军阀”的军队将领，在随后的数年里割据着领土，像封建贵族那样

以军队统治着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他们的存在，阻碍了1919年后中国民族主义者在业已垮台的帝国土地上创立新国家的努力。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北方控制的地区。中国人对日本的势力范围和商业特权的反对是如此强劲有力，乃至生成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从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锻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党和军队。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人看上去已几乎统治了这个国家。但新的对手——中国共产党出现了，其要求承担新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职责。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军队又转向争夺这个国家沿海地区的控制权。国内外的敌人依然阻碍着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继承人和中华民族国家创立者的计划。

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创建

98

1918年同盟国战败后，奥斯曼帝国也难以长久地存在下去。苏丹及其保守的宗教和政治支持者，承受着因战败而遭受谴责的巨大压力。早在战前，改革派官员就已力图鼓动帝国终结西方对他们国家日益增加的控制。战争期间，这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把他们激进的政治计划抛在一边。在阻止俄国的东线攻势和1915年击败试图征服地中海与黑海间的海峡(达达尼尔战役)的英帝国军队的战役中，穆斯塔法·凯末尔等军官证明自己是勇敢而精于军事技能的，但他们难以成功阻止英军从埃及沿地中海海岸的进攻。到1918年，英军和阿拉伯军队已把土耳其军队赶出了中东。然而，奥斯曼帝国还面临着欧洲对手给它带来的另外一场失败。

奥斯曼帝国的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垮台，是对奥斯曼军队的最后一击，苏丹投降了。协约国军队接管了帝国的战略要地。青年土耳其党人断定，帝国的衰朽是无可挽回的；只有推翻奥斯曼帝国，才能让土耳其人民实现民族复兴。战争的惨烈教育表明国家需要进行政治革命。

奥斯曼帝国的垮台

1918年11月，在奥斯曼帝国向协约国投降后，它的大部分领土被协

约国军队占领。英国军队及其阿拉伯盟友控制了肥沃的新月地带，希腊军队控制了爱琴海各岛屿以及士麦那(Smyrna)港周围的安纳托利亚沿岸。这里居住着50万希腊人。连接着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都在协约国的陆海军占领下。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战时计划，成为1919年拟定的和平条约的中心内容。条约呈送给苏丹批准后，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在缩小的奥斯曼帝国里的中部土耳其地区。

帝国及苏丹的命运对苏丹军队中土耳其军官的要紧程度远逊于土耳其民族的命运。如果履行条约，该条约将让许多土耳其人处于外国(和基督徒)的统治下，一些人被并入亚美尼亚，另一些人被并入希腊。军官们拒绝遵从协约国的条件和苏丹的命令，他们聚集到军队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周围，组织起民族抵抗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创立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组建土耳其军队，以保卫自己民族的土地免受分割。

穆斯塔法·凯末尔非凡的成就造就于战争混乱和奥斯曼帝国崩溃中，它们使之成为土耳其民族的领导人。他出生于1881年，是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贫穷农民之子。奥斯曼帝国内部公共机构提供的机会，决定了他早年的发展方向，他选择了苏丹军队中的军官职业。在军队里，家庭贫困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卓越才干，他是名熟练而勇敢的军官。在他的整个军队生涯中，他像其他军官一样，深深地卷入到改革衰朽帝国的计划里，他是那些自称“青年土耳其人”的密谋人员之一，这些人在1908年曾迫使苏丹接受他们领导下的改良的君主立宪制。他们在政治领导权方面的最初



身着现代军服的土耳其人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凯末尔·阿塔图克，约1925年(©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努力县花一现,苏丹拥有强大的盟友,包括支持君主制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世界大战暂时结束了凯末尔的政治活动,但帝国在 1918 年的失败使他重新开始了争取改革的斗争。

次年,苏丹命令军队服从协约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条约,凯末尔拒绝了,实施了所谓的叛变行动。他把土耳其族的代表召集起来,组成了国民大会,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他组织了一支新的土耳其军,任务是赶走国外入侵者、统一土耳其民族。苏丹和穆斯林当局下令处死他,但他拥有的支持者日众,他们从他那里寻获到了强有力的领导,他们仰慕他那神秘的领袖气质,我们称这种领袖气质为"神授的力量"(charisma)。他自己后来把 1919 年称作"我的诞生年"。

99

由于周边国家的弱小和协约国不愿意对土耳其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使得保卫新国家的任务变得较为容易。在东面,土耳其的军队面对的,是新成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军队。1917 年,该国出现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的高加索边陲地区,其领导人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民族主义梦想,欲让它的边界远远地延伸到东土耳其境内,因为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在这里已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尽管规模微小,装备简陋。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一些英国军队保护了他们的领土,但英国有比保卫遥远的亚美尼亚更紧迫的事务。

在亚美尼亚军队的另一边是苏联及其红军。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不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事实上,在共和国初期,他们还会逮捕和处决土耳其共产党领导人。然而,由于拥有共同的敌人,这两个年轻的国家搁置了政治上的分歧;它们的领导人在战争中选择了合作。1921 年,在苏联军队夺取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领土后,这两个国家达成了有益于双方的协定。土耳其接受苏联夺取亚美尼亚共和国靠近高加索山脉的土地,作为交换,苏联共产党政权向土军提供军事援助,并商定了这两个新国家之间的新边界。

这个区域里没有任何其他独立国家的位置,无论是"库尔德斯坦"还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都不能在这里找到立锥之地。尽管得到了国联的支持,但亚美尼亚人没有丝毫机会去创建自己的国家。凯末尔对

他们的失败的解释，虽然出于冷嘲热讽但却一针见血：如“可怜的威尔逊”之流的西方人不懂得，“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保卫不是用刺刀捍卫的国界”。他的民族主义革命动员起了愿意为祖国而死的武装追随者，他准备用他们把“祖国”的边界，向东扩展到远至与苏联所签条约所划定的地方。

100

在与苏联达成协议之后，土耳其军队掉头向西，进攻希腊占领军。1919 年，希腊领导人命令军队占领了土耳其西部的大片区域，他们认为，希腊应该把 2000 年前曾属于古希腊城邦的土地并入进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毁灭性梦想。他们认识到，土耳其民族国家阻碍了他们的大希腊美梦，但他们低估了凯末尔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他们决定穿过爱琴海占有土耳其领土，这是个愚蠢的政治错误，也是希腊人民的悲剧。

在 1920－1922 年的希土战争中，新的土耳其军队成功地把希腊军队从小亚细亚全境驱逐出去。让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长期对立的不信任感，在战争中演变为暴力仇恨。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 130 万希腊人，有许多在战斗过程中死于非命。其他人则害怕受到土耳其军队的报复，在希军撤退时抛弃家园逃往希腊。希土战争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遣返土耳其境内所有剩余的希腊人，把居住在希腊领土上的 50 万土耳其人迁徙(实际上是驱逐)到土耳其定居。国家建构首次伴随着成千上万难民的奔逃，以避免受到其他民族的统治。族群民族主义是个双面的事业，一面呈现的是同一民族人民之间信任和团结的强固纽带，另一面呈现的则是对其他民族仇恨的丑陋面具。

土耳其民族国家

到 1922 年，土耳其军队已成功地征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这里是土耳其人居住的核心领土。次年，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式废除了苏丹称号，随之而去的还有奥斯曼帝国的残余。他们可以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胜利中得到巨大的满足感，这是穆斯塔法·凯末尔至高无上的成就，土耳其国会后来为此授予他“土耳其之父”(Kemal Ataturk)的称

号。从土耳其人中征募而来的军队，是一支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它是争取民族统一伟大斗争的载体，是保护这个国家的主要工具。在苏丹制被取消时，凯末尔告诉他的人民，“土耳其民族已经终结了这些篡夺者，把主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奥斯曼帝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民族国家。1923 年，西方列强同意了新的中东和平条约，让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包括海峡留在了土耳其共和国境内。

土耳其政府开始着手雄心勃勃的国内改革计划，其领导人创建了包括国会和民选总统在内的宪政体系。所有改革措施中最激进的，是他们决定在新国家中移除曾经支撑着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支柱。凯末尔带头发起了这场攻击行动，他强调说，他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懂得，伊斯兰信仰应该成为私人事务。他认为许多穆斯林传统是落后历史的遗留物。他深信宗教不应该主宰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新国家的制度机构。土耳其政府结束了穆斯林宗教机构在苏丹统治时期享有的法律特权，下令取消逊尼派穆斯林中最高职位的哈里发名号。

最重要的是，政府颁令在土耳其公民的公共生活中以民法取代可

101

兰经律法。文字字母亦成为变革的对象。土耳其语原先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因为阿拉伯语是《可兰经》的语言。土耳其政府下令，土耳其语自此以后用拉丁字母书写。对土耳其人来说，识字意味着熟悉一套新的字母；《可兰经》如今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外语，而且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字母写成的。词汇“世俗主义”通常用于描述这个创立法治的议程。所有公民都处于法律的管理之下，无论他们的宗教习俗是什么。在 20 世纪后来的时间里，许多其他伊斯兰国家都仿效土耳其的榜样(参见第十二章“重点：伊斯兰教和民族国家”)。

妇女解放是凯末尔实现国家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新法律结束了妇女对家庭户主的屈从地位，教育和工作向她们敞开了大门。政府甚至支持说服妇女在公共场所不戴面纱的运动，在许多伊斯兰国家，这是妇女从属地位的标志。通过向宗教传统习俗挑战，凯末尔相信他可以让国家摆脱生机已失的历史重负。

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的私人生活中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宗教自由亦成为土耳其宪政体制的一部分，所有其他宗教都拥有为人所自由信仰的权利。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Hagia Sophia)基督大教堂，自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来一直是座清真寺；20世纪20年代，凯末尔将它变成国家博物馆，以纪念拜占庭(Byzantium)的这座建筑奇迹。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土耳其政府维持这个国家的模式。凯末尔希望土耳其在各方面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库尔德人的伊斯兰信仰尤其浓厚，这个半游牧的民族散居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广大土地上。他们极端忠于自己的部落领袖和穆斯林精神长老(来自苏菲派)。在协约国呼吁民族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激发下，库尔德人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而准备为自己的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与阻遏土耳其人民族主义革命相比，在中东北部为所谓的“库尔德斯坦”国划出一片地域要容易得多。他们的新国家包括大片由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

库尔德人领袖1919年曾前往巴黎，希望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获得协约国的支持。但他们没有取得战胜国的外交支持，这些国家更关心它们自己在中东的利益，而且库尔德人也没有堪与土耳其军队相匹敌的军队。库尔德人的建国运动失败了，因此，大量的库尔德人发现自己成为了新土耳其国里的少数民族。1924年，敌视土耳其统治和凯末尔反穆斯林改革的库尔德领导人，组织了一场反对新生共和国的起义。凯末尔派军镇压了起义，与此同时，他下令镇压所有被他谴责为犯有煽动叛乱罪行的穆斯林宗教社团，任何反叛的民族或宗教团体都不能阻挡他的民族国家之路。

在实现这场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土耳其人疏离了中东其余部分。他们曾经作为征服者进行统治，如今他们退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创制了既作为民族疆界又作为文化疆界的新边界，凯末尔是他们的民族英雄。1925年，他就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并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直至去世为止。他在许多方面是这个新国家的统一的象征。他的统治权威

102 如此巨大，完全可能变成独裁者。但他愿意仅作为“土耳其之父”。他缔造的军队依然是国家统一的捍卫者和防止伊斯兰复兴的堡垒。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崛起了一个统一的土耳其国。

英属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

印度漫长的历史，让它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前景的可能性非常大。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南亚次大陆的民族、习俗和宗教实践变得纷繁复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 3 亿人民，说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在北方是印地语及其相关语言，如孟加拉语；在南方则是完全不同的语系，如泰米尔语。英国于 19 世纪中期完成对这片次大陆的征服，在那里留下了成百上千的公国。这些公国大小不一，每个都由自己的君主按照自己的传统统治着。在沿海地区，商人和工厂主进行贸易和生产，像任何西方企业家一样能干；而在其他地方，农民用原始的工具耕作，竭力维持着贫乏的生计。

在殖民统治期间，宗教和文化是次大陆各民族间主要的社会和文化纽带。两千年前，佛陀曾在这里宣扬通过冥思和禁欲获得精神救赎的主张。他在印度的神殿仍然是来自中国西藏等地的信奉者的朝拜之所，但佛教本身早已退出了印度人的精神生活。印度教以其精神价值观和种姓制度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的象征。后来，伊斯兰教广泛地传播到整个印度社会。英国统治期间印度的发展，使这两大宗教群体之间的分歧恶化了，直至最后，这种冲突依然被限制在英帝国划定的殖民边界之内。围圈起殖民地领土的这些边界，界定着后来印度民族主义者希望重塑独立的印度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

印度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印度教处于印度文明的中心，它给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居民提供了宗教信仰、文化遗产和日常生活戒律。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宗教，没有统一的圣经或精神领导组织。它是一种多神崇拜，没有哪个神是其中的主神。印度教强调永恒的变化，一如生命之轮输送灵魂穿越前世今

生从一个躯体到另外一个躯体，一如生与死的相续。通过这样的生命轮回，灵魂一并带来的还有它们前生寄存的个人的行为业报，任何美德最终都会得到报偿，任何罪恶最终都会受到惩罚。因此，个人从原则上必须接受生命为他们安排的命运。

印度教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种姓制度。它按照地位和社会责任，把人分为各种身份世袭的群体。它把每个印度教徒的道德责任转化为具体的个人义务和社会纽带。种姓结构包含了数以百计不同的种姓，他们全部隶属于印度社会四大等级中的一个。曾经是实际职业——祭司、武士、商人、农民的四大种姓，长期以来已变成了纯粹的社会等级，其中婆罗门是最高等级。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还包括另外一个群体：不可接触者，或曰“不洁者”。他们被隔离于所有得到认可的种姓阶级之外，被迫永久性地从事不体面的卑下工作。他们代表着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可能占到印度全部人口的15%。禁忌主宰着各种姓的行为方式，包括吃食方面；大部分群体禁止吃牛肉，因为牛是神圣的。必须在同一种姓内部通婚。习俗和禁忌主导的种姓制度业已存在了许多世纪，与印度教的精神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03

在西方帝国来到这里之前，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是一种新宗教——伊斯兰教。由商人和武士带来的伊斯兰教，已传布到整个次大陆。它包含着一系列迥然不同的精神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式。伊斯兰教信仰要求信徒尊崇唯一神，即真主安拉；他的话包含在一部圣书《可兰经》里。伊斯兰教禁止把信徒分割为不同的种姓，否认不可接触者的低微地位。它绝对不认可崇拜一神之外的任何其他神灵。在日常生活行为和习惯的诸多方面，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都是截然不同的信仰和公共纽带。

两大宗教群体的人们在次大陆上比邻而居已有数个世纪。穆斯林最大的聚集地位于印度河河谷以西和东部的孟加拉地区。尽管在每个地方的乡村生活中，两大群体都混居在一起，在艰难谋生的过程中，他们彼此和平生活，各自劳作，但宗教信条和社会习俗形塑的群体特征，产生了无形但强大的障碍。这些不同很可能变成争吵甚至对抗之源。在殖民统治晚期，“社群暴力”，即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对另外一个宗教

团体成员的攻击，日益变成家常便饭。然而，直至 20 世纪中期，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印度教徒中的少数族裔穆斯林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以保护他们的信仰，捍卫他们的群体。

另外一个重要的宗教群体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观念和行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在印度北部，锡克教将印度教的哲学与穆斯林的一神崇拜结合到一起。在英国人统治期间，许多锡克教男子在印度军队中服役，把他们传统上对武士的尊重纳入到现代军队的军事规章中。他们集中在他们的圣城阿姆利则(Amritsar)周边，该城位于旁遮普(Punjab)省北部，在这里，他们居住在大量的穆斯林和印度教人口中间。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样，锡克教徒的生活也严格限制在其社群边界之内。这样的界限界定着他们自身的特性和他们的日常存在。

英属印度

大英帝国统治着如此众多人口，但印度是它最重要的殖民地，英王是印度的皇帝。印度的殖民边界扩展到整个次大陆，西起阿富汗东至缅甸，北起喜马拉雅山南至锡兰(Ceylon)。英国人从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它给英国人提供了经济利润，并给帝国军队提供了人力资源。它的经济完全向英国商品开放，它的士兵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诚地服役。殖民次大陆的政治权威掌握在总督手中，总督根据内阁的建议由国王任命。20 世纪初，总督在印度的权力非常巨大，因为没有议会或宪法限制他的权威。他发动战争，确定税赋，批准法律和动员军队。

104

实际上，诸多重要的限制缓冲着总督的绝对权威，大片区域依然处于印度王公的统治下，他们通过支持帝国证明自己对大英的忠诚；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只要英国还在管理印度，就确保他们对自己领土的统治权。他们极其风光地施行统治，但所有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宫廷里接受英国顾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民众造反，殖民行政当局决定保留大部分当地法律和习俗，这种状况也制约了英国对印度臣民的权力。

英国统治带来了制度结构和国内经济纽带，这给印度的公共生活

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一方面，英国人组织起印度军队，给它配备正规的英国军官，并将一个正规的英国旅与两个印度旅组合到一起，形成整编的军团。他们以西方军事技术训练印度士兵，把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提升到非委任军官的行列。印度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到 20 世纪 40 年代，印度人已经成为正式军官。

印度的文职官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英国在公共工程、公共保健和国家铁路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种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的规模逐步扩大。长期以来，印度人一直把国家公职视为高等职位，他们充分利用殖民地行政部门中的这些晋升机会。到 1914 年，高级文职官员中有五分之一是印度人，一些人甚至成为高等法院法官，按照英国传统负责执行法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莫提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的婆罗门。他是未来的独立印度的总理尼赫鲁之父。殖民地逐渐拥有了一个按照西方行政管理方式训练出来的政治精英阶层，他们已做好了准备，在印度独立时获得岗位履行政治职责。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呼吁抵制英国殖民统治的动荡岁月里，英国统治者的这些雇员仍然保持着对帝国的忠诚。

帝国在印度展开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是殖民时代的第三个重要遗产。到 20 世纪初，英国人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已经成为亚洲各国中最大的和最好的国内交通体系。最初出于调动军队的军事需要而修建的铁路，促进了大规模的工商业增长，它们服务于英国人的经济利益，而随着印度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印度商人和工人对铁路的使用也日益增多。在印度北部的广袤区域，为农耕开凿了大规模的运河网，它将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复杂河系里的水，引到旁遮普省和其他地方干燥的平原上。到 1940 年，这种灌溉系统涵盖了印度可耕地的五分之一。

帝国行政管理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开启了这个国家通往新的经济发展之路。英国为其工业品找到了广大的市场，导致印度经济的传统行业遭到猛烈冲击。来自英国廉价棉制品的竞争毁灭了印度许多小型服装企业。逐渐地，印度企业家开始为自己的商品而利用新的工业技术和日益扩大的市场。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对钢铁的需求剧增,导致了亚洲最大型的冶金企业的发展。该企业由一个印度家族所有。印度社会一小部分人采纳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方式;更大的群体成为城市劳动力。印度逐渐向工业经济转型。

105

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的政治生活急速演变。殖民统治曾激起零星的反抗行动,其中最暴烈的、规模最大的是 1857 年印度大起义,当时印度士兵和大量的王公起而驱逐英国人,以期恢复莫卧儿皇帝的统治。英军镇压了起义,惩治了反叛者,同时也对殖民管理进行了改革。英国政府开始对印度人进行英国的行政、法律和政治实践方式培训。英国的样板对印度人(包括帝国殖民统治下的反对者和合作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无论如何,殖民统治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南亚次大陆的历史。

到 20 世纪,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人业已抛弃了恢复古代莫卧儿帝国的目标。大多数人同意,印度的未来解放须产生一个民主的、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印度人将来能成功地把英国人赶出去,那么他们必须这样做:学习英国人的技能,获得西方的知识。如莫提拉尔·尼赫鲁等高种姓的印度人,即便采纳西方的生活方式,并在印度新的行政机构里效力,也同样赢得了公众的尊敬。尼赫鲁本人并不反对印度独立的目标,相反,他多年来一直是最直言不讳地呼吁本国自治的印度人之一。在他看来,通过习得西方知识,把英国人民主的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引进到印度,独立是可以实现的。

英国统治者在印度教育方面的努力,有力地形塑了印度社会精英的态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受教育的印度人鲜有否认西方的工业和科技成就有能力改变与提高民众的生活的。印度的英语初、高中学校网络,供给受过训练的人员以充实政府部门、法院、公共卫生机构和铁路管理部门。一些印度人得到奖学金前往英国留学;家庭也协助儿子们成行。19 世纪 90 年代,年轻的莫汉达斯·甘地在家庭的资助下(尽管受到被愤怒的亲戚排斥的威胁),前往伦敦学习法律。这些印度人特别渴求现代的科学知识和职业培训,他们的西方教育部分必须包含对英语的掌握,这些“从英格兰归国者”通晓两种语言,能流利地说

他们自己的语言和英语。他们对两种文化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在个人生活和对自己国家前途的规划中把两者的内容结合到一起。这种经历也拉开了他们与印度大众的距离，后者的生活依然附着于自己的村庄和宗教团体。

印度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印度民族主义者抵抗英国的核心是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形成于186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演变为群众性政治运动，追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印度。实际上，国大党借鉴了英国政党的组成结构和行动方式。最初，它强调与英国当局合作，给印度带来自治。1918年后，它将自己的目标转变为从英国那里获得解放和民族独立。

尽管与殖民当局爆发冲突的频率日增，但国大党仍然保持着对英国法治和民主政体的尊敬之情。在先建立地区性、而后成立全国性自治政府的改革中，它再三接受对话与合作。英国人迟缓而勉强地让予殖民地更大的自治权和民主自由。随着国大党为印度人民要求越来越多的自由，英国人不断地提出给民选印度领导人带来更大权力的妥协性提案。英国人和国大党，尽管表面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实际上在向印度独立前进的渐进行动中继续合作。

106

争取独立的斗争，导致了国大党内部穆斯林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在政治目标方面的分歧。20世纪初期的几年，一群穆斯林曾创立过一个新组织——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他们力图确保他们的少数派宗教群体的政治权利和文化价值不会被国大党所忽略，该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印度教徒。在国大党内，穆斯林联盟的代表与其他印度人平起平坐，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领袖都相信，他们在争取自治的斗争中必须携手合作。但穆斯林联盟的建立，是印度人中间出现政治危机的第一步，并最终让这个国家痛苦地分裂了。

关于殖民地前途的纷争，其深层根源在于分离两大宗教社群的那些差异。直至20世纪30年代晚期，支持穆斯林联盟的穆斯林希望，在未来独立的印度国里，两大宗教群体将共存但不彼此混合在一起。他

们担心，在民主国家里，印度教多数民族可能会成为穆斯林的迫害者。当英国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扩大印度领土的自治权时，竞选运动期间爆发了严重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暴动。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国家，面临着因其人民在宗教和社会方面的差异所产生的严重障碍。

印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大党崛起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协约国的政策声明和俄国的革命事件，激发了国大党领袖们争取自治的希望。他们读到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该计划呼吁承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实现民族自决。他们目睹了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读到了列宁要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民族联合起来斗争的吁求。欧洲的战争和革命也正在动摇西方殖民列强的根基。

英国政府认识到，动员印度参战需要做出给予自治的妥协，但帝国统治的机构和习惯依然在那里运转。1917 年，英国内阁发布官方声明，许诺"逐步发展自治机构，以便进一步建立印度的责任政府；作为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在一年之后，印度总督引入新的镇压性法律，以打击民族主义者的煽动。1919 年 4 月，一万名印度人在阿姆利则城的和平集会在流血中结束。集会领导人公然反抗英国人对集会的禁令，聚集支持者抗议这些新限制措施。帝国当局调来殖民军队，强行驱散了这起"聚众滋事"，向集会人群开枪，杀害了数以百计赤手空拳的印度人。国大党宣称"所有的改革谈判都是愚弄欺骗"，并组织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它拥有了一位将运动带到人民当中的新领导人——莫汉达斯·甘地。

在成年岁月的初期，甘地加入到印度新兴的西化精英阶层中。在英国学习法律后，他到南非(许多印度移民来这里寻找工作)从事法律工作。在南非，面临着欧洲人的种族歧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即政治抗争和精神调和。由于同时熟知印度和西方文化，甘地开始进行一项精神探索，试图将印度的宗教价值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调和起来，这两种价值观的结合将会给他提供用以抵抗不公的民族原则。他深深地赞同西方社会主义者要求改善穷人和被压迫者生活的诉求。与此同时，他仍然深信通过沉思实现精神再生的印度观念和非暴力的原则。甘地非常重视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训诫，即"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

107

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通过这样的方式，以爱来消弭暴力。他也研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有关抵制不公正法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漫漫的求索路上，他寻求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达到大同的人道主义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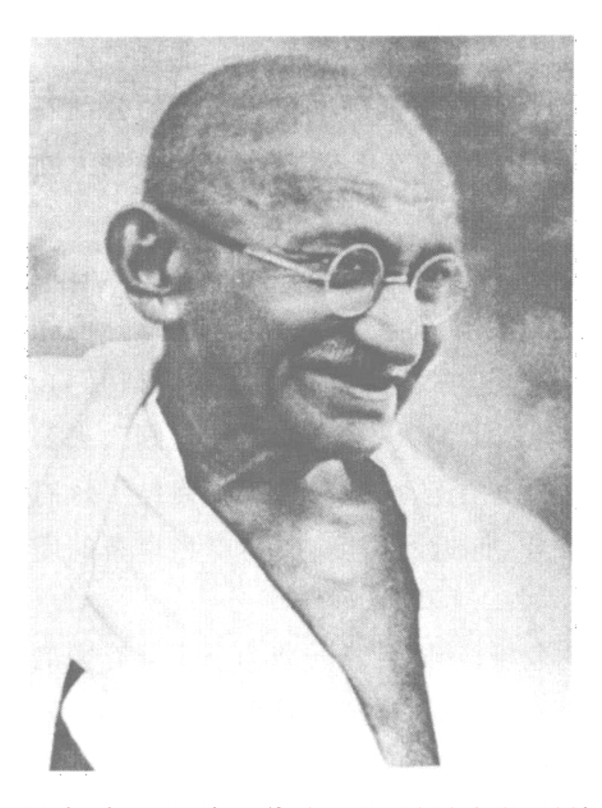
从这些读物、印度的宗教价值和他对印度同胞苦难的同情中，甘地逐渐组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信仰原则。他要求自己的同胞欣然而和平地接受来自压迫者的囚禁，而不是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或诉诸暴力。他依靠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他所谓的人们之间"爱的法则"，去获取他要求得到的改革。他在南非的政治运动，暂时成功地终结了政府对印度移民的歧视性立法。1915 年，他返回印度，成为声名卓著的印度人权利的捍卫者。

1919 年阿姆利则屠杀导致的危机，让国大党转变为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已拥有广泛的政治组织，再加上甘地富有雄心的领导和整个印度的群众的追随。在对大屠杀和帝国统治的抗议中，甘地于 1920 年组织了针对英国人统治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宣称："以任何形式或方式与这个魔鬼政府合作都是罪恶。"但一年后，随着一群国大党示威者攻击警察局，将它和其中的警察付之一炬，甘地宣布运动终止，他不能容忍暴力。

他的群众抗议计划、反对与英国人进行任何形式合作的立场，在国大党内部激起了分歧。许多国大党领导人欢迎英国人的让步，即通过选举进入省立法机关进而参与到省的自治。1921 年《蒙特福德改革法案》(Montford Reforms)使 1917 年关于建立省代议制政府的允诺实现了。英国总督宣布，"独裁统治(如英国在殖民地的专制统治)已被放弃"。国大党政治家们接受了这个让步，提名候选人参与选举。甘地不得不调整运动方向，以适应国大党的选举利益。

重点：莫汉达斯·甘地

在莫汉达斯漫长的一生中(1869 — 1948)，他从来没有追求过政治职位或荣誉。而去世时，他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哀悼，这是此前的公众人



莫汉达斯·甘地(Embassy of India, Washington D.C.)

物极少得到的。作为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律师,他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帮助他人找到正义;他曾经说:"行动是我的专长。"但他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自我净化和谦恭的哲学。他没有为自己寻求任何东西,放弃了所有的物质财富甚至性愉悦。他从生到死都是为了他的人类同胞,首当其冲的是为了他的印度同胞。

108

他们对他的付出报以崇高的尊敬,使他赢得了"圣雄"(Mahatma,意谓伟大的灵魂)的非凡称号。从一开始,他的行动就旨在提高个人的精神生活与结束殖民政权的不公。在南非和后来在印度的岁月里,他的工作包括为那些致力于道德净化和社会改革的紧密追随者创设专门的社区,印地语中称之为静修所(ashram)。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在印度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政治运动,动员起了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他期望他们同样愿意弃绝暴力,自愿接受他亲身践行的惩罚(即他的 satyagraha 原则)。当有人诉诸暴力和流血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行动。像谴责英国殖民政权的不公和压迫时那样,他以同样的激情谴责印度同胞个人和道德方面的缺点。他的道德净化

哲学，对每个人首先是他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他强烈地要求政治和社会变革，这时常激怒他的合作者，惹恼他的敌人。尽管印度普遍存在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但他坚持要求给予这些“神的孩子”与高等种姓婆罗门同样的待遇。1931年，印度总督邀请甘地前往他的府邸商谈印度的政治未来，这是来自最高当局对甘地作为国大党领袖地位的承认。他穿着简单的长袍和草鞋来到总督宏伟的府邸中。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被激怒了，他强烈抗议这个不体面的“身体半裸的反叛圣人”坐在“英王代表”的身边。即便甘地忠诚的信徒和朋友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也不能接受甘地的计划。因为他描绘的计划，欲抛弃“铁路、电报、医院、医生”，通过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拯救”印度。像对待个人行为方式一样，甘地对待政治的方式也是基于道义而非实用。

甘地非凡的人格，加之他对身边每个人所表现的友善，是他一直享有巨大声望的基础。1932年，他在英国继续就印度的独立举行谈判时，选择住到伦敦的穷人区，拜访纺织工人。这些工人的工作受到印度出产的棉花的威胁。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们带着敬重和钦佩的心情欢迎他。在数十年的合作中，尼赫鲁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关系，从他那里找到道德启迪和个人安慰。甘地去世后，悲痛欲绝的尼赫鲁告诉印度人民：“一盏明灯在我们的生活中熄灭了，到处一片漆黑”。

直至去世，甘地给印度人的告诫一直在强调需要尊重和宽容。即便穆斯林创建了自己的国家，终结了他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的梦想，他仍然继续要求平等对待所有印度人，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像他的国家以及其他存在着深深民族裂痕的土地上的悲剧一样，甘地的悲剧是，少数人的仇恨之心在短时间内就将数代人的善行毁于一旦。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刺杀了甘地，指责他呼吁结束国家分裂激起的流血冲突。暗杀者宣扬暴力而非和解。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暗杀者诉诸残暴的方法解决不同种族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都有模仿者。在他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甘地争取和平与宽容的斗争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事业。



尼赫鲁的那些"身体半裸的印度之子们"：正在扬谷子的田间劳动者，南印度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尼赫鲁和印度独立

省自治并没有削弱印度民族主义者争取整个国家自由的决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国大党和印度殖民统治者间的冲突日益恶化。1928年，国大党正式投票通过一项动议，声明"印度人民的目标是获得完全的民族独立"。这项激进的新计划，是国大党才华卓越的年轻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杰作。在接受了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教育后，他加入了国大党。地位显赫的父亲给他请来家庭教师，然后又给予他最好的英语教育。在伦敦获得法学学位后，他于 1912 年返回印度，准备追随父亲，从事法务工作。作为一名天生的和有教养的贵族，他抱着对印度人独立事业的坚定信念加入了国大党。为甘地工作期间，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印度同胞们所受的社会盘剥。他将他们称为"印度人数众多的半裸儿女"。

110

20 世纪 20 年代，他开始自己寻求解决社会不公的路径。他最初

将目光投向英国社会主义，而后转向苏联所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他前往苏联，参加1917年革命十周年庆典。尼赫鲁对苏联革命经验的理解让他明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但他与暴力革命划清界线，拒绝接受列宁的武装起义策略和斯大林的一党专政手段，他仍然信守甘地的非暴力训导和民主印度的目标。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为争取国家独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他的设想中，这种独立既是民主的也是社会主义的。

甘地依然是唯一能将国大党的追随者团结在一起的领导人。1930年，他呼吁发起抵制盐税的斗争，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效、最激烈的抗议运动。盐税直接触及穷人的利益，并且是英国人统治的象征，因此是理想的斗争目标，抵制它，可将富裕的国大党支持者和印度农民联合到一起。拒纳盐税要求的仅是抵抗的意愿，到这一年的夏天，非暴力抵抗运动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印度。甘地自己步行穿越大陆前往印度洋，沿途宣传他准备不顾英国人的食盐专卖法，从海里取盐食用。印度军警迅速逮捕了示威者，包括尼赫鲁和甘地，这场运动此后又持续了三年才逐步平息。

111

在这段时间里，国大党和英国政府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1931年，在其他印度领导人的陪同下，甘地前往伦敦，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自治领的地位。这一年，英国政府业已创立了独立的前殖民地联合体——英联邦，它的成员(自治领)取得自治权，但接受在所有的联邦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关税，执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并承认英国的君主制。在这次谈判行动中，甘地未能让印度进入英联邦，这个联邦依旧是白人统治下的英国移民殖民地的联合体(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经过几年的犹豫后，英国政府还是同意了国大党的大多数要求。大萧条业已削弱了大英帝国统治其殖民地的力量，且国大党的反抗仍然毫无动摇。1935年，英国内阁通过了新的印度自治法——《印度政府组织法》(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该法案确立了印度政治生活的法律框架，直至独立。它赋予了印度自治国家的制度机构，这种自治只在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下才受到总督特别权力的限制。处于英国人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印度——共计11个省，都接受了类似于加拿大自治领的

联邦框架。印度中央政府有自己的内阁,对联邦立法机构负责。英王的代表——印度总督,在大英帝国和印度政府间负责直接联系。

1937 年的印度立法机构选举给国大党领导人提出了两难困境:是继续斗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残余,还是在推进自治的和平选举中与英国合作?那些声嘶力竭反对妥协的国大党成员,一些是欧洲法西斯体制的仰慕者,另外一些是从苏联找到印度革命启示的人。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尼赫鲁代表着温和路线。在稍经犹豫之后,他选择了选举合作之道。他得出结论说:"除竞逐大选外,我们别无选择"。他的温和政策赢得了国大党的支持。在此次选举中,尼赫鲁成为国大党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他在全印度展开竞选运动,他的政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在 11 个省府中,赢得了对其中 8 个的控制权。

穆斯林联盟和巴基斯坦设想

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来说,这次胜利最终却是场失利。穆斯林联盟在与国大党合作的基础上提名了自己的候选人。在组成省政府内阁时,国大党领导人拒绝任命穆斯林联盟成员担任省府内阁部长职位。他们是甘地训诫的坚定信奉者,认为印度一定不能允许因为宗教分离主义而削弱建立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印度国的目标。作为应对,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ed Ali Jinnah)宣布:"伊斯兰在危急中。"他警告说,一个联合的民主印度,对穆斯林信仰乃至对穆斯林团体的存在都是一种威胁。他提出以两个国家取代一个印度,其中一个就是未来的巴基斯坦。

在南亚次大陆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观点,是一小群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想法。1930 年,他们提出了以宗教亲和关系为基础的全新国家观,按自己的方式阐明了民族—宗教多样性问题。新国家不可能聚集印度所有的穆斯林人口,但可以将那些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聚合到一起。这些梦想者给他们想象中的新国家起了一个名字:巴基斯坦。该名字来源于穆斯林聚居区中最大的几个地区的首字母,P、A 和 K 指次大陆西北部土地——旁遮普、阿富汗(甚至并非大英帝国的一部

112

分)和克什米尔。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想法和总体上不可能实现的建国方案(这三个地区中,仅旁遮普的一半和克什米尔的一小部分最终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领土),但这个不切实际的提议在印度历史上却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分离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来纷争。没有任何清晰的界线能将两大宗教的信奉者分离开来,孟加拉大部分穆斯林团体和孟加拉的印度教徒拥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而与西部印度河谷地区的穆斯林的语言和文化却截然不同。许多穆斯林继续致力于甘地的梦想,即在印度次大陆所有居民中建立一个多种族的民族国家,一些人仍在国大党内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由于担心印度教徒的统治,决心保护自己的宗教文化习俗不受西方世俗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为独立的穆斯林政治共同体的思想所吸引。他们对文化统一性的追求,与穆斯林联盟捍卫自己的政治影响、反对国大党的斗争交融在一起。

不同的民族主义梦想,为印度的前途制造出两种不同的方案。甘地对民族统一的原则不会作丝毫妥协,但他致力于公民民族主义信仰,而未能看到穆斯林的忧惧——他们担心多数人统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压迫。双方较少道义精神而更富政治雄心的领导人,利用宗教差异促成自己的政治目标。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本人就是一位只说英语的彻底西方化的印度律师,他并不践行伊斯兰教的行为习俗,甚至不会讲流利的乌尔都语(Urdu),可这是他的大多数穆斯林追随者所讲的语言。捍卫穆斯林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拒绝宗教纷争,是他致力于建立这个伊斯兰国家的核心所在。

政治利益和民族主义计划,还不足以解释印度人在关于他们国家未来问题上日益扩大的裂痕。社群间的敌视日甚一日地分裂着印度社会,引入民主体制似乎加剧了这种种族分裂。在诸如加尔各答(Calcutta)等城市地区,敌对状态更为糟糕,这些地方的贫穷助长了宗教和社会敌视情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暴力冲突的增加,让真正的民族统一逐渐成为虚幻的目标。或许,通过明智的领导和妥协,仍然有时间来避免国土分裂的悲剧,但战争横插进来了。这个时机稍纵即逝,不复再得。

像英国一样，印度也在 1939 年卷入了这场战争。印度总督在是年宣布印度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尽管国大党支持英国人的事业，但它拒绝在这场强加给印度的战争中充当英国政府的代理人。像德里联邦政府的内阁部长们一样，国大党所有的省级部长纷纷辞职。穆斯林联盟仍然期盼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但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得到解放。1940 年，穆斯林联盟通过一项名为《拉合尔决议》(Lahore Resolution)的正式声明，呼吁为印度的穆斯林人民创建一个独立国家。随着独立时间越来越近，印度两大宗教群体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113

聚焦：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

与伟大的罗马和中华帝国相比，西方诸帝国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然而，历史证明，它们的遗产与早期的帝国一样影响巨大。最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推动了被统治民族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个过程的展开不以帝国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当他们的帝国土崩瓦解之时，20 世纪后半期，在这些废墟上兴起了许多民族国家。

殖民主义直接促成了这一声势浩大的变化：首先，被征服民族反对帝国统治，这导致他们形成了民族情感纽带，人们团结在这种情感纽带周围抵抗西方的统治；其次，非西方人寻求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以便在自己的土地上聚拢和组织起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这在西方新近的历史中有着显著的样板。西方 19 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在争取民族统一和民族地位的共同事业里，民族主义具有将领导人与民众联合起来的强大功能；第三，西方的帝国统治铸造了新的殖民领土，行政官员、军队、经济活动和教育在这些殖民领土内部创造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这种种活动，让“殖民地”成为当地民众的日常体验里，一种可感知的存在。这些土地上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它们的努力指向推翻殖民统治，但保留原有的殖民边界。

由于相邻民族间彼此不信任，这些边界是难以动摇的。位于红海之滨的意大利厄立特里亚(Eritea)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

击败意大利之后消失了。相邻的内陆大国埃塞俄比亚(Ethiopia)归并了这片沙漠地区，宣称这块土地在数个世纪前就已属于埃塞俄比亚君主国所有。但对多数人口皆为穆斯林的厄立特里亚人来说最利害攸关的历史是，在意大利的统治下，他们从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分离了出来，埃塞俄比亚人主要是基督徒，说的是截然不同的语言。经过半个世纪的联邦制，1993 年他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表决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厄立特里亚重新出现在非洲地图上，它的边界就是意大利帝国曾经划定的那些界线。

在每一个地方，西方的海外殖民地都强迫不同的民族在同一个辖区里一起生活。有时候，这些殖民地所延伸的范围极其广大。东太平洋群岛在 16、17 世纪被欧洲各国征服；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征服和荷兰人对东印度群岛的控制，赋予了那些散布于数千英里洋面诸岛上的民族领土上的统一。这些民族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原本都彼此隔离开来。荷兰语在东印度、西班牙语在菲律宾都成为了官方语言。在每个殖民地，一种当地语言逐渐凌驾在所有其他方言和语言之上，如菲律宾的塔加路语(Tagalog)和东印度的马莱语。19、20 世纪这里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所确立的目标是结束殖民统治，但保留了共同的当地语言和边界，这两样东西是帝国主义时代永恒的遗产。

殖民主义不得不与西方征服之前久已存在的当地宗教和部落分裂作斗争。欧洲征服者进入诸多民族分裂林立的土地上，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部落领袖或国王。行政官员划定的边界，经常全然不顾将这些民族分离开来的界线。他们的领土范围创造了许多包含不同种族人口的殖民地。"民族"(Ethnic)一词，我们用来指有着建立在共同祖先信仰上的集体特征的人群。19 世纪被欧洲各国夺占的非洲诸殖民地，是许多不同民族的家园。专家们后来在英属尼日利亚统计出 250 多个各自独立的民族群体，他们当中有四个规模非常大。北部的富拉尼族(Fulani)和豪萨族(Hausa)皆信奉伊斯兰教。南部是伊博族(Ibo)和约鲁巴族(Yoruba)，基督教传教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改宗基督教。因此，诸如尼日利亚等殖民地是多宗教信仰的且多民族的。民族身份和宗教

114

信仰经常是交叠在一起的，从而强化了这些民族间的差异。

欧洲行政官员在统治这些殖民领土时，需要得到殖民地各民族的合作。因仅有一小撮欧洲人占据了最重要的职位，他们不得不从当地招募官员、警察甚至武装部队。面对着不同民族间经常性的彼此敌对，他们的解决办法通常是从某个特定的族群招募合作者。在尼日利亚，英国人喜欢从北部的富拉尼人或豪萨人中遴选士兵。在中非的小殖民地布隆迪和卢旺达，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比利时人）从图西族（Tutsi）那里寻求帮助。图西族人掌握这里的权力已长达数世纪，他们比居住在这里的数量多得多的胡图人（Hutu）享有更大的财富。在前殖民时代，物质财富举足轻重，拥有更多的牛，甚至能让胡图族家庭赢得这样的权利，即称自己为图西人或被称为图西人。那些丧失财富的人很可能最终被称为胡图人。换言之，这两个族群范畴，分别标志着高贵和低贱。尽管两个族群比邻而居甚至相互通婚，但有关拟构的不同的祖宗渊源的记忆，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这两个族群还逐渐拥有了相同的宗教信仰，因为大多数人口在被殖民时期都皈依了基督教。

通过给予图西族士兵和官员优先地位和权力，接着又命令所有殖民人口都要根据自己的种族出身获取身份证（内部护照），比利时殖民官员让种族差别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像其他殖民地一样，这里的族群在此过程中，比以往具有了更强烈的他者意识和对其他族群潜在的敌对情绪。族群冲突的要素形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力图避免将他们的反帝目标与任何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群体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他们不得不建立以某种形式的公民民族主义—— 一种倡导共同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的纽带关系，而非建立以民族或语言独特性为根基的纽带关系。他们保留了由前殖民统治者创建的边界，这部分是因为担心激起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周边邻国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前殖民地的政治未来是成为多民族的国家。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不吝"给英国恶魔应有的评价：殖民主义在非洲破坏了许多东西，但它创造了大型的政治单元，以

前这里只有一个个小而分散的政治单元"。按照他的评判，尼日利亚是所有居住在此的民族的希望之土，其前景远胜于"它统治下的成百上千分离的小社群"。

115

在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它的内部分裂可能比欧洲人统治的其他任何殖民地都要大。力图为全体人民建立一个印度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必须提出建立在新的统一原则之上的计划方案。这些原则和思想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劝导全体印度人民选择印度统一而非民族或宗教分离。甘地及其国大党面临着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他们最终的失败对印度来说是一出悲剧。

诸如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这些古老的土地，成为民族统一理想的发源地。在印度，甘地在写作和演说中，不断宣扬由印度各大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共同缔造的伟大历史传统。他从这样的精神合作故事中，汲取到印度民族团结原则学说的灵感。在中国，帝国在两千年间锻造的政治统一和伟大文明，成为孙中山的国民党的历史参照点。国民党领导人期望在前帝国的疆域里建立一个新中国，其成就有朝一日将比肩于早期中华盛世的成就。共产党也认为，中国的政治统一是他们为中国人民而奋斗的革命计划中一个必要的阶段。

寻求属于某个特定民族的"有用历史"，与较早之前西方各国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重写他们民族起源的努力颇有类似之处。在一些情况中，他们讲述的是充满大度仁慈的故事，但没有任何人像甘地那样，将宗教人道主义赋予全体人民。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里，力图让民主成为全体美国人民的历史纽带，他的演说要求美国人将美国革命视为"基于对自由的坚信创建了新国家"的时刻。在理论上，这种公民民族主义向所有人开放，无论他们的民族或种族出身。

但新的民族历史的书写，通常都只认定单一的族群。在历史写作中宣称一个族群凌驾于另外的族群之上，西方一些民族主义者在此方面业已开了先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种族民族主义在面对历史时，总是更多地为某个民族的权力和领土伸张，而罔顾居住在同一

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凯末尔和追随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通过赞美奥斯曼土耳其部落来美化他们的民族。这些部落是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他们在久远的过去就已征服了凯末尔称之为土耳其的这片土地。他把土耳其民族的根源追溯到了那个征服时代。这实际上是暗中表明，土耳其的其他民族，如亚美尼亚人，都是这个新国家的次等成员。这些民族主义者相信，他们的民族被赋予了独特的特质，这些特质久已出现且代代相传。他们的目标是创制政治和文化象征体系，以便围绕着这套象征体系将全体人民联合到一个民族共同体中。这些建基在特定族群之上的民族历史言说，传递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信息，因为它们有可能成为种族主义的正当理由。在这样的言说中，历史成为一部“血缘和归属”的故事。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既有创造力又具破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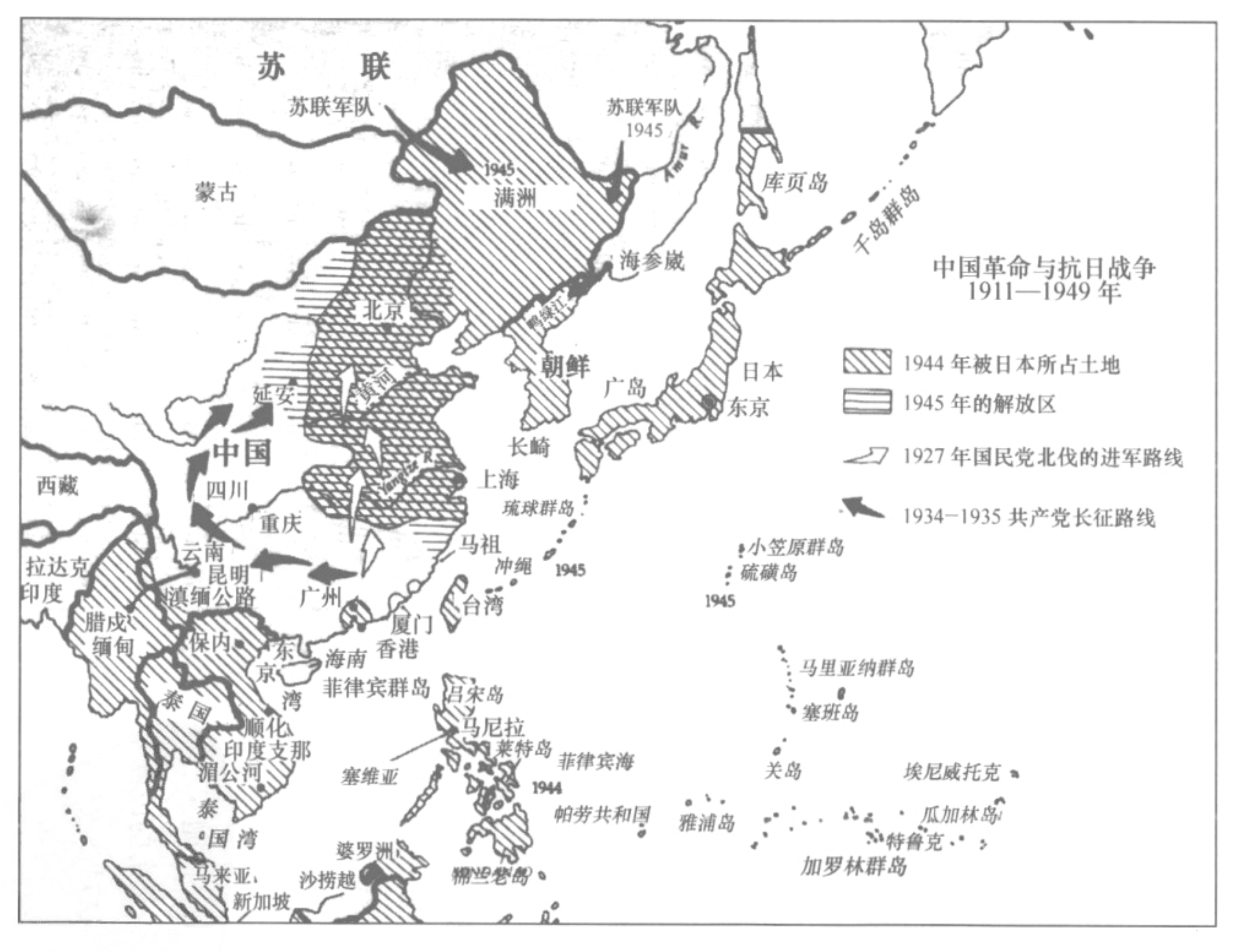
一位学者曾将民族国家的理想命名为“想象的共同体”。欲成为主权国家的民族，是如此宽泛，如此远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它只能够为人们所想象。而且它还仍需仰仗于相信自己是一个大共同体组成部分的人民的团结。[①] 民族主义者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时常是脆弱的，受到其他运动和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的抗争。诸殖民帝国形塑了这些运动形成的领土界线；这些帝国的垮台让民族主义的许诺能够在每一块前殖民土地上付诸试验。

116

中国的内战和抗日战争

中国通往民族统一之路始于 1911 年清帝国被推翻，一直持续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方告结束。曾经是一个完整帝国和社会体系的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混乱和斗争。内外战争导致了可怕的破坏和灾难，给中国人民增添了长久的困苦。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在为新中国制订计划时将目光对准西方，而中国共产党则按照苏联模式设想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91, pp/6 - 7.



战争中的中国，1911—1949年

着一个革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深刻不同的它们,都与传统的儒家秩序拉开了距离。它们是尖锐对立的敌人,每方都期望自己命定去建设一个全新的、统一的中国。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国民党似乎还是命定的领袖。

中国国民党的兴起

1911 年,清帝国军队中势力最强大的统帅宣布自己效忠中华民国。还是孩子的末代皇帝沦为阶下囚,清帝国毫无抵抗地倒台了。支持这次起义的是知识分子和在西式学堂里受教育的学生,他们随时准备努力将西方的政治权利和民族统一带到自己的国家。

在清帝国倒台后的数年里,掌握着庞大军队的、野心勃勃的中国军事将领们控制了大量的省份,他们当中的一位接管了整个东北地区。这些军阀依靠军队和从他们贫穷的臣民头上搜刮来的税收控制各自的领土。他们没有改革计划,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创制新的政治制度,彼此间以小规模战争进行混战,加剧了民众遭受的苦难。在 1911 年革命后的十年里,中国仅仅是名义上的统一国家,中央政府机构和功能极度衰弱。国外列强通过与这些小型军事统治者直接打交道,继续保有优惠待遇和势力范围。军阀统治成为民族统一道路上主要的政治障碍。

两大革命政党宣称自己拥有创建中华民族国家的权利,一个是国民党,另外一个是共产党。它们的组织者都是在教授西方语言和知识的“新式学堂”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前往国外,去日本或西方,以了解现代世界。这些激进分子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老牌的革命家孙中山。他抛弃了儒家学说,皈依了基督教,并放弃了自己的行医生涯,组织起秘密的民族主义运动。他的理想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 民族主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获得自由;(2) 民主,这对他来说代表着西方的宪政政体;(3) 社会主义,他将之理解为工业经济和中国农民在土地占有上的平等。他意识到欲达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一个现代政党,他把自己的新运动组织命名为国民党。对他以及其他激进分子来说,实现民族解放和统一是中国取得进步和独立的唯一希望。

11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事件给他的政党带来了群众支持。巴黎和会谈判各方将中国北方领土权利让予日本的消息，在中国各个城市激起了抗议浪潮，甚至商人阶层也加入了全面抵制日货的行列。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一马当先组织抵制日货行动。这场“五四运动”，给孙中山的国民党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该党挑战军阀统治所必需的。很快，日本政府同意从大部分中国领土上撤走军队。孙中山业已获得的群众支持，让他的政党走上了统一中国的道路。

国民党人很快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国外盟友，新成立的苏联与他们一样都反对日本扩张和西方帝国主义，苏联领导人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视为自己在全世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大团体拥有共同的敌人。中国的一些激进分子从苏联正在进行的革命中，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仿效的样板，他们组成了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孙中山并不赞同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仰，但他清楚地看到了与苏联结盟的实际好处。一方面，国民党需要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集权组织体系，以便组织和领导统一中国不可或缺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的运动需要军事援助以击败军阀。苏联共产党在为争取生存的内战中业已建立起一支有效的军队，他们能够为国民党军队取得中国统治权提供所需的军事训练。

1923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同意向国民党提供政治军事援助。苏联顾问协助建立了一支中国“党军”(party army)，并培训中国军官。其中，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蒋介石就前往苏联，从苏联红军军官那里学习现代战争技术。苏联的帮助是行之有效的，为中国国民党扩大了支持基础，加强了国民党的党组织和军队。

1926年，国民党领导层准备向中国北部的军阀发起进攻，它的军队来自他们在南方的根据地。军队由蒋介石指挥，不费吹灰之力向前推进。他们的目标是故都北京。“北伐”成功可能是国民党人最伟大的胜利，军阀们望风披靡。1928年，国民党夺取了北京城。蒋介石在军事胜利中获益尤大，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他已成了国民党领袖。他的

119

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作为政治工具与作为军事工具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在余生里，他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寻求政治和军事支持，蒋介石在这方面与军阀相类。他维护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坚持其改革计划，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赋予了他作为孙中山合法继承者的资格。1928 年，他似乎实现了孙中山建立一个统一于国民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梦想。

在这些年里，蒋介石开始着手消灭其主要的政治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1927 年，他的军队和警察突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会组织者和其他激进嫌疑分子；许多人被迅速处决。由于残酷镇压和党的溃散使工人心生幻灭，城市对共产党人的支持削弱了。为了挫败蒋介石的反共运动，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暴动。这些错误方针引导下的行动遭到了惨烈的失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幸存者们从这种惨痛的经历中汲取了沉痛的教训，即莫斯科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遭遇到的毁灭性的失败是它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仿效苏联共产党通过争取工人阶级支持而获得革命政权的道路，它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结果证明是错误的和弄巧成拙的。党的策略乃至意识形态都急迫地需要加以修正，这成为了毛泽东的使命。在苦苦寻求重塑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蓝图数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11 年革命时他还是个学生，与其他西化的激进分子一样，毛泽东坚信中国的旧秩序必须被打破。父亲希望他回来帮助经营家庭的田地，他拒绝了，选择了作为行动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1918 年移居北京后，他找到了自己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这一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齐声歌颂俄国革命是“全人类精神的胜利”。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以便了解列宁的革命理论。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已经是一名全心全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共合作时期给毛泽东提供了宝贵的革命组织

经验。在反对军阀割据的运动中，他致力于动员中国农民采取政治行动。从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里，他看到并相信农民从事革命行动的能力；他的经验也让他知道怎样赢得农民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农民都是佃农，遭受地主和收税员的盘剥，遭到强盗或士兵组成的四处劫掠的团伙的抢劫和杀害。像过去许多世纪一样，他们唯一可以诉诸的手段就是上山为匪和大规模起义。在国共合作的数年里，毛泽东逐渐相信，中国的贫苦农民可以被动员起来，拿起武器反抗压迫者和外国敌人。他创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观。 120

1927－1928年，中国共产党城市力量的破坏，让毛泽东到自己的农民追随者那里寻求避难。到1929年，他已在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开辟出了一小块地盘。在那里，他和他的农民游击队得以建立起一个“红色根据地”，这是他行动的中心地带。尽管遭到国民党军队连续不断的“围剿”，他还是组织和扩大了自己的领地。他的红色根据地的生存，要求有一支能够抵挡国民党进攻的军队，其士兵只能从农民阶层中招募。在这些艰难岁月里，毛泽东第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革命天分。到1931年，他的“解放区”业已扩大到处于10万红军游击队战士控制下的人口达300万的区域。这一年，他正式宣布解放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该声明是公然的抗争宣言，表明了对中华民国领导权的挑战。他相信，中国最有力的革命力量蕴藏在农村。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他的运动的成功，依赖的是中国农民阶层的支持，以及能够坚持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游击战争的军队组织。毛泽东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了贫苦农民最想得到的东西——土地。党的拥护者强迫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大部分地产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而农民则依靠毛泽东的苏维埃共和国保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共产党。许多人加入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系于他们身上。

红军是毛泽东的革命运动在军事方面的支撑力量。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力图让士兵们相信，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封建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语汇里，这个词指的是中国诸多压迫性的传统。他的士兵们在与国民党军队战斗时，相信自己正在为中国的历史性进步而战。经过多

年实践摸索，毛泽东设计出一套独特的游击战策略，并以每个士兵都能学会的简单口诀概括出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除了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伟大力量不可动摇的信念，毛泽东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任何保证；除掉农民士兵的枪之外，毛泽东在自己的对手面前没有任何保护。在中国共产党遭受残酷镇压的那些年头里，毛泽东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末，国民党巩固了它对中国的领导权。此后几年里，这个国家得以享受到相对和平的时光。西方列强与蒋介石缔结和平，摒弃它们曾强行从清帝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它们不愿意投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租界特权。此外，它们知道，国民党不会威胁它们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中华民国接管了以前由西方人管理的关税、税收和邮政事业。外国特权消失了，中国法律延伸到整个国家。在结束西方人统治自己的国家方面，国民党领导人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他们承诺结束种种旧的陋俗，禁止残酷的裹脚习俗，尽管他们没有力量强制实施这项政策。

121

虽然孙中山承诺实行宪政民主，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一个集权国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是国家的统治性政治力量。他握有半独裁的权力，称自己的体制是年轻的中华民国的"指导性的民主政体"。他宣称自己是统一的中国的首脑实际上只是幻象，许多地区都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满洲依然掌握在仅表面宣称支持国民政府的军阀手里；满洲[①]南部沿海地区和朝鲜处于日本的控制下。日本的将军们日益渴望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中国，他们讥讽国民政府声言统治整个中国的宣言，但私下里却也担心中国可能再次变得强大起来。满洲是最诱人的目标，1931 年，日本开始着手征服这整个地区。

① Manchuria，地理旧称，在不同时期具体包括的地域略有不同，但多指我国东北地区。——译者注。

驻扎在位于满洲南部日本租界里的日军军官谎称中国恐怖分子袭击了日本人的军队，侵占了日本人的财产。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已然决定在国民党真正统一中国之前攫取这片领土。1931 年，日本军队入侵满洲沿海区域以北的地区。日本军队仅遭到此地军阀微弱的抵抗，到 1932 年初，它已征服了整个地区。日本占领当局将这里变成了一个附庸国，称为“满洲国”(Manchukuo)。在一出“民族自治”的闹剧里，他们宣称自己解放了满洲人民。他们甚至为这个傀儡国安排了君主——把清朝末代皇帝扶上了王座。他实际上是日本的傀儡统治者。

蒋介石只采取了象征性的反抗姿态。对他而言，日本入侵影响到了这个边缘地区，破坏了另外一个军阀的权力。蒋介石同意了一项停战协定，而这项停战协定犹如投降条款。他意识到自己的军队难以击败日本军队，且对东北军阀的失败暗自窃喜。他选择让自己的部队肃清国内敌人，即毛泽东军队控制下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才是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的堡垒。

20 世纪 30 年代初，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了四次军事围剿行动。他转向德国军事顾问寻求帮助。他们给国民党军队教授包抄和围攻行动的方法。到 1934 年，国民党军队已逼近到毛泽东军队的鼻子底下，他们正慢慢地蚕食苏区。共产党唯一的生存希望是逃离敌手，撤出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

红军的长征业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有关这次长达年余的艰苦跋涉的官方叙事混杂着事实和想象。它始于约 1.2 万名士兵“匆促的撤退”。他们被迫抛弃家庭和财产，且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就出发了。他们穿越了有敌视汉人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国民党军队在后面穷追不舍，力图把他们全部歼灭。长征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经过数月的分歧和争论后，毛泽东取得了领导权。

这个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赢得了英雄般的“舵手”美誉，他们把他尊崇为高擎着革命火炬的英勇战士。毛泽东确定长征的目的地为偏远的西北省份陕西。这里为他的军队提供了避难所，因为它是另一个小型“解放区”的中心。这种选择是个赌博，因为陕西远隔关山万

里，要求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穿越广袤的多山地带，这些地方很难找到给养(参见第 117 页地图)[①]。饥饿和疾病一路伴随着长征者，那些幸存者需要具备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力量。传说只有 8 000 人在 1935 年末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延安。无论实际伤亡人数是多少，长征证明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革命献身精神，它锻造了领导共产党在 15 年后取得胜利的领导层。毛泽东挽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并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继续他的斗争。

122

对他卓越成就的承认来自莫斯科。在那个年代，苏联领导人尤其需要毛泽东的帮助，共产国际动员外国共产党起来反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对苏联形成了战争威胁。1935 年，它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联合阵线，这将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其装备远优于毛泽东的军队，且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对斯大林来说，该战略有望使此时已远远深入到中国北部、靠近苏联和蒙古边境的日本军队掉头对准中国。毛泽东竭诚地支持这些新策略。在随后的数年里，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这些人被它的民族主义热情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所吸引。

共产党的根据地如今变成了中国北部陕西贫瘠的高原地区。它的军队在 1936 年计有 3 万人，强大到足以击败国民党新的围剿运动。由于几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它的存在对西方是个谜，直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访问了这里，并在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里对其详加描述。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能依靠这个地区的资源，苏联没有提供任何军事或经济援助。苏联领导人宁愿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他们高估了国民党的力量，而对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的力量了解甚微。苏联政府在 1937 年向中国输送军事援助时，都是送给蒋介石的军队。

毛泽东唯有指望他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运动。他把自己早前习得的农民改革和游击战争政策同样运用到这片领土上。1936 年，他向

---

① 正文中页码均为原文页码，即本书边码。——编者注

他的追随者们解释说，他们的"革命斗争"仍然是打倒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政权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但蒋介石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他们还十分弱小。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然后才是革命。

抗日战争

1937 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最终实现。蒋介石曾拒绝联合，直至麾下的一名将军将他囚禁起来，扣为人质到他答应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方罢。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奇怪和最具侮辱性的经历之一。但是，另外的选择要糟糕得多，他的羁押者很可能会杀了他；可能正是毛泽东本人坚持"温和劝说"的方式，直到蒋屈服为止。这位国民党领袖暂时地终止了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围剿，同意了国共联合抗击日军。作为回报，他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1941 年前，苏联对中国的军援比美国要多)。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己在中华民国里的位置，将他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更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special reg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红军重新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双方对彼此仍然抱着深刻的怀疑，只是因为两者中心领土距离远隔，再加之与日本的冲突，他们得以维持着和平。这两个争夺权力的对手达成了脆弱的合作关系。

123

抗日战争给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在稍后的 1937 年夏，日本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开始了。至今仍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军事冲突是怎样在北京附近一个日本军队驻扎的区域里爆发的。共产党和反日的国民党部队显然对那里的日军发起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借口报复，日本军队大举进犯，企图击溃所有中国军队，并把中国沿海变成日本帝国的另一个"附庸国"。是年，日军侵入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持续不断地向中国内陆推进，试图击溃蒋介石的部队。

中华民国的军事力量不能与日本的相匹敌，到 1939 年，日本人已控制了中国主要的沿海地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由中国合作者统治的傀儡政权。蒋介石被迫撤退到内陆地区，把首都迁移到山城重庆。只

是通过节制使用军队和严格限制军队的进攻行动,他才得以勉强保住自己的政权不倒。他选择坚守通过防御战能够守卫得住的领土,不对日军发动血流成河的进攻。他对共产党的忧惧几乎不亚于对日本人的恐惧,决定利用自己的军队守卫曾经广袤的中华民国的残余领土。

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中国中部和北部的日军防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地区。到 1941 年,八路军共达 40 万人,控制的地区人口加起来有 4 400 万。在从日本人手里夺取领土方面,他们的游击队比蒋介石的正规军更为成功。这一年,日军企图毁灭他们的解放区,日本军队对游击区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共产党损失惨重,其军队数量下降到 30 万人,大部分领土上的文职官员被连根拔除,或被迫服从日本人的统治。然而,日本占领军不能破坏共产党的起义,也不能彻底击溃国民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都没有能力独自将敌人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要结束这种僵局,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来自国外同盟者的军事援助。

唯一有能力提供军事援助的盟国是美国。自 1937 年以来,苏联业已给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但随着德国在 1941 年中期进攻苏联,这些援助终止了。1937 年,美国政府表达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姿态,罗斯福总统对“中国伟大的自卫战”予以了赞扬。接着,他不顾美国禁止帮助海外交战国的中立法案,允许中国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美国媒体刊载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谴责 1937 年日军在中国城市南京的大屠杀。但美国的孤立主义阻碍了美国任何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努力。与德国日益增加的海上冲突把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了欧洲的战争。在日本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驱使它的军队深入到东亚腹地之前,中国人仍不得不孤军奋战。

小　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年里,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启了结束殖民统治和创立新国家的历史进程。在当时和此后,这一进程在每个国家都沿着独特的道路发展。不同的文化传统、殖民体制和民主主

124

义愿景,给这些国家的历史赋予了各自独特的特性。在世界各地的结果是西方殖民帝国影响的衰落。

土耳其民族革命采取了拒斥奥斯曼体制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道路,斗争包括与希腊入侵者战斗和镇压国内的少数民族起义。在这种艰苦血腥的冲突中诞生了土耳其民族国家。它让现代的世俗法律和西方体制适应土耳其民族的需要和特征,它的创立是一场民族革命。

经过长年的政治斗争,印度国民大会党从英国人那里赢得了整个次大陆自治的许诺。英帝国缺乏资源和决心维系对印度更长时间的控制。国大党领导人充满热情地把他们的运动推向前进,要求获得印度国家独立,同时遵从着甘地通过和平方式来斗争的训诫。然而,他们无法克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长达数世纪的不信任,印度次大陆是否会保持统一,取决于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的协调折衷和现实主义,它的命运还取决于数以百万计业已处于激烈冲突状态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兴起,给中国带来了表面上的统一,并最终结束了西方殖民统治施加的最有屈辱性的内容。国家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内冲突的结果,中国正处在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的中国复兴计划;每一方都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对方的目标。事实证明,在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改善中国众多贫苦大众生活的宏图伟业方面,国民党人没有共产党人那么能干。他们强大到足以遏制毛泽东的革命力量,并在日本人的入侵中幸存下来,但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日本帝国虽然仍陷在中国战场里,但它此前以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已变得比中国更为强大。在东亚,帝国时代尚未结束。

本章大事记

1919 年　甘地成为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1919 年　印度阿姆利则惨案

1919 年　凯末尔领导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

1920－1922 年　希土战争
1921 年　印度各省自治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 年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1925 年　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
1928 年　中国国民党北伐运动成功结束
1929 年　国大党投票赞成印度独立
1930 年　印度爆发反盐税运动
1931 年　日本侵入中国东北
1934－1935 年　中国共产党长征
1935 年　《印度政府法》
1937 年　印度国大党在全国选举中获胜
1937－1945 年　中国抗日战争
1940 年　穆斯林联盟决定争取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

推荐阅读

现代土耳其

Andrew Mango, *Ataturk* (1999)。土耳其创立者的翔实传记。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2nd ed., 1968)。对产生现代土耳其的巨大变动的综合性分析。

印度史

Judith Brown, *Gandhi: Prisoner of Hope* (1989)。关于这位充满激情的和具有精神魅力的政治领导人的最好的传记，书中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述。

Michael Edwardes, *British India, 1772－1947* (1968)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进行了深刻的回顾反思。

Stanley Wolpert, *A New Hiostory of India* (4th. Ed., 1993)对前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印度进行了广泛的回顾，对英国给印度殖民地带来的影响予以了批判。

中国史

James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1975)讲述了国民党兴衰年代里失败的希望和计划。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有关中国的阐释性历史,强调了其丰富而复杂的文化传统。

回忆录、小说和影视材料

Ved Mehta, *The Ledge between the Streams* (1984); *Daddyji* (1979); 以及 *Mamaji* (1975)。多卷本著作,生动地讲述了在一个在尊崇传统与受现代化魅力吸引而分裂的家族里成长的历史。

Han Suyin, *The Crippled Tree* (1965)。一位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中国年轻女子的回忆录,她的欧洲父亲和中国母亲让东西方的冲突变成一幕私人戏剧。

Gandhi (1982)。对这位伟大的印度领导人进行理想化塑造的银幕传记。

The Last Emperor (1975)。有关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动荡生活的电影剧本。他活过了战争、革命和毛泽东时代。

第五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专制帝国：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帝国（1930—1941）

126

- **纳粹主义与阿道夫·希特勒**
-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
- **日本帝国**

重点：共产主义与约瑟夫·斯大林

聚焦：联合舰队司令山本

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对和平与进步的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逐渐衰退。经济繁荣让位于蔓延世界的大萧条，接踵而来的是激烈的政治冲突和暴力。在遭到经济衰退沉重打击的世界各国，极端主义鼓吹者们针对民众经历的艰难痛苦提出了激烈的政治解决办法。在德国，他们对权力的渴望以及来自民众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了建立残酷的独裁统治的机会。在日本，军队将领和文官政客向民众许诺建立强大的帝国并展开对外征服，把一个相对民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专制的和扩张主义的国家。这两个专制国家侵略成性的外交政策，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开辟了通往一场新战争的道路。尽管大萧条并未直接导致这些变化，但它为极端主义的滋长创造了土壤，极端主义思想损害着世界许多地区的公共生活。专制政治而非民主体制，似乎主导了这些年对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

独裁统治的模式之一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它将民族主义转变为

极权主义独裁政治的信条。纳粹党在德国的胜利则是法西斯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胜利。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军队将领接管了政府的关键职位，把一种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国家，这种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如此严重，乃至于它看上去与法西斯主义相类。在所有这三个国家，黩武的意识形态确定了公共生活的基调，它让勇武之士和军事征服的形象熠熠生辉。这三个政权都通过外交恐吓和战争，执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德、日三国破坏了世界人民对和平新时代的渴望。在短短数年间，它们的征服似乎将世界带入到了新的帝国主义时代。

127

在另外一个政治极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向世界宣称，它的革命行动和意识形态为人类进步和摆脱经济危机指明了道路。在1917年革命之后的数年里，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党专政，斯大林则将这一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创立了独裁政体。来自苏联的消息都宣称，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自由。苏联共产党人宣扬，他们利用“自上的革命”手段取得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保留了选举体制，但每个职位只允许出现一名候选人。他们也保留了审判和辩护律师的司法体制，但在这种体制的背后还并存着一套由秘密警察掌握的镇压体制。苏联各民族屈服于这种荒谬的“民主”之下，因为监狱或死亡等待着对该体制怀有不满的任何人。

苏联外交政策不得不关注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威胁。可能是那个年代里最愤世嫉俗的领导人斯大林，他将国际政治视为“丛林”，认为只有残酷无情才能在其中生存下去。20世纪30年代末，当吞并新领土的机会出现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统治着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领土的苏联扩张到其西部领土上，这里的人民过去数年里还生活在自由的民族国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帝国。

纳粹主义与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党创始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性格和政治野心，与贝尼托·墨索里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上过前线；两人都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相信他们是自己国家命定的领导人；两

人都把战时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革命的正当理由；两人都把武士的残忍精神鼓吹为国家活力的明证，并把这种精神转化为通过暴力或通过恐吓夺取权力的激情；两人都指斥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在本国人民中散播的堕落腐化，他们指责多样性的存在和个人主义带来了这些积弊；两人都嘲讽人权，大力颂扬民族团结和战斗精神。在大众民主体制中，他们把保护公民的自由转变为建立政治独裁的手段。

但在欧洲的法西斯运动中，纳粹主义是别具一格的。最重要的是，它将种族主义变成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所有法西斯主义政党都推崇某一特定的种族国家，诉诸某种辉煌的祖先来源神话，责骂自己民族当今的敌人，但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政党像德国纳粹那样，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尤其是纳粹主义把对犹太人的仇恨转变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它抬高法西斯主义的武士理想，将之变成德国扩张计划背后的驱动力量。德国力量在欧洲的恢复，将是其迈向世界大国的第一步。没有任何其他法西斯运动如此彻底地把民族主义转变为征服的思想原则。纳粹主义将专制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捏合为一种残酷的、毁灭性的压迫和战争的思想原则。

纳粹党和希特勒

128

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希特勒为自己的运动选定的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离开德国军队后不久，就变成了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小党的领袖。在很短时间里，像墨索里尼所做的那样，他就在自己周围树立起权威的光环。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一样，"领袖"观念对纳粹运动也是至关重要的。后来，他的一名支持者在党的集会上曾高呼："希特勒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希特勒！"具体说来就是，纳粹党的纲领就是由希特勒判定的最好的任何东西。他懂得，"国家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意思就是"深刻地了解没有任何理想高过国家福祉"的人。纳粹党的纲领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社会改革承诺，它将保守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与革命的民族主义掺和到一起，党本身及其领袖才是最重要的事物。

20 世纪 20 年代间，纳粹运动具备了其独特的军国主义特征。希

特勒在党内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the Stormtroopers,SA),队伍主要由战争老兵组成,穿着专门的制服,时刻准备着为打击敌人、捍卫纳粹党而进行街头战斗。后来,他增加了一支穿着黑色制服的精锐卫队,被称作党卫军(the Schutzstaffel,SS)。他要求党卫军比德军士兵有更高的忠诚度。党卫军成员必须提供相关文件,证明他们"种族的纯洁性",同时必须向希特勒举行个人忠诚宣誓,誓言绝对无条件地遵从他——"希特勒的言辞具有法律效力"。

在大萧条初期,纳粹党发起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将自己的分支扩展到全国范围。到1932年,纳粹党成员共计80万人,冲锋队业已招募到50万人,许多人是战争老兵,或是到战时的民族共同体里寻找目标感的人。他们成为打击德国民主体制、犹太人和德国外部敌人的武士。

经济困苦和对民主政党的幻灭,驱使数百万德国选民投向纳粹党。到1932年,纳粹党已得到德国全体选民中的三分之一的支持。这些年里同样大量赢得选票的是共产党,尽管它从未吸引超过17%的选民。这两大政党加起来吸引了全部选票的50%以上。这种引人注目的选票转移,表明了德国人中间的抗议情绪,不仅抗议政府政策的毫无效率,也抗议不久前采纳的整个民主体制。

根据议会政治规则,在1932年议会选举中获胜后,纳粹党已赢得了组织德国政府的权利,它在立法机构里拥有最大的代表群体。然而,它是民主体制的险恶敌人。希特勒此前已明确要求,只有他本人成为政府首脑(总理),他的政党才同意自己的成员接受内阁部长的任命。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Marshall von Hindenburg)依赖于他的亲信顾问团的判断,他的顾问团主要由军队将领和保守贵族组成。他们未能理解纳粹党残酷的野心和狂热,认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希特勒。他们对纳粹党的残酷和暴力视而不见,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致力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群众运动。1933年1月,兴登堡元帅顺从了他们的看法,任命希特勒担任德意志共和国总理。德国走上了纳粹主义的漫漫之路。

纳粹的独裁政治

在掌握了议会后，纳粹党于 1932 年冬和 1933 年春登上了权力舞台。希特勒的武装民兵冲锋队和党卫军，肆意地恐吓和打击纳粹党的反对者。柏林国会大厦在 2 月底被焚(可能是纳粹暗地操纵的事件)，希特勒指责共产党，说服兴登堡总统授予他“保卫人民和国家”的特别权力。他终止了一系列个人自由权利，包括出版和集会自由，让国会通过《授权法》(*Enabling Act*)，授权内阁可以不受宪法限制进行统治。随着这部法案的通过，他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

129

在随后的几年里，纳粹党扩大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1933 年 7 月，纳粹政府宣布纳粹党“为德国唯一的政党”，其他党派一律遭禁；德国共产党人遭到逮捕，被送往新建立的集中营。德国变成了一党独裁的国家。形形色色的纳粹组织将触角伸向所有社会群体，包括年轻人、劳工和职业协会。即便教会也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或与纳粹保持和平关系。胆敢抗议纳粹不公的个别宗教领袖被关押起来。到 1934 年，公开反对纳粹的声音销声匿迹了。

德国军队仍在纳粹的控制之外，它的军官团依然保留着旧德国军队传统的团结。纳粹运动依仗自己的准军事力量冲锋队上台，冲锋队的领导人相信，他们的运动应该会成为纳粹新式军队的核心。希特勒选择了站在德国陆军一边反对冲锋队，他向将军们许诺扩充军队，保护军队免于改革。为了结束冲锋队的威胁，他秘密组织铲除冲锋队领导层的力量。1934 年 6 月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党卫军行动小组抓捕和处决了希特勒要消灭的 70 名政治领导人。为了给这次处决行动找到正当的理由，希特勒宣称他就是法律，因为他“为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军队将领以沉默的方式接受了这次血洗，他们心满意足地看着冲锋队领导人消失。

同年 9 月，希特勒得到了报偿。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宣布自己为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德国的将军们没有就此提出异议。在特别宣誓中，每个士兵和军官都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



大张旗鼓的纳粹主义：希特勒在向集结的党徒讲话，约 1935 年(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并誓言“作为一名英勇的士兵，终生时刻遵守这个诺言”。警察恐怖和对希特勒的绝对效忠，构成了纳粹德国的两大主要特征。

到此时，纳粹政权躲过民众的视线，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治镇压工具。这是“党卫军国家”，一种残酷而专横的统治体系，致力于确立对希特勒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它不遵守普通的法律，它的组织部门与正常国家行政管理的组织部门全然不同，纳粹党体现了专制权威的新原则。它在纽伦堡(Nuremberg)的中世纪城市里精心组织规模庞大的党的集会，以展示新政权骇人的力量。在这个党卫军国家里，它是两大重要组织——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Gestapo)——招募新成员的源地。1934 年 6 月之后，党卫军不断扩大人员和权力以取代冲锋队留下的真空，盖世太保很快被并入党卫军组织中。党卫军的权力扩展到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和对“不良分子”施行“再教育”的集中营。

这个党卫军国家拥有随意逮捕和惩罚的无限权力，它唯一的法律是简单的律条："元首的意志具有法律效力"。希特勒建立新德国的梦想成就了一个战争国家——"第三帝国"(Third Reich)，他宣称这个国家将延续千年。

130

这个帝国里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纳粹对犹太人的仇恨变成了种族隔离和迫害政策的灵感之源。首先来临的，是1933年犹太人从德国行政机构的一切职位上被排除出去。接踵而来的，是1935年包罗在纽伦堡法律里广泛的歧视举措，至少拥有两位犹太人祖父母的所有德国人都丧失了德国公民身份。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变成非法。歧视政策的目标是把犹太人从德国驱除出去，尽管他们在数代之前就已融入德国社会。市政机关根据这些法律颁布一系列政令，禁止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城市，张贴宣称本城市"犹太人禁入"(Judenrein)的标志。

到1938年，10万多名犹太人从德国迁移出去。为了获得离开的权利，他们不得不丢下所有东西。这些人当中包括爱因斯坦(Einstein)等杰出的知识分子。1938年11月，德国全境发生对犹太人和犹太人财产的猛烈攻击("水晶之夜")，所有的犹太会堂都遭到焚毁。之后，更多的犹太人逃离出去。就在这个西方人眼里的理性文明的社会中，盲目的种族主义成为了法律。种族灭绝政策的根基已经奠定。

131

对支持新政权的德国人来说，1939年之前的几年是愉快的时光。纳粹政权期望他们公开展示对纳粹政策的支持，按照纳粹主义精神为国家服务。作为回报，希特勒许诺让德国人回到工作岗位。在其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事实证明，像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早前所做的一样，纳粹政权是一种保守力量。希特勒为了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需要实现德国经济的强盛。他不知道任何经济理论；他只相信，民众必须有工作岗位，即便国家缺乏足够的岁入为就业计划埋单。他的财政顾问们被他的赤字支出震惊了，这些赤字用于公共就业工程、公共住房计划和其他大型的建设工程。失业者被要求到德国劳动服务部(German Labor Service)登记，该部门大力宣扬"工作使人自由"的口号，甚至把这个口号应用到集中营的囚犯当中。

政府的这些经济政策，加上重整军备计划，刺激了经济复苏。1936年推行的四年经济计划，力图让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因此也能更好地应对战争)。纳粹的计划制定者们与德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合作，同时保证他们的利润。这些经济手段，与同时代苏联推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毫无相同之处。到30年代中期，德国人已拥有了工作和安全，大多数人不想要求得到更多。

纳粹帝国的扩张

既是扩张主义者又是军国主义者的纳粹德国，在短短几年内就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欧洲和平体系。希特勒在1937年说："德国的问题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这就需要不断冒险"。他梦想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伟大的世界大国，他对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梦想是宏大而无情的。在其取得政权之前早已写就的非比寻常的《洲际战争》一文中，他说，他指挥下的德意志帝国将发动对美战争，争夺"世界统治权"。他没有任何精确的征服计划，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他学会了如何利用环境，在追求让德国变成欧陆和世界大国的目标时，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权力政治，依赖于战争威胁和恐吓。

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的三年里，德国政府破坏了20世纪20年代的和平协定。1933年末，它退出了国联。接下来，它结束了《凡尔赛和约》对其军备的限制。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废除1919年和约对德军规模的限制条款，纳粹德国当即着手将军队扩充到50万人，并迅速地启动了重整军备计划。希特勒坚称自己的国家理应与邻国享有平等权利，并以此为自己的行动辩护。随后，德国人在1936年占领了莱茵兰(Rhineland)地区，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东部的前沿地区曾禁止德国军队进入。然而，20世纪30年代没有任何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这里，德国遵从这个对其主权的限制的唯一保障就是《洛加诺条约》(*Locarno Treaty*)。设若德国违反该条约，其他缔约国有权向莱茵兰地区派遣部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德宣战。

希特勒选择了冒险。他的军队仍然很弱小。他的将军们警告说，132 如果法国选择战争，德国军队将不得不立即撤退。他后来承认，“如果法国人进军莱茵兰，我们将不得不夹着尾巴退出”。但他驱散了将军们的恐惧，因为他相信，英法领导人对和平协定已经丧失了信心，任何一个协约国都没有决心去执行和平条款。他猜对了，他在洞悉对手的弱点方面具有异乎寻常的天赋。1936 年 3 月德国人对莱茵兰的军事占领，在莱茵兰地区民众的欢呼声中和平地发生了。

西班牙内战让西方民主国家和欧洲独裁者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显露无余。1936 年 7 月，佛朗哥将军(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军事叛乱试图推翻西班牙共和国。他及其支持者是这一年刚刚当选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的敌人。这个改革联盟政府制定了扶助穷人的土地改革计划，颁布新法律给予该国的非西班牙民族政治自治权。在这一年的社会动荡局势中，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无力阻止他们的一些追随者侵占西班牙天主教会的财产。佛朗哥将军宣布的目标是，建立保护私有财产、教会和西班牙统一的集权政体。尽管他接受了西班牙法西斯运动“长枪党”(Phalange)的帮助，但他并非法西斯主义者。人民阵线政府则得到了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西班牙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内战。

渴望在地中海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的墨索里尼，立即向佛朗哥提供军队和军事装备。希特勒也向佛朗哥叛军提供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包括德国的战斗轰炸机和飞行员，负责对戈尔尼卡(Guernica)的巴斯克(Basque)城市进行残酷的轰炸(这成为 20 世纪最著名的反战油画的主题。该画由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创作)。

苏联领导着国际反法西斯干涉力量。在德国和意大利开始支持佛朗哥之时，苏联也向共和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并帮助组织国际战斗团——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许多西方人断定，西班牙冲突是欧洲范围的人民民主和法西斯独裁之间的较量。西班牙内战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事业，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志愿者加入到共和国的军队中参战。

约瑟夫·斯大林预料英国和法国也会干预西班牙内战，支持共和国。但英法政府以及美国采取了严守中立的不干涉政策，拒绝向任何一方出售军火。实际结果就是拒绝援助共和国。他们的目标是避免扩大冲突，不愿冒与法西斯国家开战的危险。这对它们来说比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更值得关注。绥靖姑息仍然是它们最优先的选择。1939年初，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的胜利告终，像这个危机岁月里欧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变成了独裁政体。

重整军备增加了纳粹政权的实力，它开始在其南部和东部边境走上了危险的领土扩张道路。这里有许多在奥匈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国，它们非常弱小，很容易为相邻的侵略国家所统治。1938年初，希特勒宣布，奥地利人民必须加入他的大德意志。在奥地利政府拒绝后，他派遣军队用武力强占了这个国家，奥地利变成新德意志国家的一个省。德国的第二步是要求吞并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西部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口头宣称其目的是保护居住在这里“受到压迫的”德裔民众，但真正的目标是毁灭这个新国家。它是德国向东部扩张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希特勒准备在这一年发动战争，他预期西方会再次选择妥协调和。

133

1938年9月，他发出威胁，一旦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回应，意大利提议在德国慕尼黑(Munich)举行德、意、法、英四大国会谈。尽管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但西方国家抓住了橄榄枝。希特勒拟定了条件，会议签订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Treaty*)给予了希特勒想要的全部东西。英法政府强迫捷克政府把苏台德领土割让给德国，这致命地削弱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它们维护欧洲和平的孤注一掷的努力，后来被谴责为“绥靖”，也就是向侵略俯首投降。

法国和英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从慕尼黑会议返回国内的英国首相问到，英国的士兵为什么要为“我们知之甚少的人们所居住的遥远土地”而战。条约本身是西方人多年一厢情愿的结果，他们认为纳粹是温和的，这是西方政客和民众苦苦依恋

的幻想,他们热切地希望欧洲战争永远不再发生。《慕尼黑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一个悲剧,也是西方世界的一场外交灾难。

1939 年,纳粹领导人继续采取行动,要使德国变成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大国。是年春,他们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半部,还在东半部成立了一个斯洛伐克傀儡政府,从而把这个国家从欧洲的地图上抹去了。在其东北方是波兰,它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领有从这两大国划出来的疆土。“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是指波兰西部的一块狭长土地,夹在德国领土之间,通往德国城市但泽(Danzig)。该城市在 1919 年的和约中被确定为自由市。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重获这片区域就已成为德国政策的目标。

尽管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声称不再要求得到更多,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他更大的目标是统治欧洲。他达至这个目标的手段仍然是武力和恐吓。1939 年 3 月,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和平妥协吁求,只引来了希特勒对遥远的美国人的嘲讽,夸耀说他“这个 21 年前籍籍无名的工人和人民的战士”,已“重新建立起历史性统一的德国人生存空间”,他嘲弄罗斯福“对世界命运”的关注。他能如此恣意妄为,是因为孤立主义阻碍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任何实际的影响。

苏联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多年来,希特勒一直把苏联视为德国的敌人,它拥有东欧规模最大的军队。这年春天,英国政府最终摒弃了绥靖政策,拒绝对《凡尔赛和约》做任何进一步的修改。相反,它承诺遵守与波兰的军事同盟(一旦后者与德国交战的话)并开始和法国一道,与苏联商讨军事协定。如果斯大林决定与西方民主国家携手,共同保护波兰,他本可以迫使德国陷入另外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希特勒不情不愿地选择了谈判。他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份战利品报价单——波兰东部,换取苏联与其合作,毁灭独立的波兰。斯大林接受了这样的报价,1939 年 8 月,两国秘密签订了瓜分波兰的协定。《德苏互不侵犯条约》(*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为德国发动波兰战争开辟了道路。1939 年 9 月,希特勒的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在阻止德国人扩张和挽救《凡尔赛和约》的绝望努力中,英国和法国对德

134

宣战。一场新的欧洲战争爆发了。

这场新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纳粹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驱使欧洲陷入冲突。根本的毛病在于，《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以相对公平的方式，处置了德国的安全和民族自决问题。实际上，从 1939 年的视角来看，它们太过公平了，它们给德国保留的领土、人口和资源，在纳粹领导下足以被动员起来发动战争。1919 年时，任何人都不曾想到，随着 1933 年纳粹上台组构这个国家，德国会变得如此疯狂和残酷。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大萧条中，苏联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带有独裁色彩的强大工业化国家。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1929 年，斯大林业已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和苏联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负责在动荡和艰难的条件下改造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变革主要有：(1) 迅速发展苏联工业经济；(2) 强行夺取所有耕地，将之聚集到一起建立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化农庄；(3) 扩大党的镇压权能和秘密警察队伍，使恐怖体制常态化，也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专横逮捕和惩罚。苏联的转变是如此剧烈，乃至史学家将这个时期命名为“斯大林革命”。

1917 年革命给这个广袤的农业国家带来了共产主义政权，其时，国家的土地由农民掌握和耕种。斯大林创建了个人独裁体制，结束了私人耕作模式，把国家权力扩展到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领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苏联工业。他宣称，国家社会经济的转变让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批评者则称他的体制是专制的，谴责他的政策是非人道的。

斯大林革命

20 世纪 20 年代末苏联体制的弱点和斯大林个人的政治野心，是他登上权力宝座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年代，领导权掌握在政治局手里，斯大林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但同时也是党的总书记，与党的重要官员有着广泛的联系。共产党的“先锋队”由一小部分控制着这个辽阔国家

的统治精英组成,对敌对的西方国家抱着深深的戒惧。

他们的国家是弱小的,内部分裂为一小部分赞同共产主义目标的工人阶级和决心保有自己土地的农民阶层。苏联共产党在 1921 年开始推行他们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提高农业产量,恢复国家遭到毁坏的工厂和衰败不堪的城市。该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把农业产量提高到足以养活苏联人口的水平,但它未能产出充足的财富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金。而工业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创造共产党梦想的丰裕经济的必要条件。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实际的,另一方面是空想的,促使苏共领导层在 1927 年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启动迅速工业化的计划。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梦想仍然是他们革命计划的中心点;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毫无可能通过大规模运动动员国家实现这个目标。具体说来就是,没有高额的投资,工业化不可能成功。这些投资只能来自国家。通过税收和低廉的农产品价格,苏联在 1927 年要求农民阶层牺牲大部分收入和资源,以支持工业发展。农民拒绝按照这样的条件合作,这在 1928 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国家因此陷入了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从而为斯大林的独裁开辟了道路。

135

危机表现为供应城市人口和出口所需的农产品极端短缺。国家在收购几乎所有的农产品时,降低了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这使许多农民拒绝向国家出售自己的谷物。农产品销量下降十分严重,乃至城市在 1928 年出现了食品配给。苏联农业出口几近崩溃,而农产品出口是工业机械进口资金的基本来源。对习惯于自由市场的西方观察家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短缺源自市场经济失灵。农民需要激励报偿,尤其是自己的粮食能卖出好价钱,同时能买到价格便宜的消费品,但共产党拒绝给予他们这些。

苏联领导人对此次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他们怀疑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准备诉诸内战时期的无情方式去对付这些“阶级敌人”。他们的办法是谴责富农(kulaks)企图削弱苏维埃国家。斯大林是这些领导人的发言人,他道出了他们对农民反抗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忧惧。他在 1928 年春警告说:“我们既面临着苏联外部的敌人,我们也面临着苏

联内部的敌人”。是年，针对粮食危机，他提出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下令警察和党的官员从农民手里夺取剩余产品，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用暴力。温和的领导人对他的残酷无情感到惊骇，有人甚至指责他是新的蒙古成吉思汗，正在用亚洲式的专制暴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年是斯大林首次开始确立国家政策，他宣称将按照列宁主义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他的行动的结果是发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相信，他个人野心的目标是取代列宁的地位。他把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转变为自己的有利时机。我们对他内心的想法和动机知之甚少，因为他是一位藏得很深的人。他的一生，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摆脱贫困的一生和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熟知阶级斗争和压迫，熟知资本主义必定衰亡，熟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我们无须怀疑他对这些基本的意识形态训诫的信仰，因为它们给他事业的正确性和斗争的必要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信条。换句话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符合他好斗的个性。在学习和战斗时期，列宁是他的导师和领袖，在整个地下斗争时期甚至在战争和革命年代，他依然保持着对列宁的忠诚。他所取得的一切，包括他作为总书记的职位，他都归功于列宁。

然而，像叛逆之子一样，他在20年代初开始认为自己可以取代列宁的位置。他的政治手段是粗暴的，列宁对此发现得太晚了。甚至在列宁1924年逝世之前，斯大林就已开始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键职位，在选择党的新领导人和在政策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党员干部中积累追随者。1928年，他们都对他在处理粮食危机中的粗暴方法予以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他把政治局中所有的对手从领导岗位上驱逐了出去。到1929年，他统治了这个机构，并通过这个机构统治了整个苏联。在他50岁生日庆祝会上，支持者欢呼：“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136

这一年，斯大林开始了自己所鼓吹的所谓“自上的革命”，“革命”在斯大林的语汇里，指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和社会转变。这种转变通过两大独立的政策得以实现：其一是在工业生产方面采用五年计划，使苏联的工业产值到20世纪30年代初翻三番；其二是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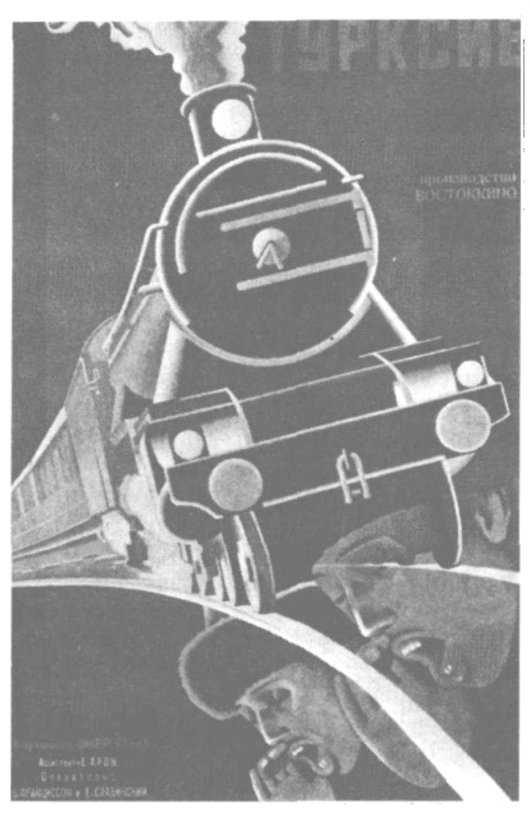
晚些时候，苏联共产党决定强迫 1 亿农民离开自己的私人土地，进入“集体农庄”(kolkhoz)。

农业集体化在理论上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合作。实际上，它让国家直接掌握了农业生产，因为国家官员能够控制新集体农庄的管理。这些举措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对农民阶层的驯服。执行这些举措，要求独裁政权扩大秘密警察的镇压力量。最终，斯大林的野心和专制警察权力的膨胀集合在一起，将苏维埃体制转变成专制体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业化，是革命梦想和增强国家军事力量的需要的结合。五年计划的生产目标，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精心拟定的计划指南所确定的。在勃发的乐观主义情绪中，斯大林下令到 1932 年底完成计划指标；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苏联工业化的精神是战争式的精神；工人必须“冲锋”在前，“攻克堡垒”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委员会里反对这种将导致混乱状态的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遭到了开除或逮捕。在这种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里的官员和管理者必须完成国家计委确定的生产指标，否则就会有被解职甚或被逮捕的危险。

这些残酷的政策，在实现装备一支现代军队的需要方面，比它们在实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方面更为有效；对斯大林来说，前者更为重要。1931 年他在一次工厂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说，“决不能降低”工业增长的“速度”。理由很简单，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会让苏联强大起来，结束它的“落后”面貌。斯大林警告与会人员说，世界仍然由“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统治着，他理解中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就是，“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斯大林所说的话更像一个沙俄统治者，而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引述了一长串在过去多个世纪里曾经打败过俄国的外部敌人名单，从 13 世纪的蒙古可汗到 20 世纪的日本人，不过，因外交缘故略去了德国人。他要求“社会主义祖国”在十年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他们打倒我们”。他预期可怕的战争行将到来，但他从未意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工业化运动一如怀疑论者在1929年预计的那样充满混乱。俄国需要引进国外机器和技术人员建立新工业。进口的东西当中包括由福特汽车公司建造的一整座拖拉机和卡车工厂，德国的钢铁厂机器设备进入了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的新兴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降低了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而这些是俄国支付机械设备进口的主要外汇来源。在此情况下，政府选择了出口更多的粮食，尽管1932－1933年苏联部分人口正遭受着严重的饥荒。在苏联，没有足够的铁路线，没有充足的熟练工人，缺乏住房，也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用于所有新工厂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满足宣传需要，哄骗和威胁工人及工厂管理者。与战时相似的优先体制决定什么地方的需要最迫切，那么稀缺的资源就流向那个地方。



为斯大林的革命服务的艺术：电影《塔西铁路》的海报，1929年(Poster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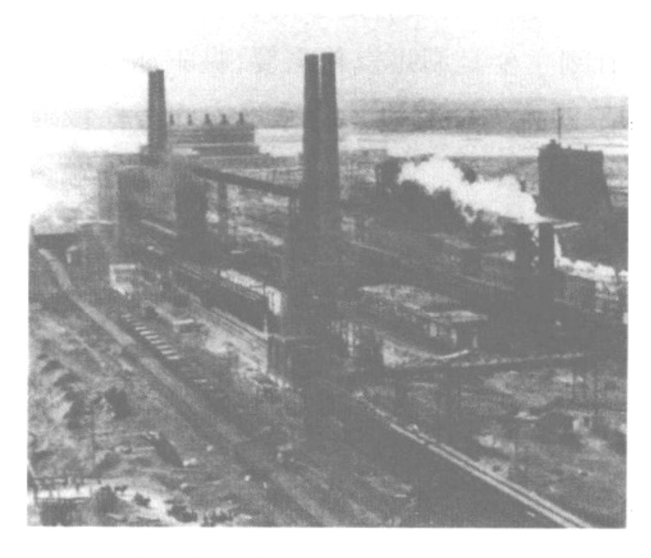
工业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是巨大的工业工程。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宣传，长达1 000英里的塔西铁路(Turksib)，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与中西伯利亚连接起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Ukrainian Soviet Republic)南部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下游的一座大坝生产出来的水电，加速了该地区重工业的发展。蒙古北面库兹涅茨克(Kuznetsk)周边的山区，成为这个国家重要的煤炭产地之一。乌拉尔山脉东南部干燥的斜坡地带，一座被命名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巨型钢铁建筑群拔地而起，采掘这座“磁铁之山”丰富的铁矿石储藏。为了

138

快速建设必需的机器设备，外国专家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些建设工地，党的重要领导人亲自监督工程进展，确保建设速度不会懈怠。

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了大量自愿前来或被强行带到这些建设工地上的工人身上。青年共产党员运动的成员相信，这些工程是一场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运动。工人们行程数千英里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一名苏联作家观察正在劳作的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样辛勤地工作，答案很简单："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然而，在他们身边的，是逃离无情的集体化运动和农村惨境的农民，这些人工作仅仅是为了逃避饥饿。成千上万的监狱劳工——大多数是抵制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些工地上服刑，生活在警察看守的帐篷里。到"一五"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劳动力总数量增加了一倍。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十分糟糕。由于住房严重匮乏，食品供应极其短缺，整个"一五"期间都在实行配给制。无论喜欢与否，苏联人民必须接受斯大林工业化浪潮下的巨大牺牲。

苏联需要一支专家队伍监管工作，它从沙皇俄国那里继承了一小批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使之成为斯大林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嫌疑分子。为了迫使他们为新政权工作，警察逮捕了许多工程师，指控他们在资本主义敌人的指使下从事破坏活动。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由秘密警察执行的逮捕就等于有罪判决。1930 年，莫斯科上演了两次"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对被错误地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工程师进行公开定罪，所有人都被迫坦白交代，然后作为囚犯劳工被送往工业项目



"钢铁之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约 1939 年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工程里工作。“正义”业已成为操控小部分重要人口的另一种工具。

139

这个国家的氛围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充满对战斗的激情，同时充满恐惧以及对破坏分子和间谍的怀疑。这场战斗的一部分是快速训练“红色专家”，他们是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得到技术训练。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通过这种苏维埃式的“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有50多万人被提升到管理和技术岗位上。他们当中包括苏联未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这些人的职业生涯有赖于党和斯大林，他们成为苏联新的斯大林主义精英。

到1932年底，苏联的工业生产直线上升。西伯利亚的新工厂开始生产出大量的铁和钢；钢铁产量在1928－1932年间翻了一番。石油产量也翻了一番，而电力生产则增加了三倍。在此期间，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因为它在斯大林革命里居于最次要的地位。城市住房紧张状况变得极其严重，大多数家庭不得不挤在公共公寓的单间房子里，与所有其他房客共用厨房和洗手间。一直到1933年，食品仍然实行配给制。1934年初，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但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之高令人恐怖。

农民遭受的痛苦无以复加。1929年11月，党的领导人下令开始对私人耕地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化，斯大林拒绝与私人耕作的“资本主义方式”有任何的妥协折衷；集体耕作的“社会主义方式”必须取得完全胜利。党预料到了农民的抵制，授权使用“行政措施”，也就是通过镇压性的警察行动惩治那些抵抗者，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所谓的富农群体。1930年1月，斯大林批准了对全国120万户农民家庭(约600万人口)进行“清算”的命令，这些农民——俄国最优秀的私营农场主，被赶出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被迫放弃所有的财产，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甚至遭到枪决。

这种有组织的阶级战争是对农业农场主最邪恶的报复行动。他们被无辜地指责为敌视共产主义制度。到1932年初，农业集体化在苏联主要的农耕地区完成了。在1934年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斯大林骄傲地宣布已建立了2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政权在农民阶层中“消灭

了资本主义”。

农村中的这场社会革命的代价是艰难和饥荒。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利用它对农业的权力,以最低的代价盘剥最高数量的产品。集体农庄里的行政官员在不遗余力地建立农业耕作“合作制”之时,把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清除了出去。农民们屠宰了近半数的家畜,不愿意让它们变成集体农庄的财产。这带来的结果是役畜极其短缺,而国家却没有拖拉机来取代它们。新农庄里的农民毫无热情劳作。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1932年农业产量的下降。集体化农业生产不出来既满足工业需要又养活农村人口的粮食,这种情况在1932年末已昭然若揭。斯大林选择继续进行国家采购,下令对任何不能完成粮食采购指标的官员予以严厉的惩处。

尽管苏联从未公开承认,但饥饿已蔓延全国,导致了饥荒、瘟疫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死亡。这种悲剧的信息传到城里,即使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惊骇于他们想要所有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已完全破灭。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怀有这些梦想,并同样在苏联人民饱受的苦难中经历了幻灭。1932年11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15周年庆祝会中间,她与她的丈夫发生激烈争吵,后来她在克里姆林宫的房间里开枪自杀了,成为斯大林革命的另一个牺牲品。

140

就连政治局里斯大林的同事们也认定,他的领导已导致严重的权力滥用。1933年春,包括他的亲密助手之一基洛夫(Sergei Kirov)在内,这些温和派采取新政策,以便结束大规模恐怖、规范集体农庄的境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确定合理的工业增长目标。他们希望恢复1929年之前集体领导的做法,约束斯大林的权威。他们支持基洛夫作为领导这种努力的人选。

但在1934年12月,基洛夫在办公室里被一名刺客谋杀,恰好在谋杀事件发生前夕,他的两名私人卫兵神秘地撤走了;这两个人在遭到审讯前就很快不明不白地死亡。苏联领导层立即展开行动,借机追捕应为暗杀负责的“反革命分子”。斯大林一马当先。可尽管缺乏明显的证据,但他最有可能是导致基洛夫死亡的秘密警察阴谋的策划者。这个

事件让斯大林摆脱了对其统治的一切限制，他很快建立起一套警察恐怖体系，这套体系一直延续到他去世。

斯大林主义恐怖和苏联的专制统治

此后的五年的显著特征，是大规模的逮捕、处决，以及对假想中的叛徒的公开谴责。对外部观察者来说，该时期看上去像是"大恐怖"的时代。大规模的镇压在农业集体化期间早已出现，如今它扩展到所有的苏联人民。历史学家依然在努力理解警察恐怖在苏维埃生活中确立的秘密过程。秘密警察日益增长的权力给斯大林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指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就是他不受约束地相信自己永远正确，以个人崇拜解释他为所欲为地施行警察恐怖。他们有意避免提及他得到了人数庞大的共产党员的支持，这些人的职业生涯与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斯大林一代"的共产党员是恐怖统治的合谋者。

斯大林的统治建基于不受约束的镇压权力上，这种权力由秘密警察执行，由斯大林亲自掌控。在基洛夫死后，按照他的个人命令，秘密警察当即得到授权，可以逮捕、审判、枪毙或监禁任何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因为只有警察是裁决反革命活动存在的法官，所以他们实际上取得了独断的权力，可以任意惩处那些被他们看作敌人的人。在斯大林多疑的头脑里，他怀疑在思想或行动上质疑其领导能力和政策的所有苏联官员、党员及普通平民，都是叛徒。基洛夫被暗杀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一波逮捕浪潮，斯大林大规模逮捕任何与反对他统治的派系有微小联系的人。

斯大林通过断言苏联国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阶级敌人和外国间谍网络，证明他仰仗于恐怖手段的合理性。他宣称，"我们朝着社会主义前进得越深入"，"被打败的剥削阶级的狂暴"就越猛烈，只有残酷无情的警觉和镇压才能对付这些敌人，他臆想这些敌人无所不在。

141

几年间，大规模的镇压没有尽头，秘密警察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使斯大林能够消灭各级党的干部、国家官僚、国有企业的工程师和管理

者，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超过半数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在大镇压中消失。他最令人吃惊的行动是逮捕、审判和处决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在革命的最初岁月里是列宁的合作者，而在这段时间里往往反对斯大林。从 1936 年开始，他们在三次大规模的“摆样子公审”中走上审判台，最后一次是在 1938 年初进行的。经过数月的审讯和折磨，所有人都坦白交代了子虚乌有的“反国家罪”，所有人都被判有罪并被枪决，他们的名字从党史中抹去了，他们的脸从党的领导人集体照中删去了。1929 年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内务部特工追踪并遭暗杀。再没有任何党的领导人可以批评这位独裁者。

斯大林和秘密警察还将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挑选出来加以镇压。他们宣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感染了非俄罗斯的边陲地区的领导层；随后，大规模的逮捕迅速席卷这些地区。对斯大林和对莫斯科的领导层缺乏忠诚的指控就足够致命了，非俄罗斯的老资格政党活动家、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消失在劳改营或集体墓地中，这些人曾在建立苏联多民族体系方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大恐怖甚至蔓延到红军当中，削弱了加强苏联军事力量的种种努力。最初，斯大林支持他的将军们把红军变成职业化的、训练精熟的军事组织，为适应坦克战进行装备，但他后来似乎担心他们对他外交政策的政治影响。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些军官阴谋反对斯大林。证据全是不相干的。然而，即便招供也毫不影响定罪，因为斯大林和秘密警察已事先判定军官团有罪。伴随着 1937 年对 5 名杰出将领的秘密审判——其中包括红军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军队里的恐怖开始了。他们都被判有罪，并被当作外国间谍而遭到枪决。当时所有的军官都有了嫌疑，全体军官团中三分之一的人在一年内被逮捕，许多人被处决，另外一些人被判长期监禁。在国外威胁日益增长之时，斯大林不惜拿国家安全当赌注换取他独裁统治的利益。

一个庞大的秘密警察帝国在大恐怖中出现了，它由监狱和遍布全国的庞大的劳改营网络组成，西伯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劳改营尤其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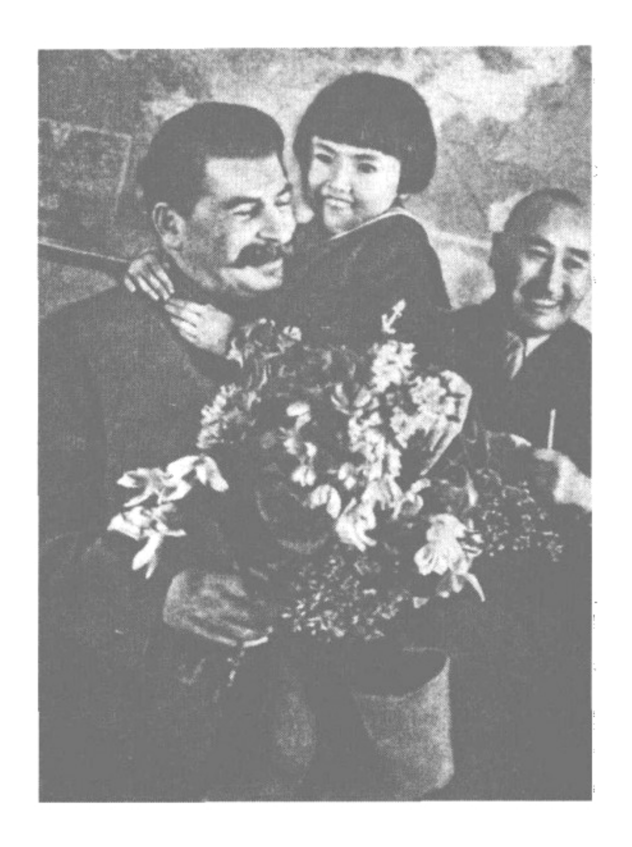
数百万的囚犯在那里劳作，大量的人死于非人的生活条件。对犯人来说，劳改营以其残忍和艰难，似乎是控制整个国家的警察统治的一种极端形式。劳改营自身构成了一个世界，监狱官员像微型国度的暴君一样统治着这里。

142

在大恐怖期间，秘密警察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政治机构。可能意识到秘密警察给其独裁统治带来的潜在威胁，斯大林在1938年逮捕了它的负责人及其亲信。现在轮到他们因妄称的和虚构的"反国家罪"被枪毙了。他不能容忍任何潜在的敌手。新的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由于绝对地臣服于这位独裁者，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斯大林去世。1938年后，恐怖的强度松弛下来，但只要斯大林活着，这个体系就一直存在。

独裁政治延伸到苏联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20世纪20年代对试验的鼓励和对艺术多样性的宽容消失了。国家掌管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教育人士组织，控制着出版和文化作品的传播，它们的审查制度几乎窒息了个人创造性。官方准则取而代之决定着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艺术必须反映"虚构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风格被强加于文学、绘画和电影上，唯一的新主题是颂扬俄罗斯民族主义，赞美俄罗斯自沙皇时代以来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沙皇伊凡四世(Ivan Ⅳ，即恐怖的伊凡)得到了特别温情的对待，因为斯大林非常欣赏他在消灭内部敌人和击败敌对邻国方面的成功。学校里的学习变成死记硬背各种朴素真理的教条活动，这些真理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像沙皇时代一样，教师再次成为教室里的绝对权威，学生再次穿上制服。文化为斯大林主义服务。

评判斯大林革命带来的变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观察者声称，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把苏联提升到世界第三大工业经济体的地位。经济统计数据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数据不能表达这种努力中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真实程度。其他人强调这场社会革命在消灭私有工商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指出所有经济领域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是



苏联人民之父：斯大林，1936 年（Bertram Wolfe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一个新的社会体制横空出世的证据。共产党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批评者称之为由新的党政官僚阶级掌控的行政命令体制。

最严厉的批判则强调它是警察独裁体制。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利用警察控制了党、国家和全体人民。它在某些方面与纳粹德国相似，西方一些观察家们把这两个政权都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强调国家及其领导人对人民拥有超乎寻常的权力。但像纳粹主义一样，斯大林主义不可能全盘控制社会。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很大程度上是立基于作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对苏联体制的观察。

苏联帝国

苏联新领导层不仅要求本国人民，而且要求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服从其意志。斯大林对外国共产党评价甚低，他之所以重视共产国际，主要是因为它能为保卫苏联服务。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部组织

对日本军队的武装抵抗，以便把日军的注意力从苏联领土上转移开来。143 这些外国共产党受命帮助“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

在20世纪30年代的危险世界里，斯大林根据一系列简单的法则指挥着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判定，西方的集体主义和平与调停理想是欺骗性的假象，而苏联则采用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西方方式——强权政治。他在1931年首次说出，并在1934年再次重申的信条是，“在我们时代，没有尊重弱者的习惯；只有强者才会得到尊重”。他在1939年宣称，各国利用它们的力量，在自己的领土周边建立“势力范围”，它们为自己的防卫和利益统治着势力范围内的小国。

他在1931年提出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称，在国际关系中，力量代表着正确。通过吞并相邻的小国或扩大势力范围，一个国家在这种冷酷无情的事情上的成功，会给它带来更多的领土。根据这个基本法则，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尊重”其他强国，接受它们的势力范围。他相信，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阵营”，像内战时期一样，会不可避免地再次进攻苏联，以终结共产主义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但是，这是很长时期以后才会发生的事，当各国(不论它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在势力范 144 围的界线上发生争执时，近在眼前的战争威胁就会出现。这种简单化的、无情的国际关系图景，在其余生里一直主导着斯大林的苏联外交政策行为。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威胁着苏联。在每一种情况下，斯大林都不得不为可能的战争随时准备着，但同时欢迎达成避免冲突和保护苏联安全利益的协定，哪怕是暂时的协定。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在此后的十年里，其军队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苏联的附属国蒙古境内对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红军击退了日军的每一次攻击，让敌军损失惨重。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给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支援。它如此为之，采取的是久经时间考验的权力均衡原则，即“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1941年，日本政府最终断定，它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在太平洋和东南亚，而非在东北亚，至此，苏联才真正摆脱亚洲战争的威胁。同年春，

日本外交大臣提议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斯大林当即接受。他根本不关心日本军队会攻击其他地区、哪个地方，他只求自己的国家能免于战争。

最终，事实证明，纳粹德国威胁更大。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体现在他的所有演说中。相反，斯大林在 1934 年初公开声明，他不认为法西斯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会成为苏联与德国新政权打交道的障碍。“法西斯主义不是问题所在”，他声称，“如果苏联利益要求与无意破坏和平（也就是不攻击苏联）的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条践线。”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盛情。斯大林有充分理由相信，德国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次东进，且德国的目标将是夺取苏联领土和毁灭他的政权。

为了让苏联避免与德国再次发生战争，斯大林试图仿效 1914 年前的《法俄协定》(*Franco-Russian Pact*)先例。1935 年他同意与法国缔结一项防御条约，但该条约从来没有成为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基石，它至多不过提供了德国或许被迫首先在西方战斗的可能性。苏联 1936 年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是想鼓励西方抵抗德国，但法国政府坚持推行绥靖政策，直至 1939 年。

此时，斯大林业已回归到他早前的目标，即与纳粹德国达成协议。他似乎深信自己已搞懂了希特勒扩张主义政策的基本原由，他判定这位纳粹领导人是“资本主义丛林规则”的信奉者，尽管是以极端的形式。根据他的推理，由于两国共同统治东欧，它们之间可以通过瓜分这个地区来避免战争。因此在 1939 年夏，他接受了希特勒提出的缔结互不侵犯协定的价码，它含有瓜分波兰和由苏联控制波罗的海东岸诸小国的秘密条款。斯大林把该协定解释为他的国家可以扩张到这些领土上。1939 年 8 月条约签订后，他派遣红军夺取了波兰东部，并在当年秋天迅速地将之合并到苏联。次年，他的军队入侵波罗的海诸国，把这些国家变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的目标是领土控制和维系对德和平，哪怕这种和平只能持续几年。德国与英法的战争并未让他感到忧虑。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使苏联在这些地域范围里成为一个扩张主义帝国。

重点：共产主义与约瑟夫·斯大林

共产主义植根于19世纪。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哲学描绘了一幅基于其经济、社会和历史理论之上的革命行动蓝图。它成为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灵感之源，这些政党最终通过在自由民主制内部行动而非敌视自由民主制的方式，寻求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核心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拥护者相信，只有暴力革命才会埋葬资本主义，开启劳动群众的自由。

1917年，列宁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转变为具体的造反方案。他的先锋党理论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观点，先锋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独自控制国家政权。他重大的成就是在俄国夺取了权力。

斯大林的贡献是促成了这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他宣称，他强加于本国人民头上的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实现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经济状况平等的预言。他声言，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标志着他的国家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再需要国家，国家自行消亡时，共产主义社会就会来临)。斯大林的社会革命方式，他的独裁政权，以及他为自己统治合法性辩护的原则，成为此后几十年里他的支持者和敌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斯大林自行改造了共产主义。

他对列宁意识形态的修正主要由三方面内容组成，这些内容是自上革命、与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利益的优先地位。他及其支持者提出，由于国家权力处于共产党的控制和支配下，苏联业已完成卡尔·马克思预言的从资本主义走向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从未描摹过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之外的历史进步蓝图。马克思主义者曾猜想，一旦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中人数最多的群体，通过他们的集体奋斗，这种剧烈的社会跃进才能实现。对他们来说，国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它的镇压手段与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是不相容的。列宁无视马克思主义者先前的这种告诫，宣称共产党必须介入

领导俄国人数不多的劳动阶级。斯大林则将马克思主义原则颠倒过来，不是约束国家权力，相反，他领导的共产党极大地扩大了这些权力。

这个革命国家有几项任务。它主要的责任是推行基本的经济改革，确保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突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理论上如此)，而不是私人所有。斯大林在

146

1934 年宣布，由于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国家指令性计划下进行的)，他的国家最终"摆脱了落后和愚昧"。批评者拒绝接受他的论断，否认这样的新秩序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承认他及其支持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通常被称为"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参见第九章"重点：革命和指令性经济")。

共产主义成为指导方针，苏维埃政权根据该方针管理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在公共演说、写作和艺术表现等所有领域都引入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文化创造必须遵循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教条的言论，他们是发现真、善、美原则的正确导师。文学艺术赞美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理想化的人民。宗教信仰和惯习遭到镇压，被贬斥为迷信的旧事物。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要求在苏联生活中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正如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所发展的那样，共产主义权力扩展至国家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其非同寻常的范围可以归结为"三大垄断"：权力垄断(一党制国家)；财产垄断(国有化的工业，集体化的农业和国营的商业)；真理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

共产主义还允诺保障全体人民的幸福安宁。公共教育、住房和保健几乎免费向人民提供，西方所谓的社会福利变成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成要素。尽管服务质量通常十分低下，农民阶层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但这套体系一直是共产主义制度的重要方面。作为交换，人民不得不履行广泛的社会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怕个人牺牲和艰难困苦，为苏维埃国家经济努力工作。民众被要求参加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这些在其他社会要付给报酬的任务在苏联是志愿性的(无论愿意与否)。无所事事会受到谴责，失业在一个工人阶级国家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拒绝工作的人可能会以"寄生罪"被判入狱。

斯大林嵌入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条，是阶级敌人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长期威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设想，资本主义的垮台结束了阶级敌对，而斯大林的观点——在他掌权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不断重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建立会招致苏联敌人的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他预计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破坏苏联，因为它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堡垒和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暂时的结盟可能会缓和两者关系，但两大体系间的根本性敌对是不可避免的。

对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民众来说，斯大林最险恶的思想是，阶级敌人和外国间谍就潜伏在他们中间。他相信，这些敌人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敌人都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孤注一掷的斗争方式是在其注定灭亡命运下的最后手段"。敌对的间谍和残余分子无处不在，只有最大程度的警觉、对嫌疑分子的公开谴责和严厉的警察权力，才能保卫伟大的共产主义成就。警察逮捕有嫌疑的"反革命分子"时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他们的信息是确实可靠的，他们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他们的方法是如此可靠，乃至逮捕本身就足以表明一个人有罪。如果没有检举揭发敌人是嫌疑分子，那么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的家人和朋友就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共产党的成员和领导人，也有可能屈服于邪恶的思想而变成"人民的敌人"。

147

这种妄想狂式的敌特恐惧，是斯大林掌权时代始终存在的警察镇压体系和劳改营的核心。20世纪70年代末，它又出现在柬埔寨(Cambodia)，当时共产党红色高棉(Khmer Rouge)夺取了权力，处决了成千上万的本国民众。每一次，无情地搜寻到的假想敌都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每一次，恐怖都是缓慢地退潮，就像西方近代早期宗教狂热时期的猎巫一样。恐怖消失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维系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团结陷入衰微。

斯大林引入共产主义当中的第三个要素，是所有的外国共产党(后来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需要。列宁曾发起建立了一个组织，旨在支持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斯大林时

代,这个共产国际变成了保卫苏联,而非推动国外共产主义革命的武器。他的论据十分简单:苏联的成就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重要性,其他任何共产主义运动都不能要求拥有与苏联同等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里,当欧洲和亚洲也出现了共产主义政权后,他强迫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遵从这个原则,要求他们为苏联的利益服务,遵从苏联领导人的指令。大多数共产主义政权照做了;但南斯拉夫(Yugoslav)共产党起而反抗,拒绝屈服于他们所称的"苏联帝国"。

后来,当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国家要求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优先时,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分崩离析了。各个国家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真正的信仰,走向了异端,共产主义因此被弄得支离破碎。最终,共产主义从其源地俄罗斯消失了,整个体制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土崩瓦解。俄罗斯人借助来自西方的词汇"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力图理解他们的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该词汇似乎最好地抓住了这个异乎寻常的独裁统治的本质。它曾经统治着他们的土地,它疯狂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社会来遮掩其专制帝国的现实。那种信仰也消失了,留下了人类工程中一场巨大试验失败后的残渣。

日本帝国

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加入了专制帝国的行列。在经济大萧条后的几年里,它经历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变化,从民主体制变成了军国主义体制,外交政策从国际合作转向了扩张主义。导致军国主义的诸种条件深深地植根在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文官统治衰微的直接原因在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经济崩溃。全球性的萧条削弱了日本民主体制的根基,促成了其发动亚洲战争的计划。

148

繁荣与日本民主制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国家看上去正走在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上,始于 19 世纪晚期的包罗万象的政治经济改革到了巩固确立的时候。在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发展出装备着新式工业技术和组织的工业经济体系，并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由上层精英改革者设计和执行的成功方案，强调将西方技术和资本主义方式适度引进到日本社会，这些东西与日本人习于勤劳和储蓄，以及日本政府的高投资率结合到一起，创造出日本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大公司使少数权势赫赫的商业领袖能控制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他们还在政治事务中享有影响巨大的发言权。重要的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尤其是石油和钢铁，制造商把他们的生产技艺用于赢利目的，向国外出口他们的大部分产品，并以此支付进一步的进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工业的福音。西方出口萎缩，日本商人取而代之，向曾经由欧洲公司控制的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它的纺织品出口增加了一倍，商业航运规模也是如此。国外利润滚滚而来，日本不再是债务国，其资本家拥有的海外投资的价值，第一次超过他们欠外国信贷者的债务(美国是另外一个类似地享受战争利润的国家)。日本的黄金储备(至今仍是国民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增加到了战前的六倍，人口增加到5 000多万，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尽管比西方社会仍然低许多。

经济繁荣增强了这个国家民主领导层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仿效英国和德国模式的政治改革，让日本拥有了西方宪政体制的制度机构和法律。20世纪20年代，新选举法引入了男性普选权。此时，日本国会(Diet)里政党的影响与西方民主国家相类似，任命内阁需要多数议员的同意。

尽管类似于西方的内阁体制，但日本政府还有一些独有的特征。在这种体制表象背后，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党的领导人、天皇的顾问和军队将领。内阁职位任命的重大决定来自天皇的顾问；而后，内阁大臣们才转向内阁里的政党寻求支持。成功的政客依赖于大公司财团的资金支持，它们大额的竞选捐助让国会议员和内阁阁僚小心翼翼地注意商业精英阶层的希望。日本陆海军司令部仍然自行其是，周期性地行使着“指挥自主权”，这使他们能在未经文官政府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这三个小群体构成了日本真正的政治精英。

日本政治体系由精英统治和大众民主、商业利益和军事扩张主义

的微妙平衡构成。所有人都一致认可维护国家利益和东亚经济市场的重要性。天皇是象征性的领袖，但在幕后仍然是重大政策决策的重要参与者。他依旧是宗教崇拜的对象，日本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他是太阳神之子。当他批准重要的政府政策时，他们的虔诚变成一种服从模式。在这个“正在升起的太阳帝国”，权力掌握在一小撮为天皇服务的文官和军事领导人手里。

149

20 世纪 20 年代，这种平衡摆向政党统治和经济利益。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建立起一个小型的海外帝国，从朝鲜到中国东北的南部向南贯穿中国境内各处被占领土，一直延伸到台湾，其海军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拥有基地，是那里占主导的海军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内战期间，它的军队曾进入西伯利亚东部。但是，庞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是日本经济沉重且毫无产出的负担，对外征服也引起了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反对。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利益和战略重心促使日本停止军事扩张并削减军费。在 1921 至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代表断定，国家利益要求其同意将日本海军限制在英国或美国海军规模的一半，并下令日本军队从中国北部和东西伯利亚撤出。作为交换，他们将得到西方不在远东地区设立新军事基地的承诺，并使国际上承认日本是东亚的主要大国(参见第四章)。这些协定让日本内阁大幅裁减陆海军规模，日本的帝国主义暂时地销声匿迹了。

只要世界经济在发展，日本政府和商业领袖就能抑制军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声称，和平而非战争，才是促进国家在东亚利益的最佳途径。政治领导人注重工业经济和城市人口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弊端和农业贫困人口。他们的信条得自于当时的一位美国总统，他宣称“政治事务就是生意”。尽管 1923 年东京大地震造成 13 万人死亡并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但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好的时光。工业生产翻了一番，出口贸易欣欣向荣，其中 40%出口到巨大的美国市场，另外 25%出口到中国，尤其是相对繁荣的东北地区，日本与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本大公司将生产规模扩大到如此程

度，乃至它们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企业。一家大型企业在日本国内拥有近百万的员工，在国外同样雇用了百万员工，控制着成百上千家子公司。城市人口增长到接近日本全部居民的50%，工人的实际工资上涨了近五成。在经济方面，这些年是日本的繁荣时期。

大萧条和日本军国主义

世界经济萧条终结了日本的繁荣、文官统治以及和平的对外关系。萧条时代的经济和社会表征在日本生活的各个领域凸显了出来。日本经济成功的重要指针——对外出口，下降到20年代水平的50%。美国市场不再吸纳大量的进口商品。而1930年美国对日本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了50%，进一步缩减了日本海外市场。工人的生活境况急剧恶化，到1931年，他们的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随着稻米价格滑落到生产成本之下和丝绸价格崩盘，农民的收入下降得更加厉害。日本一半的农村人口是无地的劳工，他们的生活条件在繁荣时光都不稳定，如今更是陷入凄惨的境地。 150

这种严酷的经济趋势使文官政府的老弱点暴露无遗，并且给民主统治带来了新的反对力量。在经济下滑开始后，政客与商业利益的勾连让他们的政策信誉全失，天皇周围一小撮手握重权的政治人物不倾向支持文官统治，农村和城市穷人与富人之间旧有的敌视，以对军队的普遍支持表现出来，因为军队是摆脱贫困的避难所。

对武士勇武精神的传统赞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吸引力再次兴盛起来，面向经济危机提供了旧有的解决办法。在此期间，爱国运动(其内含的黩武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极其相似)在日本各地纷纷出现，赋予战争和帝国征服以新的意义，他们的支持者吁求纪律和民族团结，谴责民主体制的领导人，甚或攻击那些告诫外国会加以阻遏的军队领导人。他们要求国家必须由“有勇气的人”领导，这些人拥有强化民族团结和加强日本海外帝国的意志力和坚忍力。这些爱国主义团体发起政治暗杀运动，谋杀政治领导人和立场温和的陆海军军官。他们谴责这些军政领导人是“叛徒”，背叛了日本的荣光和声誉。

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领导层的灵感来源。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从传统的资源、从群众对集权主义领导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中汲取力量。在此等情形下,政治钟摆荡向了军事统治。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表明了日本军队的影响力已变得多么大。日本政府放弃了限制军事行动的任何努力。它诡辩说中国部队在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进犯了日军,以此为军队的入侵行为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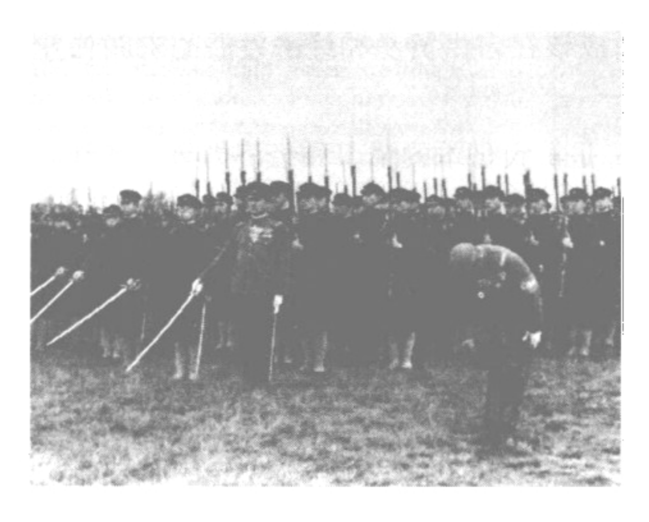
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了谴责,呼吁成员国加强对这个侵略国家的制裁。日本政府对此的回应是退出国联。美国仍然不是国联的成员国,它坚持自己的孤立主义政策,拒绝配合国联的这一决议。诚然,它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进行了公开谴责,但这种姿态只是演戏,毫无效果,反映了美国政策的软弱。

后来,日本政府公然宣布放弃华盛顿会议对其海军规模的限制,甚至在欧洲的凡尔赛体系崩塌之前,20世纪20年代远东的华盛顿体系就已解体。1933年,被称为"满洲国"(Manchukuo)的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帝国的一个傀儡国。

军国主义逐渐主导着日本的政治生活。文官政府从未完全消失,只是成为了掩饰帝国主义政策的窗口。数年间,政治暴力一直是野心勃勃的军官和狂热的爱国者的工具,他们的攻击在1936年达到高潮。当时一些下级军官发动了一千多名士兵,企图推翻文官政府。国家军事领导人选择了反对军事叛乱,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内阁进行统治,维系着宪政统治的外衣。这场叛乱最终被镇压下去,叛乱领导人遭到处决。1937年,全国选举表明,大多数选民支持政党政治反对军事统治,然而,民众的希望对日本政府没有丝毫的影响力。权力已从各政党手中转移到军队将领那里,文官虽继续掌管着重要的政府各部,在外交政策争论中他们代表着和平与妥协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1941年下半年,东条(Tojo)将军成为首相,他在此后的四年里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军界统治了日本。

151

日本政策和领导层的新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对日本的新政体最适当的描述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指的是



日本对在校学生的军国主义教育：东京高等学校的学生们参加民族精神动员周活动，约 1938 年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一种军事领导人占统治地位的情形，它追求军事扩张的政策，它美化勇武好战的文化。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所有这三种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日本的公共生活当中。从民主统治的这种巨大倒退，是受到天皇和大型军火生产公司支持的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们的杰作。在颂扬纪律、秩序和为国献身的运动中，军国主义精神蔓延到整个公共生活中。

尽管变化并非大张旗鼓，而是缓慢地到来，但这种军国主义政体，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治领导截然不同。它在某些方面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相像，但它又缺乏法西斯主义克里斯玛型独裁者和一党统治的基本特征。日本人遵从他们的新领导人，当被号召为国家和天皇利益而牺牲生命和幸福时，他们都予以忠诚的回应。爱国主义是日本人中间一条力量强大的纽带，对勇武好战的尊崇也是。两者共同构成了将民众团结到军事政体统治下的凝固剂。

日本帝国主义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复归于扩张主义，其目标是创建日本政策制定者所谓的以日本为首的“泛亚地区秩序”(Pan-Asianist regional order)，它既包括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渗透，也包括日本对整个地区在陆地和海上的军事统治。日本领导人大肆宣扬他们的计划对其他国家的种种好处。后来，他们又鼓吹，他们力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在日本帮助下

152

摆脱西方压迫者的亚洲人民，应该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宏图伟业中彼此帮助。

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扩大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该计划圈定了一片从未明确界定的广袤领土，供日本陆海军征服和耀武扬威。它强调了日本的战略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日本发动战争手段的局限性。这个方案不求统治整个亚洲和太平洋，但它存在着与苏联和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因为这两个大国的安全利益直接受到了日本建立大东亚帝国计划的威胁。最危险的是，这种政策扩大了日本陆海军的权力，鼓励了陆海军的野心膨胀至这样的程度，即他们的征服除为获取进一步的军事胜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军队领导人帝国扩张的野心未能考虑他们国家真实力量的限度，1945 年，裕仁(Hirohito)天皇在命令他们投降后，亦评论到，他们“太强调精神而忽略了科学”。此时，他们业已让日本沦为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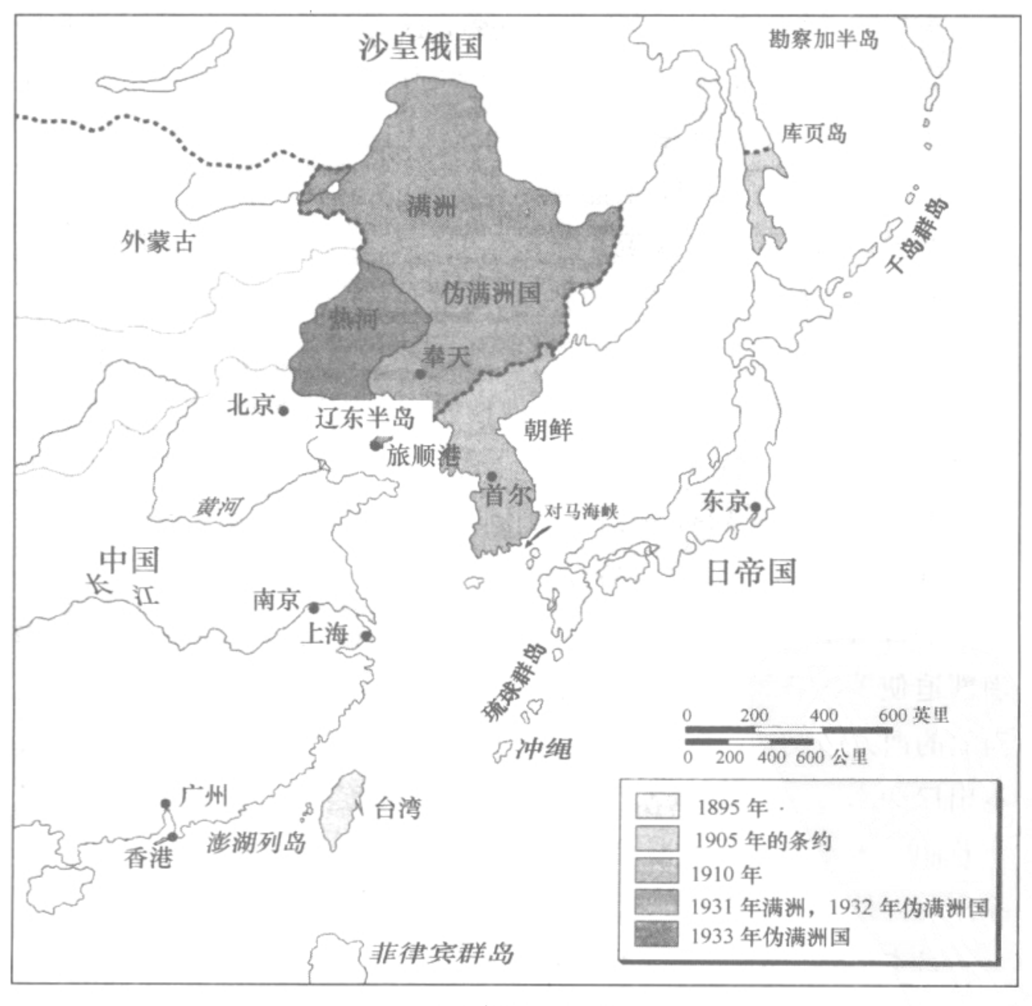
日本于 1937 年全面侵华，迈出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日本政府没有决定征服中国沿海地区，但战地军官们欲击败中国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军事动员和进犯行动进程。陆军将领们组织和领导着这些入侵行动，他们势必要让中国彻底投降。到 1939 年，他们已征服了南至与印度支那(Indochina)交界处的中国沿海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扶植傀儡政权，由中国合作者管理，类似于他们的“卫星国满洲国”。

然而，他们在主要目标上遭到了失败，未能迫使蒋介石投降，把他的残余军队从中国内陆的藏身地逐出去。蒋介石在那里继续担任着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爱国武装力量军事总司令的职务。日本人的侵略激起了占领区群众中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他们中有许多人加入或支持共产党打击日本占领军的游击行动。日本的军事力量尽管控制着城市和铁路线，却发现难以将自己的控制扩展到广袤的农村地区。他们陷入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中。

他们解决困境的办法是发动更多的战争。德国在 1940 年击败荷兰与法国，以及大英帝国军事上的软弱，鼓励了他们如此为之。这一年

晚些时候，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该条约加强了日本主战派的力量。西方在太平洋和南亚的殖民地对军国主义者来说是诱人的战利品。与中华民国接壤的法属印度支那，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为西方军援运抵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提供了一条陆路；荷属东印度(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因拥有油田而尤具重要价值。印度尼西亚各民族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下已生活了三个世纪，他们中的一些早已准备好支持一场反帝国主义反西方的起义。1940 年法国与荷兰的战败让这些殖民地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

由于急切希望征服和结束中国的抵抗，日军将领于 1940 年派兵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他们直接的目标是切断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援助



日本帝国的形成

线路。次年夏，他们的军队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军事方面的行动轻153而易举，因为法国殖民当局几无驻军，立即投降。但在外交方面，事实证明这次行动是日本军界犯下的最大错误。

日本征服整个印度支那最终激起了美国对日本扩张的抵制。这是危险而代价昂贵的行动，此时，整个东亚的势力平衡已完全向日本倾斜。向正与德国交战的大不列颠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视为美国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1941年初，他已将海军从太平洋调到大西洋，组成了大西洋舰队。美国海军虽然早已开始舰队扩编计划，但1942年之前还不能将更多的舰只放在太平洋。美国在非154律宾的驻军孤立无援且力量弱小。正与来自德国的海空攻击殊死战斗的大不列颠，根本抽不出军队准备一场太平洋战争。在与德国的冲突一触即发之时，与日本开战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在距离遥远的两线打一场全球战争。现实主义的立场建议美国忍受日本的征服。斯大林就是这么干的，他在1941年初与日本签订了一项中立条约。

但美国的国际主义政策和它在东亚的战略利益，要求其反对日本公然的侵略行径。只有美国的外交、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横亘在日本统治整个东亚、南亚和东太平洋地区的道路上。甚至从日本进攻中国时起，罗斯福总统的一些顾问就敦促他实行经济禁运，禁止重要的原材料运往日本。这是至关重要的行动，因为日本经济和军事依赖于这些供应。但直至1941年，罗斯福因担心日本报复而反对禁运。无论是姑息日本还是抵制日本，都有充分的理由。

1941年，罗斯福选择了抵制的政策。他认为，日本征服印度支那南部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日本军队从这里可以攻击整个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同年夏，罗斯福批准对包括石油在内的所有向日本出口的商品实行全面禁运，东印度群岛的荷兰当局也终止了对日出售石油。美国国务卿宣布，除非日本结束侵略行为，否则美国绝不会解除禁运。他不仅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而且要求其撤出中国。

日本军方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自己胆大妄为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后果。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让日本的石油进口骤减到以前的10%，日本官

员警告，他们的全部石油储备将在两年内耗尽，除非找到新的国外供应源。日本海军指挥官们提出军事解决办法：入侵荷属东印度。而唯有同时击败英国和美国的太平洋军事力量，这个方案才会成功。日本外交官做出最后一次避免战争的努力，他们提议与美国缔结条约，日本撤出除中国北部之外的所有亚洲地区以换取美国解除对日禁运。但在日本不同意撤出整个中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拒绝结束禁运。就在这些不成功的谈判进行之时，日本军方则紧锣密鼓地策划海陆联合进犯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太平洋的各殖民地和基地。1941年12月7日，他们的攻击开始了，将世界大战带到了东亚。

聚焦：联合舰队司令山本

尽管他真正的姓氏是五十六(Isoroku)，但他是以山本(Yamamoto)之名变得广为人知的。他作为设计日本对美战争计划的日本海军最高司令官而闻名于世，虽然他个人相信这场战争是个错误，日本不可能取得胜利。在日本的领导权从职业政客转向军国主义者手中那些年里，山本五十六(1884－1943)是当时最具天赋的军事领导人。然而，多年来，他一直是日本爱国社团暗杀的目标，这些社团怀疑他对进行扩张主义战争的热情。透过他的生涯，可以洞悉日本崛起为大国以及导致日本在二战中灾难性失败的种种矛盾和过失的缘由。

155



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舰队的总司令，1943年(Stevenson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他的家族许多代以来一直属于日本的武士阶层，他们曾忠心地为自己的大领主服务。19世纪末期，当天皇的顾问们决定创建现代军队时，五十六的父亲成为利益受损者

之一。他丧失了自己的武士地位以及与之相连的财富，而其最小的儿子五十六也不得不自谋生路。五十六选择了由明治改革者铺就的现代道路，进入新型海军学院，成为日本新海军中的一名军官，延续了从军征战的家族传统。而这一选择也让他获得了运作现代海军大型战舰所必需的教育和技能。日本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像山本这样的人的合作。

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极具天赋的海军官员。日俄战争是他首次为天皇服务。在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s)的大规模海战中，日本舰队击沉了整支俄国海军分队，他受伤严重，被授予最高勇士勋章。在此后的数年里，他回到海军高等学院。他在这里接受的训练，部分内容是学习英语，以尽可能地了解美国海军。他的长官们早已预期，他们下一个主要的权力竞争对手将是美国。

他作为海军指挥官的成功，让他赢得了大贵族世家之一山本家族的尊敬。他们没有男性继承人，提议他入赘到他们的家族。在日本社会，这样的提议是莫大的荣耀。他接受了，采用了他们家族的名字，并为了这个家族下一代继承人的香火延续，立即与一位合意的贵族女性结了婚。他尊敬自己的新家庭并以之为荣，恰如他尊崇天皇和"日出之国"一样。日本在外来者看来是一个"家族—国家"，山本就是这个紧密的共同体里的一员。

政治和能力决定了他进一步地攀向日本海军顶峰位置。20 世纪 20 年代初，日本政府选择与西方海军强国合作，签订了《华盛顿条约》，同意裁减其海军规模。一些指挥官强烈反对，称自己是"舰队派"。另外一些指挥官，也就是"条约派"，赞同这项新政策。山本属于后者。

156

在这些年里，他的生涯发生了新的转变。政府提携像他这种想法的军官，委派他到日本驻美大使馆任海军武官。他敏锐地关注美国海军正在进行的海军军备和战略革新，制空权是美国海军战略家中最大的争议和讨论的根源。主力舰——装备着能发射远程炮弹的火炮，在此前数十年里曾是海战中最新式的保证力量。如今，美国海军战略家声言，主力舰的时代已经过去，带有小型机场大小的甲板的大型军舰，

可以装载飞机，穿越重洋攻击离海军力量数百英里之远的目标。山本很快成为把航空母舰作为日本未来海军核心的主要倡导者。

他返回日本，心里装着有关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日本不可能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击败美国，他亲眼目睹了美国军事可以依靠的巨大经济力量；另一个是，只有通过建造航空母舰和飞机，通过训练飞行员和熟练的海军人员，日本在东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才能增长。他准确地道出了航空母舰在此后岁月里的作用，他甚至学会了飞行，驾驶日本工程师设计出的新型零式战斗机。但他未能说服自己的上级、政府或天皇相信美国是难以战胜的。

20世纪30年代，他迅速攀升。日本在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的这些年里，陆军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海军指挥官则在准备与美国开战。1930年，山本在46岁时成为海军上将，他的任务是重建海军。天皇命令他加入备战行动。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一名军官，其职责要求他必须服从。在私下里，他继续警告与美国冲突的危险。但当欧洲战争于1939年爆发和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时，他意识到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作为日本联合舰队最高司令官（1939年得到任命），他的任务是设计赢得这场战争的手段。

他的计划独特巧妙。他获知，美国舰队集中在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这里距日本群岛和日本海军基地远达数千英里。但他相信，在精心掩饰下，航空母舰可以从东太平洋不被觉察地行进到美国海军基地的打击距离之内，其攻击机和鱼雷轰炸机可以从这里出发，对美国军队发动毁灭性的打击，迫使美国在几个月内不得不投降。他没有预料到，驻扎在新加坡的力量微弱的英国军事力量或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会做出任何真正的抵抗。他几乎获得了成功，但还差之毫厘。

他的计划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是那种他本不愿意进行的赌博。1940年下达突袭命令时，他向一位密友解释道："与美国交战就等于与整个世界交战，但既然战争已经注定发生，那么我会竭尽全力战斗。毫无疑问，我会死在我的旗舰的甲板上，东京也会被焚为平地。"他的个人信念无足轻重，在一个绝对忠诚于天皇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他，根本

157

没有任何抗拒不从的方法。像所有日本臣民一样，他坚信天皇的决定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生涯尽管与军国主义者强加在他们国家身上的残酷扩张主义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极端形式的军国主义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占过一席之地。正如他理解的道德选择，他别无他路可走。他在战争中殒命，不是在自己的旗舰上，而是在 1943 年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一架飞机上。他对东京的预言也应验了，在 1945 年的空袭和大火中它被焚为平地。

小　结

自经济大萧条开始以来的十年里，西方世界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化。两个强大的独裁政权出现在纳粹德国和苏联，它们在对波兰的战争中的合作，标志着欧洲均势格局的重大转变。

到 1939 年，西方政客们艰难地拼凑出来的和平解决方案已名存实亡。欧洲各国没有选择强制执行这些协定，部分是因为不愿意冒新战争的危险，还有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国家遭到了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削弱。这一年爆发的战争，将不会是由欧洲国家自己结束，而是由这些国家两边的超级大国结束。这场新世界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力，乃至它们建立在亚洲的帝国也随之失去。亚洲的战争对新均势格局的形成有着与欧洲的战争同等的重要性。

德意志和日本帝国的崛起以及苏联的扩张，标志着帝国时代的新阶段。这些国家被专制政权统治着，它们对待被征服民族比西方殖民帝国要残酷得多，它们一意孤行的目标就是强化自己的独裁政权和国家。纳粹的这种政策包括把犹太人从他们的国家驱逐出去和最终灭绝犹太人口，斯大林主义政权则利用监禁或处决，从肉体上消灭假想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恶毒谴责时常出现在它们的公开声明中，日本宣称要推动亚洲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声言，他们国家民族共和国的联邦体制给这些民族带来了真正的民族解放，是世界各地被殖民民族的榜样。但现实情形迥然

不同，所有这些土地皆沉沦在专制帝国的统治下。

本章大事记

1922年　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政权
1928－1932年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9年　斯大林独裁统治
1931年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
1932年　日本退出国联
1933年　德国纳粹上台
1933年　德国退出国联
1935年　纳粹颁布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律
1936－1939年　西班牙内战
1936年　德国重占莱茵兰地区
1937年　日本全面侵华
1938年　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
1936－1938年　斯大林的"大恐怖"统治
1939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和瓜分波兰
1940－1941年　日本征服印度支那
1941年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
1941年　日本向太平洋上的英美军事力量发动进攻

推荐阅读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 Williamn S.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wnd ed., 1984)。对变成纳粹堡垒的一座小镇的引人入胜的近距离透视。

* Joachim Fest, *Hitler* (1973)对希特勒在创建纳粹主义中的作用进行了最好的研究。

* Richard Overy,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90)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做了精彩而扼要的分析。

斯大林统治的苏联

* Robert Conquest,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1991)。这个深藏不露的独裁者最佳的简短传记,偏重描述他的政治生涯。

*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Civilization* (1995)是对斯大林时期的大型工业工程项目之一的精彩描绘,以简略的形式卓越地透视了斯大林革命的苦难和激情。

日本帝国

Ia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1853 –1964* (2003)。对从明治改革到战后时代日本的简短的阐释性的回顾。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50)全面研究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和日本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

Edwin Hoyt, *Yamamoto: The Man Who Planned Pearl Harbor* (1990)生动而带着同情态度地描述了日本这位最伟大的海军指挥官的生平。

回忆录和小说

* Lydia Chukovskaia, *Sofia Petrovna* (1991)。描述恐怖对一个普通苏联妇女毁灭性影响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 John Scott, *Behind the Urals: An American Worker in Russia* (1942)。一个年轻美国人的回忆录,他志愿到苏联新兴工业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作。

* Alexander Solzhenitsyn, *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1964)。对斯大林主义集中营经历的文学性描述,由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撰写。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

159

- **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
- **大同盟形成**
- **轴心帝国的战败**

重点：国际主义

聚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范围和影响上都是真正的全球性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它前所未有地将世界各民族都拉到一场大规模的、恐怖的行动中，各个大陆的国家都被卷入，其战场散布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各处，其海上战斗扩展到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面和水下。英雄主义不再是战场士兵独享的特权，遭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抱持着争取解放、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军队向妇女开放了军阶，尽管她们仍然不是战斗士兵，但也不再仅是军队的临时工作人员和家庭的保护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新的军事技术提升了军队的机动性，使飞机成为海战的关键元素以及将战斗延伸到前线大后方的重要手段。到战争末期，一枚原子弹就能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人类的智慧发明，把超乎寻常的毁灭性武器交到了政客和军队指挥官手里。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破坏了旧的均势格局，它们的征服给这些地区的人口留下了深刻印记，抹去了旧有的边界，推翻

160 了既有的政府。欧洲的纳粹新秩序和亚洲的日本帝国都在被它们征服的人民中间寻找支持者。纳粹招募法西斯分子和支持者为军队服役、补充政府部门,而日本则选择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统治前西方殖民地。它们从被征服民族招募军事和文职人员的成功,给我们的战争语汇增加了一个新词:通敌者(collaborator),也就是给德国和日本占领军为虎作伥的人。

联合起来反抗轴心帝国的是同盟国的国际联盟。它们结盟是轴心国侵略的结果;它们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击垮它们的敌人。同盟国的军事胜利最终证明,较之战后和平的政治协定,击败敌人这个目标更容易实现。到 1944 年,同盟国的军事胜利已使形势趋于明朗,即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很快就将击败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彻底击败轴心国的短期目标——概言之就是使其无条件投降——上达成了一致。

他们在战时的讨论表明,在形塑稳定的和平方面他们面对着多么巨大的困难。后来,西方批评家指责英国和美国领导人,未能迫使对西方盟友深深怀疑的斯大林同意恢复欧洲各国战前的政府。但这些批评家忽略了西方力量的有限性、苏联的战时力量和此前被占领土地上出现的强大的革命运动。随着战争走向结束,一条新的边界正在形成,这条边界把苏联解放的土地和西方解放的领土分割开来。新降临的和平,像之前的战争一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如今,从事后来看,我们意识到这是 20 世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当时,这场战争像前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看起来很可能是一场更大的全球冲突的序曲。

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

到 1942 年,欧洲的格局已面目全非。通过军事征服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无情统治,新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了。除了逃离德国侵略,保存他们被占领国家获得再生希望的流亡政府外,民族国家的老边境对大部分人而言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意义。在日本的监护下,前西方殖民地变成

了独立国家,尽管它们的领导人在现实中必须与新宗主保持合作。1941年末日本攻击珍珠港后,美国加入同盟国行列,但在1942年,它的军事力量对战争进程还几无影响。这段时间是轴心国在世界的巅峰时代。

征服欧洲

1939至1940年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以德国迅速的军事胜利为开端。在得到苏联中立的保证后,德国军队到1939年9月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波兰军事力量。英法尽管已向德国宣战,但没有发起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拯救波兰。1940年春,希特勒将他的军事力量指向西方诸国,在又一次快速的胜利中,德国军队征服了西欧,在六周时间里击败了法国。到1941年初,纳粹德国控制了北起挪威南至西班牙边境、西起低地国家东至苏联边境的大陆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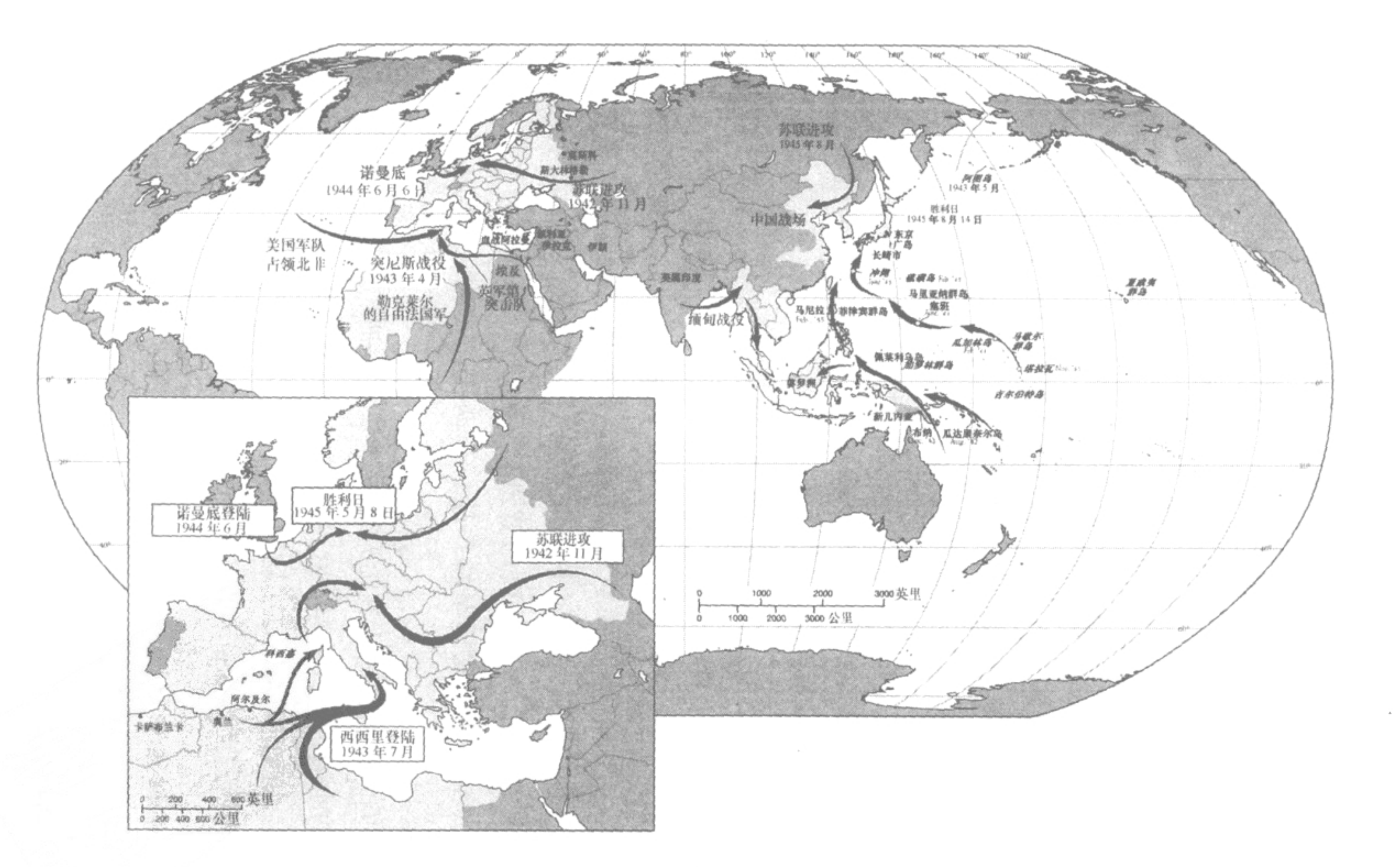
162

英国孤军奋战。这个遭到围攻的国家,依靠其海军和空军抵抗着德国的入侵。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誓言要"在海上、在陆上和在空中"战斗到底。"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ish)这年秋冬之季在英国上空展开。皇家空军成为胜利者,挫败了希特勒入侵英伦诸岛的计划。然而,英国依旧处于命悬一线的境地,它的商船被德国潜艇大量击沉,它与自己的亚洲帝国的战时通讯联系几乎中断。英国人至多只能寄望坚持作战一到两年,直到新的盟国加入对德战争。

1940年,随着意大利加入战争,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更加壮大,来自东欧的小国也加入纳粹阵营,第三个轴心大国日本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与各法西斯国家签订了防御条约。德国在东西欧的征服,使纳粹德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帝国。

徘徊在中立和战争之间的美国

随着德国力量的增强,美国的孤立主义逐渐减弱。对于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未有过许多美国人心怀的



欧洲和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种强烈反感情绪。他作为威尔逊国内和战争政策的支持者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作为海军部长在战争谋划中非常活跃。他坚信,美国必须在世界政治中承担积极的角色,这个主张是1900年初由他的家族成员西奥多·罗斯福最先坚决捍卫的。像威尔逊一样,他把英国视为重要盟友,它的失败将构成美国的灾难;然而,他不是像威尔逊那样的坚决的国际主义者,他似乎认为,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对和平更加意义重大,而非国联这样的国际性论坛。作为一位灵活的政客和公众人物,从美国国会否决威尔逊提交的《凡尔赛和约》一事中,他领悟到注意国会和美国选民意愿的必要性。在外交政策中,他不断努力在可达到的目标与希望达到的目标之间实现调和折衷。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国内改革以及由新政(New Deal)计划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外交事务一直居于次要地位,直至欧洲冲突再次威胁到美国安全和经济活动。

欧洲战争的第一年,罗斯福被迫要直面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国会对1939年战争爆发的第一反应,是重申其不卷入欧洲冲突的政策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国会曾通过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美国军用物资,或使用美国商船与交战国进行贸易。罗斯福因此不得不宣布美国在1939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随着德国人的征服范围急剧扩大,罗斯福开始出言声讨孤立主义,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他担心美国的安全所受到的战略威胁,尤其是1940年德国在西欧取得胜利后。他警告说:“如果英国倒下了,轴心国家就会控制各大洲,并处于有利位置,可将巨大的陆海军资源指向这个半球。”1940年,他下达了和平时期的征兵命令,欲再次壮大美国军队。1941年初,他创建了大西洋舰队。这是美国自1918年来在大西洋的第一支海军力量,因此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由抽调自太平洋舰队的舰只组成。

163

这一年年初,罗斯福促使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向英国提供军备。这个词汇表示这是一种直接的商业交易。选择该词汇是出于安抚美国国内势力强大的孤立主义运动的需

要。该法案实质上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用美国的军事支援增强英国虚弱的战力,英国政府最后也确实按这批战争物资被估定的价值向美国政府付了款。1941 年春,美国海军将自己的战区扩大到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这让海军舰只可以保护驶往英国的美国船只免受德国潜艇的攻击。是年秋,罗斯福授权美国驱逐舰攻击和破坏在大西洋活动的德国潜艇,美国与德国已走向了不宣而战的海上战争。

罗斯福针对德国的类战争举措主要基于安全和势力的考量,尽管当时他在捍卫英国的战争中还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对美国公众来说,国际主义的话语比维持均势的话语要容易理解得多。他就国际事务最成功的演讲,是以理想主义的语汇讨论了欧洲的战争。为了赢得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罗斯福在演说中表示反对纳粹给"各国的宗教、民主和善意"带来的威胁,他誓言美国支持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即宗教、言论、安全和免于匮乏四大自由。像之前的威尔逊一样,罗斯福谈论欧洲冲突使用的语汇,大力强调捍卫民主体制,略而不提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1941 年夏,他让丘吉尔同意了《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它承诺两国在"最终击败纳粹暴政"之后,致力于"为世界创建更美好的未来"。但宪章当时没有组构军事同盟。国会大多数议员仍然反对对德战争,许多美国人认为,对美国当务之急的利益而言,与日本之间日益增长的冲突危险应该比欧洲战争受到更大的关注。英国不得不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德苏战争

苏联成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盟友。尽管在 1939 年击败波兰时它曾与德国合作,但这两个国家彼此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和东欧势力的争夺者。斯大林充分利用了 1939 年与德国签订的秘密协定(参见第五章),吞并波兰东部领土,夺取波罗的海沿岸独立的小国。这些只是他战备的组成部分。在南方,他迫使罗马尼亚政府允许苏联兼并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在北方,芬兰政府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将东部领土割让给苏联的要求之后,苏联军队在 1939 至

1940年的冬天向芬兰发动了攻击。尽管芬兰军队与红军相比十分弱小,但它巧妙地战斗,抵挡住了苏军的不断攻击。它英勇的抵抗拯救了芬兰,使之免于像1940年末的波罗的海诸国那样被强行并入苏联。但苏联军队最终赢得了上风,后来签订的苏芬和平条约要求芬兰把卡累利阿(Karelia)地区割让给苏联。这些军事行动给了斯大林一种摆脱了德国入侵的虚假安全感,因其预料希特勒一旦击败西欧各国就将对其发动进攻。

在短期内,斯大林不顾一切地安抚纳粹德国。1940年,他的政府与德国签定了贸易协定,向德国输送重要的原材料,其中包括德军在西欧战争中必需的石油。苏联政府按照条款忠实地执行协定;而纳粹从未给苏联输送过他们先前许诺的商品。此外,苏联西部的边防军得到命令,不许有任何刺激德国军队的举动。斯大林相信,德国军队将领会是东部战争的主要煽动者。1941年春,对来自苏联间谍和英国间谍的关于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报告,这位苏联独裁者斥之为“英国人的挑拨离间”。他不能想象正在西部作战的希特勒,会在这一年进攻他的国家。红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并受到生产能力强大的工业经济的支撑,认为希特勒也实践这种现实主义强权政治的斯大林,根本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由于他的命令就是法律,苏联因此毫无准备地被卷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当中。

164

实际上,没有任何因素会动摇希特勒在这一年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决定,他对共产主义的疯狂敌视与对犹太人的敌视一样强烈。1940年秋,他下达命令,要求动员德意志帝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庞大资源,用于针对苏联的“闪电战”(blitzkrieg)。在绵沿2 000英里的边界线上,部署着400多万士兵,配备着1万辆坦克和5 000架飞机,计划在3个月内取得胜利。1941年6月22日,轴心国军队侵入苏联。

进攻最初取得的胜利,超过了德军指挥官最狂野的希望。两周时间里,苏联前线防御就被摧毁了,德军坦克部队业已渗透到苏联领土深处,他们一路上俘获了成千上万的红军战俘,苏联空军亦遭毁灭。许多残余的苏军师团已被分割包围,绝望地战斗,或士气低沉准备投降。空

袭让铁路线陷入瘫痪，成千上万的难民身陷战区。到初秋时分，轴心国部队已攻占了乌克兰大城市基辅(Kiev)，进至列宁格勒(Leningrad)郊外并迫近莫斯科(Moscow)，德军的闪电战似乎接近成功。

7 月初，当军事灾难的程度变得清晰时，斯大林终于积极地承担起动员苏联战争努力的领导职责。他接掌了政府首脑的位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oviet Council of Commissars)主席，并创建了紧急战争委员会。以前他只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在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中，他请求苏联人民在他所描述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要不惜做出一切牺牲。他在演说中把他们称作“同志们，兄弟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

爱国主义是他赢得苏联人民支持必须依赖的力量，而警察国家体制则用来惩治那些不理会他吁求的人。他下令苏联士兵坚强地抵挡德军的进犯；“绝不退后一步”是他的命令，逃避职责投降的士兵被定为叛徒。1941 年夏，他大儿子因战斗机被击落，沦为德军战俘，他没有做丝毫努力去救儿子的命。同年晚些时候，他接到德国人的交换战俘提议，用他的儿子交换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里的几名德军高级军官，他断然拒绝了。在那场战争中，他没有给人的弱点、怜悯心或同情心留有任何余地。

德军的攻势一直持续至晚秋。到 10 月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的全部领土都已陷落，苏联人损失巨大，共计约 200 万人伤亡，坦克和飞机大多数被毁。但红军找到了新的后备部队，大量部队从不再受日本战争威胁的西伯利亚源源抽调而来。此外，冬季严酷的寒冷天气成为红军的盟友，阻滞了德军的推进。12 月，苏联军队在中央战区的前线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反击战，莫斯科得救了，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第一次失败。像 150 年前的拿破仑一样，轴心国未能速战速决，但其战线仍远远地保持在苏联境内。

165

全球战争的精神支配着希特勒。尽管深陷在东线的军事行动中且并没有任何外交义务的约束，但这一年 12 月，在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三天后，他向美国宣战，从而把欧洲和亚洲的战火连到了一起。他的行动让罗斯福联合英国参与欧战的希望实现了。在西线，

对英作战包括在英伦诸岛周边的潜艇战和对英国各大城市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北非,隆美尔(Rommel)将军的师团前来援助意大利部队,与埃及的英军展开战斗。1942年初,隆美尔的部队开始进攻,意在夺取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在中东地区建立德国的附属国。

东线仍然是欧洲的主战场,军事行动在从北极圈向东南延伸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展开。德军及其盟友在这条战线上保持着100万的兵力;尽管在1941年的失败中遭到削弱,但苏联战斗部队人数超过200万,且规模还在不断增长。战斗的残暴让人类的同情心荡然无存,许多在1941年被俘的苏联军人,几乎没有受到德国人的任何照顾,死在了关押他们的战俘营里。德军封锁列宁格勒,力图让这座城市弹尽粮绝而投降,这年冬季它变成了一个冰冻的荒原,没有食品或暖气,其中数以万计的居民在饥饿和寒冷中死亡。

为了取得对苏联的胜利,在1942年夏发起的新攻势中,希特勒命令他的将军们准备从苏联中部向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和里海油田(Caspian Oil)进攻。南面就是中东,他希望隆美尔取胜,与北面的德军实现会师。这个被命名为"蓝色行动"(Operation Blue)的计划,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设想,远远地超出了德军的战力,业已接近疯狂。计划开始时,德军的战斗能力和红军的弱点加在一起,使得最初目标得以实现,到9月份,轴心国的军队已抵达高加索山脉,其他部队攻到了伏尔加河(Volga River)下游的斯大林格勒市(Stalingrad)。然而,他们未能在南线击溃苏联军队,苏军大多数部队早已远远地撤到伏尔加河对岸。胜利仍然踪影难觅,希特勒依旧要解决他所仇恨的敌人,对他来说,斯大林格勒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尽管最初不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他选择了要夺下它。在这座远离东部德军主战线的城市里,运动战变成了街道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直拖到了这一年冬季。

德意志帝国

到1942年底,欧洲大陆几乎全部落入了纳粹德国及其盟国的统治下,从大西洋沿岸向东至俄罗斯中部,从北冰洋到地中海,都在德国新

秩序的统治下。它部分是依靠与同盟国家以及与支持纳粹德国的政治运动的合作。直至 1943 年,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一直构成了德国最重要的盟友,它的军队战斗在北非、巴尔干和苏联。在法国,一部分法国领导人与德国合作,德国人在法国南部给他们留下一个国家,首都设于维希(Vichy)。战败的最初几年里,大多数法国人都屈从于德国的统治。类似的合作主义政权还存在于荷兰和挪威。

166

在战争刚开始甚或战争爆发前,东欧的一些国家就已与德国结盟。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都协助德国的战争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是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希望分享德国胜利的战利品。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向德国的行政管理机构提供合作人员,参加党卫队分支队的志愿者人数与日俱增,让东欧人四分五裂的民族和政治仇恨也有利于德国人。乌克兰人作为警察、行政人员和士兵帮助德国,乌克兰士兵与战前曾强加给他们巨大苦难的共产党人战斗。在南斯拉夫,纳粹鼓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加入他们,允诺战后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反对他们的是在森林和山区打击德国人并向盟国提供帮助的抵抗力量,但尽管如此,合作者还是很好地协助了德国人控制被占领的欧洲地区。

德国新秩序的主要特征是盘剥被征服的领土,整个欧洲都在纳粹领导人的安排处置之下。法国农业帮助供应德军军粮,以及维持德国国内舒适的生活水平;被占领欧洲地区的工业生产增加了德国的经济资源,向德国军队供应军事装备。德国当局把欧洲的劳动人口用于他们的需要。德国工人必须到军队中服役,为了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纳粹从其他国家把劳工调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里,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100 万以上的男女劳工从乌克兰运到德国,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 30 多万人,从法国运来 100 万人,共计有 500 万强迫劳工。德国把被征服民众变成受自已奴役的民族。

这种压迫性的政策给波兰民族和欧洲犹太人带来的打击最为酷烈。波兰又一次不复存在,它西部的大部分领土被德国吞并,波兰居民被迫放弃一切移居东部。中部地区则成了总督府,一个向德国商人开

放的区域,供他们前来开发,并为他们提供波兰强制劳工。该地区的经济资源流向德国,用纳粹领导人戈林(Goering)的话来说就是,仅留下“绝对最低的限度,供波兰居民维系低水平的、勉强的生存”。

在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这些种族主义政策趋于非人道的巅峰。纳粹的反犹主义构成了全体纳粹党员强有力的纽带,并在东欧各民族中找到了支持者,欧洲600万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定居于此。纳粹寻求最快捷的方式毁灭这个被仇恨的民族,1940年犹太人开始被迫迁居犹太人聚居区,但希特勒对这里因疾病和饥饿带来的缓慢死亡深感不满。在德军铁蹄席卷苏联西部时,特别党卫队处决小分队遍布整个地区,处死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然而,这些办法在他看来仍然不足以使欧洲“犹太人绝迹”。

纳粹的解决办法是下令对全体犹太人实施系统的、大规模的灭绝。1941年末,希特勒批准了被纳粹党领导人命名为“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政策,并于1942年开始执行。执行这种疯狂政策的工具是现成的——党卫队组织,其成员都宣誓过绝对服从命令。被占领欧洲的全部犹太人由火车运送到波兰领土上的特别集中营里。这些都是灭绝营,按照与牲畜屠宰场的工业效率相同的标准组织起来。火车一般都在晚上到达集中营,卸下满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大多数人马上会被赶入一个密封的特别建筑里,被毒气杀害,他们的尸体被焚尸炉焚毁。剩下的仅是从受害者身上扒下的堆积如山的衣服、金牙、头发和其他物件。一些囚犯暂时得以生存,作为强迫劳工从事劳动,直至轮到他们被毒杀。

167

1942年,当有关这些集中营存在的报道开始传到西方时,人们起初不相信,包括犹太人也不相信这样的消息。面对日益增多的大规模屠杀证据,同盟国领导人公开警告德国关闭这些死亡集中营。然而,他们对战争的优先考虑压倒了拯救犹太人的军事努力,直至战争末期,也没有任何盟军空袭瞄准集中营的设施或铁路线。

直到战争结束,“最终解决方案”仍在进行中,犹太人微不足道的抵抗根本阻止不了党卫军。1943年华沙犹太人聚居区残余居民的起义,

构成了一幕毫无希望的英勇绝地反击。到战争结束时,500多万犹太人遭到灭绝,成为纳粹疯狂的种族主义和德国人道德怯懦的牺牲品。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种种族灭绝政策产生的环境和原因,这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象,恐难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德国的新秩序撕裂了旧欧洲及其民族和国家,这个大陆再也不能复归到以前的状况。

日本帝国

在迫切需要东印度群岛石油的推动下,以及幻想在东太平洋取得伟大胜利的拉动下,日本战争领导人迫不及待地走向战争。1941年12月7日,他们启动了自己的军事征服计划。该计划要求日本海军飞机发动一系列奇袭,毁灭英国在新加坡的太平洋舰队和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接下来,日本陆军将侵入菲律宾、东南亚的英国殖民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对珍珠港的袭击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主力陷入瘫痪,只有当时正好外出演习的三艘航空母舰躲过一劫。同一天,日本飞机炸沉了两艘英国战舰,它们是新加坡要塞唯一的海军防护力量。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日本控制了北起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南至澳大利亚附近珊瑚海(Coral Sea)的太平洋区域。

海军胜利为日本陆军的军事进攻开辟了道路,大英帝国的新加坡要塞在1942年2月的突袭中陷落,守卫部队的投降终结了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日军俘获9万战俘,他们中有许多士兵都来自印度。是年春,日军完成了对荷属东印度的征服;5月,在美国有史以来遭受的唯一一次最惨重的失败中,最后一支驻菲美军投降。日本军方残酷地对待被俘的西方军队,他们将战俘视为事实上的奴隶,不给他们供给充足的食物并将其当强迫劳动力使用。日军迅速征服了泰国、马来亚(Malaya)和缅甸,并准备从这里进攻印度东部的英军。在半年时间里,日军征服了有1.4亿人口的领土,在此过程中毁灭了东南亚的西方帝国势力。

168

日本政府利用占领军和愿意与征服者合作的当地政治领袖统治这些被征服地区。在整个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取代了消失的西方人管理

着这些被占领的土地。荷属东印度变成印度尼西亚,其行政机构由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Sukarno)领导;缅甸成为典型的日本附庸国,后在1943年得到正式的独立;在菲律宾全境,日本人从地主精英中寻找愿意合作统治民众的、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们给予在新加坡陷落中被俘的印军战俘加入印度国民军的机会,让他们攻打印度边界的英帝国军队,向他们许诺说胜利会给印度带来独立。数以万计的印度战俘自愿加入,其中许多人仅是为了逃脱死于战俘营。民族解放的承诺和1942年的军事胜利,为日本赢得了各被征服土地上的民族主义者的合作。

中国依然是最大的战利品,但日军没有能力取得胜利。在征服了中国北部和中部的沿海地区后,日本政府扶植通敌卖国的伪政府,来自中国国民政府的叛变者接受了日本的诱饵,成为中国中部傀儡政权的傀儡领导,定"都"于国民党过去的首都南京。1942年,日本进一步的军事胜利,促使几个中国军队将领率领近50万部队叛离国民党,投靠南京政权。到战争末期,南京政权的军队规模增加到近100万,它在针对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中协助日军。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境内的这场战争,是1911年清帝国倒台后的内战的另外一个篇章。

日本的亚洲帝国计划覆盖整个被征服的地区。东条政府沿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一直扩张到中国,邀请它们"通过相互合作"加入"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共同繁荣和安宁的秩序"。但这个诺言从未实现,发动战争是日本的优先选择。日本帝国的以及由通敌合作者统治的各国的资源,服务于日本军队的需要,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为日本海军提供燃料,粮食供应则流向日本军队和母国各岛。这种经济盘剥使当地民众产生敌意,激起各国纷纷出现了抵抗运动。后来,当美国针对日本海上运输的潜艇战使海域变成战场,将日本占领的各国彼此隔绝开来后,被占领各国之间的贸易萎缩了。针对盟友的战争,而非"共荣",是日本占领政策的主要特征。

尽管他们的陆海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日本统帅部却不能

让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到 1942 年中期,美国太平洋舰队业已恢复到对日本海军发动攻击的水平;在中国,日本对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发动的围剿运动未能终止游击战;日军继续向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他们半数的海外军力陷在中国的战争里,对长江上游的陪都山城重庆毫无办法,蒋介石也不会投降。无论是德国的军事胜利,还是日本陆海军的巨大征服,均未能给帝国带来他们领导人苦苦追求的最终胜利。

169

大同盟形成

1941 年末,反轴心国的联盟开始形成。德国对美宣战给了英国和苏联在欧战中急需的盟友,英国和整个不列颠帝国也在与日本交战,但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挫败德国上。"大同盟"(Grand Alliance)形成了。

西方盟国与苏联在诸多方面都毫无共同点,它们在不同的战线上战斗,它们追求的是不同的战争目标,它们的政治体制是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差异产生了理解的障碍,是它们严重分歧的缘由所在。但通过举行外长会议和国际会议,盟国在一系列目标上逐渐达成一致,这些目标为军事合作以及为欧洲和东亚的战后重建确立了基本原则。

重点:国际主义

和平应该遍及各国,这个梦想存在的时间,与现代国家发动战争的历史一样长。19 世纪,西方文人和政治领导人力图让人权和民主构筑成确保国家间和平的新工程,他们的国际主义理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平倡议的基础。那场战争带来的悲剧性破坏和生命损失让许多西方人相信,这样的冲突不应该再次发生,它应该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但这个梦想欲得到实现,必须立基于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上。尽管威尔逊未能让自己的计划赢得美国国会的支持,但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稍稍调整的形式重新复活了这种和平世界观,它引导着他制订战后国际秩序的计划。

罗斯福的和平倡议从国际主义的核心观点里汲取了灵感。他带着

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倾向于支持拒斥势力均衡原则和自 17 世纪以来就主导着外交关系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原则的战后安排。改变这种体系意味着要改变各国解决争端和维系国家间和平关系的整个程序。

那些捍卫传统国际关系体系的人把自己称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宣称，国家外交政策必须以各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实力为关注中心，而不是以普遍和平的梦想为焦点。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的过程往往是主权国家间的斗争，因为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或约束性道德法则限制国家的行为。政府可以期求得到他国的善意和合作，但它必须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可能会威胁其和平安宁而时刻准备着。

170

这些现实主义者提到的战争原因，首先是一些领导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滥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在牺牲外国利益时；其次，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系列特殊的需要和目标，它们有时会与其他国家的需要和目标产生竞争。这些国家利益主宰着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致使国家有时不得不与利益跟自己有冲突的他国对抗。政府可能希望谈判和妥协能解决这些争端，但利益的最终捍卫，保卫人民和领土，首先必须依靠其在战争中护卫自己的能力。现实主义者几个世纪来一直声称，国家应该是这些利益的最终裁决者，他们所谓的“国家理性”是国际关系唯一的理性基础。他们认识到，一个强大的侵略性的国家，可能会利用“强权政治”，也就是威胁会使用或已使用军事力量发动侵略战争，寻求统治甚或毁灭其他国家。为了应对这种危险，他们相信，反对这种危险国家的国家同盟会维持稳定的力量均衡，也就是平衡优势国家的力量，从而阻止它的侵略性政策，但各国仍然必须为战争作准备以应付不测事件。

国际主义批评家认为这种战争预防是难以容忍的和不道德的，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得到证明。他们谴责现实主义者的假设，即国家间的争斗注定永远存在。他们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对人权的强调)以及 19 世纪加强了国家间贸易和金融合作的经济趋势中找到了灵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他们必须

成功地阻止战争的信念，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已变得如此之大，乃至没有任何真正的胜者或败者。对民主体制的信仰使他们深信，大多数人是理性的，能够理解各国各民族拥有的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如果确立健全的民主体制和防止侵略机制，战争就能够被阻止，至少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现代国家曾终结了封建战争，国际主义者建议针对国家间战争如法炮制。

19 世纪给他们提供了特别的理由，使他们相信自己的计划是可实现的。民主体制的扩展把权力交到了广大选民的手里。他们声称，人民有了坚实的基础，去反对那些阴谋发动侵略的政治领导人，因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会在战争中遭到惨重损失。国际主义者相信，经济界领袖们的利益也是和平的保障，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日益成长的条件下。他们期望，经济利益和共同观念将联起手来，在西方各国创造出开明理智的公众舆论。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将军或独裁者，是冲突的可能祸源，他们必须受到限制，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国际合作。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必须一致同意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它们团结起来就会制止侵略。但它们还必须准备集体行动。单个国家的主权有时必须服从反对侵略者的集体行动的需要，为了维护国家间的和平，这种牺牲完全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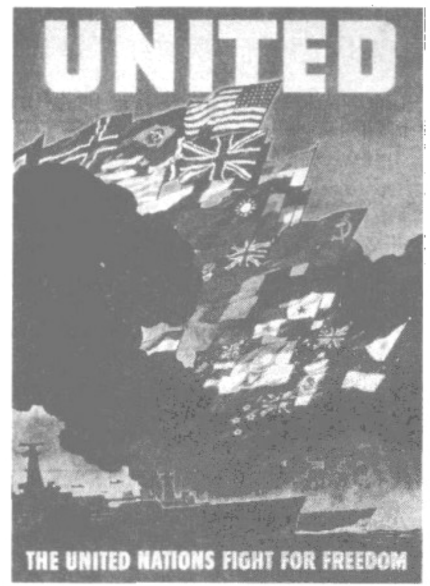
171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让国际主义成为其外交政策核心的第一位大国领导人。早在 1916 年末，在呼吁欧洲交战各国结束战斗时，他就清楚地阐释了自己的未来设想。他曾说道，“公正而安全的和平”，将会终结“有组织的敌对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依靠势力均衡条件以维持国家间和平的框架来维持的。最重要的是，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必须承认各民族有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这些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民族自决”是和平政府的基础。最后，这些政府必须准备在一个负责解决国际争端的组织化“各国共同体”中进行合作。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提议，是战争带给西方的灾难呼唤出来的提议。

威尔逊构想了一个富有远见的计划，该计划并没有随着他在战后的政治挫败而消失，国联让他的思想鲜活地存在着。威尔逊主义

(Wilsonianism)是美国政治领导人经常用来指涉国际主义的词汇。富兰克林·罗斯福复活了它的基本要素,他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吁求美国人民接受这场新战争带来的可怕牺牲。他许诺说,战争胜利的结果将恢复自由,让世界各民族继续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不复存在,但同盟国在二战结束时同意建立联合国,美国再次起到了领头的作用。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杜鲁门(Truman)总统重申他的国家致力于国际主义,这意味着在决定战与和的问题时,"无论我们的力量多么强大,我们都必须约束自己不要任性而为"。

在轴心国失败、西方帝国消失和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关系的重新安排中,威尔逊的梦想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随着新国家的加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急剧增长。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 172 在联合国旗帜下和安理会命令下展开行动的维和部队,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内战或地区冲突威胁着人民生活和地区安全的国家。此时,各国间进行国际协调以保护和平的梦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现实。



"联合国家"在战斗:海报,1943 年(承蒙 Library of Congress 许可使用)

联合国最雄心勃勃的维和行动发生在伊拉克(Iraq)。1991 年,当伊拉克被联合国旗帜下的各国联军打败后,维和行动部队负责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监督对这个国家的外贸实施经济禁运直至和平条约签订。2003 年,美国对伊战争终结了对这个侵略国家实行国际遏制的努力。宣称联合国不能控制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拉克是对和平的威胁,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入侵伊拉克,并在英国军队的支援下,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参见第十四

章)。21 世纪初,国际主义仍然是国际关系中一项有争议的原则。

大同盟中的美国

随着美国加入战争,这场全球冲突找到了中心点。华盛顿的决定对欧洲和亚洲的战争进程以及对同盟国外交目标的制定,都至关重要,这种情况,主要是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存在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对同盟国提供的经济援助的结果。

美国很快就拥有了所有交战国中规模最大的现代军队。到 1943 年,美国舰队的战舰数量达到全球最多。罗斯福在 1940 年启动的海军建设计划,很快产生效果,在弥补了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的同时,还扩大了大西洋舰队。只有美国能够通过海军到达任何战斗正在进行中的大陆和岛屿沿岸。美国空军规模迅速扩大,超过了英国空军的规模。到 1943 年,美英两国的联合空中力量控制了德国领空。在太平洋上,美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数量压倒了日本的舰载飞机数量,到 1943 年末已击沉了日本大部分航母。只有在陆地上,美国的陆军数量被另外一个盟国超过。苏联红军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上军队,这是一个对中东欧各国最终命运举足轻重的事实。

美国取得战时领导地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在整个大萧条期间始终处于部分停工状态的工厂和农场,随着战时的生产开始,又恢复了全速运转。1940 年,900 万失业者找到了工作,商业一片繁荣。大后方需要妇女回到工作岗位,战时生产工厂里爱国基调的妇女招工广告,急切地吁求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为两线战争动员起来的美国经济,为其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力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装备,它还向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罗斯福总统就已启动了对英军援计划。德国入侵俄国后,这种租借援助开始流向苏联。

173

当美国成为交战国后,以前对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所有障碍消失了,唯一的障碍就是战争本身的结果。在二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日本



美国后方生产战线的招工广告："她是 WOW：妇女法令工"(Poster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控制着缅甸，援助物资就唯有通过空中运输送到中国国民党那里，因此，中国只得到数量不多的战时援助。德国潜艇和空军阻碍了援助物资直接运抵苏联，最终，用船运输的大量援助物资取道伊朗送往俄国。伊朗领土当时由苏联、英国和美国联合占领，他们修建了从伊朗沿海到苏联边界的公路和铁路。1943 年，补给物资大量涌入苏联，总价值共计 110 亿美元，主要是食品、飞机和军车。但从美国援助中受益最大的还是英国，它与英联邦成员国一起共接受了 300 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与英国在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基础上，结成了良好的外交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曾在 1917 至 1918 年变成战时同盟。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开始打造新的关系。两国政府的外交目标并非完全相同，美国领导人倡导世界各地被殖民民族的独立事业，其中包括印度；丘吉尔则力图尽可能地保留帝国领土。但两年的军事失败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1941 至 1942 年冬，美英大西洋舰队不得不联合起来确保供应物资运往英国，但其护航舰队几乎难以对付德国的潜艇攻击，运往英伦诸岛的食品和燃料供应因攻击而被减少到了危险的低水平。

美英两国都严重依赖苏维埃盟国的军事贡献。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都在这样的信念指导下做出战略性的军事决策，即必须尽最大可能把美国的战争伤亡人数降低到最少。在冒险进行大型的陆上进攻之前，他选择先聚集大规模的军队。进军北欧则必须暂缓。直至 1944 年，欧洲大陆上只有红军在阻止德军的全面胜利。如果没有东线，西方盟国在最后准备登陆欧洲大陆时，将面临着大量的德国军队。

174

美国政府相信,与苏联的联盟对获取东亚的军事胜利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他们看来,红军似乎是能对日本在朝鲜和中国所占领土发起进攻的唯一军事力量。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的战争中,苏联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盟友。

在美国和英国政府尚不能大规模地减轻红军战斗负担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不断地就此提醒他的西方盟友们,敦促他们在 1942 年开辟西线战场,以免苏军在德军攻势前再次撤退。但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看法,认为他们的军队缺乏能够进行跨海峡作战的海军力量和步兵力量。1942 年,苏联被迫继续在欧洲孤军奋战。

在此情况下,向斯大林证明西方重视盟友苏联的外交姿态获得了特别的意义。1943 年初,美国和英国许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接受来自德国的任何和平条款,该声明真实的含义是,两国决不会与德国单独媾和。取得斯大林对此项政策的认可,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即便在没有开辟西方第二战线的情况下,苏联将继续战斗。斯大林政权是大同盟里一个重要但神秘的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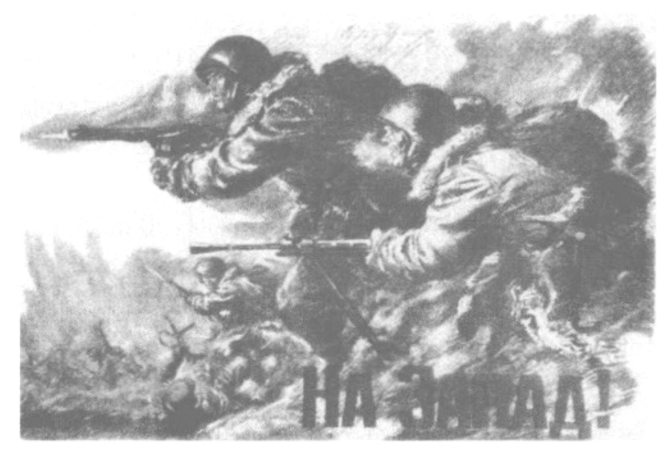
战争中的苏联

西方政治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德国战败后,苏联将在中欧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西方人眼里,苏联追求的国际目标环绕着他们无法洞悉的神秘色彩。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执行的苏联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对他的国家及世界共产主义来说,一切关乎苏联领土安全和势力的利益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他利用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东欧大肆扩张领土;后来,他又知会同盟国,战后他将继续保有这些土地。1941 年,他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保护苏联及其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他一直到 4 年后都信守这个条约。他曾答应罗斯福,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红军加入亚洲战争。他如此为之,是因为参战有望在东亚获取大量领土。这些在国外的举动跟扩展革命毫不沾边,苏联表面上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但其政策是大国强权式的。从这两方面来说,它是联盟里一个令人不安的存在。

自1941年中期与德国的战争爆发以来，苏联的目标一直是保卫国家。战争开始是灾难性的军事失败，以及西部的俄罗斯、乌克兰大部分领土的丧失。面对这种危机，苏联政府动员全国全面投入战争。斯大林直接控制着政治和军事事务，他密切跟踪军事将领们的行动，为战争重组了国有经济。他的独裁权力抹平了政治领导权和军事领导权的分野，使他后来能够把军事行动调整向追求国家的外交利益。

国家和党的巨大权力转向战争努力。警察国家工具继续在运转，它在战争期间的能量导向强化人民的战斗意志，它专横的逮捕权力用于打击变节通敌嫌疑分子、叛徒以及胆敢批评斯大林的人。军队叛逃者被枪决；集中营依旧存在，尽管其中的犯人经常被命令到前线执行自杀性任务；极少的幸存者得到了自由。斯大林要求国内民众“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个命令成为苏联生活压倒一切的特征。

战争要求动员国家的一切经济资源。德国在1941年的胜利，夺占了苏联部分最重要的工业地区和最丰饶的农业地区，西伯利亚的工业经济体系在此期间证明了自己真正的防御价值。1942年，红军的装备仍然很差，但它拥有来自东部的工厂的新军备。民众靠微薄的食品供应艰难生存，许多人忍饥挨饿，一些地区还发生了饥荒。美国的食品援助在这一年到来，平民偶或得到一盘肉，来自标有陌生名字斯帕姆(Spam)的“美国”(Amerika)罐头。



“到西部去！”苏联的战争动员海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人民应之以超乎寻常的爱国热情，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怀有这种情感。红军在 1939 年夺取的西部地区的民众欢迎德国入侵者，苏联南部的非俄罗斯民族为德国人提供了大量的通敌合作者。然而，在俄罗斯人当中，抗击德国的战争成为一项民族事业，被围城市列宁格勒的人民以最好被描述为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状态，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非人条件。到红军在 1944 年初结束轴心国的围攻之前，100 多万人失去了生命。俄国人把与德国的战争称为“伟大的爱国战争”，这场战争要求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前线士兵做出的牺牲最大。在战争最初的两年时间里，红军缺乏足够的军事装备和精干的军官去匹敌强大的德国军队，因为许多年长的、有经验的军官已在大恐怖中死去。这个弱点在第一年夏天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军事失败和整支军队被包围，导致苏军士兵大量投降。1942 年德军进攻俄国南部直指斯大林格勒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苏联军队将领要求士兵以自杀式的英雄主义来弥补军备的不足。前线步兵至多只有希望在战斗中存活一个月时间，然后或重伤或战死。到战争末期，苏军阵亡人数达 800 万。

176

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下，苏联当局命令被占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员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组织反纳粹的游击战，他们微小的军事行动有助于削弱德军在东面的战争行动。在东欧，以及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抵抗团体变成了有效的游击力量。他们在南斯拉夫最为成功，这里的共产党领袖铁托(Tito)，建立了一支游击队，逐渐控制了该国的山区。尽管他们从西方盟国得到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但对他及其追随者来说，莫斯科依然是他们的“圣地”，革命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的军事行动开始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在顽强地防守住了这座城市紧靠伏尔加河两岸的一小块区域之后，1942 年 11 月，大规模的红军反攻将德军围困在那里，两个月后，德军残余部队投降。红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了约 50 万人，但德军的损失可能与苏军相差无几。德军撤退到俄国中部。1943 年夏，东线依然深入苏联领土。

决定苏德战争结果的战役，于当年夏天在俄国的大平原上发生，希特勒企图做最后一击。那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坦克战，红军在这一次准备了装备、部队和有能力的军官。最终，事实证明苏联的军事机器比德国的更为强大，德军遭到重击全面撤退。到当年秋天，德军已后撤至苏联西部，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胜利最终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同盟国的合作

在新获得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斯大林准备与西方大国就真正的外交联盟展开谈判。在1943年秋的德黑兰会议(Teheran)上，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终于会面。西方领导人坚持1944年春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这次会议标志着同盟国间友好关系的巅峰。三国领导人就大同盟的基本条款达成一致，集中在三个主要的目标上。首先，他们重申了继续进行对德战争，直至最后胜利的决心。德国投降后，将被暂时地被分为几个占领区，强制实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政策，而德国人必须支付战争赔款。

西方领导人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同意苏联保有其新占取的西部领土。他们还非正式地同意东部领土丢失给苏联的波兰将在其西境得到德国的土地。为了维持联盟，他们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的领土兼并和波兰新边界。他们的举动促成了苏联战后在东欧新势力范围的创立。

斯大林则同意在欧战胜利后加入亚洲战争。听从了军事顾问建议的罗斯福相信，只有在红军的帮助下才能快速地结束对日战争，斯大林的军事协助承诺构成了美国总统的一项重要成就。为此，他准备认可苏联的领土收益和其在欧洲及东亚的新势力范围。

177

1944年的数场大型战役使盟军力量的优势显露无余。6月，西方盟国的海陆联军在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海岸开辟了战线。经过数周的战斗，美国的装甲纵队得以快速席卷法国中部，俘获了数以万计的德军战俘。8月，盟军解放了巴黎。但是，当年秋天英军在



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1943 年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

进抵荷兰境内的莱茵河下游的攻击行动中失败，使盟军渗透到德国境内的希望受挫。德国尽管在西线遭遇重大失败，但战争仍然在德国境外进行。

在东线，德军遭到了如同诺曼底战役一样倾覆性的失败。是年夏，斯大林为了配合盟军登陆，下令苏军在位于苏联西部地区的整条中央战线上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希特勒命令德军战斗到底，不得后退，这只是他的将军们不得不服从的、毫无希望的任务。红军击败并包围了中央战线沿线的大部分德军，数量约 30 万人。中央战线的摧毁，为苏联打开了通往波兰和东德的道路。到 8 月份，苏军前锋部队已抵达华沙郊外。

178

红军的迫近，在华沙引发了起义，起义由非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波兰国家军”发动，其领导人想在俄国人到达之前夺取这座城市，担心不这样做他们就没有机会组建波兰新政府。然而，红军停了下来。数个月时间里，它一直停留在华沙以东。与此同时，一支德军慢慢地镇压了

起义,并将城市夷为平地,红军直至1945年1月才恢复进攻。苏联停止进攻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政治私利,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可以肯定的是,德军剿灭华沙的波兰国家军,消除了苏联主导波兰政治的主要障碍。

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胜利加速了轴心国同盟的倒台,其中一个轴心国早前就已投降。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终于引致意大利军队将领加入与反法西斯国家合作,反对墨索里尼。他们以及大多数意大利人不愿意继续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毁灭性战争。在意大利国王和法西斯高层政客们的协助下,1943年中期,他们成功地将墨索里尼赶下权力舞台,并与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很快,德国装甲师占领了这个国家,替代了前线的意大利军队。意大利境内的战斗(从来不是二战中的重头戏)又拖了两年之久。纳粹德国在轴心联盟中要比过去更多地提供真正的战斗力。

到1944年,德国空军已不再能够保护本土免受盟军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英美密集的飞机轰炸让一些城市沦为废墟,成千上万德国人死于非命。最糟糕的"大爆炸"发生在1945年初,德累斯顿市(Dresden)遭到炸弹攻击,导致5万至8万平民死亡。尽管有纳粹的狂热和德国军队的坚实毅力,但到此时,轴心国的失败已然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仍在继续,因为希特勒及其纳粹追随者宁愿战败而死。

轴心帝国的战败

1945年初,欧洲和亚洲的战争迅速地趋于结束。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和亚洲各殖民地的未来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胜的同盟国的政策。大同盟承诺在战争和接下来的和平事务中进行合作。对欧洲来说,比同盟国协定更重要的是苏联和西方军队向中欧的推进。在军队身后,苏联和西方占领当局开始重建欧洲;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重建结果差异极大,欧洲的分割局面业已开始显现。当原子弹的投放标志着世界进入了核战争时代之时,亚洲的命运也随后很快被决定。美军可能主导着那里的战争。共产党的军队也占领了一片独立的区域,朝鲜像德国一样被一分为二。这场战争的结果掌控在同盟国手里。

美国与西欧解放

在西方政治家中，罗斯福对制定战后欧洲重建计划影响最大。美国的政治体制将外交政策的规划交到他一人手里，尽管该体制把外交事业的拨款权留给国会和选民决定。罗斯福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曾经历过威尔逊国际主义政策的希望和幻灭，他预料到美国战时的影响力不会延伸到和平时代。美国民众通过他们选举的国会代表，将要求立即回归到和平时期的状态——复员美国军队，结束对外援助。罗斯福能够得到的最佳结果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制能力的和平，也就是不需要美国承担永久性军事义务的和平。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塑造了他的未来和平设想，对被轴心国占领的土地，甚至对以前曾是西方殖民地的地区，他信守着民族自决的允诺。他期望各大国在新的国际维和组织——将被命名为联合国(United Nations)——框架中合作。

179

他的计划在两方面稍微修改了威尔逊主义。首先，他的顾问和英国政府努力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与稳定金融体系之上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领导人希望看到战后全球经济的扩张，这既惠及遭战争蹂躏的国家，也惠及美国。1944 年末，英美官员在美国会晤，就美国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事务进行财政支持达成协议。这个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Woods System)展望，全球市场经济的活力将在美国经济财富的支撑下恢复。

罗斯福期盼和平时期大国间展开合作。对他来说，它们对世界事务的领导作用，比联合国制订的方案影响更大。它们要负起首要责任，在小国中引入或恢复民主政府，采取集体行动抵制侵略性政府。他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股力量，因此寻求一种只要求美国有限地卷入国际事务的政策。在 1943 年从德黑兰会议回国后对国会的演说里，罗斯福阐明了他所重视的战后新的合作精神是多么的重要。“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以及它们的盟国”，他宣称，“代表了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只要这四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侵略国家发动又一

次世界大战”。

他把它们的合作称为“四个警察”的工作,他坚持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应被给予特别权力(否决权)。但想象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能够成为东亚的“警察”,他多少有些一厢情愿。而唯有罗斯福强烈的乐观主义和战时合作的愉悦情感,才支撑着他那与苏联继续保持一致的希望。战时同盟必须延续下去,因为他看不到任何其他维系持久和平的希望。

随着盟军向中欧推进,占领当局的重要角色日益显现。法国是诺曼底登陆解放的最重要的国家,它在战争期间曾全盘丧失了真正的独立,其经济曾服务于德国的战争机器,其人民曾遭受德国的盘剥。随着占领岁月的流逝,对德军的反抗潜滋暗长,地下抵抗运动聚合为“自由法国运动”(Free France Movement),其领导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是1940年从法国军队脱逃的,当时他拒绝接受与德国的停战协定而逃往伦敦。在争取法国的自由事业中,他的献身精神和雄辩口才使他很快成为抵抗德军的各派力量的领袖。当解放日趋临近时,即便共产党也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尽管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180 戴高乐获得罗斯福的承认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位美国总统相信,“民族自决”意味着通过自由选举而非通过自封选择新的领导层。但戴高乐是法国主要的非共产党政治领导人,并致力于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这种基本政治原则方面的一致,加之戴高乐在法国人民和抵抗力量中的声望,使他在诺曼底登陆前不久最终赢得了西方盟国的外交支持。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与法国抵抗力量达成协议,以民主选举方式组建新的宪政共和国;作为回报,他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即为了他们所希望的新法兰西进行大量的改革。法国以符合民族自决原则的方式恢复了独立。

聚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革新经济理论前,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众所周知的“沉闷的科学”

(dismal science)的学术研究。古典经济学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任何作用,其专家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资本主义,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经济法则会自动运行,繁荣与萧条以自然循环的方式交相轮替,一如四季轮回之不可避免。当萧条来袭,破产和失业广泛蔓延;但犹如白天之后是黑夜,接下来就是经济恢复,它将再次带来新的繁荣,商业将再次兴盛起来,劳动人口享受好时光。没有任何人能改变这种循环。

凯恩斯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挑战,使经济福祉成为政府的中心事务。在他选定的职业生涯里,他是个反叛者,正如他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里也是个反叛者一样。年轻时,他是伦敦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他们为了个人自由,反抗维多利亚式的道德传统。在他们中间,凯恩斯毫无必要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杰出才华,为他在 1919 年凡尔赛和谈的英国谈判代表团中赢得了一个席位。后来,他在剑桥大学平静地教书,与一个俄国芭蕾舞演员结了婚,并不时地在证券市场上一试身手(往往能赚一笔)。

在力求解释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造成的根本性经济问题时,他取得了自己真正的成就。在那些严酷的岁月里,他声言,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演进不一定带来充分就业和长期稳定,以此对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经济活动大幅衰退之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恢复繁荣的美好愿景是错误的。在 1936 年出版的题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①]的著作中,他阐明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该理论让经济学界炸开了锅,因为它提出,政府有责任利用自己的财政资源以及像他一样的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去改革不完善的资本主义体系。他的理论迅速地吸引了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们正在绝望地寻找解决大萧条引发的社会危机的办法。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凯恩斯力图保护市场经济的自由及其依赖的自由民主体制。在这个共

---

① 此处原文所列书名不全,应为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译者注

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到处吸引支持者的时代(包括他教书的剑桥大学里的学生),他希望"在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状态和极权主义的专制政治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与一群外交家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讲话,1944 年(UPI/Corbis/Bettmann)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全球经济体系。从大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要求有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合作体系。如果战后世界要避免混乱的、毁灭性的保护主义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停滞,美国必须占据中心位置。英美政府欢迎他的帮助,它们意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1944 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历次谈判上,就建立战后促进重建和多边贸易的国际机构的问题,他在促成各国达成一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套体系到他去世后尚未开始全面运作,但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变成了 20 世纪后半期全球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凯恩斯帮助修建了西方世界依赖的"中间道路"。

苏联在东欧的胜利

182

尽管西方领导人致力于在整个被占领欧洲推行民族自决,但斯大

林只在它与苏联的权力政治相适应的情况下才接受它,他建设和平的目标和方法都与罗斯福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对国家力量的使用方面。美国政府着手创立一种尽可能少需要美国进行国际干涉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却继续利用其军事力量,确保对由红军解放的苏联周边地区的外交或政治控制权。如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样,斯大林推崇“只尊重强者”的权力政治法则,对“资本主义丛林”保持着怀疑。对德战争暂时让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结为同盟,但在他看来,两种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敌对依然存在。在斯大林的世界观里,他不相信任何人能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为共同利益奋斗,他在对待属下的共产党员时更是无情地应用这样的世界观。他只承认政治和军事力量。

在对待其战时盟国时,斯大林坚守着这些信念。他不得不尊重西方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国家拥有未经损伤的、富有成效的经济、大型的多洋海军和强大的空军力量。苏联曾竭尽血汗,尽最大努力维持红军。出于每一种缘由,他把增强国家的国际力量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二战期间,在美国的苏联间谍已传来美国开发原子弹的情报;甚至在击败德国前,苏联科学家已开始研制核武器。他与战时盟友日益改善的关系,对劝服他停止在本国周围建立苏联势力范围丝毫不起作用。

到 1943 年,斯大林已开始为在苏联西部边界形成战后保护区安排政治和外交行动,其必要条件是苏联周边小国同意在国际事务中放弃独立。在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中欧的未来形势,1943 年,它向苏联提议缔结一项外交协定,根据该协定,捷克接受战后苏联的领导地位以换取内政自治。当红军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时,控制权被移交给了这个政府,该政府着手重建了类似于战前政体的议会民主制。1945 年,斯大林寻求苏联权力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外交上的承认。1944 年在与芬兰的和约中,他应用了这种捷克模式。现实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着这些协定。

在共产党武装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斯大林都准备承认他们的统治权,条件是他们臣服于苏联的支配。到 1945 年,南斯拉夫业已在铁

托领导的游击武装控制下,他们从山区的根据地出发,跟随在红军身后占领全国。在实现自己的革命计划时,他们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党专政和联邦国家来统治多民族的人民。在苏联的胁迫下,他们接受了经济协定,从他们的国家为苏联重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

波兰事件清楚地向西方显示了苏联在东欧的目标。甚至在战争结束前,波兰重建就在盟国中激起最大的争议。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宣称其有权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波兰民族国家。苏联领导人与伦敦的波兰人开始谈判,但在 1943 年他们终止了谈判,当时,波兰官员要求就 1940 年苏联秘密警察屠杀数万名波兰军官的报道进行调查,这些军官在 1939 年的战争中被苏联人俘虏。斯大林并不在意这些报道是否属实,对他来说,波兰人的要求说明他们的政府是不忠诚和不可靠的,不适合在苏联势力范围里实行统治。

183

从这时起,他开始从波兰共产党的幸存者当中挑选人组建另外的波兰政权(波兰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在大恐怖中都已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当红军在 1944 年攻入波兰时,苏联占领当局立即开始清除波兰国家军。这年年底,他们建立了波兰临时政府,其领导人是共产党,流亡伦敦的波兰人被排除在外。美英两国政府抗议在波兰实行这种愚弄人的民族自决,但毫无效果。

1945 年 2 月,同盟国领导人在雅尔塔(Yalta)举行会晤时,他们不得不讨论未来的和平和结束战争的举措。在纳粹战败后处置德国领土的协定上,各方没有任何争议,欧洲四大国占领区在上一年的讨论中已经浮现,柏林也由同盟国间进行分区占领,尽管这座城市深处在东德的苏占区里。无论东西两边的部队战争结束时在哪里会师,它们接下来占领的地区都要限制在这些区域里。

在雅尔塔会议上,东亚的战争问题也没有带来严重的分歧。为了换取苏联进攻中国东北和朝鲜,斯大林要求得到日本领土(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和在中国北部领土上的特权(与 1904－1905 年战争日本胜利之前,俄罗斯帝国在这里拥有的特权一模一样)。罗斯福答应从蒋介石政府那里取得让予这些特权的同意。他满足斯大林的领土要求,再

次充当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合作者。即便是在联合国中，苏联的会员资格议题也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斯大林判定，罗斯福的计划尽管对苏联的利益毫无用处，但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从这个方面来说，大同盟在继续有效地运转着。

在讨论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的命运时，同盟的局限性显露无余。罗斯福要求苏联接受民族自决和民主选举，斯大林也的确同意承诺自由选举的《解放欧洲宣言》(*Declaration on Liberated Europe*)，但该宣言给苏联回避责任留下了如此之多的漏洞，正如罗斯福的一名顾问所言："你可以驾辆卡车穿过这些漏洞"。苏联支持波兰共产党政府是外交宣言根本无法解决的，这是真正的问题和盟国观点分歧的主要源头。但罗斯福不再提出要求，因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的合作，对他来说太重要了。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未能确保一个自由的波兰，与此相关的历史争论仍在继续，一些批评者后来称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是向着俄国人的"出卖行为"。然而，把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权强加到这个国家是不可谈判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该问题上拒不妥协，表明了他在很大程度上准备不理睬西方的抗议，要把苏联的附庸国强加到波兰人民头上。

他猜测，西方列强也将要求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命令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缴械给盟国占领军。根据他所理解的权力政治，那片区域落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那里的共产党应该服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希腊亦如是。那里的共产党游击队(暂时地)结束了武装起义。同样的逻辑也应用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这些共产党登上权力舞台，必须走社会政治斗争而非暴力革命的道路。在罗斯福大谈特谈世界和平与大国合作时，斯大林却将其理解作霸权和势力范围。在观点如此迥异的政治家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思想交汇或永久的理解。

184

1945 年春，盟军继续前进，击败残余的德军。德国将军们把大量部队部署在东方，努力阻止苏军的进攻。到 4 月份，西方军队已迅速推进至德国中部和北部。业已预见到在欧洲势力范围上必然与苏联产生竞争的丘吉尔，敦促西方军队占领柏林和布拉格。它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城市，位于将要由苏联解放的区域的腹地当中。盟军最高司令官德

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拒绝如此为之,以便为政治盘算留下回旋空间。4 月,罗斯福去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一名来自中西部地区毫无经验的前参议员,取代了他的位置。敞开在新总统面前的唯一行动路线就是追随罗斯福的引领。5 月初,希特勒自杀后,德国战时领导人向同盟国投降,欧洲战争以苏军占领柏林告终。



盟军在欧洲获胜:苏联的红旗在柏林飘扬,1945 年 5 月(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7 月,东德境内的西方军队后撤,给苏军腾出空间进驻苏联占领区,苏联当局执行了自己的条约义务,让西方军队进入西柏林。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开始了,强制性赔款的安排在战败土地上的各个区域里启动了。德国不复存在,它今后的模样取决于四个占领国。当时这几个国家仍然作为盟友合作着。

东亚的胜利

太平洋战争的进程截然不同,它一直到结束都主要是海战。1945 年初,英国最终从印度发起进攻,攻入日本占领的缅甸。印度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忠诚地为英帝国战斗,保卫印度并在中东和欧洲作战;印度公务人员不负所托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印度展开行动,东南亚最高司令官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积极准备进攻,以夺回英国在东南亚失去的殖民地。在他的部队进击至缅甸北部前,红军攻入满洲,美国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掷下了原子弹,日本

投降了,亚洲战争出乎意料地遽然结束。

美国海军的进攻始于 1943 年。一年前,美国海军在珊瑚海和夏威夷西部靠近中途岛(Midway Island)的战斗中,粉碎了日本企图毁灭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尝试。相反,日本舰队损失惨重,美国舰载飞机击沉了敌军大多数航空母舰。在这种大范围的海战中,美国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到 1943 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超过了日本海军。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横穿太平洋逐步向西挺进,采取"越岛战术"建立港口和空军基地,越来越向日本逼近。1944 年,他们控制了西至菲律宾群岛的海域;同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指挥下的陆军师团重新占领了这个国家。麦克阿瑟的下一个目标是入侵日本本土,并预计在日本投降前那里可能会发生惨烈的战斗。

185

到 1944 年末,美国空军掌握了日本列岛的制空权,从近距离的基地起飞对日本实施大规模轰炸,日本各城市完全暴露在曾经毁灭德国城市的同样的狂轰滥炸之下。1945 年春,在燃烧弹引起的烈火中东京化为灰烬,近 10 万人死于非命。这年夏天,日本大多数城市的中心地带都沦为废墟。美国潜艇战有效地破坏了日本的海运贸易,夺去了日本军队的补给,阻止了日本列岛工业经济得到重要的原材料供给。

1945 年 7 月,日本战时内阁开始考虑和谈。受到裕仁天皇支持的军事领导人坚持死战到底,捍卫国家的荣誉。渴望和谈的文官内阁成员寄望苏联继续中立和调停,与美国妥协达成和平方案。日本领导人的所有指望全错了,斯大林正在准备亚洲战争,美国坚持要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发动的是全面战争。国内对日本人的憎恨情绪十分高涨,尤其是日本虐待盟军战俘的故事被公布出来后。在 1944 年的海岛争夺战中,大多数日本士兵战斗到死,面对毫无希望的逆境拒不投降。他们自杀式的战斗意志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全面战争政策,因为它提高了美国军队进入日本本土之后战事会久拖不决的预期。盟国的军事计划要求苏联红军在中国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以配合美军进入日本本土。但在 1945 年夏,美国空军突然得到了一种威力难以想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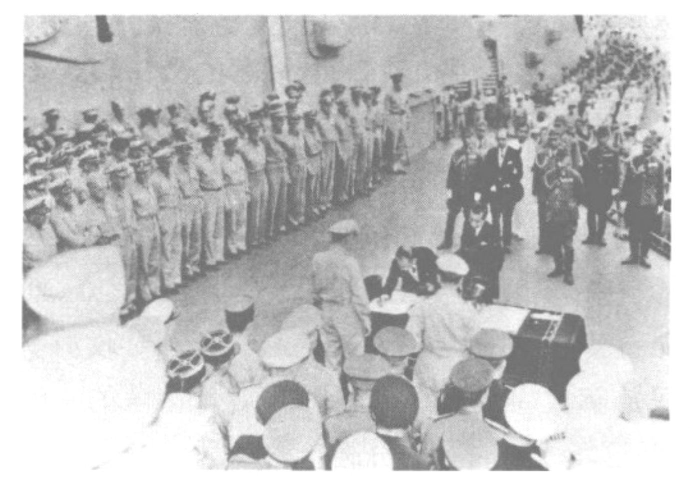
象的新式武器。

美国开发原子弹，最初始于对纳粹德国研制这种炸弹的担心。1945 年 5 月德国的失败和 7 月原子弹的成功试爆，赋予了美国领导人迥然不同的选择：一种威力无穷的武器可用于对日战争。问题不再是威慑敌人，而是毁灭在空袭面前毫无防御、准备在一场陆战中抵死顽抗的对手。美国政府几乎没有犹豫(只有一些科学家建议克制)地选择下令美国空军使用原子弹。8 月 6 日，一枚炸弹抹平了广岛，杀死了 10 余万人；8 月 9 日，第二枚原子弹毁灭了长崎市大部分。世界进入了核战争时代。

苏联的对日作战几乎才刚开始就结束了。8 月 8 日，红军进攻中国东北，斯大林遵守了他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协定条款。日军被苏军进攻的压倒，红军横扫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尽管失败不可避免，但日本战时内阁在一周后才接受投降。8 月 14 日，裕仁天皇亲自下令帝国武装力量投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可承受之事也必须承受”。

苏联进攻和原子弹让这场战争突然结束了，美国进入日本本土的计划被证明毫无必要。为避免这种进入是否必须使用原子弹的争论仍在继续，如今史学证据表明使用原子弹是必须的。掌控着战与和选择权的天皇及其顾问，不断要求日本人民“粉碎敌国”，他们呼吁进行类似于希特勒拒绝接受失败的战争，日本民众似乎准备遵从。两枚原子弹的攻击，加之苏联进攻中国东北和朝鲜，迫使天皇改变了立场，下令投

18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日本投降，1945 年 8 月(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降。美国军事专家的担心是，如果不使用原子弹，战争可能会持续数月，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

日本帝国的投降让二战最终结束。同盟国以可怖的代价，击败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

小 结

帝国时代的终结历经了一段缓慢的进程，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完结篇章。日本战败使其海外帝国轰然崩塌，但在此之前，它致命地削弱了东亚和东南亚的西方海外帝国。日本当局剥削和虐待其帝国的各民族，但他们也破坏了曾统治这些土地的西方殖民机构的权威。1945 年 8 月，荷兰帝国与法兰西帝国的领地损失殆尽，英帝国遭到削弱，并在它以前的许多臣民眼里声望尽失。日本帝国的投降是彻头彻尾的，它的军队准备从他们曾统治的每一片领土上撤离，这片广袤的地区里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

纳粹在欧洲的统治和同盟国的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陷入悲惨境地，政府缺乏救助他们的办法。近 5 000 万平民和军人在战争中死亡。伤亡人数相对较少的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人民遭受巨大苦难，苏联拥有了世界性大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这场战争造成了在这两个国家影响下的全球性分裂。两国对全球新秩序拥有迥然不同的计划。

在旧世界废墟上建立新世界的希望和梦想，从战争的激情和苦难中喷涌而出。这些梦想在抵抗运动中得到了滋养。集中营的囚犯，成群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仅希望在某个地方得到生存和新的家园。抗德或抗日游击队战士，为解放国家以及给国家带来比战前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所激励。尽管在战争中被逮捕、被折磨、被处决者如此之众，他们的努力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对进步的希望之心未死。对政治变革和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解放的巨大希冀，构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份遗产，而大国之间的冲突是这场战争的另一份遗产。

本章大事记

1937 年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9 年　德国入侵波兰

1940 年　德国入侵西欧

1941 年　德苏战争

1941 年　美国加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1942－1943 年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2－1945 年　纳粹种族灭绝营

1943 年　德黑兰会议

1944 年　盟军诺曼底登陆

1944 年　华沙起义

1944 年　有关国际贸易的《布雷顿森林协定》达成

1944 年　菲律宾解放

1945 年　雅尔塔会议

1945 年　苏联对日作战

1945 年　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推荐阅读

欧洲境内的战争

Robert De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Ⅱ* (1969)。对罗斯福战时外交政策的扼要研究。

Lloyd Gardner,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Great Powers Partition Europe, From Munich to Yalta* (1993)。对 1938 至 1945 年欧洲外交的细致研究。

Charles Hession, *John Maynard Keynes: A Personal Biography of the Man Who Revolutionized Capitalism and the Way We Live* (1984)。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令人起敬的生活史。

Raul Hilberg, *Perpetrators, Victims, Bystanders: The Jewish Catastrophe, 1933 -1945* (1992)。研究这个可怕事件的杰出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人道维度的缜密考察。

John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9)。一本有关二战在欧洲和亚洲战事的优秀军事史著作,配有大量插图。

* Voytech Mastney,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 War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 -1945* (1979)。对斯大林战时外交政策最好的研究著作。

亚洲境内的战争

Herbert Bix, *Hirohito and Modern Japan* (2000)对裕仁天皇应负战争责任进行了新的颇具批判性的阐述。

* 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 -1945* (1970)。日本征服和控制东亚帝国的军事努力的批判史。

回忆录、小说和视频教具

* Thomas Keneally, *Schindler's List* (1982)生动地描写了奥斯威辛普通的德国工厂主变成犹太人救命英雄的故事(即 1993 年那部杰出电影的主题)。

*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1959),以及 *Moments of Reprieve* (1986)。奥斯威辛一个犯人对那恐怖年代的回忆录。

Guy Sajer, *The Forgotten Soldier* (1971)。德军中一名阿尔萨斯志愿兵生动的回忆录,他侥幸在德军从俄国向波罗的海的大撤退中活了下来。

Saving Private Ryan (1999)。反映诺曼底登陆日及其后大战的混乱状态的最好影片。

The World at War。BBC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系列节目杰出纪录片(共 26 集,可从 www. shop. pbs. org 买到)。

下　编

民族国家时代



第七章　冷战与西方

- 西方的冷战
- 新苏联帝国
- 新欧洲

聚焦：艾伦尼·加佐扬尼斯

重点：外太空的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让各帝国沦为一片废墟。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从战争中恢复意味着重建生活，重新思考人类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构经济政治机制。战时人类的苦难程度超出了想象，整个欧洲都感觉到它的影响。战争结束时的政治动荡要求新的解决办法。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改革和革命主导着欧洲的政治生活。

轴心国倒台留下的权力真空，为美国和苏联带头重新安排欧洲关系开辟了道路。在东欧，重建按照苏联当局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大规模展开。在西欧，严重的经济匮乏和对苏联统治的恐惧结合在一起，促使这些国家在外交上和经济上倒向美国。政治和人性的冲突增加了外交的不确定性，使缔造和平愈发复杂。

西欧各国逐渐重新界定了它们的利益和需要。欧洲人不再那么关注占有殖民地，而更关注经济恢复和政治联合。非殖民化进程（殖民地的解放）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持续进行，有时是经过殖民解放战争后方始来临，但它是西方国家国内重建和社会福利优先的逻辑结果。到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已走向消费社会，经济共同体的纽带日益将各国紧密　190

联系在一起。

对全球共产主义革命阴谋的潜在恐惧重新出现在西方，取代了忠实的苏维埃盟友这个理想化的战时形象。在苏联，官方的言论复活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威胁的幽灵。双方敌对话语的重现表明战时良好关系的崩塌，强化了横亘在建设战后和平道路上的障碍。

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新冲突产生出了自己的冷酷语汇，词语“铁幕”(Iron Curtain)意味着有一堵不可穿越的墙把欧洲分开，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被分了出去。美苏在各自势力范围里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使它们赢得了“超级大国”的标签。不久，词组“冷战”(Cold War)抓住了双方敌对关系的不祥特征，双方没有实际交战但动员起各自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为欧洲的新冲突做准备。这种全球性的对抗给美国政治领导人提出了复杂的问题，而他们此前在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经验极少。这场冲突的性质是什么？威胁来自共产主义还是来自苏联的力量？美国的关键利益在什么地方？美国的支援应指向何方？

美国采取和平时期战略应对这种新环境，在国外投身于欧洲和亚洲的外交及经济重构。名为“遏制”(containment)的战略，在 40 多年时间里被美国确定为外交和政治政策的指导方针。冷战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引发了军备竞赛。尽管尖锐的敌对阶段在 50 年代中期结束，但战后和平安排的失败和此后数十年美苏之间持续的敌对，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使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呈战争般的面貌。

西方的冷战

战争期间滋长的迅速缔造和平的希望是短命的。它们基于这样的假想之上，即认为同盟国在取得胜利后会继续保持合作。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期望，国际主义的一个修正版将主导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将认同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在被解放的土地上推动民族自决，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努力维护和平。苏联战后势力范围政策欲取得成功，取决于西方是否同意在苏联周边的广袤区域内实行共产党统治。这片区域如此之大，乃至像个新型的苏联帝国。美苏双方的计

划没有哪一个是可行的，因此战时联盟分崩离析，冲突取代了合作。



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海报“为了和平，为了人民的民主”，约 1949 年（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1

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在军事力量方面仅次于美国，它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比以往更加活跃，它的对德胜利让其领导人在红军解放的土地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革命热情不是斯大林处置战后国际政治的办法。西方观察家想象，斯大林一如他统治苏联那样，像个独裁者般统治着国外共产党。这实际上是个错误的臆测，只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鼓噪以及共产党在欧洲和亚洲的起义，使之看上去显得有道理。但战争业已极大地削弱了苏联人民和国家。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苏联的国际力量和国内虚弱，主导着战后苏联的国际和国内政策。

新苏联帝国的形成

胜利为苏联扩张创造了条件，只是受制于苏联的战略优先次序和斯大林对美国军事实力的认识。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苏联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对苏联势力范围加以经济盘剥并继续牺牲苏联民众。斯大林欲维持苏联军事和外交力量的决心与以前一样大。

尽管斯大林在 1945 至 1947 年间似乎尚未有苏联扩张的总体规划，但他已有一些最低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在苏联西部和东部新边境沿线各国取得外交主导权，苏联政策在此范围内是扩张主义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也是机会主义的，因为他准备充分利用共产主义革命的种种收益。

斯大林对“资本主义阵营”仍然怀有深深的疑虑。战争结束时，美国业已成为民主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强权政治手段——也就是依靠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确保苏联的势力范围并对付西方——继续主宰着他的外交政策。像他最初在 1931 年所提出的那样，他依然相信“丛林规则”主导着西方与苏联的关系。他的国家在战争中胜出，因此，他有理由希望西方国家默认他的新统治范围。他的政策打破了欧洲和亚洲的势力均衡，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之间的战时合作关系。从这方面来说，他的强权政治政策悖逆了他自己希望西方承认其势力范围的期求。

在这几年里，斯大林不得不借重于政治力量和国外共产党的革命战斗精神。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迅速建立了一党独裁政权，公开表示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他们两次攻击飞越南斯拉夫西部边境的西方军机；斯大林仅表示这是粗疏所致，未再置一言。铁托积极支持希腊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尽管斯大林一再警告此举可能导致与西方发生冲突。战后初期的数年里，斯大林只给外国共产党一般性的指导，一些国外共产党领导人以比他激进得多的方式进行革命。他的小心谨慎，是因为他认识到战争给其国家造成的破坏，并一心要保护本国在东西部边境新获得的统治地位。

192

在希腊，随着希腊共产党发动革命武装起义，展开有力的游击战，冷战爆发了。1946 年，希腊共产党动员在抗击德军中得到武装和锻炼的军队，发动内战试图从保守的政府那里夺取政权。希腊共产党人从南斯拉夫的铁托共产主义政权那里取得启示，并接受其军事援助。希腊政府最初从英国那里获取军事和经济援助，英军在二战期间曾在这里战斗。1946 年底，当英国政府断定自己缺乏援助的条件时，希腊领导人转向了美国。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的武装反叛抱有深深的疑虑，因为在他的政治地缘图上，希腊属于西方的势力范围。1947 年初，他曾私下警示来访的南斯拉夫人，希腊共产党愚顽地进攻一个可以依靠“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

斯大林的扩张野心延伸到了苏联南部边境的国家。战后不久，苏

联政府要求伊朗和土耳其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要求得到伊朗西北部的领土和土耳其控制下的从黑海到地中海的海峡地区。伊朗边境上的领土开放，以方便苏联石油工业能便利地接近里海南部的大型油田；迫使土耳其让苏联当局监管这条战略性海上通道的船只往来，实现沙皇数个世纪以来的目标。两国领导人祈求西方盟国的支持和援助，以反抗它们强大的北邻。1946 年，西方的抗议结束了苏联对伊朗的压力，不久后斯大林也同样撤回了对土耳其的要求。苏联在这些地方的利益，尚未重要到要冒险与西方冲突的地步。

美国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并对日使用，削弱了斯大林对苏联战后力量的满腔自信。面对一个拥有如此破坏力武器的潜在敌人，他不再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军队能够确保苏联对欧洲和亚洲势力范围的控制。他从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得到的教益简单明了，即在 1945 年 8 月马上召集业已开始原子武器研究的苏联科学家，并大声疾呼："广岛震撼了世界，（势力）均衡已被打破。"他们得到的秘密指令是立即研发苏联的原子弹。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美苏这对前盟友之间维系和平关系的机会已渐趋渺茫。

斯大林之所以一门心思维持苏联的外交力量，部分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战争对其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苏联的人员损失是如此惨重，乃至没有人能精确地统计出总数。如今被一再引述的数字——2 700 万平民和军人死亡，表明了这个国家所遭受的困难程度。俄国西部大片领土惨遭破坏，城市沦为废墟，乡村一片死寂，矿井遭到淹没。1946 年俄国东部地区歉收，食物储备短缺，饥荒横掠整个地区，苏联政府不得不央求西方向其输送食品。

恢复需要工人进行重建，但数以百万计的男子在战争中一去不返，或受伤致残，归来不能工作，一半的适龄入伍男子或死亡或在战争中严重受伤。1945 年，人数多达 1 100 万的苏联军队迅速复员，以便为重建提供劳动力。1948 年，红军降至 300 万，比西方观察家当时认为的人数要少，但它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1946 年，斯大林宣布，实现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乃第一要务，结束了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希望。在城

193

市和乡村,妇女不得不承担起本来由男人干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全部可耕地的集体化依旧是苏联农业的基础,这让苏联政府能榨取集体农庄的资源。工业增长确实再次开始,但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红军占领的土地或战后苏联统治的土地,不得不为苏联的经济重建提供资源。在停止支付战争赔款前,仅东德就给苏联输送了近 50 亿美元的工农业物资。在苏联对日作战中被苏军夺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工厂,在 1946 年苏军撤退前被拆除并被运回苏联,仅留下一片工业废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不得不接受苏联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购买它们的原材料。苏联当局在其势力范围里强行实施经济盘剥政策,不管这些国家是以前的敌人,如东德,还是战后的盟友,如波兰或南斯拉夫。

分区占领德国

中欧重建的尖锐问题集人道、政治和外交诸种冲突于一身,这些冲突导致了战后欧洲的分裂。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憎恨超越了纳粹主义扩展到德国人本身。在整个东欧,各国新政府在 1945 至 1946 年间强行驱逐了大多数尚未逃离的德国人。德国难民总数可能超过 1 000 万;他们大多数逃到德国的西方占领区寻求避难。与此同时,战争期间被带到德国的数百万强迫劳工力图返回家乡或移居某个新国家;集中营里的犹太幸存者遥望巴勒斯坦;大多数乌克兰和俄罗斯被流放者想在西方有个新家。这些贫苦的人们聚集在中欧,照顾他们的任务落在了联合国和占领国的头上,它们还肩负起防止被战火摧毁的德国各城市居民免于冻饿而死的义务。

1945 年,胜利的同盟国在重建新德国之前,开始着手摧毁纳粹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战时协定包括解散纳粹运动、非军事化和数额不定的赔款。1945 年冬至 1946 年,在纽伦堡对最主要的纳粹分子进行了审判,他们被指控犯下了反人类罪,国际法庭判定所有人都有罪,其中大多数人被处决。

东西方第一次严重的分歧发生在赔偿问题上。在东部占领区,苏联当局要求得到占领区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以满足自己的急迫需要。

由于亲历过自己的宫殿和博物馆遭到毁坏,所藏文物被运往纳粹德国,他们反过来夺取属于德国博物馆和平民的珍贵艺术收藏作为战利品。他们还要求西方占领当局把大量的德国工业设备移交给他们。1946年春,德国经济的贫困以及对苏联政策日益增长的疑虑叠加到一起,促使西方各国认为它们应拒绝苏联当局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任何额外的东西。在经济战利品方面的冲突揭示了各方对德国的重视。对德国的敌视越来越少,它正在变成东方与西方的前线,各占领区日益成为领土分割区。

194

在这些情况下,1946 年,美国政府决定改变对德政策,从惩治转向重建。这种突然的转变,既因为它对苏联在中欧的力量有了日益清醒的认识,也因为占领的经济负担。随着德国人生活条件的恶化,管理占领区的费用大幅增加。在以货易货的经济中,香烟和肥皂是最被广泛接受的交换介质,为有任何可买卖之物的德国人提供了基本的商品。绝望的德国战争寡妇向供应充足的占领军寻求食物,卖淫盛行。美国占领区向德国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食品、衣服和取暖而产生的高昂费用(1946 年达 7 亿美元),使恢复德国经济生产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一年晚些时候几近破产的英国,赞成美国的新目标。

1947 年初,英美占领当局把它们的两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经济单元,当年稍晚些时候,法国也把自己的占领区合并进来。西方各国政府在它们控制下的德国领土上推行新的经济重建政策,对苏联占领当局激烈的反对置若罔闻。美国政府在这一年宣布:“一个繁荣有序的欧洲,需要稳定而富有创造性的德国的经济贡献。”该国四分之一的领土被排除在了这项政策之外。用直白的话来说,西方盟国的新政策有效地将德国分割开来,标志着与苏联的合作寿终正寝。

东西部德国的发展道路日渐分道扬镳。在东德,苏联当局成立了由所谓的社会主义统一党领导的一党专制政权,德国共产党事实上把持着政权。他们以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德国臣民。选举继续举行,但在俄国人支持下的德国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权力。

西方占领区的政治改革着眼于恢复议会民主制。在 1947 年的州

议会选举中，大多数选民或选择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捍卫社会主义改革和力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或选择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倡导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和依靠西方各国防止苏联控制。东西德的政治生活日趋分化，尽管这个国家在理论上仍然是统一的。

因此，同盟国就德国未来的谈判在相互争吵和指责中破裂。1947年，战胜国的外交部长开会商讨草拟针对轴心国的和平条约，他们仅在对意大利的和约上达成了一致。对苏联和西方盟国来说，德国如何处理代表着己方力量的优势，哪一方都不肯妥协。完成德国和平进程的失败责任在于东西双方，没有哪一方最初就寻求分割德国。斯大林希望有一个处于苏联影响下的统一的德国，但他失败了，这导致他诉诸控制自己的东部占领区。西方盟国寻求一个免于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当该目标受到苏联在东欧统治地位的威胁时，它们坚守着自己的占领区。对德国的分割不期而来，它是东西方相互敌视和中欧力量极端不平衡的结果。

195

铁幕和遏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里，美国领导人日渐意识到，他们在战时对欧洲战后和解的期望是不现实的，美国与苏联的合作政策不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协定。在西方外交官中引起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东欧的政治重建。他们原本期望的战后安排是，占领军从各地撤退，实行民主选举，各国恢复独立，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阻碍了各地回归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独立国家状态，共产党在东部操纵民主选举也引起了他们的关切。共产党在这些地方削弱敌对的政治运动，确保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东欧的命运，无论在外交上还是政治上，都掌控在苏联人手里。

1946 年，温斯顿·丘吉尔开始敦促美国关注苏联扩张问题。这一年，他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客人访问美国，声言反对美国回归孤立主义。在观念上，他是一位以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外

交政策的信仰者。在他眼里，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压倒性的，如果美国不承诺帮助西欧国家，力量平衡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位演讲大师，他为美国听众描绘了一个被“铁幕”隔开的大陆的景象，声言共产党力量在东欧已拉起一道纵贯欧洲大陆的铁幕。他寻求帮助的吁求在敌视共产主义和恐惧苏联武装力量的美国公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丘吉尔的目标是让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以便平衡苏联的军队和盟友政党在东欧的优势地位。他寻求欧洲新的力量均衡，美国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丘吉尔的呼吁恰逢其时。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也正提议实行新的对苏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代言人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自 1944 年派驻莫斯科，是战时国际主义政策和对苏合作的坦率批评者。凯南提出的对付苏联的战略，被称作“遏制”战略(参见第八章“重点”)，他对苏联目标的估计，看上去十分符合苏联战后在土耳其、波兰和德国等地的外交政策。在对苏谈判失败之时，他的建议恰好应和了美国领导人日益加深的疑虑。

1947 年春，杜鲁门总统最终背离了罗斯福的国际主义计划，执行了凯南的遏制政策。但要这么做，他需要得到国会和美国民众的认可。在战后岁月里，美国公众沉浸在结束战时经济、回归和平时代的生活条件当中，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外交冲突似乎是十分遥远的事，孤立主义在美国和华盛顿仍然有力地存在着。

196

面对孤立主义的抵触情绪，杜鲁门总统公开呼吁本着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全球政策。他声言，美国要捍卫那些受到“各种力图强加给它们极权政体的侵略行动”威胁的自由民族的政治自由和民族自决。他没有解释什么样的战略利益要求实行这种新的政策，也没有说明他让美国干预遥远国度事务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现实限制。他强调的是西方的国际主义目标，而非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他需要赢得公众和国会对新的遏制政策的支持。实施这种新政策，需要结束孤立主义以及国会愿意批准和平时期的对外结盟和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民主和自决问题比全球势力均衡问题更易为美国公众所理解，杜鲁门政策

中的对外结盟和援助过去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具体说来，新政策寻求两大外交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增强对西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且急需外部经济军事援助的特定国家的实力。1947 年 3 月，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外援计划。希腊正陷在内战中，共产党占据了上风，土耳其则受到来自苏联的外交和军事压力。意在保护西方势力范围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以为民主而战和反对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根本不是凯南等外交官们所要寻求的政策，但它确实赢得了公众的支持，资金迅速得到批准。

第二个目标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在 1947 年中期的演说中，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议美国给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对外援助，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年，西欧的经济复兴正在推进，但代价高昂，如果没有外部援助难以持续。西欧民众悲惨的生活条件导致了社会动荡，成为共产党参与竞选的重要优势。1947 年，日本和西德看上去像是位于苏联势力范围边界带的重要前线区域。

提供援助的直接目标是实现遏制苏联扩张的经济复兴，更长远的目标是促进全球经济中各独立国家的经济状况趋于稳定。马歇尔提议，美国向那些愿意满足一定条件的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和经济支援，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它们合作使用美国的资金和援助物资，公布它们的财政和经济需求。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让美国在没有任何特定的外交回报或酬劳期望的情况下，致力于国际经济扩张和遥远国度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些新政策让美国走出了孤立主义，转向卷入欧洲和亚洲的国际事务。

尽管美国国会直到 1948 年中期才批准了马歇尔计划，但援助计划立即得到了所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它甚至扩展到了苏联及其卫星国，尽管公布经济状况的要求是苏联难以接受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起先公开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但随后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命令而表示拒绝。马歇尔计划并非是公然反共产主义的，而杜鲁门主义是。它们合在一起改变了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基础。它们把美

国的经济资源和潜在的军事力量，带到苏联和西方势力范围分界线仍然模糊的地区。东欧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表明，欧洲已一分为二。

到 1947 至 1948 年冬，战时大联盟不复存在。谈判业已停止，被双方公开的相互指责所取代。美国对欧洲发起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同时向希腊和土耳其运送武器军备。斯大林把苏联的势力范围改造为苏联帝国，这里所有重要的政策皆出自莫斯科。实际的军事冲突没有出现，但超级大国间的对话采用的均是战争言辞。从几十年后来看，我们知道，斯大林从来没有打算向西方发动军事进攻，西方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放大了。然而，他确实在利用从对德战争中获得的国际力量地位，强行对他国实施外交和政治控制。他执行的这种扩张主义政策，应为战后和平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

西方对苏联军事入侵的恐惧，对东西方间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领导人把苏联的军事力量夸大到超越其真实水平，声称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上共产主义，是苏联侵略意图的证据。这部分是因为他们需要赢得美国人的支持，部分是因为他们把苏联的强权政治错误地理解为革命的共产主义，他们的新政策像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这种敌对和恐惧的氛围导致了军事结盟和军备竞赛。

苏联卫星国和柏林封锁

苏联对 1947 年美国的新遏制政策立即做出了反应。不出所料，斯大林宣称这些行动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作为回应，他急剧地强化了对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的控制，要求其他各国共产党抵制美国“侵略性的”动机。1947 年末，苏联领导人组织了一次欧洲各国共产党会议，意在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莫斯科严正地看待来自西方的威胁，动员社会主义阵营内外的共产党和政府行动起来。斯大林的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复活了战争话语，呼吁反对马歇尔

计划和美国“扩张主义的反动政策”，他警告说，一场“针对苏联的新斗争”已经开始。他的警告意图是明确的：资本主义列强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是很可能发生的，共产党人必须联合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苏联对国际支持力量的动员主要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控制；导致东欧余下的非共产党政府权力遭到削弱；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发动起义进行自己的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剧烈的政治变革。1948 年 2 月，捷克共产党将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党派排挤出权力层，破坏了议会民主体制，创立了共产党一党专制政权，而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的授意下进行的。在铁幕后面，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民族自决。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权力，带来了一场控制该地区共产党的秘密运动，它在除南斯拉夫之外的每个地方都取得了成功。南斯拉夫领导人懂得，民族独立是他们革命的基本条件。铁托在 1946 年抗议道，他的国家不属于任何人的“势力范围”，当然，他后来又澄清说，他所指的不是苏联。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革命者，致力于一党独裁和社会革命；但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不愿意接受苏联的统治。1948 年初，当斯大林的代理人们试图用一名恭顺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取代铁托时，他们无力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团结一致的领导层。在秘密操纵失败后，斯大林让冲突公开化。1948 年春，苏联从南斯拉夫撤回了经济和军事顾问，这是莫斯科表示不高兴的警告。

198

是年夏，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它指责铁托把苏联的国际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野心勃勃、傲慢自大、欺骗性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其目标在于推翻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斯大林私下吹嘘道，“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下台”。他所做的不止于此，因为苏联及其卫星国还对南斯拉夫实施了经济封锁。南斯拉夫共产党紧密团结在铁托周围，挫败了斯大林控制他们国家的运动。忠于自己国家的共产党第一次违抗了斯大林和苏联的意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冲突，西方观察家将之比喻为《圣经》上大卫和哥利亚之间的争斗。

德国是美国与苏联第一次发生公开冲突之地。争端源于西方盟国对三个西方占领区的新政策。1947 年,它们的占领当局把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经济单元,这种联合是它们复兴西德经济努力中的重要步骤。此时,西德仍然遭受着战争破坏、严重的食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短缺以及剧烈的通货膨胀之苦。经济政策不再为整个德国制定,与俄国人的谈判早已破裂。西方盟国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新德国,为了达到该目标,它们决定无视战时的对德协定。1948 年春,三个西方占领国宣布在它们的占领区里发行新的德国货币,这是西德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西方和东方在欧洲中部分裂开来。西方着手重建新德国。即便没有东德的土地,这个国家仍然拥有 5 000 万人口和足以让它成为欧洲主要经济强国的工业基础。在美国的支持下,它变成了前线地区,西方占领军不再保护盟国反对德国,相反,它们保护自己控制下的德国区域反对苏联。

像反对独立的南斯拉夫一样,斯大林强烈反对创建一个统一的西德。他再次诉诸经济封锁的办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阻止西德统一需要终止货币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下令封锁柏林。当新货币在 1948 年 6 月首次亮相时,苏联军队阻断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通道,切断了西柏林 250 万居民来自东德的电力供应。苏联的目标不是夺取整个柏林,柏林人只是他手中的“人质”。斯大林的目标是通过让西柏林人饥饿和寒冷,阻止统一的西德形成。他们变成了冷战的人质。他们只能完全依靠来自西方的供应。斯大林希望,面对无助的柏林人的苦难,西方列强会放弃它们的统一计划,以换取苏联结束封锁。

199

他没有考虑到现代空运的能力,因为苏联自己的空运能力很弱。西方各国沿着空中走廊源源不断地运来补给,这是在没有战争行动的情况下苏联所阻止不了的。空运发挥了作用,在当年冬天,空运频率达到巅峰时期,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抵柏林。封锁失败了,1949 年 5 月,苏联官员最终开放了柏林通道。双方都没有动用军事力量,因为双

方都力图把冲突限制在政治和外交范围里。但封锁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对战争的恐惧,斯大林弄巧成拙的政策只是加速了西方占领区的统一和西方军事联盟的形成。

遏制和军事同盟

1948 年,美国政府超越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遏制政策,考虑重建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与战后让士兵大量复员的政策相左,但得到西欧领导人的支持(用乔治·凯南的话来说就是),以克服“他们自身军事上的无助局面”和他们“自信的缺乏”。美国再次开始军队招募。1949 年,美国的国际责任进一步扩展,缔结了一项联合北美和西欧各国的集体安全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要求每个成员国帮助其他成员国反抗外来侵略。假想敌是苏联,北约国家的主要保护者是美国。

大量的美国军事补给源源不断地送到希腊政府手里,帮助它在内战中对抗共产党游击队。由于人数上被希腊常备军超过且 1948 年后失去了南斯拉夫的支援,共产党于 1949 年终于放弃了斗争,他们的领导人和残余部队逃往苏联各卫星国,同时带走了成千上万的希腊平民。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可能是阻止这个国家变成共产党独裁政权和苏联卫星国的决定性因素。

1947 年,美苏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但在此后数年里,它们的角逐日益集中到军事力量平衡和开发原子武器的问题上。在冷战背景下,科学家变成了战士,实验室成为规划未来战争的重要场所。任何一方都没有把这种军备竞赛当成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手段,但每一方都担心新式武器给予对方的力量。这种逻辑在苏联和美国都真实地存在着。

1949 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完成了斯大林在 1945 年下达的研发苏联核武器的命令,速度比西方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得多。他们已开始研制氢弹,这种武器的破坏力比原子弹大 1 000 倍。在此期间,他们还着手研发弹道导弹,这些火箭能携带核武器,在几十分钟里从苏联打到美国。这是远程炸弹方面的重大进步,苏

联在这方面本来相当欠缺。而苏联的每一次新动向都会迫使美国研制新的军备。双方的军备竞赛似乎处于没完没了的循环当中。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意图充满疑虑,1950 年(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它开始实施一项精密的计划扩充其武装力量。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一个庞大的核武器库,其中包括氢弹。美国军事领导人下令在太平洋岛屿和美国西部进行地上核试验,他们把试验转变为破坏力测试,让整支海军舰队驻泊在太平洋的核爆地点,修建模拟城镇用于陆地试验。他们敦促美国公民在自家后院建造防空掩体,储备能在地下维持数周生存的补给物资。第三次世界大战变成了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

200

由于坚信斯大林的侵略意图,美国政府断定,国家安全取决于维持对苏联的军事优势。在靠近苏联边境的盟国,美国为其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修建了空军基地,其轰炸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准备攻击苏联。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做好军事准备”逐渐主导着美国的冷战思维。悲剧的是,苏联和美国领导人都找不到比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用途更好的其他路径,保证本国得到根本性的保护。

聚焦:艾伦尼·加佐扬尼斯

艾伦尼·加佐扬尼斯(Eleni Gatzoyiannis,1912 — 1948)的悲剧是她身处冷战的前线地带。她只知道自己和孩子在内战中被抓了起来,但对诸如“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主义”之类的词汇她一无所知。占据了她所居住的希腊北部偏远山区的共产党游击队,相信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军队,而不是山谷下面的希腊政府军队。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每个人都不得不加入战斗,那些胆敢违抗者一定会遭到惩罚。艾伦尼对这场争斗的理解跟共产党不同,因此违抗了他们的命令,她如此为之是想挽救自己的孩子们,但却付出了生命为代价。

她居住的村庄靠近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边境,希腊国王及其政府远在雅典,国家政治在山区的村民生活里没有一席之地。这里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村里的男人远行他乡,甚至到美国赚钱养家糊口。她

的丈夫在美国工作谋生，他经常回来但从未在家停留很长时间。对家人来说，他像个带来遥远异乡礼物和传说的稀客。在结婚的头八年，他们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乡是村庄的规矩。在山民们严格的道德规范里，妇女照料孩子，赡养父母，维系家庭，男人外出挣钱养家。艾伦尼恪守着这样的道德规范。

1940 年，战争降临希腊，她的家族帮助她维持生计，她的丈夫不能够回来，甚至不能够继续给家里寄钱，因为来自美国的信件不再送到这个小山村。她的父亲带来食物，使她的家庭免于挨饿。村里的男人加入共产党游击队，与德国人作战。德国军队横扫整个地区，追击游击队，焚毁涉嫌帮助游击队的村庄。她很幸运。她家周围的许多房子都遭毁坏，而她的农舍竟得以幸免。战争结束时，她的家庭一直保持得完好无损。和平复归，艾伦尼恳求丈夫把家人带到美国，他答应一旦自己存足了钱就把家人迁过去，她只有继续等待。

201

接着，内战爆发。1945 年，共产党游击队为躲避希腊政府军，逃到南斯拉夫，1946 年，他们又回来了。战争，而不是政治运动和选举，才是争取政权的手段。他们仿效南斯拉夫共产党，后者帮助他们训练军队，给他们提供军火武器。他们的民主军(Democratic Army)面对着强大的希腊政府军。政府军队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帮助训练，配备着英美武器，民主军没有足够的力量走出山区。1947 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他们在希腊北部所谓的解放区组织了自己的临时政府。

村民们成为这个微小的新生国家的公民及强迫劳动力。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向斯大林画像敬礼，学唱“为我们宝贵的自由而斗争”！共产党告诉村民们，保护“与我们合作的朋友”，但严惩任何与“君主制法西斯”敌人合作的人。唯一迅速影响到村民们生活福祉的变化，是谷物损失。它们被新政府作为税征缴上去了。村民们还要花费时间参加新当局组织的集体劳动。艾伦尼经常受命到田间收割谷物，但收上来的谷物都被游击队据为己有。

不久，共产党命令年轻妇女到他们的军队里服役。艾伦尼通过在大女儿的脚上浇开水并继之用火红的烙铁烫，让她免于到军中服役。

地方当局怀疑艾伦尼违抗了他们的命令。为了不被逮捕，她毫无办法阻止自己的二女儿被征召入伍，保护自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难。

1948年春，希腊共产党决定把他们领地上各村5—14岁的孩子运到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他们称之为"儿童集中管理"，并解释说他们只是希望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躲避战争伤害的安全场所。但实际情形是，这是他们为了即将来临的长期斗争强行征召新追随者的路径。他们的斗争进展受挫，他们的领导人拒绝承认失败，希望向北撤退到希腊边境之外，在相邻的共产党国家为自己和追随者寻找到避难所，为发起新的斗争做准备。他们知道，父母们会抗拒自己的孩子被带走，他们的警察不得不用武力夺走孩子。在几个月里，他们聚集起了2.5万名被强征的年轻难民。

艾伦尼拒绝任由这种事情发生。政府军的前线仅在几英里之外，她的父母和兄弟就在战线后面。她与左邻右舍的妇女们秘密寻求办法，组成了一个有20名妇女和儿童的团体，准备下山，穿过前线，到达山谷和安全地带。就在他们准备动身前，游击队再次命令她到田里工作。她不得不去，因为假如她加入这群逃亡者行列，安全警察就会察觉并最终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因此，她最终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孩子们。



逃脱了"儿童集中管理"的人们：希腊难民儿童与母亲们，雅典，1948 (Christopher Emmett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面对这么多人逃走，当局恼羞成怒。他们从未信任过她，称她是202“美国走狗”(Amerikana)，他们指控她私通敌人，对她进行审判。当地领导人组织起来的小型公审会在村里举行，他们对她严刑拷打，让她坦白交代，逼迫邻居指控她，他们事先业已断定她有罪。在她的孩子们逃出去两个月后，她被行刑队枪决了。

新苏联帝国

在东欧，斯大林通过他的驻外大使和秘密警察官员们，统治着苏联西部边境外的一系列共产主义小国。这些国家的政府成为“附庸”，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领导层和重大政策的决定都由莫斯科做出。这些国家犹如苏联的“外围”帝国区域。

“外围”帝国区域

1948 年后的数年里，所有外围帝国区域都是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微型摹本，它们的领导人像斯大林一样以独裁权力施行统治，利用类似的警察镇压方式。在一些国家，上演着小型的“装样子审判”，矛头指向被指控为“民族叛徒”和“铁托主义”的共产党员。这些搞笑的司法审判复制着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审判经验，所有被指控者都坦白自己的罪行，大多数人遭到处决。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强行应用到东欧社会。工业和商业被国有化，农民被迫以低价把农产品出售给国家，国家计划为工业增长确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以民众凄惨的生活条件为代价来达至这些目标。20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斯大林式的文学风格，被强加给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被迫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天才”。公共生活被强行纳入斯大林主义模式当中，被一片灰暗色调主宰着。

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只有南斯拉夫逃过了斯大林主义的统治。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随之而来的是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孤立。它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停止了，苏联

及所有东欧国家都与它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此后一年时间里，铁托继续申明他忠于斯大林主义，忠于苏联社会主义。当和解最终幻灭后，他逐渐与他曾经用以指导南斯拉夫内外政策的斯大林体制分道扬镳，与新独立的亚洲各国领导人一道，创建了所谓的不结盟运动，拒绝加入西方或苏联任一方的军事同盟。但南斯拉夫的一党专政，是他忠于苏联共产主义岁月的遗迹。

效仿苏联的模式，他的国家保持着民族共和国联盟的宪政体系。铁托给予生活在这里的每个民族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通过这种方式，维系着共和国内众多民族的和平相处。塞尔维亚族人口最多，居住在该国北部的民族——斯洛文尼亚族(Slovenes)和克罗地亚族(Croats)最为富裕繁荣。铁托政府推行政策，把北部民族的收入和经济资源中的一部分重新分配给较为贫穷的南方，他的威望及其政党的权力让这种方式能够顺利进行。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反叛者，他在50年代初甚至稍稍放松了自己的专制权力。唯有他的国家享受着真正的独立，他的人民免遭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尽管铁托公开反抗苏联的霸权，但斯大林并未选择入侵南斯拉夫。尽管红军包围了南斯拉夫，制造具有威胁性的行动，但他们从未发动攻击。斯大林或许是担心南斯拉夫的持久抵抗，或许是决心避免与美国开战的任何风险。在欧洲安全方面，这位独裁者执行的是一种极其谨慎的政策。铁托的反叛并未扰乱苏联在其边境沿线其他地方的统治。1949年后，苏联能够使用原子武器，但它在军事方面仍然弱于美国，它只拥有几架远程轰炸机，它的海军还不过是保卫沿海的海岸卫队。无论是出于谨慎还是出于害怕，斯大林执行的都是一种控制性而非进攻性的外交政策。

这位苏联领导人正逐渐老去。1949年，他庆祝自己的70岁大寿，从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地收到如此多的礼物，整整堆满了两大仓库。他继续以独裁权力施行统治，执政党圈子里他的下属们都胆战心惊。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Khrushchev)后来回忆斯大林是怎样能够“在丝毫没有警示的情况下以真正的恶意打倒你”，他的疑心一如既往地尖刻。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公开猛烈的谴责，预示着苏联对犹太人迫害的加剧，而生活在苏联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1953 年 3 月，新一轮恐怖浪潮的种种迹象戛然而止。这个月，脑溢血终结了斯大林的生命，或许，他的顾问们有意延搁进行医疗急救的命令加速了他的死亡。他的死，结束了俄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历史上一段不寻常的、可怕的时期。

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1953 年斯大林去世，结束了他的残酷统治，但他在苏联和东欧确立的共产主义独裁体制依然存在。他的继承人们——苏共政治局(后来叫主席团[Presidium])里的一群人，回归到列宁创造的党的集体领导的方式。他们相互竞争国家的领导地位，直到 1955 年赫鲁晓夫千方百计控制了党和国家。

204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自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存在的政策和机制，以及这位新领导人的个性和目标，决定着苏联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斯大林时代沿着共产党的层级逐步晋升，成为这位独裁者周围的领导集团的一员。像他在主席团中的同僚们一样，他从未怀疑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他们主导的经济体制和平等的社会体制具有历史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苏联社会主义必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以及共产党的专政体制是必要的。他们统治的态度和方式，是在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残酷世界中形成的，这种政治文化培育出他们对西方持怀疑和敌对的看法，它支撑起他们武断教条的信念，即他们知道什么才是对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卫星国最有利的。

但他们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与斯大林体制决裂。党的整个领导层都懂得，他们必须结束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秘密警察的巨大权力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统治，也违背了一党统治的列宁主义体制。他们继而将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革职查办，并以“反人民罪”将其处死。恐怖的法律被取消了，成千上万斯大林的受害者从监狱或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静悄悄的“非斯大林

化”进展不够快，1956 年初，他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和给那位独裁者披上永不谬误光环的“个人崇拜”。反对一切形式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公民，在听到他的演讲后欢欣鼓舞，东欧各国人民期盼终结在他们国土上的斯大林主义势力范围。

实际上，在需要保护自己的制度时，苏联领导人并未摒弃使用镇压性措施。他们保留着秘密警察，如今叫作“国家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或简称克格勃(KGB)，用以镇压各种政治异见。他们仍然授权国家审查委员会加强对马列主义真理的垄断。他们决心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完好无损，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只要党的集体领导层基本同意其政策，赫鲁晓夫就能继续执掌权力。他采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提高苏联民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免于困苦。1961 年，他甚至向他们允诺，他们的生活在几年内就能富裕起来。他的“我们这一代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呈现为宏伟的福利国家面貌，国家给居民提供免费的住房、教育、交通和卫生保健。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历史的最高阶段)意味着，在支持集体消费的国家计划的保证下，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生活条件。私人汽车、音响、牛仔裤和摇滚乐等西方个人主义消费社会，体现了腐败的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同样反对苏联共产党上层一直以来享有的种种特权，他因为腐败蔓延整个国家，而训斥国家和党的官员，他梦想复活列宁时代的革命激情。他可以说是苏联政权最后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梦想家。但当他试图结束他们舒适安全的权力地位时，他的同僚们掉转矛头对准了他。

205

他们不准备让他削弱他们享有的种种特权或他们一党专政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终结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的努力失败了。他未能理解到，各种官僚机构是党保持对政治权力、生产资料以及公众文化和信息严格控制的基本机制，批评者把这种体制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限公司”(USSR Inc.)。即使他自己的同事最后也反对他，于 1964 年表决让他提前退休。他们停止了他的许多改革措施，结束了对斯大林罪行的公开谴责。他们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是教条的，对改革充满恐惧，对

苏联人民、庞大的国有经济和苏联帝国进行严厉的控制。这种修改版的斯大林主义体系又持续了 20 年,直到另一位党的改革者试图矫正其严重的弊端,但为时晚矣。

在这些年里,这种体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流行,加强了苏联领导层对它的信心。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把第三世界看作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逐主导权的舞台,马列主义的信念让他们确信他们这一方会赢。他们愿意向赞同社会主义理想的亚非拉非共产主义政权提供经济援助,他们只要求这些国家在冷战冲突中“不结盟”,也就是不要变成美国的盟友。

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中找到了支持的听众。1959 年末,古巴新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吁请莫斯科帮助其新政权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得到了对方热烈的回应。在非洲,西非的安哥拉(Angola)社会主义政权和东非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而且在击败它们的国内敌手时还获得了来自古巴的武装力量的援助。1977 年,当一群阿富汗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国家夺取政权时,苏联的经济援助接踵而来。

在这些年头里,势力均衡是苏联和美国领导人都在关注的问题,他们新的全球政策都是力图让世界平衡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1962 年,苏联的中程导弹运抵古巴,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判断苏联的战略利益会从中获益。在苏联这种新的世界政策中,军备竞赛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强权政治早已变成了冷战的一部分。

苏联帝国的动荡

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千方百计地维持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执掌权力。他们意识到结束恐怖主义统治体系和斯大林在这些国家确立的经济盘剥政策的紧迫性。他们改变了苏联与卫星国之间的贸易条款,以便改善各国人民悲惨的生活条件;他们向这些国家发展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渴望做出让步。但他们准备使用武力,阻止这些国家摆脱苏联的统治。



各种武器的游行展示：十一月七日庆典，莫斯科红场，约 1965 年(Patty Ratliff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956 年，苏联领导人反应神速，以武力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当年年末，匈牙利学生和工人发起非法的游行示威，抗议政治经济压迫，示威活动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反斯大林主义起义。受到全体国民支持的匈牙利改革派宣布了他们的宗旨，要结束共产主义独裁体制，解除与苏联的军事关系。他们从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行动中汲取到了灵感。匈牙利军队加入抗议者行列，改革派共产党人接掌了政府。对首都布达佩斯中心 40 英尺的巨型斯大林雕像的破坏，表明了匈牙利人对这位苏联独裁者及其附属体系的憎恨之深。起义成功地把权力交到了独立政府的手里。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恢复了公民和政治自由，宣布要让匈牙利变成一个自由中立的国家。

206

它的计划，与苏联坚持对东欧进行军事控制和维护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立场发生冲突。赫鲁晓夫不允许匈牙利擅自从“社会主义阵营”分离，起义开始一周后，苏军侵入了这个国家。他们粉碎了叛乱，让忠

于苏联的共产党人上台执政。匈牙利人失去了获得民族独立的机会，但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敌视分毫未减。

207 欧洲最危险而有形的边界，划分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个敌对的阵营。这条分界线贯穿德国中部，在其东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1 500万德国人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下。东德人对他们遭受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每年有成百上千的难民逃往西德。这个苏联卫星国经济的抽空耗竭是如此具有破坏性，乃至苏联领导人要么采取强制行动，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东德人口逐渐流失。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西方列强从西柏林撤出，使之落入东德的控制下。但西方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1961年，赫鲁晓夫冒着大规模国际危机和可能爆发战争的危险，让东德政府围绕西柏林修建了一道不可穿越的有形障碍物。这年8月，东德工人在苏军的保护下，用上面有带刺铁丝网的水泥墙将西柏林围了起来，并由东德边防军守卫着。"铁幕"终于降临到东西方之间最后一小块开放地带上。美国政府担心激起军事对抗，不愿挑战苏联的行为，欧洲继续分裂为苏联和西方军事同盟。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柏林墙成为战后和平安排失败的象征。

军备竞赛和古巴导弹危机

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遏制政策里包括核威慑政策，也就是说，开发破坏力巨大的核弹头，让苏联领导人永远不会考虑对西方发动侵略战争。50年代中期，美国军队拥有原子弹和氢弹，技术进步让他们拥有了更有效也更昂贵的毁灭苏联的手段。

到50年代末，美国武装力量的指挥官们已将他们重要的战略武器付诸应用。他们依靠三种手段对苏联目标发射核弹，一是驻扎在全球各地机场的超音速轰炸机；二是巡游在苏联沿海装备着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三是美国境内可打击苏联任何地区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它们组成的军备"三角"，在美国遏制苏联进攻欧洲或亚洲的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力图维持对敌方的军事优势，美国的这种战略是

促使军备竞赛升级的催化剂。

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继续发展现代军备。事实证明他们的核科学家和工程师，与美国那些掌握制造有史以来威力最强大炸弹的技术的专家们一样能干。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武器的破坏力是如此之大，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们也相信，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依靠拥有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力量。1956 年，赫鲁晓夫宣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与斯大林酷烈的预言恰好相反。跟美国领导人的观点一样，他的乐观主义立基于这样的理由之上，即本国的军事进步会威慑冷战的对手。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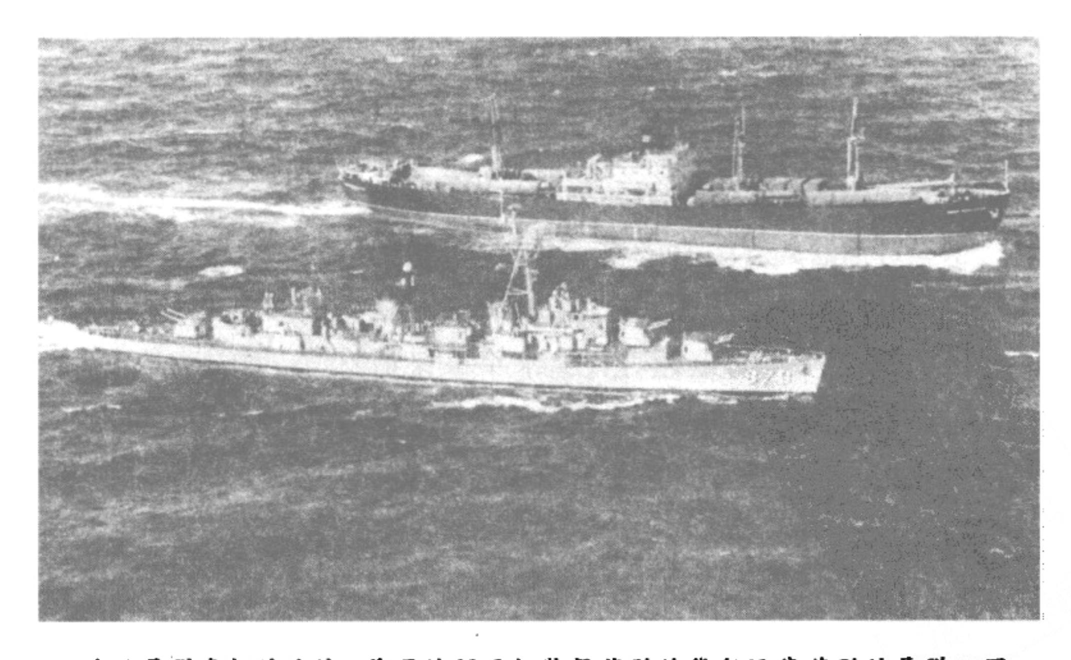
他对军事力量的追求，包含了对现代战争可怕后果的认知。一年前，苏联科学家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氢弹。1957 年，他们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他们称之为“斯普特尼克”(*Sputnik*，意为“小旅行者”)。这项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苏联的技术能力，它还证明了苏联科学家业已开发出远程弹道导弹(火箭能把核武器运载到数千英里之外)。60 年代中期，苏联的军事力量进一步扩张，第一次建成拥有核潜艇的多洋海军，能够向遥远的目标发射弹道导弹。此时，美国和苏联均有多次毁灭对方的可怕能力。武器建造的费用高得可怕，尤其对苏联经济而言。美国国防开支占国民年均收入的 5%，而富裕程度不到美国一半的苏联，不得不将 20%－25%的经济产出用于军事计划，苏联境内多座秘密城市完全致力于武器开发。

这些可怕的武器在 1962 年晚些时候差点真的用上了。这一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源于卡斯特罗革命和美国反对古巴共产主义(参见第十一章)。卡斯特罗向苏联领导人请求军事保护，尽管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但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1962 年春，赫鲁晓夫提议在古巴驻扎一支整建制苏联导弹师。它离美国如此之近，其中程弹道导弹能打击美国的任何部分。赫鲁晓夫这种不计后果的援助之原由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希望借此行动极大地提高苏联的全球力量和影响。然而，他没有让古巴人控制他们领土上的核武器，这项外交行动在严格意义上是苏联人的事。

是年秋,美国政府发现了古巴的导弹装置后,要求他们立即撤出。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们一致认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也是如此),苏联的这个行动对西方来说代表着毁灭性的外交和政治失败。冷战有其自身特殊的胜败逻辑,通过各方相关的外交和军事力量度量出来。肯尼迪的顾问们在适当的应对手段方面意见不一,但果断决绝的行动至关重要,美国一些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坚决主张必须马上开始侵入古巴,如果苏联部队动用核武器,或苏军报复性入侵西柏林,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肯尼迪暂时搁置了入侵行动,而是选择利用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阻止苏联其余船只抵达古巴,同时留下几天敞开谈判大门。他的谨慎得到了报偿。

在美国入侵古巴即将开始的前一天,赫鲁晓夫接受了美苏领导人秘密商定的妥协办法。他同意从古巴撤回导弹,换取美国总统公开承诺不下令侵入这个岛国。作为妥协的重要一部分,肯尼迪秘密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双方领导人私下里都谈论了他们避免核战争的高明解决之道。在向苏联领导层的同僚们解释他为什么选择退让时,赫鲁晓夫惊人地坦诚:"一旦你开始射击,你就停不下来。"在当时的语境下,核威慑促使双方不得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

209



古巴导弹危机的终结:美国的驱逐舰监督苏联的货船运载苏联的导弹回国,1962年11月10日(UPI/Corbis/Bettmann)

重点：外太空的冷战

美苏之间的竞争扩展到外太空。长期以来，探索太空的梦想激发着小说家和爱幻想的科学家。当探险家们尚在描摹世界上最后的未知地区的地图时，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在他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就已描绘了人类太空旅行和探索月球的幻想故事。100年后，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是美苏之间竞争军事力量和世界威望的产物。

火箭能飞行如此遥远的距离，它成为一种能把核武器运载到世界任何地点的可靠手段。军用火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最先出现在德国，当时这种武器的威胁还不大，因为德国的核武器研究尚未有结果，而盟军在德国迅速推进。美国和苏联政府都清楚地知道德国这种技术巨大的军事潜力。

首先抵达德国火箭研究中心的美国军队，夺取了德国所有的V-2火箭。德国空间科学家已经逃走，但很快向美国当局投降。被带到美国后，这些活的"战利品"成为美国新火箭计划的创始人。该计划花费极其昂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进展缓慢。空军幻想家们对试验有人控制的火箭推进飞行器(X系列)更感兴趣，这种飞行器达到的速度能把他们送往太空，最终让他们绕着地球轨道飞行。 210

50年代后期，苏联的火箭开发改变了美国空间计划的步伐和方向。苏联军方急迫需要运载其核武器的导弹，因为它缺乏足够的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所拥有的那些远程轰炸机。二战末期，斯大林亲自给予苏联太空计划最高优先权，他下令把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火箭工程师塞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从监狱实验室放出来，他原本因"反革命活动"要在这里服25年的刑。科罗廖夫在绝密状态中工作，他证明了自己是苏联军方最具创造力和最成功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成就堪与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相比，萨哈罗夫曾负责研发苏联氢弹(参见第十三章聚焦)。到50年代中期，科罗廖夫及其研究小组已测试了能够运载物品到达太空的远程液态燃料火箭，如果

这个物品是核武器，那么它能在一小时内打到美国的任何地区。洲际弹道导弹是破坏力强大的新式战争武器。

对赫鲁晓夫来说，它似乎是向全世界炫耀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伟大成就的激动人心的工具。在他的命令下，科罗廖夫研制的火箭以一个小金属球体里面放了一台小收音机的形式，第一次公开亮相。1957 年秋，科罗廖夫用他的新火箭把名叫“斯普特尼克”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它引起了极大关注，使形势完全有利于苏联。它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始，也让冷战进入新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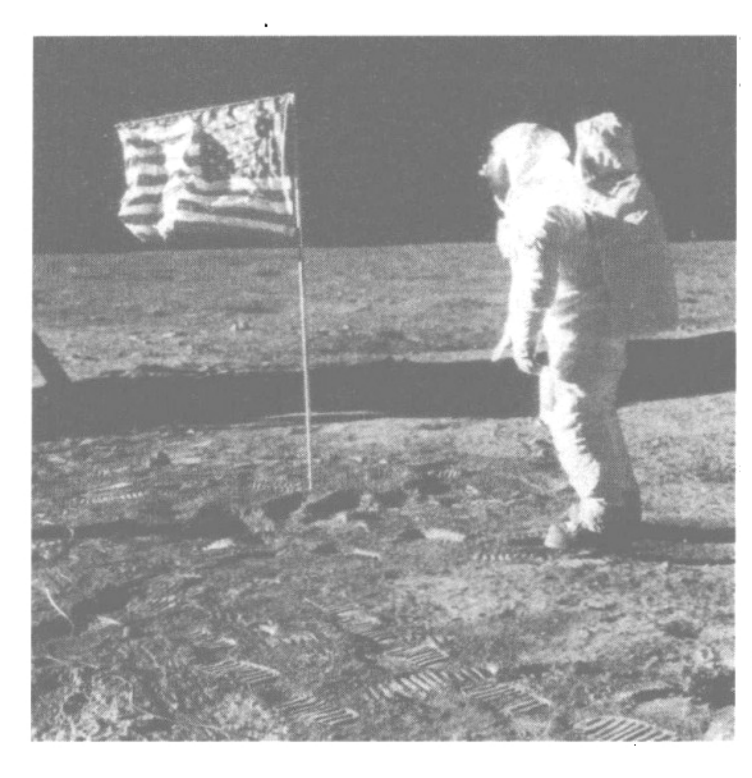
美国军方的导弹计划也开发出强大的火箭，但它根本不能与科罗廖夫的发明相匹敌。1957 年，由于被国会议员和新闻界指责“在太空冷战中败北”，美国政府立即着手发射自己太空卫星的紧急方案。最初，可以预见的是，匆忙的行动带来的是惨败，观察家给当年晚些时候美国失败的发射命名为“卡普特尼克”(kaputnik)。随着苏联成功地将更大的有效负荷运载到太空，急迫性日益增加。“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在西方的称呼，他的真实名字直到去世后仍然是保密的)看上去似乎能创造奇迹，如果他的火箭如此有效，那么他们甚至可以把人类送上太空轨道。美国性能可靠的火箭投入运营，1958 年将卫星送上了轨道，这些著名的科学发明只是加剧了“太空竞赛”的动能。

这场太空竞赛有四个重要的、截然不同的维度。在早期岁月，最显见公开的成就，来自美苏双方领导人决心实现太空探索，以强化他们各自的政治体制在全球的名望地位。但这种宣传背后隐藏着重要的、秘而不宣的太空军事用途。接着，政府和工业企业察觉到通讯和导航卫星在电子时代具有无价的、经济利润丰厚的太空用途。最后，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是太空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的太空站和太空旅行以及无人的太空探测产生出大量新发现。

211

在第一次人造卫星发射的激发下，美苏双方的公众目光和政治优先考虑都迅速地集中到把载人航天器发送上轨道，比之更甚的是把载人航天器送到月球并返回地球的诱人前景。苏联“总设计师”展示了其火箭研究团队的卓越能力。1961 年，装载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Yuri Gagarin)的太空舱绕着地球转。在一年之内，苏联其他几名宇航员(包括一名女性)证明了人类能经受住短暂太空旅行的严酷环境。



登月竞争的胜者：宇航员阿尔德林和美国国旗，月球，1969(NASA/Johnson Space Center)

苏联取得这一系列胜利没多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决定美国不能在太空只做“第二”，他许诺美国在这个十年的末期将“让人登上月球”。新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突然发现自己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预算执行此项计划，它面临着公众和政府要它立即产生结果的压力。212 1961年下半年，美国第一位宇航员阿兰·谢泼德(Alan Shepard)被发送到太空，他的太空舱立刻返回地球，在上升到地球大气层上面后，像颗人体炮弹般迅速下落。摆在NASA面前的是巨大而复杂的任务。

美国在登月计划上的成功，代表着无与伦比的工程学成就。苏联的秘密登月计划失败了。科罗廖夫在1965年去世，他的研究小组未能造出危险重重的登月旅行所必需的可靠火箭和导航系统。在这些年里，美国空间工程师们设计出36层楼高的巨型火箭“土星号”(Saturn)，它有足够的功率把载有3名宇航员的宇宙飞船加登月飞行

器送到绕月轨道。第一次登月发生在 1969 年，“人类的一大步”，当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的脚踩上月球时他向世界宣布道。这给美国带来了最伟大的空间胜利。他的同伴埃德温·阿尔德林(Edwin Aldrin)跟在他后面走出登月飞行器，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月球土地上，NASA 赢得了登月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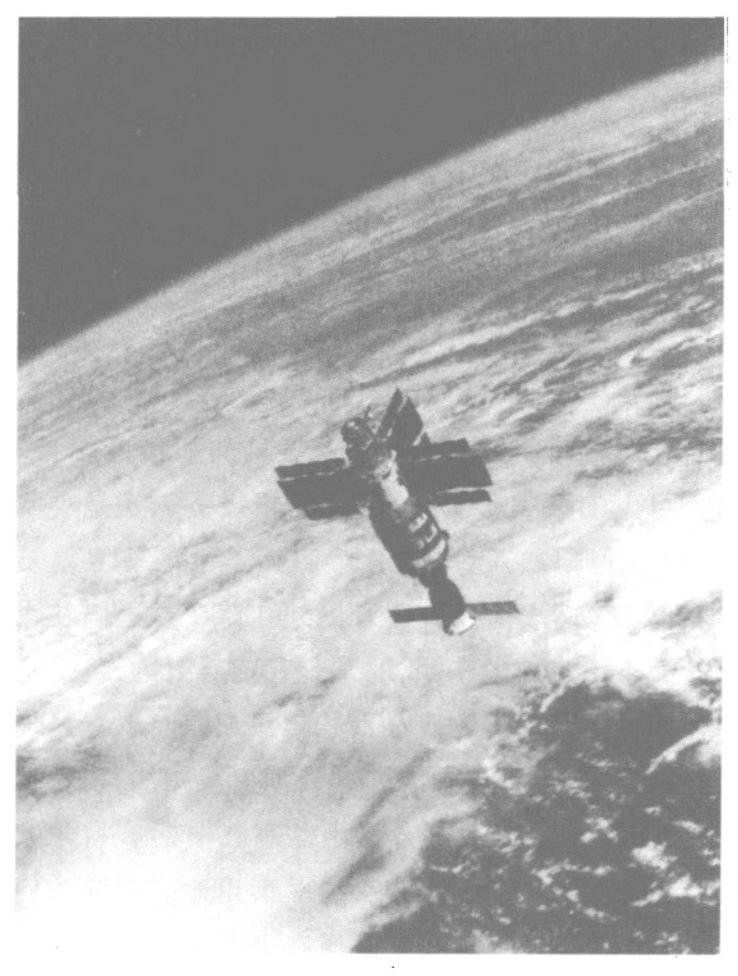
这个成就是载人空间探索的高峰。这些年间，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外问题，政府把大量的财政收入投入到为美国人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中。一些美国人对太空计划感到的幻灭表现在海报招贴上。这年晚些时候，一名示威者在贴在华盛顿白宫前面的海报上写着：“你许诺给我们食物，但你给我们的却是月亮。”给 NASA 的拨款减少了，最后一次登月发生在 1972 年。

太空的军事用途继续快速发展。从太空监控地球的可能性，创造了侦测军事秘密(如火箭安装、武器和部队调动等)的诱人前景，无需再利用复杂的情报搜集方案或危险的高空飞行。此前，美国从喷气式飞机上对苏联进行空中侦察的行为，曾引起严重的国际事件。1959 年，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飞行在俄罗斯上空 10 英里处的 U－2 侦察机，美国飞行员降落到地面被俘后，苏联政府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他的交代将冷战的秘密之一广泛传播到整个世界。

卫星执行任务比任何飞行员都要有效得多。被置于轨道上的卫星再三飞过地球的广袤区域，它们高度精确的相机传回地面的照片，让 10 平方英尺的目标都清晰可见。到 60 年代晚期，美苏军方在侦察卫星方面都取得了技术完善的奇迹。核军备限制条约(SALT Ⅰ和 SALT Ⅱ)是值得信任的文献，因为每一方都拥有全部图片证据证实任何违约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对方会遵守条约内容的承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空竞赛在超级大国间制造出有效的维护和平手段，比冷战开始时所能想象得到的任何手段都有效。

然而，军方领导人继续把太空视为一处战场。到 80 年代，弹道导弹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精确性，制造弹道导弹所需的技术和工程技巧变得非常容易掌握，所以军队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有自己的

火箭，以便在万一发生核战时使用。在美国一些科学家，以及在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看来，太空是最终能够防御弹道导弹攻击的场所。"星球大战"(Star War)计划白白地耗费了大量的基金，希望装备着强激光的卫星，能够在来袭的导弹打到美国之前将之全部摧毁。该计划是昂贵的和不现实的，不可穿透的太空盾覆盖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如此广阔的空间是不可能精确命中目标的。该计划的研究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但规模小了许多。 213



太空中的家：苏联的轨道空间站"萨柳特-7"，1985(Russian Space Agency)

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卫星从一台小收音机上播送信号，只是为了让地球上每个人都知道它正在头顶飞行。这给予了各国政府和涉身通讯业的企业有益的教导，骤然之间，即时的广播和电视信号传输到地球最僻远的地方成为了可能。包含词语、数字、音乐或声音的微波信号，能 214

够传到相对地球处于某固定位置的卫星上，然后返回到等待中的接收器上——圆盘式电视卫星天线(satellite dishes)。这种装置到 80 年代尺寸很小，价格便宜，消费者都能承受得起。依赖新兴的电子技术的产业，把太空看作是经济扩张和获得利润的新边疆。

全球性的电视网络出现了，诸如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的星空卫视(Star)，它们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播送商业计划。在国家新闻检查严厉限制电视节目的国家的民众，开始购买自己的卫星天线，收看不受检查的娱乐节目和新闻。从事国际金融交易的商业企业，能够即时地与世界各地的分部联络，处理它们的事务。卫星通讯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依靠广播和电视在民众中传播忠于国家及民族团结信息的各国政府，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政府，也受益于卫星。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拥有了自己的通信卫星，这让国有的广播电视网络能够把它们的节目传送到全国辽阔的领土各处。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利用导航卫星给地面站点提供精确的经纬位置。它最初仅用于军事，但很快就服务于航运公司和查询船只位置可靠信息的海员的需要，GPS 成为了导航员必不可少的装备，无论是巨大的超级货轮还是小帆船。有用的知识、金融投资和国家宣传，所有一切都通过这些卫星传播。到 90 年代，它们的数量约有 500 颗，还有另外 1 000 颗是仍在太空中的残骸。夜空中看上去像流星的东西，时常是它们反射的光。

科学发现作为宣传和军事开发的副产品而积累了起来。以登月作为结束的疯狂的太空竞赛之后，美苏两国的科学计划变得更加有力，得到更多关注，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冷战竞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家得到资助，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可能有潜在的军事用途。苏联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建造永久性的空间站，其宇航员在上面发现了人类生命在外太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苏联空间站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此后十年它们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得到了发展。它们甚至到苏联解体时仍然继续存在，苏联在中亚的太空中心突然变成了新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的财产。宇航员每次在上面待上七八个月时间，太空变成

了他们暂时的家。

美国的太空研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它的太空探索逐渐依靠载满自动记录科学观察设备的无人卫星。这些信息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地球的地理状况，而且通过太空照片也揭示了月球和太阳系各行星的地理条件。20 世纪 60 年代初，卫星抵达火星和金星，十年后它们环绕木星转。美国第一颗触到另外行星的卫星 1975 年登陆火星；最雄心勃勃的天文学试验是 1990 年发射哈勃太空望远镜(Hubble Space Telescope)。它是一台巨大的、精确的仪器，能够观察并拍摄遥远的星系，清晰度比地球上最好的望远镜还要高上许多倍。起初，它没有显示有任何军事秘密，后来，在严重的技术问题被矫正后，它证明了自己探测宇宙中潜藏的秘密的能力。严格地说，它的成就超越冷战属于全世界。

航天飞机是美国太空研发的第二个新领域。1981 年，NASA 发射了第一架“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传统的空军想要一架能够进入轨道并返回着陆的飞机的梦想部分地实现了。这些飞行器搭载巨型火箭被送上天空，在太空停留几天后，像飞机一样返回陆地。航天飞机成为在轨道上运行的实验室，宇航员在其中执行检测材料、拍摄地球照片和修复其他卫星等任务。美国航天飞机每次发射和着陆，都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太空继续保有凡尔纳小说在读者中制造的那种神秘吸引力。任务的成功是 NASA 继续得到资助的保证。1986 年，一架航天飞机在发射升空后不久爆炸，上面的几名航天员死于非命，NASA 被指责草率行事。

苏联崩溃后，NASA 加入新的国际时代，与俄罗斯太空署展开合作，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空间站连接到一起。2000 年，国际空间站成为首次多国共同持久维系人类太空活动的努力，建造空间站本身汲取了俄罗斯的经验，美国航天飞机为空间站运来设备，为宇航员和天文学家往返地球提供常规运输。国际空间站体现了冷战后时代的太空探索观，但公众对太空探索的兴趣以及太空探索的科学回报的重视仍然一如既往。从太空观察，地球看上去像一个彩色的但微小的物体，漂浮在广袤的宇宙中，从太空探索中得到的终极道德教益是微渺谦卑。

新欧洲

当苏联正在把“帝国”扩张到东欧土地上时，法兰西帝国和不列颠帝国业已土崩瓦解。战争的真正胜利者——美国和苏联反对这些老殖民帝国，它们在战争中曾对反殖民运动予以鼓励。在它们联手促成建立联合国时，它们的代表坚持非西方国家的充分代表权，它们以截然不同的语汇，一致反复声明它们支持西方帝国诸殖民地的解放。它们的合作很快结束，但非殖民化的动力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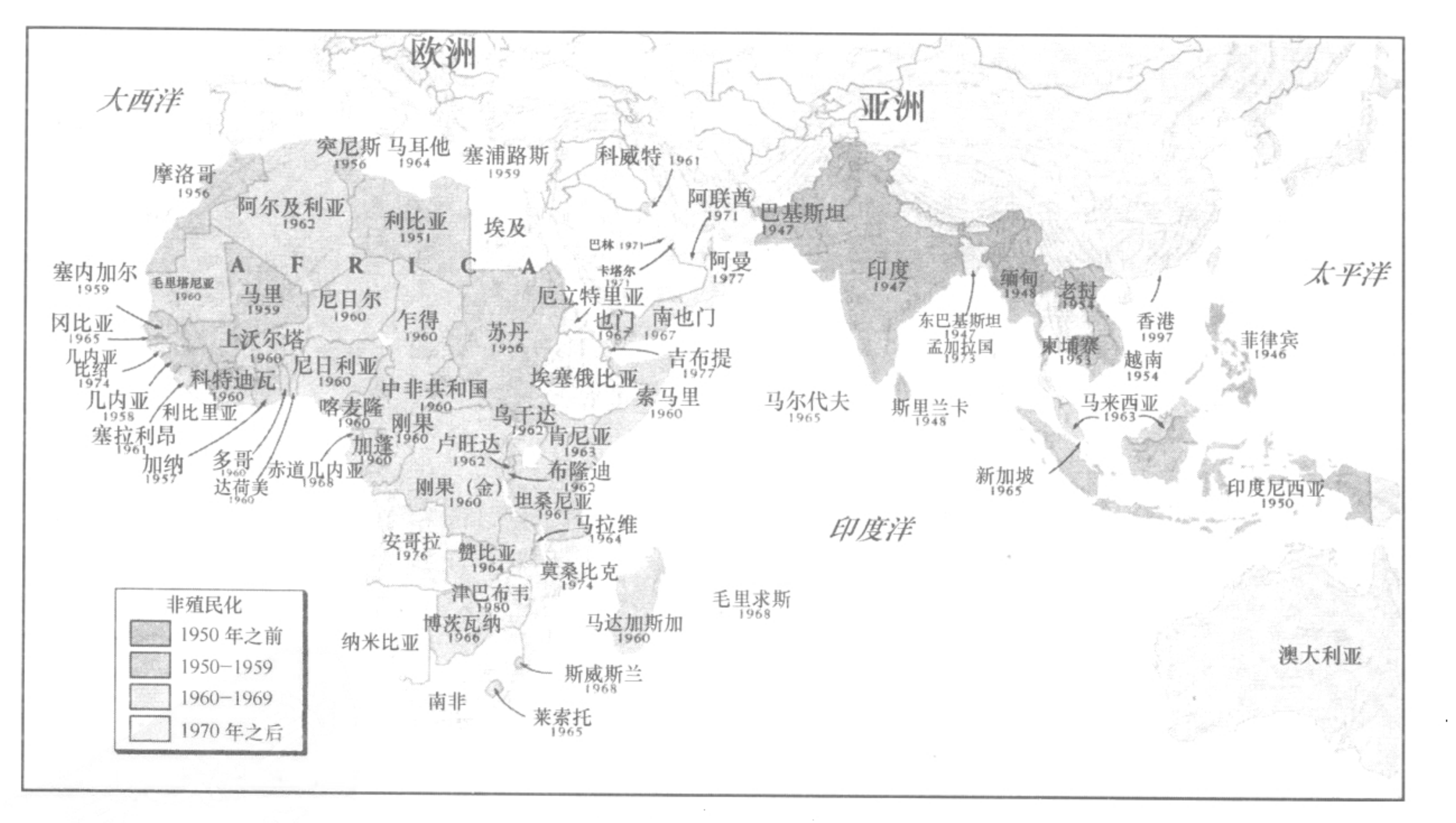
西方帝国的终结

战后时代，西方帝国残余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剧变在亚洲来得很快，在非洲则慢得多。非殖民化的压力来自殖民地各民族，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政治领导人，来自联合国，以及来自母国内部。在享有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霸权之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消失了。殖民帝国解体的长期影响是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本质。

216

联合国在 1945 年成立后的数年里，成为民族自由捍卫者的论坛。它是通过同盟国间的协定建立起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为这项事业争取盟国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非殖民化观点保证了联合国宪章在序文里正式承认“国家无论大小均享有平等权利”，并重申了国联曾经做出的支持托管领土“建立自治政府或独立”的承诺。然而，罗斯福坚持联合国宪章赋予拥有安理会席位的大国以特别权力——否决权，罗斯福希望，同盟国间的合作将确保持久的和平。

尽管罗斯福在联合国成立前就已去世，但杜鲁门总统继续执行他的首创行动。维护和平的责任属于安理会，苏联和美国代表与其他常任理事国一道，在其中决定着联合国的重大政策。这些政策也可以由联合国大会提出，来自世界所有主权国家的代表在大会里都有席位。1946 年，英国政府认定自己无力再统治中东巴勒斯坦地区，遂让联合国决定如何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国家之间分割巴勒斯坦。非西方土地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联合国里找到了同情者。



1945 年以来西方帝国的非殖民化

但联合国在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敌对中是脆弱的。赋予安理会成员国的否决权为美苏争霸并使联合国陷入瘫痪打开了道路。它阻止侵略的唯一有效行动发生在 1950 年。当时，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谴责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来自 20 个国家的士兵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与北朝鲜作战，目标是把共产党阻止在南朝鲜境外(参见第八章)。冷战中的联合国干预直截了当地站在西方一边。

217

西方国家从战争中恢复也给松开殖民关系创造了压力。美国政府参与这场重建，给了美国领导人在这些国家外交事务中有影响力的发言权。由西方盟国解放的国家的重建，掌握在他们选举的政府手中。西方在欧洲的战后政策主要是民族自决原则，也就是自治和政治自由为战后的平稳恢复提供正确的道路，不强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推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改革，外部势力不干预它们的国内事务。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尤其是 1947 年启动的马歇尔计划，是影响它们外交政策的潜在工具。荷兰政府在东印度群岛发起军事行动，击败民族主义力量并恢复在那里的殖民统治后，发现了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美国威胁切断对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全部外援，除非荷兰人考虑从他们这块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和平撤退。在数年时间里，美国领导人一直把非殖民化作为他们最优先的事务之一，力图促成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们扩大了威尔逊 1919 年的国际主义计划，坚持殖民地各民族应该享有“民族自决权”。

战争结束时，同盟国各国政府对殖民地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不想帝国统治继续下去。早在战前，美国就答应给予其菲律宾殖民地独立。在英国，工党于 1945 年赢得全国大选，其纲领包括解放帝国各殖民地人民。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法国。帝国荣耀和权力的捍卫者，如英国老一代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谴责这是对帝国的“背叛”。在法国，非殖民化的反对者得以(暂时地)阻止殖民地解放。在欧洲各国，就解放殖民地民族的步伐和意愿，出现了深刻的意见分歧。

英国和美国都计划通过与它们的殖民地臣民缔结条约，恢复这些亚洲殖民地的独立，赋予殖民地人民投票选举新领导人的机会。换言

之,要按照西方的民族自决原则来解放。在缅甸,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接受了英国政府提供的条件,加入了解放进程。菲律宾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这里的独立支持者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条件。

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从殖民地撤退可能会带来更剧烈的冲突。这种困境的出现,部分是因为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部分是因为当地人民对独立国家的未来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定居者和阿拉伯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之舞台,犹太人定居者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阿拉伯人则反对任何犹太人国家(参见第十二章)。1948年英国人的撤离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阿拉伯各国与新国家以色列发生战争。类似地,英国在印度的谈判者难以让两大民族主义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同意独立条款(参见第十章)。和平难以维持,1947年,英国军队让他们这块伟大的殖民地沦入内战的痛苦深渊。

218

通过谈判实现非殖民化过程中的这些悲剧性事件,其破坏性还比不上欧洲国家企图保住亚洲殖民地引发的战争。荷兰统治东印度群岛已达四个世纪,它国有的"荷兰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业已在那里探明了巨大的石油矿藏。1946年,荷兰还不准备放弃这些价值连城的殖民财富,派遣部队重新占领了广袤的群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组织起游击抵抗;这场殖民战争拖了三年,直至荷兰接受势在必然的结果,于1949年给予印尼独立。

法国两次卷入类似的殖民冲突中。第一次爆发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1945年,这里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断绝了与法国的一切关系。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开始,但法军在国内亲帝国的政客的支持下,着手镇压独立运动。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54年,这时轮到法国政府承认它没有能力击败共产党反抗力量。法国的第二次也是最血腥的战争接踵而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始于1954年对反殖民起义的镇压,是维持一小部分法兰西帝国的最后一次尝试。法国军队将领对这项事业是如此投入,乃至1958年,当他们得知与阿尔及利亚叛军的谈判后,他们成为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叛乱活动的主要人物。他们的反叛结束了于1945年建立的短命的第四共和国,使夏尔·戴高乐重回权力舞台。

戴高乐将军是战时法国抵抗德国斗争的领导人，他答应回来，但条件是法国议会草拟一部总统制（有些像美国的政体）的新宪法。在第五共和国开始运作后，他转向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认为，这种殖民冲突削弱了法国的统一，降低了法国的国际威望，而这两者对他的新法兰西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寻求自己的国家在欧洲和非洲的大国地位，欢迎法国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合作，放弃与民族主义者已经掌权的地方强行保持殖民关系的努力。1960 年，戴高乐政府在法属非洲殖民地中发起“法兰西共同体”计划，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数都同意合作，以换取独立。在北非，他断定，由于军队不足以击败阿尔及利亚起义者，他不得不接受他们完全独立的要求。尽管法国在阿定居者发动了恐怖袭击，法军内部也试图发动武装反叛，戴高乐依旧执行他的方案，于 1963 年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

曾经强大的欧洲海外帝国的非殖民化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非洲殖民地最后达到大规模非殖民化高潮（参见第十一章），部分原因是这里民族主义运动的微弱，部分原因是欧洲帝国领导人不愿意接受非洲各民族准备独立的可能性。一名英国军官描绘了这里人民凄惨的生活图景，他们饱受“愚昧和贫穷，疾病和营养不良，原始耕作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令人绝望的微薄收入和需要每种类型的服务”的损害。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有道理的，但这也是继续殖民统治借以自利的借口。无意当中，他揭露了帝国统治在满足这些殖民地人民的需要方面做得多么不足。

但欧洲国际的和经济的重点主导着所有殖民地的解放，甚至包括

219

非洲的那些殖民地。1961 年，比利时放弃了其刚果殖民地，英国和法国同时撤出了非洲。欧洲最早形成海外帝国的葡萄牙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地，是最后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在独裁者萨拉查（Salazar）将军的统治下，葡萄牙到 1975 年一直拒绝向横扫殖民统治者的“变革之风”屈服。葡萄牙派遣军队镇压了其非洲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以及东印度群岛殖民地东帝汶（East Timor）的民族主义起义。70 年代中期，当民主政府从萨拉查手里接过政权后，新政府

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解放这些土地。到此时，帝国时代在欧洲的唯一遗产，就是从它们前殖民地来的移民。他们离开家园，带着最重要的入境证——他们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和知识，前来欧洲寻找更好的工作。无论是以和平谈判还是以战争的方式，在亚洲和非洲的欧洲殖民帝国慢慢地让位于民族国家。



欧洲的战事造成的废墟：匈牙利，布达佩斯，1945 年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西欧的复兴

战争结束时，欧洲各国不得不把它们的主要精力转向从战争中复兴。获得解放之后留下的可怕破坏，要求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重建，不仅要重建工业经济的实体框架，也要在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里重构社会关系。社会期望和重建计划都是想为全体民众寻求更好的生活，政治领导人力图满足这些追求社会繁荣幸福的期望，因此，劳动者在工业事务中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妇女成为活跃的政治领导人，新的家庭政策为抚育孩子提供支持。英法等国家战后的经济改革产生出所谓的“混合经济”，也就是生产资料部分国有化、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好时

220

光是昂贵的，他们的民众仍然贫困，这些改革超过了财政资源的承受限度。但政治领导人没有退路，他们坚定地相信社会公正，民众对“新政”的要求带来了将其迅速付诸实施的强大压力。战后这些年里，西欧各国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自己的国家。

西欧遭到的破坏看上去是如此严重，其后果对西方的政治稳定如此具有威胁性，所以美国政府在 1947 年答应为欧洲重建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不仅在美国的外交关系中，而且在欧洲国家间和欧洲国家及其前战时盟友间的关系中，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件。

欧洲各国政府同意在就如何花费巨额援助的重大决策中进行合作。美国政府就给予欧洲各国数十亿美元(最终援助总额超过 130 亿美元)援助确定了严格的条件，争议最多的条件是它要求所有受援国政府公开它们的经济需求和财政状况。一个名叫“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的全欧范围委员会，把所有西欧国家的代表联合到一起，管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决定美国援助优先流向何处。在此期间，欧洲联合成为一个诱人的梦想。马歇尔计划对联合的推动立即得到了报偿。

事实证明，援助是有效的，而且效果超过了计划制订者的最高期望。到 1952 年，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了 100 多亿美元的财政和经济援助，最大的份额流向了英国(32 亿)、法国(27 亿)和西德(15 亿)。每个国家的政府都选择了恰当的方式使用援助。在英国，它帮助重建了老工业；在法国，它为实现法国工业和交通的现代化提供了资金；西德政府用援助资金奠定了自由企业的工业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鼓励资本家将利润用于再投资，要求工人接受低工资和长工时。其结果就是我们后来所知的德国的经济奇迹。到 1952 年，德国的生产水平比战前高出了 50%。

此时，西欧经济以年均 5%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来自美国的大量进口和欧洲国家间贸易的增长。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它们逐渐适应了新的国际汇兑体系，以美元结算对外贸易。美国用经济援助促进了欧洲国家政治稳定和工业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美国与西欧的合作，确保了这些国家重建起自己的市场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参见第六章）建立起一系列的机制，保证了全球自由市场里的各个国家能够依靠国际援助保持贸易流动，鼓励了它们实行较低的关税壁垒。这套体系包括一家国际银行——世界开发银行（The World Bank of Development），它为需要援助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它还提供了专门的储备资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掌握，为缺乏足够外汇支付所需进口物品的国家提供短期贷款，以促进国际贸易。该体系的国际货币是美元，正如其行长必须是美国人一样。尽管相比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布雷顿森林计划对战后复兴的助益要小，但它们成为了此后数十年新的全球经济永久性的组成部分。

221

战后，欧洲各国政府更深地卷入经济事务中，尤其是通过私人公司的国有化和国家为经济发展预定计划，但它们的经济和金融权力从未扩大到削弱市场经济的程度。它成功的重要标准是生产效率——通过产出和价格来衡量的资源有效利用率。这种衡量标准仍然是欧洲经济重建和发展中的基本现实。最终，国有化工业部门在这种衡量标准面前的失败，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彻底出售或大幅减少它们的国有化企业。

随着生产发展和工资上涨，欧洲消费者发现自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商品。战后 30 年间，就业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生活水平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迅速提高。到 60 年代，大周末和年度带薪休假使休闲成为现实，人们举家前往由诸如“地中海俱乐部”等公司创建的那些价格低廉的度假胜地，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汽车。第一种成为人们“梦想”的汽车品牌是凯迪拉克（Cadillac），但后来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争取到了那份荣耀。萧条的艰难困苦和战时的破坏成为了久远的记忆。

战后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弥平分歧和联合西欧各国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各国间改革的具体内容差别极大，但核心都是以保证所有人享有丰裕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为目标。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允

诺,国家所有制会确保就业和高工资。诸如此类的以及其他的改革运动都逐渐深信,国家有责任满足其人民的基本社会需要,包括价格低廉的甚至是免费的医疗保障、免费的且容易获得的高等教育和体面的住房。他们提议通过对富人和私人企业征收高税赋,为这些昂贵的计划买单。在他们看来,民众中的极端贫富分化是一种社会不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希望在人民当中推进某种类型的"社会民主"。

在英国,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工党领导下的巨大政治社会变革的开始。1945 年,工党呼吁英国选民"面向未来",支持它的民主社会主义计划。在当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它压倒性地战胜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它上台时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因为战争导致 100 万英国公民死亡,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无论是国外投资还是国内资本。一年后,它不得不向华盛顿恳求 40 亿美元贷款,大部分都用于支付进口食品和燃料的费用。到 1946 至 1947 年冬,英国政府面临严重的预算危机,已无力承担它的国内改革和在印度及中东的国际义务所产生的费用。非殖民化部分也是由于英国财政这种濒临破产的状态。对工党政府来说,社会福利和基础工业国有化具有最高的优先地位,国内利益是首位。

222 类似的改革运动在西欧其他国家也占据了主导地位。照顾本国民众的健康、教育和福利的需要,给它们的财政预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需要细心规划。1948 年,来自美国的外援开始到达,但必须精打细算地花。在好几个国家,引导重建的急迫需要,致使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法国,这形成了国家的预先规划,但它不像苏联那样,没有试图用国家指令性计划取代自由市场的力量。相反,它的目标是合理地利用稀缺的资源取得最理想的经济增长效果。铁路必须重建,且成为法国国有财产。紧接在铁路重建之后的是着手实现现代化和电气化。在法国这种新型的混合经济中,资本主义和国有工业并肩运行。

60 年代,美国最终加入该行列,走向全面的社会福利计划,加强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1960 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开启了广

泛的社会政治改革时代。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继续进行这些改革。“伟大社会”——约翰逊给自己1964年改革计划所取的名字,包括一系列保护所有公民民事和政治权利的法律,目标是终结对黑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和压迫。为“向贫困开战”,改革也推出新的福利政策,这些政策在精神和意图上与战后欧洲推行的社会福利措施相似。没有任何私人企业被国有化,政府的年度预算以及由联邦机构(美联储)执行的对银行业和利率的控制,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提出的方式引导着国家经济。

战后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复兴发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它成立于1949年。在同盟国的监督下,德国政治家和律师草拟了宪法,宪法规定西德实行议会统治下的联邦结构。在1949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党赢得了多数选票并选出了共和国新总理(政府首脑),他就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他曾在纳粹时代沦为囚犯,坚定地相信德国在统一的西方政治军事共同体里有应有的位置。

西德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全部主权。1951年,阿登纳获得了对德国外交的完全控制权。在把自己的国家带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及与德国的夙敌法国并肩合作方面,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到60年代,德国的工业经济是欧洲最繁荣的。处于同盟国军队持续占领下、被建设为繁荣的灯塔的西柏林,变成了吸引东德人的磁石。他们利用东西柏林间的开放边境移居到西德,直到1961年柏林墙建起来为止。此时,300多万难民业已抛弃共产党的东德,到西德谋求新的生活。他们在那里被当作难民受到欢迎,并获得帮助在联邦共和国创造新生活。

到60年代,西德的适龄劳动人口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工人的需求。从南欧,尤其是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等贫穷地区来的移民填补着这些工作岗位。像前往欧洲其他繁荣国家的移民一样,他们是二等公民,尽管他们享受着经济的和社会的种种好处,包括社会福利体系,但他们被排除在积极的政治参与之外(在德国,他们没有得到公民地位)。诸如西德之类的国家正变成多种族和多宗教信仰的国度,因为它

们的繁荣吸引着第三世界的各个民族移居进来。

223 德国的分裂是二战留下的悬而未决的大问题。1955 年,西德加入了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取得了建立德国新军队的权利。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阿登纳拒绝承认波兰西部新边界(远远地深入到旧德国领土中)的合法性,也不接受德国领土永久的分裂。在他看来,西德代表着真正的德国,因为它的人民自由地决定着国家的命运。然而,阿登纳政府没有办法结束这种分裂局面,当苏联坦克支援下的东德政府于 1961 年修建起一堵环绕西柏林的墙体时,它只能当个无助的旁观者。难民逃亡之路被切断了,除少数千方百计突破壁障的大胆个人之外,大多数人都被共产党的边防卫队射杀。西德的电视广播向东部直播着西方繁荣的诱人场景,这边的电视观众则怀着对他们生活节节提高的美好希望。

1969 年,西德新政府决定承认德国的分裂。新政府处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它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德国的繁荣和选举制度的吸引力迫使它放弃了这种纲领,它的新目标强调扩大社会福利政策,改善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社会民主党政府立即将这种“东方政策”付诸实施,它签订了一项承认东德的条约,与波兰签订另一项条约,放弃对战后被波兰合并的德国领土的要求。尽管是许多独立的协定,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德国和平条约,确认了德意志民族分为两个国家的现实。前同盟国把德国和柏林的分裂视为欧洲新国际体系永久性的组成部分,它们看不到使东西德之间保持和平关系的任何其他替代方案。东欧继续处于苏联“帝国”之内,其人民被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统治着。

西欧联合

西欧各国是整个世界率先获得强烈民族身份意识的地区。它们的民族国家,以及让这些国家和人民感到荣耀的民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其他各国人民的样板——无论是好还是坏,民族主义的希望和缺陷均已深入到了欧洲生活的肌理当中。这些民族共同体中内生的团结协

作,创造了持久的忠诚纽带。而曾让国与国之间生死敌对的可怖的世界战争,将民族主义狂热是多么的具有破坏性表露无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它们历史的转折点。为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以前相互交战的国家间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的领导人同意在超国家的机构中合作。欧洲各国政府牺牲了本国绝对独立的原则,以克服民族主义的敌对状态。它们新的联合机制——最终叫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是欧洲后殖民时代最突出的成就。寻求持久和平的欧洲人意识到,民族国家间的纽带应该被强化,欧洲各国的联合或可消解种族和民族主义冲突造成的破坏。实现这种联合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许多欧洲人对德国人依然怀有挥之不去的恨意。

分配马歇尔计划援助款的合作经历,证明经济合作是可行的。首个严肃的联合提议来自法国领导人让·莫内(Jean Monnet)。他以前是一名银行家,作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他给战后的法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明白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即联合的欧洲只能分阶段逐步达成,他认为经济联合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切实可行的第一步。1950 年,他提议在欧洲民主国家中建立铁、钢和煤免关税的"共同市场",该计划要求所有西欧国家同意在这些产品贸易中取消所有关税。它们将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任何成员国都不能否决这个管理机构的政策,它在这些重要经济部门的企业中协调生产和工资计划。

1952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写为 ECSC)成为现实,由西欧六国(意大利、西德、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条约创建。这个前所未有的协定是意、德、法三国政治领导人相互商讨的结果,它们都属于基督教民主阵营。它们对基督教和平观念和人道价值的信仰,为国家间和解尤其是为德国再次融入欧洲创造了共同的理想。它们达成的协定是一种实用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事业,它寻求加速经济恢复的新路径。英国工党政府拒绝加入,继续坚持英国的"光荣孤立"之梦,对商业利益在 ECSC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心怀疑虑。尽管政治联合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但 ECSC 是欧洲国家间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它是把德国融入西方各国阵营里的第

一步。

接着,莫内提出更激进的改革,加速创建西欧经济联合体。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市场",对所有的工业、商业和农业交易实行自由贸易。由于 ECSC 的成功,协议迅速达成。50 年代中期,法、德领导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接受了莫内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 EEC)的提议,并于 1958 年开始实施。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变是复杂的,因为它必须拆除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壁垒、合作补贴处于不利地位的生产商、救助失业人员以及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它代表着走向莫内的欧洲政治联合之梦的重大一步。

商业壁垒急剧消失,比条约签订者原先期望的要快得多,到 60 年代中期,西欧业已开启了经济合作的新时代。共同市场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运行,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是小农耕作者还是农业企业,概不例外。西欧所有的大政党都赞同经济联合的愿望。

小　结

冷战未能给二战提供永久的和解。斯大林在苏联周边创建外交和政治势力范围的意图导致了欧洲分裂。1946 年,他警告说与资本主义列强的战争不可避免,让他的国家事实上保持着战时状态。他私下里承认这场战争不会很快到来,"尊重强者"决定了他避免可能激怒强大美国的任何冒险行动,因为他的国家需要多年时间从可怕的战争破坏中恢复。他的军队是封锁而不是夺取西柏林;南斯拉夫被孤立而非遭入侵。尽管西方政治领导人担心苏联的外交和军事力量,斯大林实际上只想巩固环绕苏联边境的"新帝国",而不是发动一场新战争。但苏联这位独裁者狭隘的扩张主义目标阻碍了永久性的和平条约,削弱了欧洲稳定的势力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不可能有保证。

225

美国的遏制政策,在这个苏联"帝国"周围的重要战略区域里,促成了强大政治经济同盟国家的形成。从这些方面来说,遏制政策构成了一个创造性的、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全球战略。但美国政府对苏联侵略

恐惧的夸张，使其把努力方向集中到创建军事联盟上，取代外交上的遏制政策。它重建了自己的军备，支持反苏军事联盟，即便在苏联没有形成真正威胁的地方也是如此。遏制政策的这种调整加速了核军备竞赛、导致了军事同盟的建立，这种军事同盟给予了美国如此之大的霸权影响，乃至它看上去似乎正在建立自己的全球帝国。

二战后的十年间，战争的大规模破坏和国际紧张局势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国际体系的出现。在东方，按照苏联庞大的党与国家官僚体系控制下的集体农业和国有工业模式，诸多一党专政政权把指令性经济强加于本国的土地。在西方，各国通过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的贸易和投资联合到一起，美国是这个西方体系的中心，美元是稳定的汇兑货币，美国技术为现代生产提供了重要手段，美国的外交援助和私人投资是国外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的萧条危机似乎暂时得到了解决，两个超级大国每一方拥有的核武器足以将人类文明带入灭亡深渊，新挑战是避免它们之间发生战争。

在冷战背景下，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正在重塑世界面貌。两个超级大国都宣称殖民帝国时代业已结束，但在真正意义上，二战后苏联的胜利让这个国家变成沿着边境扩大了的“帝国”，在莫斯科统治的这片广袤领域里，国家边界是毫无意义的分界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老帝国时代消失了，但民族国家的新世界尚未完全到来。

本章大事记

1945 年　联合国建立

1945 年　德国被分区占领

1945 年　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

1946 年　菲律宾独立

1946 — 1949 年　希腊内战

1946 — 1949 年　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战争

1946 — 1954 年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

1947 年　印度独立

1947 年　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

1947 年　冷战开始

1948 年　南斯拉夫抵抗苏联控制

1948 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夺取政权

1948－1949 年　柏林封锁

1949 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

1949 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建立

1953 年　约瑟夫·斯大林去世

1957 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

推荐阅读

新欧洲

* Raymond Betts, *Decolonization* (1998)。回顾欧洲海外帝国消失过程的有用之作。

Anthony Sampson, *Anatomy of Europe* (1968)。一位极具洞察力的观察者对欧洲的民族和问题的近距离审视(本书又名 *The New Europeans*)。

冷　战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1997)。研究本主题的一位杰出史学家根据冷战期间的苏联档案对冷战的新思考。

William Walter, *Space Age* (1992)。一本美轮美奂的插图本空间探索史,主要关注民用方面。

* Tom Wolfe, *The Right Stuff* (1979)。以讽刺性的观点透视美国面对苏联第一次太空探索时出现的太空狂热。

* Daniel Yergin, *The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77)研究了冷战影响下美国政治生活动荡不宁的转型。

苏联外交政策

Max Frankel, *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 (2004)。一部古巴导弹危机简史,使用了新开放的美苏档案。

*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 -1956* (1994)从苏联方面透视核武竞赛的引人入胜的历史。

* Voytech Mastny,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1996)。斯大林战后外交政策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回忆录和视频教具

*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1958)。独一无二的珍贵的个人记录,记载了 1944 — 1947 年间南斯拉夫领导人和斯大林之间三次秘密会谈。

* Nicholas Gage, *Eleni* (1983)。这位希腊母亲之子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返回希腊重构了她的生平及其在希腊内战中悲剧性的死亡。

* Robert Kennedy, *Thirteen Days* (1968)。古巴导弹危机一位重要参与者的回忆录;2001 年改编为同名电影。

* Czeslaw Milosz, *The Captive Mind* (1953)。令人胆寒的真实生活图景,由作者亲眼目睹过知识分子如何合作建立共产主义波兰。他是一位波兰诗人,后来流亡国外。

第八章　冷战和东亚革命

227

-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 **朝鲜战争**
- **印度支那的战争与革命**

重点：遏制和反共产主义

聚焦：胡志明

像欧洲一样，东亚各国也成为冷战的舞台，但是在没有苏联部队在场的情况下。苏军在作为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占领军的义务结束后撤走了。这里的冷战对峙，起源于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这些革命运动宣称忠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像苏联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以武力实现本国的激进变革。

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曾经隶属于某个外部帝国，或处于外部帝国的支配之下。这些帝国中最新的是日本帝国，它部分或全部地占领这些国家，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抵抗。通过抗日游击战争，共产党最强有力地要求得到在建立新民族国家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利。二战结束后，他们力图通过武力击败自己的敌手。尽管苏联对这几国共产党的影响巨大，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控制这些战争的进程。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将这些冲突视为殖民帝国崩塌的一部分，遏制战略确实延伸到了太平洋地区，但最远到日本列岛为止。1950 年，当北朝鲜军队侵入南朝鲜后，美国的看法急剧改变。美国领导人将冷战前沿扩展到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亚洲大陆地区，开始像对待斯大林的苏

228

联那样,同样敌视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战后欧洲从未真正发生过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战斗,而东亚的朝鲜和越南(从印度支那形成的国家之一)境内的战争,让美军与共产党军队发生了面对面的交锋。在世界这一部分,冷战呈现出暴力血腥的色彩。

各种战争形塑了朝鲜和印度支那的诸多新国家。这其中部分是这些土地上人民相互厮杀的内战,部分是美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对外战争。朝鲜冲突的结果,让这个国家分裂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像德国一样是冷战的后遗症。相反,在印度支那,战争时期持续得更长,且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30 年的内战和外部干涉让这个法国前殖民地支离破碎。最终,越南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使之成为那片土地上的统治力量。该地区与其邻国仍然被法国人在 19 世纪划定的边界隔离开来,这些边界的存在,是西方对亚洲持久影响的明显标记。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国民党政府自 1928 年北伐胜利以来(参见第四章),就已宣称拥有中华民国的统治权。民国政府主席、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控制整个国家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二战期间,他得到美国的支持,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罗斯福总统的战后东亚规划,要让国民党中国成为这一地区稳定和权威的中心,他希望中国成为在新世界秩序中合作的“四大警察国家”之一。他的计划是非常不现实的。蒋介石的军队在抗击日军中没有取得任何大型战役的胜利,战争结束时依然困守在山峦起伏的内陆地区。而共产党游击队解放了中国沿海的日本傀儡国中广袤的农村地区。他们反对侵略者的斗争赋予了他们中华民族保卫者的光环。

国民党中国的衰微

1945 年,美国政府做出巨大努力,以增强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杜鲁门总统命令 5 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开赴中国北方沿海

维持秩序，与此同时，美国飞机和军舰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日本人已撤退一空的地区。他还把价值 10 亿美元的剩余军事物资送给了国民党。美国没有在其他任何惨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如此直接地卷入战后复兴任务。

重建中国的重担落在国民党手里，但事实证明这是他们难以承担的任务。在强大的外表之下，国民党国家实际上虚弱不堪。蒋介石政府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管理这个国家。控制着重新占领的省份的国民党将军们，像旧军阀们一样处理事务，他们感兴趣的首先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丝毫不为民众谋福利。缺乏效率的国民政府和开支高昂的军队是经济复兴的障碍。政府高昂的开销引起了高速通胀，这变成了战后岁月严重的问题。国民党政权最严重的弱点是它不能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腐败和权力滥用败坏了它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声誉，没有为农民阶层推行土地改革使之失去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口的支持。

战争让共产党的力量和权威壮大起来，他们的军队增加到 100 万人，解放区拥有 5 000 万人口。早在与日本作战开始前十年，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已是权力的竞争敌手，和平一到来，他们又重新开始争夺。坚守着与欧洲同样的民族自决原则的美国，敦促双方组建联合政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亲自前往中国，说服两位领导人达成协定。

蒋介石有来自斯大林的帮助。像在欧洲一样，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亚洲执行着同样的强权政治战略，认为中国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1945 年末，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友好条约，作为交换，他在中国东北得到了重要的经济让步(包括控制一个海港)。有这些战利品在手，他敦促中国共产党放弃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希望，接受与国民党的政治联合。他后来回忆到，1945 年当一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来莫斯科时，“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武装起义没有前途，中国的同志们应该加入蒋介石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压力，把这对前敌手带到了一起。1946 年 1 月，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停火协定，开始讨论组建联合政府。

协定很快失败。超级大国的影响没有能抹平这两大权力争夺者之间激烈的较量,美国不能迫使蒋介石摒弃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苏联也没有办法强行让毛泽东解散农民军、放弃解放区,这两者是毛泽东自1928年以来革命希望赖以生存的政策中的双联因素。1946年末,围绕着长年以来的领土控制问题,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间的战斗再次爆发。东北是双方争夺的重点。这里曾被苏联占领,苏军直到这一年的下半年才撤出。他们的离开,引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为接管这个一度繁荣的地区展开竞争。

在争夺东北城市控制权的战斗中,国民党占有最初的优势。装备落后和人数居劣势的共产党被迫撤退到乡村地区,再次发动反抗他们老对头的游击战。1946年末,美国最终放弃了让两者媾和的努力,马歇尔将军宣布,“在(国民党)政府里占主导地位的反动集团与不肯和解的共产党”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到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军队已壮大到200万人,并成功地切断了中国北部与中部地区的联系。唯有军力将决出胜者。

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

这场冲突变成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一方是国民党政府,拥有300多万军队,装备着美式武器。它看上去像是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运动,但它的力量却迅速衰微。随着时间推移,1945年它显露出来的诸般弱点变得更为严重。除几个训练有素的师被派遣到东北之外,整个军队领导无方,都是由一有机会就开小差的应征入伍者组成。民众对国民党政府日益仇视。它不能保证公共秩序,不能阻止工商业的颓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转向了中国共产党。 230

1948年,共产党的军队在数量上仍然比国民党军队少,但天平正在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社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诸多因素解释了他们日见增长的力量。在动员群众支持和组建能够管理这个国家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组织方面,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的领导层是有效且娴熟的。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因为苏联没有给予其任何援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右边为毛泽东,最左边为周恩来)与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延安,1945 年(Philip Sprouse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他们确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对斯大林的建议予以礼貌的关注但从未盲目地服从他。

1947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是年,苏联支持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起了进攻性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他可能从这种激进的转变中得到了鼓励,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改革运动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的革命中国梦想。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在贫苦的农民中重新分配,共产党禁止劳动力雇佣,允诺给予所有农民一定数量的土地。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新的革命秩序,农民中的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支持随之而起。十年前,毛泽东曾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0 年代末,这杆枪拿在了农民手里,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解放全中国而战。

231

共产党的干部们无情地、时常残酷地执行这些改革措施。但他们仍然不失为有效的管理者,能够维护"解放区"的秩序。数十年的战争动荡之后,坚定而有秩序的统治吸引着许多中国人。共产党力量日益

增长背后的另一因素是军事领导才能。经过数年游击战后，在日益类似于常规战争的战役中，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指挥员们学会了率领大军团作战，事实证明他们比国民党将领更为优秀。他们的士兵（国民党逃兵的人数在其中不断增加）纪律严明，对胜利的信心日增，并深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共产党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高昂的士气和领导才能，而不是人数。

1948 年，共产党的目标变成了征服整个东北。是年春，共产党军队封锁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守备部队。1948 年中期，他们开始系统地消灭国民党能够动用的所有精良部队。到年末，国民党丧失了 30 个师，这些部队近半数是未经任何战斗就逃跑了或投降了。东北地区完全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恐慌在蒋介石的军队中蔓延。

1949 年初，双方的军事力量平衡已倒向了共产党。美国尽其所能，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扶持国民党政府，但杜鲁门总统拒绝派遣美国军队取代蒋介石士气低落的部队作战。没有得到苏联援助的共产党，从被俘的国民党部队那里获得了大多数美式武器。美国政府谴责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行为，斯大林也警告中国同志要谨慎从事，但都全然无用。在中国内战中，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冲突。

1948 至 1949 年冬春之季，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9 年 1 月，一支被包围在北京城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丧失了 50 万士兵。早前几个月，在中国中部地区，总数达 50 万的共产党军队向保护国统区的防线发起攻击，到 1949 年 2 月，那里的各条防线均被突破，国民党军队逃走了。1949 年春季到秋季，毛泽东的军队渡过长江，进入中国南方。那年夏季，国民党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纷纷投奔共产党，到 1949 年秋，已没有剩下任何重要的抵抗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共产党领导层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片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土地，已转

到了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一个新的国家掌管了权力，结束了 1911 年清 232 帝国垮台以来中国长期的动荡局面。但共产党领导人认为，直至他们夺取宝岛台湾，蒋介石及其残余部队逃到了那里战斗才算结束。人民解放军准备大规模进军台湾岛，计划在 1950 年夏进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他们。

美国政府尚未弄清楚中国新领导层的意图，力图澄清东亚哪些地方处于它的防卫区域中。1949 年，它公开划出了其军事力量的“防卫范围”(defense perimeter)，该战略区域包括了日本；它将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大陆各地区和台湾岛都排除在外。当时，这则声明阐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在东太平洋的延伸范围以及哪些地区对其遏制战略至关重要。在这些区域之外，美国不承担派遣自己的军事力量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义务。与此同时，在亚洲，从南朝鲜到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政权，得到了足以增强自身军队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1950 年初，美国政府同意帮助新成立的印度支那国家越南(基本上由法国一手创立)在与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中赢得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这些反共政策在 1949 年末尚未出现，当时美国并没有排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这年冬，中美双方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谈，为可能开启的外交关系作准备。

对毛泽东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需要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1949 至 1950 年冬，他访问莫斯科，踏上了他的首次国外之旅，与斯大林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中国共产党要求得到军事同盟、经济援助和结束苏联对中国领土的占领，苏联控制的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的一个港口和所有铁路，以及中国位于中亚的大片区域。中国人实际上是在要求结束苏联在东亚的“帝国”统治。中国和苏联拥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也尊重苏联共产党的智慧和成就。尽管中国人极度需要苏联援助，重建他们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但他们更决心要获得斯大林对他们新革命政权的承认。

尽管同为共产党，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斯大林坚持把中国当作苏联势力范围里的附属国来对待，他显然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独立

行为一定让他想起南斯拉夫共产党。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斯大林担心中国可能蜕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我可能变成另一位铁托。"斯大林肯定担心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这片势力范围从亚洲内陆经过蒙古一直到朝鲜，在谈判中，站在中国领导人一边的正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共产党代表。这次中苏谈判持续了两个月时间。

最后，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军事同盟和经济援助要求，他答应苏联在几年内撤出中国东北领土。作为交换，毛泽东被迫承认蒙古独立(在苏联保护下)。这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人尊崇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对外部世界来说，这两位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似乎在他们的革命目标和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的敌视上联起手来。然而，共产主义中国并未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

朝鲜战争

234

冷战中隔开两个超级大国的边界向东一直延伸到朝鲜境内。1945年，正当日本帝国投降之际，苏联部队控制了朝鲜。为了遵守与美国的战时协定，他们撤退到朝鲜半岛北半部。在同盟国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授权恢复独立统一的朝鲜国时，美苏占领军之间对朝鲜的这种分割就将结束。

被分占的朝鲜

在被日本人统治了半个世纪后，朝鲜人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十分强烈，但美苏占领区成为统一难以克服的障碍。美国当局向李承晚(Syngman Rhee)领导下的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开放了朝鲜南半部。1948年，他成为大韩民国(the Republic of Korea)的总统，美国军队从占领区撤出。他们的军事基地将设在日本，美国政府让日本基地变成冷战中自己在东亚的稳固据点。李承晚以独裁权力统治着南朝鲜，镇压国内的朝鲜共产党及其工会组织，诅咒共产党是民族的叛徒。他誓言民族统一是他的事业，告诫他的军队随时准备以武力夺取半岛北半部，除非共产党同意他的统一条件。像对中国一样，美国政府不愿意直

233



斯大林与毛泽东：12 英尺×16 英尺油画《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局部，1950 年（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接卷入这里的内战,但它对战争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遏制李承晚的民族主义狂热,美国仅给南朝鲜提供防御性武器。

北部的苏联占领当局建立了朝鲜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官政府。1948年,按照美国的做法,他们让朝鲜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the Korean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并撤出了占领军。当时,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Kim Il Sung)是一名老牌的共产党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从苏联学到了自己的革命经验。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对日作战时业已习得娴熟的军事技能。他钦佩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尤其是打败国民党和统一全中国。金日成希望在朝鲜实现同样的目标,因为像毛泽东和越南的胡志明(Ho Chi Minh)一样,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但与亚洲其他共产党人不同,他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朝鲜统一战争。由于依靠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他对斯大林的效忠加强了。朝鲜是苏联新的卫星国。

在苏联的武装下,他的军队已准备发动战争,但他仍然需要斯大林批准才能着手进军南朝鲜。他的军队在装备上比南朝鲜军队好得多。他向斯大林保证四周内取得军事胜利,朝鲜全境都将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时机是适宜的。尽管李承晚大谈对北方开战,但他的军事力量非常虚弱。金日成和斯大林两人没有明言,但内心蕴涵的是一种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已获得的东西,金日成的军队也应该可以去追求。革命是他的目标,而且没有任何美国部队阻挡在他实现此目标的道路上。

中国、斯大林和朝鲜战争

1949 至 1950 年冬季,金日成都一直在恳求斯大林批准他入侵南朝鲜,电报如潮水般涌向莫斯科。在给伟大领袖的电报中,他恳请伟大领袖的支持,他强调自己军队的强大,保证能在几周内取得胜利。即便美国改变其将军队撤离亚洲大陆的政策,他也能确保快速征服南方,让美国军队来不及干预朝鲜,阻止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年春,斯大林答应了。1950 年 6 月,北朝鲜军队进军南朝鲜。像邻国中国一样,一个统

一的朝鲜似乎命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又一场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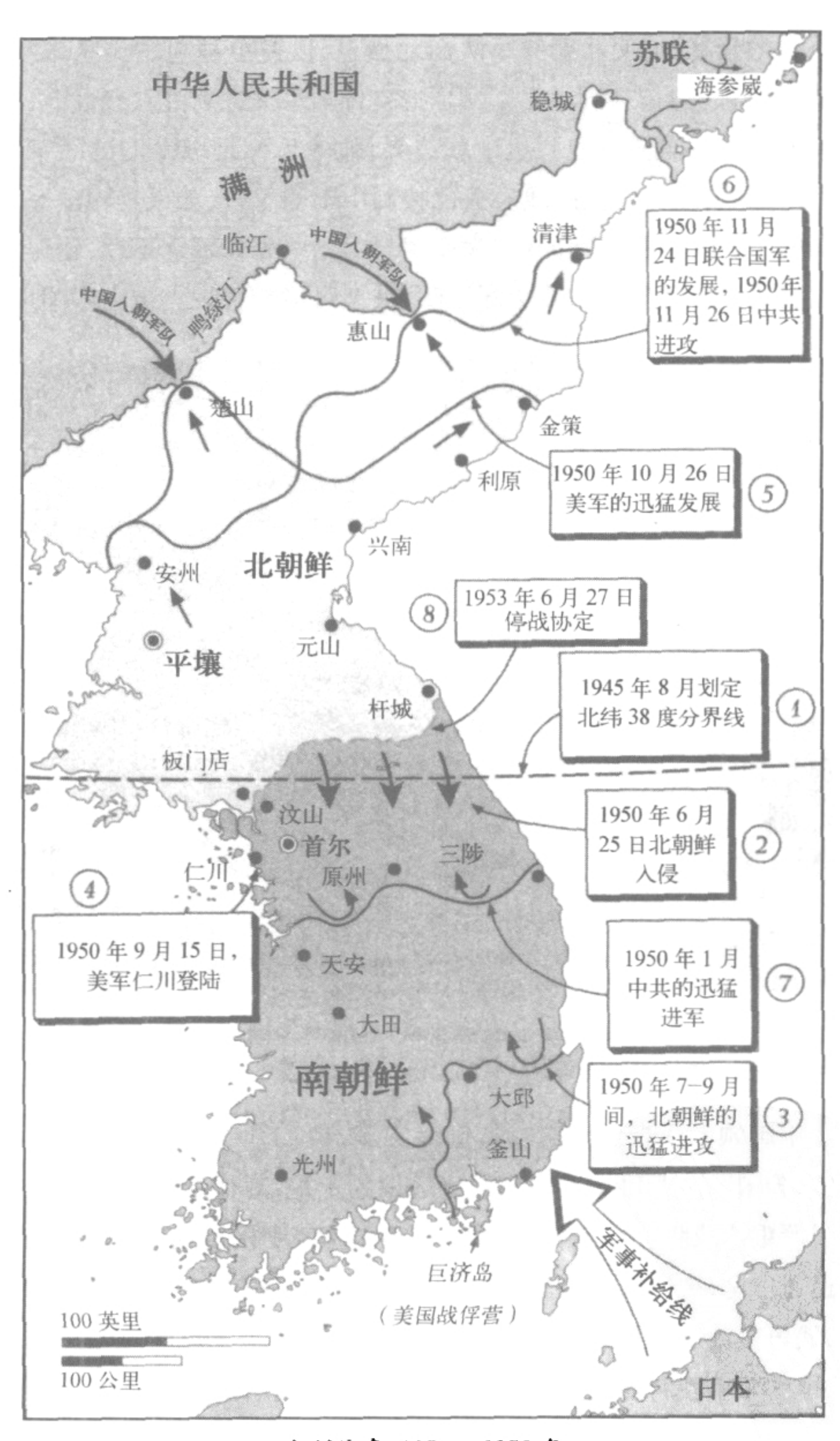
斯大林是在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后，才愿意允许这场战争到来的。在支持他的朝鲜同志方面，毛泽东没有丝毫犹豫。他似乎坚信，这年夏天自己的军队可以收复台湾，北朝鲜可以收复南朝鲜，而不会遭到美国的军事反对。他太过相信北朝鲜人有充足的武装力量能迅速击垮南方的敌人。

在北朝鲜出兵两天后，朝鲜冲突不再是一场局部战争了。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保卫南朝鲜。美国政策的这种突然逆转，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领导人已意识到，一个共产主义的朝鲜，将把苏联的卫星国圈扩展到美国亚洲防御的中流砥柱——日本附近。或许同样重要的是，美国考虑到抵制北朝鲜南征行动的失败，将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遏制政策隐藏着军事上的弱点，美国政府担心这会让人们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强调了遏制的军事方面，美国必须证明它真的愿意抵制苏联支持下的军事扩张。美国军事干预朝鲜的新政策，改变了这场战争乃至冷战的进程。

朝鲜战争迅速演变为全面战争。北朝鲜军队一路击溃南朝鲜军队，如果美国的干预想要成功，必须立即从日本派遣军队阻止北朝鲜。美国政府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援朝军队司令官。联合国安理会在一项正式动议中谴责北朝鲜的入侵行动，批准保卫南朝鲜(苏联代表抗议未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国民党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离场而去，表决时缺席)，因此麦克阿瑟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美国军队确实成功了，在最后时刻阻止了北朝鲜军队向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推进，金日成速战速决的预测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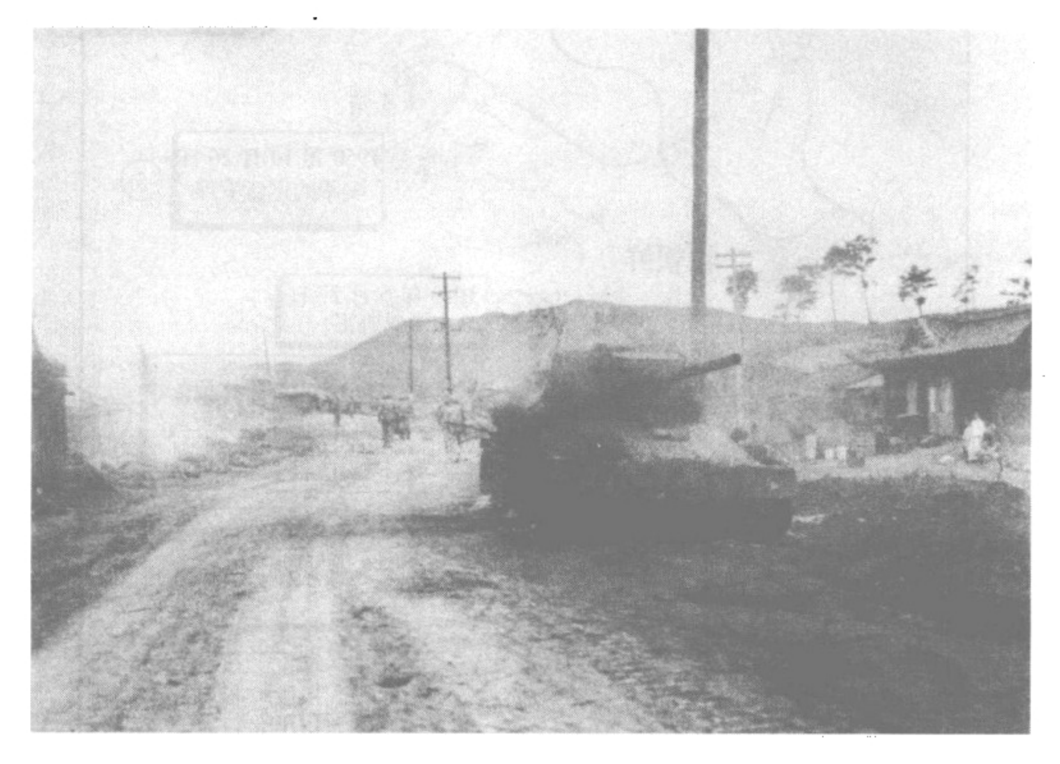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膨胀到要彻底摧毁远东的共产主义，包括中国和朝鲜。美国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7月，它改变了不防卫台湾的决策。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军队攻台。中国共产党政权进入了美国冷战的敌人行列。

直到那年秋天，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才明朗起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当务之急是守住南朝鲜。入侵两个月后，联合国军在半岛中部出



朝鲜战争，1950—1953 年

236 其不意地登陆，迫使北朝鲜军队向北撤退，以避免被包围。是年 9 月，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麦克阿瑟把联合国军推进到三八线以北，进入北朝鲜。他的军队迅速到达中朝边界，他的目标是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让北朝鲜投降。美国政府业已接到中国的警告，如果美国陆军迫近中国领土，中国将军事介入。麦克阿瑟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错误地相信自己的武装力量能击败中国军队，甚至可能想把战火带到中国境内。



亚洲的新战争：美国反攻北朝鲜军队，1950 年 9 月（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37 中国领导人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施，他们介入的理由主要是战略性的，美国军队占领靠近他们国家边境的土地，对他们新政权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1 月，30 万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联合国军被迅速击垮，被迫撤回到南朝鲜境内。不久，前线在老边境地区稳定下来，战争变成了持久战。1951 年，美国政府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他的军事胜利梦想和削弱遏制战略的行径，有违美国外交政策的有限目标。美国军方领导人坚称，麦克阿瑟的计划“让我们在错误的地点，

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卷入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政府只想保护南朝鲜，拒绝在这场只想遏制而非征服北朝鲜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海报“扑灭战火，拯救和平！”1952 年（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朝鲜战争又拖了两年，一次次血腥的、毫无结果的战斗未能打破僵局。美国蒙受了 3 万多士兵的伤亡，但对朝鲜人来说，战争是全面的，南朝鲜的伤亡人数达 130 万，其首都汉城（Seoul，现译首尔）在 1950 至 1951 年的战斗中变成了废墟。美国政府通过对北朝鲜城市进行密集的轰炸，迫使战争走向结束。这些城市也被夷为平地，伤亡惨重，但补给继续源源不断地抵达北朝鲜前线。这个国家的死伤人数估计有 150 万。战争毁灭了这两个国家。

238

斯大林应为战争的爆发负责，他显然阻止了折衷的解决办法。朝鲜战争证实了他的与资本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残酷观点，迫使共产党中国依附苏联盟友和斯大林领导。1951 年，第一次和谈开始，只是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搁置了下来。1953 年斯大林死后不久，战俘问题对北朝鲜谈判者不再有重大影响，斯大林的去世，使结束朝鲜战争（以及不久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成为可能。毫无疑问，中国和苏联政府清楚艾森豪威尔总统新政府增强在朝鲜军事行动的威胁。它们可能听到过流言（美国政府故意散布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正在考虑动用核武器，结束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符合它们的利益。1953 年，停战协议结束了朝鲜战争，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大约还停留在 1950 年的位置。这对中国、苏联和美国的谈判者们来说足够了，南北朝鲜的领导人

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北朝鲜和南朝鲜

北朝鲜仍然处于金日成和共产党的统治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他迫使自己的国家遵循教条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自己则变成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和人民膜拜的对象。他仿效苏联模式,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组建强大的军队,派遣渗透者越过非军事区进入南部,还周期性地威胁说要继续进行民族统一斗争。朝鲜共产党禁止民众与南部有任何联络。斯大林主义在北朝鲜有了可靠的家园。

在教条的共产主义模式被中国抛弃很久之后,甚至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北朝鲜仍然冻结其中。结果是到 90 年代,朝鲜人民陷入贫困和周期性的饥荒,集体农庄体制不能产出充足的粮食,国有化工业鲜有开工,只有军工厂得到充裕的国家补贴保持全速运转。除几家韩国银行和韩国政府外,没有任何国外投资者准备冒险把资金投入到这个破产的经济体中。唯有大规模的外国援助,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食品和石油,来自韩国的食品和金融捐赠,使这个国家免于崩溃。那种可怕的可能性,必定伴随着大规模的难民潮,中韩两国政府被迫成为朝鲜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支持者。

239

金正日(Kim Jong Il)于 1994 年接替父亲后,他的政府继续在首都中央广场检阅装备精良的军队,以便给外国政要留下深刻印象。2003 年,它公开宣布已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它宣称,这是保卫国家不受"美国侵略"的需要。在强大的外表之下,这个国家是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试验令人悲哀的遗迹。

战争结束后,南部朝鲜处在李承晚的专制统治下。1965 年他死后,一连串的军人统治者控制了政府,此时,从战时破坏中的恢复业已完成。他们把国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建设现代工业经济中,以取代战前落后的农业经济。他们"有指导的资本主义"(guided capitalism)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式,十分类似于日本模式。为了增加储蓄和投资资金,他们对消费予以严格控制,甚至禁止韩国人到国外度假。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的发展方式和人民的勤劳，成功地创造出了韩国的“经济奇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民主的反对派力量已非常强大，足以迫使这个集权政体放弃权力。国会与总统选举给了这个国家选民机会，选出他们认可的领导层，这在韩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新的民主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结束工厂工资的冻结，让工人的薪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增长，此时，韩国人的生活水平与西班牙人已不相上下。然而，冷战在他们的国度留下了疤痕，在美军援助下的韩国军队永久地驻扎在非军事区沿线，这个区域把他们与共产主义朝鲜分割开来。全球分裂为武装敌对阵营的遗迹至今在朝鲜半岛依然可见。

重点：遏制和反共产主义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一个神秘而有威胁性的存在。它的历史与自由民主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它的领导人用西方民众完全陌生的阶级斗争话语解释着国际关系。1939 年，温斯顿·丘吉尔就被苏联政策给弄迷糊了，乃至他称这个国家是“谜中之谜”。在击败轴心国后，它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但其行动仍然与以前一样难以理解。

这个谜的一个谜底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政治中的作用。共产党领导人赞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历史、政治和人类关系中真理的源泉。在理论上，革命是走向进步的唯一道路。自 240 1917 年以来，美国和西方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敌人一直在警告说，苏联是革命的家园，除非对之进行抵抗，否则它将毁灭西方文明。他们的反共信仰让他们担心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不可避免，当务之急要做好准备抵制苏联及其支持者的革命进攻。难以说清楚这种攻击是来自苏联军队，还是来自一系列的共产主义政治阴谋和暴动，共产主义者无论使用哪种方法，只要苏联存在，威胁就一直实际存在着。针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反共理论预见到了与共产主义摇篮势在难免的冲突，甚至战争。

苏联扩张之谜的另一个谜底来自从帝国兴衰历史上汲取的教训。

历史上，侵略性的新国家通过征服并控制其边界之外的领土和民众进行扩张，他们的领袖力图通过领土扩张得到权力和财富，并准备使用威胁和武力实现这个目标。但这些大帝国在扩张性成长中都曾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各种障碍，其他国家利用外交或军事手段，给它们权力的崛起设置障碍，国内的弊端也时常迫使它们收缩乃至最终衰落。从这种历史视角来看，苏联曾取得过大帝国的力量和幅员，因为其领导人是扩张主义者，像他们之前的其他扩张者一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怀疑，但这不是苏联领土扩张的根本原因。他们的外交政策的确对独立的邻国和对稳定和平的希望构成了威胁。但历史的经验表明，像古代一样，合理的应对之策是集外交和政治制约于一体，对这个新“帝国”力量进行遏制。

对苏联攻击性的历史诠释，是美国新的遏制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合作与协调政策（被称为“国际主义”，因为它以国际磋商和和平维护为基础）未能使其与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和平方面达成基本协定，40 年代后半期，这种历史诠释出现了。美国新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乔治·凯南提出，旧的国际主义方法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所谓“苏联行为”的观察和理解让他相信，苏联领导人对西方抱着深深的怀疑，疯狂地决心克服他们认为威胁自己统治的一切危险。

在凯南看来，他们敌意的源头在于俄国的历史经历。它在历史上曾再三面对侵略性的外部敌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驱逐这些敌人。他从未阐明这种漫长的历史记忆是怎样塑造了苏联领导人怀疑的世界观。他有时候声称，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敌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罪魁，斯大林本人冷酷的个性塑造了苏联的政治生活。但他对苏联的理解首先来自他确定不疑的观念，即它显示了一个扩张主义帝国的历史特征。它在国内依靠专制权威，相邻国家一旦露出弱点，它就准备把自己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扩展到国界之外。

241

苏联的敌意和扩张主义阻碍了永久性的和平安排，西方的和解姿态没能消解苏联领导层的怀疑。他们只依靠本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而非国际协定来保护苏联的利益。用凯南的话来说，他们对“理性的逻辑”没

有任何反应,对“武力的逻辑”极为敏感。但长期研究苏联行为也让他确信,在寻求国家权力扩张时他们不是“冒险主义者”,当遇到抵抗时,他们随时准备避免“不必要的冒险”。换言之,他们深谙“武力的逻辑”。这样的认知,为凯南构思美国新的长期政策提供了基调,他的政策方案,比罗斯福的国际主义路径少了些姑息,但也比反共产主义议程少了些强硬。

从短期来说,他的遏制战略并非绥靖,而是吁求抵制苏联领导人在苏联周边扩张势力范围的努力。凯南曾亲历了 1938 年针对纳粹德国实施绥靖的后果。慕尼黑危机期间他驻捷克斯洛伐克。遏制是他解决绥靖政策危险的良策。遏制政策呼吁美国对一些有能力抵制苏联扩张主义的独立强国提供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些国家将变成西方安全的盟友和地区稳定的核心,它们包括西欧、中东地区各国和日本。凯南相信,来自苏联的威胁不是军事侵略。他认为,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比美国弱。他极力主张使外交同盟和经济繁荣成为遏制苏联的主要障碍。不过,1950 年北朝鲜出兵南朝鲜后,他也支持美国军事介入,但限制在保卫南朝鲜的范围内。其遏制政策也伴随着军事代价。

然而,他的政策并未许诺迅速解决与苏联的冲突,他所理解的国际和平,是一个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梦。在他看来,保护人权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应该妨碍与对遏制至关重要的集权国家合作。但凯南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以反共产主义战争的方式来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既不同意反共产主义者对苏联威胁性质的看法,也不同意他们提出的美国正确的应对之道,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太过现实主义了。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位总统都曾许诺,美国卷入对外战争会促进民主事业和民族自决,这个诺言在诸多方面受到太多掣肘而未能赢得圆满实现。一些美国领导人赞同反共产主义者的警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从而推动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和建立全球军事同盟体系。

然而,他的政策依然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即便在反共狂热时期——如紧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反共狂热,以及有核战危险的危机时刻——如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政府也没有试图迫使苏联后退,

242 而是任由幅员辽阔的苏联势力范围的存在。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领导人在北越划出军事遏制线，错误地认定它是莫斯科的傀儡，但当战争在这里爆发后，又拒绝发动全面战争。后来，美国发起和接受了限制危险的核竞赛的谈判协定。凯南业已预见到苏联内部力量的衰微，会让这种耐心最终得到报偿。在他提出这项政策 40 年后，那种衰微开始了，高峰是 1991 年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和冷战终结。遏制战略所取得的成功，超过了他最狂野的梦想。

印度支那的战争与革命

在中国南疆之外，法国人曾名之为印度支那的那片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从法兰西帝国转到了日本帝国手里。19 世纪末，法国人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创建了一个殖民地，越南人和高棉人(Khmer)是这里最大的两个族群，也是两个曾经水火难容的敌人。印度支那也存在着宗教分野，这里有大量的佛教徒，也有重要的天主教团体。像中国一样，其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广布着由少数富有地主拥有、由贫民耕作的大庄园。到 20 世纪中期，实际上像其他殖民地一样，当地一些人准备发动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

法国殖民战争

印度支那的殖民冲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场斗争以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越南为中心。它为越南共产党提供了充足的新成员，越共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胡志明(Ho Chi Minh)。胡志明是莫斯科共产国际在东亚的国际代理人，他曾协助中国共产党，而后在 1929 年创建了他最初所称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从这时起，他的事业就是争取越南的独立以及开展共产主义革命。像毛泽东一样，胡志明坚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定到来，这场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他尊崇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智慧，但像毛泽东一样，他和他的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立的政党。

越南共产党的短期目标是把印度支那完全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他的武装斗争开始于抗日战争。1940年，胡志明组织并领导了抗击日本占领军的游击战。越南的丛林和山区是游击队的庇护所，而日军则占据着城市和沿海地区。在战争结束投降前，日军总指挥官以反抗同盟国的姿态，宣布越南独立。他的军队撤离，让主要的反日抵抗力量——越南共产党承担起越南共和国的领导权。

1946年，胡志明前往巴黎，准备与法国战后政府谈判。设若当时达成协议，那么越南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虽然承诺逐步给印度支那自由，但那里的法国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坚决反对把权力交给越南共产党。1946年，他们力图恢复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向越共占领的地区发起进攻，并迅速地将部队调入柬埔寨和老挝等内陆地区。共产党及其民族主义盟友撤退到农村地区，像北方的中国同志一样，他们在那里展开了游击战争。

243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这属于法国殖民战争性质。法国军队在战争中进展不顺。1949年，他们建立了独立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试图借此赢得那里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还不得不继续背负着血腥战斗的沉重负担，法军将领许诺迅速取得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胜利，但并未能结束叛乱。他们的军队由殖民地军队和法国士兵组成，占领着主要的城市地区，但乡村地区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1950年，美国政府决定介入支持法国人，印度支那的冲突进入冷战范畴。此前，美国政府认定这场战争是法国人恢复一个过时了的帝国的努力，亚洲的冷战改变了这种看法。到1950年，美国领导人已将遏制政策扩展到那些正在发生共产党起义的地区。实际上，他们把印度支那战争列入到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全球争夺当中。

美国领导人断定，胡志明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是全球共产主义力量的一次胜利。这是一种错误的、并最终会带来悲剧的判断。其之所以产生，部分原由在于美国反共产主义政治力量的影响日益增长，对他们所认为的“丢失”中国恼羞成怒。他们如此投入地组织反共产主义的战斗，乃至忽略了介入像印度支那这样的殖民地区将要耗费的人力物

力代价。大背景则是对斯大林扩张主义到处蔓延的恐惧。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作为这种错误观念的证据摆在人们眼前。因此,法国殖民军队在美国政府中找到了盟友。

美国政府开始为印度支那战争向法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回报,它要求法军镇压共产党游击队。法国军队不仅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行动中遭到重大挫败。到 1953 年,在扫荡共产党叛乱的战斗中,法军战线拉得过长,且遭到严重削弱,它难以保护自己的山区战略要地奠边府(Dienbienphu)。这一年,该地被共产党团团包围住。1954 年初,驻守在该要塞的 1 万名法军投降,结束了法国重新控制印度支那的努力。

是年,法国新政府判定,其军事力量难以赢得印度支那战争。法军在冲突中已有 10 万人伤亡,为控制这个无关紧要的遥远国家耗干了法国经济的财富,在亚洲殖民统治的荣耀对法国不再有吸引力。虽然法军依然占领着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但法国政府在 1954 年同意与越共谈判。

此时,美国政府进一步卷入印度支那的事务。日内瓦会议商谈结束这场战争,美国是会议参与方之一。来自越共、新成立的越南共和国和法国的代表与会,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和苏联的代表团。印度支那的和平是一项国际性事务。法美谈判者力图寻求越南分治,把越共限制在其力量中心所在的越南北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希望得到比法军实际控制范围更大的领土。

244

越共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希望签订一项实现越南统一的条约。但就建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国家的要求,胡志明的代表没有得到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任何一方的支持。一心想迅速解决这场战争的中苏两方向胡志明承诺,他无需继续战斗就会很快实现民族统一的目标。他们向他保证,共产党力量仍然是这个国家唯一强有力的,在南北沿海地区组织政治运动,这会让共产党很容易在和谈各方计划于 1956 年举行的越南选举中获胜。主导这次和平安排的民族自决原则,显然为共产党提供了可以轻而易举控制整个越南的机会。胡志明接受了越南的临时分治安排,1954 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终于结束。

北越和南越

美国政府决意阻止越共夺取南方。尽管观察者警告说，南越政权生存下去的机会十分渺茫，但美国仍然把流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吴庭艳(Ngo Dinh Diem)扶植为这个新国家的统治者。来自新成立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美国特工，开始组织搜捕南方的共产党，美国军事顾问着手组建南越军队。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到1960年，南越得到了10亿多美元的美国援助；这对南越政权的经济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代理民族主义领导人统治下的美国卫星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这个国家就难以为继，用肯尼迪总统的话来说，南越是“我们的子孙”。

创建一个非共产主义越南国的行动是大胆的赌博，从一开始其命运可能就注定了。在一片被政治敌对分裂的土地上，在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机构或杰出的非共产党民族主义领袖确保新政治秩序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建设再怎么往好里说也是一件令人畏惧的任务。近百万难民从共产党统治的北方逃了出来，其中包括担心胡志明独裁统治和自身压制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徒。南越大部分人口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既不愿意支持共产党，因害怕遭彼方迫害也不愿支持吴庭艳政权。吴庭艳的主要兴趣放在增强个人权力上，像韩国的李承晚一样，他相信，通过建立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他可以挫败共产党在自己新生的国家的地下运动。在美国的支持下，他拒绝举行原定于1956年的越南重新统一选举。相反，他大力建设警察和军队，主要用作国内镇压的工具。它们在削弱越南南方共产党力量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到1958年，许多南越共产党成员逃到北方或被逮捕入狱。

吴庭艳的南越计划是建立一个保守政府，保护地主和商人，接受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鲜战争结束后，类似的政治规划在南朝鲜已取得了成效，但吴庭艳让它在南越同样取得成效的机会要小得多。南朝鲜领导人宣称自己是朝鲜国家漫长历史的合法继承人，这样的诉求

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政权从 1945 年就已独立。吴庭艳缺乏越南
245
民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面临着力量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冲击。这场运动决心要把国家中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赶出去。

1959 年，内战降临到南越，这一年胡志明断定，只有通过游击战才能征服南方。共产党干部沿着位于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重返南方。共产党的首个目标是农村地方官员。他们的肩头担负着稳定吴庭艳在乡村地区统治的任务。政治暗杀和恐吓破坏了吴庭艳政权对许多地区的控制，地下党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新的行动根据地。

南越政权的弱点很快显露无余。农民选择投靠共产党代理人，后者会保护那些给他们提供帮助的人。1960 年有 2 500 名南越地方官员遭到暗杀，吴庭艳的官员为自己的性命战战兢兢，退却到有防御工事的营垒里。到这一年年末，共产党起义遍地开花。美国官员警告说，吴庭艳政权岌岌可危。美国支持的国家建设未能成功。

始于 1959 年的新暴动，从吴庭艳和美国在南越招致的越来越多的敌人那里，从准备把所有资源投入到这场斗争的北越那里，不断聚集力量。游击队的补给，部分来自缴获的政府物资，部分来自北越。北方的中央领导层和党的干部纷纷来到南越，帮助和指导南方共产党。1960 年，战斗仍然是越南人之间的一场内战，共产党已趋于赢得胜利。

聚焦：胡志明

保密是胡志明(1890 — 1969)一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作为越共地下党领导人的漫长岁月里，其隐匿状态保护他未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也让其私生活不为公众所知。在他们眼里，他似乎全身心地投入到越南独立事业中。他为我们所知的名字，只是他用于藏匿自己身份的诸多化名里的最后一个。该名字的意思是“带来光明的人”，在 1940 年他创立民族主义抵抗组织与日本占领军战斗时，变成了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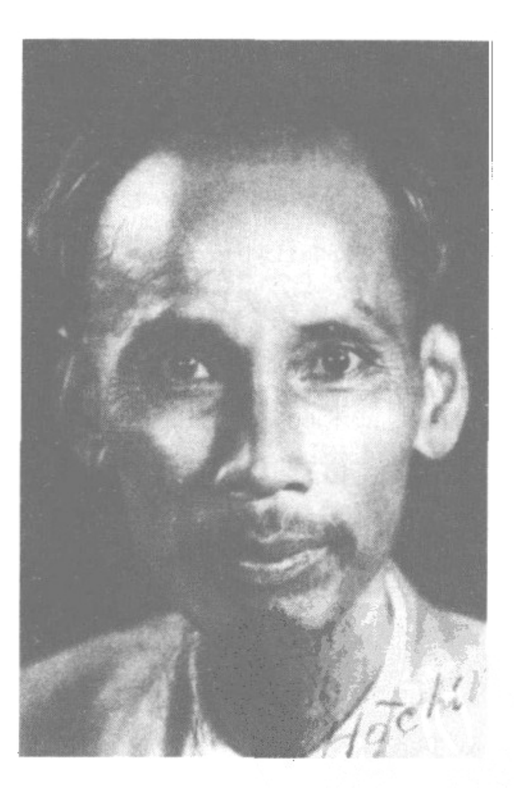
越南摆脱外国列强获得解放的斗争，是他作为一位革命者的终身目标。他在越南长大和受教育，既接受了越南的传统教育，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1911 年 21 岁时，他前往欧洲寻求新生活，最初是在一

艘法国轮船上当厨师，随后在 1917 年移居法国，当过园林工和侍役。但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名政治活动家。

他已发现自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和越南爱国者的号召力。1919 年，他向巴黎和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印度支那独立。在这份文件上他署名“胡爱国”(Ho the Patriot)①。就在这些年间，像毛泽东一样，他逐渐相信，必须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实现本国人民的解放。他成为共产国际的积极分子，到莫斯科指示的任何地方服务。1929 年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只是他为世界革命而努力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首要的任务是争取自己国家的民族解放。按照他的想法，建立独立的越南将是越共的行动使命，因为他认为解放既包括社会革命也包括推翻帝国主义殖民枷锁。他是一位虔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相信暴力是通往革命解放的必经之路，他的新政权必须是一党专制体制，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他创建新越南的首次尝试差点儿取得成功。1945 年，日本占领当局给了他建立新国家的机会。是年，他在河内(Hanoi)召开了庆祝独立大会。他在大会上宣读了摘自美国《独立宣言》的句章，但他无意仿效美国革命。法国人回来重新控制印度支那后，他逃到山区和丛林地带继续战斗，但未能活着看到最终胜利来临的那一天。



胡志明(David Barrett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他的成就是击败了法国人，并于 1955 年在越南北方建立了越南

① 按英文拼写为“胡爱国”，但胡志明当时署名似应为阮爱国。——编者注

民主共和国(Vietnamese People's Republic),成为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和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接着,他发起暴力运动,开始扫荡阶级敌人,建设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他计划中的革命社会没有其他政党的存在空间,也没有个体农民或工商业者的容身之地。

247

当越南南方脱离了他的南方支持者的政治控制后,他再次要求展开游击战。这次,除越南反共阵营外,美国也是敌人。他作为革命者的技能和他在支持者中享有的权威,确保了他在漫长恐怖的战争岁月里一直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像毛泽东一样,他从未怀疑,牺牲将带来胜利,统一的共产主义越南是其民族的救赎。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下半期,反共产主义中国已变成美国在亚洲遏制政策的主要特征。美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越南境内的战斗仅视为一场局部冲突,对他们来说,它像是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另一个步骤。他们担心,如果不在印度支那阻挡住共产主义的扩张步伐,那么其他东南亚国家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滑向共产主义暴动。1960 年当选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新政府判定南越内战是冷战的组成部分。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就是,阻止"中国吞并东南亚"。肯尼迪及其顾问对美国实力过度自信,期望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将确保吴庭艳的胜利。增加军事援助,似乎是避免美国直接卷入战争并同时保证南越胜利的捷径。

美国卷入这场冲突分为两个阶段。在前四年里(1961 — 1965),美国的介入主要表现为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重新武装南越军队。这种政策让南越军队的规模到 1963 年增加了一倍,1.5 万名美国军事顾问对之加以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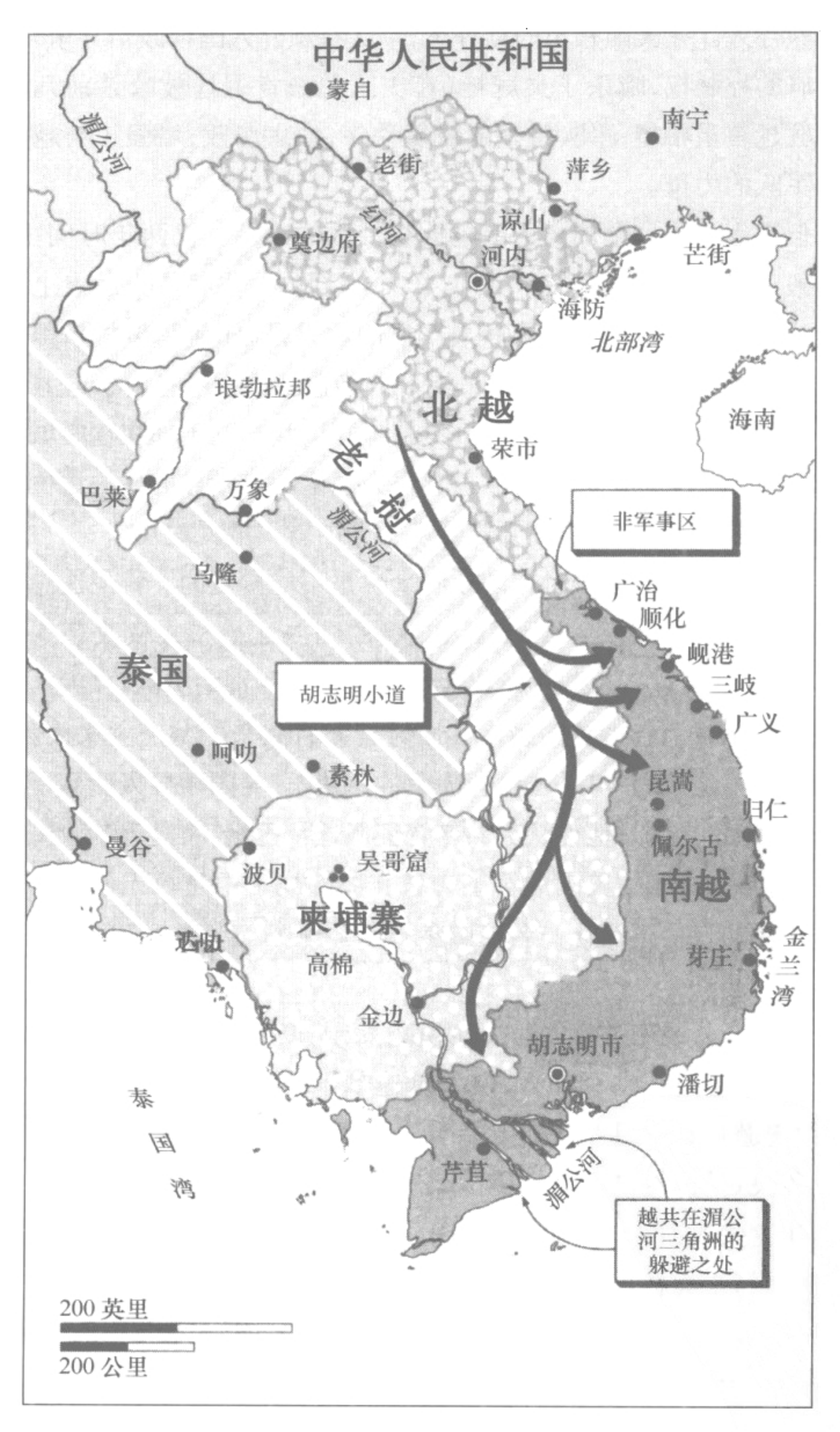
但南越政权的政治弱点比其军队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反对吴庭艳集权统治的南越人数量日益增长,他的政治雄心与其政权的实际力量不相称,他显然难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以及改革自己腐败的政权。1963 年,美国支持军事政变,孤注一掷地试图寻找有能力管理南越政

权的领导人。在美国官员的默许下，军队将领介入国内政治斗争，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暗杀了吴庭艳（在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前几天）。美国驻越官员希望，军队将领能恢复秩序，结束腐败，增强正与越共作战的军队的力量。

但军人统治只是加剧了南越政权治下的动荡。仅两年时间里，在自我毁灭式的政治领导权争斗中，10 个不同的军事将领先后走上前台统治这个国家。这种动荡局面最严重的后果是，任何军事将领都无力阻止共产党控制区的扩展，1964 年下半年它已遍布所有省份。共产党游击队甚至包围了南越首都西贡，与此同时，共产党干部在这座城市里自由地行动。南越政府已丧失了它作为越南国家领导力量的地位。除非美国采取激烈行动，否则共产党几个月内就将取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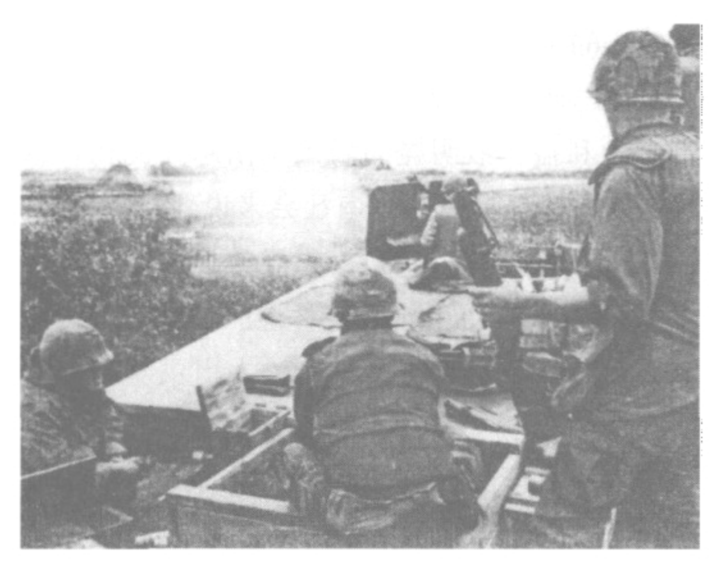
248 “丢失”南越的前景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肯尼迪总统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国内社会和人权改革纲领赢得了 1964 年大选。尽管他承诺致力于建设他所谓的美国“伟大社会”，但他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越南。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胜利，他宣称自己不能成为“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美国领导人受到了两种信念的驱使，其一是他们认为共产党征服这片土地，将是遏制政策的严重失败；其二是相信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局部战争中是攻无不克的。这种悲剧性的自信过头让一名美国参议员后来判定他的政府犯下了“虚妄自大”罪。

美国介入越南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始于 1965 年。约翰逊的顾问们保证，如果美国陆空军加入，定将迅速拿下战争。被他们的观点劝服后，约翰逊开始组织美国直接军事干预越南内战。249 他大幅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定权，使自己免受美国众议院的任何干扰。1965 年初，约翰逊利用这些权力，下令美国战斗部队在越南展开行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二次卷入了亚洲陆战。然而，这次冲突与朝鲜战争不同，这是一场游击战争，没有任何前线，敌人无所不在，很容易与平民混淆，唯一清楚的分别是美国人和越南人的区别。印度支那战争给美国军方提出了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
蒙自
南宁
湄公河
老街
萍乡
谅山
红河
奠边府
河内
芒街
海防
北部湾
琅勃拉邦
北越
海南
老挝
荣市
巴莱
万象
湄公河
非军事区
乌隆
广治
顺化
岘港
泰国
三岐
胡志明小道
广义
呵叻
素林
昆嵩
归仁
曼谷
佩尔古
波贝
吴哥窟
南越
柬埔寨
高棉
金
兰
湾
芽庄
金边
胡志明市
潘切
泰
国
湾
芹苴
湄公河
越共在湄公河三角洲的躲避之处
200 英里
200 公里

越南战争



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美国海军在越南行动，约1968年(Official U. S. Navy Photograph, Courtesy Freda Utley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夺取胜利的方案包括两项的军事行动。像朝鲜战争一样，美国的目标限定在防卫尚不在北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领土。美国陆军与南越军队合作，负责“平定”南方，也就是镇压越共的游击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开始对北方实施空中轰炸，希望造成巨大破坏，逼迫北越领导人同意结束在南方的共产党起义。美国空军进行了其历史上最为密集的轰炸行动。

轰炸未能带来胜利。北越是一个农业经济体，并没有对其经济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可打击目标，而且其民众愿意忍受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巨大苦难。轰炸行动也从未阻止过北越向南方游击队的物资补给行动，或迫使北越严肃地考虑放弃战争。

南方的陆地战同样失利了，没有实现镇压共产党游击力量的主要目标。到1968年，美国派驻越南的兵力超过50万人，几乎与南越军队一样多。为了协助步兵行动，美国空军在南越农村地区进行了密集的空中轰炸。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的直接结果是阻止了越共的胜利，共产党游击队缺乏装备和人员击败美国—南越联军。1968年初，他们尝试发动大规模进攻夺取南方的城市地区，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作为血腥战斗的结果，他们的军事力量萎缩了三分之一，从30万减少到20万。北越军队成为起战斗的主力。游击队挖掘了数千英里的地下隧道。这些隧道在地下30英尺深处，用以躲避美国的轰炸。许多士兵阵 250

亡了，但更多的人补充了他们的位置。

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外交、政治、经济和人力代价增加到极高的程度，远超过胜利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最明显的后果是南越人民伤亡惨重，无助的受害者遭到战斗双方的抓捕。对越南社会来说，同样严重的还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是战争的直接后果，它导致许多地区有序的村庄生活遭到毁灭，轰炸和大规模使用除去密林地区树叶的落叶剂带来农业产量的下降，400 万难民涌入城市。越南的人道灾难远远地超出了有限战争的限度。

美国付出的代价，尽管不能与越南的苦境相比，但也足以削弱其介入的决心。空中和地面战的总耗费，再加上给予南越政府的援助，使战争的代价上升到 1 500 亿美元。至战争结束，战斗让 5 万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速战速决的预期破灭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剧烈的政治冲突，许多美国人在战争的残酷面前退却了，他们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真相。美国介入的外交代价同样是高昂的。越战使其把注意力和资源从更重要的大国关系问题上转移开来，如美苏的军备控制和中东日益恶化的冲突。越南战争的持续对美国来说代表着失败。

1968 年，这些因素合在一起，迫使美国政府再次转向利用南越军队击败共产党的起义。次年，美国开始撤军。“越南化”意味着把战争责任移交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援助的南越政府。与此同时，新上台的尼克松(Nixon)政府与北越政府开始谈判。

新政策也导致美国政府做出最后一次努力，阻止供应物资从北越流向南方游击队。胡志明小道穿过相邻的中立国家柬埔寨，美国多年的秘密轰炸未能阻止这条丛林小路上的物资运输。为了阻止物资流入，美国军队 1970 年侵入柬埔寨，美国成为这里一个反共军人政府的保护者。

这种战争升级行动的唯一效果是扩大了冲突。北越物资供应继续运抵南方，因为丛林地带大部分是美国步兵无法到达的。在北越共产党的军事支持下，柬埔寨反叛力量红色高棉占领了自己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入侵立竿见影的结果只是让柬埔寨直接卷入到这场战争

中。红色高棉开始了自己的反美解放战争。但美国从印度支那的撤退仍在继续，到 1972 年，已没有任何军队留在越南或柬埔寨。

美国军事力量的撤出注定了南越政权的命运。美国与北越在 1973 年达成一项妥协性的和平协定，但它却为共产党的胜利打开了道路。越南共产党接受了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的存在，作为交换，美国谈判者同意不要求北越从南方领土上撤走所有的军队。大量北越军队在南越的继续存在，让他们拥有了在适当时机发起新进攻的基础。

南越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起初拒绝签署该条约。尼克松总统秘密承诺，如果北越发动攻击美国会出兵，从而克服了他们的反对。然而，1974 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丑闻中辞去总统职位后，这个承诺变得一文不值。南越领导人未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权，美国也没有能力在南越扶植起一个强大的非共产主义民族国家。

1975 年，越共在这片曾被叫作印度支那的土地上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是年，北越军队发动总攻，他们在两个月里击垮了南越军队，南越国家与军队一道崩溃了。不久后，越共把南方并入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时，红色高棉击败了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权。三年间，他们囚禁和处决了数百万柬埔寨人，红色高棉的革命暴力最终导致他们自己垮台。1978 年，他们的军队侵入一块越南边境地区，他们宣称这块土地属于柬埔寨，该行动激起了越南的军事反击，并轻而易举地推翻了红色高棉政府。越南共产党在几年内统治了前印度支那的所有地区。

最终，越南共产党的胜利并未如 60 年代美国好战派所预测的那样，是东南亚的灾难。尽管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它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羞辱，但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影响力并未遭殃。20 世纪 70 年代初东亚的重大国际事件是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恢复了良好的关系。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事实证明，越南战争是一个次要事件。

面对柬埔寨反越的民族主义和越南指令性经济的衰败，越共把整个印度支那置于自己统治下的梦想破灭了。在柬埔寨，越南控制下的新政府与敌视越南的联军之间的内战持续了数年。1990 年，最终轮到

越南军队自己放弃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越南政府同意撤离，把这个国家交给柬埔寨新政府。

在越南，指令性经济的失败和对柬埔寨的军事干预制造出巨大的经济危机，越南领导人难以把这场危机的罪责推到数十年战争的头上。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得如此剧烈，乃至它位列世界上最贫穷的社会之一。绝望之中，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逃离自己的国家，许多人乘船出海，希望到西方寻求庇护。越南和美国为战争死难者建立的一座座纪念碑，标示着争夺印度支那的灾难性斗争所付出的真正代价。

小　结

战争和革命深远地改变了东亚的历史。日本不再拥有庞大的帝国或强大的军队，它曾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广袤地区，但最后不得不放弃它征服的所有领土。日本的失败为这片广大地区的革命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打开了道路。

252

东亚各国的内部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国家特有的力量。在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交融到一起，支撑了漫长的革命战争。二战后朝鲜的长期分裂，归因于两个集权政权的力量对这个国家牢牢的控制，南北两大集权政权都出现在二战后同盟国占领时期。韩国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铸就繁荣的东亚地区的“四小龙”之一，应归功于人民的勤劳和奉献，他们拥有相对自由的经济选择权，并将这种自由的经济选择权转变为开启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密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引进了斯大林体制的北朝鲜让国家陷入赤贫的境地。

越南共产党击败法国人和美军的胜利，也是其追随者奉献牺牲的产物。美国人能登上月球，但其军队面对的却是这些游击队中最不屈不挠的对手。印度支那战争数十年的毁灭和流血所留下的遗产，是统一的越南和柬埔寨民族国家，以及它们官方史学里对共产党英雄的记忆。在越南，即便在指令性经济崩溃后，共产党政权依然掌握着权力，

这也是那场战争的遗产。

本章大事记

1945 年　朝鲜分治
1946－1954 年　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
1946－1949 年　中国内战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年　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建立
1950－1953 年　朝鲜战争
1954 年　法国从印度支那撤退
1955 年　北越和南越的建立
1959 年　越共在南方发动起义
1961 年　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南越
1965 年　美国军事介入越南
1972 年　美国军队从越南撤退
1975 年　越共征服南越和柬埔寨

推荐阅读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Sus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51*(1978)。对 20 世纪重大战争之一深思熟虑的评价。

Jonathan Spence, *Mao Zedong*(1999)。对这位伟大革命领袖生平简单而有批判性的重新评估。

朝鲜战争

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1993)。到目前为止对原因晦暗不明的北朝鲜出兵行动的最佳研究。

William Stueck,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2002)。对那场被遗忘的冷战冲突的缜密分析。

印度支那战争

William Duiker, *Ho Chi Minh* (2000)。这位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批判性长篇传记。

* 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1975* (2nd edition, 1986),简明扼要地探讨了美国在越南的国家建设和反共产主义中的失败经历。

冷战和遏制

*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ty* (1982)。对从起源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遏制政策极具洞察力的研究。

Anders Stephanson,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1989)。这位外交家的思想传记,强调形塑他世界观的文化力量。

回忆录和视频教具

* Robert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1995)。美越战争中重要角色之一撰写的充满思考且坦率的自传。

* Bao Ninh, *Sorrow of War* (1993)。一部栩栩如生的北越小说,描写了越南战争的人道惨剧。

Platoon (1986)。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惨烈电影,通过一名美国普通士兵的视角透视这场战争。



第九章　中国和日本的复兴（1950 — 2000）

254

- **共产主义中国从革命到致富**
- **日本从战败中复兴**

重点：革命和指令性经济

东亚最后的帝国——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灾难中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它的军队撤离了亚洲大陆，放弃了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支那、中国和朝鲜。只剩下他们自己的本土岛屿群，日本人民不得不在战争的废墟里和美国的占领下重塑自己的生活。东亚在许多方面都亟须重组再造。

该地区各国仍然保留着由西方帝国列强划定的边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从未完全收复大清帝国曾经统治过的边陲土地，但这个新国家通过谈判和军事力量，确实保住了其领土和人口的绝大部分。它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其西部地区有大量说突厥语和藏语的少数民族，说汉语的民族是这个国家人口占多数的民族。

苏联和美国以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和它们所遭遇的抗阻，成为东亚诸国的发展进程中持续而重要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的早期岁月里，为意识形态动机和军事援助而投靠苏联。后来，他们公开谴责苏联邻居抛弃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在他们与美国对抗中，苏联未给予支持。这种冲突导致了亚洲势力均衡的深远转变。美国作为占领权力同时作为经济援助的来源国，在重建日本过程中扮演了重

255

要的角色,直至日本经济"奇迹"成为美国产业的样板。为了理解东亚国家的演变,我们必须既关注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力量,也要关注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它们的全球支配地位使 1945 年后的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行动的产物。

共产主义中国从革命到致富

1950 年,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文明中国之前程命运,成为共产党的使命责任。长期内战让其人民陷入分裂,大部分国土生灵涂炭。日本人的战争产生了破坏,它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中国共产党反抗仇敌的斗争带来了中国爱国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对这个党的支持。紧随共产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胜利,它为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毛泽东作为党的"伟大舵手"和古老帝国的继承人,登上了权力舞台。

毛泽东和共产党专政

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改造国家、社会和再造中国人民行为观念的革命任务。毛泽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直至变成一种半宗教式崇拜的对象,犹如苏联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那种英雄崇拜。他的主导地位赋予中国共产党最初数十年一种独特的革命特征。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毛泽东就已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群众身上。他带着这样的信念,用他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语汇来说就是,开始着手"打倒封建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他相信,在怀疑论者看来不可能之事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假如接受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群众"能够创造"奇迹"。对中国人民群众非同寻常的信任之情贯穿着他整个当权岁月,并激发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共产主义试验。

毛泽东相信,他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套系统的革命智慧。他的思想主旨蕴涵两大经验:(1)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必须改造以符合中国国情;(2) 毛拥有创造性的天才,找出了通往社会主义社会以及领导党和国家走向这种幸福生活的中国式道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他赋予人民解放军特殊

而重要的地位,它是党夺取政权的先锋队。他认为,解放军的严明纪律和献身精神为整个革命先锋队树立了榜样。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在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把如此重责放在自己的军事组织肩上。总的说来,中国共产主义的这些根本性律条构成了人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Maoism),它们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指示着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

256

最初,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国家不久的将来设想为照搬苏联最初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他们崇拜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仿效苏联的政治专政和经济革命。他们相信(尽管时间不长),苏联已成功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革命者在朝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必须追随苏联模式。1949 至 1950 年冬在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宣称,苏联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和指令性计划是"新中国建设的模板"。与此同时,日本在这些年里按照西方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体制重建自己的国家和经济,而中国道路仿效的则是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体系。

革命中国

在实现其革命计划时,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游击战岁月里,他们在统治相对较小区域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控制着比大陆美国还要大、拥有 6 亿人口的土地。这些人有许多曾与共产党的敌人战斗过,或支持共产党的敌人。政治信仰和自身利益曾让许多中国人与国民党携手奋斗,另外一些人则与日本人合作共事。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度,遭到数十年战争的严重破坏,其新的领导人渴望建设一个富裕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革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一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感到急不可耐。

成立新国家首当其冲。这个新国家的疆域与此前的中华民国和清帝国大体相当。西藏再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1950 年共产党军队解放了这里。同年,随着苏军撤退,新疆边远西部不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国当局接踵而入。只有台湾岛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之外,因为那里的国民党逃亡政府处于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机构模仿苏联一党专政体制。1954 年新宪法生效,它给予中国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其职责包括选举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新体制通过为每个非汉族民族创建“自治区”,正式承认了少数民族的存在,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都有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学校和文化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遵循列宁的中央集权原则,大权掌握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手里,毛泽东是这些威权赫赫的委员会的主席,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像斯大林一样,毛泽东确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北京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周围,悬挂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巨人肖像,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接下来是列宁、斯大林,最后是毛泽东。世界共产主义这种“使徒传统”(apostolic succession)的景象,将他提升到了世界领袖的行列。

在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废墟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清洗敌对势力,削平敌对的思想意识。共产党开始镇压敌对阶级,由军队、法院和秘密警察(国家安全部队)合力进行。1951 年,针对“反革命分子”的新法律发起群众集会,公审反党分子。没有人确切知道被逮捕和判决的中国人数量,温和估计的数量为,约有 100 万到 300 万人遭处决,大规模的劳改营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用以“改造”囚犯,许多囚犯作为强迫劳动力服刑数十年。

这些年里采取的社会改革措施,指向构成帝制中国社会核心的“五常”[①](five bonds)。传统的家庭是共产党向旧中国进攻的目标之一,它被视为儒家学说和祖先崇拜的堡垒。他们倡导妇女权利平等的原则,并把该原则应用到中国社会,要求取消旧式婚姻习俗,包括童婚和强迫婚姻、童养媳和杀婴。离婚变得合法,堕胎亦是。新政权根除了缠足的习惯,缠足曾是女性屈从地位的象征,是封建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荡平这些残余对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改革都包含在 1950 年的

---

①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译者注

婚姻家庭法里,它向数个世纪的风俗习惯发起了挑战。

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和颁布新法令,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效果。在此期间,共产党政权改进了节育方法,限制人口过快增长。其他新的社会政策包括无情地打击吸食毒品,在几年之内就扫除了这种恶习。政治专制统治和席卷性的社会改革,把这个新国家的权力和党的权力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大跃进

1953 年初斯大林的去世,开启了中苏关系的新时期。苏联新领导人公开承认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有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们放弃了斯大林曾经取得的领土特惠权,扩大了经济援助计划,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向中国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机械、信贷和技术援助。这些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

258

利用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系作为自己样板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采用了苏联指令性经济的主要机制,也就是指令性计划、农业集体化和快速发展国有化工业。1955 年,他们启动了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毛泽东命令党迅速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 年,国家对剩余的私人工商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仿效苏联的实践模式,中国领导人严格限制农民消费,以便将农业产出转向城市和工业人口。

到 1956 年,整个中国经济皆已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毛泽东期盼社会主义发展的奇迹,他援引苏联经验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他在这一年写道,"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此后他再也没有用如此热情洋溢的词句谈论过苏联社会主义。

不到一年时间,毛泽东(先是私下里而后是公开地)指责了苏联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糟糕透顶的失败,是什么让他的思想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转向并不为人所知。他后来表示,他认为苏联领导层应为他们国家在工资和收入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状况负责。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社会主义的衰亡。他抨击苏联的官僚

主义,他认为这种官僚主义应为腐败和不公负责。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这两项指责都是对的,但后来的事件证明,他自己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同样弊病重重。

这两大共产党国家的争论很快呈现出宗教派别对立的形貌。以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改革者挑战天主教教皇一般的精神,毛泽东相信,自己比其他任何共产党人都更懂得怎样去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冲突以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开始,他们相互谴责对方是邪恶的异端。

1958 年初,毛泽东开始着手证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将希望建立在自己的信念上,即他认为中国人民有能力实现这样的丰功伟业,有能力胜任这样的非凡努力,有能力在集体体制下做到这样的根本性进步。人民的意志力和他的领导能力,将在短短数年里把中国引向富裕和社会平等。他写道,"中国六亿人口"好像"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在上面"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要求他们协助他实现一次"大跃进"。

他对自己国家的宏伟憧憬,要求中国抛弃它几年前刚开始采用的苏联式经济政策。指令性计划必须终结了,因为它方向错误且是有害的。他声言,中国工农群众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一年内就能把经济生产提高 100%,完成多座大坝和洪灾防范工程,并能够将集体农业转变为公有制农业。他要求在农村地区创建"人民公社"来取代集体农庄。它们将按平等的原则组织起来,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也没有私人园地或私有住房,家庭将过上集体生活,饭食和儿童保育由公社统一提供。就在这场运动前夕,毛泽东写道,世上没有人民群众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他们把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党对人民群众帮助的需求,导致了生育控制的废除,直到 20 年后这个国家的人口又增长了 3 亿之后,该政策才重新复归。大跃进表露了毛泽东不同寻常的革命民粹主义和乌托邦理想。

259

现实是灾难性的。对农业的激进改造重组导致了最糟糕的后果。农民丧失了劳作的动力,被从田地里带到大规模的灌溉和防洪工地上,

以及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教导会议上花费大量时间。1959 年和 1960 年的农业产量下降得如此严重，乃至饥荒蔓延整个中国乡村。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困难程度之大在此后数十年里人所共知。尽管有严厉的定量配给，以及 1961 年决定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但仍有数以百万计(最近的估算是 4 000 多万)的中国农村居民因饥荒和疾病而死亡。毛泽东对群众动员方式的灾难性试验是原因所在。这场危机促动党内领导层里反对这一政策者强行结束大跃进，他们公开批评用“游击战争的办法”统治国家。他们掌控了政府，毛泽东暂时地失去了权力至尊地位，但他作为中国革命伟大舵手的权威确保了他在党内的地位。随后数年里，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他不得不强压自己的不满。他平等的社会主义梦想不再主导国家政策，他在党的领导层里的影响力缩小了。

他的革命政策加速了中苏联盟的破裂，诸多国家利益问题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中苏失和的根源所在，领土争端和不同的对美政策加剧了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紧张关系。1960 年，毛泽东谴责苏联共产党背叛了列宁主义，没有遵守诺言，即一旦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开战会给予军事支持，出卖了世界革命事业。作为报复，苏联领导人停止了一切对华援助，拒绝进一步帮助中国开发核武器，撕毁了经济援助协定。几周内，所有苏联技术人员都撤走了，由其援建的工厂被遗弃在那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与中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变得与中苏关系一样举足轻重。大约在与中国爆发争吵的同时，苏联答应向印度出售军火，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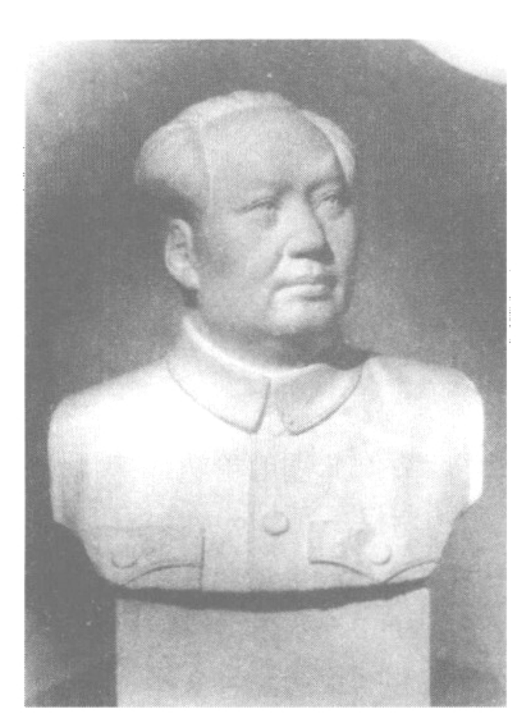
中印之间在漫长的喜马拉雅边境线上存在长期的争端，中国政府决定确立对印度宣称拥有的一片领土的控制权。到 1960 年，中印之间的争吵演变为军事对抗。印度政府拒绝承认这片土地属于中国，并将军队调动到那里。中国领导人准备开战。1962 年，在印度边境沿线条件恶劣的山区，中国军队展开行动，在一场短暂的边境冲突中，击败了印度军队。在占领该地区后，中国部队终止了战争。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苏联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260

262 “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发起一场新的、更为暴烈的革命攻势之前，1960 至 1966 年间的几年是一段短暂的平静时期。人民公社被解散，规模较小的集体农庄重新建立起来。农业复兴需要大量的国家投资，这些年里主要按照需求和生产效率的实用原则进行资金分配。

尽管无力阻止这些变化，但毛泽东拒绝妥协，他斥责其同僚们的“资产阶级”精神。他在一本名为《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里，宣扬自己的革命共产主义观和个人崇拜。该书的发行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保证，军队印刷了 10 亿册，确保全体中国人和国外拥趸者都能得到。小红书最热情的读者是中国青年人，他们对伟大舵手的钦仰是发自内心的和毫无异议的。毛泽东乐于接受他们对其理想的支持，对他们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

60 年代中期，他似乎确信，他的革命陷入了恶(他的敌人)与善(人民群众、军队和学生)之间持续进行的冲突当中。他认为，中国青年不会被贪婪或野心所腐蚀并随时准备着与“阶级敌人”战斗，他相信这些敌人已然渗透到他的国家当中。他的直接目标是消灭新的“剥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这个新的剥削阶级包括高薪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党的官僚。他准备针对自己的党和本国有教养的精英，发动一场新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崇拜：毛泽东胸像，1970 年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在此前的革命史中从未有过类似始于 1966 年的十年动荡这样的现象，它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都卷入了进来。它削弱了党的机构

和统治,在教育、工业和农业领域制造了漫长的动荡,毁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乃至整个“文革”历史至今仍然晦暗不明。1966 年,毛泽东依然是中国人民尊敬的领袖,能够动员学生、工人和士兵中的支持者参加到他所称的文化大革命中。是年,他明确指明阶级敌人是谁,警告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263

在这场阶级战争中,毛泽东的主要武器是发动群众运动,推动他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直接目标是摧毁党的旧领导层,创建新的革命体制,该体制由掌管国家的一个个“革命群众组织”构成,革除贪婪的官僚、利润追逐者和自我本位的知识分子。他以某种方式千方百计地赢得党的领导层足够的支持,发动一场他们必定知道会威胁他们政策和权力的运动。1966 年,他获得了创建并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绝对权力,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发起他的文化大革命。1966 年中期,该组织发起宣传动员,呼吁所有 7 万万中国人“打倒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首批干将来自青年学生,以“红卫兵”(Red Guard)为单位组织起来。是年秋,所有大学和高中停止正常的学习,这种中断持续了近十年。学生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毛主席呼吁他们领导他发动的新革命。

红卫兵是中国青年的革命组织,他们的登场与毛泽东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潮头浪尖互为呼应,是年 8 月,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 100 万红卫兵,犹如太阳东升出现在他们面前,他的指示简明扼要:“破旧立新。”这年秋冬,武斗席卷全国,那些自封的革命者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攻击被指称为反革命的人士,囚禁党的官员,破坏老的纪念性建筑和中国历史的珍贵遗存。党的官员们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反击这些孩子们的讨伐,抵抗中心形成了。街头示威经常演变为敌对政治派系之间的公开战斗。

接下来的 10 年是极其混乱的 10 年,严重的混乱伴随着对党的官员和工厂管理层的攻击。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为领导权而混战,与宣称捍卫真正的毛主席路线的工人组织战斗。对阶级敌人的惩罚包括公开

侮辱,流放到乡村,关押囚禁,甚至殴打至死。

很快,人民解放军开始介入,在中国各城市和城镇强行恢复最低程度的公共秩序。1968 年,毛泽东授权军队监管各省的经济和政治事务。军队指挥员不想让中国成为军事化的国家,相反,他们组织了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学生和军队代表组合为极其混乱且不稳定的联盟,它们取代地区和城市的旧党委,后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些革委会行动的指导原则是"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思想和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所在。

264

事实证明,毛的革命体制既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不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机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政治统治的主要力量。在 1969 年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解放军领导人,在政治权力上仅次于毛泽东的林彪,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业已取得胜利。实际情形却是到处蔓延的混乱,以及对臆想的阶级敌人的继续猎杀。人民解放军省级军事指挥员们掌控着国家残余的微弱政治权威。在这场大动乱中,工业建设任务、专业人员培训和科学研究皆荒废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专家和教师被迫接受"再教育",到农村公社从事体力劳动。中国进入不断革命的时期,一直持续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才最终结束。

这些年里,中苏关系极其紧张,战争似乎随时可能爆发,毛泽东的支持者把苏联视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宣称大部分东西伯利亚属于中国所有。19 世纪之前,清帝国曾在这里行使着遥远而有限的宗主权。1969 年,在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爆发了零星的战斗;1969 年和 1970 年,偶发的对抗出现在整个漫长的中苏边境。苏联政府断定,毛泽东是危险的和侵略性的,他们相信,中国的战争威胁是如此严峻,乃至他们调动大量的武装力量,包括核导弹,前往与中国接壤的东部边境。中苏之间的冲突成为一场新的冷战。

被毛泽东制造的国内动荡和国外威胁吓怕了,党的其他领导人逐渐终结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狂热阶段。国务院总理和最具影响力的温和派领导人周恩来,恢复了自己在决策中的作用,同样地,权力易手交替的具体过程我们至今仍不清楚。1972 年,党的领导人正式解散红卫

兵,其大部分成员被送往农村劳动,在那里,他们不能再拥护毛的文化大革命。但只要毛在世,就没有任何人挑战他乌托邦式的中国社会主义梦想,也没有任何新的改革举措出现,医治其政策造成的巨大破坏。

“致富光荣”

70年代末,毛泽东的革命秩序土崩瓦解。为中国经济体制全面变革开辟道路的事件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得到了创建新中国之父一切应得的荣誉。他的继承者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权力毕竟来自他曾经发动的革命,但毛泽东的继任者也从他们领袖可怕的乌托邦试验的惨痛经历中汲取了教训。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长期穷困,他们仍然缺乏足够的食物维系生存,为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他们自身的权威,取决于让中国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

265

到1978年,邓小平领导下的党的新领导层,着手结束毛四分之一世纪破坏性的革命试验。是年,邓小平公开宣布,在四分之一世纪的乌托邦试验后,共产党的梦想转向了经济。

新领导层致力于实用的改革,这些改革将赋予中国人民努力工作的机会和动力。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支持成为重中之重。指令性计划遭到急剧的弱化。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做生意的权利。私营商店能够以市场可以承受的价格供应顾客想要的商品。

邓小平为国有工业划了界线,他不愿意放弃规模庞大的国营工厂网络,这些工厂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工人阶级支持的保证,它们对雇员和工人的就业、住房和福利保障,产生出观察者所谓的中国“铁饭碗”。邓小平明令这些国有企业——效率臭名昭著的低下——以自己的生产赢利,但事实证明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这些工厂继续亏损,只能依靠国家补贴苟延残喘。

邓小平眼前的关注重心是为使中国农村人口提高粮食产量而给他们提供经济刺激,中国的生存取决于他们的努力。1978年,新领导人彻底改变将耕地置于国家监控下的政策,他们让这些土地重归

私人自由耕种。[1] 农产品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国家控制下解放出来,农民允许通过劳动谋利。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政府开放了私营商业网络,给农村带来农民想要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很快就包括昂贵的耐用品,如电冰箱、电视机和日本进口的摩托车。这种改革程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集体农庄的结束对大多数仍居住在农村的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农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国家的农业产量翻了一番,他们引进新的高产水稻和小麦品种,这些品种作为"绿色革命"的一部分,10 年前在西方业已开发出来。到 80 年代中期,中国已有粮食盈余用于出口,此时,中国经济以年均 9%的速度扩张。到 80 年代末,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1 亿人)还生活在贫困中。邓小平为这个新中国宣扬的新口号是"致富光荣"! 后来,中共共产党领导人降低了他丰富的内涵,向中国人民允诺"小康社会"这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

后共产主义时代:全球经济中的中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于 1978 年发动的经济改革逐渐让这个国家向市场经济开放。后来,他的继任者把经营产权的保护列为宪法权利。中国各大城市成为国家欣欣向荣经济的中心,三分之二人口依旧生活其中的乡村则发展滞后。在接下来的 25 年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七倍,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在财富方面最快速的大规模增长。

到此时,共产党领导人坚定地致力于在全球经济中进行合作。他们欢迎国外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向中国注入数十亿美元。1997 年,在英国把东亚金融中心香港归还给中国后,他们的经济获得了接近香港财富的直接通道。数年前,富裕的香港商业企业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投资者。这些新企业的产品在全球经济中找到了市场,尤其是

267

---

[1] 作者此说法有误,自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农民得到的是土地的私人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译者注

美国,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快速的人口增长;21世纪初,中国人口估计已达13亿。成百上千万农村移民离开村庄,到沿海城市迅速扩张的工业经济中寻求工作。中国各个城市里的人们,发现那里空气和水污染与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都市地区一样恶劣。在中国北方,由于铺张的工农业用水,地下水供应日益短缺。中国科学院警告说,如果不严厉控制水资源利用,那么到21世纪,中国大片地区都将面临严峻的长期干旱。

对驱动经济发展的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抬高了全球原油市场的价格,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21世纪初,中国对进口石油的需求,使之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市场。电力短缺迫使中国政府于1995年开始在长江上修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大坝,其库容如此巨大,乃至500万人不得不迁移出去,数百万亩良田沃土被淹。共产党政府笃信,只有通过促进经济现代化——无论其代价多大,才能为国家众多的人口找到工作。

这些年里,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们重新界定了他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将国家利益置于世界革命之上。至20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中国出口最重要的市场。通过向世界市场出口以实现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府首要的关注点。它准备按照国际市场经济规则行事,并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与邻国和平共处也同样事关重大,中苏尽管从未回到早前的同盟关系,但两国结束了边境争端。共产主义理想尽管尚未被忘却,但它不再横亘在国家利益之路上。到21世纪初,党的领导人在政治讲话中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们真理的源泉。但这个国家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复有任何相似之处。

重点:革命和指令性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掌控了自己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他们立即着手寻求能在最短时间里给予他们国家一

268

个现代工业经济的政策。西方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样板，但它把太多的主动权留在私人投资者那里，且难以保证经济快速增长。苏联的指令性经济是他们的另一个样板，斯大林不断宣称他的国家正在朝着社会主义的“光辉未来”凯歌式行进，他的威望在那个时代臻于巅峰。他及其支持者坚信，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是由于他和他的政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强加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他们宣称，历史站在他们一边，这种观点在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当中吸引了许多皈依者，他们在拒斥西方帝国主义的同时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改革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够保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它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承诺。换言之，它们既是促进工业发展的手段，亦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词语“指令性经济”最适当地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经济体系，因为国家拥有控制工商业和农业领域一切经济活动的权力，发布指令确定生产、价格和工资指标，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发展经济。当中国、北朝鲜和越南的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实施经济革命，他们改造了这种指令性经济的体制和政策。亚非诸多民族主义政权国家也引进了这种经济体系的主要方面。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整个第三世界各国经济更类似于苏联的指令性经济，而非西方资本主义。

指令性经济的两大特征在其运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国家拥有和监管所有生产资料；二是国家控制一切对外贸易。两相结合，这些权力把国家行政管理带进民众经济事务中的程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的经济干预。在建立指令性经济时，国有化是必要的步骤。在苏联，夺取政权后，政府颁布政令，接管所有的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在私人农地集体化之后，农业也同样处于国家的监管之下。

个人手里余下的唯一私有财产是他们的私人所有物，在农村就是农民居住的房子及周边的小地块，有时候甚至这些也会被剥夺。私人生产和谋利是非法的，当局指控这些是资本主义行为的残余。在世界各计划经济体中，非法的私人交易从未消失过，因为它们效率低下的分配体系和无处不在的物资短缺为稀缺商品创造了现成的市场。但国家

宣布这种私人交易是犯罪行为,交易者会被处以监禁,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被处以死刑。共产主义政权的指令性经济合法地镇压自由市场经济中带来利润和赞赏的活动。

所有对外经济活动也在国家的监管之下,政府机构负责从外国购买商品和服务,其他机构则决定是否向国外出售商品,以及本国向国外出售多少数量的商品。指令性经济让国家把自己的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其程度比西方国家以往任何时候——哪怕是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尝试的都要彻底。没有任何跨国公司或银行能做出决策,直接帮助或阻碍其经济增长计划。国际价格的波动毫不影响这些国家进口其领导人判定有用或想要的商品。就在西方各经济体正大踏步迈向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之时,各共产主义政权牢牢地控制着所有对外贸易活动。它们得到保护免受资本主义的干预,同时也与西方各经济体的技术革新隔绝。更重要的是,这些控制确保了政治领导阶层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269

这些经济体在国家的指令下运作。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在理论上受各种国家规划机构制定的计划的支配。指令性计划以实现年度计划作为经济活动成功的关键指标,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执行自己部委的指令,而工人则遵从工厂厂长的指令,不允许有任何工会召集罢工阻碍生产,那是非法行为。

生活条件依赖于这种受到紧密控制的经济的消费者,不得不接受任何他们能够找到的商品。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各部委确定。社会主义社会保证工人就业和所有消费者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选择机会绝无仅有,但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如毛泽东等领导人尽管改变了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未考虑放弃它。对他们来说,不坚持指令性经济的基本特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这种体系潜藏的根本性弊端是如此严重,乃至到 20 世纪 90 年代,它在它曾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国家里都消失了。这些弊病包括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刺激技术变革、忽视民众的选择权、农业生产率的极端低下、完全不顾经济工程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主管着该体系的

官僚昏庸无能。指令性经济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变为一个巨型公司，其董事会由国家政治领导人组成，其雇员在巨大的主管部委官僚政治网络里劳作，其产品在市场上享有垄断权。

在该体系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着鼓励冒险的动力机制，如引进更丰产的耕作方式，试验更多产的制造方法，或向消费者提供新产品。西方经济体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着手大规模改进电子、无线电和计算机技术，给生产和通讯带来革命性的新方式，但类似的东西在共产主义国家悄无声息。

国家部委继续下达实现生产计划但浪费稀缺资源的大型经济工程。这些工程对消费者几无任何益处，他们获取新产品的最有效手段是黑市。这些工程还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组织迫使各部委考虑环境代价。但最终削弱了整个体系的弊端是政治和经济领导人们的昏庸和腐败，他们把国家财富掌控在手，但对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财富既不关心也没受到任何专业训练。

270 大权独揽的国家官僚机构日益倾向于从其经济权力和影响里谋利，这些官员的生活比任何普通公民的生活要舒服得多，大量官员接受贿赂换取个人好处，腐败行为甚至扩展到非法的黑市操作中。20 世纪 50 年代，东欧一位指令性经济批评者称共产主义老板们是一个“新的阶级”，像 19 世纪的资本家一样残酷地盘剥本国经济。他们没有坚守社会主义的承诺，未能取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从经济方面来说，事实证明指令性经济最终会走向破产。

日本从战败中复兴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政府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接受了美国的军事占领和同盟国决定的和平条款。从军事上和心理上来说，战败都是彻头彻尾的，日本人民从广播里听到他们的天皇以自己的名义接受投降和丧失独立，这是一个“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但又无可逃避的屈辱。美国占领当局统治了这个战败的帝国六年，唯余天皇的位置让日

本人民尚能回忆起帝国的过去。像德国一样,日本只是从前的自我的幽灵。

美国占领日本

然而,对德日两个战败国的处置是不同的,日本占领由美国单独负责,其海空军在击败日本帝国中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事力量独自占据了这个国家。美国太平洋战区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成为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他在这个国家掌管着绝对权力,并且只对美国总统负责。他统治的领土依然保持完整。苏联要求得到一个独立的占领区,但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因此没有任何苏联占领军抵达日本本土。一个由各同盟国组成的委员会名义上有权监管麦克阿瑟的工作,但实际上,它只是批准这位最高司令官业已决定的各种政策,占领日本是美国的而非盟国的事情。1945 年末,斯大林在莫斯科向美国大使抱怨说,日本盟国委员会里的苏联将军“所受的对待像一件多余的家具”。但他的抗议是半心半意的,他接受了日本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事实。

美国对日本行使如此非同寻常控制权的事实,形塑了同盟国占领的又一重要特征。日本中央政府执行最高司令官的指令,而德国在占领期间没有任何国家级政府。日本统一的象征仍然是天皇,尽管他完全是有名无实的政治角色,但日本人依旧把他视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

1945 年麦克阿瑟就任最高司令官时,裕仁天皇做了简短的仪式性演说,将自己置于胜利者的支配下。他告知麦克阿瑟将军,他希望独自为战争中的每一个政治和军事决定承担责任。尽管美国政府决心惩处日本战犯,但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不让裕仁天皇负责,他想获得天皇对其占领政策的支持。他的决定让日本人民免于看到自己的天皇像普通战犯那样受到审判的耻辱,裕仁天皇对战争行为的责任成了国家秘密。在美国的指示下,日本得以维系它的政治统一,保留了帝国的君主制。

271

麦克阿瑟掌管的国家是一片废墟。日本伤亡人数共计 900 万,在美国的大规模空袭下,日本所有大城市皆遭破坏。广岛和长崎各遭一

枚原子弹袭击，成百上千万平民无家可归。海上商船几乎损失殆尽，大多数纺织厂和煤矿早已停止运转，粮食生产跌至战前水平的一半。雪上加霜的是，600 多万曾生活在帝国海外领土上的日本人逃回或被迫返回日本。

更深层的毁灭超越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伴随着屈辱性的战败，人们对日本军事领导层的崇敬之情消失了。美国凌驾于日本国家与人民之上的事实，削弱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旧精英阶层的尊敬。日本帝国失去了其行为的指导法则，许多日本人处于集体震惊的状态中。

272

他们对投降的心理反应，在美国实现成功占领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日本人配合征服者最常见的态度是在建设美国人强加的新秩序中乐意合作。按照一位日本史学家的看法，这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希望，即尽管遭到可怕的破坏，但“必须有所作为”，人们普遍相信，日本“实现未来强大之路在于吸收美国的技术文明”。[①] 换言之，胜利者掌握着复兴的钥匙。

强化这种态度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人当中赢得的巨大尊敬。他专横傲慢的行为方式，为许多美国人所不喜，但在被征服的日本人眼里，却是传统的武士权威的体现，展现了美国人的不拘小节。尽管他每天都乘敞篷车前往司令部，但在他统治的六年里，从来没有成为暗杀的目标。天皇已公开接受了美国统治，表明了他在占领期间予以合作的意愿，日本人民也同样如此。

在占领期间，美国当局加予了这个国家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一部新宪法、引入普选制、以法律保护妇女权利和扩大整个教育体系。20 多万前官员和政客因战争行为遭到惩罚。许多遭到清洗的个人暂时消失了，但美国占领结束后又重新出现在新的政府职位上。清洗包括对战犯的审讯和判决，被判有罪的人中包括东条英机将军，他犯下了发动战争罪。许多日本人不了解日本对待战败民族的残忍暴行，把这些审判中应用的原则认定是征服者的正义。从全球视

---

① Masataka Kosaka, *A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Tokyo: 1972, p. 35.

角来看,审判是一纸宣言书,表明西方对支配战争的国际法的信赖。

新宪法是占领期间进行的主要改革举措,麦克阿瑟直接负责宪法改革。他把这份文件呈交给日本政府,希望他们批准。在宪法翻译成日语后,用东京的一个报纸评论员的话来说,其章节条文听上去“新奇得像美式英语”。麦克阿瑟还坚持,它必须包括一段引言,声明“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宪法把和平主义作为一条政治原则,这是美国军事占领特殊性的又一清晰的表征。尽管它是舶来品,但这部宪法契合了人们的期望和日本公民过去的民主实践。它主要借鉴英国的内阁制,与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议会民主制没有很大的不同。民选议会掌握主权权力,遴选由首相领导的内阁。它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根本大法。

美国的经济改革举措旨在重组日本的各行各业和产权控制,它们触及农业、工业和劳动者。新的农地改革法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最重要、最持久的变化。美国占领当局下令大规模重新分配农地。农地是从地主手里收来的,他们得到的补偿价格非常之低,事实上形同被没收。日本全部可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转移到500万农民手里,这些人以前是没有土地的佃农。此项改革涉及范围是如此广泛,乃至看上去像共产主义中国最初的土地改革。它为麦克阿瑟赢得了激进分子的名声,美国一些批评者称他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农民成为日本主要的保守政治力量,鼎力支持分给他们土地的新秩序。 273

美国鼓励小企业和劳工的改革努力则不那么成功。这些改革的精神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改革,这种美国式的自由企业梦想难以在日本商业和政治精英中扎根。产业改革解散了数家大型经济公司——财阀(zaibatsu),美国人指责它们是日本战争行动的合作者。美国占领当局通过法律,旨在“消除日本经济权力的集中”,他们许诺,资本主义的企业机会将在小企业中“和平地重新分配”。然而,超大型日本企业在几年后就重新出现,很快主导着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

新法律保护和鼓励工厂工人以及国家雇员组织工会,这导致了改

革者未曾预料到的劳工战斗性,工人们转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会组织者和活动家,许多工会处于日本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劳工们持续的不满情绪,加之基本商品短缺和共产党劳工领袖的鼓动,导致了1946 年和 1947 年激烈的罢工运动。当工会号召在 1948 年初举行全国性罢工时,麦克阿瑟动用他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特殊权力,禁止了这次大罢工。

到此时,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经济重建和社会稳定应是他们最优先的事务。他们站到了日本管理方一边,撤回了对工会的支持。这种保守的社会政策为接下来几十年的日本资本主义确定了模式。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建立起一种民主的自由企业体制,该体制所推动的政治经济实践,与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实践颇为相似。

日本新的政治领导层——明显地屈从于美国占领当局,在这种新秩序的引进中实际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战后,日本发生了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分为几个党派,但工会许下的实现根本性社会进步的诺言,吸引了数百万成员加入进来。这些组织提出的改革,比美国占领当局所支持的举措要广得多,尽管它们没有机会真正引进自己的改革工程。在 1957 年的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社会党,也仅获得了全部选票的 25%,它建立了一个联合内阁。对社会党心怀敌意的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结束日本战后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左翼政府。他们对任何社会主义式的改革都抱着深深的疑虑,像在德国一样,他们判定政治保守派最适合冷战政策。政治权力转到了右翼手中,自由党和民主党(不久合并为一个政党)组织起联合内阁,它们的领导人是吉田茂(Shigeru Yoshida)。

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吉田茂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主导性力量。左翼政党之间的纷争确保了自民党联盟在国会里的控制权和内阁领导权。保守派的目标是促进日本的商业利益,加速结束美国占领。日益升级的冷战紧张关系,促使美国当局日益依赖自民党在新的遏制政策中辅助他们。1948 年,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

274

在重大的政策转变中(在德国同时发生),美国政府开始动用一切

可能的手段,加速促进日本的经济复兴。日本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退居次要地位。1948 年,麦克阿瑟宣布,他希望将日本变成一个"自立的国家",能够抵挡住来自外部苏联的压力和来自内部的激进政治煽动。1949 年,他动用自己的占领权力,迫使日本政府大幅削减支出,降低财政赤字,以便遏制通货膨胀。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这种财政保守主义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吉田茂对此予以了合作,因为他欢迎社会改革政策的结束。他的合作得到了日本商业和金融领袖们的大力支持,这些人是吉田茂政党的主要支持者。他还协助占领当局成立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工会运动,把共产党人从政府和工会岗位上清除出去。新的产业工会与管理方合作,降低工资,增加投资。这种复兴方式同时也应用于西德。

吉田茂的合作之举使他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合作也提升了他的政党的政治运势以及该党支持的保守计划。工会运动到 1950 年业已衰微,既遭到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间战斗的撕裂,又被美国保守的占领政策削弱。企业利益至上、工会的削弱以及吉田茂自由民主党内阁保守的政治统治,是未来数十年日本国内政治的主导趋势。

冷战中的日本

在冷战岁月里,曾经的敌人日本,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朝鲜战争使日本变成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的主要基地。它位于苏联东部边境这一地理位置,使之成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垂涎不已的空军基地所在地,其港口给美国海军提供了海港。基本的改革措施已产生效果,日本政治领导权掌控在保守派手里。1951 年,美国军方结束了对日占领,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该和平条约让日本重新掌握了其本土列岛,但它失去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Sakhalin),它们归了苏联。台湾回归中国,冲绳岛(Okinawa)被美国占领。日本开始向二战期间被其征服的各国赔款,与之没有外交关系的共产主义中国除外。

日本政府没有机会设计自己的外交政策,它的回旋空间狭小,因为它身陷冷战前线,接近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日本一些民族

主义分子希望恢复日本独立的东亚大国地位，由自己的陆海军保护，在超级大国之间自由地确定自己的道路。相反，反军国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则力促自己的国家中立化，他们力争到，日本不应该在冷战中扮演任何角色，在其领土上应拒绝任何军事力量的存在，无论是它自己的还是美国的。

首相吉田茂在这两大立场之间选择了一条折衷路线。在 1952 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中，他接受了与美国结为军事同盟，允许美国在日设立军事基地，像西德一样让自己的国家处于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之下。他同意遵从美国的冷战政策。在日本人当中，争议最大的政策是不承认共产主义中国，这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决定。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日本与其强大的邻国没有任何官方关系。然而，吉田茂拒绝屈服于美国政府再三要求日本突破自卫队最低限度重新武装。这些年里，他的国家是一个解除了武装的国家，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中。

275

整个 50 年代，与美国结盟在日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强权——美国及其前亚洲敌人日本之间，《日美安保条约》确定了不平衡同盟的条款。对安保条约条款的反对主要来自社会党和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1959 年，在重新商定该条约时，政治反对派和街头示威变得异常猛烈，以至日本政府一度瘫痪，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议会政体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最终，日本公众转而反对新条约反对派的暴烈策略，是年，条约在国会里被强行批准。作为回报，以不民主方式处置这场危机的保守的首相辞职以平息抗议。

“经济奇迹”

日本惊人的经济发展始于战后十年。最初，这个国家不得不度过一段从战争破坏和殖民地损失中复原的痛苦时期。在战后岁月里，日本商界人士仍然不愿意开始真正的经济重建，他们缺乏国外市场，没有国内航运业，担心工人骚动的后果和美国强加的社会改革。到 50 年代初，这些问题令他们满意地得到了解决。吉田茂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执

政的自由民主党同盟保护投资者,劳工抗议平息了下来。从1950年开始,美国为在韩国的军队进行大规模采购,给日本经济提供了强劲的促动力。美国政府允许日本商品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它还开始大型的经济援助计划——道奇计划(Dodge Plan,相当于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鼓励使用这些援助资金使日本的经济现代化。最后,它允许日本企业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它没有料想到这些企业利用美国技术建立新的工业大帝国会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功。

这些有利的金融、商业和技术条件,为后来众所周知的日本"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1956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战前水平,差不多同时,食品配给制最终结束。日本家庭仍然满足于过十分朴素的生活,剩余财富主要流入经济扩张中。日本民众平均20%的收入投入储蓄(60年代初美国的人均储蓄率只有7%)。各行各业都大规模借贷,利用日本民众的储蓄投资新产品、新机械和建立从事外贸的商业公司。到50年代末,日本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每七年就翻一番。没有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能与之相媲美。

276 外国和日本观察家们为这个国家经济财富发生如此惊人转变的原因争论不休。一些人强调日本国民优良的教育水平,他们得到良好的培训,能够轻而易举地适应复杂电子技术的新产业时代;另一些人则强调有利的国际条件,包括美国的自由贸易和技术,亚洲和西方对各种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但人们都一致认可,政府官员和产业界领袖之间合作,联手努力扩大日本全球工业市场的份额是成功的。日本保守政府投入财政资源,颁布法律保护措施,为日本工商业发展创立各种公共服务机构。这个自由企业规划系统的主要机构是国际贸易和产业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其官员利用他们在国家金融和贸易活动方面的广泛权力,监管着日本的经济发展。

日本商界和政府精英确立了一种经济体制,该体制后来被称为"有指导的资本主义"(guided capitalism)。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的官僚们收集经济数据,预测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国际发展趋势。他们以这些信息为根据向大企业建议经济目标。政府利用关税建立贸易保护壁垒,阻

止与日本商品有竞争的国外进口商品。出口企业得到国家低息贷款形式的补贴。有指导的资本主义巩固了保守派政治家、国家官员与商界领袖之间的联盟。日本人尊重民主程序,但在其背后,真正的政治权力取决于一名西方观察家所谓的"各种权势机构和手腕"。

在遭到决定性失败的四分之一世纪后,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富生产力和最繁荣的国家再度崛起,它的资本主义模式被亚洲其他国家所学习和仿效。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发展方式在韩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它与日本一起,被称为东亚"四小龙"(Four Dragons),它们的经济欣欣向荣,伴随着年均近 10%的增长率,所有这四个国家每十年经济财富就翻一番。亚洲许多领导人声言有指导的资本主义是通往经济繁荣的"亚洲道路"。

新产业从日本商界人士的企业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人具有杰出的能力,可以将西方技术转化为可靠廉价的产品。一些企业主的故事揭示了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特征。20 世纪 40 年代末,一个年轻的日本机修工本田宗一郎(Sochiro Honda),开始以远低于西方进口产品的价格制造摩托车。到 50 年代末,他的公司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市场包括整个亚洲和西方。他的工厂后来转向生产汽车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当西方的电子技术发明为电视开启了新的消费市场时,1958 年,一名日本电子工程师以 500 美元和 7 名工人,开办了一家小公司,生产一些电子产品。他的公司索尼,后来成为世界上电视设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新机会意识和产品质量意识,是确保在不断扩展的全球经济中为消费者提供新产品的日本企业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个人首创精神与既有的大公司管理技术和政府支持紧密结合在一起。日本人呼之为"株式会社"的大企业,将融资、运输和销售业务合为一体,分公司延伸到亚洲和西方。它们的雇员和工人,以有保障的终身雇用和高工资聚集在公司工会里,是日本劳动大军的贵族阶层。他们比那些在小企业里的工人要富裕得多,小企业里的劳工薪酬低廉,失业是时刻存在的威胁。

277

虽然战败剥夺了其整个海外帝国，但日本以自己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影响力范围。美国仍然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市场，但日本投资者和出口商很快在东南亚建立起重要的商业联系，日本人的工厂在该地区到处涌现，以廉价劳动力和日本技术生产流水线产品。在政府的鼓励下，日本企业投资新的电子产业，到80年代，日本已是全球电脑制造中心。国家核电工业的迅速发展是日本政府又一个重大决策。在中东石油危机时代，日本政府决定让国家摆脱对进口石油和煤炭的依赖。直至20世纪90年代，有指导的资本主义仍然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后来，随着来自其他东亚经济体通过竞争打入它的海外市场(对一个民众节俭地生活并继续将很大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的国度来说，这始终是其主要的销售市场)，日本失去了继续使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

到这个时候，美日同盟已变成不正常的、尴尬的伙伴关系。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仍然强大，但日本的金融和技术成就让其银行和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出口每年赚得数十亿美元的外汇，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被重新投资到美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国家彼此相互依存，日本经济同样是美国企业的利润来源，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人已不相上下。尽管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曾短暂地重新激起日本人对战争和日本战败的记忆，但此时那似乎已是遥远过去的一部分了。

小　结

战争和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东亚的历史。日本不再拥有庞大的帝国和强大的军队。在占领过东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后，它不得不放弃所有被征服的领土。它的战败，为这片广袤地区的革命和新民族国家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形貌，尽管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梦想曾给这个国家带来政治和社会混乱，但共产党的专政体制不可撼动。日本实行民主改革后，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民主体制，它仿照美国

雕塑树立起来的新自由女神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同时也是日本战后变革的象征。战败后，日本的民族自豪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但这个国家在新的经济奋斗中携手合作的能力，让日本重新回归到世界强国的行列。

多样的历史经历背后，是该地区近代历史显而易见的重要的相似之处。这种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在亚洲其他地区、中东和非洲一再重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目标成为政治行动和民众期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平凡但有效的经济发展计划，取代了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平等的乌托邦式运动，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278

在各大帝国土崩瓦解之后，东亚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卷入到全球事务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竞逐扩展到这个地区，这里的各国政府为了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或倒向西方，或倒向苏联。全球市场吸引制造商和各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竞争。民族独立和全球相互依存，构成了战后东亚历史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本章大事记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 年　西藏解放
1951 年　美国结束对日占领
1956 年　日本经济繁荣开始
1958－1960 年　中国发起大跃进
1966－1976 年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 年　毛泽东去世
1978 年　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结束
1980 年　中国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推荐阅读

共产主义中国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1985)。对毛泽东统治下最具破坏性年代的细致研究。

*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雄心勃勃地努力将中国共产党政权置于这个国家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故事中加以考察。

战后日本

*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1999)。对日本战败后痛苦的恢复的细致研究。

Akira Iriyi, *The Cold War in Asia*(1974)。一部将日本整合到冷战冲突中的东亚国际关系史。

* Edwin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1995)。对晚近日本社会、文化和政治史的简要考察,作者是该领域的资深史学家之一。

Kar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1989)。对日本式民主体制的批判性评估。

回忆录和视频教具

* Orville Schell,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China in the Eighties*(1984)。一个老中国通对中国私营企业令人惊奇的涌现过程所作的敏锐观察。

Small Happiness(1980)。一部特写纪录片,由一组西方人类学家拍摄,内容是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中国村庄的。影片特别注意了妇女享有的新自由。

279

第十章　南亚的新国家

- **各岛上的新共和国**
- **印度和巴基斯坦争取独立**
- **印度和巴基斯坦民族国家**

聚焦：苏加诺

重点：新国家与族群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内，南亚的西方帝国纷纷消亡。荷兰撤离了其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美国给予菲律宾完全的独立，英国给予印度、缅甸和马来亚自由。在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政治变迁遽然而至。在一些国家，走向独立伴随着内战和种族冲突，在新获得解放的民族中间留下了苦涩的记忆和敌对。尽管西方各国曾经利用武力统治它们的殖民地，但它们也招募和培训数量日益增多的殖民地臣民，进入军队和行政部门服务。在它们殖民地界线之内共同使用的语言，给予了不同种族的人民一种有用的交流工具。在它们的统治岁月里，为开采西方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帝国给殖民地带来了经济投资，包括建设铁路和港口。数个世纪的帝国统治在即将到来的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整个南亚地区，反殖民运动都将民族统一作为自己争取独立计划的根基，在当前目标是驱逐西方殖民统治者之时，这是一个将领导者和支持者凝聚到一起的美好愿望。但事实也证明它是一个困难重重的理想，将之融入到新国家的生活中并非易事。领导人大谈特谈超越他们

280

国家内部的社会、宗教和文化鸿沟的民族主义,暗示他们寻求建设一个包容所有人的宽容而自由的国家。但他们发现,种族和宗教纽带仍然是内部各民族中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分离主义运动经常出现,他们的目标是捍卫自己族群的利益和完整性。种族民族主义威胁着这些国家新赢得的统一。面对持久的社会分歧和冲突,领导人们经常求助于威权主义统治,作为难以捉摸的民族统一的替代品。

在新独立的土地上,自由带来一种将他们与前帝国和西方分离开来的根本性差异意识。这种独特性最宽泛的定义来自印度领导人尼赫鲁。按照他的看法,非殖民化在世界被解放民族中业已创造出追求和平的集体需求,他力图让自己的国家远离冷战的国际冲突。许多其他领导人赞同他的观点,支持"不结盟"政策,拒绝与西方或苏联集团结为同盟。尼赫鲁把他们在新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描述为"第三世界",与民主的"第一世界"和共产主义的"第二世界"分别开来。

差异并非大到如此程度,乃至这些新的民族国家能全然不顾工业更发达的国家。它们的领导人面临着贫困和经济落后的尖锐现实,需要外部的帮助和援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和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依赖于西方的自由企业体系,或依赖于类似指令性经济的中央政府控制体系。在期望国外援助和引导的同时,他们适应和改变这些政策和体制,以投合自己的需要。

各岛上的新共和国

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南亚各国的历史遵循着共同的模式。最初数年是非殖民化时期,也就是消除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联系和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新政权按照自己与东西方的关系确定新的国际政策,聚集到一起商讨共同的问题和政策,哪怕它们在最希望采取的发展道路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们的政治发展转向威权统治,一小撮领导人利用政治追随者和依附者操纵选举。在任何地方,经济发展都日益受到重视。但无论是对城市还是农村的民众,贫困依然是挥之不去的现实,而商业精英和官僚精英则累聚起巨额财

富。社会和种族骚乱时而零星爆发，支持由革命政党组织的游击战争。国家建设构成了一个复杂且时常是暴烈的进程。

菲律宾独立

1944 年，随着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军队的回归，菲律宾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二战前，美国政府已给予菲律宾自治权，仿效美国政体组建起有民选总统和立法机关的政治体制。有权势的家族主导着这个群岛的政治生活，它们的权力基础是自家拥有的巨额财富，它们利用这281 些财富维系着政治庇护体制，雇用政治上的“依附者”执行自己的指令。它们是菲律宾真正的统治者。

日本占领只是恶化了菲律宾农民的艰难处境，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被迫向征服者缴纳沉重的税赋。作为反抗，1943 年，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者既攻击日本占领军，也攻击大土地所有者，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中有许多人与日本人合作。这种农村暴动，282 与散居于菲律宾群岛的各民族之间的种族敌对一起，在战后岁月里仍然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所在。

1946 年，美国正式给予菲律宾新政府独立。第一任民选总统自己曾与日本人短暂合作过，像前任一样，他的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惩治通敌卖国者。政治权力移交给菲律宾人民，但并没有削弱地主和工商业精英的统治地位。没有任何革命运动涤荡新的领导人，或给农村人口提供具体的土地改革计划。独立和平地到来，对菲律宾上层阶级的特权和安适未做任何触动。

殖民秩序的残余继续形塑着这个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依赖于美国的领导是菲律宾新政权的指导原则。在冷战中，它加入了西方集团，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让美国在菲律宾群岛设立海空军基地。作为报偿，它得到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它继续坚持美国统治者带来的资本主义体制，维持保护其市场经济的法律。

跟以前一样，国家的外贸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贸易协

定允许菲律宾商品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对那些希望移民美国的菲律宾家族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作为回报，美国投资者得到了特殊的优惠条件，在菲律宾共和国创办新公司。菲律宾商人和工业家与美国银行家和制造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菲律宾政府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均与美国政府及经济的利益紧密相连。社会主义试验在这种新秩序里没有立足余地。

尽管存在社会不平等和种族多样性，但菲律宾领导人得以在短短几年里建立起民族统一的基础。新政府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主岛吕宋岛(Luzon)上的农民暴动。到 40 年代末，它已变成一支主要的反叛力量，有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它得到了无地农民的支持，这些人最仇视的敌人是大土地所有者。从 1950 年开始，强有力且颇受欢迎的军队领导人雷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对游击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成功地控制了农村大部分地区。在政府最终通过改革法案，分给佃农土地后，武装反叛者失去了支持，大部分农民放弃了叛乱，以换取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事实证明麦格赛赛是一位克里斯玛型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极受欢迎。1951 年，他的改革与和解路线成功地平息了叛乱。是年，菲律宾选民选举麦格赛赛担任菲律宾总统，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 1957 年去世。新的菲律宾国家享受了数年的和平时期、民主政府和经济发展。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共和国的民主政体和代议制政府被一系列权势赫赫的政治强人所颠覆，民主政治演变为精英统治。菲律宾领导人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写作中哀叹，他的祖国"托身于民主但却被根深蒂固的财阀政治所掌控"，"致力于平等但却深陷于陈旧的等级体制"。充满权力欲望的政客之一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担任事实上的独裁者达十年之久。菲律宾变成政治阴谋的沃土，日益被内部叛乱所撕裂。

1965 年当选为总统的马科斯，操纵立法，极大地扩大自己的总统权力。他真正的支持来自他那非正式的支持者网络。他通过政治庇护体系来网罗这些人。社会混乱和种族冲突依旧是菲律宾政治生活的显

283

著表征,马科斯以此为借口,为他不断增长的威权统治寻找正当的理由。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族群针对中央政府以及他们岛屿上的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堂掀起反抗。在北部各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运动在贫苦农民中间不断出现。但马科斯残酷的统治和腐败的政权未能阻止混乱。1972 年,马科斯不是选择举行新的大选,而是颁布军事戒严法律,在军队的支持下,大肆逮捕政治反对派,结束了宪法保护的政治与公民自由权利。

他的独裁统治没有解决其国家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他的政权从未能压制住共产党和穆斯林的暴动,而尽管有美国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也没能改善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条件。他利用专制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聚敛了巨额财富(在他倒台后,一些人估计他的财富总额超过 10 亿美元),让他的亲信朋党中饱私囊,充实自己强大的政治机器。权力给他和他的追随者带来巨大利益。到 80 年代初,他的腐败和政治高压已引起整个国家的愤怒,甚至天主教会都加入到要求他下台的行列中。1986 年,在军队领导人转而反对他后,他被迫逃亡国外。到此时,政治反对派已发起大量的群众暴动。

继他之后担任总统的是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她是该政权著名的反对者贝尼格诺·阿基诺的遗孀。1983 年马科斯下令暗杀了贝尼格诺·阿基诺。她承诺恢复民主统治,重新团结全国,但数十年经济衰败和威权统治的遗产带来了诸多巨大的问题。这个国家保持了民族统一,恢复了民主政府,但它难以结束南部诸岛上的穆斯林反叛活动。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胜利地结束了美国军事基地在这个群岛国家的存在。1994 年,他们为最后一个美国海军基地的关闭欢欣鼓舞,菲律宾投资者把美军基地的建筑转变为第一批电脑和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全球经济业已取代冷战,作为菲律宾通往外部世界的主要连接通道。

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

在东印度群岛,从日本统治下取得解放之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

者与荷兰军队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殖民战争。1945年8月，从东印度群岛撤退之前，日本占领当局业已批准那里的民族主义合作分子宣布自己的国家独立，直到数周之后才有同盟国军队抵达东印度群岛。在这期间，民族主义者为他们名之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创建了政府，他们的领导人是苏加诺(Sukarno)。在此前的20年里，他发起了反抗荷兰的运动，宣扬半宗教性质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复兴纲领。在独立运动中，他吸引印尼各民族的感召力比他的信条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从他的独立后实现印尼再生的允诺中找到了激情。

1945年末，荷兰军队抵达东印度群岛，终结了这种短暂的独立。荷兰领导人极度需要他们广大的殖民地，殖民地的有价资源，尤其是石油，对他们遭战争撕裂的家园的重建至关重要，但接踵而来的数年殖民战争，未能重新建立起荷兰对广大东印度群岛的控制权。美国反对他们的殖民战争，他们也难以扑灭反殖民暴动，导致了这场冲突在1949年结束(参见第七章)，荷兰放弃了它在亚洲的殖民帝国，苏加诺及其民族主义支持者赢得了胜利。

284

聚焦：苏加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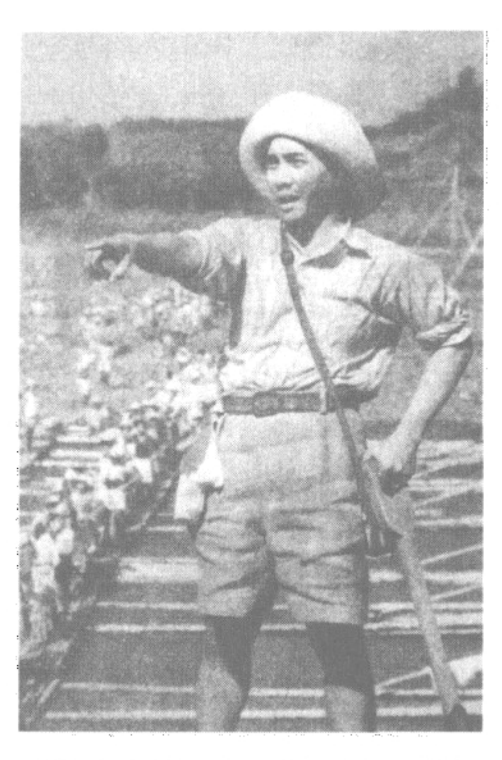
20世纪初，居住在东印度群岛荷属殖民地主要岛屿上的大多数民族，依然生活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将来自它岛的居民视为外国人。苏加诺(1901—1970)的父亲来自爪哇岛(Java)，但由于他是荷兰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臣民之一，所以在巴厘岛上找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在那里，他与一名巴厘妇女结了婚，她的父母对她选择一个来自爪哇的“外来人”做丈夫非常愤怒，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半个世纪后，她的儿子成为了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最高领袖。在其边境之内，集合了这个由约1.7万个岛屿组成的广袤群岛中的所有岛屿，它们是荷兰在过去200多年里建立自己的东印度殖民地过程中逐渐征服的。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民族统一梦想，苏加诺及其追随者在面对着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使之成真了。

在中学时代，苏加诺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信念。这些中学是荷兰人建立的，旨在为殖民地培养忠诚的土著官员。像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一样，他的父亲是一个穆斯林，但他选择给予自己的儿子非宗教教育。苏加诺的大学教育，让他摆脱了狭隘的爪哇岛岛民身份认同，因为教育赋予了他想象独一无二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工具。孩童时代，他既说爪哇语，也说巴厘语；中学教育让他学会了流利的荷兰语，后来又学会了法语和英语，这为他打开了阅读欧洲民族主义著述的大门。他从那里了解到民族文化的荣耀，独立自治国家的尊严，以及帝国和君主们的不公。他与印尼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友谊，将他领入了政党圈子里，这些政党业已宣告了自己的自由印度尼西亚梦想，并与荷兰统治者展开战斗，以便让自己的梦想成真。苏加诺经常用帝国统治者的语言进行联系，如同印度民族主义者依赖英语一样。他也利用马来方言，这种语言正在变成东印度群岛臣民们——包括在各岛屿间流动的商人和协助荷兰殖民者的土著官员——共同的交谈口语。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是他及其追随者视为最凶恶敌人的荷兰帝国主义者塑造出来的。

他的革命活动在他创建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里形成，但他追求的被称作"印度尼西亚"国家的目标，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中先驱们的创造。他通过著述和演说与荷兰人展开战斗，并为此遭到数年的监禁和流放。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卓越不凡的公众人物，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民族解放思想吸引了一群追随者。许多年来，他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他称之为印尼统一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民族主义(反对各岛岛民间狭隘的敌视)、国际主义(承认其他国家的权利)、民主(对他来说民主指的是全民一致而非多数人统治)、社会福祉(关爱这个国家的各民族)和信仰最高神祇(宽容所有宗教)。像 20 世纪其他革命者一样，他信仰思想在推动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实现激进进步变革上的力量，他是公民民族主义的信奉者，并将之改造，适应东印度群岛的特殊情况。像甘地为印度构想的信条一样，印尼公民民族主义许诺，在印尼各民族克服种族、宗教和社会敌对的条件下实现新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从这些方面来看，它像是一

285

种乌托邦梦想。对他来说，它有着宗教信仰般的力量，他为它牺牲了正常生活的安全和舒适。



苏加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此图出自日本1944年的宣传册，表现了苏加诺已在动员印度尼西亚劳工团(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苏加诺多年奋斗在民族主义抵抗中，以实现这种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日本占领者合作，后者欢迎反西方民族主义者的辅佐。他发表公开演说支持日本人对印度尼西亚劳工的索取，日本需要这些劳工(实际上是强迫劳动力)帮助他们修建战事工程。到战争结束时，他是印尼解放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随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他宣布印尼独立，并成为这个新民族国家的创建者。

在1949年击败荷兰后的岁月里，他发现自己的五项原则只是有效治理的可怜替代品，而他对有效地管理国家没有什么兴趣。1957年，他屈服于诱惑，以被称为"有引导的民主"的名义，执掌起独裁权力。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他背后，充当其领导地位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保证。他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谴责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导致其国家苦难不幸的各种演说中。他对印尼经济衰微和种族冲突的无力的解决办法，是赞同印尼共产党提出的实行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党制国家和指令性经济的建议。他意识到自己作为领导人的软弱无能，是他在1965年怂恿共产党阴谋消灭军方对手夺取权力的主要原因所在。这是一个致命的抉择，取得胜利的军队将领迫使他辞去总统职位，在他短暂的余生里将他软禁在家中。他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的梦想实现了，但它此后的生存依赖于军事独裁。

286 是年，他们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胜利独立，其边界在荷兰统治者确定的界线之内，其官方语言是已成为东印度殖民地各臣属民族共同语言的马来方言。它的新宪法许诺给这个群岛的 8 000 万人民议会民主制，他们生活在星罗棋布纵贯 3 000 英里的各个岛屿上。巨大的财富不均、不同的文化语言以及毗邻岛屿间人民彼此日久年深的不信任，让各民族处于分裂之中。印尼的大多数人口信奉穆斯林教，其境内生活着后殖民时代世界各国最大的一支穆斯林群体。在爪哇和巴厘等中部岛屿上，佛教继续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在传教士曾经活跃的地区，则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群体。在原本只是因领导人和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联合起来的情形下，代表各个岛屿和不同民族的政党内部相互争斗，削弱了它们的权威。

苏加诺是民族英雄，成为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的地位不仅依靠宪法权力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依靠他在印尼人中庞大的追随者。许多人崇拜他，他是印度尼西亚统一的保障。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政府，日益成为剧烈政治争吵的舞台。来自伊斯兰教势力强大的地区的政客们，要求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强化穆斯林宗教律法。地区竞争使来自不同岛屿的领导人相互敌视，许多岛屿上的岛民都坚守着自己的本土文化。军队是有效的国家机器，它的存在确保这个新国家的统一。

苏加诺需要军队支持，而军队指挥官们则需要他所体现的国家合法性。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两者之间的联盟成为威权统治的基础。像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苏加诺相信，新国家的幸福安宁取决于他个人的领导能力。1956 年，他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宣布，他梦想“埋葬”旧的宪政体制，给予其人民所谓的“有指导的民主”和“有指导的经济”。1957 年，他开始掌控国家，他的梦想在付诸实施后，演变成政治独裁、国家计划控制下的国有化经济和冷战中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苏加诺的领导更多的是依靠个人激情和喜好，而不是一致连贯的政策。他的政府夺取了荷兰和其他外国的所有商业企业和不动产，将皇家壳牌公司的大油田收归国有。这种急切的国有化，导致国家经济

经历了数年痛苦的衰退。苏加诺既获得西方国家也取得了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因为像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双方在这里也是竞争对手。为了获得国内众多政治派系的支持,他在举世各国规模最庞大的内阁里给他们提供领导岗位,他的100位部长很大程度上都在为自己和追随者的利益工作。在国有企业里,任人唯亲导致毫无实际用途的工程,这些工程让苏加诺支持的一小撮腐败政客钱包鼓鼓,而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当中,外贸因缺乏支付进口的资金急剧衰落。

287

苏加诺的独裁带来了个人崇拜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他得到了"终身总统"和"伟大革命领袖"的显赫封号。通过宣扬自己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苏加诺向所有形式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在其演说中缩略为 *nekolim*)宣战,他将他低效而腐败的政权制造的经济困难归咎于新殖民主义。他鼓励印度尼西亚军队夺取印尼周边岛屿,宣布这些岛屿属于自己的国家。国家统一仍然是脆弱的、有争议的创制,苏加诺及其军队把这个群岛共和国维系在一起,但其代价是少数民族对印尼统治日益增长的敌视。



民族英雄们与帝国主义恶魔:印度尼西亚的官方宣传画"(印度尼西亚解放运动的)五大支柱粉碎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约1960年(Howard Jones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华而不实的领导方式潜藏着严重的政治弱点，正侵蚀着其国家存在的根基。他自己意识到，他的个人权力不足以保持国家统一，他的解决之道是，寻求他及其政权能够指望的群众运动。他开始相信，这个国家最大的政治组织印尼共产党，会给他提供他想要的那种纪律鲜明的群众支持。他希望在其政权几无国外同盟之时，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会让他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他与西方的话语论战以及他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依靠的是印尼乃南亚一大国的宏大而虚幻的梦想。

288

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导致了其倒台。他成为剧烈权力斗争的中心，印尼共产党与军队是这个国家一对激烈的领导权力争夺者。共产党领导人似乎相信，苏加诺支持他们夺取权力。1965 年，他们秘密组织了一场武装暴动，暴动以逮捕和处决数名军方高级领导人开始。但这场叛乱失败了，因为侥幸逃脱的将军们，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动员军队扑灭了暴动。与此同时，他们呼吁人民共同抵制共产党，他们诅咒共产党是国家中“不信神的敌人”。政治叛乱激起了大量处决群众事件。

在印尼各岛，群众在军队或好战的穆斯林帮派带领下，攻击共产党和它的嫌疑同盟者。印度尼西亚境内因国家建设压力酝酿的政治和种族敌意，突然以可怕的暴力方式爆发出来，它制造了对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血腥屠戮，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来自这个国家的华人族群。在荷兰人统治的几个世纪间，中国移民大量移居东印度群岛，许多人通过商业贸易发家致富。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很容易成为心怀不满者的攻击目标，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印尼心怀不满者大量存在。像任何其他战后新兴国家一样，种族纷争和政治敌对产生出群众暴力的种子。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死于 1965 年的大屠杀中，死亡人数保守估计约为 50 万。

在动荡中，苏加诺政权失去了权力，军队将领们不再信任他。军队首领苏哈托将军控制了这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一个中立的不结盟国家，同时从东西方接受援助。苏哈托将军和军队将领们把维护群岛的国家统一作为最优先的重点事务，遏止种族骚乱，拒绝给政治反对

派任何公开的论坛。他们第二优先的目标是经济发展，他们废除了苏加诺半心半意的指令性经济，结束了国家计划体制。他们出售国有企业，经常是卖给自己的亲信朋党，对国外投资者打开国门，这些投资者为开展业务经常不得不付出巨额贿赂。一小部分印尼银行家和投资者从苏哈托政府那里获得了特别的优待，作为回报，他们为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秘密开办银行账户，苏哈托及其家人是最受青睐的贿赂对象。军事独裁体制在整个岛国境内滋养出了“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印度尼西亚经济逐渐开始增长。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业已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石。亚洲木材公司进驻苏门答腊岛（Sumatra）和婆罗洲（Borneo）的森林地带，伐走有价值的硬木树，焚烧剩余的森林，把这些土地用于农耕种植（参见第十四章“重点”）。到 20 世纪 90 年代，资本主义“亚洲道路”的印度尼西亚版已将印尼经济变成亚洲“新兴市场”之一。

它对全球经济的依赖也是其弱点所在。自苏加诺倒台后兴盛起来的裙带资本主义，带来了不可胜数的金融借贷。1998 年，当国际金融恐慌毁灭了印尼货币、引发经济骤然衰退后，这些债务成为压倒印尼经济的决定性重负。在接下来的混乱和失序中，苏哈托放弃了权力。1999 年，在 34 年来头一遭的民主选举中，印尼选民选择了温和派领导人带领国家走向平静。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没有吸引多少选民。就在其他几个国家落入伊斯兰统治之下时，印度尼西亚成为多民族伊斯兰土地上的一个民主样板。

289

新加坡和全球经济

新加坡岛的政治命运取决于其邻国——全部都是英帝国前殖民地。在缅甸和马来亚土地上，战争岁月的经历赋予了民族主义领导者在 1945 年后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信心，英帝国新领导人没有做任何抵抗。1945 年后执政的英国工党，欣然同意组织权力移交，那里

的民族主义者欢迎英国军队帮助击败自己土地上共产党领导的叛乱。1948 年,缅甸成为独立国家;十年后,马来殖民地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国家。

新加坡城仍然是英国皇家殖民地,其经济和战略重要性远远超过它微小的面积。它位于通往东亚的航运要道上,拥有东南亚最优良的港口。华人占多数的居民业已将它变成该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之都。它是反殖民主义的例外之物,像香港一样,是帝国的一个繁荣兴旺的残余,被各独立国家包围着。

英国政府既不希望,亦无财政能力,长期维持在该地区哪怕如此微小的帝国存在。1963 年,英国结束了对该城市的统治,说服新加坡领导人以联邦的形式加入马来西亚。这个新兴国家是脆弱的,由不同地区的多民族群体组成。大部分为农民且不具备华人商业技能的马来穆斯林民族,对新加坡的繁荣愤愤不平。他们的穆斯林宗教行为习俗和公共组织构成了他们生活至关重要的部分,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被华裔政客统治,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会遭殃。两大族群间种族敌对的紧张状态,导致新加坡城里马来少数族群发动骚乱,以及联邦政府中的新加坡华裔领导人和马来政客之间的政治纷争。担心种族冲突会毁灭自己新生国家的马来领导人,决定把新加坡城从联邦中驱逐出去。1965 年,新加坡被迫组成自己的独立国家,这是一个仅有 200 万人口的岛国。

事实证明它的孤立状态是福音,其领导人能够为堪与日本媲美的经济繁荣创造条件。这个岛国演变为威权主义政体,致力于国家支持的经济发展。在自由选举中,大部分人口赞同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的纲领计划。上台后,它的领导人立即行动,加强公共秩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他们削弱反对党、独立工会,以及该城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当中任何分离主义的种族运动。他们严惩一切犯罪,小过错也会受到被桦树枝鞭笞的惩戒(该刑罚最初由英国人引进)。在新加坡出生率下降得过低时,他们指示家庭多生孩子。他们把自己的小国变为社会秩序、经济生产力和威权统治的样板。人民行动党领导人

和国家长期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许诺给新加坡公民一个“有序的、有组织的、合情的、理性的社会”。

这个威权主义政权开始引导自己的小国家走上经济财富的道路。它与居民不言自明的交易,是要求他们遵从威权主义,以换取经济繁荣。它诚邀国外投资者开办炼油业、纺织业和电子制造业,以岛上勤奋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为它们提供雇员。它向国际银行敞开这个城市国家的大门,欢迎全球商业公司使用它的港口。它小规模地把曾在日本取得成功的“有指导的资本主义”引进国内。意料之中的是,李光耀鼎力支持有秩序的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亚洲道路”。

290

新加坡在全球经济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繁荣局面。在经济方面,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经济繁荣成长被称为东亚“四小龙”之一。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个城市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10%以上,并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保持着这个发展水平。不久,新加坡人民生活水平在亚洲各国中仅次于日本,该岛国的经济状况令周边国家称羡不已。新加坡在军事方面微不足道,它的安全依赖于它在南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它也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力图与所有国家搞好关系,无论共产主义国家还是非共产主义国家,它与任何有支付手段的国家进行金融和商业交易。尽管它在规模上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相似,但它内部包含着推动 20 世纪后半期全球繁荣的一切强大的经济力量。

印度和巴基斯坦争取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度的遗产,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南亚其他国家迥然不同。日军从未深入地渗透进印度国土。英国总督、印度公务员和印度军队依然是联合省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接受了英国统治的 600 位王公继续统治着自己的公国。只有 1942 年被日军俘虏并同意加入印度国民军的印度士兵成为反对英国人的通敌合作者。他们在 1945 年返回印度时被当做英雄欢迎,这表明战后年代反对英国压倒了印度人面对的所有其他问题。

英国统治的结束

从争取独立之时起,国大党领导人就决心保持英国人给予次大陆的统一完整。他们渴望民族独立和尊重所有人(不论宗教抑或社会等级)权利的民主选举政府。对国大党精神领袖甘地来说,给任何宗教群体特权,都是对他最深沉信仰的背叛,他终生追求的是在一个自由的印度民族国家里实现所有公民的公民平等。他的这种梦想,受到将穆斯林族群和印度教族群分裂开来的社会敌对的威胁,同时受到穆斯林联盟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威胁。印度的统一和独立对国大党来说是不可分割的目标,但结果证明只有独立得到了实现。

1945 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印度教徒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和骚乱数量日益增多。尽管总体上印度教徒占大多数,但每个邦都混居着两大宗教族群,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全部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印度最大的、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孟加拉邦(Bengal)首府加尔各答(Calcutta)的人口中,这两大族群几乎平分秋色。他们比邻而居是产生冲突和政治敌对的一个原因,因为自治增加了一个族群相对另外一个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对许多人来说,个人权利比群体团结的重要性要小得多。民族独立有撕裂印度的危险。

穆斯林联盟选择把南亚次大陆分割为穆斯林领土和印度教徒领土,而不愿意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组成统一的国家,实行民主统治,将政府置于国大党的掌控下,穆斯林联盟担心新统治者们会不顾国大党领导人的承诺,剥夺少数族群穆斯林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在自由立场的理想主义者眼里是个人自由的民主保护阀的东西,在穆斯林联盟看来则是一种迫害少数人的威胁。在战后岁月,它把建立穆斯林独立国家巴基斯坦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但其领导人不想建立一个宗教政权,因为他们认为穆斯林标签是民族的一种社会文化身份标识。他们的计划是一场豪赌,因为围绕着穆斯林宗教忠诚感组构起来的国家,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然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者们在二战结束后准备诉诸群体暴力,阻止印度民族统一,实现自己建立巴基斯坦国

的目标。

准备印度独立是英国和印度领导人的第一要务。英国工党政府像支持帝国的其他亚洲殖民地一样强烈支持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争取自由，其战后财政危机要求其迅速解放印度，因为对印统治给英国穷困的国库添加了沉重的负担。大规模群众示威和暴力也是常在的威胁。英国提议进行新选举，遴选愿意且有能力商讨独立条款的印度领导层。

1946 年举行选举时，国大党在几乎所有邦都赢得了多数，但穆斯林联盟也得到了大多数穆斯林选民的支持。那么，谁代表印度谈判？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同意与英国人谈判，但各自都欲按照自己的条件去谈。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要求穆斯林代表在谈判中与国大党拥有同等的发言权。但尼赫鲁和国大党其他有影响的领导人拒绝承认穆斯林联盟代表穆斯林族群的权利，担心那样做会意味着对分治的致命性退让。1946 年 7 月，真纳断定，他的政党通过合法手段难以成为印度穆斯林唯一的谈判者，因此他呼吁穆斯林支持者强有力地向英国人及国大党证明他们对穆斯林人口的掌控程度。

1946 年 8 月穆斯林联盟直接行动日，是战后印度历史上的真正转折点。真纳宣布，“印度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是巴基斯坦”，也就是说，印度次大陆要分割为他所称的“印度斯坦”（Hindustan）和他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为了表明内战是另外一种抉择，他要求整个印度的穆斯林加入“直接行动”，包括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以及联盟其他领导人肯定明白，骚乱将伴随着游行示威，族群冲突将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接受了这样的可能性，声言“我们也有枪杆子”。穆斯林联盟的鼓动确实导致了全印度境内穆斯林与印度教徒间的骚乱。随着悲剧性的分治进程启动，种族敌视和恐惧愈益加深。

孟加拉邦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其首府加尔各答经历了如此血腥的暴力，乃至观察者后来把那些可怕日子里发生的事件称为“加尔各答大杀戮”，仅在这座城市就有约 6 000 人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遭到双方暴徒袭击的无辜印度教徒或穆斯林。英国军队开进骚乱中　292

心,逐渐恢复了秩序。惊骇于血腥暴力的甘地,开始了个人穿越孟加拉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地区的朝圣之旅,通过自己个人的榜样和教导恢复和平和宽容。尽管他冒着死于狂热分子之手的危险,但他促进了民众恢复平静。

人们禁不住要指责穆斯林联盟的分治主张。尼赫鲁自己,其政治意识形态里没有任何深厚宗教情感和普世精神,憎恨穆斯林联盟及其体现的一切东西。他认为联盟培育的穆斯林团结精神是“中世纪的”,是“急速变化的工业主义、科学和核能世界里”一种危险的过时物事。1946 年 8 月,他视察了北部旁遮普省被骚乱毁灭的地区后,对印度人背叛“甘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伟大理想”深感绝望和“羞耻”。他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在这一年继续坚持为自由而统一的印度努力,但这个国家分裂得太深、太剧烈了。这种仇恨和敌对是穆斯林联盟点燃的,但并非它制造的,它的错误在于容忍并领导了集体暴力行动。也就是说,宗教和社会分裂,而非穆斯林的政治操作,是决定印度命运的终极因素。

英国内阁对谈判的僵局感到灰心和为难,遂于 1947 年 2 月宣布不列颠将于一年内撤出印度,即便在印度谈判者中就宪政体制和权力和平移交方式未能达成协定,它也准备离开。这则声明是最后通牒形式的失败宣言,英国政府拒绝再为日益升级的暴力负责。这年春,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位新总督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来做最后努力达成协商解决办法。他最后断定,分治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他报告说,“如果不以某种形式承认巴基斯坦”,那么穆斯林联盟准备“诉诸武力”。

印度殖民地的分治

没有国大党的同意,这种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代表着印度多数人口的声音。分治并未得到甘地的支持,他终身都致力于宣扬友善与宽容。他曾追求民族独立,因为他相信独立是印度精神再生之道。接受巴基斯坦意味着认可地方自治主义,承认宗教分离主义的胜利。尽管他认为分治是毁灭性的和罪恶的,但他并没有阻碍这样的安排。他让尼赫鲁担当起国大党的领导,将争取印度独立的重责放到他的肩头。

是年春,尼赫鲁认定分治势在难免。1947 年 6 月,蒙巴顿向印度和全世界宣布了印度领导人的协定,计划南亚次大陆不是以一个国家而是以两个国家的形式实现独立。

分治打乱了印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结构。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邦归属巴基斯坦,其余的归属印度。两个重要邦孟加拉和旁遮普的领土将被划分开来。旁遮普境内居住着锡克教徒群体以及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人数一样多)和一小部分印度教徒,邦领导人勉强同意他们这两片地区被分割出去。一名英国官员秘密重绘了印度地图,划定了印巴两个国家的分界线。这种划分让西部的印度河河谷和东部的孟加拉邦部分地区归于新的巴基斯坦国,巴基斯坦本身也分为两片隔开的领土。次大陆四分之三的人口归属印度,处在国大党的领导下。

293

分治要求对领土、族群、经济体系以及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和军队进行分割。依赖黄麻出口的东孟加拉经济,失去了其主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加尔各答,该城市分给了印度。旁遮普最大的灌溉系统陷入混乱,因为边界分开了其河流和运河系统。这里的锡克教徒群体被一分为二,其圣城阿姆利则在印度境内,而其首府拉合尔(Lahore)在巴基斯坦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继续留在巴基斯坦境内,三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仍在印度境内。8 月 15 日被确定为独立日。

尼赫鲁在独立日向印度人民发表讲话,他对新赢得的独立欣喜不已,“我们是一个自由而主权的民族,我们让自己摆脱了过去的重负”。尽管真纳反对,但尼赫鲁的国家依然保持了印度的名称。即便分治,印度依旧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消除“外国统治的压迫”在他眼里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这是各殖民地民族获得解放,走向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组成部分。尼赫鲁心怀雄心勃勃的计划,解决“印度人民大众巨大的经济问题”,其中包括发展工业、重新分配财富、灌溉和水电工程。然而,这个国家首先必须“结束所有的内部冲突和暴力”。

在巴基斯坦首都,真纳向他的人民发表了讲话。他祈告说,“真主

赐予我们力量，将巴基斯坦变成世界民族之林中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他敦促巴基斯坦穆斯林尊重本国印度教人口的权利。这一天，印巴的确切边界线公之于众，揭开了分治的真实面貌。

英国数个世纪的统治创造出了有助于组建新国家的遗产。英国行政管理者打造了印度的行政管理系统，其权威延伸到农村地区村庄生活的层面。英国官员以西方的军事技术训练出一支印度军队。独立后，印度的行政和军事人员立即开始服务于新政权，取代撤离的英国官员。英语是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彼此之间沟通交流和直接获取西方知识的语言，它在印巴两国都成为第一官方语言。

自治政体的源头在于 1935 年英国颁布的《印度政府组织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它业已为印度创造了一个联邦国家，并分配给各邦独立的立法权力。它仿效英国的议会体制，宣布内阁制下立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原则。这种政体形式为印巴两国立国之初提供了统治基础。英国殖民统治时代亦留下了宝贵的经济遗产。印度庞大的铁路系统和海港、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都成为两个新国家的财产，灌溉系统和水电大坝同样如是。英国向印巴的权力移交过程简单平静，新领导人们设想，他们的人民会注意他们的和平吁求，接受分治作为他们获得自由的必要代价。

294

独立和战争

英国人和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中间群体恐惧和敌对的巨大张力，因此，他们未能预见到 8 月 15 日宣布新边界激起的愤怒和恐慌骤然井喷。诸如尼赫鲁和真纳等西化领导人在群众中聚集了大量的支持者，但阶层和教育将他们阻隔开来，他们没有注意到旁遮普锡克派领导人的警告：“如果穆斯林统治我们，我们的宝剑会做出决断”，也没有留意日益增多的锡克派男子加入各个武装派别，准备与穆斯林开战。只有甘地觉察到分治将带来的巨大人类悲剧。

两个被分割的邦，东部的孟加拉和西部的旁遮普，是大规模暴力事

件最可能爆发的地区。孟加拉首府加尔各答在1946年曾是骚乱最暴烈的场所。在蒙巴顿勋爵的主张下，加之该城穆斯林的支持，甘地同意前往这里。他准备置生命危险于不顾，阻止这座城市继续流血。他居住在该城最差的贫民窟里，宣布绝食至死，除非这里各宗教团体领袖答应合作阻止他们的民众骚乱。他的道德威望如此巨大，乃至他几乎凭一已之力，当月恢复了孟加拉的和平。

但在旁遮普，暴力行动随即爆发。难民开始涌过边境，成为暴徒们唾手可得的攻击目标。边境两侧的种种暴行谣言，让印属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反对穆斯林，而在巴基斯坦，穆斯林帮派大举攻击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蒙巴顿麾下的5万军队在阻止骚乱方面无所作为。受到惊吓的家庭和整个村庄开始徒步或乘火车寻找避难所，穆斯林逃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往印度，难民潮汹涌而至。他们成为四处肆虐的杀手和强盗帮派的牺牲品。暴乱蔓延到印度首都德里(Delhi)，从巴基斯坦来到这里的印度教难民散播着穆斯林滥杀无辜、集体强奸印度教妇女和四处劫掠的故事。作为报复，印度教徒对该城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发动攻击。蒙巴顿和尼赫鲁密切合作以阻止混乱局面吞噬这个国家，他们不得不调动军队维持这里的秩序。

在乡村，秩序恢复要慢得多。由于逃难或群体暴力的险恶环境，这一年可能有50万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死亡。到1948年中期，约摸500万难民逃到印度，可能同等数量的难民来到西部的巴基斯坦。独立带来了印度历史上最惨烈的内乱，在两国人民间留下了强烈的仇恨。尼赫鲁抨击穆斯林联盟是“狂热分子”，誓言永远不再让这样的宗教狂热破坏国大党运动的民主和非暴力原则。两年后，他以一种自我反思的形式，回忆那些可怕岁月的痛苦，当时，印度领导人变成了“在我们眼前残酷展开的事件的奴隶”，屈服于“恐惧和仇恨”，他与他的人民共同饱含着被群体暴力激起的怒火。

甘地自己当年晚些时候来到德里，继续为和平与理解奔走呼号。他的努力旨在引导印巴两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人民。他抨击一切宣扬不宽容的狂热主义，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他接见所有希望与

295 自己谈话的人,尽管谣传有人阴谋夺取他的生命。1948 年 1 月 20 日,一名印度教政治极端分子,恼怒于甘地的和平与调和主义思想,在他前往祈告的路上枪杀了他。甘地作为一个殉道者去世了,成为分治的又一个牺牲品。

依旧在印度王公统治下的大多数领土,在一些英国顾问有力的劝谏下,和平地归并于公国所在的国家,但克什米尔王公对加入哪一方踌躇不决。事实证明,他的优柔寡断是个致命错误。1947 年下半年,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把这块领土并入自己国家。尽管克什米尔王公是印度教徒,但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他们强烈支持与巴基斯坦联合。他们业已开始发起暴力示威,迫使自己的王公同意加入新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军队陈兵边界又给他带来了额外压力。但尼赫鲁的家族来自克什米尔,他决定把这个多山地区留在自己的国家里。是年 10 月,印度部队阻遏了穆斯林的入侵,占领了该邦的大部分。尼赫鲁拒绝承认自己的国家是入侵者,宣称巴基斯坦的攻击是“残酷而不可饶恕的侵略,是针对克什米尔人民和印度联邦的侵略”。实际上,双方都有侵略的嫌疑,动用武装力量争夺这个重要的喜马拉雅地区的控制权。

在克什米尔的冲突升级为印巴之间的公开战争之际,巴基斯坦军队试图把印军从克什米尔赶出去。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双方达成休战协定,前线仍然接近它们原初的位置。这场战争只是成功地通过武力分割了克什米尔,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给这个多山省份的穆斯林—印度教徒之间的敌对留下了有害的遗产。分治的最终结果就是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它们的冲突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一直持续着,并爆发了两次新的战争。力量较弱的巴基斯坦寻求美国的军事同盟和外交援助;印度则接受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20 世纪 80 年代初,两国针对对方各自秘密开发核武器。克什米尔,曾经如此美丽,它有可能是“香格里拉”神话传说的源地,它的分割把这片前线领土变成了战区。对次大陆的人民来说,分治是一个悲剧,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分治是可怕的负担。

重点：新国家与族群冲突

20世纪后半期所有在帝国曾经统治的地方出现的新国家，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呈现民族国家的面貌。旗帜、仪式和英雄人物(真实的或虚构的)，纪念和颂扬着历史性成就以及特定民族共同体的声望。领导人宣称，他们的政体体现着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特质。在19世纪初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瓦解后的拉丁美洲，这真切地发生了。在1945年后的十年里，当西方帝国纷纷从亚洲和非洲撤离后，这也真切地发生了。这些国家在初期都是虚弱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政府没有机会建立稳固的权威基础，经常受到渴望权力的野心勃勃的个人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内部争斗的困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承诺人民与领导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新政府合法性和适于统治国家的前提条件。

296

对这些新国家来说，如果政客们滥用民族主义信条，那么它可能就是个陷阱。它的重大缺点是围绕着民族共同体本身的思想含混不清。该词可以指这个国家边界之内的所有人，这种民族国家理想被称为公民民族主义。1947年8月15日午夜钟声敲响之际，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力欢迎“一个民族灵魂”的解放，这样的民族灵魂在此时此刻赋予了其独立。像甘地一样，尼赫鲁相信，自由和宽容是维系印度人民及其领导人团结的纽带。

但“民族”(nation)也可能指由族群身份的集体认知联合起来的人们，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有共同的祖先，通常使用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祖先的民族观形成对照的是，公民民族主义理想构成了一种模糊的道德号召力，前者被一位史学家描绘为讲求“血缘和归属”，这种民族理想被称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当这种形式的民族忠诚大行其道时，新国家便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冲突隐忧。所有新国家在其国境之内都包含着一个以上、经常是多个有着强韧族群纽带的独立族群。在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族群忠诚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特别有意义，它确保了特定共同体中的人们共同的集体认知、社会动荡时期

所需的社会团结和艰难时期无价的互助纽带。

这些族群团结纽带有多种来源。语言构成了族群身份最流行、最有意义的标识。印度人口当中有 15 个不同的大语种，印度独立后，这些民族中的一些领导人要求在印联邦内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即便有其他民族共同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宗教行为习俗是另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纽带，它是穆斯林联盟要求在印度殖民地内建立穆斯林国家的基础。共同祖先的信仰又是另一个族群纽带。在独立的尼日利亚，许多大部落甚或小部落的领导人都要求得到单独的领土空间，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人民的独特性理应在领土方面得到专门的认可。这些族群认可的诉求每次出现，都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公民民族主义对自己的族群才重要，对其他族群则不那么重要。反过来，这种要求带来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新国家的界线必须重新划定，甚或国家本不应该以现有的方式存在。

这些国家中族群间的冲突源自殖民经历的遗产、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困难。新获得自由的土地时常沿袭来自殖民地时代的政策，优待某个特定民族，帝国管理当局过去从这个受到优待的民族中招募士兵或下级官员服务于殖民地的需要。一旦摆脱帝国统治获得独立，殖民时代逐渐累积起来的敌对就演变为族群冲突。

297

这种历史经历只是独立产生的一系列真正的困难的序曲。新国家在其初期阶段遵循人民选举挑选自己新领导人的民主原则，竞选会产生这样的可能，即一些政党出来宣称捍卫某特定民族的需要。在南非，英卡塔党（Inkatha Party）只代表祖鲁人（Zulu）说话，拒绝非洲国民大会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要做所有非洲人真正代言人的主张。选民经常选择来自本族群的候选人。以族群忠诚为基础的投票，保证了被最大族群支持的政党的候选人有最大机会赢得权力。由于获胜者能够利用自己的职位，只向来自本族群的支持者分配工作岗位和其他酬劳，所以作为民主统治的结果，少数民族可能发现自己成为被抛弃者。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当尼日利亚伊博族（Ibo）相信自己就处于这种境况下时，他们起而反对中央政府。因此而发生的内战持续了三年，几

乎毁灭了尼日利亚。

种族民族主义以按“权利”属于某特定族群的“家园故土”(native land)信仰为根基。这种信仰建基于一个族群的历史诉求之上,即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在人们并没有长久生活在此的那些土地上,甚至也出现了这样的诉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声言,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真正的故国家园,尽管罗马人早在2000年前就把几乎所有犹太人从那里赶了出去。没有任何地方特定地区里的居民完全属于某一族群,该族群的所有成员也并非都居住在某一紧凑的区域内。在这种情况下,统治某族群“自己的”领土的要求,必定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族群难以享受到同等的权利。从本质上来说,对家园故土的要求制造出少数派民族,如果这些民族应之以对同一片土地提出要求,那么没有任何和平的解决办法能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50年的斗争就源自这样的争端。

寻求调和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忠诚之道,导致政治领导人们许诺以法律保护民族差异。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宪法都清楚地规定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通常是语言权利。国家基本法创制的通常是联邦政治体制,在代表所有民族的中央和代表某特定族群的地方之间划分国家权力。这种体制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合法基础,如印度、尼日利亚和20世纪晚近的俄罗斯联邦。

这是一种脆弱的妥协,因为它从理论上否定了该国主要族群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同时也必然拒绝了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当和平妥协不能满意族群民族主义的要求时,结果必定导致内乱、政治镇压和内战。这些冲突最早出现在后帝国时代初期的亚洲和非洲,它们在20世纪后期以日益增加的强度持续爆发,一个原因就是第三世界贫穷民众中日益蔓延的生存斗争。存在着一种十分强烈的诱导因素,让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咎于其他族群,控诉他人阻碍他们得到经济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困难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少数族裔——大部分居住在城市从事商业和金融,成为这个共和国里嫉恨他们富裕生活的其他民族的攻击目标。 298

当族群冲突变成武装对抗时,内战就在这些新国家中爆发了。有时候,引爆内战的火花,是少数民族不惜代价脱离出来并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行动,这些反抗有许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得到解决。尽管印度宪法和联邦法律保证尊重各族群权利,但当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接下来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人口中暴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威胁脱离印度时,政府诉诸法外的镇压权力。尼日利亚政府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击败了伊博族,内战导致了数百万平民死亡,大多数人死于对该地区实施经济封锁导致的饥荒。

偶尔也有通过自由选举结束族群冲突的例子,这通常导致和平的分离。1993 年,"厄立特里亚人民阵线"(Eritrean People's Front),在经过数十年的游击战后,迫使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厄立特里亚人民争取独立举行选举,它获得的群众支持是压倒性的,新的厄立特里亚民族国家由此在非洲出现了。这只是暂时的妥协,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决心重新统一国家,在六年后再次发动战争想要夺取这片土地,只是厄立特里亚武装力量挽救了这个新国家。

东欧多民族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制造出一些当代最惨烈的民族冲突。这些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通过为人数众多的族群建立"民族共和国",试图以此平息其民族间的敌对,但它们很多时候还不得不使用类似于殖民帝国过去曾经使用的那种压制性措施。当共产党失去权力后,这些被压制下来的敌对很快抬头。最残酷的暴力发生在巴尔干国家南斯拉夫,它曾在联邦内为各民族创立了各自的共和国,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波斯尼亚族是它们当中人数最多的民族。1991 年南斯拉夫国解体后,这些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在内战中爆发了出来。对少数民族的敌视情绪是如此强烈,乃至一些民族主义者准备强行驱逐甚或杀掉居住在"他们土地"上成千上万不属于自己民族的平民。这种被叫作"种族清洗"的残酷行为,表明了种族冲突会变得多么的惨无人道。

20 世纪 90 年代,遏制族群冲突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其他国家和联合国的口头抗议难以阻止诸如南斯拉夫内战和

1994 年非洲国家卢旺达暴力活动等剧烈的种族争斗，外国部队的介入一度制止了群体骚乱和杀戮。一些观察家力争，外部介入以结束这种流血是道德义务。有时候，似乎只有在战斗制造出人为的不毛之地后，耗竭才结束了暴力。在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取代瘟疫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

印度和巴基斯坦民族国家

299

作为英国从印度次大陆撤退的结果，这片土地起先以两个国家，后来以三个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它们的领导人宣称有权统治这些国家。复杂的国家建设，是医治分治创伤的痛苦任务，英属印度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东巴基斯坦在 1971 年脱离出来，如今称为孟加拉国(Bangladesh)。在印度境内，一些族群当中小规模但暴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了内乱和军事镇压。事实证明，印度领导人最初允诺的和平与公民民族主义的愿景，难以甚或不可能实现。

尼赫鲁和新印度

在尼赫鲁的领导下，一个新印度国形成了。在初期暴力频发的岁月里，他和国大党领导人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实际像个军政府那样施行统治。但印度政府把一个民主国家的各种因素整合到了一起。第一步是把各公国合并到印度各省。为了换取丰厚的津贴，几乎所有王公都和平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只有海德拉巴(Hyderabad)的穆斯林王公抵制，直到最后印度军队于 1948 年占领了他的土地，在官方所谓的一次“警察行动”中“恢复了秩序”。解除王公的权力相当于一种民族革命，几乎没有动用武力就实现了。唯有克什米尔的未定命运，继续提醒着印度人，在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的国度里进行国家建设的复杂性和潜在的悲剧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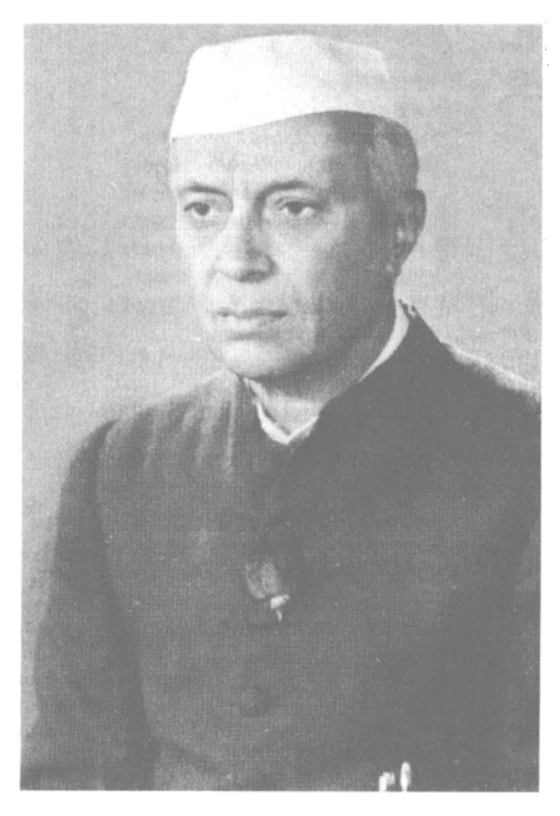
新的行政部门和军队的创立相对平和顺利。尽管国大党早前批评为英国行政机构和军队工作的印度人，但新政府欣然地接纳了他们融

入到印度新政权当中。它选择了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和成熟的军事力量所提供的稳定和效率，而不是从零开始构造国家机器的重重危险。在独立初始的混乱岁月里，这些人员证明了自身价值，像他们为前英国统治者一样忠诚地为新政权服务。

形塑新国家的重责掌握在尼赫鲁手里。他的政治权威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他享有如同国父般的巨大声望。他的政治理想，正如他1949 年对美国听众所说的，是“在国家的中央集权与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机会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国大党从一开始就聚拢起不同群体，捍卫不同的利益和信仰。新国家不得不调和这些彼此不同的目标。尼赫鲁重视这种多样性，接受它强加给他的妥协折衷。

基本政治目标上的一致把国大党所有派系都联合到了一起。他们计划的关键是在印度建立自由民主制。在全亚洲范围里，只有日本成功地改造了西方民主体制使之适合自己的公共生活，它有着面积小、人口单一和历史完整的优势。印度的民主政府实际上意味着大胆的赌博，在国大党领导人看来，它似乎是不论宗教、语言或种姓，让所有印度人享有宽容和平等权利的最好保障。国大党在政治和公民自由之外，还添加了社会福利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这两者都旨在保护和加强印度穷困大众的福祉。三大目标——民主、宽容和社会主义，指示着世界上这个最古老文明社会的转型。印度领导人的任务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正是他们希望保护的民主制度和多样性，严重地限制了他们的行动手段。

300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Embassy of India, Washington D.C.)

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它维护并扩大了英国人在1935年首次引进的联邦制结构。各邦和联邦政府全部都由各部统治,依靠他们在立法机关里的多数地位掌管权力。最重要的职位是联邦内阁的总理,如果存在着对印度统一的威胁,也就是联邦主义原则遭到违犯时,他甚至被授予解散邦政府的权力。尼赫鲁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去世。政治和公民自由保证给予所有公民,按照普选制投票。定期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在1951年首次举行,1.7亿公民有投票权,他们当中超过半数是文盲。正如尼赫鲁后来所评论的那样,这个规模巨大的选民群体,让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转着的民主国家"。

301

尼赫鲁的政治威望在印度是如此之大,乃至有可能削弱国大党所捍卫的自由民主制。许多年前,他曾匿名投稿给一份印度杂志,这样描绘过自己的形象,他警告说,"在这个革命年代,恺撒主义(即像罗马将军尤利乌斯·恺撒那样的独裁统治)就在门口徘徊,贾瓦拉哈尔(·尼赫鲁)有没有可能想象自己是位恺撒?这是摆在贾瓦拉哈尔和印度面前的危险"。他其实还可以补充到,这种危险在所有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都存在着,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就屈服于恺撒主义的诱惑。尼赫鲁个人致力于自由是印度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印度的民主社会主义

印度欲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要进行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改革。尼赫鲁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姓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主要的关注是大量印度民众的悲惨处境。1950年,他的人民约摸有一半生活在赤贫中,缺乏足以维系生命活动的食品。他没有去尝试如中国所做的那样发起剥夺私有财产的运动,和平改革以及容忍多样性存在不允许用这种解决办法。取而代之的是,他设想出一种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经济体系,同时由政府对两者实行大量的监管控制。印度既有的工业主要掌握在私人手里,农业和商业也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印度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它宣布拥有如以国有资金和国外援助建立起来的钢铁厂等大型工业企业、如天然气和电力等公用事业公司和新的灌溉工程的所有权。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着印度“混合经济”(部分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的发展，其管理人员负责着投资、农业发展、运输和外贸等方面的重大决策。

国家计划委员会利用国家资金，以(理论上)最适于提高人民生活条件的方式引导经济发展，它依赖于尼赫鲁所钦羡的苏联指令性经济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以及印度资本家和农民的配合。它针对农村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依赖于数百万计村民的自发努力。农村发展计划(Village Development Program)把国家资金分配给村委会，用于修建水井和学校，开展最低限度的卫生保健以及消除贫困所必需的其他举措。在几年之内，1.5 亿印度人享受到该计划带来的好处，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在最初数年里，经济计划运行良好，印度农业生产以年均 3%的速度攀升，几乎是人口增长速度的 2 倍。第二个五年计划，尽管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成功，但也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水平。该计划的伟大希望所在——工业生产，每年增长 6%，20 世纪 60 年代更是上升到 9%。但印度人口以每年 2%的速度暴增，挫败了把印度从依赖工业进口中解放出来和确保国家粮食供应充足的希望。为了避免与穆斯林宗教权威冲突，印度政府在这些年里没有做任何努力推动生育控制。日益提高的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也促进了人口从独立时的 3.5 亿扩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 7 亿。这对印度经济是一个压倒性的重负。

302

养活人口成为一个如此急迫的问题，乃至 60 年代中期只有依靠西方援助才能让这个国家免于饥馑。西方农学家们业已研发出新的高产矮株小麦和水稻种子，他们特别想将自己的发明用于贫瘠的农耕地，这些农作物在那些地区尚不为人知晓，且要求有复杂的耕种技术，为维持年复一年的丰产需要大量的化肥。最初，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都对这些外来农作物心怀敌意。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和顽强的反对者，

在绝望中，印度农业部长在首都德里的自家花园里种植了这种新小麦，以验证其价值。他的园圃试验，加上全国各地 1 000 个"示范点"，证明了他的观点。1967 年，政府同意在印度全境散播这个麦种。印度的谷物产量飞速上升，到 70 年代中期，该国生产的粮食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种植这些农作物需要广泛地施用杀虫剂和化肥，这些农用物资在像博帕尔城外的那些新工厂(大型跨国公司所有)里生产。印度至少在几十年里得以免除了饥荒。

经济发展的"印度道路"没有产生奇迹，但以独立最初的 30 年来衡量，其结果是可观的。或许，中国是最好的比较对象，50 年代末期大跃进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饥荒和经济停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印度的温和政策避免了社会动荡，在立国初期的数十年里保持了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增长步伐缓慢。

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也有进步。1950 至 1990 年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既是因为公共卫生保健的相对成功，也是由于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发展教育的努力则不那么成功。在这些年间，只有一半人口拥有基本的读写能力。这种接近现代经济的重要技能，对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印度政府决心不能听任这种障碍横亘于它在民众当中传播新闻和国家理想的道路上，为此，它建立了国家电视网络，发射通讯卫星，向村民提供电视机。

尽管有这些发展，但贫困仍然无处不在。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依旧深陷在贫困中。那些曾经潜藏在次大陆广袤农村的穷人，当他们不顾一切地为寻求生计而移居城市地区时，变得触目可见。80 年代，加尔各答等地是每天上千新移民的目的地，印度各城市成为人类苦难的焦点所在。博帕尔城附近一家农药厂周围的荒地，成为成千上万贫苦移民的棚户区，直至 1984 年这家工厂爆炸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毒杀了数以千计的居民。这种情形下的城市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毋宁是数以亿计印度人仍在进行的生存斗争。

303

民族多样性和世俗民主制

在同一时期,印度政府实施各种法律,旨在确保民族多样和宗教信仰多样的印度人享有平等权利。“世俗主义”是国大党政府用以描绘其章程的词汇,它旨在保证给予所有民众民法保护和共同的公民地位。许多世纪逐渐形成的习俗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及宗教偏见,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拦路虎。但尼赫鲁坚持必须“通过我们的意志”,而不是“通过任何类型的强迫或压力”来实现世俗主义。这是一个高贵的梦想。

宪法取消了不可接触者的社会身份类型,宣布种姓限制是非法的。它确立了所有印度人不分宗教、种姓或性别,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为了产生实际效果,它的原则必须被体现于触及民众个人生活的各种法律中。它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通婚和财产所有权习俗、种姓排他性和妇女从属地位的堡垒。种姓歧视继续分裂着印度教人口,对不可接触者的不宽容弱化得极其缓慢,尽管有专门法律旨在保护他们。

世俗主义方案的核心,是印度领导人致力于保持国家在所有宗教事务中的中立地位。所有的官方讨论和政策,都必须避免最轻微的倾向于哪一种宗教的暗示。在国家与少数族群穆斯林人口的关系中,这种担心最为尖锐。他们对针对自己的宗教法律和习俗的任何威胁仍然保持着高度敏感。尽管本意不想如此为之,但世俗主义变成了伊斯兰教反抗的一种东西。穆斯林群体保留了自己管理结婚和离婚的习惯法,在该领域,国家的民法没有实施到所有人口。

属多数族群的印度教民众慢慢地接受了作为个体公民应得的法律保护。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印度颁布基本法,为印度教妇女确立了平等的公民权。1955 年的《印度教婚姻法》(*Hindu Marriage Act*)和 1956 年的《印度教继承法》(*Hindu Succession Act*),为所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的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印度教继承法》在财产继承和财产所有权方面赋予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印度教婚姻法》宣布一夫多妻和重婚是犯罪行为,准许离婚,规定离婚后男方付给女方生活费。接着,婚姻嫁妆被规定为非法。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平等状态首先

在印度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妇女中普及，她们逐渐享受到新的教育和工作机会。

在其余人口中，社会习俗和家庭约束继续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穆斯林仍然普遍地实行“深闺制度”(purdah，妇女闭门不出)。尽管非法，但印度教的婚姻嫁妆习俗成为来自丈夫家庭令人痛苦的索求之根源所在，他们向新娘家庭索取昂贵的陪嫁礼品。当这些索求遭到拒绝后，妻子有遭到丈夫及其亲戚毒打甚至杀害的危险。妇女保护组织估计，20 世纪 80 年代，此等嫁妆谋杀导致每年 1 至 1.5 万名妇女死亡。只有与过去的状况比照，人们才能看出，印度的世俗改革在印度人当中确立了“地位和机会的平等”。

在这片多种族、多宗教信仰的土地上，印度政府通过向各种族群体妥协、诉诸公民民族主义、对看上去威胁国家统一的运动进行军事镇压，恩威并施，保持各民族的团结。以宗教和文化为根基的族群忠诚，在一个由多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组成的国家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各族群领导人发起运动，力争重新划定边界，给予自己的民族“家园故土”。如果他们寻求脱离印度，他们的要求就会带来分裂的威胁。印度政府逐渐屈服于这些压力，1956 年，几个公国消失了，新的邦界取而代之，每个邦都将拥有自己语言的独立多数族群聚集到一起。但这些妥协，为其他族群的进一步煽动打开了道路，印度统一的纽带仍然脆弱。

304

然而，尼赫鲁的成就是不凡的，他把印度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民族问题上，给予了他们民族自豪感。他或许没有能够为数量巨大的印度人创造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但是他之于印度有多么重要，直至他 1964 年去世后才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大党和印度选民都选择了他家族的领导，其间仅有短暂的中断。他们起先选择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接下来选择他的孙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当总理。尼赫鲁的个人魅力似乎成为一项家族遗产，赋予他的子孙后代象征民族统一的威严。

他们的国内计划与尼赫鲁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逐渐取消了他曾经引入的指令性经济政策。印度国有工业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

所谓的"执照申领"把私营企业套牢在复杂而无穷无尽的官方文件申请中。在发展经济、提供新就业和推动技术革新方面,新领导层日益依赖印度资本家和国外投资者。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在新的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中心找到报酬优厚的工作,这些新产业由微软等外国投资者和业已变成"新经济"领域富有企业家的海外印度人投资建立。印度一小部分人口已进入电子时代,开发应用这种新技术,使自己与发达世界,而非自己周边贫穷的汪洋大海,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此时,这个国家的居民已超过 10 亿。

族群冲突在印度人的生活中从未长期缺席。1989 年,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再次发动反印叛乱。这次在巴基斯坦支持下,他们要求该邦的穆斯林人口有权组建独立国家。他们在巴基斯坦境内的营地里展开行动,计划对克什米尔的印度人发动武装攻击和恐怖袭击。印度军队再次受到召唤,以武力维护印度统一,其军队在克什米尔境内建立了一个军事统治政权。20 世纪 90 年代,与巴基斯坦军队偶发的边境冲突,一直保持着类似于低烈度地区战斗的态势。此时,两国均已获得了能够发动核战争的军武库,两国间毁灭性冲突的危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

在印度其他地方,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法治正在改变着印度社会的面貌。印度民众中受迫害最深的不可接触者群体,不再被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由于议会体制,他们利用自己的投票权,选择他们自己的邦政府领导人。尽管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存在周期性的国内冲突,但印度保持了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

305

南亚的战与和

尼赫鲁将非殖民化理解为新旧国家间国际和平与合作新时代的开始。他与苏加诺及其他新独立国家领导人一样,反对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他们把这种控制称为"新殖民主义"。尼赫鲁希望让印度变成缔造世界各国——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前殖民地还是老牌帝国——友好关系中的领导者。在独立后的数年

里，他慢慢地摸索出自己新的外交政策，该政策是通过合作寻求和平变革，其最终目标是在世界各民族中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福祉。在1949年的演说中，尼赫鲁阐明，印度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但不是通过加入任何大国或国家集体，而是通过独立的方法解决每个争议或争端问题。

他的国际主义观，摒弃了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势力均衡的老路。他拒绝在冷战中站在任何一方，选择了他所谓的"不结盟"政策。他的理想是梦想家式的，梦想一个被奴役民族获得解放的和平时代即将到来。

他依靠自己的威望担任印度民族领导人，依靠他的大国影响力团结起一批国家致力于他的原则。在1955年印尼万隆(Bandung)会议的国际讲坛上，他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来自亚非拉各国的代表在这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达成共识，在前殖民地各国，未来不应有任何西方强国的控制。但与会者在由冷战提出的诸多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因此未能就尼赫鲁的方案达成一致，他们仅仅通过了措辞模糊的《世界和平与合作宣言》。

巴基斯坦国家与伊斯兰教

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新国家的历史，在一些根本方面迥然有异于印度的发展道路。伊斯兰教，而非公民民族主义，界定着它的独特性；独裁政治，而非民主制，成为它选择的政府形式；与美国结盟，而非不结盟，决定着其外交政策。独立初期，印巴两国存在的根本性不同就已显现。为印度创建了联邦制国家、确立了内阁统治体制的1935年《印度政府管理法》，提供了独立后政治生活最初的要素。但穆斯林联盟未能在巴基斯坦培育出民主政治所需的政治条件，它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它在该国人口中所获得的支持非常微弱，因为不像国大党那样，它从未成功地变成群众运动。它的领导人真纳于1948年去世，在巴基斯坦人当中，内部深深的社会和种族差异阻碍了他的继承者们国家建设的努力。

307

只有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民众中提供了一条脆弱的纽带。宪法宣布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它是第一个规定《可兰经》为该国基

本法的国家，许多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中东国家后来仿效了它的做法。但是，共同的穆斯林身份尚不足以克服宗教和种族敌对。这个新国家的统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其领土的不统一，它的领导层和最有力的支持者都在西部巴基斯坦。在东部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作为外来者施行统治，因为这里的人民与他们自己的孟加拉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1954 年之后，东巴基斯坦的选民把选票投给自己的孟加拉政党，拒绝穆斯林联盟的领导。

巴基斯坦的议会政府无能而动荡，总理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独立的头十年里更换了六位总理。政府动荡和东西部间的内部冲突让民主统治名誉扫地。1958 年，巴基斯坦议会民主制不复存在，军队掌握了政权，尼赫鲁曾经警告的“恺撒主义”成为这个穆斯林国家的现实。是年，阿尤布·汗(Ayub Khan)将军夺取了权力，承诺加强国内秩序，建立“基本民主”，以此作为军人独裁的遮羞布。他与美国达成军事协定，因为结盟会给其穷困的国家带来巨额的美国援助——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共计 40 亿美元。他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建议，鼓励个人企业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市场战略刺激了经济发展，但只让一小撮成功的资本家富裕起来，进一步深化了该国的社会不公。

事实证明军人统治并不比文官统治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统一。东部对西部统治的反对不断壮大，东部的领导人抗议政府对其人民的援助不足，他们被经济学家视为世界上最穷困的民众。到 60 年代末，双方的不和变得非常剧烈，东部已处于西部军队的军事统治之下，孟加拉政治领导人被逮捕入狱。

1971 年，争端导致内战，孟加拉人举行示威，反抗巴基斯坦统治。军事镇压迫使数百万孟加拉人越过边界逃到印属孟加拉邦。希望削弱巴基斯坦的印度政府接纳了这些难民。冲突正演变为一场国际危机，在己方孟加拉人口的压力下，印度政府决定支持东巴基斯坦的反叛。当巴基斯坦军队拒绝印度对其提出的结束军事占领要求时，印度军队侵入东巴基斯坦，印巴之间再次陷入战争。这场战争以印度的速胜结束，和平协定要求巴基斯坦给予孟加拉领土独立。反叛领导人宣布他

们的领土独立，国名为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本身剩下的人口不到战前国家的一半，经济上比以前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贫穷和疾病肆虐。许多下层阶级男子前往海外寻找工作，他们在欧洲和中东一待就是多年，给家庭邮寄回来的“汇款”，逐渐成为巴基斯坦外汇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仍然是巴基斯坦人最想去的地方，移民们带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

对许多巴基斯坦人来说，独立初期的美好希望烟消云散，所余仅是单一穆斯林国家的理想，以及国内持续不断的种族纷争和印巴战争威胁的残酷现实。1978 年，穆斯林律法原则成为这个国家宪法基础的一部分。有教养的巴基斯坦人反对国家严厉的伊斯兰律法，他们可以移居英国，对他们来说，这里是个人自由和世俗权利的乐土。

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参见第十三章)，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巴基斯坦向毗邻的阿富汗人的游击反抗提供秘密支持。其领导人希望通过将巴基斯坦的影响力扩展到阿富汗，提高本国的地区力量。该行动仅有的直接后果，是助长了他们土地上好战穆斯林的势力，其中包括许多渴望加入阿富汗“圣战”的外国人。巴政府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向这些狂热分子(包括一个名叫奥萨玛·本·拉丹[Osama bin Laden]的沙特阿拉伯人)提供支持。

快速增长的人口中的贫穷，加之对西方文化的敌视，促使日益增多的巴基斯坦人走向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信仰和实践。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变成了政治行动主义的中心，它们发起运动，力图在国内实行更严厉的伊斯兰律法。它们在国内得到的支持使它们拥有立法机关的多数，但一位军队将领再次夺取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像之前的军事统治者一样，他通过警告族群冲突会毁灭国家，为自己的威权统治提供正当性。在这片以伊斯兰国家信念为立国之基的土地上，伊斯兰教依然是国家统一不那么可靠的象征。

小　结

西方帝国在南亚消失，民族主义领导人肩负起重责，处理本民族尖

锐的社会经济困境，在族群和宗教冲突的情况下确保政治稳定。独立改善了这些人口的生活吗？人们基于何种立场看待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进步：是根据民族独立、政治自由、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缓解，抑或是根据一个国家当中族群和宗教多样性得到保护？所有这些目标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出现在第三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这些国家人民的集体愿望中。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项得到完全的实现。这种失败激起的失望和愤怒，导致人们寻找简单的原因加以解释。

新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答案。苏加诺把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失败和国际弱点归咎于殖民遗产。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他寻找西方替罪羊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在他的统治下，印尼的问题主要是族群敌对、贫穷和政府腐败无能。他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他欲在一党制国家里，309 围绕着自己的克里斯玛式领导缔造民族统一的短视行为造成的。它为军人干政开辟了道路。军队将领们利用军事力量恢复这个领土广袤的国家的秩序，并将他们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国家。

殖民主义——以新殖民主义概念无助于我们理解的方式，留下了前殖民地各民族选择接纳或拒斥的复杂遗产。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和荣耀，欧洲征服者曾把分散的岛屿和不同的民族构建为大的殖民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作为殖民统治下各片土地的联合得以形成。帝国的统治方式本身不会制造族群冲突，但却让这样的敌对在帝国崩溃后很可能爆发出来。

在英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印度民族主义者培育起印度民族的观念，并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容。在甘地的民族主义信条中，它变成一种高尚的人类团结和道义平等理想。这种梦想被南亚次大陆的分治毁灭了，其悲剧性破灭的责任，在于帝国的和民族的领导人以及印度民众中深刻的敌对。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族群敌对在新的国家边境内外激起了对非我族类的潜在恐惧。忠诚永远不止语言、文化、宗教或世系这么简单。以巴基斯坦为例，其新生的民族统一主要来自伊斯兰的团结，但1971年的国家分裂表明，与东西巴基斯坦人共有的穆斯林信仰相比，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是更强有力

的纽带。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是脆弱的。

独裁主义是应付不稳定的诱人答案。军队将领们时常相信自己是国家的拯救者，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诉诸残酷的独裁统治方法来维护权力。曾经一度是新民族国家样板的缅甸，在20世纪80、90年代变成残酷军事独裁和经济衰败的刺眼典型。因为担心商品和思想的自由流动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军队将领们选择把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封闭起来。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是亚洲各国的目标，但他们的手段和能力难以满足他们的梦想。

本章大事记

1946年　菲律宾独立
1947年　印度分治；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
1947年　尼赫鲁担任印度总理
1947－1948年　印巴战争
1950年　苏加诺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
1951年　印度联邦宪法
1955年　不结盟国家万隆会议
1964年　尼赫鲁逝世
1965年　新加坡独立
1966年　苏哈托将军成为印度尼西亚统治者
1967年　印度接受“绿色革命”作物
1971年　印巴战争和孟加拉国独立
1981－1989年　巴基斯坦援助阿富汗反抗者
1982年　锡克教反印大起义
1989年　克什米尔穆斯林反印暴动

推荐阅读

东南亚

Theodore Friend, *Indonesian Destinies*(2003)。一部解释性的印

度尼西亚历史,重点关注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苏加诺和苏哈托。

* Stanley Karnow, *In Our Image: 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1989)。一部描述独立前后菲律宾与美国之间密切关系的史著。

C. L. M. Pend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karno*(1974)。有关这位印尼民族英雄和专制统治者的批判性传记。

310

印度和巴基斯坦

*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 *Freedom at Midnight*(1975)。围绕着英国最大殖民地解放的人物和环境的戏剧性历史。

* Patrick French, *Liberty or Death: India's Journey to Independence and Division*(1997)。对印度的殖民过去和分治悲剧的中立平和的历史评价。

回忆录和小说

* V. S. Naipaul, *Voyage 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1981)。印度西部一位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个人游记,描述了在亚洲穆斯林各国的发现之旅。

*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1981)。一部关于印度独立的生动小说,透过一个独立时刻在印度出生的人之眼审视这一事件。

* Khrushwant Singh, *Train to Pakistan*(1956)。透过旁遮普一个小村庄的人们的视角,描绘印度分治悲剧的生动小说作品。

第十一章　第三世界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311

- **脱离殖民统治的非洲**
- **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
- **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

聚焦：纳尔逊·曼德拉

重点：第三世界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相距甚远的非洲与拉丁美洲却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两个洲都曾经被划分为若干个小国，加上这些小国本身资源贫乏，以至于根本就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此等状况带来的困难，在战后时期对它们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非洲获得解放150年前，拉美就已摆脱了帝国统治。19世纪早期，几乎整个拉美地区都脱离了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获得了自由。大部分地区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方式是民族起义。为了表明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起义领导人利用革命民主和民族自由的图片与象征符号，阐释他们反抗事业的正义性。全民族武装反抗的故事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政客们利用这样的故事，为他们新生国家的诞生编制出一套神话。然而，事实上，国家的建立过程是非常缓慢和艰难的，在获得解放后的150年时间里，政治动荡时有发生。

在非洲，真正的帝国主义征服开始于19世纪晚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方告完成。在这之后，欧洲帝国又对非洲进行了长达半个

世纪的占领。然而,突然之间,在 1950 至 1970 年的 20 年里,欧洲的殖民者们把自由轻易地归还给了非洲殖民地的人民。突如其来的独立与自由让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感到出乎意料。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地域范围较大的地区,因为,小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些地方很少甚至完全没有遭到来自帝国的任何抵抗。在非洲控制着较大领域和产业的大英帝国与法国政府,在二战结束之后,都将重心转移到了国内事务上,重点关注国内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非洲的自由与独立来自欧洲殖民者的默许。

312

独立之初,这些新生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任务与此前已获得解放的亚洲殖民地是相似的,即,第一,建立稳固的政权;第二,调动有限的资源去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为了快速地找到一条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领导者们纷纷效仿苏联和中国的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同时,领导人们都试图在本国建立起单一的民族国家政权。政客的演说都竭力地强调民族团结,尽管这样,由于族群多样性的特点,人们要求政客们提供值得信赖的保证来促进政治多元化的实施。与此同时,不时发生的族群内乱却逐渐侵蚀了保障老百姓正常、有序生活的基础。在这片广大的区域,究竟谁才能最终解决这个艰巨的难题仍然是个问题。然而,南非却是个例外。首先,由于在殖民统治时期,南非实行的是“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这项制度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才被废止,因此南非获得民族解放的时间也比非洲其他地区晚;其次,相对于非洲其他地区,二战后的南非一直保留着经济增长的活力。而非洲其他地区,尽管新生的民族国家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小有成就,但不能否认的是,一直到本世纪的最后 10 年,经济衰退以及零散的内战冲突一直都存在。

这些带领老百姓获得民族独立的领导人手中的政治权利很快就被人夺走,来自新成立的国民军的野心勃勃的军官们强行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非洲进行经济援助的资助国已经开始向军事独裁者们施压,要求他们实行民主政治,然而最终结果却不那么令人满意。严峻的经济衰退形势成为这些新生国家必须面临的危机之

一,这一状况几乎出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人能轻易地解答出农业以及工业衰退的缘由。调查报告表明,相较于刚独立的那 10 年,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非洲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显然更加糟糕。

在拉丁美洲,政治斗争同样存在于领导人与军队官兵之间。从 19 世纪获得独立开始,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期,拉丁美洲各国的文武官之间的权力争夺从未间断。然而在 1945 年后的几十年间,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拉丁美洲的文官与武官的政府,像非洲那样,转向于开始控制国家的商业贸易与财政;为了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政府出台了许多新的社会福利计划。显而易见,与非洲相比,拉美地区的国家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取得了更好的成效。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经济的发展更是出现了奇迹般的飞跃!

随着反军事独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拉美大部分地区的独裁者们都放弃了手中的权力。由于不能实施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以及在政治上要面临大量来自民主力量的反对,军事独裁者们逐渐把权力让渡给了由选举产生的文职官员。在同一时期,政府也停止了于 20 世纪中期引入的"国有经济"机制,这一举措是紧跟当时亚洲与非洲的发展趋势的。无拘无束的市场机制能够不断促进经济的增长,事实证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比严格控制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更行之有效,与此同时,自由市场还能够为广大人口带来更多的经济契机。在拉丁美洲,只有古巴共和国还保留了计划经济。虽然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古巴的革命领袖仍然拒绝放弃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

313

在整个拉美地区,社会不公一直是普遍现象。到 20 世纪末,更多的移民前往北美,希望摆脱故土的贫困。尽管如此,拉丁美洲民主的扩大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这表明旧体制下精英统治正在逐渐衰落。或许,自由经营企业的出现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公平,然而,与国家社会主义相比较,私营企业更有利于为人们创造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张来建立幸福生活的机会。

脱离殖民统治的非洲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西方诸帝国的非洲殖民地迅速走向独立。帝国在非洲的急速消失标志着欧洲海外殖民统治的结束。在殖民时代末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仅有的独立国家是埃塞俄比亚(20 世纪 30 年代曾被意大利控制数年)、利比里亚(19 世纪创建的一个小国，用作美国被解放黑奴的庇护所)和南非(1910 年英国人给予它在英联邦之内的独立)。遽然之间，非洲其他民族不再生活在西方帝国的统治之下，它们的新领导人自豪地谈及自己的非洲新国家，尽管每个国家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许诺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尽管这些国家依然十分贫困。

殖民历史给这片广袤大陆的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像在他们广大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欧洲统治者划定新的政治界线，标定自己领土的范围。每块殖民地都有自己的首府以及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城市。殖民官员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大力鼓励商品作物贸易，如可可、棕榈油和花生；非洲农民迅速引进种植这些新作物，希望以此增加收入。但如此为之，使他们依存于国际经济，而国际经济的周期性衰退压低了这些商品作物的价格，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困境。

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带来了深远的宗教文化转变。殖民统治的社会和心理张力，为大规模地皈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开辟了道路。穆斯林传教士给非洲人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宗教信条和强有力的宗教共同体，伊斯兰信仰迅速传播，到 20 世纪中期，东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各帝国为自己的利益支持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他们向皈依基督教的非洲人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医疗保障和学校教育，并传播基督教信仰。宗教皈依与帝国统治的破坏性影响有着紧密联系，帝国征服削弱了旧有的自然神信仰的公信力，把基督教信仰提升到了征服者的宗教的地位。皈依基督教，为那些渴望了解新的经济和政治情势并从中获利的非洲人提供了社会身份和文化资本。

314

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旧的部落团结纽带逐渐解体，但新机制和新思想意识填补这种文化与社会真空的过程非常缓慢，宗教本身变成思想分野之源。英国西非殖民地尼日利亚的高地地区成为伊斯兰教中心，而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民族更多地皈依基督教，改宗的过程激起了纷争。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契贝的父亲选择了基督教信仰。他回忆到，在孩童时代，他和教堂里的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教堂人”，而称他们周围的非基督徒为“异教徒”(heathen)或“不信教的人”(the people of nothing)。在这种社会文化断裂的情境中，反抗帝国和非洲人团结的民族主义思想原则看上去是一个诱人的解决之道。

非洲的民族主义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改组它的非洲殖民地，为这些地方的独立做准备。它的过渡计划中包含在帝国监管之下的长期自治。即便到此时，英国政府最乐观的计划也预计解放过程将是缓慢的，要持续好几十年。但在殖民解放运动和欧洲不愿意强化殖民统治的压力下，它的时间表显得毫无用处。一位英国政客称这些力量为“变革之风”，它横扫了所有殖民帝国。非洲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蔓延至整个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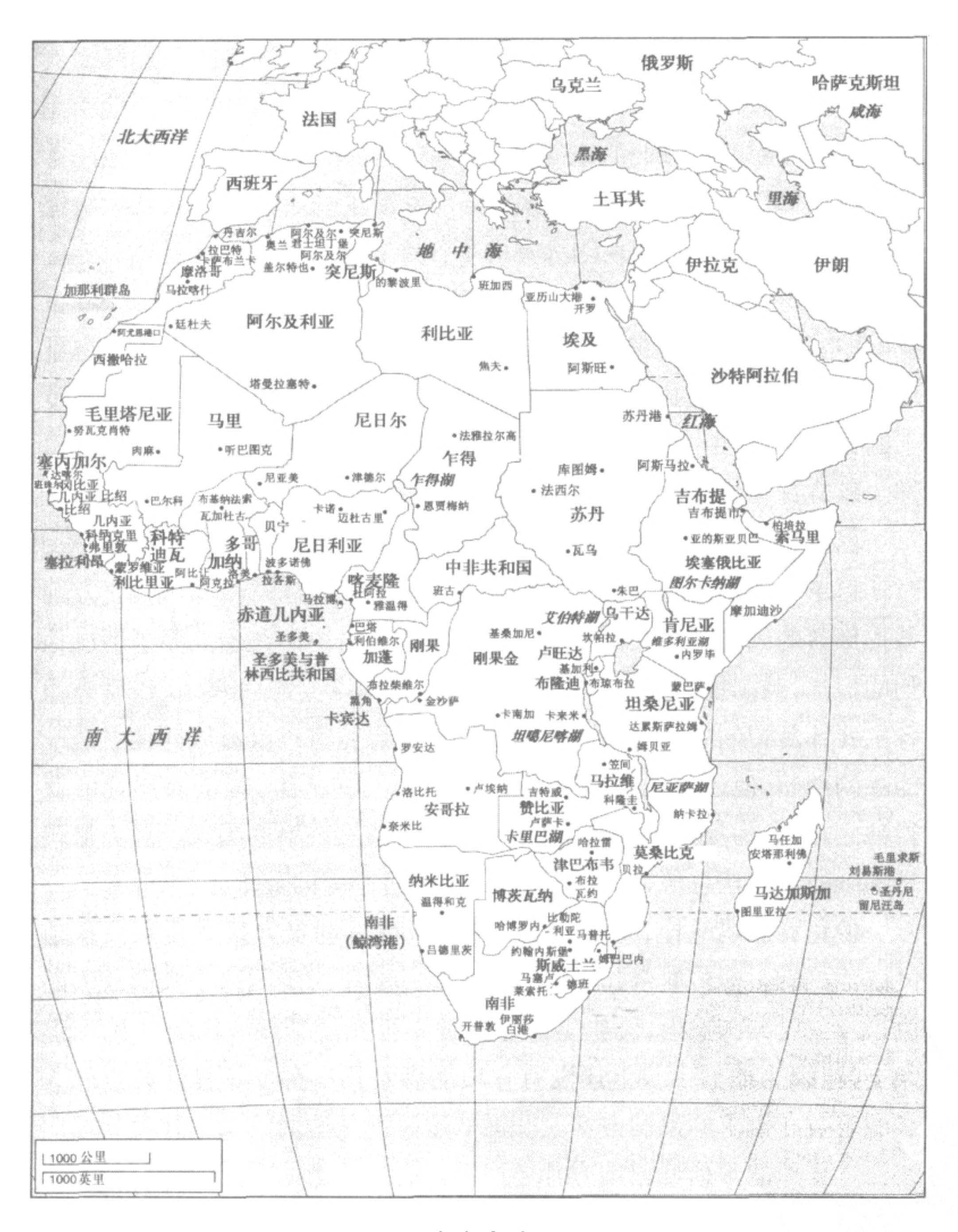
非洲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一次令人瞩目的发展。在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熟知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后，非洲的民族主义得以形成，殖民世界中共同的敌人和新型的经济关系又使之发展壮大。在欧洲人控制的殖民地内，人口通过部落、宗教、语言进行划分。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协议来自他们对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认知。管控殖民地的欧洲行政官和士兵的存在是殖民主义一个实实在在的标志。在首都，满大街飘扬着欧洲帝国的国旗，并建有重要殖民地官员的官邸，这些城市成为民族主义者示威游行和引发骚乱的地点。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他们的人民凝聚在一起。

最先出现有效的反抗欧洲统治运动的地区是英国的殖民地——西

非的黄金海岸(后来的加纳)和东非的肯尼亚。20 世纪 50 年代,在肯尼亚占支配地位的基库尤人组织了一次猛烈地反抗当地白人居民的斗争。他们称自己的组织为“土地自由军”(Land Freedom Army),但是欧洲人却轻蔑地称之为“茅茅党”(Mau Mau)。这次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通过制定纲领,将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一起。这项纲领旨在终结外国人的统治,并在基库尤人中分配曾被西方移居者夺走的土地。基库尤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愿意其他部落组织参与他们的反抗事业,这一点在非洲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也十分明显。

英国对这次起义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努力镇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曾鼓动肯尼亚的其他部落去打击基库尤人的反叛,并且重新安排已归顺的非洲人定居在一些要塞村落。英国政府逮捕了肯雅塔,并将他判刑,入狱 7 年。茅茅党起义导致了 1.3 万名黑人(茅茅党的追随者和英国的支持者)和 95 名白人死亡。但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英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加速向肯尼亚引进自治。最终,肯雅塔成功迫使英国政府开始撤离东非。

316 第一次成功达至独立目标的反殖民运动,发生在西非大西洋沿岸的黄金海岸(加纳)。黄金海岸的政治行动主义模式和动员大众支持的困难,揭示了此后岁月非洲其他地区独立运动的重要特征。黄金海岸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夸米·恩克努玛(Kwame Nkrumah),一位强有力的有技巧的组织者,他利用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构思出解放与自由的民族主义信条。20 世纪 40 年代末,恩克努玛开始召集他的拥护者反对英国统治。这个时候,在殖民地港口城市,非洲工人中爆发了一次猛烈的工会运动,黄金海岸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可可豆就是从这些港口城市输出到西方。曾经强大的阿桑提(Asanti)部落就位于种植可可豆的内陆地区。沿海与内陆贸易区之间的商业往来,使各个民族群体由于共同利益和相互交际凝聚在一起。由于遭受国际公司带给种植者和工人的价格浮动,殖民地新兴市场经济成为对英国统治不满的主要源头。


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
咸海
法国
北大西洋
黑海
西班牙
土耳其
里海
丹吉尔
阿尔及尔
突尼斯
拉巴特
卡萨布兰卡
奥兰
君士坦丁堡
摩洛哥
突尼斯
地中海
伊拉克
伊朗
加那利群岛
马拉喀什
的黎波里
班加西
亚历山大港
开罗
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埃及
西撒哈拉
焦夫
阿斯旺
沙特阿拉伯
塔曼拉塞特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
苏丹港
红海
努瓦克肖特
廷巴图克
法雅拉尔高
塞内加尔
乍得
库图姆
阿斯马拉
乍得湖
法西尔
吉布提
几内亚比绍
巴尔科
尼亚美
苏丹
吉布提市
几内亚
瓦加杜古
贝宁
恩贾梅纳
索马里
科特迪瓦
多哥
尼日利亚
瓦乌
塞拉利昂
加纳
中非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利比里亚
图尔卡纳湖
喀麦隆
班吉
朱巴
马拉博
雅温得
艾伯特湖
乌干达
赤道几内亚
摩加迪沙
圣多美
肯尼亚
刚果
坎帕拉
维多利亚湖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共和国
加蓬
刚果金
卢旺达
内罗毕
基加利
布隆迪
布琼布拉
蒙巴萨
金沙萨
卡宾达
卡南加
卡来米
坦桑尼亚
南大西洋
坦噶尼喀湖
达累斯萨拉姆
罗安达
姆贝亚
马拉维
洛比托
卢埃纳
尼亚萨湖
安哥拉
赞比亚
利隆圭
纳卡拉
奈米比
卢萨卡
卡里巴湖
马任加
哈拉雷
安塔那利佛
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
毛里求斯
纳米比亚
贝拉
马达加斯加
温得和克
博茨瓦纳
图里亚拉
南非
(鲸湾港)
哈博罗内
比勒陀利亚
马普托
吕德里茨
约翰内斯堡
斯威士兰
马塞卢
莱索托
德班
南非
伊丽莎白港
开普敦
1000公里
1000英里

当代非洲

1949年,恩克努玛创立了他的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它团结了来自城市和乡村,以及来自遥远的北方穆斯林的积极分子。恩克努玛承诺,自由将终结黄金海岸人民的苦难,他将带给人民一个崭新的、充满进步与机会的时代。他引用《圣经》上的原话告诫他的追随者们:"你们要先求政治王国,其他的才会跟随而来",带着这些承诺,恩克努玛发动了一次消极反对殖民法律的行动。他从甘地和印度国大党的事件中获得反殖民主义灵感。他的政党尊称那些被英国审判入狱的活动分子为"监狱毕业生"。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恩克努玛的活动赢得了非常广泛的支持,由于不愿继续花费巨大但毫无成果的镇压,英国政府允许黄金海岸地区很大程度上的自治。那时的英国囚犯恩克努玛同意出任黄金海岸第一任临时总理。双方都宁愿赞成政治妥协而非暴力冲突。

恩克努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他拒绝用对任何单一族群的忠诚作为他的民族主义理想的基石。但是,北方阿桑提部落的领导人害怕南方人在中央集权政府中的统治。为了解决他们的担忧,英国提议了一部宪法,规定这个国家实施联邦制,该联邦由各主要部落控制的独立自治区构成。尽管恩克努玛没有放弃建立统一国家的理想,他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安排。1957年,黄金海岸地区获得独立,更名为加纳,这是非洲第一个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恩克努玛是加纳的第一任总统,也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心中的英雄。

像恩克努玛一样,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能够动员大量支援来反抗殖民统治,然而,他们联合起来作战的力量却源于对英国这个共同敌人的仇恨。一旦英国撤退,民族主义者们便不再指望新成立国家人民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手头上还没有一项能满足具有种族多样性特点的人口的利益和需求的建国方案。非洲非殖民地化造成的国家建设问题比殖民世界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和法国政府都选择尽快结束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国际压力在加速非洲非殖民地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亚洲新成立的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使非洲人民的解放成为一项国际斗争。

317

美国和苏联公开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联合国成为公共的讨论场，在这里，反殖民主义者谴责欧洲旧式的帝国主义体制。1956 年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失败(参见第十二章)，英国与法国开始明显地衰弱，这次的失败剥夺了英法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并且向他们证明(也向世界证明)，在这个全球非殖民地化的时代，英法不再具有守住他们殖民地的实力。在促使英法政府返还独立给非洲殖民地方面，这次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从此一去不复返。

非洲各殖民地的独立

就这样，非洲从一个曾被遥远的欧洲帝国控制的区域，迅速转变成一个被分割成 40 多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大洲。获得解放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大英帝国效法了曾经用于亚洲的办法，与每一个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协商，建立具有宪法的民主政府。在黄金海岸地区之后，1960 年，尼日利亚获得独立。与加纳一样，尼日利亚各主要部落领导人一致同意通过一部宪法，该宪法认定联邦政府是既能维护 3 500 万人口的民族多样性又能保证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1963 年，在肯雅塔的领导下，肯尼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位领导人最终从英国监狱获得释放，迅速转变为新政府的总统。这个新生国家的宪政秩序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民主制，英国认为这个西方舶来品对非洲来说是最好的。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认为议会制是一个临时的手段，在殖民地转变为完全独立的国家的过程中，它是十分有用的。尽管非殖民地化进展迅速，但是英国和非洲的领导人设法取得合作，在权力转换过程中共同维护民众的和平。

在某个主要方面，法国的非殖民地化不同于英国。1958 年，法国政府向其非洲全部的殖民地提议了一个转变期的办法，在这段时期内，各殖民地政府拥有广泛自治权，但需接受法国提供的经济、军事顾问和经济援助。为达到目的，法国变革了它的殖民帝国，取名为法国联盟，非洲民众可以投票来决定是否加入联盟。即给非洲民众的另外一个选择是独立于法国联盟之外，但就得不到法国的任何援助。这项政策由

二战时期法国的英雄夏尔·戴高乐提出,1958 年他再一次被任命为法国总统。戴高乐通过法国联盟与非洲各国合作的提议,是为了维持法国与其前非洲殖民地的紧密联系。

法国殖民帝国内的大多数非洲领导人同意加入这个联盟,他们驳斥了反对者认为这项计划是“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有利于抓牢手中的权力,因为他们面临着艰巨的国家建设困难。非洲领导人也希望获得法国的经济援助,特别是资助耗资巨大的工业投资,以及维持他们新发行的货币的价值。1958 年,各殖民地都就是否加入联盟进行了投票,在每一个区域,选民都拥护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建议。除一个地区之外,法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都成为了联盟的成员国。

成员国获得了经济援助、财政顾问和技术员,并与法国建立了一个货币同盟。他们也接受了永久的法国驻军,这些军队驻扎在各战略要地,在边境冲突或政治骚乱时能够随叫随到。作为交换,驻军也保护法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安全。两年后,法国政府采取了最后的、不可避免的步骤,承认它以前的殖民地完全独立。这些殖民地成为新的“法国共同体”的成员国。

318

新生国家中温和的领导人是激进改革的有效反对者,他们认为这对自身和法国的经济利益来说都将是一个危险。一位非洲的领导人后来总结道,“戴高乐将军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非洲人”。他的观点表明,他十分重视以不进行任何社会改革为代价获得的政治稳定。法国提供的援助确实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利益,其中,独立早期的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

在非洲最大的殖民地——比属刚果(后来的扎伊尔),非殖民地化过程成为一个充满内斗和流血的噩梦。1959 年早期,比属刚果爆发了首次暴力反比利时的示威游行。这次由小规模民族主义运动导致的抗议,获得了首都金沙萨(以前的 Stanleyville)广大劳工的支持。这次简单快速的政治反抗,有效地促使比利时政府承诺,立即授予殖民地独立。在之前数十年,比利时政府没有为殖民地自治做任何准备。民族

主义运动自身也缺乏一个为这个庞大国家人民所支持的杰出领导者。1960年，随着“变革之风”吹过，比利时政府在极其糟糕的环境下解放了它的殖民地。

对这个新国家以及它的人口(无论是非洲人或是欧洲人)来说，解放的结果是悲惨的。殖民制度的结构迅速瓦解，刚果人的军队发生兵变，并且攻击逃离这个国家的白人定居者。部落之间也相互争斗。唯一具有大量追随者的政治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无法恢复军中秩序，并且拒绝任何来自比利时的帮助。骚乱迅速地变成彻底的内战。南部的加丹加(后来的沙巴区)正式的脱离新的国家并创建了自己的军队。这个地区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并且是由西方财团占有的采矿业中心。

联合国赞同从成员国派遣军队，阻止刚果陷入完全分崩离析和无政府的状态。在战争过程中，卢蒙巴被加丹加军队逮捕并处决。长时间的政治骚乱之后，1965年，一位前殖民地军官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到此时为止，幸存下来的白人定居者已经逃离，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遭到毁灭，成千上万的刚果人在这次战争和暴乱中丧生。几年后，被蒙博托更名为扎伊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业已开始了它滑入失败国家的缓慢衰败进程当中。

南非民主制的胜利

非洲最南部的国家——南非，在1910年就已经获得了自治。然而，拥有完全公民权的只有白种人口。由于其珍贵的自然资源，英国联邦的成员国——南非，在国际贸易中有着特殊地位。与某些欧洲民主国家一样，南非政府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来回交接，两党竞相行使由国家议会大多数人授予的权力。南非的宪政秩序由自治的司法系统监督，这也是仿效英国的办法。但是，南非禁止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欧洲人参与政府体制，并要求它的非洲国民服从日益严厉的种族歧视制度。

有限的民主体制有利于欧洲血统的南非人(以前叫做布尔人，为说

荷兰语的定居者)向国家的宪政秩序注入种族偏见。尽管这群人只有400 万,但是他们的新教信念以及本世纪初与英国的战争,使得这群人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长达三个世纪作为南非的垦荒者和开拓者的生活,使他们认为南非本来就是他们的土地。宗教信条使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非洲人是劣等民族。他们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种族主义。他们的领导者决定,无论使用什么必要的手段都要坚守这片故土。

南非的经济财富集中于黄金和钻石开采业,这些都被来自欧洲的英国人和新近的侨民掌控。城市贸易是印度移民的专门领域,他们作为大英帝国的国民移居到这里,在发展的城市中寻找工作。对非洲人来说,他们在庞大的采矿业中担任劳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南非的商业带来了繁荣,而在商界占支配地位的是英美集团(Anglo-American Corporation)。其触角伸展得十分广泛,南非一半企业的股票交易都被其控制。

社会不公并不完全是白人统治的产物。大多数欧洲血统的南非人是贫穷的农民,拥有相对较小的土地,而一些印度人和混血南非人(Coloureds)却在商业上十分成功。人口中最穷的主要是非洲人。然而,在 20 世纪中叶,为满足商业和工业需求,进入城市经济的非白种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一些非洲人还获得高等教育,并迈入中产阶级。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后来非洲反抗运动的领导,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律师。在那些年,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逐渐削弱了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

那时,政府不断制定大量的法律,企图禁止非洲人、亚洲人和混血南非人与白人接触。这导致许多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者变成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rgress, ANC)的支持者。这个组织仿效印度国大党的方法和目标,在 1912 年成立,其成员和平地鼓吹民主自由,并要求结束任何形式的隔离制度。不断扩大的影响以及来自开明的白种人的支持,使它给欧洲血统南非人的统治带来严重的威胁。

欧洲血统的南非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政党——民族党。20 世纪 40

年代末，该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胜，选举的主要议题是非白种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民族党的竞选大纲鼓吹对非白种人完全的排除，赢得了大量的投票者的支持，从而掌控了内阁。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内，新的民族党政府着力制定种族歧视政策，也被称为“种族隔离制度”。它将非白种人排斥在所有政治权利之外，并剥夺他们的公民自由。非洲人甚至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力；他们被强制要求住在专门的定居点，仅仅在工作的时候才允许像“客人”一样进入城区（所谓的通行机制）。在整个镇压的年代，只有南非的司法制度继续尊崇（有较多的例外）英国法治的原则，即使在审判种族制度反对者的时候也不例外。

民族党不承认这个国家多族群、多种族的人口能够形成一个民族。在他们看来，只有对族群忠诚，才有民族主义。在他们的主义纲领中，公民民族主义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政策意在力图加强南非各部落的分裂。正当非洲其他地区的非洲人获得政治独立的时候，民族党应该为建立白人至高无上体制负责。 320

受到20世纪50、60年代非洲其他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鼓舞，非洲国民大会加强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1955年，非洲国民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该宪章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纲领：建立一个多族群的、民主的南非，它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的。其青年团吸收那些对老成员的温和方式不满的积极分子。纳尔逊·曼德拉等年轻领导人提出，非洲国民大会应该发动新的、大规模的行动来反抗日益严酷的种族歧视法。非暴力仍然是他们策略的基础，但国家的高压统治逼迫他们转向对抗。

1960年，非洲国民大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对限制通行体制的示威游行。在一个非洲人的定居点夏普斯威尔（Sharpsville），南非警察向徒手的游行者开枪，杀死了60多人。这是一场大屠杀，其最主要的影响是激起了非洲国民大会彻底地反抗现有政权。更多的游行示威接踵而来。在大范围的逮捕和野蛮的监禁后，非洲国民大会的领导最终同意，在政治行动的同时实施暴力反抗。非暴力不再起作用，民族党给自己制造了一场政治危机。

作为对非洲国民大会行动的回应，南非政府诉诸更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宣布非洲国民大会不合法，并以叛国罪逮捕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 30 年，南非警察全力抓捕所有的政治反对者。政府加大力度实施通行机制和所有保持白人优越性的法律。政府给非洲部落建造单独的“故土”，在这些区域之外，非洲人没有永久合法的住所。这些区域都坐落于国家那些贫穷的地方。在定居点之外的地方，通行证法允许他们有临时的居所，这些地方变成大城市外围的贫民区。民族党使南非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政策，导致联合国开除了南非，并且给国家造成了紧急状态。

反抗来自南非内部和外部世界。非洲国民大会仍然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并作为地下组织幸存下来。当抗议遭到镇压的时候，暴力冲突在这个国家时常发生。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西方国家加入了国际性的抵制南非经济联盟。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面临社会骚乱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南非政府发现自身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在新总统德克勒克[①](F. W. de Klerk)的带领下，民族党最终承认种族隔离制是毫无希望的。南非的生存依赖于制定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和种族宽容。德克勒克政府渐渐地取消了强化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许多欧洲血统的南非人抗议，但是他们又没有化解危机的其他办法。

为了迫切地寻找到解决办法，改良家求助于非洲国民大会。1990 年，他们解除了所有否认非洲国民大会拥有作为政党权力的限制法案，释放了它所有的政治囚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镇压后，民族党认可了非洲国民大会为它的对手。非洲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准备展开合作，《自由宪章》已经陈述了他们的合作条件。他们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即建立一个宽容、自由、和平的多种族国家。他们为所有非洲人说话的主张，遭到一场强烈的、由南非最大的部落祖鲁人发动的政治运动的挑

321

① 此处原文为 prime minister，为总理，但德克勒克应为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编者注

战。像印度的穆斯林联盟一样，发起运动的因卡塔党（Inkatha Party）[①]没有希望在国家选举中获胜，所以它要求以专门承认对其族群利益的保护。非洲国民大会勉强地接受了与因卡塔党的合作。

1993年，民族党、非洲国民大会以及因卡塔党相互合作并制定了一部新的南非民主宪法。在接下来的一年，自由选举使非洲国民大会获得大多数的议会议员席，并有权利治理国家。尽管有着30年的暴力对抗，三党的合作却保证了权利转换和平地进行。南非政治危机能有这样一个非凡的、充满希望的落幕，更多的应该归功于非洲国民大会的一位卓越领导——纳尔逊·曼德拉。

聚焦：纳尔逊·曼德拉

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期，纳尔逊·曼德拉（生于1918年）是南非的一名政治囚犯，于1994年成为南非总统。数十年监禁和突掌大权均直接源于他反抗并最终战胜了南非白人优越体制。

曼德拉在南非的一个部落里度过童年，他出生于该部落的统领家族，国王曾把他送往一所卫理会创办的英语中学读书，期望他能成为部落的领导。但曼德拉没有选择这条传统道路，他脱离了部落人民的宗教，加入卫理公会。毕业后，他离开了部落，在南非一些发达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他在一家法律事务所找到工作，并最终获得了法律学学位。

那些年，民族党霸道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触动了曼德拉和一些其他非洲人及非白色人种。他选择将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作为他的天职。26岁时，为了寻找能够结束部落分裂、联合非洲人为"一种人"的办法，他加入了非洲国民大会。曼德拉与青年团一起，工作了多年，努力强化大众对非洲国民大会的种族平等和宽容纲领的支持。他既是一位充满活力、具有领袖气质的组织者，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作家。他曾为非洲国民大会的民主纲领辩护，这个纲领是针对南非所有种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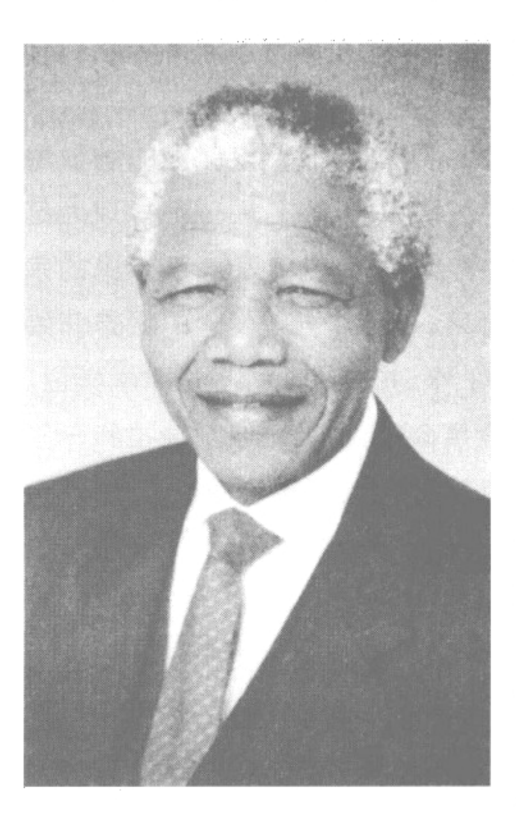
① 全称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以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地区祖鲁族为主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928年，1990年向所有种族开放。

在党内的最初几年，曼德拉支持非暴力反抗民族党种族法的办法。1955 年，由于他的工作，曼德拉以叛国罪被捕。他曾写道："我的道德良知使我成为一名罪犯"。

由于落在民族党政府手中，他濒临生命危险。但法院最终取消了对他叛国罪的指控。1960 年，民族党政府增强对非洲国民大会政治活动的镇压，曼德拉认为是时候该放弃非暴力反抗的手段。南非已经成为，如他所写的"一个被枪炮统治的土地"。他看不到其他方式，只有诉诸恫吓和恐怖袭击，主要如袭击国家建筑和重要的经济设施等。这些是他新建立的地下组织——"民族之矛"的专门任务。曼德拉被追捕，只有 1962 年在欧洲简短旅游时，他才能自由地为他的理想辩护。一回到南非，曼德拉就被逮捕，被判定犯有叛国罪，判处终生监禁。

322

长年的监禁生活是对曼德拉心理和身体的折磨，这也是一段孤独与艰苦的岁月。可是，他对自己国家民主的热情却从未减弱，他的政治地位比以往更高。他面对政府镇压仍不放弃的决心鼓舞了非洲国民大会的拥护者。在那些年，曼德拉作为非洲国民大会真正的领导人而存在。国际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愈演愈烈，曼德拉的监禁也体现了民族党政权种族歧视主义的残酷程度。曼德拉对非洲国民大会理想的忠诚，也证实极权国家在压制国内反抗方面的无能。1980 年，联合国安理会表明，若想允许"一个有意义的有关南非未来的讨论"，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将曼德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承蒙 South African Consulate General, Los Angeles 提供）

民族党自身也不得不承认曼德

拉作为政治领袖的声望。曼德拉一直都接受和平谈判的原则，即建立一个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1990 年，他获得释放，民族党人意识到曼德拉对非洲国民大会的积极领导，是结束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唯一的希望。在政府释放所有南非的政治囚犯、废除它的种族隔离政策之后，曼德拉接受了谈判，从而为自由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使权利的和平转换成为可能。1994 年，南非第一次自由选举结束之后，新国会面世，非洲国民大会成员占据绝大多数议席。代表们选举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任非洲裔总统。曼德拉实现了当初加入非洲国民大会所拥护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的国家。像印度的尼赫鲁一样，曼德拉谋求成为一个多族群国家的领导。

323

这些政治改革是不可逆转的。种族主义者被击败，非洲国民大会政府着手开始一项商议好的工作，即努力为本国的非白人，特别是占大多数的黑人构建更好的生活。10 年后，这些结果令人鼓舞。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建造用来取代黑人居住区的公共住房，以及在反种族隔离社会骚乱导致的数十年干扰后，推动小学教育。此外，在白人中产阶级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富裕的黑人，在 21 世纪早期这个人数大约有 1 000万。但是，剩下一半以上的黑人仍处于贫穷中。同时，大量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盗窃、抢劫伤人、谋杀等，然而政府似乎无力控制这个局面。南非没能免受困扰着其北面各国的种种骚乱的影响。然而，对于每年从邻近非洲国家涌进来的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来说，南非是一个非常适合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相较于其他非洲国家，南非是一块有着民主、经济契机和跨人种混合合作制度的和平的土地。

非洲的国家建设与失败的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在国家建设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新生的非洲国家进展十分缓慢与困难。这些国家的经历各种各样，但是在接下来的 10 年内，主要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独裁政府。政府经常被军队控制，

领导人在往往导致流血的武力争斗期间频繁更换。另一种是经济停滞,以及快速增长的乡村和城市人口仍然处在贫穷中。

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立刻放弃了在独立时采用的民主宪法。各民族都被剥夺了殖民时期的自治权。解放后,领导人更重视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建立一个多党制政府。权力迅速落入政治精英手中,既包括文人政客,也有野心勃勃的军队统帅。一位西非的政客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国家,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在某段时期有着至上权力的首领。如果他犯了错误,我们会在此之后再取代他”。这位政客的国家在整个非洲大陆上算是管理得最好的了。在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下,他给人民带来政治稳定,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其他非洲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了他是正确的。

在肯尼亚,乔莫·肯雅塔一直执政到 1978 年去世。他没有遭遇严重的政治竞争,因为作为肯尼亚之父,他的威望与权威是巨大的。尽管有一位来自竞争党派的重要政客被暗杀,并且凶手一直没被抓获,但暴力很少干扰到公共生活。肯尼亚获得了有序的统治和相对的经济繁荣,白人定居者与他们曾经的殖民臣民生活在一起。军队规模一直很小,出版社享有针砭时弊的自由。在肯雅塔的一生中,肯尼亚是非洲大陆上最好的例证,说明如何能在独立后拥有稳定的政府,该政府又如何保护了一个和平的社会。

其他非洲小国经过一段时期的解放,成功地从殖民主义过渡到独立自主。其中的关键就是受人尊敬的领袖与忠诚的公民之间的联合。前英国殖民地博茨瓦纳(Botswana),一个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的内陆国家,在转换过程中享有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有利条件。英国保持了殖民地化之前的部落领导模式,1966 年的独立使这些领导人具有了作为政治人物新的合法性。

324

1969 年沙漠地区首次发现藏有巨大的钻石储量。开采是私人的经济活动(尽管有一大笔利润流向了国家),这防止了肆无忌惮的政客利用有利可图的经营来壮大自己以及支持者的腰包。民主政府继续高效地运转。到 20 世纪 90 年代,钻石开采的税收不仅给全国儿童提供

了基础教育,也给全体居民带来了充足的卫生保健条件。博茨瓦纳人口的平均寿命期望值达到了70岁。由于这些福利,博茨瓦纳公民享有了可与亚洲新兴经济国家媲美的生活水平。民主领导是博茨瓦纳富足康乐的关键。

但是,在大多数新的非洲国家,威权主义政体带给人们的只有不安定和暴政。为了获取最大的权力,野心勃勃的政客们操控议会,榨取国家财产来充实自己的腰包,建立大量的、专门为自己服务和赞美自己的团体。政治自由很少或根本没有,与政权为敌的人或是被抓进监狱,或是被暗杀。加纳独立后所发生的事实说明了这一趋势。恩克努玛曾经承诺,他掌权后将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他开始废除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法律创建一种指令性经济模式。他的政党对外宣称恩克努玛是"命运的使者"和"救赎者",他修改宪法,使自己终身任职总统。恩克努玛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自己被认可为全非洲国家的领导,他帮助创建非洲联盟组织,并花费巨额的金钱招待到访的非洲国家首脑。

对于他的子民,恩克努玛的统治是一场灾难。他既缺乏有经验的官员,本身也不具有能有效利用供国家支配的资源(包括一大笔国外援助)的能力,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1966年,独立九年后,经济衰退和政治骚乱逐渐削弱了他的权威。在这一年,他自己的军队指挥官强行使他下台。加纳军队成为独裁统治的支柱,军事将领们掌控了政府。加纳人欢迎恩克努玛的下台,在全国各地人们摧毁那些赞美恩克努玛高尚领导的雕塑和肖像。

在许多非洲国家,常见的模式是政府由军队控制。20世纪60年代,在非洲国家,总计发生了40起成功的叛乱,它们由一小撮的领导人及其武装的追随者造成。在那些年,仅有少部分非洲国家新政府上台是通过民主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位非洲观察者悲哀地总结道:"我们将不再享有和平"。在政治骚乱中,人们向各自的部族寻求保护。部族的力量频繁地决定国家控制权争夺的胜利者。部族间为结果而引发的冲突成为内战的导火索。

最血腥的战争是尼日利亚的冲突。由于北方的穆斯林群体怀疑(没有实质的理由)南方的伊博人在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享有指挥权,冲突爆发。他们害怕,如果伊博人享有特权,他们自身的富足和安全就会受到损失。谣言足够引发流血冲突。在与其他部落一起居住的地区,伊博人受到暴徒的袭击。联邦政府似乎不能够保护那些逃回家乡的伊博人。由不断恶化的恶意谣言、暴乱和死亡引起的族群冲突,最终导致1966年的内战。一位伊博人将军说服他的子民脱离尼日利亚。他依靠伊博人的团结,事实证明这强大到令人惊叹。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年时间里,伊博人为建立自己的国家——比夫拉(Biafra)而战。由于尼日利亚军队在数量上超越并且包围了伊博人,大面积的土地被摧毁,饥荒威胁着全体居民,伊博人最终放弃了抗争。即使那样,伊博人的领导者拒绝承认战败,并且命令人们战斗至死。当灾难的程度被外面世界知道后,比夫拉再也得不到一丝国外援助。尼日利亚再次统一,但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面对痛苦的族群冲突的时候,国家建设成为保护一个国家微薄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的重要办法。

325

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独裁政权通常以军队统领为首,他们掌控着大部分新非洲国家。他们获取权力依靠的是手中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合法的法律批准。新的领导人常常在前任由于动乱的权力争夺被暴力推翻后出现。当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力图长时间掌权时,这个国家就能免受政治骚乱。但代价必然是腐败的蔓延肆虐和对公民自由的不断践踏。这些领导人至多能意识到国家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需求。他们的独裁行为,使之能够方便地结束国家的经济控制,让市场经济再次扎下根来。20世纪80年代,在军方统治者放弃了恩克努玛建立的指令性经济,为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自由贸易敞开了大门后,加纳经历了一次引人瞩目的经济复苏。

最坏的情况是,这些统治者毁灭了其人民可怜的福祉。1965年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扎伊尔(前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通过剥夺公共事业亟需的财政支持,囤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国家的领导人,蒙博托的个人声望给他带来了西方国

家的支持。大批的国外援助流进他的国家。大多数的资金都被浪费，流进了他在欧洲银行的私人户头。在电视演说和公共演讲时，蒙博托坚持称他是扎伊尔人民尊严和团结的保证人。他的演讲为他在自己国家里赢得了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希望，扎伊尔不同民族在一位公正的统治者带领下，能够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团结起来。但是，蒙博托没能满足这些人的希冀。

政府将兴旺的采矿业国有化。他挪用采矿业的收入用于一己私利，而不是再投资获利。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蒙博托的管理不善以及愈演愈烈的军队造反，使得扎伊尔的局面近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即缺乏有效运转的国家机器，混乱无序状态大范围存在。由于资金不足，国家行政机关瓦解，军队缺乏武器，海陆空运输减少，机场暂停运转，城市缺少警察保护、卫生系统和学校。至少在非洲地图上，扎伊尔的边境线保持不变，它的国旗也依然飘扬在联合国上空。但在其他方面，扎伊尔中止了作为一个真正国家的功能。它已经成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在这种国家里，人们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国家来得到法律、秩序和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在非殖民地化数十年后，冷战渗入到非洲地区。这是苏联和美国之间为寻找非洲盟友，以及为获取非洲珍贵的自然资源(包括铀)的竞争的结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即使蒙博托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统治者，美国仍秘密地给他运送军事和经济支援用来支撑他的政权。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爆发内战，冷战双方立即选择支持内战某一方，力图影响战争的结果。苏联顾问和古巴的军事力量得以(暂时地)帮助他们的盟友在那场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国外援助也终止了。苏联和美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积极致力于非洲人民的富足安康。当援助枯后，非洲人只剩下微薄的资源，来应付或新或旧的大面积贫困和不断蔓延的疾病。

326

非洲国家出现了小群体对独裁统治的有力反抗，他们致力于政治和公民自由，而这些是在他们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已经承诺了的。这群

人的努力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西方政府的援助对一些非洲国家的生存极其重要。1990 年,法国和英国同时声明,未来他们的援助将提供给那些尊重族群的公民自由、允许选民在民主选举中选择自己的领导、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控制的国家。实际上,在允许政党参政并承诺选举方面,独裁者们已经做出了重大努力。

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在尼日利亚,1993 年,军事统治者拒绝新选举的总统就职,他们坚称他们可独力阻止国内各族群间的仇恨爆发成新的内战。另一个六年过去后,一位自由选举出的民选总统才得以上台,然而接下来,尼日利亚却处在不断恶化的部落战争中。在其他地方,选举成了族群间相互斗争的时刻,一些部族的政治领导人利用本部落民众的恐惧来赢得选票。

族群关系和宗教情感使非洲国家国内始终分裂严重,它们不利于形成强大的国家忠诚纽带。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地处非洲边陲。为争夺权力和土地,游牧民与农民、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发生争斗。这种社会和宗教的分歧横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北部国家,从太平洋边的象牙海岸到红海边的苏丹。人口增长和荒漠扩大化加强了他们对可利用资源的争斗,例如水、牧地、农场等。部落的分割使得社会差异加重,这些部落有一些是基督教徒(主要是农业人口),其他一些则是穆斯林(通常是游牧人口)。这使得任何纠纷很容易升级成不同族群间的骚乱。

在尼日利亚,21 世纪早期见证了跨世纪的、反复发生的血腥屠杀,这一现象贯穿这个国家人们密集定居的中部地区。在这些地方,各种经济体制、族群和宗教团体原本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却见证了部落族群聚集在一起,驱逐他们中的外来者,焚烧敌人的清真寺或教堂。这个过程是某种形式的"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也就是通过消灭其他族群建立"纯种的"部落地盘。作家奇努阿·阿契贝谴责了存在于他的故乡尼日利亚的这种部落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因为出生地而歧视一位公民"。但是,他有关公民民族主义在尼日利亚得到发展的希望仍然还是对未来的乐观想象。

经济发展的失败

与政治动乱密切相关的，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未能增长到能够给国民提供适当生活水平。非洲人口激增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要猛烈，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时间里，人口增长率每年都浮动在2.5%到3%之间。粮食生产落后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在一些地区，农民自愿或是被迫去种植用于出口的农作物，而不是粮食作物。许多政府垄断农场出口，力图通过人为地降低经济作物的购买价格，侵吞农产品的国外销售利润来增加国家收入。在加纳，价格控制由恩克努玛确立，并且被后来的军事统治者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这造成了可可产量的急剧下降。出口降低了几乎一半，相应地，用来购买必要进口品的资金也减少了。由于非洲城市充斥着贫困移民，这些价格调控缩减了在基本食品上的花费，食品骚乱成为对脆弱的政府稳定的严重威胁。

政治、贸易和环境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社会贫困和经济贫穷。内战爆发时，农村人口不得不为生活逃亡，他们遗弃了村庄和田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严重打击到非洲国家，因为这剥夺了农民的收益和国家极度需要的财政收入。土地状况的恶化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明显是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拒绝适当的国家援助的结果。土壤流失和土壤耗竭成为土地状况衰退的双重标志。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这个过程直接导致沙漠扩大化。轮番的环境危机造成农作物产量和收成的下降。这些政治的、人口的以及生态的困难造成整个非洲严重的食品短缺。到20世纪70年代，相较前面10年，每户居民的粮食收成大大减少。20世纪8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80年代末，粮食总产量比70年代的水平低了20%。

尽管土地曾经是非洲财富的一个来源，但是它不再能够给这里的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对于一半的非洲人口来说，营养不良是生活实情。随着经济衰退，为了找到工作和食物，许多家庭不得不迁往城市，或者在自己国家内，或者越过边境线。由于害怕城市骚乱，政府继续压

低粮食价格，满足城市人口需求。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国的援助计划来保证低价供应食物。这是唯一能阻止严重饥荒发生的因素。

农业危机甚至殃及那些在民族解放后出现了稳固的政治领导的国家，例如坦桑尼亚（Tanzania，即前坦噶尼喀[Tanganyika]）。享有坦桑尼亚民族国家建立者声望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这块前英国殖民地的第一次选举中，被推选为总统，直到 24 年后辞职。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教育、健康和营养水平，他实施了一大批福利计划。他为他的政策所带来的相对社会公平而感到自豪。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目标，尼雷尔开始实施农业集体化（非常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庄）。村庄变成国有农场的一部分，无论村民是否支持这项改革，都必须加入农场的生产队。农民们反对国家的强行控制，并且，由错误思想指引的国家农业实践造成了土地流失与枯竭。尼雷尔糟糕的政策使坦桑尼亚的粮食产量相较于前集体化时期，减少了几乎一半。只有在经济朽烂的情况下，坦桑尼亚才可能实现平等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一位新的政治领导人中止了他那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政策，允许农民根据市场需求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和贩卖农作物。

328

农业危机是非洲经济发展失败的致命因素。跟其他因素相比，农业危机更能解释，在独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人口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并且在许多地区甚至更糟的原因。经济学数据揭示了经济停滞和衰退这一悲剧般的事实。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人均产值）少于 1%。20 世纪 80 年代实际上是经济衰退的十年，每年人均财富平均约下降 1%。一位观察者称这个年代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失去的十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来自西方国家首都的经济援助官员称，他们必须中止援助那些无效政府，并且在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上实行苛刻的条件。法国政府缩减了对法兰西非洲国家共同体的货币支持。由此造成成员国货币贬值，使各国民众不得不花费多出一倍的价钱来购买进口商品。作为贷款的一个条件，来自世界银行的官员要求非洲政府结束其对经济的失败干预，废除对价格和产量的调控政策。他们坚持

要通过改革来建立一个具有自由企业、自由价格和平衡的国家财政预算的市场经济。

为了寻找有利可图的事业，私人投资者逐渐返回非洲。外来投资者主要是被这片大陆上丰富的矿藏财富所吸引。拥有巨大铜矿的赞比亚曾经是世界上主要的铜出产地之一，只排在俄罗斯和美国后面。民族解放后，铜矿被政府接手，由于指令经济、管理不善以及疏忽，铜矿产量暴跌。20 世纪 90 年代末，政府被迫将矿区卖给一家南非矿业公司。要想产量如以前一样，矿区必须经过数年的修复。

一些幸运的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这些国家向国际石油公司敞开大门。为了获得石油开采权，它们保证向中央政府提供一大笔分红。这些收入创造了观察家口中所说的“龙头经济”(spigot economy)(“龙头”是指石油出口和大人物对金融油井的控制)。政治领导人从他们的客户那里赚取现金，而不是寻找生产性投资。国家花费增加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最糟糕的是，石油开采区爆发了小规模内战。各个族群抗议政府没能返还给他们对等的利益分红。所有这些复杂情况妨碍了非洲经济也同样能从自然资源中获益。尽管非洲政府十分怨恨外来投资者和经济顾问的存在，但是除了接受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20 世纪末，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许多非洲国家公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开始衰落。教育事业无法收到足够的资金来训练娴熟的职员。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医疗保健事业显著地提高了人口平均寿命和婴幼儿保健水平，然而面临人口激增和新的传染病，医疗保健显现了不足。其中最具毁灭性的，就是艾滋病的蔓延，它通过战争和市民骚乱扩散到非洲的许多区域。一些国家的健康专家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五分之一的非洲人口感染了能够引发艾滋病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20 世纪末，健康部门估计大约有 1 400 万非洲人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极度想要维持家庭富足的非洲移民，为了在欧洲和美国找到工作公然反抗移民法。非洲危机成为一个全球问题。

329

民族独立提出的诸多希望遭到悲剧性背叛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最

直接的责任应归咎于无能而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毁灭性的统治利益争夺中使用着政府资源。欧洲帝国的突然撤退留下权力真空，非洲各国人民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填补它。他们成为领导人滥用权力的牺牲者。遭受的经济苦难以及生活中的政治动乱，迫使他们选择依靠宗教和部族，并且不信任来自他们部落之外的或不同宗教的领导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部落主义造成一国接一国的种族战争、难民骚乱和敌对大屠杀。它源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失败。新的外来干预以联合国特遣部队的形式出现。银行家维和团在经济政策上给政府建议，外交官维和团为复原民主行为提供意见。没有更好的、能帮助非洲脱离苦难的另外一种选择出现。

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

19 世纪早期，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就已经迎来了帝国主义的结束。民族革命横扫整个大洲。葡萄牙和西班牙软弱的殖民势力很快被摧垮。欧洲移民领导了这些起义，他们成为新生国家的领导者。他们的民族观念由以下几点定义，即前殖民地的行政边界、由殖民帝国灌输的欧洲语言，以及曾经移民到新大陆的欧洲血统人口对这些民族国家的全面控制。他们新的民族共同体中没有本地美洲人的位置。

这些“印第安人”(indians)通过在农村当农民或者农场工人赚取微薄的收入。欧洲人通过大地产、矿藏、商业和工业的形式把持着国家的财富。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许多部落与世隔绝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一些部落完全不为外人所知。由于基督教信念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在大多数人中传播开来，因此，在突破团体间障碍方面，基督教取得了一定成功。照这些情况来看，美洲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亚洲和非洲已经获得自身民族解放的地区情况不大一样。

拉丁美洲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也是独特的。它的国家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都十分软弱。20 世纪早期，拉美的北部地区落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政府不定期地派遣军事力量或政治顾问，解决加勒比海地区、

中美洲的那些小国的内乱或政治纠纷。20 世纪最初 10 年,墨西哥爆发独立战争,从而脱离了美国的控制。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取消了干预主义政策,并承诺要与拉美国家建立“睦邻”(good neighbor)关系。

330

20 世纪中叶,美国仍然是拉美地区的主导力量。美国不仅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和拉美原材料的主要销售市场,而且是拉美的主要出口国和财富的重要来源。美国政府希望拉美政府意识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二战期间,许多拉美国家加入同盟对抗轴心国。冷战时期,美国利用它们来打击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济有着广泛的、有时是压制性的影响。

拉丁美洲完全属于“第三世界”的范畴。观察者用这个术语来表明,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和社会鸿沟。与亚洲和非洲地区相似,大多数拉美人口的生活非常贫困。为了解决不发达的现状,政治领导人制定了许多新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照这些情况来看,拉美地区和亚洲和非洲有一个巨大的相似点。欧洲和北美的公司控制着主要的工业,并且它们的银行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仍然是虚幻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成为拉美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事。

经济独立的诱惑

二战后,新一代的拉美领导人掌权,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第一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战争不仅扩大了全球对拉美出口品的需求,也为工业制成品打开了市场。这些新的经济增长契机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个摆脱依赖美国的机会。拉美经济学家坚称,这种“进口替代战略”(import-substitution strategy)将会使他们国家提升至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并且会改善人口居住条件。政治领导人也向各族群承诺更广泛的国家社会福利计划。这是一个有利于获胜的选举计划。但是,双赢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有一项重大并且有争议的改革,即在美国的支

持下，推行鼓励外来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政策给国际商务投资者提供免税待遇和廉价劳工，这些人主要来自北美的美国公司，他们既受到自己国家的保护，也受到拉美政府的庇护，他们将对矿藏、种植园和工业企业的所有权扩展至整块拉美大陆。然而，这些投资并没有如预期地增长。令人失望的结果，迫使拉美领导人继续依靠自身经济资源来实现他们对人民的承诺。

为求发展制定的“进口替代”计划，要求国家机构积极参与本国的经济事务。在政府监督下工作的官员设想，调控市场的专门权力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发展，它们的产品将能够替代国外进口。国家基金为优良的新工业提供津贴补助，例如飞机制造业和汽车行业。税收制度和其他的法规限制那些会危及到新生工业的国外进口。这些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英明的领导，但在充满政治倾轧并且人口激增的穷困国家，这些将很难实现。但不断增强的独立性和经济繁荣的诱惑是十分吸引人的。因此尽管其社会政策具有保守性，许多拉美政府却准备大胆实验有限的指令经济。

331

如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这些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国外的资金援助。拉美国家指望西方银行提供贷款来刺激工业增产。政府也需要贷款和国外援助来支撑改善民生的基础公共服务。经济繁荣时，出口给政府带来大量的国家收入和充足的国外贷款，但是在这之后就会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国际贸易衰退，政府拖欠国外银行一大笔难以承担的债务，并且各国政府出现财政亏损。对民间项目的持续投资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常常发现，糟糕的计划和鲁莽的买卖使他们缺乏偿还国外债务的手段。

民粹主义者的政治运动捍卫人们的社会与经济需求，他们指责政府与国外商业利益相勾结（这是惯例），要求增加国家给穷人的福利政策（这方面的资金通常不足）。拒绝这些要求的领导人激起大量反抗，而那些支持民粹主义计划的领导人虽然赢得了名气，但这是以经济混乱为前提的。20 世纪中叶，政治骚乱和经济不独立的问题紧紧缠绕着拉丁美洲。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民粹主义

由于政党之间、文职政府和军队之间的激烈争吵，19 世纪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宪法承诺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根本没有机会实行。20 世纪 50 年代，是由民粹主义同盟支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统治拉美政治的 10 年。然而，军队暴动后，军事独裁者再次上台，他们的荣耀即刻被中断。

这就是拉美三个主要国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政治命运。1946 年，胡安·庇隆(Juan Peron)被选为阿根廷总统。他向选民承诺，要终结国家财富精英的统治，并实施一大批社会福利计划。在工会的强力支持下，他组成了一个民粹主义拥护者同盟，他们都渴望让寡头政治倒台。阿根廷富有原材料和农业资源。庇隆利用总统权力来确保社会福利惠及工人。

他这些政策的政治代价是非常高的。几年之内，他的政府不得不节约开销，裁减社会计划。工人很快发起了骚乱。庇隆无可奈何，只好动员他的拥护者反对基督教会，他指责基督教会过度富足且支持他的政敌。在一个基督教徒势力强大的国家，这种行为是十分危险的。由于害怕庇隆的民粹主义计划以及不满他对基督教的攻击，阿根廷社会精英鼓动野心勃勃的军官干预这场政治危机。1955 年，他们的愿望实现了，阿根廷的军事统帅推翻了庇隆政权。阿根廷迅速从民粹主义民主过渡到军事独裁统治。

尽管有短暂的中断，独裁主义政权一直执政到 20 世纪 80 年代。军官们声称要保卫“西方和基督教世界”，事实证明他们是压迫性的和不称职的统治者，保住权力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很少关心利用国家的自然财富来改善民生。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机会溜走了，人民的不满不断增长。20 世纪初曾与欧洲一样繁荣的阿根廷，在世纪末陷入了与不发达地区相似的政治和经济困局。20 世纪 70 年代，为反抗现有政权，革命团体发动爆炸袭击、绑架和谋杀等一系列活动。他们也不关心当下的经济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暴力革命才能解救阿根廷。

332

作为回应,军事独裁者制造了许多残忍的逮捕和处决事件。成千上万涉嫌颠覆政权的人消失了,他们的名字从官方记录上被抹除。他们留下年幼的孩童,这些婴儿被官方认定为可以被领养的孤儿。但是,镇压没能够结束社会和政治动乱。由于希望赢得爱国主义者的支持,1982 年,军官们试图夺回在 19 世纪被英国占领的,位于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他们与英国的战争失败了。这次耻辱的失败使他们的统治彻底丧失了民众的信任,使他们政权的失败成为必然。不久之后,军事独裁者下台,留下一个经济贫困、政局不稳的阿根廷。

像阿根廷一样,巴西富有自然资源,但是受到政治斗争和极度社会不公问题的折磨。巴西社会精英的生活圈与穷人的世界相距甚远,一个在本国的沿海地区,一个在内陆的丛林。由于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政治尤其给政府提出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沿海地区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中心,然而,庞大的内陆地区(特别是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大部分都未受到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影响。

20 世纪 40 年代,一位强有力并且魅力超凡的政治领导人热图利奥·瓦加斯(Getulia Vargas),承担了复苏巴西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他动员了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广泛联盟,支持他雄心万丈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政策。他尤其追求工业经济的扩张。他的政府利用国家的权力和收入资助私人企业,并在石油开采、军火制造和汽车生产等关键领域创建国有企业。他的计划带来了大量的收益,他的经济政策为下一届政府提供了范例。

1954 年,瓦加斯去世,其政治继承人们承诺将继续他的“新巴西”设想。他们把仍未被开发的广袤内陆地区,变成自 19 世纪被北美大平原地带白人定居者占领以来规模最大的殖民化浪潮的目标。国家修建了 1.1 万多公里的新道路,伸入印第安人曾居住的与世隔绝的丛林地区。这些道路带来了那些想在大雨林里开拓土地用于大牧场和农场的移民。为了在荒漠地区修建新首都——巴西利亚(Brasilia),巴西政府花费了一大笔金钱,意图使它成为“可以联合整个国家的首都”。1960

年，巴西利亚正式建成。

这些庞大发展计划的支出，远远超出了巴西政府的财政资源。为了支付它们，巴西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银行，吸收了大量的国外贷款。然而，贷款的偿还给政府预算造成巨大压力。与阿根廷一样，渴求权力的军官们是唯一从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斗争中获利的人。1964 年，在保守的巴西精英支持下，他们推翻了民主政府，揭开了长达 20 年的军事独裁统治。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拉美政治生活中军事统治的盛行，造成令人担忧的旧统治形式的回归。

333

对拉美国家来说，冷战是一件遥远的事。然而，美国的广泛影响和因受到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鼓励而出现的革命活动，将这个国际问题带入到拉美的政治生活中。受冷战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太平洋沿岸的智利。出乎意料地，20 世纪 70 年代，智利成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危机的中心。

智利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典范，由于尖锐的社会改革观念问题，智利的政党分裂成保守派和激进派。1970 年，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由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领导的改革政府正式成立。他的政治影响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联盟。他们一致同意了一个激进的民粹主义方案，即快速实现本国工业和外资工业国有化。他们的目标与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政府的目标相似。纵观第三世界的改革家，他们尤其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脱离美国国际控制所吸引。古巴的行为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主义转变。这种精神不仅蔓延至乡村地区(农民们开始夺取大量的土地)，并且影响到工厂工人，他们不断罢工来要求涨工资。对这个改革方案的反对主要来自商业群体、保守党、军队以及美国政府。尖锐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笼罩着智利。

由于下定决心恢复秩序，1973 年，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领导的智利军事统帅们密谋夺取政权。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都相信国家正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美国政府拥有同样的担忧，他们决定摧毁拉丁美洲的任何社会主义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在

1973 年开始了在智利的秘密活动，利用美国支持的资金和承诺，帮助建立针对阿连德政府的反对派。虽然社会主义叛乱的威胁是虚构的故事，但在那些年，它却影响了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由于受到智利中产阶级的支持和美国的鼓动，皮诺切特将军成功地结束了智利在社会主义政府下的尝试。在暴乱过程中，皮诺切特的军队在包围总统府期间导致了阿连德的死亡。在全国各地，阿连德政权的支持者被逮捕；军队和警察未经审判处决了无数的囚犯。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智利将近 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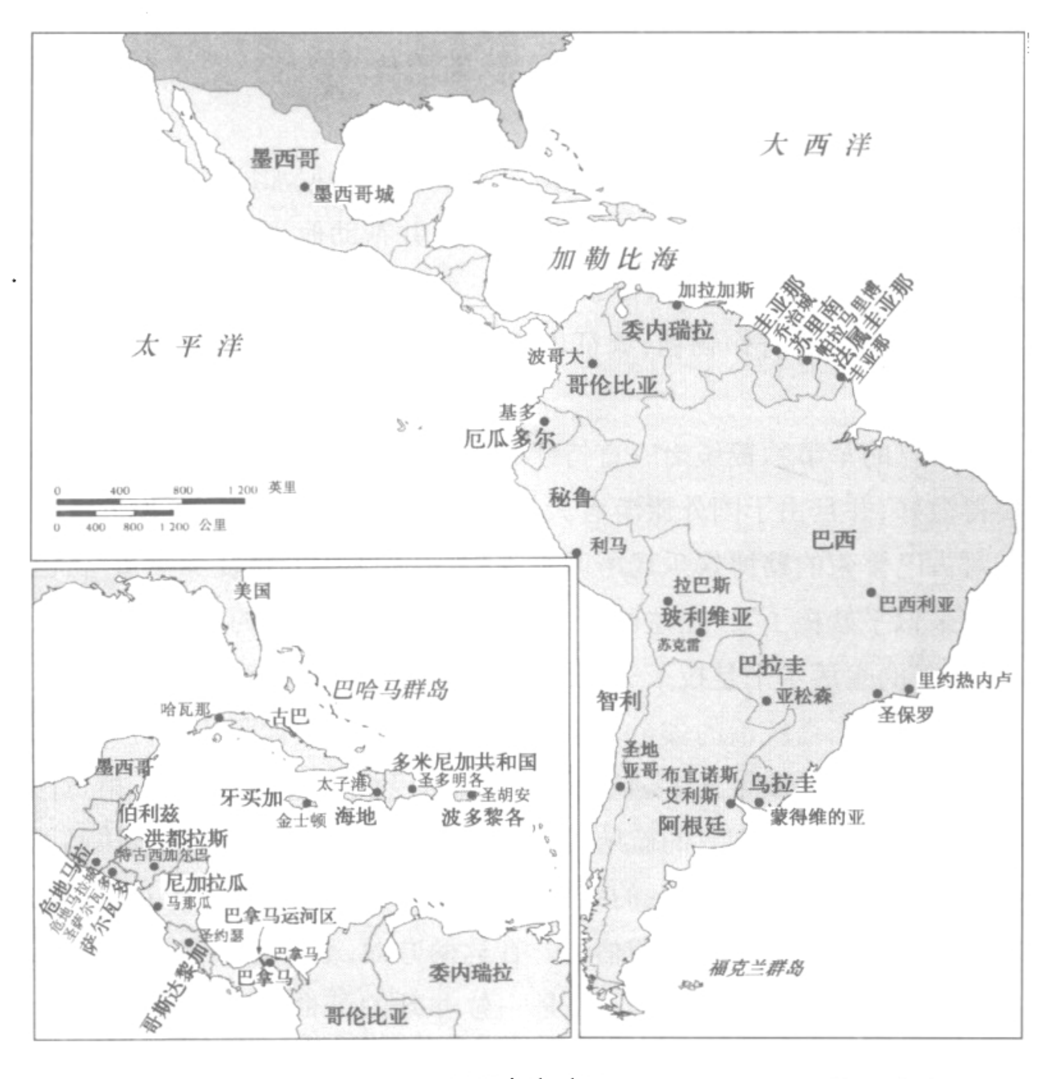
在某个方面，智利的军事统治不同于阿根廷和巴西。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智利军官们选择了资本主义策略。在暴动后的 10 年间，他们邀请美国经济学家担任实施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顾问。他们使智利政府退出诸多经济活动，并削减针对穷人的社会福利计划。阿连德的所有改革措施被抹除，作为代价，劳动人口遭受到严重的贫困，经济不景气时间延长。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智利迎来了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这个方式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利益。

美国控制下的中美洲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政府发现，中美洲地区大部分值得信任的盟友都是军事独裁者。外交上，美国企图将所有中美洲国家，包括加勒比群岛，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在内务和外交上，弱小国家必须坚决拥护美国的反社会主义、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美国将中美洲任何能够寻求得到的盟友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334 尼加拉瓜的领导人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是其中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他已经夺取国家政权，逮捕并处决了他的劲敌——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奥古斯塔·桑地诺（Augusta Sandino）。索摩查的统治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财富。与此同时，他要335 确保拥有土地的上层集团享有舒适的生活，并确保自身作为美国冷战中的忠诚盟友。像索摩查这样的统治者，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实际上是依附性政客。他们忠诚地拥护美国的外交方针，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

作为交换，他们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确保了他们的原材料能出口到美国。



当代中南美洲

20世纪50年代的古巴政治模仿了这种统治形式，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军官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他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独裁者，并于1940年提出一部民主宪法后成为总统。由于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在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灵活地应付来自华盛顿的政治之风。战争年代，他注意到了美国民主重建的需求。1944年，他暂时退出了政坛。民主政府的时代只持续了8年。20世纪50年代

早期,巴蒂斯塔意识到,只要他们支持冷战政策,美国会再次容许加勒比海势力范围内的独裁者。他对权力的欲望仍然和从前一样强烈。1952 年,在古巴军队的支持下,巴蒂斯塔夺取了政权。这一年的选举没有如期举行。他取缔共产主义政党,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美国不再提出其他要求。

巴蒂斯塔对美国侧重点的理解是正确的。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一样,美国给巴蒂斯塔提供大量的武器援助,并帮助他训练军队。在对外政策上,他的国家与美国保持紧密一致,并且与美国的投资者合作。主要销往美国的经济作物糖,象征着古巴对美国持续不断的政治和经济依赖。

古巴的军事独裁统治一直持续到 1959 年。在这些年里,糖在美国卖得很好,并且由于国外旅游者大量涌入,古巴的经济得到了发展。由于对古巴繁荣的赌博娱乐场所印象深刻,一位美国的赌徒惊呼道"古巴的未来似乎妙极了"!在这段繁荣时期,许多中产阶级的古巴人获利巨大,古巴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最高的。然而,经济的繁荣不足以保证巴蒂斯塔统治的安全。事实证明他是一位不称职和不得人心的统治者。古巴民族主义者谴责美国在古巴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指责巴蒂斯塔是屈服于美国人的新殖民主义者。巴蒂斯塔依靠军队来压制民众骚乱,但镇压政治反对派的结果,只是激起更多的反抗。他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的支持充满信心。在这两方面,他都算计错误。

造成古巴独裁者下台的人,是一位非凡的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一名成功的蔗糖种植业主的儿子,卡斯特罗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孩提时期,他没有遭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并接受了专给富有的古巴青年人的教育。但是,他的政治信仰却是成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名律师,20 世纪 40 年代末,卡斯特罗进入古巴政坛,他主张脱离美国实现独立,以及进行政治改革。在那些年里,他与其他有抱负的青年政治家没什么不同,卡斯特罗后来称自己生命中的这段时间为"资产阶级的奴隶"(bourgeois thralldom)。国家法定选举被定在 1952 年举行,卡斯特罗准备发起活动竞选官职。但巴蒂斯塔的

军事政变中断了这些计划。在极度失望的竞选者中就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将卡斯特罗从政党政客转变为一名革命的领导人。

1953 年初,卡斯特罗召集了 150 名追随者,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他们团结在一起支持被随意命名为“革命”(Revolution)的行动。他们承诺,要恢复 1940 年宪法,要实现“以经济和工业发展为前提的、完全的、不可更改的社会公正”,要摆脱“任何与外来国家的联系”,意指与美国的关系。强调社会改革和反抗美帝国主义,构成了卡斯特罗政治思想的核心。这是由革命热情、对美国控制的反抗以及对古巴穷人需求的关心构成的不切实际的混合物。这后来成为他革命的中心。然而,卡斯特罗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远远超过了他能采取的行动手段。1953 年中期,他领导小部分追随者鲁莽地攻击巴蒂斯塔政权。他相信正义站在他这边,古巴人民已经准备好在他领导下起义。然而他错了。卡斯特罗的起义被军队轻易地镇压,他自己被逮捕并且被判以长期监禁。

336

卡斯特罗推翻古巴军事独裁统治的决心是顽强无畏的。1955 年,政府实行大赦,卡斯特罗逃往墨西哥,并组建游击队,力图再一次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他的革命队伍被称作“七二六运动”(是他第一次起义的日期),他们寻求与准备武装反抗反巴蒂斯塔的力量联合。由于巴蒂斯塔逐渐加强了对古巴的控制,新的起义成为一项冒险的事业。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游击力量已经尝试从独裁者手中夺取政权,一些甚至取得了成功。但拉丁美洲没有出现类似规模的运动,而美国也许实在是一个劲敌。

卡斯特罗的革命

1956 年末,卡斯特罗和 8 名战友返回古巴,展开他们第二次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这一次,在古巴东部山区,卡斯特罗成功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到这时候,反抗独裁者的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包括政治对手、工人联盟和许多农场工人。一年之内,卡斯特罗将自己的小军队

发展成一支组织有序的 300 人战斗队,这支军队受到大多数古巴城市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支持。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Raoul)并肩战斗,劳尔是一名古巴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卡斯特罗忠诚的助手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者。一名叫做厄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年轻阿根廷医生也是卡斯特罗的战友之一,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们是精力充沛的、强有力的起义领导人,他们在古巴群众中找到许多反感巴蒂斯塔残暴统治的支持者。游击活动为卡斯特罗夺取政权提供了重要条件。那些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后来都成为了革命古巴的领导人。

由于不信任卡斯特罗的革命和反帝国主义计划,美国希望古巴人能够找到其他解决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方法。1958 年,美国结束对巴蒂斯塔政权的军事援助,这明显是后来其失败的原因之一。美国期望,古巴会出现一个能够团结广泛的政党联盟的新政府。但是,它没有公开谴责卡斯特罗的行动。美国的沉默帮助卡斯特罗赢得了古巴人的支持,并且由于想要结束古巴的独裁统治,美国准备忽视他激进的改革理想。美国对古巴战争的不干涉政策,使古巴人拥有了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权利。事实证明,战争的结果一点儿也不是美国领导人所期待的那样。

1958 年,巴蒂斯塔政府迅速垮台。此时,卡斯特罗已经建立了一个在他领导下的广泛联盟。那年秋天,一小部分起义军在全国各个地区采取行动。在市区,一支城市游击队——市民反抗军,攻占了警察局和陆军部。11 月,由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离开乡村攻向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巴蒂斯塔的军队溃败逃散,他的军官四处逃命。巴蒂斯塔找不到任何人来保卫他已失去信用的政权。1959 年 1 月 1 日,他放弃权力,逃往国外。紧跟在他后面而来的是格瓦拉的起义军。一个星期后,已经走遍了整个古巴的卡斯特罗来到这里,他受到了成千上万古巴人英雄般的欢迎,32 岁的卡斯特罗成为了古巴领导人。

337

古巴的政治革命不同于拉美地区曾经发生过的任何革命。小规模农村游击队领导的武装起义终结了军事独裁者的统治。这次革命的领

导力量——“七二六运动”,仅仅控制着改革计划的大纲,并且不对其政治盟友实行控制。在一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国家,卡斯特罗自己的武装人数甚少,支持他们的是一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卡斯特罗最珍贵的盟友是共产党,该党大约有1.5万名成员,效仿苏联共产党实行中央集权领导。它和卡斯特罗一样,反对美国控制,并且给卡斯特罗提供骨干精英参与组织大规模运动。参与起义的各组织联盟没有共同的目标。真正的团结来自卡斯特罗的领导。新政权的核心力量都来自起义军。这是1959年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数年,古巴仍然保持这种状况。

横扫古巴的革命,与战后数十年发生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古巴的结果却是独特的和出人意料的。在巴蒂斯塔倒台后的3年内,古巴经济在一种指令性经济体制下运行,这种体制与苏联情况相同;同时,整个国家由一党专制,这一点受到苏联的支持并且依赖苏联。最重要的是,古巴突然之间处在了冷战的前沿。卡斯特罗为获得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依靠苏联的决定,削弱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岸的影响力,并将古巴引向二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国际危机。

从革命的第一年开始,卡斯特罗就是古巴政治的中心人物,巩固政权成为他的第一个目标。他的第二个目标就是通过激进改革来提高古巴底层阶级的生活条件。他的第三个目标就是退出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许多方面,他的目标与其他拉美地区民粹主义运动的追求相似。卡斯特罗的纲领吸引了许多古巴人,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对这些人来说,卡斯特罗是他们不容置疑的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决定保持对新国家的政治控制权。1959年1月初,他来到哈瓦那,警告说,他不会听任古巴新领导层“像过去许多漫无目的、相互争斗的革命者那样”行事。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将任何可能挑战自己领导地位的组织群体从权力层中驱除出去。

在两个月之内,卡斯特罗正式成为革命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渐渐地,政府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落入他“七二六运动”的同事手中,自由选举不再举行。1961年,卡斯特罗正式废除了1940年宪法,

声称“对于我们说来，它已经太过时，太陈旧了”！实际上，卡斯特罗不允许自由选举和公民自由，以防削弱他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苏联模式的中央集权领导开始形成。卡斯特罗和他周围的人都意图以共产主义一党制为模型来建立新政权。曾经被巴蒂斯塔支持者控制的工会领导权，过渡到共产主义者手中。政治反对派被新的秘密警察告发，这个机构以“革命”的名义实施行动。国家利用严格的审查制度，控制古巴的出版社、广播和电视。卡斯特罗称自己的统治为“人民直接管理政府”，但权力实际上属于前游击队的领导人。

338

革命结束后，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斗争立即拉开序幕。这源于 1959 年卡斯特罗为实现他所理解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理想的早期努力。为救助城市的穷人，他将房租降低 50%，电费也同样削减一半。5 月，新政权下令剥夺所有超过 1 000 英亩的大地产，其中包括所有主要由外国公司控制的蔗糖种植园。部分领土分给穷人和无地农民，然而最大的种植园却变成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场。尽管美国政府强烈反对，但在这一年余下的全部时间里，古巴继续对国外企业实行国有化。

古巴革命者决意让自己的国家脱离美帝国主义的控制。1959 年，卡斯特罗称古巴将采取新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他谴责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对古巴资源的资本主义掠夺。新的古巴领导人努力寻找脱离美国势力范围的办法，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仍然和以前一样依赖蔗糖出口。蔗糖销售给古巴带来收入，这些收入对于资助昂贵的改革计划是必不可少的。数十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合理的价格定期大宗采购蔗糖来援助古巴经济(和国家)。严格地从商业角度来看，古巴依赖美国经济。

卡斯特罗决定向美国提出一个大胆的、不同寻常的有关间接援助的要求。他采取的方法是，要求美国将蔗糖购买量增加一倍，并且把价格提高 20%。他的做法是在公然要求分享美帝国主义者的财富。这是一个轻率的行为，这与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责相矛盾，这也体现了他力图改变古巴的革命热情。由于不相信古巴革命者已经超出控制，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重新商议蔗糖协议，并且要求古巴对美国企业的

损失做出赔偿。

古巴革命者不是退缩,而是加快了脱离美国控制的步伐。他们转向共产主义国家寻求被美国拒绝的经济和外交援助。他们成功了,苏联领导人乐意通过援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获得将其新的第三世界政策传播到拉丁美洲的机会(参见第七章)。1960 年 2 月,苏联签订协定,定期购买古巴蔗糖,提供给古巴大量贷款,允许古巴购买苏联的商品、石油和军火。卡斯特罗认为这个条款是古巴民族主义的胜利。苏联石油必须在古巴提炼,卡斯特罗命令美国人开的提炼厂合作。在与华盛顿协商之后,石油公司拒绝加工这些“红色石油”。1960 年 6 月,卡斯特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卡斯特罗的决定成为美古关系的破裂点。美国政府停止所有对古巴蔗糖的购买,1960 年末,又宣布完全禁止与古巴的贸易。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了经济战。作为报复,卡斯特罗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所有财产。后来,没收范围又扩大到所有剩余的私营工业、银行和交通运输业。1960 年末,贸易和银行、大部分的工业和运输业、三分之一的农业土地都归国家所有。

古巴领导人此时决定控制整个古巴经济。他们以苏联为模板,仿效苏联的指令性经济体制。他们颁布加强指令计划的法律,在全国农村建设集体农庄,利用国家收入发展国有企业。这些决定是仓促的,他们缺乏有经验的人员和能够支付这一巨大工程的财政收入。他们向苏联大量借贷,并欢迎苏联经济顾问帮助建设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这些举措,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在外交上和经济上依赖苏联。

339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计划终结这个距离它海岸线如此近并且支持苏联的国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发动一场潜在的入侵。1961 年初,新当选的总统约翰 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公开警告称,古巴正在演变成“共产主义在加勒比海的第一个基地”。他的冷战策略仍然是遏制政策,到此时为止,已经扩大到包括针对疑似苏联盟友的国家。他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提出的美国支持反叛者入侵古巴的计划。他对中央情

报局的行动充满信心，认为卡斯特罗的不得民心和古巴国内的大量起义将有利于小规模反叛势力入侵古巴。

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错了。1961 年 4 月，由美国军舰送到猪湾(Bay of Pigs)登陆准备入侵古巴的 1 400 名反叛者，在登陆海滩遭到狙击。新的古巴军队迅速击败了这群入侵者。在内陆地区，古巴警察局立即逮捕了可疑的反叛势力支持者。这次入侵最终沦为一次糟糕的并且无意义的行动。胜利带给古巴革命者比从前更大的声望。他们击败了“美帝国主义”势力。

然而，面对着强大的邻国，他们的政权仍然十分脆弱。他们不得不预先防备美国的另一场入侵，毫无疑问这将比第一次更集中、规模更大。这个原因促使卡斯特罗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联盟。卡斯特罗有关全球革命势力的理解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他认为，古巴已经加入了第三世界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场对抗中，古巴的敌人是美国。他断定，古巴既属于第三世界，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1961 年 11 月，卡斯特罗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他发表声明称“我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直到我死去，我都一直是”。这是一份有关信仰的誓言，等同于直接向苏联请求保护。

苏联领导人只是部分地答应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想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但不管是苏联还是华沙公约组织(共产主义国家军事同盟)都没准备好采取这种冒险行为。相反，1962 年春，苏联政府提议在古巴境内安置短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将由俄罗斯人负责安置和管理。卡斯特罗同意了，认为在与帝国主义对抗中他的国家获得了军事保护。1962 年秋，导弹以及随行的苏联技术人员和防空部队秘密地到达古巴。美国军事侦察机构发现了这个秘密。美国要求立即撤除导弹，并威胁有必要将入侵古巴。古巴导弹危机拉开序幕。(参见第七章)

为了结束这场危机，苏联政府同意从古巴撤除军事装置和人员。它得到肯尼迪总统的承诺，即不再利用美国的力量或者反古巴势力，发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军事行动。全世界大致都赞成这个和解协定，它避免了核战争。卡斯特罗并不满意和解。他的政府只获得了美国不

再干涉的承诺。最糟糕的是，卡斯特罗对危机解决没有发言权。在没有他批准的情况下，苏联导弹迅速从古巴撤除。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他的国家从前沿地位退居成配角。

340

重点：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成员。这是一名记者的发明，他压根就没想到这个用法会如此成功。对他来说，这个词似乎有力地描述了新独立国家的情况，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既不像西方民主国家也不像共产主义东方。该词的用法很快流传开来。新独立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利用这个词，凸显他们国家在后殖民世界的重要性。激进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将这个词的含义进一步发展，意指全球所有脱离西方"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地区。换言之，在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瓦解后亚非拉民族未来的思想辩论中，这个术语变得十分有用。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个词最有意义、最不受争议的含义，是指工业化地区和非工业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安宁方面的巨大悬殊。在后殖民时代，一些地区享受着相应的繁荣，但许多国家的民族却处在极度贫困中。每当民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政府互相争辩，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理念才是对人类进步的最好指导，第三世界则呼吁双方注意他们民族的迫切需要。

这些需求体现在许多方面。证据表明，在亚非国家，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民族处于完全贫困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缺少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贫困地区，由于母婴医疗保健的不足，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1岁。用人类尺度来衡量，这些地区的生活条件确实看起来属于另一个世界——"第三"世界。

经济学家对这些国家不发达的分析，是基于其在发展经济和谋求社会安宁道路中出现的障碍。他们强调，这些地区用于工业化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例如电力和公路，同时又缺乏能够支撑公共服务的专业

技术人员。他们强调，亚非拉大多数民族赖以生存的农业用地产量极度低下。他们告诫，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国家，缺少资金购买必要的工业产品和新技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如此。他们也强调这些国家教育不足，最多只有 50% 到 60% 的人口拥有很低的读写能力。数据为这些国家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即它们的人口将面对与他们祖先一样充满苦难和疾病的未来。外来援助似乎是唯一能够打破这个地狱式循环的方式。

部分是因为不结盟国家组织的成立，使得这种需求成为经济援助计划的基础。1955 年，这个组织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首次召开集会。印度总理尼赫鲁驳斥了“某些大国”（指美国和苏联）关于“他们的矛盾是世界的矛盾，世界必须服从他们”的观点。在他看来，前殖民地国家不应与任何一方“结盟”，它们有着自己的需求，最紧迫的是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援助。联合国成为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赖以发出政治请求呼吁的论坛。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不断增长，并最终占据了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的大多数。针对它们的请求，联合国发起一个名为“十年发展”（Decades for Development）的计划。第一批计划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它邀请富有国家，每年至少捐献国家收入的 1% 给针对发展中地区的经济计划。这些从前都不曾尝试过。

341

这些求助促使一大批国家政府启动自己的援助计划。它们这样做，部分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部分是为了回应冷战竞争中它们在新兴国家中的盟友。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政府贡献最大。美国针对拉美的援助计划——“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援助资金。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击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呼吁中南美洲革命的行为。苏联援助通常是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例如帮助埃及政府在尼罗河流域的阿斯旺修建大坝。捐赠者之间的竞争有时会导致不同寻常的结果。大约在同一时间，印度获得了三座独立的钢铁厂，分别由美国、英国、苏联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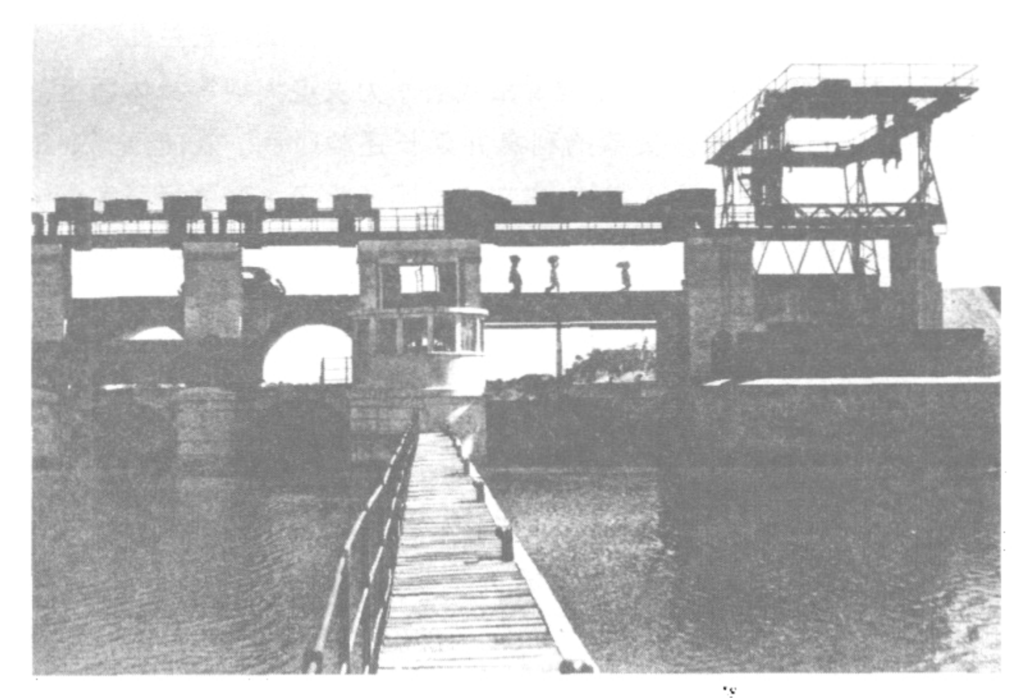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针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迅速增长。法

国政府的经济援助计划直接用于那些新领导人选择加入法兰西共同体的前殖民地国家。针对提议修建道路或者水力发电大坝等具体项目的政府，世界银行降低大宗贷款的利息并延长还款时间。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收入增加，中东产油国成为了主要的捐赠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基金或贷款形式的经济援助，成为国际组织和工业化国家的长期义务。

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国外援助计划下，为打破贫穷和经济滞后循环付出的努力，在有些地方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其他一些地方则以惨败收场。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这些成功或失败单独归因于国外援助，因为当地和私人的负责机构发挥着主要作用。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计划有时候非常起作用。举个西方农学家的例子，例如著名的诺曼·伯劳格(Norman Borlaug)，他发明了许多新型高产的小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品种。农学家们的成功研究大大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观察者称这是“绿色革命”的成果。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引进新的农作物，在接下来的 20 年内，印度农民在没有开采新耕地的情况下将小麦产量提高了 5 倍多。伯劳格告诫，除非印度人口激增停止，否则这些“神奇作物”将只能给这个国家提供不超过 30 年的足够食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饥荒暂时得到了遏制。

其他一些国家在工业和商业方面获得了卓越发展。最令人惊叹的转变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韩国和台湾曾经都是穷困地区，大部分土地用于农耕，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它们都成为了重要的工业中心，销售在全球市场流通的综合电子产品。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和日本一样高，并且都追随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管如何衡量，它们都不再属于第三世界范畴。 342

在其他地区，严重的障碍阻挡了经济发展的道路。第一，工业化国家不愿再持续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很少有国家达到了每年将其国家收入 1%或以上的水平用于援助。第二，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日渐恶劣。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为获取更大市场份额，贫穷国家扩大产量，导致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大降低，有时



对非洲来说太复杂的科技：灌溉水坝，马里共和国(African Pictorial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甚至降低了50%。第三，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和基金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能力偿还这些欠款。20世纪80年代，由于出口价格下跌，贷款利率上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负债累累，它们只能够支付贷款利息。在这些绝望的情况下，它们缺乏用于自身发展计划的资金。

343 第四个障碍是指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糟糕的政治领导人。政府提出冒险的经济改革方案(经常以共产主义经济为模板)，浪费了从国外非生产性援助计划中获得的资源。其他一些政府则沉溺于大规模工程，例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坝，消耗了大笔本该用于解决更紧迫需求的资金。评论家认为，从长远看来，简单的技术革新更适合贫穷国家的人口和资源利用。"小而美"是某位经济学家的格言，他支持适中的技术进步。显而易见，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府不能够通过国家政策，制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成就。它们的努力更适合用于实现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可持续性"增长，这给它们的经济和资源带来稳定的、小规模的发展。

最严重的经济发展障碍来自这些国家疾病预防政策的成功。终止

传染病，根除携带病菌的昆虫和改善医疗保健体制的努力，迅速提高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直接的后果是这些地区人口激增。从1950年到1990年，世界人口总数增长了一倍(从25亿到50亿)。快速增长的人口耗尽了缓慢增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这导致一些国家，例如印度，1990年的人均食物拥有量还不比1950年多。



草根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赞助的烹饪技术(UN/DPI Photo by Kay Muldoon)

第三世界正在发生转变。在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的企业家阶层。他们像富有的西方人一样，逐渐与穷苦大众远远地脱离开来。富人与穷人、发达与发展中、丰衣足食与穷困挨饿之间深刻分化这一世界基本问题，持续到了20世纪末。第三世界仍然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存在。

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

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数十年内，拉丁美洲逐渐发展成经济发达的地区，民主政府或多或少地成功解决了各自民族的要求。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军官们是如此无能，以至于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有关工业发展的经济计划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日渐安宁，数百万的家庭拥有较少小孩，因此，新增人口数量也显著降低。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第三世界内，拉丁美洲不再属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的等级。

344

南美洲从独裁统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压力来自三个

新的、独特的趋势。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作为革命领导人的才干,加强了社会对拉美寡头政治的反抗。1962年初,在他的哈瓦那第二声明中,卡斯特罗提出了有关第三世界革命的指导方针。他将古巴放在“向上行进的历史”的领军位置。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古巴是关键一员,因为“古巴革命表明革命是可行的,人们能够成功”。他将自己的国家提升为全拉丁美洲革命起义和经济发展的模范。为了回击卡斯特罗的计划,中南美洲各政府比以往更注重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努力增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由于害怕革命,被迫做出资助拉美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决定。肯尼迪总统的“进步联盟”,试图援助拉美地区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它们提出要自己决定本国的发展计划。美国向那些顺从的政府保证经济和财政援助,接下来的10年内,总援助金额达到200亿。美国顾问十分鼓励拉美领导人对富人课以重税,这有助于支付那些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计划,也鼓励各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分配农田给农村贫民和无地工人。美国政府也增加了军事援助,旨在镇压类似导致卡斯特罗上台的游击队活动。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担忧怎样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天主教会做出了在社会改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决定。1958年当选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发起了一场他称为教会的“再度觉醒”运动。在1962年到1965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教会同意了他这个大胆的提议。这次会议批准的许多改革和政策,对全球经济不公平问题有特别的意义。这些决议说明了,天主教神父的职责是照顾贫困的下层社会人群。这次会议注意到“全人类”的需求,号召教士和信徒在社会和经济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帮助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群。它鼓励国家福利政策,并表明在这个庞大的任务里,信徒必须创建专门的援助组织。天主教会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它的计划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另一种方式。

天主教会号召所有友善的人致力于和平和社会公正,这在天主教

徒中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在好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会是拉丁美洲各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宣扬服从国家和尊重社会精英,天主教会曾经扮演了一个非常保守的角色。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再度觉醒"改变了一切。1968 年,为了使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所作的决议生效,所有拉丁美洲的主教举行了一次集会。当着教皇的面,代表团制定了天主教神父和普通教徒的社会活动准则。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在梵蒂冈会议上业已确定的那些,即立基于正义之上的和平需求,通过社会行动和大规模社会改革实现人类进步。

345

尽管不能被轻易估量,但是这些决定的影响是深远的。没几年,大约有 100 万主要来自贫穷的工人阶层的巴西天主教徒,加入宗教协会(被称作"cebs")从事地方改革行动。20 世纪 70 年代,在压抑的军事独裁时期,它们是巴西唯一的民众政治活动。这些决定在天主教教士中也同样影响深远。尽管上层主教反对改革运动,但是其他一些主教和牧师开始站出来反对贫穷和不公正,有时候,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当卡斯特罗的拥护者呼吁马克思主义革命时,天主教会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理念。

古巴革命后的 30 年,是拉丁美洲向民主和经济增长过渡的时期。老百姓对更好生活条件的需求促使各国军方和文职领导人重视经济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经济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材料价格很高,并且银行乐于提供贷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支持反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对拉丁美洲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

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典型特征,军事独裁统治被证明是短命的。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有独裁者都下台消失。大部分是由于人们反抗他们的压制政策而被迫辞职,并且经常是由于他们无力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利息上涨,国际商品价格下跌。旧式的原材料出口和国外银行贷款不再起作用。国家补助减少,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许多拉美政府欠了国外银行和国际

信贷机构如此多的钱,以至于它们不得不拖延支付还款。各国领导人不再指望新的贷款。由于缺乏外来援助,拉美各国不得不实行严厉的财政和经济紧缩措施。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超出了军事统治者有限的能力范围。

智利的情况是个例外,主要因为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财政紧缩和自由市场的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正当其他军事政权面临着同样的政策选择的时候,皮诺奇特的决策给智利带来大量的经济回馈。即使这样,处在不断增长的民众反抗压力下的智利军事政权,最终使国家回归到了议会民主制。面对日趋激烈的、对他独裁统治的抗议,1988 年,皮诺切特最终允许实行自由选举,主要是就军事独裁统治和民主选举领导层之间做出选择。选民选择了民主和文官统治。到这时为止,在这个正在严重经济危机中挣扎的地区,智利获得的经济富足仍旧十分显著。

那 10 年巴西面临的危机使困境的根本原因变得十分明显。文官政府在穷人中实行财富再分配措施的失败引起社会动荡,导致 1964 年曾结束巴西民主政权的军事暴动再次发生。新军事独裁者残酷地处理了革命者的抗议,并削减了社会福利计划。通货膨胀暂时缓解,国外债务也得到偿还。

巴西军事政权的领导人继续实施 20 世纪 40 年代发起的国家支援发展的政策。他们提供财政补助给工业家和牧场主,并且向国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他们想要为保守的巴西投资者和企业界扩大经济机会。他们开始实施一项有关亚马逊地区发展的宏伟计划。该区域仍然有大面积荒地,主要居住着印第安人和一些移民。在开采亚马逊河流域的过程中,他们期望来自巴西最穷地区的移民能涌入这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动乱将会减少,国家经济也会繁荣。这一野心勃勃的经济增长计划需要巨大的成本,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也不考虑这个计划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他们的目标具有政治性,希望加强本国的独立性和国际影响力。但他们的愿望是一个空想,这个计划也非常的不切实际。

346

他们的计划确实实现了部分目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亚马逊河流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和牧场主。但是,亚马逊发展计划造成向殖民开放的森林无法控制地大面积被毁。最具影响力的移民是牧场主,他们渴望获得广阔的公开土地。在这个边缘世界里,他们制定规则,甚至下令暗杀那些抗议他们掠夺土地的直言不讳的人。伴随着牧场主的踪迹,小农场主也来到这里,他们想要尽可能快速并且廉价地榨取种植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作物的产物,这块土地很快就被耗尽。这两群人共同烧毁了大面积的热带雨林。这种破坏,对于亚马逊河流域的居民,特别是印第安人以及依靠这片森林而活的人,例如割胶工人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同样严重的是,热带雨林消失,给这个独特并且生机勃勃的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的威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焚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有时候烟雾覆盖了整个亚马逊地区。"绿色和平"等环境保护组织,发起了一项阻止进一步破坏热带雨林的国际运动。

由于军官鲁莽的经济政策,巴西不得不付出了高额的经济、生态以及社会代价,军事政权最终被迫放弃权力。由于缺少偿还手段,国家深陷债务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预算赤字造成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和财政不稳定。同时,巴西累积了将近1 000亿的国际债务,高于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不再能够应付自身的债务,财政紧缩的措施却只加强了民众的反抗。贫困人口没有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天主教会开始公开声援贫民的需求,并且支持保护梵蒂冈集会改革计划的抗议活动。其他政治运动也同样日益活跃。1985年,面对反抗,军事政府决定退出政坛,允许自由选举。

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一个新的民主选举的政府接掌了巴西政权。它开始逐步处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经济性能的不足。它的解决办法就是复兴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几年之内,政府放弃了国家支援发展的政策,逐步向国外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并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卖给私人投资者)。政府承诺减少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并且在1992年主办了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尽管社会不公和政治不稳仍然

是巴西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那些危机似乎已经结束。

347 ## 墨西哥的新民主

墨西哥选择了和其他拉美国家同样的，通往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制度革命党的一党独裁政权就一直存在。20 世纪初的政治骚乱后，该党给墨西哥带来了稳定。代价就是墨西哥失去了政治自由。一位墨西哥评论家称该党的政权为"完美的独裁统治"，因为它"通过任何有用的手段有条不紊地镇压了威胁其统治的异议"。表面上，墨西哥政治民主，拥有选举出来的总统和议会，但实际上，每一任总统的上任都必须得到制度革命党的同意。新闻报纸暗地里收取了该党的资助金，作为回报，它们只出版独裁政权提供的消息。表面上，政权稳定，整个国家一片安宁。

在这些表象背后，像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制度革命党的独裁统治开始衰败。腐败四处蔓延，有权力的团伙向美国走私毒品，贿赂警察和政党头目。银行家和实业家发现，只有贿赂当权官员，他们的生意才能兴旺。曾经激励着后革命时期墨西哥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热情逐渐消散，现在的政权主要用来维持该党政治垄断和充实它的支持者的腰包。

在使国家成为经济生活的关键一员方面，墨西哥政府选择了和其他拉美国家同样的方法。国有公司控制着墨西哥庞大油田的石油开采和提炼业务。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国外石油销售价格增长，改善了墨西哥的财政预算，导致国外银行乐于发放贷款。政府拨给一些重要企业大笔的补助金，并且利用关税和其他手段阻碍外国企业竞争。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终结了这个繁荣时期，墨西哥经济陷入危机，国家没有能力偿还自身的国外贷款。政府在经济独立方面的尝试，不能够满足墨西哥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到 20 世纪 80 年代接近 9 000 万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墨西哥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涌向美国的非法和合法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制度革命党内部，一些领导人像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改革派

领导人一样，认为国家的幸福安康来自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同样的时期，他们决定，自由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扩大化才是墨西哥经济复苏的美好希望。他们这个大胆计划的成功依赖于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改善。1994 年，墨西哥政府同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与美国和加拿大在一起。在接下来的一年，富有的墨西哥人和国外投资者突然在国际市场上抛售墨西哥货币，改革家们由此意识到这些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已经开始缓慢下降的比索价值突然暴跌。美国政府的大笔贷款，帮助墨西哥政府在接踵而来的财政危机中避免损失，这也使墨西哥政府摆脱了拖欠所有外国贷款的噩梦。在这些情况下，财政和商业日益互相依赖，墨西哥进入了与它从前的北方敌人合作的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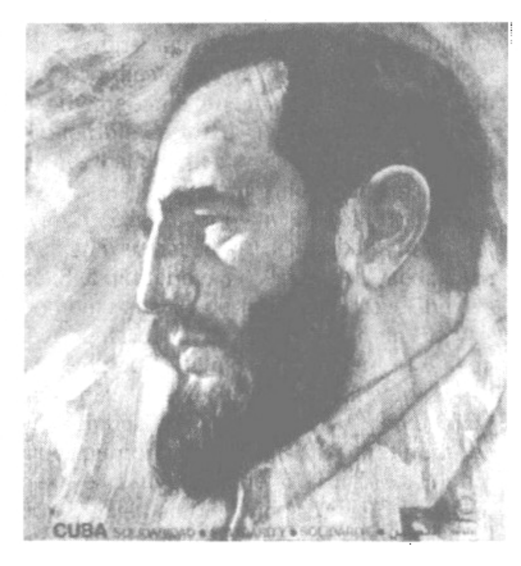
改革家认为，如果想要经济复苏计划取得成功，他们必须开放墨西哥的政治系统，实行自由选举。这个改革计划遭到制度革命党官员的反对，这些人利用公共财产充实了自己的腰包。他们担忧，当选民有机会选择敌对党候选人时，顽固的制度革命党领导人将会失去权力。这是一个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暴力的过程。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墨西哥政府同时实现了自由市场的改革和民主权力的复原。制度革命党的改革派领导人正式宣布放弃对政治权利的垄断。1997 年，将近一个世纪后，反对派首次赢得了墨西哥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三年后，2000 年总统选举获胜的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来自改革政党。在这个被称为和平革命的改革中，制度革命党放弃了它的“完美独裁”。到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民主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确立了下来。

348

古巴、中美洲和美国人

尽管 1962 年导弹危机后，古巴一直处于美国经济贸易的封锁之下，但是，古巴政权不再面临美国军事入侵的威胁。卡斯特罗可以自由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他的改革方式不稳定，在接下来数十年，改革的结果也令人失望。古巴定期收到苏联大笔的援助，包括对古巴经济至

关重要的廉价石油和小麦。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每年对古巴的援助总计将近 50 亿美元。军事上,苏联援助古巴大量军火和顾问。因此,卡斯特罗能够派遣武装力量前往非洲,援助那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第一次是 1975 年的安哥拉,然后是 1978 年的埃塞俄比亚。这些军事冒险行动是卡斯特罗在国际事务上的最大成功,使他恢复了信心,相信共产主义古巴仍然是"向上行进历史"的一分子。



菲德尔·卡斯特罗崇拜:"古巴团结"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卡斯特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给古巴人带来了大量社会福利,但也使许多人对独裁统治和指令性经济感到不满。20 世纪 70 年代,古巴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古巴没有经历像巴西一样的极端富有或者贫困。古巴女性拥有比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女性更多的机会和权力。古巴社会革命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婴儿出生率下降,在整个拉美地区是最低的。然而,女性的解放并不是全部原因,为了支撑家庭开支,大部分女性必须在这个饱受消费品短缺折磨的经济体中工作。

资本主义美国的生活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家庭都有在卡斯特罗革命后离开古巴的亲人。大多数人住在靠近古巴的地区,例如佛罗里达州;由于它的古巴定居者,迈阿密大部分地区被叫做"小哈瓦那"。1979 年,古巴人获得了移民美国的机会,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仍然有一小部分人乘坐小船非法逃出国,大部分船只在古巴和佛罗里达之间海上的暴风雨中沉没。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苏联倒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即使这样,卡斯特罗仍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在古巴的刊物上,出现了这样一句标语:"社会主义或者死亡!"

349

在中美洲,天主教徒、改良派和革命家都开始反抗顽固的社会和政

治上层集团。每个群体都选择了一种不同的反抗方式。1968 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后,天主教教士带头谴责军事统治和经济不公。当情况恶化时,一些教士甚至公开声援起义暴动,认为它是唯一能够实现自由和公正的手段。本用来对付乡村地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萨尔瓦多军队,转而攻击这些改革派教士。1981 年,为压制异议,政府官员暗杀了大主教奥斯卡·罗慕洛(Oscar Romero)。在政治保守主义和军事压制的双重作用下,真正的社会改革根本无法进行。

古巴社会主义给 20 世纪 80 年代尼加拉瓜出现的革命政权提供了范本。20 世纪 70 年代末,索莫查独裁统治面临着来自各路反抗力量联盟的抵制,其中既有激进派也有自由派,他们称自己为桑迪诺解放阵线(桑迪诺是一名被索莫查暗杀的政治改良家)。1979 年,天主教会联合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发动了一次著名起义,推翻了索莫查政权。然而,联盟中的激进派拒绝分享权力。和 1959 年的卡斯特罗一样,他们开始建立一党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体制。然而,这个小国缺乏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资源,他们面临保守的美国政府的强烈抵制。美国提供军事物资和军事训练,给一个名为“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s)的反桑迪诺游击队,并且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经济封锁。革命激起了老百姓的广泛抗议,他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

1989 年,由于面临惨淡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骚乱,桑迪诺解放阵线同意民众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大部分选民倾向民主党反对派,桑斯诺解放阵线离开政府。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到此结束,依旧贫困的人口表明,他们的改革计划不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繁荣的关键因素。

尽管存在一些经济增长的迹象,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大部分国家仍处在社会不稳和经济贫穷之中。政府的不稳定为政治极端分子和独裁者的上台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行为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当美国领导人判定它们的内政外交对美国利益不利时,这些靠近美国的国家就会受到美国的军事干预。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军队曾两次占领该地区的国家。1983 年,美

国强制将试图采用革命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府，驱逐出了格林纳达岛。1989 年，美国将巴拿马军事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赶下了台。他涉嫌参与国际毒品走私，并且鲁莽地宣扬自己想要夺回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的意图。由于靠近美国，这些小国都处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同时，这些国家里离开故土移民美国的人口数量不断上涨。一些移民是政治压迫的逃难者，但大部分人是想寻求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靠近美国的小国都是第三世界的一分子。

350

小　结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三世界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所描述的地区似乎距离西方世界很遥远。欧洲国家愿意让它们的非洲殖民地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国领导人和大部分欧洲人口准备，或者渴望摆脱旧式帝国主义野心，并且都在进行紧迫的战后重建工作。帝国主义的落幕创建了许多新国家，它们往往远离欧洲各国的关注的重点地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渴望获得独立和能制定自己国家未来道路的自由。第三世界的新的后殖民时期似乎是一个处于冷战斗争之外的充满希望的时代。南非从白人统治中获得解放，全体人民都有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运动观念发生转变，它们相信，最终一定能够实现脱离美国控制的真正地独立。各国新的领导人一致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经济发展。

遇到的阻碍比预期的更严重。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个国家碰到的困难都不一样。最常见的阻碍是无能的领导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军队统帅，相较于老百姓的幸福，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权力和腰包。资源和技巧的不足也是阻碍发展的重要原因，导致许多饱含雄心壮志的经济项目陷入衰败。在通往繁荣和幸福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苏联领导人曾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形式是既公正又富有成效的，但是，这些终被证明是一场虚空。古巴的经历表明，一个小农国家，无论是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还是处于西方国家经济中，都依然是外部强权的依附

者。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控制经济发展的实践,起初确实造就了短暂的繁荣时期。但当低效率、腐败和生产力不足成为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的时候,初期的经济猛增后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最终,相较于国有制经济,西方自由市场的生产和分配机制被证明具有较少的浪费和破坏性。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理念,被限定在这个生产力和企业受到最高赞扬的制度内。

在拉丁美洲,复兴市场经济造成的后果是深刻和持久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体现在一些国家的出生率急速下降,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巴西。越来越多的家庭相信,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安享晚年,他们的每一个新生儿都能存活下来。老百姓的生活不再取决于每日为食物苦苦奋斗,他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相反,在非洲,持续的高出生率揭露了这些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不成功。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地经济都处在严重衰退中。这些严重问题引起外来人插手当地经济改革。失败的国家政权和持续衰败的经济加剧了贫困,西方干预再次成为非洲生活的一部分。离开当地前往遥远的城市中心寻找工作机会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多。一些人甚至长途跋涉前往西方世界。到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三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程度地成为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一部分。

本章大事记

非洲

1948 年　南非民族党提出种族隔离制度
1955 年　非洲国民大会通过自由宪章
1957 年　加纳独立(黄金海岸)
1960 年　非洲前法国殖民地成为法兰西共同体成员国
1960 年　尼日利亚独立
1960 年　比属刚果独立(扎伊尔)
1960－1963 年　扎伊尔内战
1961－1993 年　纳尔逊·曼德拉被南非政府监禁

351

1965－1996 年　约瑟夫·蒙博托担任扎伊尔领导人

1967－1970 年　尼日利亚爆发比夫拉内战

1993 年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

1994 年　纳尔逊·曼德拉成为南非总统

拉丁美洲

1934 年　美国提出针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

1946－1955 年　胡安·庇隆担任阿根廷总统

1955 年　为开发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提出巴西利亚计划

1959 年　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

1960 年　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建成

1961 年　古巴猪湾入侵事件

1962 年　古巴导弹危机

1962－1965 年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

1964－1985 年　巴西军事独裁统治

1973－1988 年　智利军事独裁统治

1985 年　阿根廷民主政府建立

1985 年　巴西军事独裁统治结束

1989 年　智利民主政府建立

1992 年　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94 年　加拿大和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2000 年　墨西哥第一次总统自由选举

推荐阅读

第三世界

Nigel 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Decline of an Ideology*(1986)。一部研究东亚地区经济成功及其“第三世界主义”教训的著作。

Akie Hoogvelt, *The Third World in Global Development* (1982)。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诸难题的历史考察。

非洲独立

* Frederick Cooper, *Africa since 1940*(2002)。非洲大陆从欧洲殖民主义最后的堡垒过渡到民族国家的热土，该书是对这片大陆此段历史演变进程的缜密分析。

Karl Maier, *This House Has Fallen: Midnight in Nigeria*(2000)。描述了尼日利亚摆脱国家失灵处境的斗争的严酷图景。

* Martin Meredith, *Nelson Mandela; A Biography*(1997)。对这位杰出政治领袖生平最有洞察力的但带有同情式的研究。

战后拉丁美洲

* Greg Grandin, *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 Latin America and the Cold War*, (2004)。对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干预中美洲的批判性研究。

* Thomas Skidmore & Peter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5th ed. (2001)。对拉丁美洲史的简要考察。

* Tad Szulc, *Fidel: A Critical Portrait*(1986)。卡斯特罗作为一个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详尽且批判性的传记。

回忆录和小说

* Chinua Achebe,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1985)。一位尼日利亚小说家创作的有关希望失落的故事，他的小说记载了尼日利亚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

* Nelson 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1995)。对作者本人从囚徒到南非总统这一人生旅程动态的个人反思。

* Alan Paton, *Cry, the Beloved Country*(1948)。这个国家最好的作家创造的影响巨大的小说，反映了南非残酷的种族主义时代。

352

第十二章　中东战火中的国家

- **以色列与中东**
- **国家建设与石油**
- **战争、和平与伊斯兰教**

聚焦：果尔达·梅厄

重点：伊斯兰教与民族国家

1945年后中东地区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战争、革命及内乱的历史画卷。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中东在当时的数十年中成了政治冲突和战争的温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支配曾一度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那些领土，这个帝国在一战后的崩溃标志着中东地区重建的第一步。

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以各种方式开始着手划定中东地区后继政权的国界。埃及和伊朗的领土已根据历史上建立起的边界线明晰地确定下来，并且其政府在名义上是独立的。而其他政权的边界甚至政权名称的存在，只是因为它们是奥斯曼帝国行省的遗留（诸如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的土地轮廓成为一战后西方勾勒新国家边界的基础，在那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各个国家在其国境内聚集了不同语言、文化和忠于不同民族的各个民族，后来的观察家称其为“没有民族的国家，没有国家的民族”。

各宗教派别间的宗教争端（主要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与敌对，都显现了政治统一的严重障碍。保守王权（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的统治，依赖臣民对其王位的传统忠诚，但其政权的合法性

353

由于他们自身的不称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社会动乱而饱受威胁。一个大阿拉伯国家的设想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思想形态。阿拉伯知识分子受过去统治整个地区的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启发，设想了这个宏大的国家共同体。1945 年之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们频繁要求建立一个泛阿拉伯国家，然而，这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吁常常基于一个特定的阿拉伯统治者的宣称，即他的领导是阿拉伯统一的唯一基础。

事实证明，专制统治是这整个区域应对不稳定局势最为盛行的统治方法。在 60 年代，军事独裁者们在大多数中东国家夺取了政权。他们推行社会改革，经常性的鼓吹自己是大多数人民所虔信的伊斯兰信仰的保卫者，来为其统治辩护。但有关发展状况的所有经济指标却显示了在 20 世纪末，中东许多地区仍陷于贫困状态，只有波斯湾沿岸的一些石油富足的国家，从这一珍贵自然资源的开采中分享了大量的利益。另外，贫困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一起，形成了一种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形式，强力地吸引民众支持。保守王权的分裂和权力斗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怀有野心的将军们使这片土地的政治生活持续着混乱和不稳定。

这一地区急剧变化的历史也归因于阿拉伯社会外部的一些因素。二战后不久，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语民族之中的犹太人定居者，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梦想。阿拉伯国家和既存的以色列国家之间不可动摇的对立，导致了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间的四次战争。泛阿拉伯国家主义开始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领袖来说是以色列国家)予以微弱的抵抗。在以后的 10 年里，巴勒斯坦人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投身于对犹太人国家的斗争。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民族主义，是中东混乱的核心问题。

中东的当代历史同样也是一部石油的历史。中东的油田主要集中在波斯湾沿岸地区，这里储藏着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多、质量更好的石油。工业国家对这种重要资源的依赖，将冷战的压力带到了储油丰富

的国家身上。苏联和美国对那里动摇不定的政府保持着严密的监视，分别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干预，并动用各自的全球力量以保护其盟国。拥有大量石油储备土地的政府将其石油产业国有化以直接获取利润的份额，并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卡特尔，来对这一越来越有价值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进行规范。石油生产中获得的大量利润又成为伊拉克试图征服其邻邦石油富集地区所发动的战争的原因。而国家内部和国际的冲突是战后中东历史的重要特征。

以色列与中东

中东是三大主要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土地，在 20 世纪是教徒们朝圣和对三大宗教虔诚崇拜的中心，同时又是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长久以来的主要城市，最后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地方。在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打败后他们复国的目标变得可行了，他们达成这一目标的决心使他们陷入了与英国统治者的冲突当中，国联在一战后曾赋予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在英国人撤出后，他们又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语民族对峙。新的以色列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地区扩展着边界，而穆斯林和基督徒两大宗教群体曾数个世纪在外国统治下生活在这里，膜拜着他们各自的圣地。民族和宗教差异使中东这一小块地区成为种族冲突和战争的熔炉。

354

争夺巴勒斯坦

在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长期的敌对在二战结束后迅速爆发出来。到战争结束时，其他委任统治领地——黎巴嫩和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获得了立宪君主制下(后两者)或是议会选举制政府下的独立，但在巴勒斯坦却没有一个政治团体或领袖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威，而这一地区当时仅有 60 万犹太人定居者和 120 万阿拉伯人共存，双方都想寻求排除另一方的自治。阿拉伯人反对英

国占领和犹太人定居的行动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引发了阿拉伯人长期而血腥的起义斗争，在英国军队最终镇压起义后，英国政府为这块土地制定了分治计划。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民族国家(虽然面积有所缩小)的前景而欢呼时，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则联合起来反对和抵制授予犹太人土地。战前协商巴勒斯坦独立所陷入的僵局使内战升温，像印度独立时的情形一样，每个族群的领导人都决心控制对方视为已有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它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独立，使其联合起来对抗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同样，对二战中种族屠杀的恐惧回忆使犹太民族空前地联合起来支持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复国主义者对这一回忆的执着变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式的运动。这场战争暂时结束了有关未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犹太人移民和分治的一切讨论，英国人把维持巴勒斯坦地区的秩序作为他们唯一的目标，实际上终止了允许犹太人再向这里移民。然而，在那些年里，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却使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成为生死攸关之事。

二战中，英国政府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政治统治。战斗依然在远处进行，但这里仍旧能感知到轴心国势力的渗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的宗教领袖——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公开宣布他对纳粹德国的支持并流亡到柏林。他向中东地区进行广播，号召阿拉伯人反抗英国统治者。在埃及和伊拉克，当隆美尔的攻势于1942年抵达埃及边境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似乎准备好欢迎他的德国非洲军团。苏伊士运河与该地区石油的重要性，让英国人有充分理由动用军队镇压阿拉伯人和德国人勾结的任何苗头。在伊拉克和埃及，他们强行扶持亲盟军的政治领袖。巴勒斯坦犹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欢迎这个有利时机，积极投入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派遣3万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他们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中坚力量。

355

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危机立即爆发，夹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并想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英国政府，拒绝对更多的犹太移

以色列及其邻国

民开放边界。犹太难民零星地穿过欧洲大陆，指望在巴勒斯坦找到新家园，他们在途中受到了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帮助。孤注一掷的犹太人移民们，乘坐破旧的船只从欧洲前往圣地，犹如《出埃及记》。有些船在抵达目的地前就沉没了，有些人被英国人抓住，他们将这些犹太人乘客送到塞浦路斯的拘留所，使他们再次沦为囚徒。

356

1945 年，复国运动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盟友。美国政府公开支持他们重开巴勒斯坦，允许移民入境的要求，美国的政治领袖们支持犹太人建国的目标，并迫于国内犹太人组织的强大压力，协助建立一个犹太人

家园。杜鲁门总统宣布的美国新政策，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巴勒斯坦上问题向英国施压，这使该危机成为国际事务。

巴勒斯坦地区各民族政治目标上的深刻分歧和民族争端，使和平谈判变得不可能。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一致认为，未来的国家必须是在阿拉伯多数民族统治下的独立民族国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要求为其人民提供专门的领土保护，以避免他们在阿拉伯人国家统治下遭到迫害。1945 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开始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以期使英国政府注意到他们的移民和自治要求，小规模的恐怖组织甚至对英国驻军和殖民地官员进行恐怖袭击。

由于无法向一个巴勒斯坦新政权和平移交权力，英国政府转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1947 年初，它将托管地巴勒斯坦的命运交给了联合国，放弃了促成双方一体的无谓努力，并像在印度问题上的解决方法一样，迅速撤离。联合国不得不决定巴勒斯坦地区将建立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在动员赞同创建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人国家，另一个犹太人国家——所需的表决票数方面，美国扮演了关键角色，甚至苏联及其盟友也对该计划投了赞成票，希望以此证明它们反对“英帝国主义”。是年 11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数国家投票赞成巴勒斯坦分治，分为阿拉伯国家和犹太人国家。像印度的情形一样，两个深刻敌对的族群的存在，每个都意欲捍卫本族群的权利，导致了该地区新边界的划定，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了两个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选择了族群自有领地的民族主义原则(ethno-territorial nationalist formula)，联合国决议意味着国际社会对这种解决方案的批准。

对周边的阿拉伯各国来说，该决议是不可接受的，反对犹太人国家成立，业已成为忠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试金石。它们决定介入巴勒斯坦问题背后的另一因素，是阿拉伯领导人间对中东地区政治影响力和巴勒斯坦领土控制权的竞争。约旦国王希望能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同时担心叙利亚扩张主义者的含括从伊拉克直抵地中海沿岸所有土地的大叙利亚计划。伊拉克和埃及君主是阿拉伯国家领导权的竞争对手，他们仅在一点上存在共识，即中东必须是阿拉

伯人的中东。这个目标让他们在 1945 年共同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组织，称作“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他们宣称，阿盟的目的是在成员国(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间“协调政策”和“加强关系”，它的当前目标则是阻止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国家。

埃及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始国和领导国，且是最大、最有实力的阿拉伯国家。其人口增长迅速，从 20 世纪初的 1 000 万人增长到 1 600 万人，城市和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当时或许业已止步不前，为严重的社会混乱创造了条件。社会动荡和政治腐败问题，强化了埃及群众中“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影响，该组织的成员数量在二战后增加到 100 余万人。它宣称有 50 万埃及人(这个数字有相当大的水份)加入其准军事组织——分遣队(the Phalanx)，没有任何政党拥有如此庞大的群众基础。它独自向乡村下层阶级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引导，其原教旨主义纲领，使伊斯兰信仰成为社会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坚决抵抗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根本原因。

357

1947 至 1948 年冬，巴勒斯坦地区饱受内战摧残，英国军队从海岸地区逐渐撤离，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军事组织为争夺各村镇的控制权互相攻击。巴勒斯坦人从阿拉伯联盟那里获得装备，而以色列人则只能就地获取武器。1948 年 5 月，当最后一批英国驻军从巴勒斯坦撤离后，犹太领导人正式建立了以色列国家，他们实现了建国目标，但敌人兵临城下威胁着这一新生国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立即对以色列宣战，命令军队摧毁这个新国家。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

埃及一马当先。埃及军队开赴前线首先开战，与此同时，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准军事力量的志愿兵加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参战。埃及军队装备落后，尚未做好战争准备，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无视军队将领们的警告，相信阿拉伯军队将迅速歼灭人数居劣、装备简陋的犹太人军队。他和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都低估了犹太人抵抗的能力。

遭到敌军三面合围的犹太军队，为自己的新国家和族群的存亡而战，巴勒斯坦人就不具备这样的民族主义激情。许多阿拉伯人，担心在

犹太人统治下生命安全和宗教信仰受威胁，逃离了犹太人控制区。只有一部分阿拉伯军队的战斗技能可以与犹太人军队相匹，由英国军官领导的约旦阿拉伯军团(Jordanian Arab Legion)夺取了约旦河右岸(西岸)的一部分领土和古城耶路撒冷，他们古老的犹太邻居被围困数月，直至以色列军队不得不撤出耶路撒冷为止。

另一支阿拉伯军队则进展不顺。一些埃及军官，如迦玛尔·纳赛尔(Gamal Nasser)上校，战斗英勇，但埃军中大部分军官并没有与他一样致力于这场战争。埃及政府的军队领导无方，补给匮乏。埃及军队进攻巴勒斯坦南部受挫，之后又被迫撤出整个内盖夫沙漠。阿拉伯各国军队没有任何协调战略，各自为战，难以阻止犹太人攻城略地，夺取比联合国分治计划给予的土地大得多的区域。

埃及进攻行动失败是战争结束的关键。1949 年 2 月，联合国让交战所有各方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军占领了巴勒斯坦沿海地区、约旦河谷部分地区和内盖夫沙漠到红海沿岸的土地，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停火线标出新的巴勒斯坦领土分界线，它如今由以色列与约旦分占。耶路撒冷旧城和约旦河谷大部分地区仍掌握在约旦军队手中，停火协定确认了以色列——这个敌人环伺下的小国的胜利。战争期间，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从犹太人控制区逃离，犹太人定居者成为以色列人口的多数。战争结束时，巴勒斯坦人发现他们无家可归。

358

新生的以色列政府开始了建立犹太人民族国家的进程。新政府实行议会民主制，它欢迎来自所有国家的犹太人，把希伯来语——已有两千年不作口语使用的圣经语言定为官方语言。它在某些方面有点像神权政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其居民由宗教信仰情感联系起来的国度。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其法律保障政治自由和个人平等，并受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启迪引入社会改革，它支持创办集体农庄，称作基布兹(Kibbutz)，第一代犹太人定居者早先就已开始建立集体农庄。在让沙漠变成沃土的奋斗中，这些集体的成员共享着来自他们农作物的收入。

尽管以色列保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宗教自由，但对阿

拉伯人来说,它是永久仇恨的对象,因为它分解了巴勒斯坦,它的法律和社会秩序体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拒斥的西方世俗价值观。在敌国环伺之下,以色列人不得不武装自己的国家以预防另一场战争。

对阿拉伯国家来说,阿盟军队失败是一次举世皆知的耻辱,75 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这场失败。他们散布在中东各地,主要集中在埃及的难民营里。巴勒斯坦人很少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帮助,极少数人在中东其他地方找到了新家,大多数人仍然待在联合国负责照管的处境恶劣的难民营里,希望以色列有朝一日不复存在,他们得以回到自己的家园。无论如何,以色列的胜利对埃及君主制来说是一场灾难,它没有能力团结起阿拉伯人的力量以及组织和领导阿拉伯军队。数月的战争对埃及军官来说是一个苦涩的教训,他们回到埃及,深信是自己国家腐败的政治领导层出卖了他们、埃及民族和阿拉伯人的事业。

聚焦:果尔达·梅厄

果尔达·梅厄(1898 — 1978)一生致力于建立巴勒斯坦犹太人家园。9 岁那年,她全家逃离沙皇俄国,此时,她已亲身体验到了反犹主义仇恨,这种情感在她曾经生活的地方的人们当中普遍流行。与此同时她也了解到了一个被称作犹太复国主义的新运动,其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尽管她在美国长大,但在 20 岁那年,她决意把该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决定改变了她一生的历程。

她之所以能终生奉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源自她杰出的个人品质和她对犹太人家园目标的投入。20 世纪 20 年代,她与丈夫移居巴勒斯坦。"犹太人必须再次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她写道,"我通过在这里生活与工作,促成它的建立"。她成为在沙漠上开垦土地的犹太人集体农庄的先驱者之一,这些先驱者通过让土地重新欣欣向荣,在说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中宣称这是属于他们自己拥有的巴勒斯坦家园。用梅厄的话来说就是:"唯有自力更生,犹太人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赢得道义权利和历史权利"。



果尔达·梅厄作为总理检阅以色列军队，1969 年(UPI/Corbis/Bettmann)

像其他犹太人移民一样，她相信，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具有道义上的和历史上的正当性。她在随后几十年里过着艰苦的生活，目标是取得属于犹太民族的土地。那片土地是犹太人宗教的发源地，但她并不希望使之变成一个宗教国家，犹太人像其他渴望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一样，想要形成一个共同体。她信仰宗教宽容，希望阿拉伯人"作为犹太人家园里的公民，与我们和平而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359

她的梦想必然意味着，那些阿拉伯人势必会成为犹太人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对于这一异教徒将统治他们以及他们的巴勒斯坦圣地的思想，许多阿拉伯穆斯林断然拒斥。他们的宗教信仰容不下建立世俗的犹太人国家的可能性，而这个世俗国家正是果尔达·梅厄等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

为复国主义事业而奔波操劳完全占据了她的个人生活。她后来承认，她用在婚姻和孩子身上的时间太少了。她离开家庭远赴欧洲和美国，鼓动犹太人移民，为犹太人建立定居点，后来又为建立以色列国家

筹集资金。但她最大的贡献在于其政治领导能力，在许多犹太人看来，360 她与其他一小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令人难以置信的以色列之梦成真。1948 年，当她作为第一任以色列驻苏联大使抵达莫斯科时，大批犹太人冒着被逮捕和监禁的危险在以色列大使馆外庆祝。

她还具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的天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将妇女视为与男性平等的伙伴，尽管一些以色列人对从政妇女的偏见依然是强烈的。她的政府相信并需要她的才能，1949 年，政府任命其为劳工部长，她着手奠定了以色列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她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全球各地说着不同语言，互相不相熟悉各自传统和习俗的蜂拥而至的犹太人中”建立共同的忠诚观念。她回忆到，这是“我生命中最满意和最幸福的时光”。

以色列确实耗尽了她的余生。1956 年，她从劳工部长变为外交部长，13 年后，她勉为其难地同意就任国家总理。她问到，为什么让一个“70 岁高龄的祖母去领导一个只有 20 岁的国家”？答案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具备这个能力。投身犹太人家园事业把尚是一个年轻女性的她带到了巴勒斯坦，她对这片土地的责任感，最终把她提升到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政治职位上。这是一段鲜有男性能够相媲美的生涯。

埃及的革命

战后年代，埃及的君主制越来越不受欢迎。1950 年，自由选举(1984 年前的最后一次多党选举)表明议会政治在何种程度上业已成为一小撮政治精英的专利，鲜有选民费神费力去投票。法鲁克国王企图控制政府的野心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新内阁动员群众支持反英运动，以迫使英国人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出军队。这些军队是根据 1924 年埃及独立后英国与埃及政府所签订的协议驻扎在这里的。英国人拒绝谈判，反英运动日益趋向暴力。1952 年初，开罗爆发骚乱，抗议英国人在苏伊士运河沿岸驻扎，国王解散了内阁，接管政府，并召集军队镇压暴

动。他的上述行动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埃及革命军官选择了这一政治混乱时刻展开行动，这个秘密反抗团体的领导人就是迦玛尔·纳赛尔。二战前，还是一名学生时，他就已积极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像其他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一样，对他来说，国家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公正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弱小而屈辱的埃及人民就（能够）再次站起来，过上自由独立的生活"。作为贫穷农民的儿子，他选择了军官职业。对他来说，这是提升自己生活和促进埃及民族主义事业的手段。在最初岁月，军旅生活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机会，但却组构起纳赛尔与其他军官的联系纽带，其中包括继他之后担任埃及统治者并在后来着手改造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巴勒斯坦战争之后，就像他后来所写的，他和他的同僚认识到，"我们的斗争发生在开罗，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的国家，而后才能够战斗"。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国王和议会体制所出卖，因此决心恢复自己在埃及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的军事密谋把埃及推向一场政治革命。

361

纳赛尔领导下的军官们，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自称为"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该组织成立于 1949 年，成员壮大到约 1 000 人。1952 年夏，当法鲁克国王命令军队进入开罗镇压骚乱时，其成员发动了他们的军事"政变"计划，也就是用武力推翻君主制。在一位同样反对君主制的高级军官纳吉布（Naguib）将军帮助下，他们秘密接管了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陆军包围了王宫，迫使国王退位。在逃离国家时，法鲁克国王警告胜利的反叛者："你们的任务会很艰巨，你们应该知道，统治埃及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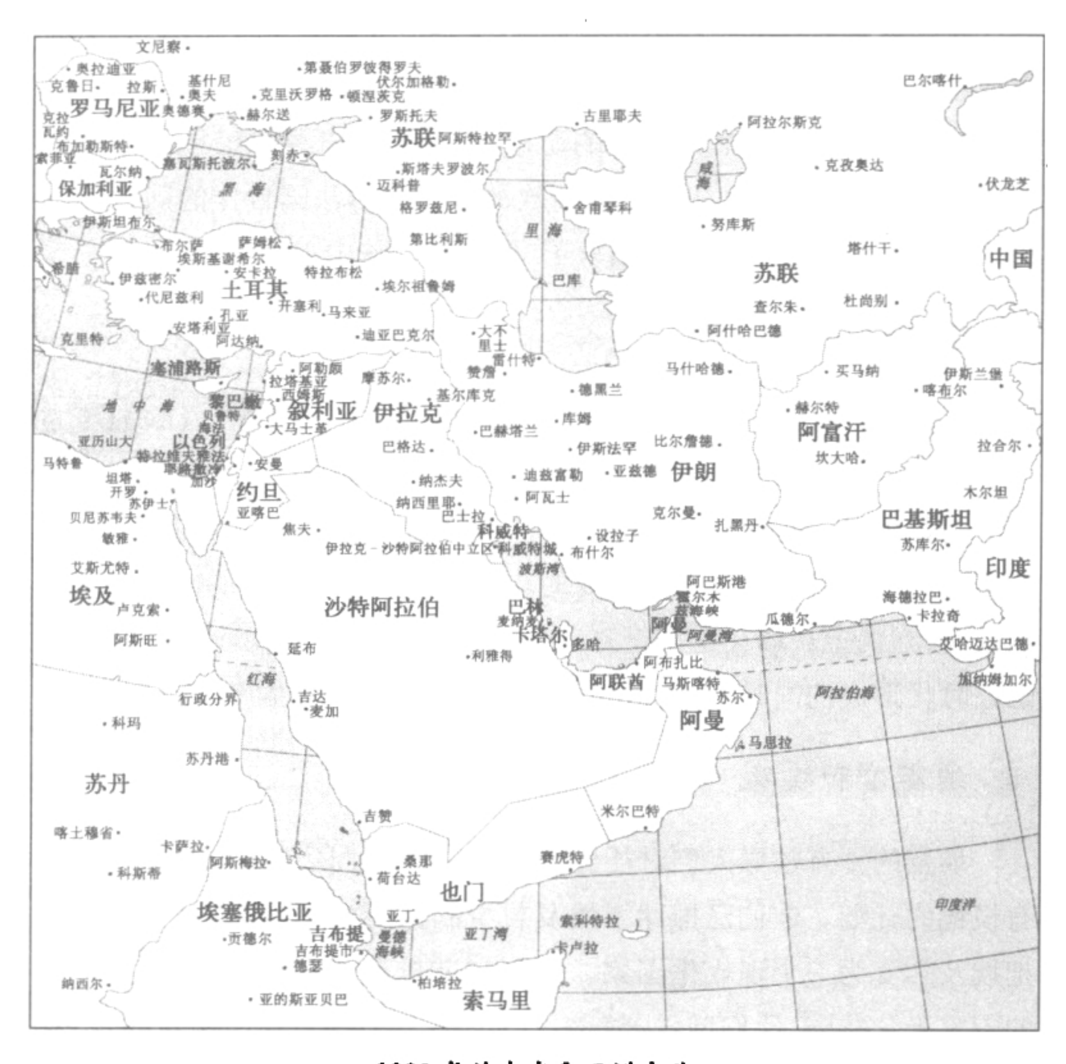
重建埃及民族国家的进程仅是刚刚开始。几乎没有埃及人对这位土耳其族国王的离开抱憾，几位权力竞争者都渴望统治共和国。自由派政党希望维护宪政政体，保护支持他们的金融家和地主阶层的利益。穆斯林兄弟会的追随者则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以加强穆斯林宗教信仰，荡平社会与道德的败坏，他们相信西化必将造成这种恶果。

这些军官并不准备容忍政治多元化和异见分子。纳赛尔后来嘲讽

地提到在推翻君权之后几个月里，他们遇到的“树倒猢狲散似的追随者和反差鲜明的残渣余孽，混乱，争吵，投降和靠边站”。他们从来不曾认真地考虑与他人分享统治的责任和权力，他们针对政敌的应对之道就是消灭竞争者，结束议会统治。他们解散了议会和内阁，以革命指挥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RCC)取而代之。它由自由军官组织中的领导人组成，纳赛尔任主席。该委员会废除了宪法，并在1953 年初取缔了所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由于缺乏群众支持，在公共活动中消失了。势力弱小的共产党成了彻底清洗的目标，其领导人被投入监狱。纳赛尔宣称：“共产主义者既不相信自己这片土地的自由，又不相信自己的民族，而只是唯外人马首是瞻”。对这些军官来说，埃及民族主义是实现国家复兴的意识形态灵感所在。

穆斯林兄弟会被革命指挥委员会视为最危险的对手。这些军事领导者反对兄弟会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与穆斯林兄弟会没有相同的伊斯兰革命目标。他们是西化的将领，对他们来说，《可兰经》只规定了宗教的信仰和实践，而不是国家政策；二是兄弟会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1954 年 1 月，穆斯林领袖开始号召大规模的街头游行，迫使革命指挥委员会推行伊斯兰革命计划。当政的军官们抓住这次机会大肆逮捕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并取缔了该组织。像以前面对高压政策时那样，兄弟会转入地下，1954 年 10 月，他们中的一名成员试图刺杀纳赛尔，警方称(尽管没有实质证据)兄弟会想要阴谋推翻新政权，对他们的镇压更加严厉，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革命军官们击败了他们所有的权力竞争对手。

新政权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灵感之源，362 他们重申准备与以色列开战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们采取行动加强正在北非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里是阿拉伯人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之下的最后区域。仍属于法兰西帝国一部分的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953 年后来到开罗，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躲避法国殖民势力的庇护所，并从埃及新政府那里得到经济援助。1956年，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当地的民众骚乱迫使法国政府不情愿地给予摩



1990 年的中东和亚洲内陆

洛哥和突尼斯独立。

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面临着来自法国的坚决对抗。法国军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征服阿尔及利亚,使它向来自南欧的殖民者们敞开国门。所有这些殖民者都得到了法国的公民资格。拥有法国文化和公民资格的 100 万名欧洲定居者,对阿拉伯人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思想抱着深刻的敌意,法国政府拒绝与总部在开罗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the 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谈判。1954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号召发起反法起义,法国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其中一些刚刚从印度支那撤回来)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起义,保护欧洲定居者。 363

法国这场新的殖民战争一直持续到 1962 年，至此时，战争已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并激起了针对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双方的恐怖主义活动。面对着一场显然无休止的游击战，法国政府决定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100 多万名阿尔及利亚裔欧洲人和曾与法国合作的阿拉伯人逃往法国。最后的殖民战争结束了，西方帝国从中东消失。

国家建设与石油

埃及新政权夺取苏伊士运河，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标志着欧洲势力在中东的崩溃。在石油驱动下不断成长的全球经济，将西方私人公司吸引到该地区。石油公司获得了石油开采权带来的巨额利润，石油对所有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拥有大量石油储备的中东地区各国政府，亦渴望获取在这个全球市场上石油销售带来的收入。在民族国家时代形成的同时，这些新兴国家走入了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

纳赛尔和埃及

埃及的军方领导人们对社会改革和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只有模糊的计划。他们已推翻了埃及君主制，宣称仅凭他们自己就可以把埃及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知道自己的试验危险重重，他们的国家十分贫弱，他们增强国家实力和改善埃及民众生活条件的希望，取决于新的岁入来源。他们仍然坚信自己是国家理所应当的领导者，正如纳赛尔在 1953 年写到，是“先驱”(vanguard)，他们“任重道远”。

他们自身在政体形式的基本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一些军官倾向于引进立宪民主制，将权力交还给各政党，纳赛尔则坚持军队统领全国。1954 年初，这场争端以他的胜利告终。他宣称，革命受到了君主制腐败行为回潮的威胁，因此将自己的支持者安置到埃及政府的各个要害位置。埃及军人政权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纳赛尔成为主要领导人。

他开始着手建立专制国家。他和他属下的军官创建了自己的群众政党，取代了各个党派，该政党最初被称为“解放阵线”(Liberation Rally)，在未来几十年里曾数易其名。他们规定，唯有该党享有提名候

选人参加选举的权力，他们对广播和新闻出版实行检查制度，剥夺工会罢工权利。1956 年，他们推出新宪法，设立了国民议会，但它并不享有任何真正的立法权力。秘密警察逾越法治恣意行动，逮捕军人统治者的敌人。内阁取代了革命指挥委员会，但它仍然由 1952 年以来领导着这个国家的同一批官员组成。纳赛尔获得了共和国总统的头衔，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致力于民族革命的、仁慈的军事独裁者。 364

纳赛尔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阿斯旺修建一座新的大坝拦截尼罗河之水。这将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建筑，足以让金字塔相形见绌。水坝形成的新湖将淹没过去埃及法老的珍贵古迹。水坝的规划用途设想为农业灌溉提供充足水源(埃及的可耕地面积将增加三分之一)，以及提供水电，其发电量将比埃及当时所有电力的总和还要大。对纳赛尔来说，该工程让他非常自豪，体现了他改善社会的希望和他的民族革命的宏大梦想，他称之为埃及"活人享用的金字塔"。然而，筹集水坝建设资金是个严重问题，埃及政府缺少必要的财政手段。像印度一样，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埃及无法启动重要的经济建设工程。

军事革命的最显著结果就是埃及拒绝服从西方。继印度的尼赫鲁之后，纳赛尔宣布埃及在冷战中奉行不结盟政策，他拒绝加入英国发起的与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组成的"巴格达条约组织"(Baghdad Pact)，这一冷战同盟组织试图作为包围苏联的一环。纳赛尔指责这一条约组织(某种程度上是对尼赫鲁指责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回应)是一个"现代版的被保护国"，谴责其成员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他拒绝加入条约组织极大地减少了埃及从美国获得物质援助的机会。

埃及和以色列的冲突给纳赛尔的新外交政策蒙上一层好战色彩。埃及和以色列在形式上仍保持着战争状态，它禁止任何驶往以色列的货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军队的装备依然落后，需要引进现代化装备，而这只能由外国贷款来支付。美国政府犹豫不决，担心这一援助可能引发新的阿以战争，而苏联则准备提供援助，继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打算支持那些中东和亚洲地区不与西方结盟的改革政府，他们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和金融贷款对埃及政府来说是十分诱人的援助源。

1955 年末，纳赛尔接受了这一援助，他宣布埃及政府已经和苏联签署了一项协议，埃及以出口的棉花和大米作为回报，从苏联获得了一笔长期贷款，苏联允许埃及用这笔贷款从共产主义国家购买战斗机、坦克、军火和海军舰只。纳赛尔的这一行为获得了遍布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们的满堂喝彩，他称这一军火贸易政策为“积极中立”。西方领导人中蔓延的冷战情绪无限放大了他在法属北非支援阿拉伯叛军和他的军火协议的意义，他成为了一个潜在而又危险的共产党的盟友。

纳赛尔与共产党国家军火协议的代价在 1956 年中期显现出来，他从 1955 年开始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世界银行磋商一项用于开始阿斯旺大坝建设的大额贷款，他将国家的威信和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在这一巨大的建筑计划上。谈判一直拖延到了 1956 年 7 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不再参与这一贷款计划，英国马上也做出相同的决定，他们的意思很清楚：纳赛尔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的代价就是使他的国家失去西方对阿斯旺大坝的资金援助。这一决定是对埃及领导人的公然羞辱，也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

365

苏伊士运河和 1956 年中东战争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仍由经济企业运营并归欧洲人所有，是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遗物。它也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财产，给其所有者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是年，最后一支英国军队撤离了苏伊士运河区。这条运河对纳赛尔等埃及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件极具诱惑的战利品，运河生产的巨额收益以及夺取它将给政权带来的威望吸引了纳赛尔。1956 年 7 月，纳赛尔向聚集在开罗的埃及民众宣布，他的政府已拥有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他大声说道，“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信念”，曾受到西方的挑战。运河的国有化证明，“这个国家将不再接受羞辱和贬低”。如果“帝国主义者”不赞成他的国有化行动，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他公然反抗西方，让他和他的国家与欧洲国家陷入直接对抗。这个行动得到人民的热烈喝彩。

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促使英法政府做出最后努力，确保它

们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帝国权力。它们将运河国有化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运河仍然是西欧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尤其是石油。它们对纳赛尔的国有化政策怀着深深的疑虑,战略和意识形态原因,促使这两个国家对运河区发动了一场轻率而欠考虑的入侵。他们在以色列政府里找到了现成的盟友,以色列经济正因埃及对其通过运河的货运实行封锁而受到损害,而且它的领导者担心埃及会再次入侵。1956 年 10 月末,这三个国家进攻埃及。以色列装甲部队穿过西奈沙漠直指运河,与此同时,英法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苏伊士港和整个运河区。这次行动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但在政治上却一败涂地。纳赛尔成了埃及人的民族英雄,在外交上,这次入侵也是一场灾难。

反对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几乎全部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对英法进攻行动予以了谴责,苏联为纳赛尔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并警告英法,苏联准备采取"一切措施"保卫埃及。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同样谴责了这次入侵,因为他对这次军事行动十分震怒,且欲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美国政府通过削减对英法的经济援助,让它的反对立场变成令英法痛楚地感知到的现实。它还拒绝保护英国的货币,因恐慌的英国人大量购入美元,英镑正在急剧贬值。由于失去美国支持,英法两国孤立无援,无法将战争继续下去。面对全球性的外交抗议和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英国说服法国和以色列从运河区撤军。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了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外交影响挫败了它们的入侵行动。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纳赛尔最大的胜利,他公然反抗欧洲强权并取得了胜利。在中东地区,他的行动使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重新盛行起来。对埃及人来说,他成了他们无可争辩的民族领袖。但其实他在战争中唯一的作为是用沉船阻塞住运河,使其关闭了一年时间,无法通航。由于突如其来的石油荒,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浪潮席卷欧洲。在和平协定中,纳赛尔接受了联合国的提议,同意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在埃及驻扎,其任务是在埃以边境巡逻,防止阿拉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同时阻止以色列再度入侵。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给予了纳赛尔大国强权的幻觉。在数年时间里,他的行动让他成为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 366

不结盟国家的领袖。

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改革

苏伊士战争给国家控制埃及经济提供了遽然降临的推力，纳赛尔欢迎这种发展方向，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言下之意是这些改革为所有阿拉伯国家树立了榜样。直到 1956 年，埃及经济一直沿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运转，允许银行业、工业和农业的私人所有制，并欢迎国外投资。苏伊士运河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新的经济势力，在没有任何长远规划的情况下，政府突然成为苏伊士运河公司(the Suez Canal Company)的所有者，负责运河的运营。战争期间，埃及没收了以任何方式与英法有联系的为外国所有和运作的企业，其中包括许多银行、保险公司和工业企业。国有化控制让政府在埃及弱小的产业经济中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苏伊士运河危机让自由军官组织的“社会正义”目标扩展为更加宏大的社会主义蓝图，它采取的形式颇类于苏联的指令性经济。政府转向制定经济计划，为国家经营国有企业提供必需的经济指导方针。1957 年初，它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National Planning Committee)，同年晚些时候又批准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接受苏联援助建设阿斯旺大坝，美国运来食品补给以帮助养活埃及不断增长的人口。纳赛尔宣布，埃及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一个互助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像印度一样，埃及变成了混合型经济体，小型商业企业和农业仍由私人控制，而大型企业则由国家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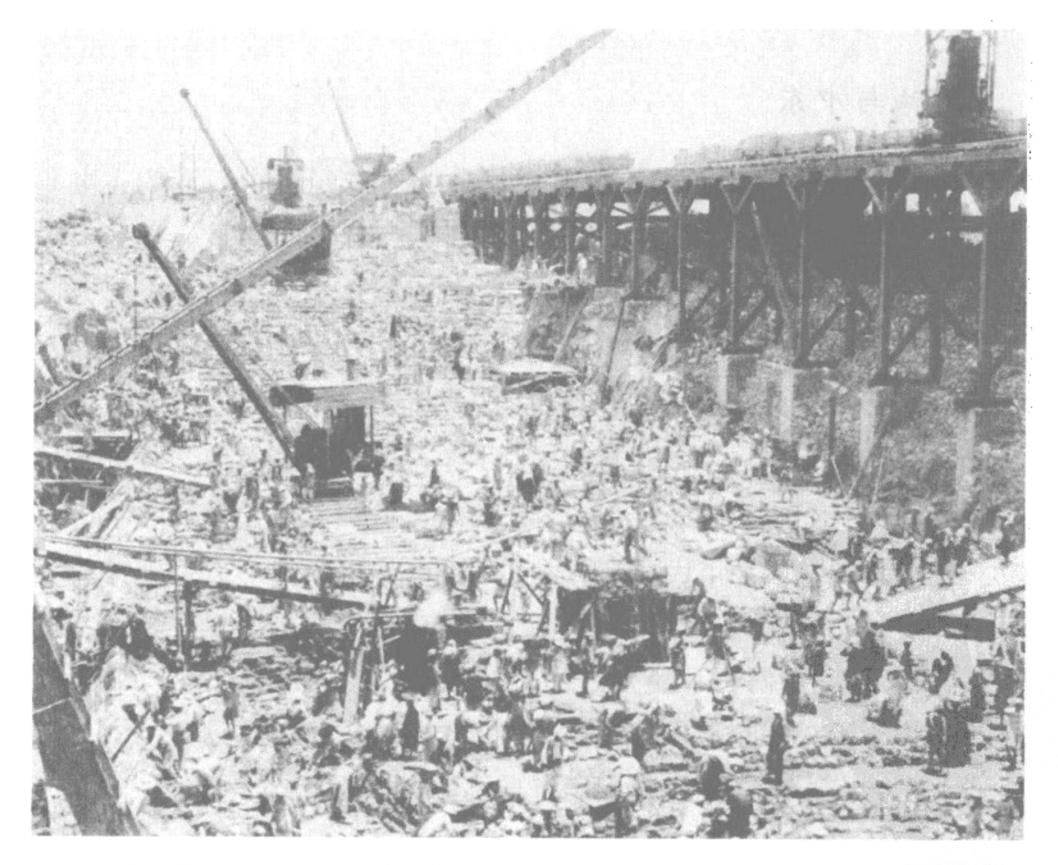
埃及人民在数年里曾从这些改革中受益颇多。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不断增长，尽管其增长从最初数年的 6%减缓到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 2%。但经济发展难以长久地满足人口年均 100 万的爆炸性增长。国家对向城市民众出售的廉价食品提供补贴，以防止社会骚乱，城市提供工作的同时也提供福利。主要由国外援助构成的进口农产品，成为对抗饥荒的唯一保障。

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追求埃及转型下的宏大计划，它于 1970 年完

工,永久性结束了尼罗河下游每年一度的洪水泛滥。被命名为"纳赛尔湖"(Lake Nasser)的蓄水区,向上游纵贯300英里,所储之水用于发电(每年100亿千瓦时)和灌溉农田(比以往多1/3)。周期性的洪水不再毁灭尼罗河盆地,在尼罗河源头,降雨稀少的年份对埃及农民来说也不再意味着大旱。

阿斯旺大坝是一项技术奇迹和埃及人民的骄傲,但生态环境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灌溉水源通过运河区域而带来了疾病,并让土地上的盐分积淀不再能被洪水冲刷清洗。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社会主义梦想和局限的生动写照,其规划者们可以自豪于埃及的经济增长,但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永久地破坏了长久以来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平衡。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数年的埃及,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向中东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支持。"阿拉伯之声广播电台"在开



人民的金字塔:建设中的阿斯旺水坝(©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67 罗捍卫阿拉伯人统一事业,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纳赛尔复活了把所有“进步的”阿拉伯土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伟大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梦想,进步的阿拉伯土地也就是那些不是由保守的君主们统治的国家。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成果,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被证明不适合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和利益。

在这片四分五裂的地区,与以色列的冲突是最严重的战争威胁,纳赛尔在阿拉伯领导人中最先站出来声明反对以色列国家,他屡次扬言要“消除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侵略”。然而,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 10 年里,他的行为并不好战,直到 60 年代中期,他一直接受沿着埃以边境部署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它在埃及边境一侧纯粹象征性的存在,消除了埃及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危险,这是埃及根本无法承受的、也是纳赛尔军队打赢的战争。

石油与中东

埃及政治革命来临之时,也是中东成为全球经济中石油的主要供应地之时(参见第三章,“重点:石油和国际经济”)。这是一场经济革命,给一些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同时将中东地区性的革命和战争问题提升为关涉世界各大国重要战略利益的问题。失去取得该地区石油的途径将直接威胁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崩溃,1956 — 1957 年欧洲的衰退表明,中东地区石油运输的中断具有多么大的破坏性。中东地区业已获得的重要国际地位,压倒了如纳赛尔等政治领导人的政治野心。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东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不需要考虑它们
368 炼油厂和油井所在的中东国家的利益,甚至如伊朗国王这样的西方的坚定盟友,也对它们在石油生产和价格方面的权力心怀愤恨。石油生产国的统治阶级从这些公司的生产利润中获得开采税,这些公司主要根据石油价格的稳定性和利润确定自己的生产指标。

西方各国政府基于自身对石油的需求,同样保障其本国公司的利益。当需求上升时,他们限制产量并协商一个原油统一批发价格来避免

破坏性的价格战。战后新发现的油田不断威胁着他们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晚期，西方的经济衰退使市场需求严重降低，以至于他们互相之间协议降低石油价格至每桶低于2美元，他们希望能够以此促进销售。这样做，引起了中东石油生产国的不满，包括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有其共同利益，即他们要维持君权统治反对内部政治革命，以及建立起他们本国对石油工业的控制。他们已经开始了昂贵的经济发展计划，由他们的石油开采税的收入来支付，这些收入突然由于国际石油公司降低原油价格而大为减少，这两个国家的君主希望通过互相联合来迫使石油公司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

1960年，他们与所有主要石油生产国(除了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OPEC)。这一组织的直接任务就是稳定油价，协调石油政策以保护“我们各国的和共同的利益”，在这一温和目的后面是更加大胆的目标，即稳定石油生产和价格水平。一个国际性的石油卡特尔诞生了。

如果说他们的组织对石油生产有一些直接影响，而西方在60年代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则在本质上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流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收益达到了近10亿美元，尽管这两个国家君主的政策是保守的，他们却已使其政治影响力彻底转变为在国际经济势力均衡中占重要地位。在那时，石油使用量迅速飙升，在西方能源供应中已超过半数，产业经济已经无法离开石油而运作了。60年代晚期，石油价格开始缓慢上升，一桶超过2美元，在国际金融和经济领域，这些收益以及拥有如此巨大的石油储量赋予了欧佩克成员国新的权力和影响力。

战争、和平与伊斯兰教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内斗频繁爆发，每一次冲突都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响，有时候是因为冷战角逐的介入，有时候则是因为全球经济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石油危机。伊朗革命中，穆斯林宗教领袖夺取了统治权力后，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回归《可兰经》的教义。宗教问题深深体现在阿

以冲突中，忠诚的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把领土争端重塑为一种宗教反对另一种宗教的十字军式战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当中较为冷静一派的意见，是彼此妥协，以便让两个民族能够彼此和平共处。90 年代中期的巴勒斯坦自治协议带来了和平希望，但却面临着巴以双方强烈的反对。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已不再主导着中东政治，但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369

重点：伊斯兰教与民族国家

20 世纪中期，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第二大宗教，它是从北非到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的主流信仰，欧洲殖民帝国的征服曾让这些地区的民族臣服于西方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让由穆斯林统治者管理的最后一个帝国土崩瓦解，但伊斯兰教依然是穆斯林群体中一种重要的力量，一些宗教领袖开始致力于复兴伊斯兰信仰，以隔绝现代西方文化对穆斯林的腐蚀影响。其他公众领袖则相信，把穆斯林族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基础，通过植入某些现代制度和价值观它可以抵御西方的文化入侵。伊斯兰教慢慢地改变自己的信条和行为，以应对西方主导地位的挑战。

像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的教义统一，建立在一部神圣经文的基础之上。穆斯林教众相信，《可兰经》是 7 世纪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先知穆罕默德所得的神启。这种神启构成了穆斯林的基本信仰，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真神和任何其他宗教信仰之源。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也无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是什么，只有《可兰经》的语言是他们的宗教语言(阿拉伯语，是穆罕默德的语言)，只有《可兰经》规定了他们基本的宗教行为。穆斯林学者几个世纪以来详细制定了支配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宗教法则(沙里亚，the Shari'a)，包括家庭，婚姻、继承等许多方面的法则。每个国家各有不同，在许多地方，妇女在公开场合必须将她们的脸藏在面纱后面，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通过这些方式，伊斯兰信仰在公众场合和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私人事务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西方帝国主义的到来，在某些方面给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活动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活力。国际和地区贸易的增长在亚洲和非洲开拓了新的市场，许多世纪以来穆斯林商人在和他们贸易的不信教的人（异教徒）中致力于转化他们的信仰。这些传教工作在 19、20 世纪与商业贸易一起扩展，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殖民地区，基督教传教士在那里与穆斯林传教士竞争，而穆斯林由于站在西方的对立面而使其传教更具优势。

西方帝国不知不觉地方便了急剧增长的穆斯林朝圣者到他们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的圣地朝圣，朝圣是在他们一段神圣的、叫做"斋月"(Ramadan)的时间里进行的，是所有穆斯林的神圣职责，轮船和铁路为这些离圣地路途遥远的朝圣者提供了快捷安全的路线以抵达麦加和麦地那，一些西方人秘密地到这些地方游览，他们惊奇地发现如此众多的穆斯林朝圣者对宗教的热忱，他们从亚洲、非洲和中东各地来实践它们最神圣的宗教行为。

除了这些共同特点外，伊斯兰教自从穆罕默德开始传教的千年来已显现出很深的分歧。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同样分裂出许多宗教团体，他们各自宣称是穆罕默德教义的唯一继承者，其中最大的一派是逊尼派穆斯林(Sunni)，另一个要小得多，其中心位于伊朗和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Shi'a)。在这两个派系之间的分歧不时导致暴力冲突和宗教迫害。 370

在 20 世纪，对他们的领袖来说，这两派的不合由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挑战而影响较小了，西方的制度和行为习惯是穆斯林民族在改革中所受启发的两个广具争议的问题的根源，其中一个是时常被作家和政治领袖提及的现代化，另一个则是世俗主义，那些支持沿现代化道路改革的人主张，某些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性是有用和有建设性的，并对宗教信仰没有什么危害性的影响。一些穆斯林领导人尤其将科学和技术作为现代的产物，有些在教授本地语言的公立学校里将应用科学及数学包括进来，而最激进的改革者甚至号召要建立立宪民主制度。

另一个主要问题通常被称为世俗主义，它的拥护者和其他一些现代化改革者一起，强调要一个国家回到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中去，这个社会是由民法而不是由伊斯兰教义来统治日常生活的。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他们准备引入世俗民法和刑法典（即不以宗教敕令为基础的法律）来代替、或补充穆斯林习惯法。世俗主义拒绝承认由宗教条例指导的穆斯林官方的权力，他们要求实行完全的法律裁决，包括刑事案件以及个人和家庭的事务（与崇拜宗教的空间相对的世俗空间），婚姻、财产权以及继承权都属于世俗空间的事务。这一改革措施的提议者同样反对以穆斯林法律来决定刑事处罚（比如偷盗者要受到断手的惩罚，而通奸者则要被石头扔死）。

这些讨论出现在许多穆斯林学者和政府官员中，而这些问题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衰落和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兴起后变得特别重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会不会将他们民族大众的需要置于那些邻国的穆斯林（Umma）之上呢？一些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主张反对民族主义，强调维护全球伊斯兰教的团结是第一位的。在内心里，他们希望依靠一个复兴的、重建的伊斯兰大众群体来抵御西方文化和经济依赖。他们相信传统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社会责任应该成为新的团结组织的基石和信仰的保卫者。在 20 年代，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们的事例在之后几年传遍了其他中东国家。他们坚信新的、有能力的领导者们会从教授伊斯兰宗教经典的伊斯兰学校中脱颖而出。

生活着穆斯林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的绝大多数政治领袖认为这种折中的宗教改革并不可靠，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人民中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这必须基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并不否认在一国的穆斯林中的宗教忠诚属于这一“民族文化”，但他们试图将宗教实践置于私人的日常生活的范围，而不是公众范围内。建立于 1920 年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新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保证了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不会妨害他们新国家的建设，他们最为激进的措施就是废除了哈里发。哈里发是穆罕默德时代之后，逊尼派最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他们的国家是完全世俗化的。

371

在这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他们的新领袖试图建立一个不仅是伊斯兰化的、同时也是世俗化的民族国家。他们认识到其民众受到穆斯林文化的深深影响，但他们也用世俗的、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构想他们的任务。这意味着是世俗法律而不是伊斯兰律法指引了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在巴基斯坦，这一尝试失败了，这个国家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部族团体，并缺乏必要的手段来应对所有民众的不幸。在这些混乱状态下，巴基斯坦宗教领袖强迫政府日益依赖宗教律法和实践以维持其虚弱的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些阿拉伯文人相信阿拉伯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对民族主义运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将其方式称为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语国家的民族构建计划这些文人中还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设想出现了许多世俗主义运动的强力支持者，他们支持以他们所相信的接近西方民族国家的关键特征为本的改革。埃及的纳赛尔将世俗主义的和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他在 1952 年夺取政权后的基石。穆斯林兄弟会反对他的政策，号召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纳赛尔让他的将领们逮捕这些反对者，将他们的组织驱逐至地下。十年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Batth，“Rebirth”)追随纳赛尔的步伐，在他们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并建立起世俗的民族国家。他们的领导人限制了伊斯兰教的公共作用，迫使拥护建立伊斯兰逊尼派或什叶派国家的人流亡。

伊朗国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实行了相同的政策。但他却最终招致本国什叶派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对，他们后来在 1979 年组织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他的王权，建立了一个受《可兰经》和教法所指导的、由穆斯林教长所统治的伊斯兰共和国。而相邻的阿富汗也经历了相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来反对阿富汗共产党在 1976 年的激进革命。20 年后，他们之中最为激进的宗教团体——塔利班(Taliban)夺取了政权，将伊斯兰神权政治(一个完全基于宗教训诫并由宗教领袖领导的国家)强加于阿富汗人民。他们把持了国家权力有四年之久，直至 2002 年被阿富汗游击队武装和美军武装部队的联合行动所推翻(参见第十四章)。世俗民族主义给穆斯林带来了严重的分歧。

20 世纪晚期，伊斯兰国家中对抗现代化和世俗主义的方式是强烈的，常常是以暴力的国际运动为形式。保守的伊斯兰宗教领袖激烈地反对世俗主义，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伊斯兰社会及其精神价值的存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他们常常将其与物质主义联系在一起，将其理解为通过物质占有来满足个人私欲而忽视精神职责。他们特别鼓励的抵抗模式是以政治运动团体为主体的，诸如塔利班，致力于夺取政权。观察家们将其称为"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团体（由于他们宣称要捍卫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或伊斯兰激进派团体（由于他们将伊斯兰教视为他们所信仰的终极目标）。

372

这些团体中有些致力于伊斯兰教法和实践所规定的教条强制实施（就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比如基地组织（Al Qaeda），动用暗杀和爆炸这样的恐怖行动。其他的团体则继承了政党的传统，寻求赢得国家议会竞选的胜利，如果成功获选，他们就通过法律来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加强穆斯林教法，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接受公共教育和有偿工作。这些团体利用国家制度来制定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律，在多个国家实施，包括苏丹，以及尼日利亚北部各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严苛的宗教法规同时引起了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民以及捍卫世俗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直至 20 世纪末，由现代化和世俗化所引起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一场文化和宗教的危机。

六日战争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东仍是最严重的战争威胁。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承认犹太人国家的存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巴勒斯坦难民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抵抗运动来要回他们自认为是其家园的土地。他们遍布中东，但主要的难民营则坐落在埃及和约旦。他们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来帮助恢复自己的生活。在早些年里，他们从同情他们事业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那里接受经济援助。

巴勒斯坦人必须先克服自己的内部分歧，才能使阿拉伯国家留意他们的需求。最终，在 1964 年，一些巴勒斯坦运动团体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合体，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巴解组织的创始者们将他们的目标定位为"巴勒斯坦人通过民众自决来达到解放我们国家的目的"，即摧毁以色列国家。而阿拉伯联盟对其支持仍半心半意，对联盟中的大多数成员国而言，其他一些问题比这更为紧迫。他们希望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温和的控制手段。然而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敢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做需要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约旦国王与他的以色列邻居保持着秘密联系，但他也担心如果公开与以色列谈判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巴解组织的阿拉伯支持者们对在阿拉伯领土上所存在的犹太国家怀有敌意，并希望能一雪 1948 年和 1956 年战争失败之耻。作为巴解组织努力的结果，阿拉伯领导人逐渐开始打算对以色列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这些打算促使了 1966 年的行动。当时叙利亚新上任的来自复兴党的领导人号召发动一场"革命战争"，来打败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叙利亚政府仿效纳赛尔，向其民众许愿要建立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国家。它谴责保守的阿拉伯君权诸如沙特国王始终坚持部族的方式和传统穆斯林的实践。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质疑叙利亚人想要将其政治影响传遍整个新月沃地，从黎巴嫩直到波斯湾。这些内部的分歧隐埋在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公开声明之后。　373

如同纳赛尔在 10 年前所做的那样，叙利亚政府转向苏联以求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领导人正好急于扩大他们盟友的联系，将叙利亚包括进来。他们称赞复兴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以及有望与苏联利益紧密团结的一个信号。纳赛尔的埃及已经为他们展示了在中东与苏联联系的一种方式。1966 年，叙利亚成为苏联在中东的第二个盟友。苏联的援助流入叙利亚政府，同样也秘密地流入了巴解组织。一些组织成员不远千里来到东欧接受苏联代理人给他们进行的训练。巴解组织的游击队战士受叙利亚鼓动，从他们的领土向以色列人定居点发起袭击。就这样，中东变成了苏联和美国的

支持者之间冷战冲突的竞技场。

美国领导人认为西方联盟的战略利益要求其与石油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西方对阿拉伯国家石油的依赖不会变少。然而美国政府同情以色列的民族事业，这体现了犹太人寻求远离迫害的乐园的希望。这一弹丸之国比中东任何国家都尊重人权。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它保证其 250 万犹太人和 30 万阿拉伯人的公民自由，保障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尽管它的阿拉伯公民饱受怀疑，并被排除在所有公共政治事务之外，比犹太人享有较少的权力，但他们是受宪法保护免于迫害的。而在那一地区，没有其他国家敢说能这样相同地对待他们的少数民族。

以色列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他们的祖国，美国政府以公开保证会保障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权力”的方式许诺以色列人。这是直接针对阿拉伯人的讯息。美国政府将其在中东的政策目标定为保障和平和政治稳定，它对阿拉伯石油国和以色列人的承诺使其陷入了两难，战略利益与它随时准备保护以色列相冲突。随着与叙利亚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愈来愈大，以色列将领们制定好了他们的战争计划。他们回想 1956 年的战争经历，意识到他们必须独立于其他国家自己进行战争。由于担心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协同进攻，他们计划了铤而走险的一步，秘密率先突袭，他们准备好了依次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进攻，分别对各国进行打击以期能最终将其全部击败。

巴解组织对抗以色列的战斗仍可成为战争爆发的直接借口，以色列将领们决定摧毁巴解组织游击队在约旦和叙利亚的基地，他们是从那里渗透进以色列的。对这些营地的袭击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公开强烈的抗议。叙利亚政府要求埃及政府立即准备加入到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去。一场新的阿以冲突迫在眉睫。纳赛尔无法收回他支援的承诺，因为他长久以来已经多次热忱地宣称要“消除以色列人的威胁”。叙利亚领导人公开发问，如果埃及继续让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其军队与以军中间，那么埃及人所宣扬的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又有什么用呢？

1967 年，纳赛尔放弃了他谨慎的政策，这一年的 5 月，他命令联合

国部队离境，同时，他关闭了在埃及东部边界的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切断以色列与印度洋的联系。以这年春天的紧张气氛来看，这一步标志着对抗以色列的战争准备。没有证据显示他实质上已命令埃及军队做好入侵的准备，而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的这一冒险举动是他想要成为“进步的”阿拉伯世界领袖的野心使然。为了这一角色，他只能将埃及置于对抗以色列战争的最前线。纳赛尔的这一行动迈出了使另一场中东战争爆发的致命一步。

374

由于担心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以色列政府批准了对其周边阿拉伯邻国进行预防性战争的冒险军事计划。在距第一次中东战争20年之后，相同的对手在1967年6月又再次遭遇。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准备一如既往的糟糕，而以色列的陆军和空军则保持了超群的战斗技巧和致命的精准打击。“六日”战争是以色列值得称颂的一次胜利，对埃及来说则是一场军事灾难，埃及是以色列的主要对手，因为它拥有最大规模的阿拉伯装甲部队。在战争开始的一小时里，以色列的战斗机已经摧毁了整个埃及空军，而在之后的三天里，以色列的装甲集群占领了直至苏伊士运河的整个西奈半岛。其陆军继续进攻并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城内击败了约旦军队。最后，以军迫使叙利亚军队退出被称为“戈兰高地”的边境山区地带。以军在这六天内大获全胜，被打败的阿拉伯国家同意联合国的停火协定，以军获得了所有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

埃及、巴勒斯坦及与以色列的和平

事实证明，这场战争是中东地区近期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同时明白了以色列政治统一和军事技能所带来的回报。用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话来说，阿拉伯人认识到，“一个弹丸之国却揭露了他们历史上的不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大片的土地，并毁灭了他们自认为装备和气势值得骄傲的军队”。[1] 六日战争的胜利使以

---

[1] Fouad Ajami, *The Arab Predicament: Arab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since 196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

色列得到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犹太先祖的土地。对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地带(Gaza Strip)、约旦占领的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占领使超过100万的巴勒斯坦人臣服于以色列的统治之下。他们其中一些生活在难民营,一些生活在自己的社群中。巴勒斯坦到底归谁所有?这一疑问对以色列政府、以色列人民以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涉及政治和宗教的问题。

在接下去的20年里,以色列人通过政策和每日实践给出了回答,即被占领的土地要被并入他们的国家之中。不顾联合国要求从这些地区撤军的方案,保守的以色列领导人给在西岸地带的新的犹太人定居点提供奖励和保护。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定居者占领了整个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几乎所有最为珍贵的水源。巴勒斯坦人被迫让位给定居者,为失去水源和土地付出代价,他们在以色列企业劳作,时常往来穿越仍是区分以色列和被占领地区的"军事分界线"(green line)。

在政治上这条线是很真实的,这一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仍是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一群人,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统治之下。在一位以色列观察家看来,在80年代,以色列的300万犹太人不管情不情愿,他们对25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都是一种"多数民族的暴政"。按照这名观察家的看法,以巴民众之间的经济往来的融合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但政治的统一看来却是无法达到。[1] 另外一个冲突的根源是犹太原教旨团体的强烈愿望,即想要使所有犹太部落回到他们祖先古老的土地上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巴勒斯坦定居者转移出去。以色列领导人坚持他们扩大犹太人土地的信条,而巴解组织则继续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国家。

375

在战争过去的二十年里,巴解组织试图以武力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为其民兵组织建立了军事训练营,他们的军队从约旦被驱逐出境后于70年代早期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巴解组织由于占领这一地区

---

① Meron Benvesisti,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New York: Publisher, 1986, p. 184.

而与黎巴嫩政府发生冲突，1975 年开始的一场内战使这一小国四分五裂，叙利亚和以色列的武装力量同时介入了这场战争，各自都沿自己的边界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由于缺少强力的军事力量和统一的政治领导，黎巴嫩国家分裂成一系列基督教和穆斯林社群的私人武装，他们互相敌对，各自保卫其领地。然而巴解组织的民兵力量未能进一步地对抗以色列，甚至缺少保卫自身军事训练营地免受以军袭击的能力。

同样，在这些年里，巴解组织开始了一场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对以色列进行一场“非常规手段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其恐怖行动不断使用暗杀和破坏手段宣扬其目标以及恐吓以色列。巴解组织对那些与以色列合作、有的甚至与以色列并不密切的目标进行恐怖袭击。他们以 1969 年劫持并摧毁隶属于美国航空公司的三架航班为这一恐怖运动的开始，之后，参加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甚至也在巴解组织对奥运村发动恐怖袭击的过程中惨遭毒手，12 名以色列运动员在这次袭击中遇难。一场以色列特工组织和受国际恐怖组织支援的巴解组织之间的秘密战争持续进行了多年。然而恐怖主义行动却反而表明了巴解组织没有能力在军事上与以色列对抗。

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反抗以色列最为成功的运动就是在以色列的占领地带进行的群众暴动(阿拉伯语称为“Intifada”)。这场暴动开始于 1987 年末，当时城镇和难民营中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同时加入了对抗以色列军队的群众示威。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石块，对抗以色列占领当局所驻扎的军队和警察武装。他们并没有行动纲领，巴解组织也没有参与组织这一暴动，这让巴解组织的领导人(流亡在外)感到意外，也让以色列政府感到惊讶。最初，示威的领导者来自巴勒斯坦人的社群，而暴动逐渐升级为罢工和从经济上抵制以色列企业。以色列军队发现使用暴力能驱散示威者(造成了许多伤亡)，但却无法结束暴动。第一次暴动零星持续到 90 年代早期。这些示威是巴勒斯坦人首次实质上的民族团结的征兆，并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拒绝承认被占领地并入以色列。

在埃及,1967 年的战败使埃及政府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对外和对内政策。纳赛尔于 1971 年去世,他的继承者,安瓦尔·萨达特同样是 1952 年自由军官组织的前任成员,他舍弃了纳赛尔为埃及制定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而开始了一场世俗化改革,其中包括设立法律保护埃及妇女的权利。他也不认同纳赛尔要使埃及成为对抗以色列的斗争领袖的决心,认为这不符合埃及的国家利益。萨达特确实在致力于恢复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苏伊士运河之外的领土。一旦达到这一目的,他便决心将自己的国家从无止境的耗尽国家资源的冲突中解脱出来。

376

他的大胆计划是,首先要恢复埃及在 1967 年惨败中所失去的国际声望。他获得了进行另一场战争的有力后盾,即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沙特国王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国家在石油出口中的角色。在 70 年代初,对石油的需求突然飙升,使石油成为一项稀缺资源。各产油国那时已经从石油公司那里赢得了控制他们石油生产的合法权益,他们拥有了新的力量。有了沙特的支援,萨达特决定冒险开始另一场针对以色列的战争。

1973 年末,萨达特的军队穿越苏伊士运河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Yom Kippur War)。开始的战斗对他们有利,以色列军队撤出了苏伊士运河。美国和苏联都介入进来以援助各自的盟友,战争升级为国际冲突。苏联派遣军队到埃及,而美国迅速向以色列送出军事支援。当以色列军队成功逆转形势将埃及军队逼回运河边时,苏联领导人威胁会军事介入,美国政府宣布核导弹戒备为“3 级”,命令其军队做好可能的核战争准备。为支援埃及,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对美国的石油运输实行禁运,并减少石油产量。石油价格飙升至 14 美元一桶,在美国出现了油品限额供应,并由于石油短缺而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核威胁和石油禁运一起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双方坐下开始协商解决方案。一个停火协议中止了战争,埃及军队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一块狭长地带,萨达特现在对以色列有了谈判的筹码。

377

萨达特在之后的几年里继续执行他和平政策中的第二步。他向以



面对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以色列军队在伯利恒，1988 年（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HQ Gaza）

色列提议和谈，将其他阿拉伯国家排除在外，并突然终止埃及与苏联的同盟。他恳请美国与埃及结盟，并希望美国成为埃及最主要的经济和军事支援国，他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成功了，埃及和以色列在 1979 年签署了和平协议。埃及是在诸多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作为回报，以色列政府将 1967 年战争中所占领的所有埃及领土还给埃及。美国政府开始向埃及输送军事装备，并加大了对它的食品援助，以满足赤贫的埃及民众的需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时向埃及和以色列提供援助。

一场新的中东战争出现的可能性变小了，但萨达特的冒险政策却让他丢掉了性命。他正式认可了犹太人国家是中东各国政治组织的一部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团体谴责了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政策以及他的社会改革（包括他给予妇女极大的权益）。1981 年，他被一伙埃及军队的军官和士兵暗杀身亡，他们属于一个伊斯兰教主义的恐怖主

义团体。采取这一粗暴的举动，是他们受一种信念所鼓动，即埃及的领导者站到了伊斯兰教的敌人那一边去了，这一行动也标志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中东地区势力的增长。

尽管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在持续着，埃及政府仍忠于萨达特的政治政策，它指引着政府不断努力帮助贫困的埃及人民，使得其人口于1990 年增长到了 5 500 万。埃及结束了对自由企业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补贴和私有雇佣制结合的方式推动埃及经济的发展。埃及成为一个在压抑的阿拉伯国家中相对自由的国度。它最为危险的敌人仍是穆斯林兄弟会，其支持者在 80 年代发起了一场恐怖主义运动，目标直指埃及的知识分子群体，诸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纳吉布·马赫福兹(Naguib Mafouz)，他被指控犯了现代罪(遗弃伊斯兰教)，以及直指埃及科普特人的基督教会，甚至是外国的旅游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埃及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势力，他们因为宗教狂热以及这个国家普遍的、看来无法解决的贫穷得以维持。

将近 15 年，萨达特的和平倡议仍没有续集，巴解组织拒绝包含在1978 年和平协议中的被占领地区自治的提案，它的支持者坚持他们夺回所有巴勒斯坦土地的希望。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导人竟相以类似战争的方式威胁以色列。以色列仍是一个受到其阿拉伯邻国的战争威胁的国家。

378

90 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变化部分是由于 1993 年新上台的以色列领导人的缘故。仍在继续的巴勒斯坦人的暴动清楚地显示，被占领地已无法再被以色列人统治下去了。以色列政府破天荒地宣布其准备与巴解组织商议一个妥协和解政策。和平的前景同样由于极端的、对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势力的衰落而逐渐明朗。伊拉克在 80 年代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国，但其在 1991 年海湾战争(the Gulf war)中的失败结束了它的区域影响，并使巴解组织依靠伊拉克人发动一场对抗以色列的新战争的希望落空了。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失去了他们的政治金主。

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则采取了如同

20年前萨达特的和平倡议一般的大胆措施。1993年，他同意承认以色列国家并与新的以色列政府商讨一个和平谅解协议。阿拉法特准备公开承认无止境的流血并不能给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梦想带来希望，而以色列也应该成为赞同创建一个巴勒斯坦人国家的一员。在那一年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the Oslo Agreement），这为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打开了一条道路，这个国家的建立将在被占领地之内缓步进行，并由以色列政府官方出面组织。巴解组织命令停止恐怖袭击并停止巴勒斯坦人的暴动(暂时的)。第二年，约旦国王与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自以色列建国后持续近50年的中东战争终于落下帷幕。

阿拉法特的权威在几年里足以阻止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街头暴力和恐怖主义。巴以之间的协议保障了巴勒斯坦地区被占领地(加沙、约旦河西岸)的自治，只是哪片领土(耶路撒冷城的哪一部分)应由“巴勒斯坦当局”统治仍留待商榷。以色列政府设法缩小了一部分犹太人定居者的扩张计划，这些定居点是位于将要被巴勒斯坦统治的领土中的。这些议题十分复杂，同时引起了双方极端分子的强烈抵制。

2000年，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阿拉伯激进分子在被占领地内重新开始走上街头攻击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这“第二次暴动浪潮”(second Intifada)与第一次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冲突程度。这次巴勒斯坦起义者使用步枪和机枪攻击以色列部队。另外穆斯林恐怖分子团体对以色列实行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无辜群众中有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以色列军队以进攻巴勒斯坦境内可疑恐怖分子的据点作为回击，出动了武装直升机和坦克。以色列政府开始建筑巨大的围墙将巴勒斯坦地区与以色列和以色列定居点分隔开来。在几年内，巴勒斯坦人的伤亡达到数千人，在以色列受雇的巴勒斯坦工人失去了工作。战争，而不是和平成为这片圣地的主导情势。

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

同其他中东地区国家一样，伊朗的人口是由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民

族组成的，几乎所有人口都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追随者。在 20 世纪中期，伊朗国王得到“沙”(shah)的头衔，即皇帝。但这片土地早已失去了与古老的大波斯帝国皇帝的联系。二战以后，伊朗的统治者礼萨沙·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选择和西方势力合作。他继续实行准许英国石油公司垄断伊朗石油生产的政策。他在冷战岁月里使自己的国家牢牢地依附在西方阵营一边。

379

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在伊朗国王的亲西方政策中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选择。一个名为民族阵线(the National Front)的联合政治集团，由精力充沛的政治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博士(Dr. Mohammed Mossadeq)领导。该集团许诺不依附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伊朗的宗教领袖宣布他们支持这一团体，希望能够保障他们的“伊斯兰国家”远离西方和现代化的腐蚀。摩萨台的纲领包括将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资产国有化，并使伊朗在东西方的冲突中获得中立。有了伊朗的下层阶级选票作为强力后盾，摩萨台的党派赢得了 1951 年的议会选举。他成为伊朗的首相。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国家的油井和石油精炼厂收归国有。而伊朗逐渐恶化的政治斗争使摩萨台宣布废除伊朗国王的统治，支持他的政府的暴力示威活动迫使国王出走。没有任何一致的计划，摩萨台发动了带领其国家走向政治革命的历程。

伊朗的事变，是一场最初由国家石油工业国有化引起的争端，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一次冷战冲突。1953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扩展了其遏制政策，其遏制对象范围包括了在苏联周边的战略要地反对西方势力的国家。摩萨台政治党派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者对美国政府来说表明了摩萨台政府是苏联的马前卒。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给伊朗的国王支持者提供秘密支援。摩萨台并不能团结他的民族阵线联盟，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摩萨台政府，军队将领们也反对其统治，他们秘密接受美国特工的精神和经济支援，迫使摩萨台于 1953 年年中下台。这一以美国为靠山的政变使国王重回王位，他对西方的依赖更深了。

为平息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骚动，伊朗国王出台了三项新政策。首先就是巩固其政治权力。他清洗了国内所有的政治革命者，并扩大了

他的警察力量来镇压穆斯林阿訇们的反对声音。他容忍了议会政治但却将权力掌握在他的政府手里。虽然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裁者,但其统治仍保持着专制性质。

他的第二项政策是恢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他将伊朗带入中东军事联盟,即同英国、土耳其和伊拉克为盟友的《巴格达条约》中去。他与美国签署一项单独的防御协定以表示他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作为回报,美国政府向伊朗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支援,比除北约盟友之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多。此外,美国顾问帮助国王训练其军事力量,以及为其建立新的警察部队提供帮助。在国际力量政治事务中,伊朗国王使他的国家与西方紧密站成一排。

国王的第三项政策是使伊朗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他将这一计划称为一场"白色革命",即将政治秩序(以王室的颜色白色为象征)和社会改革结合在一起。他解释说,他的目标,是使伊朗迈入"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利用出售石油所得的资金,他的政府大量投资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服务业,没收穆斯林宗教团体的大量土地,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

在社会和文化事务中,国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他参照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改革,将其作为自己的世俗化计划的范例。伊斯兰教将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并被限制在宗教崇拜和道德的私人空间内。民法而不是《可兰经》中的教法,规定婚姻和财产关系。国王的政府不鼓励妇女戴头纱等穆斯林传统的习俗,并贬低伊朗过去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地位是由于伊斯兰教光辉的缘故。在国王看来,伊朗的历史早在 18 世纪伊斯兰教到达这个国家之前就已经十分辉煌。 380

挑战穆斯林宗教领袖的权威使国王直接与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等伊斯兰教长发生对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卫"伊斯兰国度"。其中最有威望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为一项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习俗和教法的原教旨主义事业而斗争。他最深的信念,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中的那些人,促使他起来反对现代化和世俗主义。他大声扬言反对国王的改革,这使他于 1963 年被逐出伊朗。

国王富有雄心的改革计划道路上的障碍是巨大的。他所面对的一些严肃反对他统治的声音,来自要求政治自由的团体——绝大多数是学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者,以及来自宗教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主要是城市贫民阶级。为了达成他的经济改革目标,他耗尽了他的国库,石油贸易的收入对他的宏伟计划来说是不足的。由于疯狂的通货膨胀,社会骚动加深了,飞速的经济增长也加重了拮据状况。

对他政权的核心反对力量来源于穆斯林的教长们。他给予妇女选举权,将民法作为婚姻、家庭和继承的依据,并且剥夺了伊斯兰教宗教机构的广大地产。由于这些原因,穆斯林领袖们认为他并不适合统治这个国家。70 年代中期,他们组织自己的支持者来推翻他的"无神"政权。反对国王的力量迅速增长。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是极为有效率的革命者,在几年里,他们组织起一个广泛的反对国王的联合团体。1979 年,他们精心策划了一次民众革命结束了国王的统治。示威者控制了城市的街道,工人进行了罢工,使石油产业的生产瘫痪,军队被革命情绪的高涨弄得不知所措,军队哗变了,拒绝对游行者射击。缺少了人民的支持以及压制起义的手段,国王被迫出走。

霍梅尼得到了胜利。他是革命者的精神领袖,并成为 1980 年出现的伊斯兰神权国家的主要建设者。他对《可兰经》的严谨的理解启发了他的激进的改革纲领。他坚信,根据这一纲领,他能够建立一个伊朗的伊斯兰教共和国,它的宗教纯洁性,以他的乌托邦的视野来看,将重建穆罕默德最初的国家形态。标志伊斯兰教习俗的重生的象征,是他下令妇女必须重新隐藏在传统的头纱后以符合伊斯兰教的习俗。

这个伊斯兰教共和国期望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恢复伊斯兰教教法和信仰。它的宗教领袖掌握着在伊朗政府和立法机构中的权力,指挥着一支维护治安的民兵组织,他们负责惩罚那些违背伊斯兰教习俗的伊朗人。宗教领袖们号召所有穆斯林回到《可兰经》和伊斯兰教教法的严格指引下,他们在革命后的几年里同时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中找到了支持者。这些人成了 80 年代动乱背后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生力军。他们谴责那些削弱伊斯兰教统治和习俗、实

381

行世俗化的统治者。他们许诺受《可兰经》对减轻城市大众的苦难的社会关怀所启发的改革。他们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复兴的、团结的、具有伊斯兰信仰的社会。

通过言辞和行动，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将他们的激进纲领传播到远远超出伊朗边境之外。文化、社会或是政治领域的公众人物都成为他们宗教忿恨针对的目标。1988年，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布对印度作家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处决令，他因为出版了一部名为《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的小说，被认为是亵渎了穆斯林的信仰。拉什迪被迫离开了他的家乡，在外避居多年；两名他小说的译者(在日本和挪威)被谋杀，杀手据推测是霍梅尼的拥护者。伊朗政府给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信仰受到威胁的土地上的恐怖活动予以支持，包括慷慨的补贴。他们号召伊拉克的穆斯林去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当伊拉克于1980年入侵伊朗时，他们驱使伊朗军队去摧毁萨达姆的军队。但他们的圣战在此失败了。阿亚图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拉克只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同情者，而其中更少的人愿意准备冒其生命危险进行他们的宗教事业。伊朗军队得以将伊拉克军队赶回了他们的边界，但面对伊拉克的现代化武装(包括致命的化学武器)他们没法再前进一步。战争于1988年以一个停火协议结束，战争造成上百万伊朗人死亡。

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在90年代逐渐减弱了施加于人民身上的严格教法。在私下场合和“道德警察”视线之外，许多民众在诸如伴随西方音乐跳舞、观看西方电视中获得了简单的消遣。但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们，仍在政权背后把持着权力，坚持他们的一个引导正直生活的、神权政治领导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的梦想。

他们的信条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家找到了同情者，特别是在那些政府对平民大众的贫困生活无能为力的伊斯兰教国家，支持者尤其众多。90年代早期，许多在中东和亚洲的其他国家的政府使伊斯兰教教法成为他们国家的立法依据。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信徒发动起义反对政府在大选中控制选举，由此引发的军事政权的内战导致了平民骇人

听闻的伤亡,保守估计有将近 10 万人死亡。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对那些信仰宗教容忍和公民自由是给人身完整最好的保障的人来说是一股恼人的趋势。原教旨主义者捍卫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但却带来了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以及拒斥不管人民的宗教信仰如何,都会保护人民的公民自由。伊朗的革命表明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和世俗改革激起了基于伊斯兰教价值观和习俗的更深更坚决的抵制态度。

伊拉克的石油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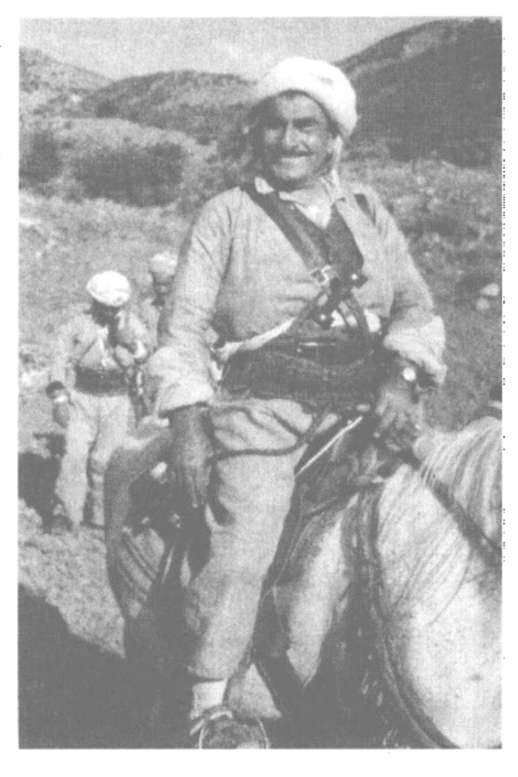
在 80 年代,除了以色列以外的几乎所有中东国家就陷入了专制王权的统治之下,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具备自由选举和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民主政治体制来运作的。各国出现强有力的领导人的一个原因是到处存在的互相敌对的社会、种族和宗教团体。当他们互相虎视眈眈之时,是不会有一个针对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权利的共识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常常依靠特定的民族或部族来获得忠实的拥护者,相互为了权力而斗个你死我活。尽管得胜者声称其为祖国利益、为全体阿拉伯人或为伊斯兰教着想,但他们主要却是在致力于维护和保存政治权力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和特权。

382

伊拉克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差不多符合了这一专制统治的模式。这一国家的领土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四周为中心,曾一度名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那里居住着包含中东绝大多数主要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形形色色的居民。主要的居民(近三分之二)是信仰什叶派的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的数量也同样很多,小群基督教民众星罗棋布在境内。国内的穆斯林主要讲阿拉伯语,但北部山区地带居住着一大群库尔德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1940 年,伊拉克脱离英国统治独立,留下了一个由费萨尔一世国王(King Faisal Ⅰ)统治的国家。他的统治开始于 1921 年,当时这个国家作为国联托管地开始得以存在。他的民众只给予他微弱的支持,他同样也对他的臣民报以蔑视,他评价他们“没有一点爱国热忱,满脑子宗教偏见,不受约束”。在 1959 年,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推翻了他的

王权，尝试进行军事独裁统治。在接下去的10年里，军队中的政治冲突只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骚动和混乱。终于，在1969年，一个进步的、称自己为“复兴党”的世俗党派在一场血腥的起义中夺取了政权。他们的领导人中有一位年轻的名为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人，他在这一党派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一党派的政策大量吸收了50年代在埃及由迦玛尔·纳赛尔所推广的社会主义、世俗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纲领政策。萨达姆·侯赛因凭借1969年起义前的地下斗争的年月里磨练出的组织能力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之一。



库尔德武装，1965年(Getty Images, Inc.)

在他当权的早年，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同志们继续实行他们所宣传的国内改革。第一步就是接管兴隆的石油产业。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的猛涨给他们的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在整个70年代，他们利用这笔财富来投资新的工业发展部门，提出一项内容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卫生保健和养老保险，并且扩展了国家的教育体系。他们鼓励妇女去寻找教师、医生或律师等工作。

383

为了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复兴党领导人出资将讲阿拉伯语的居民重新安置到国内其他族群聚居的地区。他们强制将库尔德人迁出北部核心城市，安置入来自南部的阿拉伯移民。最后，他们加强了军队建设，花费了大量资金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军，并将陆军机械化(从苏联大量购买装备)。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撤退至山区继续他们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但却难有所成。到了这一个10年的结束，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实力的国家之一。

在那些年里,萨达姆·侯赛因逐渐建立起他对复兴党乃至对整个伊拉克的控制权。他利用他作为秘密警察总长的影响在这个一党制的国家里清洗了他的对手,同样也压制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势头。政府的领导人聚集在革命指挥委员会(the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仿效纳赛尔在埃及所建立的)中,在那里萨达姆可以不依赖复兴党而掌控政府。1979 年,他消灭了他最后的对手。他公开承认他的统治是约瑟夫·斯大林式的。他成了"总统、领袖、斗士"。那一年他成为伊拉克的独裁者,他达到他的权力高峰是通过(就如苏联人评价斯大林时所说的)"爬过他的敌人的尸体。"

他的统治方式带有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明显的相似性,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只是作为在他那分裂的国家中维系人民团结的一根意识形态的纽带。伊拉克是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就是说,它缺少一个主流的民族团体,而他则用专制统治来替代这一个整体。民族主义成为这一体制内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就像早期的欧洲法西斯领袖那样,他常常宣称自己是为广大伊拉克人民着想而来统治他们的,同样就像法西斯领袖一样,他赞誉军人和战争。他也谋求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就像他之前的纳赛尔一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准备推动反对以色列的十字军征讨。他的军队是这一事业的关键工具。他着手开始一个发展核武器的秘密计划,但这一计划意外受阻,原因是 1981 年,以色列的轰炸机摧毁了伊拉克境内的核反应堆。就像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一样,他为发动军事征服而开动了国家的人力和经济资源的引擎。

萨达姆的第一个目标是伊朗。伊朗的石油富集地处于和伊拉克的边境地带,在 1980 年,这个国家正处于伊斯兰革命的阵痛之中,并且它的穆斯林领袖正发起号召去推翻萨达姆的"无神论"国家。那一年,萨达姆下令他的军队入侵伊朗来结束这样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他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波斯湾附近的伊朗油田,他最初设想夺取这一目标应该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在最初的胜利后,他的军队面对伊朗的"圣战"不得不撤退。为了击退伊朗军队,他动用了他军队的所有装备,包括化学武器在内。他从周边那些恐惧伊朗穆斯林狂热政权的国家那

里获得了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援，甚至美国也出售军备给伊拉克，这是出于经过时间考验的势力均衡的政策，也就是“我敌人的敌人即是盟友”。

两伊战争持续了八年，直至这两个国家被战争拖垮，最终签下了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军队撤回各自边界内，萨达姆所梦想的辉煌胜利给他的国家留下了 50 万的人员伤亡和 800 亿的外债。只有最疯狂的想象才能使人相信 1988 年的停火是伊拉克的胜利，而萨达姆就在公众场合坚持这一不切实际的看法，却没有人敢于驳斥他。

384

现实的情况是，他将伊拉克的资源挥霍在一场无谓的侵略战争之中，使他的国家欠下其他阿拉伯国家大量的债务。而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中有一个边邻伊拉克的科威特王国，这个国家具有非常惊人的石油储备(被认为是位列全球第四)。这对伊拉克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并且面对萨达姆的强大军队，科威特是毫无抵御能力的。萨达姆决定第二次发动为石油的战争，一旦获胜，他的国家将会统领中东地区。

萨达姆的军队于 1990 年夏越过科威特边界，他希望国际社会对他占领这个弱小邻邦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对。而那个曾经给他的国家支援过绝大多数军事装备的苏联政府，正陷入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导致的严重政治危机之中。苏联政府在伊朗的顾问团失去了对萨达姆外交政策的所有影响力。而美国政府在之前的几年里数度徒劳地动用其军事力量，包括在 1980 年的伊朗解救大使馆人质的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及在 80 年代早期对结束黎巴嫩内战的无能为力，使得维护国际和平对美国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伊拉克的军队在弱小的科威特军队那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接着萨达姆·侯赛因即刻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的一个省份。

然而，胜利并非如此轻易，在数周内，萨达姆不得不面对自二战以来在联合国领导下的最为强大的军事联合体。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征服给全球所有的领导人昭示了冷战后两条重要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首先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外国的保护，任何小国在对其虎视眈眈的邻邦面前都是极其脆弱的。联合国在原则上保障一国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但只有在它强力的成员国联合下才能有效保证这一承诺。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事实。石油价格决定了那些遥远国度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伊拉克夺取科威特的油田使萨达姆得以主导国际市场。伊拉克周边的中东国家如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早已纷纷发觉伊拉克是一个威胁他们全体利益的国家，而远在日本和阿根廷的这些政府认识到他们在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苏联和美国曾一度是死敌，却发现在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上他们有共同的联合目标。

这一联军的首领是美国，其政府在美国的战略利益要求其取得获取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手段的问题上争论了将近 40 年，现在，它已经公开向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实行保护措施。萨达姆·侯赛因在科威特的突然胜利给这些地区的安全带来了问题。萨达姆的军队可以轻易地越过科威特边界进入沙特领土，而他对反以色列团体的支持，特别是对巴解组织的支持，提高了另一场中东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来谴责伊拉克的入侵行动，安理会引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全体一致反对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军事征服，并要求伊拉克撤军。这一声明奠定了这些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合的基础，很快他们的数目就超过了 30 个，在提出谈判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为战争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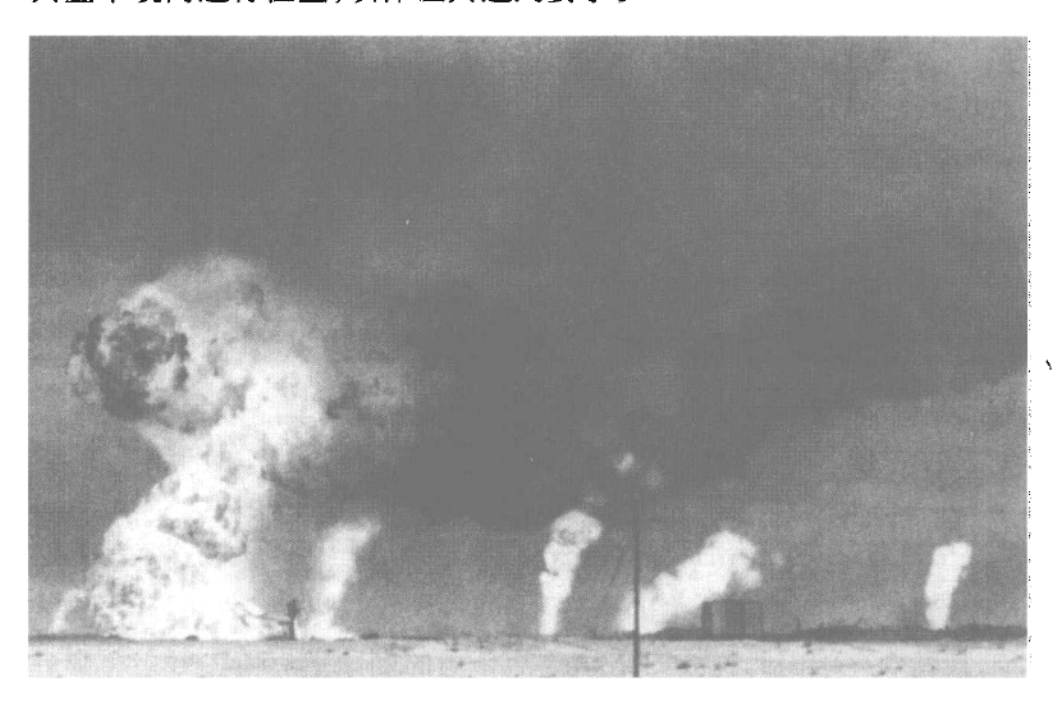
打败伊拉克的战略分两步进行。首先，国际上的经济封锁切断了伊拉克的对外贸易往来。但这一措施是不完整的，因为伊拉克周边的国家伊朗和约旦并不支持这一国际联盟，并让伊拉克的物资得以通过其边界。萨达姆·侯赛因拒绝认真考虑撤军要求。为结束这一僵局，联盟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开始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空中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空军力量，接下去是在 1991 年 2 月，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装甲部队为先导的、对科威特的一次地面部队突袭。这些部队使用了最新的电子战武器以对抗伊拉克军队。大量的伊拉克军队和平民在试图撤离科威特时死于空袭，伊军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投降了。

385

然而联合国军队在抵达首都巴格达前止步于伊拉克南部。联军的阿拉伯成员国更希望获得使伊拉克垮台的局部胜利，美国军事将领则

希望将他们军队的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萨达姆·侯赛因宣布投降并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

联军的军事胜利是有限的但却很有效率，其解放科威特的主要目标以全部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而达成了。在这以前，伊拉克特工爆破了科威特所有的800个油井。石油所引发的巨大火灾在完全燃烧殆尽前污染了这一地区的大气有将近一年。萨达姆保留了他的统治，但联合国采取严厉的制裁来限制他的政治权力。伊拉克政府必须拆除其核武器设施并销毁它的生化武器的库存，并允许联合国检查官员通行其整个境内进行检查，以保证其达到要求。



沙漠中的大火：科威特油田，1991年（Benic/Getty Images Inc.-Hulton Archives Photos）

386

而联合国的最史无前例的行动就是在伊拉克北部为库尔德少数民族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全部的2 000万库尔德人分散居住在整个北部中东地区，有超过300万人居住在伊拉克。他们以将自己从伊拉克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目标所不断进行的起义，每次都以败退以及许多库尔德村庄被摧毁而告终。库尔德人游击队武装冒着落入萨达姆军队之手的危险参加了1991年的战争。为了防止另一次种族大屠杀，联合

国要求伊拉克政府从库尔德人的土地上撤出军队,库尔德人应该管理他们自己的土地。联军的战斗机定期在伊拉克北部执行巡逻任务以防止伊拉克空军和陆军进入这一地区。联合国从来没有像这样过,通过动用其武装力量来分隔这样一个威胁本国少数民族生命的国家的地域。库尔德领导者们给伊拉克境内标记了一个叫做"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标志。

中东又回到了一个不稳定的和平状态。萨达姆试图主导整个地区的尝试失败了,为保证他不再企图将其军队领入另一场战争,美国海军保持在波斯湾附近游弋,一小群美国空军和地面武装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对伊拉克的经济封锁依然持续,伊拉克大量油田生产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小规模出现,作为联合国允许采购的民用物资。伊拉克仍然保有全球第三大石油储备国的地位,它的石油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萨达姆的政权依仗这一事实作为他们未来政治力量发展的希望。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萨达姆卑微地保持着他的独裁地位[①],统治着一群在战争废墟中艰难维生的贫苦大众,而这一切都是他的责任。

小　结

中东地区的政治活动在非殖民化后的年代里表现为一次次不断进行的内部纷争和专制统治的事件。只有以色列,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埃及,其民众在国内的民族团结和政治参与的问题上有所一致。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政府排除在享有完整公民权之外。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被宗教和民族群体中积怨已久的仇恨所深深分裂开来。各族群对社群纽带的强烈执着是源于他们对施行压迫统治的政治领袖充满了不信任。这些领袖对全民团结夸夸其谈,但却以自己的政治拥护者、民族团体或是氏族的支持来实行他们的统治。对族群的效忠无

① 萨达姆的统治已于 2003 年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推翻,他本人也于 2006 年被执行绞刑。——编者注

处不在，以至于那些观察家们将这一趋势称为是部族主义的新形式，即排外的民族团结。

当这些族群忙于进行内战时，谈论国家建设实在是种讽刺。在黎巴嫩的例子里，战争冲突使国家分裂了整整十年，而军事独裁者的专制统治使用武力将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冲突也产生了腐化的政府，他们对平息族群不合或是推动经济发展以减轻他们人民的贫困无能为力。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石油维系了伊拉克和伊朗等幸运的拥有大量石油储备的国家的收入，而其他国家则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宗教问题的持续重要性使中东地区比战后世界的其他任何地区更引人注目。在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原教旨主义团体一直保持着对思想和行为的宗教纯洁性的关注，并不断与世俗主义者和女权改革主义者斗争。劳苦大众每日的生活被痛苦和不安笼罩，许多穆斯林在他们的信仰中寻求支持和慰藉。他们也被宗教领袖所设想的重建精神价值的思想所鼓励而去奋斗。这一维持信仰的斗争夹杂在技术奇迹和西方现代化影像的环绕下却要为维持信仰而斗争，这正是导致遍及整个中东的私人生活和公共事务危机的根源。

387

本章大事记

1939 年　沙特阿拉伯开始石油生产
1945 年　阿拉伯联盟的形成
1948 年　以色列独立
1948－1949 年　第一次中东战争
1952 年　纳赛尔上台
1955－1963 年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1956 年　纳赛尔夺取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战争
1960 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
1963 年　阿尔及利亚独立
1964 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成立
1967 年　第二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

1973 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
1975－1981 年　黎巴嫩内战
1979 年　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
1979 年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1980－1988 年　两伊战争
1988 年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区起义
1990 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1 年　海湾战争
1993 年　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的奥斯陆和平协议
1994 年　以色列与约旦的和平协议

推荐阅读

战后中东

Fred Halliday, *Nation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East* (2000)。一部对伊斯兰现代政治极有价值的研究著作，聚焦于中东民族主义问题和伊斯兰教。

Efraim Karsh and Inari Rautsi, *Saddam Husse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91)。至今为止这名伊拉克独裁者最好的传记。

* Samir Khalil, *Republic of Fear: The Inside Story of Saddam's Iraq* (1992)。一位伊拉克难民所作的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崭露头角的历史。

* Bernard Lewis, *History: Remembered, Recovered, Invented* (1975)。一部关于最近在伊朗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神话的创造的著作。

Roy Mottahedeh,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1985)。一部关于 20 世纪伊朗穆斯林教长所体现的具有影响力作用的引人深思的探究。

以色列及与其有关的几场战争

Michael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48*

(1982)。一部客观评价大国在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国家建立中的作用的著作。

*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 *O Jerusalem!* (1980)。一部生动记述以色列人独立斗争的著作。

Charles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88)。一部清晰展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战争历史的著作。

回忆录和小说

* 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1989)。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对其在 80 年代中东经历的扣人心弦的回忆录。

* Naguib Mahfouz, *Midaq Ally* (1966)。对一个开罗家庭在二战结束时状况的深刻描述。作者为埃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目标)。

Golda Meir, *My Life* (1975)。从俄罗斯的犹太人居住区到成为以色列首脑的一段不同寻常生活的个人的回忆录。

388

第十三章　西方：从冷战到欧盟

- 新产业革命
- 欧洲各国与欧盟
- 苏联解体

重点：社会变化与妇女权利

聚焦：安德烈·萨哈罗夫

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几十年里，冷战主导着全球关系。随后，它突然结束了。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层曾诉诸继续保留斯大林主义的基本体制，通过看上去几乎是难以置信的独裁维护着该体制。在西方国家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时，东方的整个共产主义体系却陷入停滞之中。长期不为外部所察知的苏联内部弊端，迫使其新领导人在80年代开始风险重重的改革。改革尝试失败了，共产主义体系于1991年土崩瓦解。冷战与苏联一道消失，留下了数以万计毫无用处但却致命的核武器。

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民众的反抗已风起云涌，整个卫星国体系在1989年的几个月里瞬间消失。苏联改革主义领导人的首要举措，就是公开谴责斯大林体制，该体制仍在东欧各卫星国里运转。这些国家的人民欲从苏联主导和共产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深切渴望，导致了大量的民众反抗行动。这些东欧政权的崩溃速度是革命性的，改革范围是突破性的，新领导人们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法则。整个过程与先前的革命鲜有相似之处，因为它的发生几乎没有伴随暴力行动。389

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向过去回归，因为新中欧类似于 1919 年巴黎和谈确立的民族国家版图。

在俄罗斯和东欧，斯大林时代留下了苦涩的回忆，以及政治压迫和破坏自然资源的遗产。在这些地方，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曾宣称，他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的样板。如今，“极权主义”成为谴责令人憎恶的过去的流行语汇，到 21 世纪初，俄罗斯迈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步伐看上去进展良好，倒退回共产主义制度已成为不可想象之事。

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欧洲重建发生之际，正值如此重要乃至被称为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发明面世之时。欧洲各国人民享有二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体制带来的种种好处，享受着比这个大陆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闲暇时光。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和公众对自由主义政治目标的认同，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公共生活的重大争论讨论的是二战后改革存在的不足之处。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新的欧盟，欧洲各国的联合过程变得愈发强劲。到 20 世纪末，欧洲从许多方面彻底改造了自己。

新产业革命

西方 20 世纪下半期的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技术革新。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子和计算机工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中心，它们的管理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任何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地方建立生产基地。全球相互依存的根本性新情势，让西方不再有可能重返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岁月的经济孤立主义。

电子时代

计算机和无线通信工具的出现，首先在西方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信息在发达国家和来自全球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中实现同步传输和解码，这种新兴的电子工业消解了边界，开启了通往海量知识的途径。但政治和文化壁垒仍然存在，知识共享是受限的、不完美的且经常产生误解。只有其操作者才能让这种现代技术变得有效，他们主要用它来谋

求经济利润。

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电子和通讯作为重要产业方才出现，它们作为新发明的直接结果开始迅速发展。该领域的技术革新，把火箭和地球卫星的成熟技术、分析信息的超级强大的计算机、世界范围内数据即时传输的电信设备和电视荧屏连接到一起。从事这些发明的科学技术工作复杂而昂贵，主要集中在西方和日本，这里的私人企业和公共机构为昂贵的研究提供资金。大多数新设备服务于企业的需要，企业在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又将之带到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新部门促动了新的产业革命。

390

电视对大众文化起着最大的直接影响，它提供的交流频道，通过图像和口头文字，扩大人们对社会政治状况的认识。在战前就已发明的电视，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才在西方各国广泛地普及。紧接着，它开始在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出现。

广播公司在美国是私有私营，在大多数国家则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生产电视的费用要求得到国家的财政拨款，更重要的是通过电波控制信息的选择权和阐释权。当被用于推动如民族主义之类的政治事业时，电视传播的信息，在视觉图像的强化下，是有史以来威力最为强大的宣传工具。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电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建设计划中迅速扮演起中心角色。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教育和娱乐工具，电视提供了一种革命性手段，克服各民族间误解和偏见的樊篱。与此同时，它构成了民族团结和政治教化的强大力量。

新的电子发明，为全球电视传播网络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形成了观察者所谓的“地球村”。通讯卫星于 1965 年在西方国家率先使用，它从一个大陆向另外一个大陆或在同一个国家内相距遥远的地区间转播信号，十年后，它们飞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小型廉价的圆盘卫星天线，让即便在那些实行新闻和电视节目检查国家的收视者也能收看到这些节目。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命令伊朗人拆除卫星天线，伊朗人过去曾用之绕开穆斯林僧侣荒唐可笑的宣传和笨手笨脚的审查。但法律没有起到作用，即便独裁政权也难以阻遏民众通过电视窗

口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

跨国交流首先注重娱乐，体育比赛尤其受欢迎。约摸 30 亿观众收看了 2004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外节目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电视产业制作的电影、歌曲、体育比赛、娱乐名人和流行时尚。各国国家电视网络力图以自己的节目阻止美国节目的泛滥。欧洲和拉美的电视网络也创作自己的“肥皂剧”，对取得巨大成功的美国模式——以电视连续剧形式戏剧性地表达日常生活——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它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情境，但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的全球流行和好莱坞娱乐产业的国际市场强有力地证明了西方电视的诱惑力。20 世纪后期的最新帝国是媒介帝国。

西方经济联系

二战后初期，在奠定全球经济生产和贸易迅速增长的基础方面，美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为国际贸易和贷款机构提供资金，刺激经济从战争破坏中恢复。美国经济的巨大财富，使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是欧洲和亚洲各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二战后不久，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它有着稳定的固定价值。直到 1971 年，美国政府一直保证每盎司黄金兑换 30 美元的币值，[①]以黄金为基准维持着美元价值的稳定。美国的对外援助，在战后初期主要流向欧洲国家，促进了经济增长。美国曾经的敌人西德和日本，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它们各自地区的生产中心，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391

像过去一样，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尤其生机勃勃。欧洲新的繁荣吸引了美国大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由于它们将雄厚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投资，因此被叫作“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为自己的产品建立新工厂，开拓新市场。对美国投资者来说，西欧快速的经济复兴，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最赚钱的市场，美

①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该是每盎司黄金兑换 35 美元，此处疑为作者之误。——译者注

国对欧投资总额从1950年的20亿美元跃升到70年代中期的600亿美元。在这二十余年里,欧洲银行和公司用美元进行交易和金融汇兑,欧洲人持有的美元数量如此之多,乃至他们所持的美元赢得了“欧美元”(Eurodollar)之称。

逐渐地,其他强势货币加入美元的行列,成为全球经济的交易货币。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不再统治世界贸易和工业。太多的美元流向大西洋彼岸,用以支付数量日益增长的进口商品。美国的通货膨胀开始贬损美元价值,一盎司黄金兑换30美元太便宜了,国际投资者和金融投资客日益转向德国和日本稳定的货币,他们卖出的美元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难以再维持美元的固定低价。1971年,美国政府被迫放弃金本位,允许美元价值根据市场需求浮动。不久,需要300美元才能买到一盎司黄金。

对其余货币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拥有稳定不变的国际价值。在当今不稳定的金融世界里,美元依然是风险最小的货币。20世纪90年代,在诸如俄罗斯等遭受高通胀的国家,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选择用美元进行交易。一些南美小国不能控制本国货币的通货膨胀,采用美元作为法定的交易介质。

20世纪后期,币值不稳定刺激了全球性的货币投资,有时候,这种投资制造出国际性金融危机。1997至1998年,国际投资者担心对东南亚和俄罗斯的风险贷款会亏钱,突然抽回他们的贷款,抛售他们手中所持的这些国家的货币。他们大规模恐慌性的抛售使这些币种急剧贬值,限制了进口,并把利率抬高到如此程度乃至造成严重的衰退。这场危机不久就结束了,但其教训是深刻的。每天有数万亿美元交易流通的世界金融市场,对决定各民族和各国的命运拥有巨大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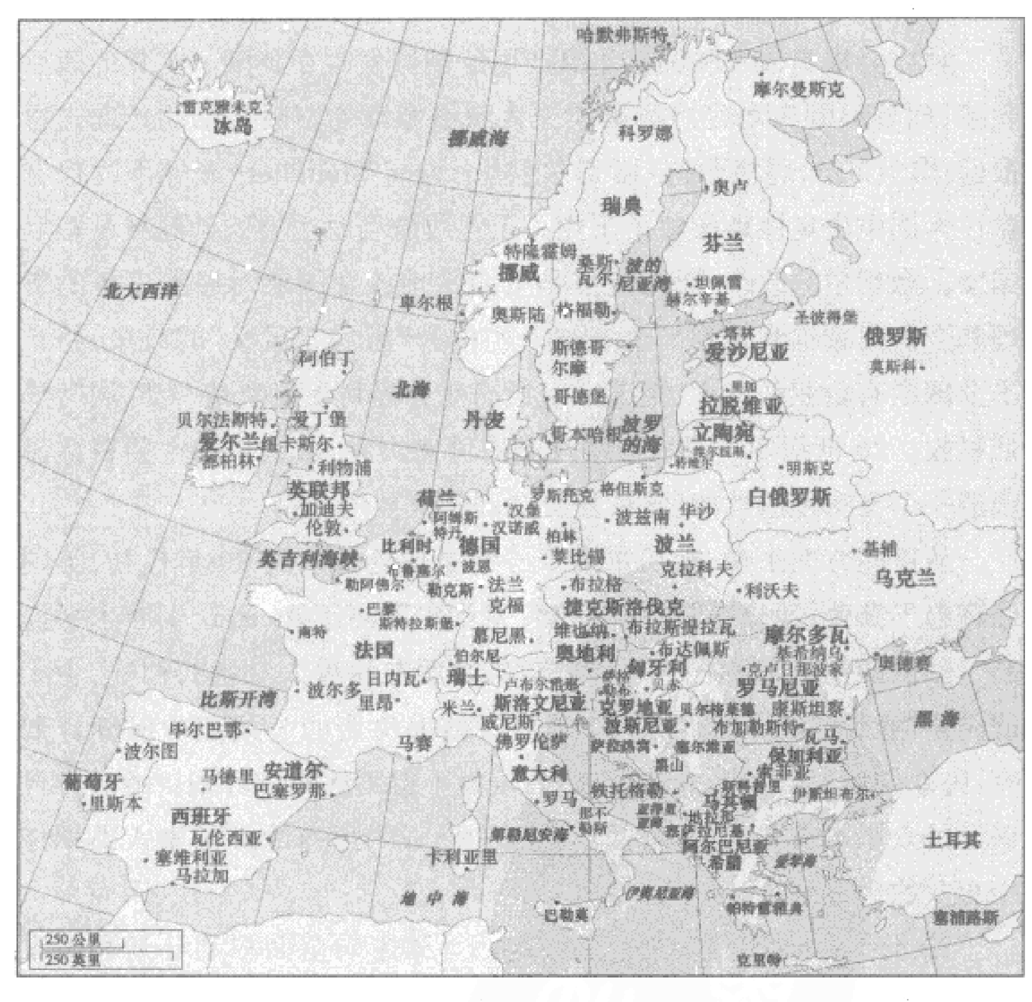
欧洲各国与欧盟

西欧诸民族,在世界上率先获得了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他们的国家、赞美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们的人民,在20世纪成为了其他民

族的样板——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民族主义的利与弊，都已嵌入了欧洲人生活的肌理中。出现在这些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一致，产生出持久的忠诚纽带。国与国彼此争斗的可怕世界大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民族主义狂热多么的具有破坏性。20 世纪 50 年代，西欧政客开始构建统一的、超国家的经济联合机制，该运动到 20 世纪末进一步加速。

392

到 20 世纪 80 年代，西欧诸国公民的关注点集中在矫正福利国家的缺点方面。但没有任何人正式提出要全盘取消整个福利社会体系，回归到 20 世纪初的情形。作为民众的“安全网”，它已成为西欧社会永久的特征。



1992 年的欧洲

393

修补福利国家

战后年代新的社会主义体系中存在的弱点需要修补矫正。这些问题包括：要求每年涨工资的工会压力引起的高通货膨胀率，需要国家补贴维持运转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广泛的福利计划花费日增造成的严重财政赤字和高税收。欧洲各国采取的解决办法各不相同，但在每个国家，它们都是缩减国家支持的社会服务范围，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所有者。穷人和劳工人口失去了其部分好处，但仍然有大量的工人投票支持提议削减福利国家责任范围的政党。"父国"(fatherstate)——正如德国人所称的，不再是国家福利唯一的或最高的保障者。

对社会福利体系和国有化最严厉的削减发生在英国。工党的战后改革，朝着限制市场经济和给予工人阶级慷慨的财政援助的方向走得很远。1979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下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工党。工党政府当时主要的问题就是福利国家。撒切尔的改革计划，内容是全面性地放弃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管理和全盘削减福利计划。逐渐被人们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将几乎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国家出钱的社会福利计划削减一半，同时降低税收。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改革被付诸实施，撒切尔的主要目标是塑造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经济，社会福利是次要的考量。

从这些方面来说，撒切尔改革计划是成功的。到 90 年代初，英国经济趋于繁荣，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失业率大幅下降，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即便是"铁娘子"——撒切尔的朋友和敌人对她的称呼，也不能完全消除社会福利计划。在她建议结束免费的公共卫生保健计划时，民众的反对声浪是如此巨大，乃至她不得不放弃该计划。战后时代保证民众基本需要的"安全网"梦想，业已成为所有欧洲国家人民期望中永久的组成部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也加入这一行列走向全面福利计划和国家更多地监管经济事务。1960 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开启了一

段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时代。1963 年肯尼迪遭暗杀后，林登·约翰逊继续执行这些改革。约翰逊在 1964 年把自己的改革纲领命名为“伟大社会”，其中包括了保护所有公民民事和政治权利的新立法，目标是结束对黑人漫长的种族隔离和压迫。为了“向贫困开战”，改革也推出了新的福利国家政策，它们在精神上和意图上都类似于战后欧洲引进的那些社会福利举措。但美国没有任何私人企业被国有化，政府的年度预算以及由联邦机构（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执行的银行和利率控制，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激发出来的那种方式引导着国家经济。后来，保守的政治领袖响应欧洲提出的主张，对高税率和昂贵的社会福利提出质疑。像英国一样，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大多数选民似乎更关心创造性市场经济的成功，而不是国家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许诺。

在欧洲大陆，同样的对社会福利政策修正进程也在进行。它们对社会福利计划的削减堪比英国，不过其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且没有如同撒切尔及其支持者那样的意识形态狂热。欧洲大陆温和的原因之一，是改革恰好发生在工作的欧洲人正享受着比以往更多闲暇时光之时。21 世纪初，他们每年带薪休假时间平均高达六周，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低于 40 小时。他们的收入比美国人少，但大多数欧洲人相信，他们的生活质量比美国人高。正如一位丹麦人所言：“我们花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

394

欧盟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间的商业壁垒急剧减少，速度比条约签订者原来预期的要快得多（参见第七章），西欧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新时代。不论竞争主体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小农还是农业企业，共同市场均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运作。西欧除共产党外的所有政党都赞同经济联合的希求。

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夏尔·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之时。他不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期望一个（在他自己领导下的）“由各国组成的欧洲”（Europe of Nations），而不是一个“欧洲合

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然而,他属例外情况;在他退出法国政治后,他的国家再次变成一个合作的成员,不再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共同的利益和未来合作的共同梦想,确保了参加国在贸易领域永远不再宣称拥有完全的主权权力,欧洲共同市场是真正超国家的。

欧共体国家的繁荣保证了其影响力不断增长,美国政府承认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新角色。1963年,美国与欧共体签署了一项全面的条约,降低关税,欧美之间更加自由的贸易让两个大陆的企业获利。它还加强了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班牙、丹麦、希腊、英国和爱尔兰等重要成员的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了。到80年代后期,欧共体国家总人口达3亿。此时,它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自由贸易区。

它的吸引力辐射到欧洲南部和东部边缘的国家。从物质方面来说,共同市场给其成员国带来了大量的好处,这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来说尤为明显。他们之中前来北方繁荣的经济体中寻找工作的人数日众。欧共体国家根据协定运转,协定要求所有国家必须是民主的政治体制,尊重人权、实行市场经济,只有尊重这些公共生活基本原则的国家才有望加入。在欧洲大陆南部边缘,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统治不符合这些条件,它们在70年代全部都让位于民主的政治体系。每个国家的政治动荡都带来了急剧的转型,在这三个国家中,许多群众和秘密政治运动虽经历多年的镇压,仍都信奉人权理念,而北方共同市场的存在,进一步鼓励了三个国家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要求结束这些压迫性的政权。

在西班牙,政治转型急速发生。1975年,自1939年在西班牙内战中获胜以来的独裁者佛朗哥将军去世,按照他的要求,取代他的是西班牙前君主政体的继承人。面对着对持续独裁的普遍反对,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下令立即举行大选,准备制定新宪法。1977年,他将自己的行政权让渡给新选出的政府,西班牙成为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尽管受到来自一小撮佛朗哥支持者的抗议,新政权仍在短短几年内就在全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来自本国民众和欧洲国家同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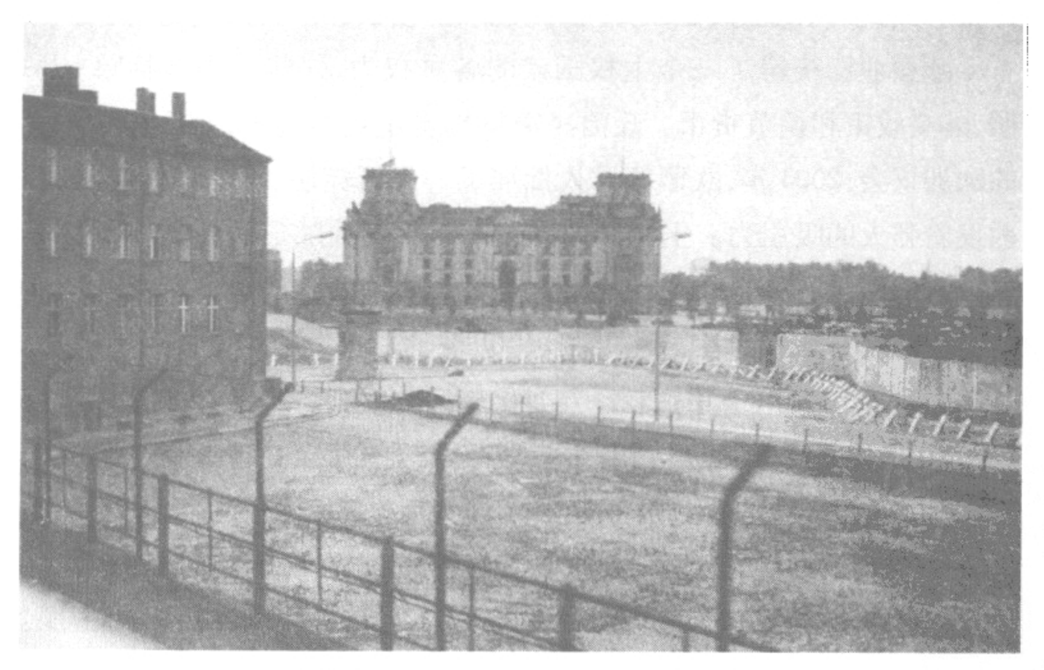
395

的压力，在同一时期结束了希腊和葡萄牙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三个国家很快都成为了欧共体的新成员。

欧洲人当中进一步联合的梦想，导致了90年代初强化他们经济联系的新一轮努力。1994年生效的新的联合条约，把这个国家间的组织更名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它最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在整个地区实行单一货币。为了实现该目标，各国政府必须降低通胀率、平衡预算，但它们只有在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这两点。尽管它确实重新从富裕成员国向贫穷成员国配置财政资源，但新欧洲并没有尝试削平社会不平等。

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马上同意建立货币联盟。仍然眷念其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拒绝加入，其他小国也是如此。在德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主要的大陆国家继续努力，创造共同货币所需的全部条件。对它们来说，为财政金融的统一值得放弃自己的货币和建立协调的财政政策。1999年1月1日，被称作欧元的欧盟单一货币投入使用。

只要冷战还在延续，这个新欧洲的边界就不得不止步于铁幕之前。396 大陆的冷战分裂威胁着欧洲复兴，并使人们时刻心怀恐惧，担心又一次



分隔的柏林：柏林墙，1970年(Daniel R. Brower)

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成为战争的中心。为了确立东西方稳定和平的原则，1975 年，西方国家邀请共产党国家代表前来芬兰赫尔辛基。来自东方的谈判者渴望就欧洲各国新边境的永久性达成协定，尤其是苏联和波兰之间的边境。作为交换，西方外交官希望得到共产党国家承认，人权(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政治统治唯一稳固而正义的基础。

东欧各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承认个人自由是必要的或值得向往的目标。但为了确保永久性国家边界，它们答应把这个民主制的基石包含在最终的《赫尔辛基宣言》中。各缔约国同意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致力于尊重“基本的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这在当时看上去就是一个虚幻的承诺，东欧各国政府会漠然视之。

但当东欧共产党政权在 80 年代末消失后，《赫尔辛基宣言》为东欧国家奠定了基本条件，使它们能够加入繁荣富裕的欧盟，重新与这个大陆的其余部分融为一体。在向民主国家的政治转型和市场经济完成后，联合成为可能了。2004 年，共有 10 个国家加入了欧盟，其中包括曾经属于苏联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是欧盟历史上单次幅度最大的扩张。到此时，欧盟成员国 25 面旗帜飘扬在欧洲议会大楼的门口。

欧盟业已获得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单一护照、外交政策和调节货币。政治决策机构也建立了起来，包括选举出来的欧洲议会；2004 年，欧盟领导人批准了一部新宪法。欧盟对周边各国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土耳其政府——在欧洲大陆最边缘且人口几乎全部是穆斯林——也在被考虑接纳进来，欧洲一体化的势头不可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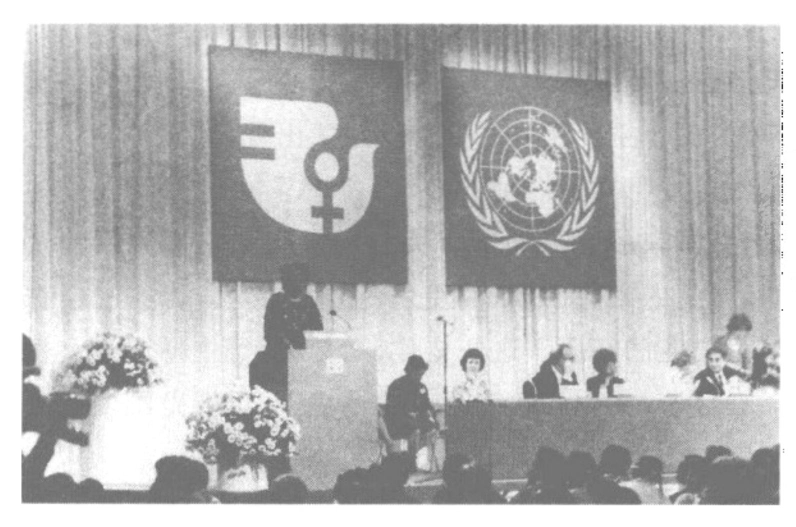
重点：社会变化与妇女权利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所有主要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和角色。这些变化，部分是国际妇女运动的回响。该运动要求通过法律权利的平等，赋予妇女对自己生活更大的控制权。妇女运动经常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在许多国家至今仍然是争议巨大的主题。1975 年，联合国通过设立"国际妇女年"(1980 年和 1985 年再次这样

做)给予支持，并宣布 1975－1985 年为“妇女十年”。有关妇女权利的国际会议，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参加者，它们标志着妇女权利问题业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

增强妇女社会角色的又一个全球趋势，来自公众对人口增长日益加深的焦虑。20 世纪下半期人口爆炸造成的社会经济困境，迫使各国政府——哪怕是那些敌视妇女权利的政府，提升妇女在限制生育率方面的选择权。在 1994 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这种前景表现得最为清楚。在大会上，主要问题是制定政策，促进家庭自愿采取措施限制家庭规模。与会代表们认识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妇女作为个人必须被给予更大的自主权。她们的选择权必须超越生育控制问题，扩展到能够获取提高生存条件的手段，其中包括教育和工作。在不发达国家，疾病和饥馑是常在的威胁，生育大量孩子构成了家庭生存延续的基本保证。当社会进步改善了妇女和男子的生活后，家庭就会有信心和动力把家庭规模限制在 2－3 个孩子。

对社会和经济进程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植根于对深远历史趋势的理解，并对妇女角色和家庭生活有着直接影响。这些变化在加强妇女对自己生活拥有更大控制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国际上的公众运动和政治改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重要。得到教育和就业机会有助于改善男女间的关系，使妇女更加强有力地吁求政治权利，促进妇女在母亲



第二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哥本哈根，1980 年（United Nations/Photo by Per Jacobsen）

义务和家庭关系中负担的减轻。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化重塑了成千上万人们的社会环境。到 20 世纪下半期，一半的欧洲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在第三世界，城市化进程发展要慢得多，那里的城镇人口比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 5% 上升到 1980 年的 25%。398 尽管这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时代，但城市化首先是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地区的结果。



妇女识字：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的成人学习班，1983 年(UN/DPI Photo by John Isaac)

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家庭，发现自己处于不熟悉的环境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主要是以雇佣劳动形式出现，城市里不同生活方式、语言和宗教价值观的人们频繁接触，产生了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这个时期，新兴国家的政府制定有关妇女权利和家庭关系的法律，这些法律削弱了传统的家庭习惯，或使之变成不合法。西方社会在半个世纪甚至更早之前业已经历了这些变化，在 20 世纪中期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巨变的情境下，世界范围内新的机会和旧的约束同时加诸于妇女和家庭。

20 世纪下半期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城市化是其中影响最大

的，逐渐削弱了旧的家长式生活方式。在经济需求、对更好生活水平与日俱增的期望和女性渴望有属于自己的收入的驱动下，家庭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妻子有了外出工作的自由。即使在非常贫穷的国家，得到财政资助的农村小企业也让妇女获得了工作的机会。妇女在家庭里作用加强背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提高生活条件的渴望。在巴西，这是让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大军和缩减家庭规模的主要动力所在，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国家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年女性从事工作，在 60 年代到 80 年代间家庭规模从平均 4 个孩子降低到 2 个孩子。

399

在第三世界许多地方，妇女被雇佣受到严厉限制。这里的妇女受教育不足，她们的经济机会也很贫乏。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找到更高报酬的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扫盲计划提高了妇女的识字率，达到了与男子同等的 60% 以上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她们大量地加入城市劳动大军。印度的情况表明，逆转也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的公共教育水平低，三分之二的妇女不识字，她们缺乏基本的正规教育，大部分人几无得到工作的希望，哪怕是最无需技能、报酬最低微的工作。

这些毫无组织且愿意接受低廉薪水工作的劳动人口，对小企业和跨国公司都是有利的。20 世纪 70 年代，后者在发展中国家的总劳动力增长到 300 万至 400 万，妇女在制衣业和这些公司的流水线岗位上占据主导地位。依赖远方的雇主、挣低微的工资，没有技能的女性劳工构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在大多数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能进入高薪水的技术岗位。男性歧视和缺乏足够的教育是提高妇女经济地位的主要障碍，但妇女挣工资和远离家乡的活动，依旧构成了摆脱传统家长制家庭模式的重大转变。

在大多数新兴国家，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问题在它们独立后不久就成为了政治争论的主题。在印度，政府在印度教徒中推动家庭平等的运动，得到了声援遵从政府新标准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强化。禁止童婚法把女性的结婚年龄提高到 17 岁，这是对 20 世纪之交婚姻习俗的重大改革。甘地结婚时 14 岁，而他的妻子只有 12 岁。这种变化还促进了印度出生率的缓慢下降。一些女权主义纲领借鉴西方改革运动的

启迪。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争取性别和阶级平等的样板。1949 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童婚和男性掌握绝对的离婚主动权。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们引入改革措施，旨在削弱男性的社会特权，把女性整合到他们的新社会秩序中去。

大多数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没有采取这样激进的改革。由于担心族群的冲突，印度政府没有尝试对穆斯林家庭强行实施两性平等，它没有挑战印度穆斯林人口的伊斯兰教教法，该法赋予男性在家庭和财产方面大得异乎寻常的特权。土耳其是唯一将伊斯兰教教法的角色让渡给从西方民法典借鉴而来的婚姻家庭法的穆斯林国家；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妇女权利法消失了。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经常使得妻子比以前更紧地捆绑在家务事中。照料孩子的义务直接落到她们手上，因为在新环境中她们没有了大家庭的帮助。丈夫利用较高的收入，迫使妻子习惯于从属地位。这样的逆转趋势在南亚十分明显，在这里的富裕人家里，妇女深居简出已实行了许多世纪，这种方式在 20 世纪下半期的新兴中产阶级中蔓延开来。法律改革要求和对更高收入的渴望，产生出争取更大程度上的两性平等的压力，但遭遇了习惯的男性权威和对女性的传统限制的强大阻力。

400

民主国家保护妇女享有全部参与权利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未保证女性很快接近公共职务的机会。妇女选举权本身非常重要，因为它挑战了男性对立法权，尤其是对涉及妇女和家庭事务的政策的控制。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把妇女在政治、教育、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平等权利变成其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中东地区领导政府的第一位女性就是果尔达·梅厄，她在 1967 — 1973 年间担任以色列总理。即使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和巴基斯坦，妇女也上升至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伊斯兰教没有清楚地界定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在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治领导人发起世俗改革运动，其中包括给予妇女选举权。伊朗国王把妇女选举权变成改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把自己的改革称为“白色革命”。该政策激起伊朗伊斯兰僧侣的强烈反对，当他们在 1980 年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袖后，立即结束了国王针对妇女的温

和改革。当这个政权的一名狂热支持者，被问及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回答道："让妇女回到面纱里去，让她们从电视边走开。"[1]

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全球发展趋向清楚地指向妇女在私人和公共两方面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的日益增加。这些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伊斯兰改革遵从的方式深受伊斯兰习俗的影响，但国际妇女运动与工作、教育和家庭生活等基本社会发展趋势两相结合，在社会中确立起一系列女性权利和机会，它们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实践方式，可以称为一场革命。

苏联解体

冷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结束于40年后。它的源头在于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扩张到东欧地区和西方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在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崩溃后它消失了。它的焦点原先在被西方和苏联分区占领的柏林。它是强权政治和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的结合，这两种因素的强有力混合，使得妥协和达成一致极其困难。在现代国家历史中，它给文明带来了最严重的威胁。

美苏之间的核武竞赛使爆发全球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时刻存在着，每一方都逐渐意识到使用这种武器将给它们的人民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它们都继续改进更加致命的武器，料想如果不这么做会让自己的安全处于危机之中。驻扎在柏林各自占领区里的苏联和西方军队，是每个超级大国为难以预料的核战争准备的质押品。

401

苏联的衰落

苏联周边的诸共产主义卫星国构成了该国的"帝国外围"，它通过

[1] V. S. Naipaul, *Voyage 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New York, 1981, p. 28.

加盟共和国的方式控制非俄罗斯民族，因此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帝国”。苏联领导人随时准备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保证任何共产党政府不被强行赶下台，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之间，他们曾两次派遣红军到民主反抗运动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国家。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无力阻止工会、知识分子和改革派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运动，运动反对苏联式的独裁统治和指令性经济。捷克改革派希望苏联接受他们的改革，他们承诺继续忠于苏联军事同盟。但苏联领导人担心，如果共产党统治在东欧消失，那么它在这里的“帝国”势力会岌岌可危。这一年 8 月，他们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莫斯科选择的傀儡政府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

不久之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红军业已付诸实施的原则进行辩解。他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主张苏联有权干预“社会主义阵营”里任何盟国的事务，以维护共产党统治。1979 年，勃列日涅夫再次应用该原则，他下令苏军进入阿富汗，支持那里脆弱的共产党新政权。

控制政府仅两年的阿富汗共产党，因其激进的改革，已与这个亚洲内陆国家各部族处于敌对状态。阿富汗的民众仍牢固遵从部族习俗和伊斯兰传统。名为“mujahaddin”的游击队，从邻国巴基斯坦得到了重要援助。针对共产党统治者的反抗运动威胁推翻他们脆弱的统治，苏联政府拒绝让这个新政权垮台，它派遣近 10 万军队打击阿富汗叛军，后者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担心，苏联要把阿富汗变成向南亚扩张的战略基地。曾经僻远的亚洲边缘地带阿富汗，成为冷战的热点。

共产党卫星国政府的弱点在波兰最为明显。波兰共产党的反对派来自知识分子、工人和强大的天主教会。波兰摆脱数个世纪的外国统治实现了民族统一。在纳粹占领的战争岁月里，波兰国消失了，1944 年苏联红军解放并恢复了波兰民族国家，它当即由共产党统治。波兰人民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敌视苏联控制下的政权，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仍然是民族团结的核心。1978 年，一位波兰教士被推选上天主教会的

最高位置，成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Pope John Paul, Ⅱ)。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影响更大了，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援波兰对共产主义的抵抗。

1980年，波兰全国工人参加总罢工，抗议缺乏自由和艰难的生活条件，地下反对派走向公开。教皇为他们大规模的和平反抗喝彩。他们创立了全国性的自由劳工运动，被称为团结工会(Solidarity)。波兰共产党权威尽失，团结工会赢得了人民的尊敬。苏联领导人威胁进行军事干预，以结束团结工会的统治。他们在波兰军队将领中寻找同盟者，波兰军方领导人害怕苏联入侵，准备动用自己的军队结束短暂的政治自由时刻。掌控着军队的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颁布了戒严法，宣布团结工会非法，逮捕了大量团结工会支持者，以军事独裁者的身份统治这个国家。 402



苏联的海报，抨击阿富汗游击队极其CIA盟友，1985年(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依然完好无损，恭顺的领导人执行着莫斯科的命令，他们的统治最后的救命稻草是苏联镇压的威胁。东欧在苏联“帝国”内看上去似乎不可撼动，阿富汗战争看上去似乎确认了苏联的承诺。冷战在这种状态下持续着。

对超级大国和对世界其余国家最具威胁性的，是这种紧张状态导

致超级大国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这种危险——双方领导人尤其清楚此点——表明急迫地需要他们找到某些共同的谈判立场，以延缓核武器竞赛。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为它们的外交政策服务，根据双方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理想界定着本国的对外政策。国际军备控制的实现，要求每一方都抛弃它们的意识形态分歧，直接面对基本的战略问题。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在 1969 年申明道，"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将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是根据它们国内的意识形态，判断其他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

双方愿意更多地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更少地以意识形态术语看待它们的冲突，使这对冷战对手单就军备问题进行谈判成为可能。按照这样的视角，全球竞争不需要无休止地开发威力更加强大的战争武器。在每一方接受了必要但不合逻辑的思想——这些武器仅用于阻止对方发动或威胁发动战争，之后才会产生这样的理解。

403

在相互疑虑和竞争的条件下，这个基本道理是达成一致唯一可能的基础。两个超级大国认识到，每个国家都需要足够的进攻性核武器，以阻遏对方的攻击，也就是说，通过毁灭入侵者的方式才能保护自己。每一方都能够保证其接受威慑政策，同意不建造防御性核武器，换言之，就是让自己的人民对彼方的核武器毫无防御。在冷战的情境下，这变成了和平的根本定义，一位美国领导人恰当地名之为"确保相互毁灭"（MAD）战略，它是美苏第一份重大的核军备条约成功达成的关键。

1972 年，双方签署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SALT Ⅰ）。在条约中，苏联和美国政府都同意不开发或使用防御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们业已开始安装的那些防御性导弹不得不被销毁。通过使用美国和苏联经常停留在对方国家上空的军事间谍卫星，对每一方履行条约情况进行检查。该条约结束了单方面的核军备竞赛，威慑战略成为美苏间和平关系的基石。

但该条约还不完整，它没有对开发新的防御性核武器予以限制。双方的科学家们，以特殊的军备竞赛话语，不断地使自己国家的核武库

现代化，他们的工作本身帮助维持了军备竞赛的延续。为了缓和这种危险的进程，1979年，美苏双方谈判者最终又签订了一个军备条约（SALT Ⅱ），该条约对一些进攻性武器的数量进行了限制，主要是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军备竞赛并未停止，但超级大国领导者们至少能够对他们的核武库予以了某些限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他们可怕的军事力量，至多能保持两国间“持久的战略僵持”（一名美国官员之语）。

美苏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局部冲突、新军备和政治竞争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1981年，美国新总统罗纳德·里根启动了比5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要广泛得多、也昂贵得多的军备计划。美国引进了一种致命的新一代导弹，可以在成百上千英里之外打击一个只有几英尺平方的目标，它还使用了另一种类型的导弹，配备着秘密的全球定位雷达系统，使之能紧随地形起伏飞行，避开苏联雷达防御。为了寻求终极的防御（实际上违背了SALT Ⅰ），里根总统授权开始一项计划，在美国之上的外太空建立一个假定不能穿透之盾，它将由包括巨型激光束在内的防御性太空武器组成，以对付来袭的苏联弹道导弹。美国向这个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注入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里根的军备竞赛损害了美苏军备限制条约，导致苏联政府加快开发自己的导弹武器。军备竞赛是超级大国未能给战后世界带来和平的悲剧性警示。

共产主义的终结

404

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已难以维持该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角色。年迈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部分出于他们僵化教条的信念，部分出于他们对帝国以及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衰败视而不见，仍紧紧地抓住全球大国的迷梦不放，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此时，一群较为年轻的共产党人甚至已开始提出大胆的改革计划，但只要斯大林主义者依然掌权，什么都做不了。

1985年，斯大林主义者最终失去了对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控制权。年纪大到足以记得并尊崇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革命的那一代

共产党人正在消失,他们的继承者拒绝遮掩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到处肆虐的政治腐败。从斯大林那里继承而来的制度,在许多重要方面难以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它太过僵化,乃至未能采用让西方工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技术革新;它的官僚制指令性经济体系滋养了无能和低效;它死板的中央集权控制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和希望;它占用这个国家每年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力量,且根本不能与美国武器的电子魔法相匹。

民众不满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因素。人民可以得到满足基本需求的食品和住房,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危机迹象已很明显,苏联人均寿命下降,俄罗斯男子的人均寿命下降得尤其快。民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经济事实上已停止增长,只有原材料出口,尤其是原油和天然气出口,使得大型投资继续进行。非法的黑市经济,向那些能支付高价的人们提供稀缺商品。为了换取好处,腐败官员停止执行打击这些"投机者"的法律,保护非法黑市交易活动,人们把黑市商人和共产党官员之间的这种勾结称为苏联"黑手党"。苏联经济学家(私下里)把自己国家的经济状态与第三世界国家相提并论。

共产党一党专制——在理论上为苏联的经济福祉负责,被腐败和特权严重削弱。党的官僚权力实行终身制,许多人把自己的官位变为个人财富的来源。由于贿赂和权力交易,他们比苏联普通公民过着优裕得多的生活。他们为自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真正需求,漠视他们制订的经济计划造成的环境破坏。党的这些官员,口头上高喊让列宁主义的德能之士为社会主义服务,实际上深陷在自己的权力幻景中,整个国家因此而遭了殃。相似的政治经济危机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所有共产党国家中。

甚至最后一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 1985 年去世前,就有一些党的高级官员,在秘密警察首脑的协助下,尝试少许微弱的改革。他们先前的失败,使他们更决心在新领导层里发起改革运动。当选择一位新的苏共总书记的时机到来时,他们之间的联合是至关重要的。像过去一样,苏共最高委员会(政治局)是有权做出抉择的机构。1985 年,在改

革派的压力下，政治局成员选择了他们最年轻的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他们认识到，为了维持国家实力和满足苏联人民的基本需求，必须进行改革。他们期望，改革的结果可以带来一个得到改善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重新恢复生机的苏联帝国。他们设想，一党专政体制将继续是苏联体制的核心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支柱。他们这两个算盘都打错了。

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卓越娴熟的党的领导人和充满活力的改革家。他迅速意识到，腐败无能的党政官员在整个苏共机构里盘根错节，他们依靠检查制度和秘密操作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1986年，他们企图掩盖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事故。几天之内，北欧各地的放射性尘埃探测机构，转播了那里发生巨大爆炸和大气中放射性尘埃比广岛原子弹爆炸高出十倍的消息。戈尔巴乔夫被他的官员们骄狂傲慢、漠视人类安全和对公众隐瞒事故的拙劣行为激怒了。他诉诸大胆行动，在所有媒体上开放公众讨论，该政策在俄语里被称作"公开性"(glasnost)，他们不再能躲藏在秘密政治的黑幕之后了。

很快，信息的洪流淹没了苏联检查机构。自1917年革命以来第一次，能够接近所有新闻成为一项公共权利。电视、广播和新闻出版抓住机会批评旧秩序，旧时代的斯大林主义者被激怒了，但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是权力手段的大师和苏联新体制大胆的设计师。

他寻找任何可能的政治同盟。他从监狱里释放了所有政治犯；他下令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准许教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对外开放，允许宗教经典印刷出版，并在1987年与基督教领袖们一起庆祝俄国改宗东正教1 000周年。他最激进的措施，是1988年要求最高苏维埃(国民议会)举行自由选举。自1917年以来第一次，选民们被给予机会，在几名争夺立法机构职位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带着些许迟疑，改革派共产党人与保守派共产党人竞争公职。

戈尔巴乔夫赌选民们会抛弃斯大林主义的党政官员，他赌对了。1989年举行的选举显示，这个国家重要城市地区的苏联人敌视他们旧

的党领导，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那样，共产党老卫道士们败给了改革派候选人，并在竞选过程中遭到了公开羞辱。在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列宁在 1917 年建立的先锋队党独裁统治开始让位于民主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打开了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之路。他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危机是如此严重，只有与西方国家和投资者合作才能实现更生。给予苏联卫星国人民自由，是与西方保持持久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准备放弃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外围帝国"。他公开宣布与勃列日涅夫主义决裂，放弃以干预的方式捍卫受到内部反对派威胁的共产党政权。为了证明自己坚持这项新政策的决心，他下令从阿富汗撤军；1989 年全部苏军撤回苏联。他秘密通知东欧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军队不再为他们脆弱的政权做后盾，他给予这里的人民选择自己政治制度的自由。他意识到，这些东欧人会坚定不移地"清除强加的、外来的和极权主义的政权"。但是，任何人都没预料到共产党政权消失的速度如此之快。

406 波兰共产党第一个失去了政权。1981 年后的波兰军事独裁统治岁月，曾让团结工会运动作为非法的地下组织存在，但它对民众的影响力，像天主教会对民众的影响力一样，仍然是重建共产党统治难以克服的障碍。波兰指令性经济危机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面对全民敌视的情形，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明白，他无力对付这些问题。在戈尔巴乔夫 1988 年开始推行政治多元化政策后，这位波兰领导人 1989 年命令在波兰举行议会自由选举，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么做团结工会会赢，但他和波兰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的是，共产党的反对者赢取了议会里每一个选举席位。尽管如此，他们接受了选举结果，是年夏天，波兰自二战前以来第一次由自由选择的非共产党政府统治。它开始了废除指令性经济的痛苦过程，新波兰将是一个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

根本性的改革也迅速波及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在这两个国家以建立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政府告终。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 1968 年在苏军的扶持下上台，他们自那时以来一直拒绝任何改革。1989 年下半期，学生领导的群众示威迅速在全国蔓延开

来，警察被击败了，国家陷入瘫痪。没有苏军的支持，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不得不辞职。

捷克共产党政权的头号政治反对派是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他曾因大胆地捍卫自由在狱中度过数年时间。在人民的要求下，他成为捷克新的民主政体的总统。那一年末，他感谢捷克人民在与旧制度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的热爱和公民勇气"，他许诺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和社会正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道共和国"的新国家。他吁求理解、宽容和体谅，力图复兴民族自豪感，以及在一个民主的欧洲对其他民族的尊重。

民族忠诚的纽带和对一个统一德国的渴望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十分强烈，它们削弱了共产党政权的根基。东德民众愤恨于得不到生活在西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德国人所享有的自由和繁荣，这种愤恨情绪增大了他们对东德政权的敌视。尽管这个国家战后分治被西方所接受，但这对东德民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柏林墙是东德共产党拒绝给予其臣民任何个人自由最显见、最令人憎恶的标识。西德电视多年来一直向东德人播送节目，以生动的画面传播着西方的生活方式，其诱惑力是压倒性的。1989 年夏，来自东部的德国人开始数以千计地经由匈牙利逃往西方，匈牙利政府允许他们逃奔西德。同年秋，逃亡已达到大规模出走的水平。东德各城市开始出现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他们高举着反共产党的旗帜，宣称"我们就是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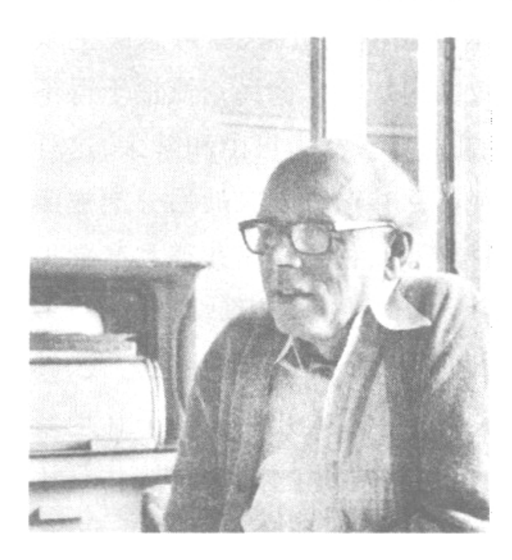
随着东德政权孤注一掷地决定给予东德人前往西德的自由，德国共产主义的垮台开始了。11 月 9 日晚，柏林墙上的大门向所有东柏林人敞开，该城市的西半部成为东西柏林人大规模庆祝的中心。西德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对东德人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乃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迅速解体。1990 年的自由选举把那些许诺以最快速度实现联邦共和国统一的政党带上权力舞台。1990 年中期，西德金融系统进入东德领土；10 月，这个国家实现了统一，让柏林再次成为统一的德国首都的计划启动。

407

1989 — 1990 年东欧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复兴，是苏

联新领导层改革政策的直接结果，没有他们的不干涉，共产主义政权会继续维系着权力，但走向自由民主制的真正推动者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在反对派组织的引导下，他们迅速控制了本国的政府。只有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进行了反抗，但在经过一周的街头战斗后屈服了，其他地方的权力转移过程异乎寻常的平静。在获得自由后，关于国家前途的分歧就出现了，但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一致认可，政治改革是必要的。

聚焦：安德烈·萨哈罗夫



安德烈·萨哈罗夫（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现代科学创造了改善人类生活的种种奇迹；在服务于国家的同时，它也制造了一系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安德烈·萨哈罗夫（1921—1989）了解并亲身参与了这两个领域的科学活动。1948 年，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召集他——莫斯科大学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参加核武器计划，他答应了，成为这个国家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并被承认为苏联氢弹的发明人。接受了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训练，他在现代物理学这个最复杂、最具革新性的领域里展现了超凡的思想创造能力，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分析和理解的理性力量。当他把这些技能用于批评苏联体制时，他变成了共产主义直言不讳的408反对者和人权及民主的捍卫者。为此，他从"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光荣地位坠落到遭迫害的异见人士行列。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的理性能力。

他的爱国主义使他深信自己参加苏联核武计划是理所当然的，他和在原子弹秘密研究基地阿尔扎马斯（Arzamas）城的同事们称自己是

“新科学战争的士兵”，他们相信美国的核武器是对自己国家致命的威胁。美国已建造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核武器研究暗语)，在那里开发出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科学家紧跟着美国的研究(部分归功于苏联间谍的出色工作)，把他们的城市起绰号为洛斯阿尔扎马斯。萨哈罗夫承担起了摆在他面前的挑战。在需要爆炸一个热核反应堆装置、其破坏力比一枚原子弹要大 1 000 倍的研究中，萨哈罗夫杰出的天才让他成为主要的驱动力量。1953 年，他亲眼见证了在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的第一次试验。在爆炸后的庆功会上，他的祝酒词是希望这些“核装置”的爆炸继续取得成功，但他补充到，这些爆炸“永远停留在试验场上空而不是城市上空”，这样的语调让苏联的主管将军们感到不悦。萨哈罗夫第一次没有跟随苏联政权的步调。

他出于对自己理性正确的绝对自信继续着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他与当局的决定性破裂缓慢发生，在他从事氢弹研发后直接到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苏联核武试验引爆了威力前所未有强大的装置，在 1962 年爆炸 5 亿吨当量热核反应炸弹中臻于登峰造极。萨哈罗夫日益关注由核试验本身引发的死亡和疾病，这些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扩散到数千平方英里范围内。这一年，他的核研究知识使之相信，人类生命的价值远比任何进一步的试验成果重要，他告知他的上司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继续试验下去是“无意义的和犯罪的”。他的吁求引起了当局的怀疑，对他的吁求没有做出回应使他感到“痛苦、羞愧和耻辱”。由于良知和理性，他已变成苏联体制的局外人。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成为社会不公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知道，他这么做，很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受到秘密警察的惩罚，但他对自己事业正确性的信念驱使他继续下去。1964 年，两名作家因在国外出版了批评苏联共产主义的小说而遭到囚禁，值此之时，他的公开抗议毫无效果。针对迫害知识分子的其他抗议接踵而来，所有抗议都建基于他这样的信念之上，即在一切公共事务领域里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1968 年，他在题为“进步、共存和思想自由”的小册子里公开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萨哈罗夫从来不是共产党员，如今他成为了直率的人权捍

卫者。他逐渐设计出一套苏联体制必须进行的根本性改革方案，欲以自由民主制、市场经济和多民族联邦国家取代之，给予苏联境内所有民族真正的自治权。他的著作都以打印稿的形式在苏联流通，苏联的检查制度全盘控制着所有的印刷出版，这让他成为一位国际名人和苏联当局的敌人。

409 只是由于他在西方的声望以及他作为苏联氢弹之父的过往业绩，让他免于被监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1975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发给瑞典方面的获奖感言中，他力陈在核时代绝对需要有一个“开放社会”才能维护真正的和平。苏联政权在他周围树起了一道隔离墙，随心所欲地动用一切专制权力，让他的生活饱受折磨。他最后的反抗行动是抗议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此时，秘密警察让他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囚犯，他被判流放到一座远离莫斯科的“封闭”(禁止外国人前来)城市里，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他唯一剩下的抗议手段就是绝食，这给他带来了残酷的住院治疗，他被强迫喂食以阻止死亡，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的命运是苏联专制政权的另一种牺牲品。

接着，改革派领导层在 1985 年开始重新改造苏联体制。与前任诸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是激进的。改革计划更加极端的萨哈罗夫如今在政治上变得可资利用。他的多党制、民主体制吁求让戈尔巴乔夫看上去显得温和，给他自由向世界昭示苏联改革派领导层与过去决裂的意愿。戈尔巴乔夫亲自把他从流放中解放出来，欢迎他返回莫斯科，允许他结束共产党专政的公开吁求在媒体中传播。

尽管受到过前 20 年的迫害，但萨哈罗夫准备与新领导层合作。1989 年，苏联新立法机关开会时，他是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之一，他在那里发表了雄辩的演讲，反对保守的共产党人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呼吁和平改革。他是一位国际名人和成百上千万苏联公民心目中的英雄，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恳求他帮助，他身上承负着巨大的压力。这一年年末，他猝然死于心脏病发作，他的葬礼是国家哀悼日。他活着目睹共产主义的终结和开放社会在俄国的诞生。

冷战的终结

在掌权初年，戈尔巴乔夫并不了解苏联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在最终接受经济学家的建议放弃指令性经济之前，他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他的激进改革(改革的俄语词是 perestroika)口号意味着在苏联经济中引进有限的自由市场，这样的改革遭遇的结构性和社会性阻碍，比他在引进政治和公民自由中遇到的那些阻碍要大得多。公众数十年来一直享受着国家补助的低价消费品和服务(一般来说质量低劣且供应短缺)，他们继续依赖这些国家商品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管理者和工人早已习惯低效的工作方式，苏联人对这种体制的流行判定体现在寥寥数语里："他们假装给我们报酬，我们假装工作。"国家的工农业设备陈旧不堪，国家缺乏资源用于更新和技术现代化必需的大规模投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浪费而短视的国家经济管理的结果，以及苏共领导人决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全球超级大国的代价。

410

经济困难恶化了非俄罗斯民族与苏联中央政府间的紧张关系。列宁欲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建立一个"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尝试失败了。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里，新当选的改革派领导人公开把苏联与 19 世纪沙皇帝国联系到一起，沙俄政权也曾将其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从历史方面来看，非殖民化已横扫了除苏联之外的所有西方帝国。苏联实际上是最后的帝国，东欧诸国已表现出摆脱帝国的倾向，苏联帝国很快就步了西方帝国的后尘。

到 1990 年，组成苏联的几乎所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都已正式宣布自己为"主权国家"，即便最大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也采取行动反对苏联宪法和共产党统治。长期以来被苏联压抑在地下的民族主义突然喷薄而出，成为苏联各民族中一股强有力的运动。民族忠诚纽带，比苏联的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在苏联的西部各共和国，自由选举成为通往独立之路，1989 年波兰民族解放的榜样，激发了苏联边境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做出同样的尝试。1990 年，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盟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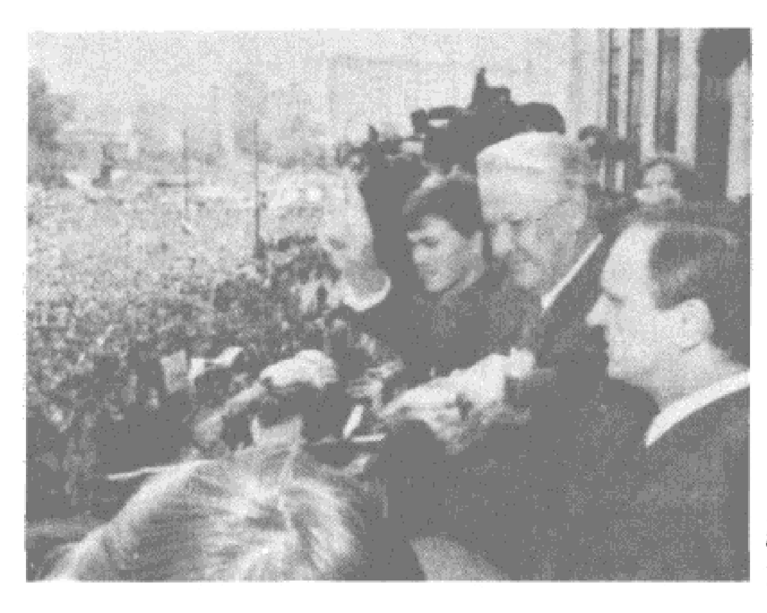
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地区选举中大获全胜,他们公开了 1939 年希特勒—斯大林瓜分波兰和让苏联兼并波罗的海小国的秘密协定。他们的领导人立即要求结束自己国家非法丧失独立的局面,他们的目标是从苏联分离出来。这个国家开始分崩离析。

在日益发展的危机中,莫斯科有影响的共产主义卫道士要求戈尔巴乔夫动用红军和秘密警察镇压民族主义骚动,他拒绝了,担心此举会结束他的改革运动,开启与西方敌对关系的新时代。1991 年 8 月,党、军队和秘密警察里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组织阴谋活动想要推翻戈尔巴乔夫,重新恢复旧的专制统治,挽救苏联。他们是戈尔巴乔夫以前的同僚,他信任他们,依靠他们遵从自己的命令,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背叛。

然而,他们的反叛企图失败了。大规模的对政变阴谋的反对表明,苏联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已经弃绝了共产主义,欢迎民主改革。他们的领导人是活力十足的反共产主义改革者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他曾是苏共党员,但因反感党的腐败和保守,1988 年退党了。他加入了民主运动,开始领导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里的改革运动。1991 年春,他参与首次全民选举竞选俄罗斯总统,他的竞选纲领是民主制、自由市场经济和俄罗斯民族主义。选举中,他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凭借这样的群众支持,这一年 8 月他领导了对斯大林主义者政变阴谋的抵抗。通过向红军将领们解释他是合法选举的俄罗斯领导人,他赢得了军队的支持。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走上街头,挡住政变阴谋者军事力量的去路。斯大林主义者被迫投降,致使苏共名誉扫地、苏联支离破碎。

叶利钦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胜利者。他宣布共产党非法,并大力推动自己的俄罗斯改革计划。波罗的海共和国已从苏联分离出去。8 月针对戈尔巴乔夫政变阴谋的失败和叶利钦的胜利,确立了苏联除法律名义之外在所有方面的独立国家地位。是年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举行公投,以决定是继续留在改革的苏维埃国家里还是分离出去;乌克兰人一边倒地投了独立票。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无力阻止联盟

411



俄罗斯民主制的英雄：鲍里斯·叶利钦，莫斯科，1991 年 8 月（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的分崩离析。苏联其他 14 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很快纷纷仿效，在 1991 年末宣布自己的共和国独立。共产主义随风飘逝。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亦复如是。戈尔巴乔夫一夜之间变成一名普通的俄罗斯公民，绣着斧头镰刀的红旗，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上的旗杆顶上消失了。

共产主义政权的消失和苏联崩溃结束了冷战。乔治·凯南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曾预见到，终有一日，苏联帝国会衰落，谈判会解决美苏间的基本安全问题，这一天在 40 年后到来了。苏联主导下的东欧各国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消失了，它的成员国接下来全部要求加入西方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后来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新的军备协定，这些条约为真刀实枪地削减核军备提供了条件。中短程导弹将被彻底销毁，洲际导弹的数量大幅削减。整个前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数量，国防工业突然之间丧失了繁荣兴旺的武器市场。

新俄罗斯

作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废墟的继承者，俄罗斯的经济财富在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贫乏的。就在结束指令性经济的中

国方式释放出动力十足的产能之时，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却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苏联的崩溃给新独立的共和国间的贸易往来添加了412壁垒，它们原本被苏联的计划和投资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冷战的突然终结，让俄罗斯庞大的国防工业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它失去了利润丰厚的国家订货者，缺乏任何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自己先进武器的经验。俄罗斯经济复兴最严重的障碍是缺乏了解怎样让资本主义经济运转起来的人。老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从来没有学过生产率和效率，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主席从来没有为满足俄罗斯消费者的需求和爱好操过心。

到 1995 年，经济萧条已让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民众生活水平滑落，公共服务退化，工厂停发工资和其他福利。成百上千万俄罗斯城市居民被迫取得一小块耕地，种植自己的粮食。举国各大城市周围兴起大型的露天市场，人们争先恐后地来这里出售任何到手的商品，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在一些地区，俄罗斯人看上去似乎回到了物物交换甚或自然经济时代。

通常与政治领导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少数投资者，通过购买以前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如石油和铝等自然资源的企业，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新资本家资助叶利钦参加 1996 年总统大选，倾向于他而不是共产党候选人。他赢了，作为回报，他们以低价取得国家有价值的产业，大发其财。一名观察者把这种快速混乱地出售国有企业称作“世纪大甩卖”。这些投资者那半合法或不合法方式被批评者称为“黑帮资本主义”(gangster capitalism)。

这些年里，犯罪横行，敲诈勒索和帮派暴力到处蔓延。警察难以控制数量与日俱增的犯罪帮派，它们被称为“俄罗斯黑手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数量估计达到 500 个。这些黑帮成员从惊恐不安的商人那里榨取贡金，如果他们没有缴纳就会有被处死的危险。不久，这些黑帮扩展到国际贩毒和卖淫等非法勾当中。

这种混乱状况延伸到俄罗斯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地方政府因缺乏税收而形同虚设，大多数公民和公司企业很少或根本不交税。联邦

政府被迫从西方银行拆借短期贷款。这些银行担心国际金融动荡时期自己的贷款会遭到损失，在1998年突然抽回贷款，俄罗斯政府无力偿付，宣布破产。银行倒闭了，卢布急剧贬值，通货膨胀恶化。

俄罗斯联邦政府继续缓慢地建立法治和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直至90年代末，立法机构仍然是民族主义者的堡垒，他们痛惜自己祖国和农村选民选择的前共产党领导人的没落，一个强大的“农工业”游说团捍卫早已过时的集体和国有农庄。他们敌视自由市场最明显的例证，是国家杜马到2000年一直拒绝批准允许购买和出售集体农庄的法律。俄罗斯仍然是多民族国家，新宪法赋予统治非俄罗斯族聚居地的地方政府广泛的政治权威。

俄罗斯逐渐从共产主义过去走向经过修正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受国际市场上原油——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恢复。叶利钦1996年再次当选，表明大多数选民已摒弃了旧制度。1998年，他参加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遗骸在圣彼得堡历史最悠久的大教堂里的重新安葬仪式，他们被安葬在俄罗斯历代沙皇的陵墓旁边。仪式之意旨并非是吁求回归君主制；它是对苏联革命与恐怖中所有受害者的致敬行动。叶利钦利用这个时刻，恳求国人们忘怀“流血的一个世纪”，共同加入到建设一个自由宽容的国家中来。他最后的戏剧性行动是在1999年新年前夕突然辞职，经过短暂的竞选活动，绝大多数选民投票赞成叶利钦的显见继承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413

新总统利用总统权力的技能，给予了这个国家一个稳定的领导层，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前苏联武装力量的大部分军备，给俄罗斯政府提供了一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武器。到21世纪初，俄罗斯石油年产量的增加使它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石油就是力量，俄罗斯政府因此获得了全球性地位。

俄罗斯的民主改革产生出威权主义总统制，而不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电视频道处于国家的控制下，尽管广播和报纸仍然免于新闻检查。普京仍然忠于宪政体制，接受改革者早前引进的基本的政治和公

民自由。这片土地依然载负着广泛的环境污染和人口增长的停滞不前,两者都是从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依旧缠绕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危机的严酷象征,是俄罗斯男子的高死亡率(平均寿命 58 岁,远低于西方任何国家)和日益下降的婴儿出生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之一)。苏联共产主义垮台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新俄罗斯在 21 世纪初刚刚开始崛起。

俄罗斯和亚洲内陆的战争

在曾由苏联统治的地区,俄罗斯联邦用其遭到大幅削弱的武装力量,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外交影响力。苏联崩溃后继承国家的出现异乎寻常的和平,主要原因就是大继承国——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联邦——的领导者们达成一致,不尝试改变前苏联政府创建种族领有自身土地的"民族共和国"时就已确立下来的国家边界。这些新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宣称统治着种族"绝对纯粹"的人口,所有国家都统治着来自其他相邻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苏联 70 年的统治之后,移民们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向外迁移,1 500 万人宣称属于俄罗斯民族,但居住在其他共和国,尤其是在南部的乌克兰和东部的哈萨克斯坦。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拒绝了民族主义者想在俄罗斯边境内外建立一个"大俄罗斯"的所有要求,他的温和立场保证了欧亚大陆北部的和平。

不更改边境的政策也意味着,俄罗斯联邦里的任何少数民族都不能分离出去。俄罗斯宪法明确地给予联邦内部众多少数民族以自治。除车臣人之外,所有少数民族都接受了俄罗斯主权权力。这是一个居住在高加索山脉北部小块山区奉行穆斯林信仰的民族。1991 年苏联解体时,车臣领导人宣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俄罗斯坚持"领土不可分割"的原则,派遣部队镇压反叛行动。到 2002 年,俄罗斯军队击败了叛军。作为报复,车臣民族主义者诉之于对北高加索山脉甚至莫斯科的平民和军事要地实施恐怖袭击。他们辩称自己的行为是在把车臣从异教徒和殖民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伊斯兰战争中的"烈士"之举,他们将捍卫伊斯兰教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融合到了一起。

414

1991年后，高加索地区各独立国家民族间的战争，给俄罗斯政府提供了在南部边境建立新势力范围的机会。对北部强大邻国深怀敌意的格鲁吉亚，发现自己少数民族中的叛乱活动得到了俄罗斯的秘密支持，未能击败叛乱和因经济崩溃陷入穷困潦倒境地，使它不得不顺从俄罗斯人的合作要求，在两国共有的山区边境与俄罗斯联手镇压车臣叛乱。

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于1991－1994年发生小规模战争时，俄罗斯支持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政府力图占领阿塞拜疆境内主要由亚美尼亚人居住的一片偏远山区，亚美尼亚军队获胜，迫使阿塞拜疆军队放弃了该地区。在征战过程中，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被迫逃离家园躲避迫害，在苏联时代，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原本安宁地生活在邻国。

俄罗斯支持亚美尼亚，并非是出于对引发这场战争的民族主义事业的同情。在该地区，俄罗斯的主要战略利益是里海丰富的石油储藏。遭到削弱的阿塞拜疆政府被迫与俄罗斯合作开发其石油。地区力量均衡在高加索地区逐渐出现，俄罗斯是该地区复杂事务中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参与者。苏联业已消失，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填补了它留下的空间。

在中亚诸共和国中，俄罗斯直接卷入局部战争，成功地在这里维持了某种程度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在最后一支苏联军队于1989年撤离阿富汗后，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未能击败阿富汗共产党傀儡政权的反对力量，苏军的撤离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名为塔利班(Taliban)的阿富汗伊斯兰运动继续战斗，开始反对共产党，意欲建立伊斯兰政权。尽管受到苏联数十年的宗教压制，中亚人民仍旧保持了他们祖传的穆斯林信仰。塔利班的狂热向北方蔓延，这里的一些穆斯林希望把他们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变成建立新国家的基础。

1989年后，在新成立的塔吉克斯坦国，走向独立的过程导致前共产党人、部族领导人和受塔利班启迪兴起的穆斯林运动之间爆发了一

场内战。俄罗斯政府决心把与阿富汗的边界变成北部屏障，阻遏敌视俄罗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使之不能向北扩大他们的影响。它派遣军队到塔吉克斯坦守卫这条边界，在背后支持前共产党人。在它的支持下，各交战势力最终于 1997 年达成分享权力的协定，协定赋予前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占据主要角色，俄军在这里驻有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帮助维持这个失败国家免于倒台。俄罗斯实现了在中亚地区的目标，保持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加强那里世俗的而非伊斯兰教的领导阶层。苏联业已消失，但俄罗斯的外交和军事影响沿着其边境地区继续存在，掌控着旧帝国领土的某些部分。

冷战结束后，"变剑为犁"的希望很大程度上仍只是梦想。美俄间的削减核军备条约依然允许每一方拥有 2 000 枚核弹头。在美国的核武库里，有 14 艘导弹发射潜艇，500 枚陆基导弹和 100 架战略轰炸机。除美俄外，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拥有核武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同样如此。然而，核战争的可怕威胁已不再主导全球关系，欧洲亦不再一分为二，美国政府把经济援助扩大到俄罗斯。寻求高薪的前苏联运动员加入西方的职业队，俄罗斯学生出现在西方各国的商学院里。墙业已塌下。

415

小　结

冷战在近 50 年的时间里把欧洲和世界分为两个敌对的同盟和相互竞争的政治社会体系。在二战后的最初数十年里，欧洲的未来似乎取决于外部的力量。二战中两大胜利者美国和苏联，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有着决定性影响，它们盟邦间在欧洲的分界线，被称为"铁幕"。在欧洲地图上仅为一个小点的柏林，汇聚了所有这些敌对的力量，悲观的观察家们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从这里开始。西德领导人欢迎美国武装力量的"核保护伞"扩大到他们国家，面对东德和苏联的军队，它更适于选择毫无防御。西柏林被重建为西方的灯塔和庇护所。

共产党国家的人民除臣服于苏联统治之外别无选择。如果容许他们表达自己的选择，那么他们会立即宣布自己的国家独立，让西方而非

苏联作为他们文化、政治和社会价值观的源泉。从这些方面来说，冷战中东西方间或美苏外交政策间不存在任何道义上的等价，冷战紧张的延续就立基于这种根本性的现实基础上。

导致共产主义体系崩塌的压力，部分来自东方各民族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持久敌视。但用哈维尔的话来说，他们拒绝合作只是“无权者的权力”。终结苏联和苏联在东欧统治的真正力量在于苏联自身内部，最重要的是在于 1985 年上台的新的改革派领导层的期望和计划。没有任何民众抗议迫使戈尔巴乔夫启动自己激进的改革计划。苏联政治精英阶层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着特权和权力的果实，但这种体系无力维持有效率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有活力的领导方式，体制沉疴是如此严重，乃至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准备冒险重塑之。他们无法克服这个广袤帝国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忠诚，或消除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曾向这些民族施予种种残酷行为的记忆。这种顽强的民族主义，粉碎了他们的改革希望并毁灭了苏联。

20 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不再是 100 年前那个样子的民族主义。西欧为前共产党国家的改革树立了样板。自由民主制在欧洲各国繁荣兴旺。经济活动日益依赖于私人利益的操控，欧洲各国政府让它们大多数国有企业回归私人所有，只间接控制金融和生产。从共产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申请并获得了欧盟成员地位，对市场和投资敞开大门。再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纲领主导着欧洲人的生活，或许诺结束社会不平等，人们把精力用于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依靠二战后确立的社会福利政策度过困难时刻。 416

最后的殖民帝国苏联业已消失，欧洲地图再次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当民族解放让东欧各族群能够组织起来时，当来自第三世界各国的移民出现在整个欧洲时，族群和民族敌对再次浮出水面，但欧洲的战争与共产主义革命时代永远是明日黄花了。

本章大事记

1952 年　美国进行首次氢弹试验

1953 年　苏联进行首次氢弹试验
1972 年　限制防御性导弹的核军备控制条约
1975 年　苏联第一个太空站建立
1975 年　关于欧洲边境和人权的赫尔辛基宣言
1977 年　西班牙立宪君主制
1979 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 年　世界人口达到 50 亿
1980－1982 年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掌权
1985－1991 年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
1989 年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1989 年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
1989 年　苏联举行首次自由选举
1990 年　德国重新统一
1991 年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1991 年　苏联崩溃
1993 年　欧洲联盟条约
2004 年　十个新成员加入欧盟

推荐书目

欧　盟

Derek Unwin, *The Community of Europe: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1994)。对从煤钢共同体走向欧盟历程的细致研究。

* Daniel Yergi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2002)。对近来关乎欧洲新近历史的政治争论的问题导向的研究。

苏联崩溃

Richard Lourie, *Sakhavov: A Biography*(2002)。对这位科学天才和勇敢的反共产主义斗士的一部翔实而充满赞美之情的传记。

* Micheael MaFaul,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2001)。对俄国终结共产主义、奠定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革命的最好研究。

* Alex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3rd edition, 1992)。卓越地描述了苏联指令性经济的兴衰。

* Gail Stokes,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1994)。20 世纪 80 年代末共产主义政权突然崩溃的戏剧性历史。

回忆录和视频辅助教具

Jack Matlock,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1995)。一个美国人从内部观察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戏剧性事件。

"People Power: The End of Soviet-Style Communism"。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一部杰出的记录片(属于"人民的世纪"系列之一),利用文献材料和采访参与者,追踪各共产主义政权的倒台。

417

第十四章　冷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全球经济

- **全球经济的出现**
- **局部战争与维和行动**
- **恐怖主义与局部战争**

重点：全球环境

聚焦：奥萨马·本·拉登

到20世纪90年代，殖民帝国在世界上业已消失。词语"海外"(overseas)指的是远方的民族国家，而不是西方帝国统治的臣属民族的土地。上百个民族国家取代衰落帝国，是20世纪最壮观最持久的全球政治剧变。

新的经济联系取代了帝国曾经维系的旧纽带。词汇"全球经济"既指工业和技术革新传播到世界各国，也指世界所有地区各经济体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新兴的民族国家拥有主权，让自己的国旗飘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然而，它们的经济依赖于国际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的中心地带往往与它们相隔遥远。作为对来自商业利益压力的应对之策，西方各国政府，鼓励发展中国家以降低发达世界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进口关税的方式，在全球经济中与它们实现一体化。货币投机者在寻求回报丰厚的短期投资时，毫不关心新兴国家的经济需求。繁荣或萧条是一个小国无力施加影响的全球性过程。

418　最繁荣的地区不仅包括北美和西欧，也包括太平洋东岸的各个国

家。日本成为该地区第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接下来是小如新加坡和大如中国等国家，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赋予了它们的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与它们的军队规模或军事同盟关系甚微。将它们拉入其中的地区和全球经济关系，创造出一幅超越这些国家边界的新的相互依存图景。民族独立的诉求和民族主义敌对的爆发扰乱了这些联系，但难以完全毁灭它们。

到 20 世纪末，国际经济关系已逐渐类似于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贸易和监管壁垒极大地萎缩了。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指令性经济的垮台终结了它们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它们的新领导人欢迎国外投资者及其奋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新型私有工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大的经济力量是跨国公司、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它们的投资和投机性活动，每天让数万亿美元在世界流动。利润是衡量它们成败的标准，哪怕结果是造成偏远地区的经济苦难。

这种过程称作“全球化”，包括商品（如石油）、服务（如金融和银行业）和人员（尤其是劳动力迁移）的大规模流动，并在空气污染和传染病散播（尤其是 AIDS）等全球性问题中被人们所感知，它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发展过程。全球化允诺实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性经济增长，并提供更多就业，但随着利润仅流向少数国家，它也有加剧各民族不平等的危险。1914 年之前，西方人沉浸在工业和技术的奇迹中，相信人类进步不可避免，如今几乎没有人再持有这种天真的信念。整个工业革命都依赖燃烧化石燃料，但这种能源消耗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大气污染，乃至它正在改变全球气候。

在 20 世纪末，事实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战争。随着 1991 年苏联崩溃，美国成为这个惨遭恐怖主义运动和小规模战争蹂躏的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内战，也就是一国边境之内敌对群体间的武装对抗，在巴尔干各国和阿富汗造成毁灭性破坏。其他冲突是地区性争端，其中最严重的是 2003 年美国征服伊拉克。

贫穷、种族仇恨和政治敌对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促成了暴力的爆发。生活在内战剧烈的国家的民众，力图寻求来自国外力量或来自联

合国提供的保护。国外力量的形式多种多样,或是地区性联盟,或是邻近国家。外来的帮助是给内战国家民众带来某种程度的和平唯一有效的手段。在没有任何这样的力量出现的地方,战争久拖不决,直至经济衰败,城市沦为废墟,大量的人口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前来这些危险的地区,提供医疗保健和食品,以阻遏饥荒和疾病。他们的努力——无论怎样微弱,常常是阻止饥荒和传染病的全部依托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在其成员国事务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它终于从美苏之间使之瘫痪的冷战争吵中解脱出来。安理会不断地收到干预局部战争和内战的紧急请求,因为对这些战争没有任何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伊拉克军队 1990 年占领小国科威特引发了短暂的海湾战争,在苏联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下,它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盟军胜利而告终。“新世界秩序”的希望取决于联合国保护各国(无论大小)不受侵略的前景。但强权政治,也就是依赖国家军事力量,对大国来说仍然是切实可行的选择,正如美国在 2003 年征服伊拉克中所展示的那样。21 世纪初,国际和平的梦想仍然十分遥远。

419

全球经济的出现

20 世纪初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到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际经济的扩张进程,部分是从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汲取力量,同时日益从欧洲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不断成长的生产力中汲取力量。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远没有地区经济集群重要,地区经济集群通常聚集在一个生产能力强大的富裕国家周围,日本在东亚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德国在中东欧地区有着类似的影响。

在这些生产能力强大的经济体中,大公司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它们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政府参与其中,推动更趋自由的贸易,力图降低关税壁垒。诸如日本索尼、荷兰皇家壳牌或美国微软等公司的经济资源,在财富上让许多国家的全部国民收入相形见绌。远至东京、新加坡、伦敦和纽约等城市的摩天大楼是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总部,它们是

这些城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跻身世界级都市的明显标识。

全球能源

全球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的获得和有效使用。新的交通、工业生产、照明和通讯方式需要方便的能源获取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对能源的需求以惊人的高速度增长，到70年代，全球能源需求已是1950年的4倍。能源的来源发生根本性转变，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煤炭，在1960年后让位给石油，退居次席(参见第三章的"重点"：石油和国际经济)。

工业化地区的能源消费水平很高，但拉美发展中地区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很快同样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美国石油消费消耗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四分之一。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快使它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平均2美元/桶的石油价格，到80年代初上升到17美元，接着，到2000年代中期再次攀升到50美元以上。

得到石油对全球经济成长至关重要，但只有少数国家拥有大油田。20世纪初，美国曾是主要的石油产地；80年代后，它的油田趋于干涸。 420 到20世纪90年代，它所需的油品一半以上不得不依靠国外进口来满足。20世纪60年代，中东(主要是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成为石油的主要产地。中东是对美国政府至关重要的地区，它通过各种方式力图为国家的战略和经济需要保证稳定的石油供应，它针对伊拉克的两次战争(1991年，2003年)，可以从这种压倒一切的利益方面得到最佳理解。

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认识到寻求其他方式驱动经济增长的紧迫性。核电一度似乎是最具诱惑力的替代能源来源。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旨在创造种种技术奇迹，其中最有希望的就是利用核反应堆发电。20世纪60年代，核电厂开始大量出现；到90年代后期，世界各地有400多座核电站在运转，它们的发电量换算成能量，相当于世界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的全年总产量。

法国全面推动核能建设，80 年代末，核电占其全部电能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时，其他许多国家业已削减或停止了核电发展。这项新技术有发生严重事故的危险，其代价比其他电力生产的能源来源更大一些。对安全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导致了复杂的设计变化和工厂建设的迟缓，从而抬高了成本。1979 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以及 1986 年最严重的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了全世界公众对安全核能可行性的关注。一些有运作良好的核计划和有减少石油进口巨大需要的国家(最显著的是法国和日本)，继续它们对核反应堆的依赖。由于日益依赖新的电力来源以满足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世界各地人民和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直接危及他们日常生活的痛苦经济选择。

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提出了不可再生能源有朝一日终将耗尽的重大问题。更好地利用能源可从两方面着手，一种是加以保护，另一种是通过新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价格突然上涨将成本提升到新高度，能源利用率成为工业化国家优先重视之事。美国在工业和家庭使用以及交通运输方面发起大规模能源节约计划，在 1973 至 1983 年的 10 年里，它将能源消费减少了四分之一，削减石油使用五分之一。这个趋势构成了环保革命，它对未来世界发展与粮食生产方面的绿色革命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令人瞩目的经济繁荣时光的推动下，美国对能源的贪婪需求再次催生出铺张浪费的习惯，尤其是与日俱增的汽车燃油消耗。

新技术创造了扩大必要资源来源的机会。石油工业开发出复杂的机械，使之能够把油钻深入到条件恶劣的地带，包括近海区域和北极地区。70 年代开发的阿拉斯加油田和北海油田，成为西方最新的石油大发现。苏联崩溃后，中亚各国新政府邀请西方公司派遣地质学家前往勘探里海周围地区的石油，那里被认为有着大量的原油储藏。在完成分析后，西方石油公司宣布，它们已发现油田和天然气田，储量有北美和欧洲北海地区加起来那么大。

421

这些发现，让 21 世纪最初几十年有望得到充足的石油。全球生产

的增加和环保政策两相结合，使20世纪80年代末的原油价格一直低于20美元，90年代大部分时间，石油的价格仍然保持着稳定且供应充足。90年代中期，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国际油价几乎与70年代初一样低，石油刺激着这个十年全球经济的繁荣。但这个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使石油需求日增。世纪之交，中国骤然爆发的经济增长（近10%/年）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因其自身缺乏石油供应，中国巨大的石油进口需求在日益攀升的油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其他原材料来说也是如此。

21世纪初，高油价的回归迫使各国寻思，它们的经济发展计划是否已遭遇有限资源的壁垒。在新世纪之初，答案是令人鼓舞的，由于技术发明，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全球经济所需的全部基本资源价格下降了。新塑料取代昂贵的金属，在工业中广泛应用。铺张浪费的生产和消费带来的风险，在环境污染和周期性短缺方面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来。科学家全球变暖的警告，促使各国政府寻找办法，放缓甚或减少污染性能源的使用，但代价是高昂的。这些棘手的情况让人们在世纪末再次拾起70年代的环保计划。"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被界定为服从于限制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消耗和保护人类环境需要下的增长，为全球经济给21世纪的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生活水平的能力给予了清醒而现实的限制。

重点：全球环境

经济发展和世界人口迅速增长让地球环境付出了高昂代价。现代之前，最大的环境破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如火山爆发和严重干旱；人类在20世纪将自己变成了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到20世纪50年代，所有大陆上的土地、水和空气清楚地显露出被严重破坏的丑陋迹象。反过来，这种环境恶化直接促成了自然资源的流失、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和地球气候的永久变化。

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些问题的起因截然不同。在世界工业化地区，环境恶化主要是因为高能源消耗和消费社会的废弃物；在发展

422

中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毫无节制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爆炸、城市过度拥挤和贫困产生的压力。自工业革命开始,渴望利润的制造商们全然不顾他们企业造成的环境恶化;但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国营指令性经济在它们密集增长的数十年里,同样破坏环境。环境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侵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它们妨碍了数十亿人民的正常活动,延伸到地球人口最稀少的地方,它们的全球特征在大气污染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烟囱一开始曾是工业革命的象征,它释放着为工厂提供动力、为街道和家庭提供照明的烧煤蒸汽机产生出来的废气。20 世纪,内燃机和柴油机燃烧精炼石油散发出来的废气,以其难闻的气味标识着新的消费社会。使用这些化石燃料直接带来的烟雾,是 19 世纪伦敦黄色浓雾的源头,一个世纪后,这样的烟雾像块肮脏的帘幕悬在世界各大城市上空。

甚至在 19 世纪,一些科学家已指出,这些废气(主要由二氧化碳构成)的聚集,长此以往将如同围绕地球的覆盖物,最终改变全球气候、提高平均气温。直至 20 世纪后期,这些预言才以被政府和民众都能理解的确凿证据证明。但在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仍然是公共政策和私人投资的核心;它同样也是欠发达国家的重要目标。没有日益增长的来自化石燃料的能源消耗,工业化和提高消费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 20 世纪后期的全球经济中,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仅受到市场价格和获取手段的限制。

20 世纪 80、90 年代,由于科学家的努力,以及对身体遭到恶劣空气毒害的人们的关注,大气污染危险性的认识因此得到了提高。破坏臭氧层的化学过程只有通过研究者的精密仪器才能辨别出来。到 80 年代中期,他们能够在人造冷却药剂(尤其是空调里)的散发和大气臭氧的下降之间确立直接的关联,臭氧层对保护地球免于强烈的太阳辐射起着重要作用。在人们懂得其中的机理之后,这个问题成为了国际会议讨论的主题。1987 年,各国政府和制造业者达成协议,到 20 世纪末结束生产和使用这些冷却剂,他们的合作,首次产生出重要的全球环

境问题方面的国际条约。

碳气体造成的大气污染的增加，提出了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生活平等权。20 世纪 90 年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一个世纪前的 25 倍，西方各国应为这种迅速升高负主要责任，它们繁荣的经济日益依赖公路运输，它是二氧化碳污染的主要原因。仅美国一国就制造出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20 世纪最后 30 年，第三世界国家也遭遇到了清晰可辨的严重空气污染迹象，印度大城市上空的烟雾云团可资证明。缺乏现代技术加之经济增长的压力，都阻碍着他们采取认真的污染控制措施。到 20 世纪末，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排放总量已接近于西方的排放量。

423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科学研究清楚地揭示了全球大幅变暖的迹象，证据显示，整个北半球冬夏气温有着显著的上升。2000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出版了有关全球变暖的权威性报告，该报告把全球变暖归咎于人类行为。全球各地的平均气温都在升高，包括南北极地区，温室气体——到目前为止二氧化碳是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气候变暖的主因。气候变暖的结果，在地球冰盖的融化、风暴日益严重和海平面上升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

在此过程中，热带雨林的毁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造成热带雨林毁灭的原因，既包括不顾一切地在第三世界贫穷人民的土地上搜寻资源，也包括不断扩展的全球经济对森林产品的贪婪需求。进入亚马逊雨林地区的巴西定居者和在苏门答腊岛森林里开始新生活的印尼移民，每年烧毁数百万英亩森林用于耕种，他们的举动加速毁灭独特的环境，并把数以十亿吨计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在对木材日益增长的需求刺激下，国际木材公司购买了大片雨林资产，先是砍伐树木，然后是焚烧灌木，把土地卖给农业企业或小农场主。它们对印度尼西亚森林破坏性的焚烧，在东南亚居住着 1 亿多人口的广袤区域上空制造出严重的雾尘。印尼政府支持大企业的政策以及把人口从过度拥挤的中部诸岛迁移到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动机，是这场环境危机的核心。1997 年，它就业已形成的损害发布了公开的国际道歉，并答应严格限制森林

焚烧，但它的承诺是半心半意的，森林滥伐仍在继续。

世界森林的急剧减少贻害无穷，因为它毁灭了一种无价的资源，也因为它导致了空气、土地和水体的污染。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由于贫穷和农村人口剧增使得人们无法得到其他的加热来源，树木和灌木成为唯一的加热燃料来源。森林的消失，使耕地在雨水冲刷侵蚀和农民过度耕种下不断退化。热带雨林起着强有力的媒介作用，吸收着大量的二氧化碳。它们的消失进一步加速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森林还是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福祉的自然产品的宝库，一旦森林消失，里面的珍贵之物也随之失去。

中东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等地区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成为一种经济和政治问题。在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半沙漠地区，得到水资源是如此重要，乃至这些地方的水比油更珍贵。20 世纪 80 年代，土耳其政府启动了非西方国家中最雄心勃勃的水资源控制工程，它沿着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游开始建造 20 座大坝和灌溉水渠，这两条河流都发源于土耳其东部的山脉中。到 20 世纪末，这个"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Southeast Anatolia Project)已完成了其大坝主体的一半，它正在给一片久已被过度耕作和滥伐森林夺去树木及表土的广袤半沙漠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通过灌溉，土地再次肥沃起来，廉价的电力推动着工业化，该地区人民(包括数百万库尔德人)眼看着摆脱了由来已久的贫困。

424

他们成功的代价，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下游地区的水供应受到了限制，土耳其的大坝，以那些生活在河流下游区域的人们作为牺牲，承诺给一部分人们更好的生活。东南部安纳托利亚项目的指挥者们准备向花得起钱的地中海干旱地区卖水，如以色列，其他国家缺乏买水的资金。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水资源合作协定可能会保护这些国家的利益；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也存在着真实的可能。

第三世界的传染病与水、空气和土地污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河流里充斥着来自失去森林保护的土地、来自新工厂污染物及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的泥沙，从这些水源地取来的水，成为生活在被污染河流

沿岸的人们中传染病和身体畸变的源头，如中国的长江和印度的恒河。在诸如开罗和孟买等大城市，成百上千万农村居民移居这里，以逃避贫苦的农村生活，这些城市里未经处理的垃圾和被污染的空气滋长了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印度等国家面临着各种疾病的复发，如淋巴腺鼠疫，医学专家曾认为这种疾病已被公共保健和现代医药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从这些方面来说，在20世纪结束之际，第三世界国家有着最为紧急的环境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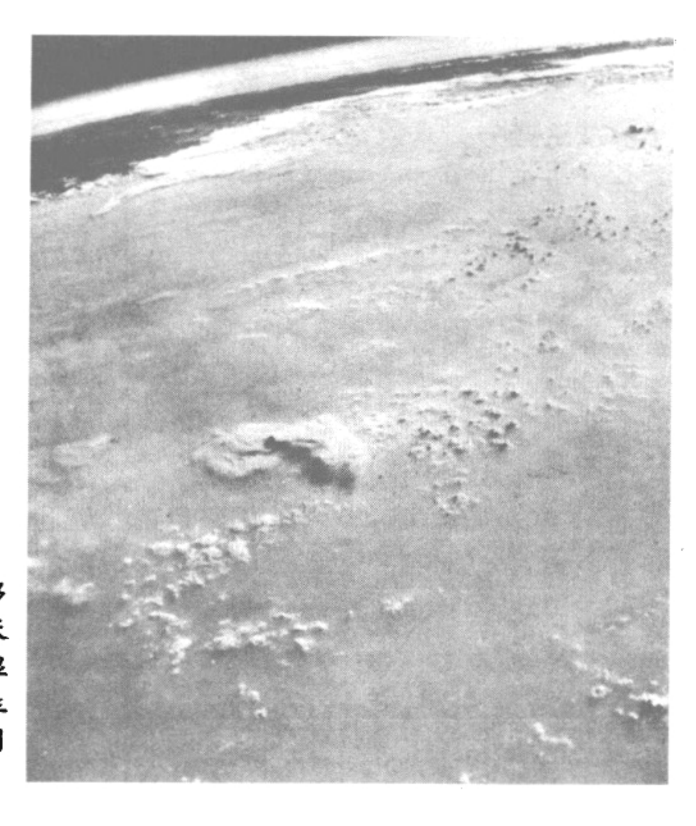
经济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两难之境，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希望所在。一个世纪以来，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界定为经济福祉的提高，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像西方一样狂热地信奉着这个信条。它们的领导人声言，由于自己的人民普遍贫穷，所以它们的经济发展需求对生存和安宁有着重大干系，他们力争道，西方应该为环境保护做出最大牺牲，因为西方造成的全球污染的总量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而且西方的技术成就能更容易地应用于能源保护和污染控制。然而，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如此之大，乃至没有各方通力合作，任何国际解决办法都不可能成功。

两个世纪前，一名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业已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危机发出警告，他认为，人口增长远远超过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所必要的食物供应。工业革命和西方向低生育率的人口模式转变证明其观点错了。然而，在21世纪初，马尔萨斯陷阱再次迫近。为了应对全球环境危机，只有着眼于全球才会产生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必须同时包括严厉的人口控制和全面的技术调整，以限制能源消耗和保护全球环境。

1992年，危机意识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首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聚首。这个所谓的“地球峰会”(Earth Summit)，有一百多个国家的首脑参加，听取了各方激烈的争论。环保主义者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大自然，而第三世界领导人坚持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克服其人民的困苦和创造出阻止污染的财政手段，来自发达国家的代表则捍卫他们自己国家民众的高生活水平。本次大会在阻止土地和水资源退化方

425

面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它最后只达成了一项《全球变暖公约》(*Global Warming Convention*)，呼吁到 20 世纪末阻止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



亚马逊河流域的火灾多发季：由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太空拍摄的照片，显示了亚马逊雨林大火产生的浓烟与火焰，1988 年 9 月(NASA Headquarters)

实现这个目标的举措必须来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工业化国家推出的一项协定，开启了阻止全球变暖的艰难历程。他们承诺，到 2010 年，将把本国的化石燃料排放量降低到 1990 年排放量以下水平；随后，第三世界政府同意加入这样的努力。签约国一直拖延到 2000 年，才就如何实现这种剧烈而痛苦的转变达成具体协定。但在 2000 年荷兰海牙会议上，就各发达国家应如何落实京都会议确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各方陷入分歧，关于限制温室气体举措的谈判破裂了。来自世界环保组织的示威者警告道，“地球在危急中”！美国仍然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源头，其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他们知道，美国国会反对任何这般严厉地限制能源乃至威胁国家经济发展的条约。次年，美国新总统乔治·W. 布什正式退出了京

426

都议定书。全球环境仍然敌不过国家利益。

成功地拯救地球环境要求各国自愿合作，推行新的能源政策。它也要求全世界人民通力合作，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保。它需要技术解决之道，找到替代能源。环境危机要求国际社会在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规模上进行合作，这场危机的利害关系，与战争的结果一样举足轻重。失败的结果会让人类未来凶险无比。

全球市场

20 世纪后期的全球经济，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迥异于世纪初的国际经济。商业企业第一次能把自己的经济活动扩展到整个世界，公司总部云集在一小撮城市里，金融运作和工厂生产逐渐远离这些中心迁移到劳动力最便宜、政府给投资者特别照顾的国家。从经济意义上说，墨西哥城镇工厂里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劳动人口，是美国大型汽车公司总部底特律的邻居。

由于在第三世界才能找到最廉价的劳动力，跨国公司的运作分为本土的行政和研发办公室与遥远国度的生产工厂，这种跨地区的运作被称为“全球工厂”。美国公司倾向在拉美寻找工厂地点，日本在东南亚日益扮演起贸易、金融和工业领头羊的角色，德国公司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东欧，地区经济架构围绕着一个主导性国家缓慢出现。到 20 世纪末，计算机使用和通讯的全球化，打开了以类似方式完成分散的员工工作的可能，这种“外包制”(outsourcing)在印度发展尤为迅速，美国公司在这里找到了能力强、报酬低的替代者，取代它们美国国内的雇员。这些公司巨头在世界市场上运作，但仍旧扎根在自己的母国。

20 世纪后期国际经济关系全球化趋势的重要新特征，是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继续在贸易、金融和经济援助等领域进行政策合作，所有发达国家的富裕安宁都依赖全球经济关系的稳定。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复杂的国际经济运转，业已超越了任何单个政府的控制。20 世纪 30 年代贸易和金融混乱的记忆，仍然萦绕在政治领导人和工业家的脑际。

427

新近非殖民化世界的地区冲突和革命运动，激起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新障碍的担忧。为了给全球经济关系带来某种程度的秩序，七个主要工业国家领导人(西方各大国和日本)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定期会晤，商讨共同的工业、金融和贸易问题。

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保持、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全球经济的范围。这些目标包括，商品和资本相对自由的流动，最主要币种的稳定，全世界经济向私人投资者和工业家开放，他们的合作确实给运行着的经济活动带来了便利。它建立在对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认可和共同致力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

他们的关注还包括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国家的财富的的确确地感知到了欠发达地区繁荣或萧条的影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第三世界国家欠他们银行未偿付的债务总计近 1 000亿美元，且永远没有任何全部偿还的机会。1996 年，七国集团减免了 250 亿美元的债务，条件是债务国政府采取自由市场改革。对贫困民族的经济援助不能驱动他们奋发努力，私人投资是七国集团援助发展中国家优先选择的方式，他们的财政顾问对大量援助被第三世界国家腐败的政权浪费而感到日益气馁。他们的选择表明，致力于第三世界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对全球财政和市场经济利益的关注取代。

全球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世界贸易的极大扩张和资金在各大陆间的急速流动，所有发达大国(共产党国家除外)对进口商品减少或免除关税的决定促进了这一趋势。为了反击倒退回 20 世纪 30 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西方各国在 40 年代后期达成的“国际关税及贸易协定”(Glob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GATT)，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指导方针成为 60 年代初全面削减关税的基础。跟随而来的是 1994 年幅度更大的国际关税削减，这一年国际关贸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取代。到世纪之交，WTO 成员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100 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WTO 的目标是让生产和贸易不再是由国家调节而是由市场力量

来决定，工厂按照利润和生产能力开门和关张。商品价格上涨将被国外进口抑制，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和生活代价。在20世纪最后繁荣的10年里，国际贸易总量翻了一番，但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在这个10年，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来自欧盟和美国。全球自由贸易是一种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规则。

对贸易关系全球化的反对仍然非常强烈。环保组织抗议关贸协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条款软弱无力。西方国家中的政治抵制来自制造业者和工人坚决要求保护他们免于国外竞争，以及得到政府财政资助以便把自己的产品廉价地销往国外，工会反对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利益团体坚持要求国家继续补贴基本的农作物，如棉花，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以较低的价格生产出这些东西。21世纪初，全球关税削减使这些问题平息了下来。

428

地区集团是自由贸易的更好的舞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扩张显示了这一点，它的成功引导着其他地区仿效这种程式。拉丁美洲在80年代走向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府后，不再是一个各个国家彼此敌对的大陆，经济合作基于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之上。1995年，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建立了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北方，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启动了贸易壁垒的消除。

在经济不发达和大部分人口深陷贫困的地方，地区经济合作是危险的，这些危险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不久就出现了。1亿墨西哥人口的生活在许多方面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其政府对从美国和加拿大公司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得经济利益抱着极大的希望。但在1995年，外国投资者和墨西哥富人从墨西哥撤走数十亿比索后，墨西哥人开始怀疑政府做出的快速获利的火热承诺。墨西哥货币贬值了一半，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计划，使政府的国际贷款面临着违约的危险，并随着投机性恐慌的恶化威胁到了其他拉丁美洲货币的价值。

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如此严重，乃至克林顿总统决定从美国政府基金中拨出120亿美元贷款支

撑墨西哥货币。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墨西哥严厉的紧缩措施结束了这场危机,墨西哥政府在两年内偿还了这些贷款,代价是墨西哥国内惨痛的两年经济衰退。这场危机是一个警告,即全球经济带来了因全球投机和投资资金快速流动而引发地区性金融崩溃的威胁。这样的警告是正确的,且没有任何反制措施存在,它被 1997 至 1998 年始于东亚、甚至波及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所证明。在当今全球性金融市场,对快速获利的追求刺激了国际银行的投机活动和不顾风险的贷款,潜在地催生了政府权力难以阻遏的危险状况。

到 21 世纪初,词汇"第三世界"最适宜用来指那些贫困的地区,这里尚没有现代工业的踪迹,难以找到工作岗位,或工作岗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这些贫穷地区的人们,合法或非法地前往更繁荣的土地,寻找报酬良好的工作。即使科威特这样的小国也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该国吸引了愿意做无需特殊技能劳工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如澳大利亚一样的大国也能感知到,2000 年,这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出生。逐渐地,全球经济从本质上获得了全球性的劳动力,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些国际移民总数估计已达 1.5 亿。在此前 20 年里,有 2 000 多万人来到美国,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地区,这种骤然的人口流入,产生出大量出生地在国外的居民,其数量是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西欧诸国。

429

巴黎、柏林、纽约、伦敦和洛杉矶等城市是这些移民的中心,在它们当中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劳动人口。但在能找到工作的地方,这些移民似乎无处不在,即便他们时常遭到歧视和迫害。20 世纪 80、90 年代,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纷纷涌入石油储量丰富的北非国家利比亚,填补利比亚人不愿意接受的下等工作。他们待在这里,直至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和工作岗位竞争激起大规模反移民骚乱,才迫使他们在 2000 年逃离。90 年代,欧洲也爆发过类似的反第三世界移民暴力。敌视这些外来者流溢出来的社会紧张,暴露了潜藏在繁荣国家表面之下的种族对抗。

全球经济的扩张,还产生了找到限制世界人口剧增的希望。在富

裕生活成为现实且家庭拥有保证这种生活的手段的地方，生更少的孩子成为人们的选择，这个简单的准则证明了其在全世界的强大影响，它依赖多种条件的辐辏，其中包括医疗保障、公民秩序、识字率、妇女权利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

它还是 1994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的重要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国发布了一份行动纲领，将妇女包括到所有发展计划当中。大会一致同意，没有她们的参与，就难以自发实现任何有效的人口控制。该倡议大力提倡人们自由选择，以其作为掌握个人命运的动机与激励。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将有助于促进其国家乃至全球的安宁幸福。从全球经济到这种个人自由选择之间的距离尚且遥远，但它们的联系纽带业已形成。

局部战争与维和行动

苏联崩溃，让美国唯一拥有超级大国的经济资源和军事实力。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之际，乔治·布什总统力图打消世界的疑虑，他的国家不会滥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外交和军事联盟是弱国保护自己不受某个主导性国家强加的"强权政治"(德语里称为 machtpolitik)威胁的主要手段。1919 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立基于民主政府、民族自决和集体防御以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新国际体系，取代势力均衡体系(参见第六章"重点：国际主义")。1991 年，布什总统再次举起这个自由主义理想，呼吁为"和平、安全、自由与法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如今从冷战僵局中解放出来的联合国实现这样的目标。

整个 90 年代，美国都支持在巴尔干、中东、非洲和亚洲维和的集体行动，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或阻止某个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暴力冲突，有时候会得到北约的地区性协助，北约动用武力在结束巴尔干冲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肩负着全球使命，但面临着采取有效行动的严重障碍。21 世纪初，联合国国际维和的主角地位，受到了美国总统　430

乔治·布什及其顾问拒绝国际行动、追求“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政策决策的挑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复杂的国际冲突新时代的开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帝国时代,世界上新的民族国家面临着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局部冲突和种族冲突。据统计,它们的数量有近 50 个,包括前南斯拉夫和阿富汗的内战,以及非洲卢旺达共和国的内战和屠杀。这些冲突以及其他许多类似冲突的内在问题,是相互矛盾的种族团体间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彼此冲突的运动的领导者们,都宣称代表自己的民族,捍卫其“权利”。有时,战争成为战争鼓吹者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目的只是获取权力和财富。一些冲突是由于执政政权将独裁统治强加于人民的野蛮行为所引发的。事实证明,在上述各种情况中,民族自决进程无法给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条件。

中亚的种族冲突和战争

在非洲和亚洲新兴的民族国家中,暴政、贫困和社会动荡日趋尖锐,族群关系深受其害,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常见现象。当资源匮乏,民族被迫移居城市贫民窟谋生时,种族骚乱的爆发几率急剧放大。社会艰难状况使犯罪率日益上升,在国家不能提供保护时,部族团结给人们提供了最好的防护手段。无能或毫无道德原则的领导人,通过动员自己种族或部落的支持者反对其他部族,以此掌控着权力。以前无关紧要的差异,如宗教信仰,如今成为另外一种冲突之源。导致种族敌对的方式千变万化,但对被动荡所卷涉的人们来说,这种敌对的结果普遍是灾难性的。

1994 年,卢旺达经历了非洲后殖民历史中最惨绝人寰的种族暴力,这次冲突,在其起因和结果方面,都是国家建设转变成种族冲突的过程的鲜明案例。卢旺达是个小国,但其境内汇集了能够点燃种族冲突之火的所有力量,其中包括,历史上殖民当局偏向少数民族图西族(Tusi)、牺牲另一个族群胡图族(Hutu),以及人口爆炸和多数居民的贫困。从比利时统治下获得解放后,这片多山的土地是非洲人口密度

最高(800 人/平方英里)的国家之一。在比利时统治下，图西族享受着优待地位，其传统的部族领导人与殖民统治者合作，能得到荣誉和利益，还能方便地得到教育，在殖民地民政管理当局中找到工作岗位。

1962 年，比利时突然撤出，图西人失去了这些有利条件。在多数人统治的名义下，比利时人把权力移交给了占多数的胡图族(占居民的80%)。新的国家领导人强行将图西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力位置上驱逐出去，他们寻求政治统治地位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控制着国家职位和商业交易的优先权，为自己的部族民众获取独占性利益。

新统治者从这个地区的前殖民统治者那里找到了帮助，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像对待扎伊尔的蒙博托政府一样，给胡图族领导层提供外交援助。它们的目标是，在自然资源丰富且法、比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经济利益依然强大的地区，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它们的关注重点没有扩展到种族关系和少数族群权利。

431

胡图族领导人保留了殖民时代的身份证制度，身份证明确地标识出卢旺达公民的种族出身。图西族人的生活条件通常比胡图族人好，胡图族人通过激起对图西族的敌对情绪，努力转移民众对他们无能统治的不满。胡图族的一个极端主义组织秘密草拟了完全消灭图西族的计划，“回到埃塞俄比亚”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宣传把图西族描绘为自己国家的外来者。像德国纳粹分子一样，这些狂热分子手里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大屠杀为原则信条。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对图西族的周期性攻击时有发生，许多图西族人因此逃往周边各国，一些人组织起反对卢旺达胡图人政权的游击战。

日益升级的种族敌对，导致包括总统在内的一些胡图族领导人采取行动，建立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联合政府。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到了试图以大规模屠杀为解决之道的其他胡图人的破坏。1994 年，胡图族总统在飞机坠毁中死亡，事故的疑点重重给胡图族极端分子提供了口实，宣称图西族正准备屠杀胡图人，指控是荒谬的，他们只是想借此动员起在胡图族武装民兵和军队中的支持者。他们早已制定好了集体屠戮图

西人的计划，他们可能就是总统座机失事的策划者，他们可以仰仗的是追随者的忠诚和许多胡图人对图西人的仇视。

他们动员起自己的民兵力量，向支持者大肆宣传“必须杀掉图西人”的讯息，小股联合国维和部队甚至无力保护自己免受暴徒的冲突。当温和的胡图族人试图阻止流血、保护图西人时，他们也沦为这场杀戮的牺牲品。在接下来的大屠杀中，卢旺达一半的图西人遭到杀害，人数约达 50 万。

自纳粹最后解决方案以来的几十年里，胡图族领导人的行动，使其与执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任何狂热分子别无二致，也就是有意识地、集体地灭绝某个民族的全部人口。像纳粹大屠杀一样，它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在徒劳地、试图保护一群图西族孩子的过程中受伤的一名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后来向外国记者解释道，“我们被这个强大的邪恶力量制服了，疯狂主宰着一切”。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残暴行为，他找不出任何其他答案。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引起的战斗，给中非地区带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为了阻止屠杀，流亡在邻国乌干达的图西族武装力量侵入卢旺达。他们得到了乌干达领导人的支持，十年前，通过他所谓的“无党派民主”和给予少数民族有效保护，他把自己的国家带出了内战的泥沼。由于被流血震惊且担心暴力会蔓延到自己国家，他在军火和财政方面给予图西族反政府军重要援助，他的行动让卢旺达的国内冲突升级为一场非洲战争。图西族入侵部队比胡图族民兵更加善战，后者逃离了卢旺达，约有 200 万胡图族难民跟随他们一起逃亡，这些人担心会死在他们前屠杀对象的手中。大屠杀结束了，新的图西族政府开始恢复国内秩序，审判种族灭绝分子。

当战争蔓延到扎伊尔时，这场冲突扩大为国际危机。大量的胡图族难民聚集在扎伊尔境内毗邻卢旺达的难民营里，其中大多数人是应为种族灭绝负责的胡图族军阀和民兵，他们把难民营变为反对卢旺达新政权的游击战根据地，微弱的扎伊尔政府自身无力维持其东部地区的秩序。扎伊尔此时已陷入混乱和衰败，它经历了蒙博托 30 年的暴政



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恩雅玛塔天主教堂里被大批屠杀的图西人的尸体，1994 年(Dufka/Getty Images Inc.-Hulton Archive Photos)

统治，成为后殖民地区失败国家中情形最恶劣的案例之一，其血腥的部族冲突表明，这是一片没有任何秩序或真正国家权威的土地(参见第十一章)。在对扎伊尔东部地区维持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的绝望努力中，蒙博托向胡图族游击队提供支持，这是一个致命的行动，因为该行动把这场冲突变成了地区战争。

1995 年，在非正式的地区联盟支持下，卢旺达政府军侵入扎伊尔，追剿胡图族民兵。在这种新型的后殖民时代局部战争中，两个问题至关重要。扎伊尔的国内动荡，让这里的任何冲突都有可能蔓延到其边境之外，卢旺达和乌干达都面对着这种可能。此外，扎伊尔包括钻石在内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对邻国和对从冲突中寻求好处的劫掠成性的民兵，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这场非洲战争由卢旺达政府领导，其不顾一切地要结束与胡图族游击队持续不断的边境战斗，后者以扎伊尔境内的难民营为基地展开行动。战争把蒙博托的政敌们卷入进来，其中最有能力的是与他对抗

433

了 30 年的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战争还把安哥拉、赞比亚和乌干达等邻国卷入其中,它们的领导人迫切需要给该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他们还期望自己的武装力量占领扎伊尔矿藏丰富的地区,为本国的经济带来丰厚的收益。

这些力量辐辏到一起,成功地在极短时间里组织起一支以卡比拉为首的军队,由来自卢旺达的图西族军官加以训练和领导。1996 年夏,这支军队横扫扎伊尔直逼其首都,蒙博托的军队望风披靡,他仓皇逃出这个国家。卡比拉控制了该国,将之重新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恢复了 1960 年独立时的国号。在一场被观察家们称为“泛非联盟”(pan-African alliance)发起的战争中,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最大的国家的政权易手了。

然而,暴力并未结束。卢旺达政府承诺保护胡图族和图西族公民,但两大族群间的仇恨在零星的战斗中不断地被点燃。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是一片缺乏良好监管的广袤土地,逃亡的胡图族民兵对卢旺达发起周期性的突袭,卢旺达军队继续在搜捕 1994 年大屠杀的责任人。乌干达、安哥拉和赞比亚军队进驻到边境地区,很快,它们不仅与刚果部队战斗,而且相互战斗,以控制生产钻石的地区。中非的内外战争持续了多年,造成 300 多万人死亡。直至 2003 年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以及该地区陷入赤贫,才让战争减弱为零星的种族骚乱。联合国在其国际战争法庭的权威下,对被控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胡图人进行审判。那场惨无人道的事件的伤疤使和平在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21 世纪初,中非国家间维系着极其脆弱的和平,这里的殖民边界仍然是帝国统治的遗迹,政治领导者们继续谈论公民民族主义和结束种族及部族敌对的需要。像邻国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领导人一样,卢旺达政府领导者们意识到人权是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但他们又坚持认为,不能用西方的理想来衡量他们的政权。正如人们所言,“非洲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隔着许多世界”。

在非洲其他地方,20 世纪 90 年代的局部战争变成了争夺战利品的斗争。扎伊尔“带血的钻石”,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与非洲大陆其他

地方的私人军队生产出来的战利品展开竞争。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等国的内战，助长了自立山头的军队的劫掠活动，这些军队的士兵除抢劫外不知道任何其他谋生之道，贵重原材料是这些武装团伙的主要目标。安哥拉丰富的钻石矿藏养活了叛军，它自1976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在战斗，试图夺取中央政府。冷战结束后，美苏代理人在这里停止了对影响力的争夺，它的国外军事援助来源枯竭。对钻石贸易的控制使这支叛军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继续战斗，只要它能为自己的战利品找到买家。一名观察者总结道，在这些地区，“钻石是战争最好的朋友”。

巴尔干的交战民族

434

冷战结束将种族冲突带到了前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当中。最惨烈的冲突发生在被称为巴尔干的东南欧地区，该地区主要由说斯拉夫语的民族居住着，但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分别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穆斯林信仰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地区的许多居民中传播。

南斯拉夫共产党统治者仿效苏联的模式(参见第七章)，以“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国家形式，千方百计地将说斯拉夫语的不同民族聚合在一起。南斯拉夫共产党创始人、战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1980年，他的去世使南斯拉夫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人；1989年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削弱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国家被迫走入重建轨道，唯一获得有力支持的重建原则就是民族自决。

1990年，南斯拉夫主要的民族共和国领导人达成一致，让每个民族共和国的民众投票，决定是从联邦中分离出去还是继续留在联邦内。他们的决定是基于对弱点的认知，他们意识到，共产主义已经破产，针对政治危机他们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自由选举。两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当即选择了分离。1991年，它们的领导人组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他共和国很快仿效它们的做法(参见1992年欧洲地图)。每个新的民族国家里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梦想控制自己的家园故土。纯种族领土的民族主义梦想，与巴尔干地区

种族通婚、移民和世代延续的种族混居的现实相抵触。

这种民族混杂的局面，给塞尔维亚共和国野心勃勃的领导人米洛舍维奇(Slovodan Milosevic)提供了机会。按照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属于“大塞尔维亚”范畴，米洛舍维奇把这种煽动性呼声变成自己政治新议程的基础。米洛舍维奇曾经是一名强硬的共产党人，他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当作一个替代性纲领，以此为基础在后南斯拉夫的巴尔干人中重建自己的权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族人为争取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自由，曾与奥匈帝国战斗，这段历史启发了米洛舍维奇及其追随者，1992 年，他们要求所有塞族人都应生活在一个大塞尔维亚国里。只有通过兼并相邻的土地，扩大的塞尔维亚才有可能，前南斯拉夫继承国的虚弱使米洛舍维奇相信他的计划能够成功。他的民族主义野心毁灭了维护巴尔干各民族间和平关系的最后希望。1914 年，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大公斐迪南时，战争爆发了；1992 年，当塞尔维亚人试图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有大量塞族人居住的波斯尼亚地区时，战争在同一个地区再次爆发了。

波斯尼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分为数量上较少的穆斯林人口和人数众多的塞尔维亚族人及克罗地亚族人。1992 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联手夺取了波斯尼亚的大片领土。来自南斯拉夫旧军队(大部分是塞族人)的军事装备和武装力量开进波斯尼亚塞族人居住的地区。塞族武装团伙发起系统的行动，把穆斯林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他们的“种族清洗”(一个新词汇，指强行赶走整个民族)包括杀戮、强奸和大规模恐吓，其目标是迫使大量的穆斯林逃到他们自己的小片领土里，塞族人单独拥有波斯尼亚大部分领土。塞族武装力量围攻都城萨拉热窝。与此同时，克罗地亚政府发起自己的种族清洗运动，夺取了波斯尼亚居住着许多克族人的地区。波斯尼亚穆斯林政府组织军队，奋不顾身地战斗，以图击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武装团伙，它的军队时常利用与对手一样残酷的手段，对无辜平民的尊重和简单的同情在这场残酷的内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435



内战造成的废墟：圣玛丽天主教堂，萨拉热窝，1992 年 12 月（Corbis-Bettmann）

一个不计后果、野心勃勃的政治领导人，启动了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内战进程。但是，如果南斯拉夫联邦中，业已和平地生活了三代的各族群间的敌对情绪未曾复苏，那么米洛舍维奇的战争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暴虐行为。在蛊惑人心的暴力叫嚣过程中，邻居们开始彼此心怀戒惧。只有一小群士兵在执行战斗，大多数平民不愿意加入其中，他们担心会因为一个远没有自身安全和幸福重要的事业而遭殃。有时候，私人军队控制了国家的大片区域，它们好战的领导人以民族主义语汇证明战争的正当性，但实际上却只是十足的战争狂热。

他们的种族仇恨思想使其拒绝承认敌方人的尊严。妇女成为性暴力的目标；男人成为兽行的牺牲品。至 1994 年，10 万人在遍布巴尔干的战火中丧生，100 多万人沦为难民，被迫逃离家园躲避战争的暴力。前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巴尔干内战，鲜明地体现了种族冲突最丑陋、最不人道的面貌。 436

战败后,波斯尼亚政府于 1993 年向欧盟和联合国吁求帮助,两者都试图寻找结束冲突的妥协方案,但失败了。波斯尼亚的塞族军队继续驱逐和迫害波斯尼亚人,甚至包括那些居住在联合国保护区域里的波斯尼亚人,萨拉热窝城处于塞族枪手持续不断的炮轰当中。只有军事干预才能阻止流血。1995 年,这样的行动来自北约武装部队,其领导人最终认定,这场可能扩散到周边国家的战争,威胁了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安宁。在美国的带领下,北约空军开始轰炸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军队阵地。北约最高司令警告塞族领导人,除非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停止战斗,同意达成妥协性的和平条约,否则他们将面临着战争蔓延到塞尔维亚自己领土上的危险。

北约的军事行动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1995 年的条约要求将塞族人和克族人的土地合并到统一的波斯尼亚当中。这种和平进程进展缓慢,受到战争产生的毁坏和仇恨的阻挠,统一的波斯尼亚很长时间里仍停留在纸面承诺。米洛舍维奇和其他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曾短暂地让他们的人民相信,他们新的民族国家已获得了“纯净的”种族领土,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和一起人类悲剧。1 年后,米洛舍维奇垮台,被控以“反人类罪”,2002 年,在联合国托管下运作的国际战争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

国际主义和联合国

通过国际维和行动制止后冷战时代的这些冲突,将来自各人道主义组织和联合国的官员们聚拢到一起。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维和使命一直是它功能的一部分,尽管其成员国从没有让联合国直接指挥自己的武装力量。整个冷战期间,苏联一直拒绝批准范围广泛的联合国军事行动,声称它是西方列强的工具。1990 — 1991 年伊拉克战争中,最后一任苏联领导层乐意与联合国盟军合作,表明联合国最终摆脱了对其行动的这种限制。

20 世纪 90 年代,对联合国介入局部战争的强有力支持来自欧盟。苏联的威胁一旦消失,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成为了国际社会在欧洲内外保护人权的积极支持者,它们把国际主义作为欧盟对外

关系的重要目标。它们准备动用武装力量，阻止塞族人在波斯尼亚境内的践踏人权行为，先是支持在那里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而后在1995年又支持向巴尔干派遣北约军队。

西方的私人团体也积极参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实施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非政府组织自19世纪便已存在，红十字会是第一个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向遭到战争蹂躏的土地提供医疗帮助。为了避免偏袒任何一方，它在自己的战时行动中摒弃所有的政治立场。20世纪70年代，这种国际人道主义业已成为数量日益增多的志愿组织的思想之魂，它们在公共参与方面采取更加具有行动主义的立场，因为在它们判定政府或武装组织犯有反人道罪行后，会毫不犹疑地对其予以公开谴责。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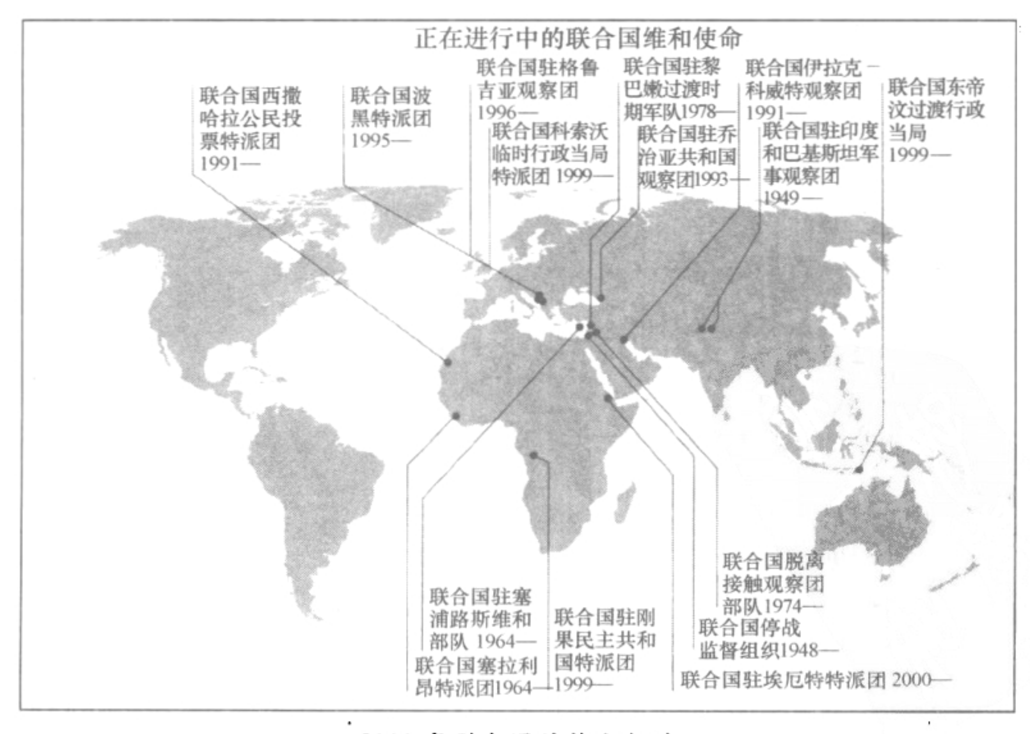
它们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政治参与，是其吁求外部介入的基础。新的组织，如法国的"医生无国界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派成员前往暴乱地区向平民提供帮助。医生无国界组织创始人之一的贝纳尔·库什纳(Bernard Kouchner)，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曾与红十字会在比夫拉(Biafra)工作。他对尼日利亚武装部队犯下的罪行深感愤怒，断定自己不能接受红十字会无政治立场的政策。1971年，他创建了一个新的医疗援助组织，名为"医生无国界组织"，其章程鼓励志愿者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公开监督暴行。库什纳深信，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部力量，对残酷迫害无辜平民的战争拥有他所谓的"干预权"。1990年，联合国大会正式承认它们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值得称道。

20世纪90年代的局部战争把非政府组织带到全球最偏远的地方，同时也将它们置于惨烈的冲突当中，它们在这里的存在变成了政治问题。它们自身的行动有时也的确带来不想要的结果。1994年，医生无国界组织前往中非，帮助从卢旺达逃出来的数百万胡图族难民。他们很快发现，卢旺达种族灭绝的罪魁胡图族民兵，控制了扎伊尔的难民营并夺占了医药食品救济和援助服务，卢旺达新政府抗议向难民营提供援助的非政府组织是在帮助谋杀其人民的凶手，而不是为人道主义

目的服务。厌恶胡图族军阀利用他们的援助,医生无国界组织停止了在这里的救死扶伤工作,在自己的和平期求与权力欲望强烈的残忍军阀倾向于暴力的丑陋现实之间,他们陷入了绝境。

对于那些认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新秩序应该依靠国际社会而非单个国家军事力量的人来说,联合国看上去是解决 20 世纪晚近的局部战争的最好选择。联合国宪章要求维护和平行动,要以最符合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和争斗的各种族群体利益的方式,求得公正的解决办法,这种维和使命由秘书长直接负责。安理会批准干预提案,投票表决支付文职工作人员薪水的资金数额,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负责执行行动的部队。有时候,安理会授权成员国派遣它们自己的部队介入反击侵略国家,保护受害国,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就是以这种方式成功实行的。对于局部战争,联合国军队通常在安理会秘书处维和部门的掌管下直接行动,秘书长对维和行动予以全盘监管。

作为区别符号,联合国装备上都印有蓝底白鸽的特色标记。维和部队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事力量,他们由其政府同意参加维和行动的



2000 年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成员国的多个分遣部队构成，其中包括军事指挥官。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执行维和行动中他们的责任是只能使用武器进行自卫，这给联合国指挥官们制造了残酷的两难之境，当军阀民兵或常规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胜利时，在阻碍他们目的的人们当中制造大规模的破坏和死亡时，仅配备着防御性武器的联合国军在这些情形中根本不能展开有效的行动。 438

在它存在的最初 40 年里，维和问题尚未凸显出来。联合国维和任务就是加强执行交战各方业已付诸实施的和平协定。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在以色列军队撤出后告终，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前往埃以边境巡逻，他们在这里是让以色列政府放心，埃及不会再派穆斯林恐怖分子进入以方领土，同时协助埃及政府遵守条约，该条约在埃及国内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中非常不受欢迎。这些行动是有用的，尽管不是经常发生，1945 — 1990 年间，联合国只派遣部队展开过 13 次维和行动。事实证明，在交战各方邀请和相对有秩序的情况下展开行动，联合国的干预是有用的和(几乎)不流血的。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的行动急剧加速。局部战争突然在世界各地爆发，安理会行动起来，本着捍卫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阻止大规模杀戮和暴行。1991 年，它一致批准了当“人类安全”受到战争或种族冲突威胁时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次年，联合国发现自己忙于 20 场战争当中，需要 7 万联合国部队参与。在交战各方继续战斗的情况下，一些行动关涉到调停战争，而不仅仅是维护和平，联合国旗帜飘扬在世界各危险区域的军营之上。 439

这种危险在非洲国家索马里率先凸显出来。在 1960 年获得独立后，该国的游牧部族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政府。像贫穷和部族忠诚致命地削弱了公共生活重要功能的第三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索马里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在严重的干旱袭击之后，这个国家民众悲惨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非政府组织试图帮助饥饿的民众，但却无力阻止军阀领导的民兵偷走它们的援助物资和在无休止的内战中彼此混战。

1991 年,联合国回应强烈的国际吁求,批准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援助行动。1992 年,它接受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提议,派遣美国军队进入索马里。穆斯林军阀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异教徒”占领者,在索马里首都的一次被大力宣传的军事行动中,18 名美军士兵被杀死。美国军方和国会为此提出严重质疑,美国士兵何以要为与本国利益毫无关系的事情而死。不久后,美国政府结束了其“武装的人道主义”,联合国也结束了它在索马里的调停努力。军阀们赢了,联合国和索马里人民输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在结束针对少数民族的种族暴行方面的努力数度失败,国际调停行动失去了美国的支持。1993 年,联合国部队开进前南斯拉夫惨遭战争蹂躏的地区,以阻止波斯尼亚境内主要针对穆斯林居民,以及克罗地亚境内主要针对塞尔维亚族民众的残酷种族清洗。同年,安理会授权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卢旺达,协助执行胡图族政府和图西族叛军之间的停火协议。在这两个案例中,联合国秘书处能够支配的部队寥寥无几,且维和部队仅配备着轻武器,去遏止各敌对民族间正投身内战的重武器军队。美国政府拒绝直接参与,担心公众反对可能会以美军流血而告终的军事干预行动。它宣称,那些地方的“动荡”是内部事务,应由这些国家自己解决。没有美国的支持,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处难以在这些土地上进行真正的军事干预。

结果,联合国部队无助地看着波斯尼亚穆斯林被屠杀,以及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只是在 1995 年北约介入后波斯尼亚内战才被阻止了。在卢旺达,图西族游击队在攻入国内并击败了胡图族军队后,才最终结束种族灭绝。联合国维和部队则缺乏武器装备和安理会授权以加入到保护图西人免遭屠杀的真正战斗中。1949 年联合国的“战争罪公约”曾赋予各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阻止种族灭绝的义务。在这些地区不可能实现“无血的”调停,美国政府再次拒绝让军队参与,声言并未发生任何种族灭绝。因此,1994 年,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使命再次失败。

这次悲剧性的失败,加强了新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确保

联合国能在暴力业已爆发的地区迅速决绝地展开行动的决心。他于1996年成为联合国最高官员，他的当选标志着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交官第一次成为秘书长，他把非洲的麻烦作为自己主要关注的重心。他解释道，联合国的任务必须包括干预“主要目标不是毁灭军队而是平民和整个族群”的冲突（包括内战），该目标超越了伍德罗·威尔逊和第一个集体安全组织国际联盟的其他创始人的志向。但自1919年以来时代已经变了，150个新国家在联合国中找到了它们自己的声音，安南深信，联合国比其他任何外部力量都更适于国际维和任务。 440

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他的决心至少带来了一次成功的军事干预。1975年，帝汶岛（Timor）东半部的人民从葡萄牙帝国那里取得了独立，次年被印度尼西亚军队征服。在接下来的20年里，帝汶民族主义者为从印尼那里争取独立，展开了隐秘的零星战斗。90年代下半期，印尼民兵和军队继续战斗，随意杀害帝汶平民，以迫使他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放弃斗争，这是又一场带着种族屠杀的局部战争。

迫于国际压力，印度尼西亚新的文官政府最终同意东帝汶人就独立问题举行公决，它勉强地接受了联合国军队的存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是结束这里的战争，澳大利亚军队率先介入，击败了印尼民兵并将之缴械。在战斗结束后，联合国其他文职官员和军事人员监督了公决投票，帝汶人选择了独立。在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东帝汶新政府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努力，重建其生灵涂炭的土地，建设新的东帝汶民族国家。在后冷战世界，由于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主义已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

恐怖主义与局部战争

在后帝国时代的国家中，国际关系朝着由旧的强权政治和势力均衡方式主宰的方向发展。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创造出脆弱的势力均衡，被称为恐怖平衡，每一方都制造旗鼓相当的海量毁灭性武器。它们偶尔也诉诸强权政治的做法。在超级大国危机期间，它们曾威胁动用核武器，逼迫对手退让。当它们势力范围内的局部争端看上去可能削

弱其主导地位时，它们会毫不犹豫，或堂而皇之或偷偷摸摸地动用武力强制施行自己的意志，斯大林曾把这些办法看作是“资本主义丛林法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成为这种外交游戏中一个变弱了的玩家。

20 世纪末，美国军费占世界所有国家军费总支出的 35%以上。美国军队仍然拥有 5 000 枚洲际弹道导弹，其海军部署在各大洋。维持这种军备水平的庞大费用，得到了年生产能力计达世界生产三分之一的经济的支撑。在这种情形下，不像冷战时代那样，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全球性的势力均衡，苏联崩溃后的数年里，美国独掌着全球霸权。

在此种情况下，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得不按全新的指导原则来解决，联合国提供了一种模式，乔治·布什总统 1991 年的“新世界秩序”吁求给这种方案提供了支持。但在他儿子乔治· W. 布什当政时，美国的重点急剧转变。2001 年对美国东海岸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促使他的政府考虑采取单边行动，打击拒绝遵从美国要求的其他国家，被名之为“预防性战争”，它标志着国际强权政治政策的回归。

441

阿富汗的伊斯兰教

苏联政府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参见第十三章)，这个国家旋即陷入破坏性内战时期。1989 年苏军撤离是对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死刑判决，它在 1992 年垮台了。阿富汗变成了相互竞争的武装团伙的逐鹿之地，它们之前仅是为反对共产党联合在一起。权力的争夺者之一是塔利班运动，它此前兴起于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学校，主要从 80 年代逃离反对阿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的战火的阿富汗难民里招募支持者。仅几年之内，阿富汗难民就已攀升至 150 万，其中一部分在伊拉克，但大部分在巴基斯坦。20 世纪 80 年代，塔利班的好战信仰曾支撑着他们与“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展开浴血奋战。此时，它从其他伊斯兰国家吸引来 3 000 名志愿战士。富有而虔诚的穆斯林，如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曾组织财政援助和军事补

给，与那些他称为“十字军”的人战斗。

苏联撤离后，塔利班继续斗争，试图把这个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转变为伊斯兰共和国。他们的战斗技能与日俱增，巴基斯坦政府向他们提供秘密支持，希图对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施加一些影响。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直至 1997 年得以夺取阿富汗的控制权，这是一个经过 20 年战争沦陷在废墟中的国家。

塔利班最终取得了对国家足够的控制力，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比伊朗更严厉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把穆斯林法强加到民众头上，妇女被迫离开学校或工作，被限制在屋里和家庭中。刑法遵从传统的穆斯林法规，对严重的犯罪行为施以石刑。如听音乐等世俗“邪恶”也变成了公共犯罪，鸦片和海洛因的种植遭到禁止。人民受到一个追求宗教纯净的政权的严格管制。 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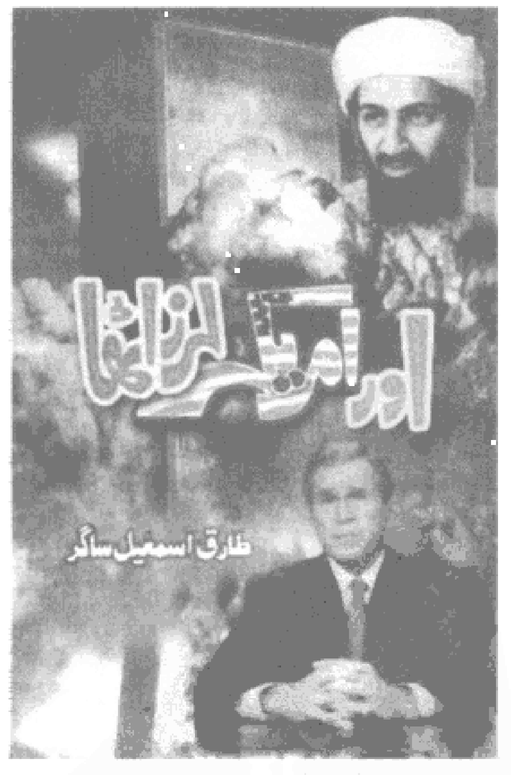


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产生的难民：难民营，伊朗，1986 年（UN/DPI Photo by A. Hollman）

塔利班政府欢迎同样仇视世俗主义和现代性的外国穆斯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物质文明，被它视作邪恶力量而加以狂热反对。1996 年，奥萨马·本·拉登在这里建立了自己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Al Qaeda）的总部，像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运动一

样，基地组织的目标就是恢复“纯净的”伊斯兰信仰，在所有伊斯兰国家以伊斯兰信仰取代西方带来的现代性异端邪说，打击美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政治和外交存在。为此，他遭到了自己祖国沙特阿拉伯的驱逐，这个国家的封建君主制依靠美国的支持。他的组织尽管人数很少，但都愿意为反美圣战慷慨赴死。然而，词语“战争”实际上意指恐怖主义，他的目标是将恐怖主义扩展到世界各地。

奥萨马·本·拉登的组织，与东南亚和中东其他小规模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到 90 年代初，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都出现了小型的恐怖主义组织，对世俗主义和现代性的种种邪恶开战。在印度尼西亚，原教旨主义分子于 90 年代后期对穆斯林社区附近的基督教堂发起暴烈攻击，并于 2002 年，以巴厘岛一家颇受西方游客欢迎的夜总会为攻击目标，炸死了近 200 人。1993 年，另外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着手进行小规模破坏活动，它在纽约世贸中心地下车库制造了爆炸事件。



基地组织出版的书籍：《美国战栗了》的封面，2002 年（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ollection）

这幢摩天大楼对美国人的重大象征意义，使之与华盛顿特区的政府建筑一道，成为恐怖主义分子追逐不舍的目标，基地策划了一个新的、更致命的攻击计划。2001 年 9 月 11 日，本·拉登的 19 名追随者劫持了四架商用航班，并将这些飞机变成巨型的遥控炸弹。他们驾驶两架飞机撞入世贸中心双子塔，第三架撞上华盛顿五角大楼，本来打算让第四架撞击白宫，但由于乘客的反抗，这架飞机在抵达目标前坠毁了。双子塔的崩塌，造成近 3 000 人死亡，被摄影师抓拍了下来，并在电视上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恐怖分子已

将他们的圣战带到了西方文明的正中心。

聚焦：奥萨马·本·拉登

443

奥萨马·本·拉登(1957－2011)从未使用过“恐怖主义”一词，描述他组织的对中东各国政府和美国境内外目标的袭击活动，他深信自己是一名圣战(阿拉伯语是 jihad)战士，与所有伊斯兰教敌人战斗。他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这使他变成了许多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他针对美国的暴力攻击，在 2001 年毁灭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使他成为巨额悬赏的通缉犯。

他的个性和阴谋活动笼罩在神秘中。在公开场合，他以长篇大论，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誓死打败和毁灭所有威胁穆斯林信仰的人，不惜在这场斗争中殉身。据报道，他在 1998 年解释道，“我战斗不止，我以殉道者身份而死，前往天堂觐见真主”。他有着大阴谋家的气质，宣称或暗示自己的基地组织成员为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多起爆炸案负责。他认为这种暴力是除恶扬善，将之臆想为自己的事业，把这些行动视为真正的穆斯林的正义之举，他的这种信念标志着他是一名宗教狂热分子。他随时准备不分青红皂白地发起死亡和毁灭，作为威吓和削弱自己敌人的手段，这使他成为恐怖主义的践行者之一。

从 1980 年加入阿富汗反抗力量与苏联入侵者战斗开始，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就成为他生活的中心。在这之前，他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超级富有的商人之子，对宗教十分虔诚。他父亲的建筑企业兴隆发达，因为在重建穆斯林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诸多大型工程中，沙特君主政权对它的关照超过所有其他企业。20 世纪 70 年代，本·拉登在沙特大学学习，熟练地掌握了工商管理和土木工程技能。去阿富汗后，他用这些技能为阿富汗游击队募集资金、修建牢固的防御工事。像父亲一样，儿子也一丝不苟地奉行瓦哈比教派(Wahhabism)严格的伊斯兰教教义，他以严格的伊斯兰教教义理解阿富汗战争，这让他相信，像十字军东侵时代一样，穆斯林再次处于异教徒的攻击之下。

本·拉登深信，这场保卫伊斯兰教的战斗，需要整个伊斯兰世界信

徒的加入。许多志愿者纷纷来到阿富汗与苏军作战，大多数来自说阿拉伯语的国家，他建立专门训练营培训他们从事现代战争的技能，武器由美国政府秘密提供。在这些浴血战斗中，他领会了圣战、伊斯兰战士和殉道的意义。1988 年，这些武装兄弟成为他新的阴谋组织基地的核心。1989 年，本·拉登为阿富汗游击战的胜利自豪不已，对他来说，战胜苏联军队意味着穆斯林战士击败了“世界上最大的异端力量”。他相信自己在这里亲眼见证了超级大国面对“真主伟大”(Allah Akbar)的呼声时的虚幻。阿富汗战争中的信念和训练使他变成了一名穆斯林战士，这些年是他作为恐怖主义者的学徒期。

444

20 世纪 90 年代，他的圣战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发起对美国的斗争，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的军队驻扎在穆斯林各国。1990 年，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准备为保卫科威特打击伊拉克，他付诸行动反对这个“十字军”国家。他公开谴责沙特王国政府是“美国的代理人”，允许异教徒进入这片穆斯林圣土。为此，沙特政府在 1991 年将他驱逐出境并剥夺了他的国籍。在他看来，他个人遭到迫害的背后和针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背后的邪恶力量就是美国。他在苏丹找到了庇护所，这个国家掌握在一个伊斯兰政权手里。在这里，他为反对沙特君主政府和美国，开始组织自己的战士。从此刻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恐怖活动中。

本·拉登在阿富汗的行动为他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中赢得了荣誉、财力支持和追随者，在这种支持下，他将基地变成组织良好、资金富足的恐怖主义组织之一。他为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数起爆炸案负责，受到沙特和美国特工的追捕。为了寻求更加安全的避难地，他在 1996 年把自己的行动从苏丹转回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在这里即将赢得内战的胜利。塔利班领导人与他拥有同样的宗教狂热，因此，他很快变成新政权的亲密伙伴，他得以利用旧有的军事基地，作为他反美战斗的中心。

他作为恐怖主义组织者和代言人恶名远扬就始于这些年。他并没有受过严格的伊斯兰神学训练，但这种缺失丝毫没有减弱他宣称自己

理解宗教真理的热切之情。在苏丹时，他曾两次出现在视频（他喜欢的传播方式）里，号召发动对美圣战。1998 年初，他以“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圣战国际阵线”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宗教宣言声明，在任何国家，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每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就是“杀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他夸夸其谈的语调是一种战争宣言。是年秋，破坏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爆炸案——几乎确定无疑是基地组织成员所为，向世界证明他是国际上头号恐怖分子。

2001 年 9 月 11 日他袭击美国目标的成功，是他的事业以及他个人的成功时刻。他策划的行动需要数年精心的准备，基地组织成员必须被训练为飞行员，四个恐怖主义小组必须协调行动，劫持飞机在当天几乎同一时刻抵达攻击目标。他对三架成功抵达目标的飞机造成的可怕破坏欣喜若狂，宣称那是“超过他最疯狂梦想的成功”。但它只是成功地挑起了导致塔利班统治垮台的另一场阿富汗战争。这场战争对基地组织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的炸弹攻击摧毁了十年前他与苏联作战时修建的山洞掩体，基地组织曾将这里打造成其行动的中心，许多基地成员被活埋在山洞里。此后几年他被指只在做演讲的录音带，表明自己还活着。他的行动招致来自全世界的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镇压，最终，他所谓的胜利再次证明，恐怖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运动。2011 年 5 月 1 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座隐秘的豪宅里被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击毙。

美国的局部战争

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激起的国际义愤和恐惧，让多个国家形成一个国际同盟，联合起来决心摧毁基地组织运动及其支持者塔利班。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西方反塔利班军事联盟，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对该行动予以了支持，即便是作为塔利班曾经的秘密支持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庇护所的巴基斯坦，也公开支持这场战争。反塔利班军事联盟与阿富汗的几个军阀合作，他们的游

击队让该战争变成阿富汗联军行动。2001 年底发起的进攻成功地推翻了塔利班，摧毁了基地组织的训练营。战争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阿富汗人对他们残酷无情的穆斯林领导人的憎恶。

然而，这场干涉战争只是部分的成功，它没有能够扫清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分支网络，因为许多基地分支组织还在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秘密运作；在国家建设从未消弭宗族、部落和宗教争端的阿富汗，战争也难以带来稳定和政治统一。塔利班继续对他们的阿富汗敌人和外国军队发动零星攻击。这场战争展示了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这个超级大国有着全球性的支配力。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对那些仍然相信势力均衡决定国际关系中的成败的人来说，美国在恐怖主义袭击面前看上去像是一个虚弱的超级大国。乔治·W. 布什任总统的美国新政府声称，这些新情况证明诉诸所谓的“预防性战争”是完全必要的，也就是发动侵入战争，打击那些支持全球恐怖主义的国家。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这种政策必须依靠强权政治的手段(参见第七章“重点：国际主义”)，布什及其顾问准备动用本国的军事力量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实力。基地组织袭击凸显出来中东尤其是美国的软肋，它的石油对美国的经济需求和战略利益举足轻重。

1990 — 1991 年美国领导下的联军，在科威特击败了萨达姆·侯赛因，保卫了这个小国的主权，把伊拉克挡在了中东大国之外。这场战争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以保留萨达姆政权的妥协性和平结束。联合国负责和平协定的执行，其观察员确保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理会授权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自治，美国空军监护着这个国家处于半分治状态，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管对伊拉克部分石油出口的禁运。这种和平安排利用了遏制方式——在意图方面类似美国最先在全球范围内针对苏联所使用的遏制战略，限制萨达姆政权的权力，它继续统治着这个遭到急剧削弱的国家。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总统及其顾问决定将萨达姆政权赶下台。冷战期间，当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受到威胁

时，曾发生过类似的进攻行动，但在中东的战争行动面对的障碍要大得多，这里的穆斯林中广泛存在对美国的敌视情绪。阿拉伯人反对西方介入有着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后英国和法国在那里创建半殖民地国家之时。

446

布什准备在没有经过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入侵。这场新战争缺乏关键成员国的支持，其中包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它们的领导人主张继续维持遏制政策。2003 年 4 月，在仅有的大国英国的支持下，美国侵入伊拉克，其军队迅速击败了伊拉克军队，将萨达姆政权赶下了权力舞台。

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军事占领上，指责美国政府的战争计划建立在几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它意想，只要摧毁伊拉克政权，美国政府在中东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就会从基地组织攻击所造成的损坏中完全恢复；它还期望，伊拉克民众会将美国侵略军当作解放者加以欢迎。美国政府宣称，萨达姆政权在基地组织的袭击行动中扮演了角色，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它对中东地区形成了清晰而严峻的军事威胁，这些指责构成了战争正当性的理由，但没有任何一个是属实的。只是后来，美国政府才把这场战争描绘为向中东推广民主的讨伐运动，利用罗斯福国际主义的对德作战理由，证明其“预防性战争”的正当性。

萨达姆·侯赛因是中东反美抵抗运动的象征人物，他利用反美旗号支撑自己在国内的独裁统治。美国领导层打算，把萨达姆赶下台会显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影响力主宰着该地区的势力均衡。在美军入侵后，俄罗斯总统评论道，这场战争的意图不是与恐怖主义“罪恶作斗争”，而是通过使用自己“强大而装备精良的国家军队”扩大美国在中东“战略影响范围”的一次努力，他在战争中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强权政治行动。对布什政府来说，这个目标值得付出美伊两国人民生命以及破坏伊拉克经济和社会的代价。

事实证明战争的后续之事比战争本身更加血腥。当时，美国政府针对“被解放的”伊拉克尚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甚至没有得到伊拉克

军事领导人的正式投降。在美军对这个国家实施军事占领后的几个月里，伊拉克败军开始了武装反抗活动，这种战斗在两年内造成 1 500 多名美军士兵和成千上万伊拉克平民死亡。建立伊拉克新政府的努力进展缓慢，因为对美军驻扎伊拉克的反对情绪广泛蔓延。美国军方和文职人员，以及协助他们的伊拉克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这些袭击行动是由伊拉克人和国外穆斯林恐怖主义组织发起的。联合国同意在挑选新政府的选举中提供帮助，但面对频繁的恐怖袭击，其官员在这个国家难以自由行动。伊拉克重建努力进展极其缓慢。

美国的单边行动，有意地将在联合国旗帜下维护和平的国际主义战略排除了出去，它清楚地表明，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事务中尚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新秩序"。

小　结

21 世纪初与此前的几十年鲜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在欧洲业已消失，帝国也已消亡，冷战同样如此。前共产党国家新选出来的领导人缓慢地恢复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型历程。自二战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社会已走进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新的全球经济中，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共产党国家留下来的那些过时的工业生活遗产迥然不同。

447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数年，是种族冲突如此剧烈乃至威胁到一些新生民族国家生存的时代。这些悲剧性事件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那些野心勃勃的领导者们不顾人道后果决意要夺取并掌控权力。担惊受怕的人们——常常饱经艰难困苦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所在，在绝望中转向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开出简单易行的药方。20 世纪末，极端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看上去似乎最经常地控制着这把钥匙，他们借助民族主义激情煽起种族仇恨的火焰，经常让与邻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大大提高。联合国的努力提供了些许遏制这些冲突的希望，但民族间仇恨和不宽容的有害结果并没有消失。

2001 年恐怖袭击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世界依然动荡不宁，暴

力频发。联合国力图控制局部战争，但仅获得有限的成功。大国领导者们仍然掌握着发动战争或加入集体维和政策的主动权。在新兴国家中，领导人推动公民民族主义的意愿能够阻遏种族冲突和战争，但种族冲突仍旧是一种潜在的暴力力量。2003 年，当美国领导人判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处于危殆之中，要依靠战争而非集体的外交手段遏制伊拉克时，它动用了强权政治手段。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 1919 年曾吁求由“国家共同体”而非强权政治保护下的和平，但这仍旧是一个希望而非现实。

本章大事记

1964 年　集成电路计算机问世
1965 年　第一颗通讯卫星问世
1971 年　美国放弃金本位制
1973 年　石油危机和全球衰退
1986 年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1980－1997 年　亚洲经济繁荣
1990－1991 年　联合国反伊拉克战争
1991－1995 年　南斯拉夫内战
1992 年　全球环境会议
1994 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994 年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1995 年　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6－2002 年　中非战争
1997 年　塔利班军队征服阿富汗
1997－1998 年　亚洲金融危机
1998 年　世界人口接近 60 亿
2000 年　联合国环境变化会议确认全球变暖
2001 年　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袭击美国
2001 年　美国领导下的入侵行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2003 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

推荐阅读

全球经济、全球环境

·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2000)。尽管书名耸人听闻,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研究。

· John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2000)。人类在 20 世纪对全球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该书对此予以了细致均衡的研究。

· Diane Raines Ward, *Water Wars: Drought, Flood, Folly,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st*(2003)。一部环境史,主要关注 20 世纪下半期的水资源冲突。

维和、局部战争和种族冲突

Christopher Bennett, *Yugoslavia's Bloody Collapse: Causes, Courses, Consequences*(1995)。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南斯拉夫内战和种族清洗痛苦的复杂政治和种族起因。

· Walter Laquer,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3)。一位精通该主题的作者对当代全球恐怖主义的探究。

· Clyde Prestowitz, *Rogue N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2003)。一部缜密的、批判性的研究,探讨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种种失败之处。

·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2000)。对阿富汗政权的翔实研究。作者是一位对该地区复杂政治状况有着透彻理解的记者。

· William Shawcross, *Deliver Us from Evil: Peacekeepers, Warlords and a World of Endless Conflict*(2000)。尽管书名如此,

但其积极地评价了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在对付内战和地区冲突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中取得的成就。

旅行者游记和视频辅助教具

* Michael Ignatieff,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1993)。一位思想深沉的政治暴力观察者，对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和中东民族主义人道的一面的第一手描述。

* Fergal Keane, *Season of Blood: A Rwandan Journey*(1995)。英国广播公司一名记者，根据对悲剧发生时刻的目击，对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栩栩如生的记录。

"The Last Just Man"(2002)。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一部强大的记录片，主要关注一位试图推动国际干预但终未成功的加拿大将军。

www. un. org, 联合国网址，里面有关于它当前和过去活动的丰富信息。

索　　引

（本部分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D

E

H

I

L

O

P

R

S

T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20世纪世界史
作者=作者:（英）布劳尔著
页数=600
SS号=13136380
出版日期=2013.01
出版社=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